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共编入4个专题，即苏联与战后波兰，苏联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与战后罗马尼亚，以及战后苏联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

“苏联与战后波兰（二）”（1944年4月至1948年12月）：专题选编了61件档案，主要是有关战后波兰各派政治力量（以波兰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与苏联政府和苏联驻波兰机构，有关苏联政府内部各机构，以及苏联驻波兰机构与苏联政府之间往来的信件、电报、报告、批示和会谈记录等文献，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单独执掌政权期间，苏联对波兰的政策及苏波关系的发展状况。

“苏联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1944年11月至1948年11月）：专题选编了44件档案，主要是有关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各派政治力量（以捷克共产党、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与苏联政府和苏联驻捷机构，苏联政府内部各机构，以及苏联驻捷机构与苏联政府之间往来的信件、电报、报告、批示和会谈记录等文献，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稳固地掌握政权期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及苏捷关系的发展状况。

“苏联与战后罗马尼亚（二）”（1944年8月至1948年4月）：专题选编了57件档案，主要是有关战后罗马尼亚各派政治力量

(以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与苏联政府和苏联驻罗马尼亚机构,苏联政府内部各机构,以及苏联驻罗机构与苏联政府之间往来的信件、电报、报告、批示和会谈记录等文献,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罗马尼亚工人党全面掌握政权期间,苏联对罗马尼亚的政策及苏罗关系的发展状况。

“战后苏联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1946年3月至1953年10月):专题选编了20件档案,通过党和政府部门的决议、报告、指示和会议记录,有关机构的统计数字,以及大量民众之间的普通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战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部分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农业的政策。

沈志华

2000年12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23-1

苏联与战后波兰 (二)

(1944年4月至1948年12月)

专题说明..... 23-1

- No09133** 莫洛托夫关于未来波兰政府、军队及侨民命运与朗格的谈话记录(1944年4月24日) 23-3
- No09134** 斯大林关于旅美波兰侨民对苏联态度与奥尔列曼斯基的谈话记录(1944年4月28日) 23-14
- No09135** 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致哥穆尔卡的电报草稿(1944年5月19日) 23-21
- No09136** 马努伊尔斯基和巴拉诺夫关于支持向人民统一代表会议发出呼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4年5月22日) 23-24
- No11125** 华西列夫斯卡娅等人关于组建波兰政府问题给哥穆尔卡的电报(1944年7月17日) 23-26
- No09137** 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正常化同米科瓦伊奇克的会谈记录(1944年7月31日) 23-27

- №09138** 苏联人民委员会给苏联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关于其基本任务的指示
(1944年8月2日) 23-31
- №09142** 卡斯曼关于波兰形势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摘要)
(1944年9月5日) 23-34
- №09149** 谢罗夫关于波兰国家军的行动及加强反侦察措施致贝利亚的报告(摘录)
(1944年10月15日) 23-42
- №09150** 克尔关于向波兰派遣英国军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11月2日) 23-45
- №09151** 布尔加宁关于国家军的反苏武装行动给维辛斯基的电话记录(1944年11月3日) 23-47
- №09155** 贝利亚转呈谢罗夫报告时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附函(1944年11月14日) 23-49
- №09165** 莫洛托夫关于西方对苏联承认波兰政府的反应所做的工作笔记(不晚于1945年1月4日) ... 23-51
- №09173** 维辛斯基关于对波兰问题苏美英“三人小组”工作的建议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5年2月16日) 23-52
- №09184**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农民党代表建议与波兰领导人举行谈判的电话记录(1945年3月31日) 23-54
- №09185** 列别杰夫向莫洛托夫转发的哥穆尔卡关于波兰地下活动形势的电报(1945年4月3日) 23-56
- №09188** 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军事当局拘留波兰地下组织代表给克尔的复函(1945年4月9日) 23-59
- №09197** 贝利亚关于向波兰增派内务部部队给斯大林等人的信(1945年5月17日) 23-60

- No09198** 雅科夫列夫与马杜舍夫斯基关于波兰工人党和
社会党情况的谈话摘要
(1945年5月25日) 23-62
- No09200**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奥库利茨基等人案件”
诉讼程序的决定
(1945年6月13日) 23-64
- No09209** 雅科夫列夫与莫拉夫斯基关于波兰政治局势的
谈话纪要(1945年8月1日) 23-66
- No09219** 苏军北方集群政治部关于波兰境内德国居民处境
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摘录)
(不晚于1945年8月30日) 23-69
- No09222** 谢利瓦诺夫斯基关于波兰犹太居民状况给贝利亚
的书面报告(1945年10月20日) 23-73
- No09231**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在强制外迁德国居民问题上的
立场给维辛斯基的电报
(1945年11月10日) 23-78
- No09236** 斯大林转述的与哥穆尔卡和明茨关于波兰局势的
谈话内容(1945年11月14日) 23-79
- No09239**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国内政局与波兰政界领导人
谈话纪要(摘录)
(1945年11月22~25日) 23-82
- No09240** 波兰关于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营地遣返波兰人
的备忘录及营地清单(1945年11月29日) ... 23-87
- No09242**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面临的国内外问题与日莫夫
斯基的谈话纪要(1945年12月1日) 23-90
- No09249**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关于人民党和民主党现状的
谈话纪要(摘录)(1946年1月7日) 23-95

- №09254** 列别杰夫呈送贝鲁特的关于波兰地下武装袭击苏联官兵的情况通报摘要
(1946年1月17日) 23-98
- №09256** 卡普兰-科布里斯卡娅关于波兰工人党的错误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摘录)
(1946年1月) 23-101
- №09268** 克鲁格洛夫关于波兰反政府地下活动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1946年4月23日) 23-108
- №09272**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部长会议讨论访苏事宜给莫洛托夫的电话记录(1946年5月22日) 23-112
- №09273** 斯大林与贝鲁特关于波兰经济和政治状况的谈话记录(1946年5月24日) 23-114
- №09276** 达维多夫关于波兰农民党情况给克鲁格洛夫的报告(摘录)(1946年6月8日) 23-137
- №09278** 奥瓦基姆扬关于波兰社会党政治活动情况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6年7月2~3日) 23-140
- №09281** 达维多夫关于波兰部长会议例行会议给克鲁格洛夫的报告(1946年7月9日) 23-142
- №09283** 雅科夫列夫与西伦凯维兹关于波兰国内形势的谈话纪要(1946年7月18日) 23-145
- №09287**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关系出现危机给杰卡诺佐夫的电话记录
(1946年8月18日) 23-152
- №09288** 列别杰夫关于哥穆尔卡呈交工人党与社会党分歧的报告给杰卡诺佐夫的电话记录
(1946年8月18日) 23-156

- No09290** 斯大林关于波兰社会党的作用问题同莫拉夫斯基等人的会谈纪要（1946年8月19日）…… 23-161
- No09300**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社会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分歧与西伦凯维兹的谈话纪要（1946年10月31日）…… 23-171
- No09301** 克鲁格洛夫关于从波兰领土撤出内务部部队事给贝利亚的请示报告（1946年10月）…… 23-174
- No09304**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人政治情绪与杰韦茨基和克洛茨的谈话纪要（摘录）（1946年12月11日）…… 23-175
- No09306** 莫杰莱夫斯基提交莫洛托夫的有关在苏联羁押的波兰人的资料（1947年1月13日）…… 23-177
- No09320** 波兰工人党关于波兰政治形势给巴拉诺夫的情况通报（1947年3月17日）…… 23-178
- No09321**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关于波兰国内政治形势的谈话纪要（1947年3月23日）…… 23-184
- No09323** 雅科夫列夫与沃尔斯基关于波兰将迁移乌克兰居民的谈话纪要（1947年4月2日）…… 23-188
- No09343** 维佳索夫与普特拉门特关于波兰是否出席“马歇尔计划”协商会议的谈话纪要（1947年7月4日）…… 23-190
- No09344** 尤什凯维奇关于波兰对“马歇尔计划”协商会议态度与亚历山德罗夫的谈话纪要（1947年7月8日）…… 23-194
- No09353** 雅科夫列夫与西伦凯维兹关于波兰领导人访苏事宜的谈话纪要（1947年8月23日）…… 23-196
- No09509**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工人党与社会党之间的分歧与贝尔曼的谈话记录（1948年2月20日）…… 23-199
- No09510** 苏联驻华沙使馆关于波兰社会党代表团访捷书面报告的简报（不早于1948年3月8日）…… 23-202

- №09511**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工人党统一问题与德罗布涅尔的谈话记录（1948年3月9日）…… 23-208
- №09512**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关于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统一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1948年3月12日）…… 23-210
- №09494**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波兰工人党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调查报告（1948年4月5日）…… 23-214
- №09520** 瓦维洛夫等人关于释放和遣返波兰战俘及公民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8年5月23日）… 23-232
- №09498** 雅可夫列夫与兰格关于波兰两党合并后政治纲领等问题的谈话纪要（1948年5月26日）…… 23-235
- №09503**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关于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报告的谈话纪要（1948年6月9日）…… 23-238
- №09523** 波兰工人党中央“关于执行共产党情报局六月会议决定”的资料摘录（1948年10月7日）…… 23-242
- №09529** 哥穆尔卡关于拒绝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机构致斯大林的信（1948年12月14日）…… 23-252

苏联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

（1944年11月至1948年11月）

- 专题说明**…… 23-260
- №09156** 哥特瓦尔德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入苏联给普罗霍兹卡的复电（1944年11月21日）…… 23-263
- №09164** 佐林与费林格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谈话纪要（1945年1月4日）…… 23-264

- No09166** 佐林与费林格关于同匈牙利进行停战谈判的准备情况的谈话纪要（1945年1月9日） 23-268
- No09170** 费林格关于同匈牙利签订停战协定的条件给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1月27日） 23-270
- No09171** 维辛斯基与费林格关于贝奈斯前往捷被解放领土及特欣形势的谈话纪要（1945年2月16日） 23-272
- No09174** 哥特瓦尔德关于贝奈斯谈判的准备情况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报告（1945年2月23日） 23-275
- No09180** 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共制定的政府纲领草案给联共（布）中央的附函（1945年3月10日） 23-278
- No09182** 莫洛托夫与贝奈斯关于捷战后边界、居民和经济形势等问题的谈话记录（1945年3月21日） 23-280
- No09183** 莫洛托夫与贝奈斯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属和经济援助问题的谈话记录（1945年3月24日） 23-290
- No09189** 佐林同诺塞克关于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人的命运的谈话记录（1945年4月11日） 23-295
- No09190** 佐林与劳什曼关于恢复捷工业及其发展远景的谈话纪要（1945年4月11日） 23-298
- No09191** 佐林与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国家建设问题的谈话纪要（1945年4月14日） 23-300
- No09192** 佐林与斯兰斯基关于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的会谈纪要（1945年4月17日） 23-303
- No09194** 佐林关于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局势与西罗基的谈话纪要（1945年4月23日） 23-306

- №09201** 布尔采夫关于斯洛伐克的反匈政策给季米特洛夫的通报 (1945年6月19日) 23-309
- №09202** 杰米亚诺夫与什米特克关于斯洛伐克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5年6月25日) 23-312
- №09203** 斯大林与费林格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等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5年6月28日) 23-316
- №09251** 谢米恰斯特诺夫关于同劳什曼会谈的情况给米高扬的报告 (1946年1月8日) 23-321
- №09255** 克鲁格洛夫关于释放战时捷被拘留人员和战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1月17日) 23-324
- №09257** 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共八大和国民议会选举准备情况的通报 (1946年2月27日) ... 23-326
- №09258** 奇恰耶夫与什米特克等关于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6年3月6日) 23-329
- №09261** 莫洛托夫与里普卡和霍拉克关于民族问题及捷国内局势的会谈纪要 (1946年3月28日) 23-333
- №09269** 莫洛托夫与盖达和诺塞克关于匈牙利居民迁移问题的会谈纪要 (1946年4月30日) 23-340
- №09282** 斯兰斯基关于捷国民议会选举后的形势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 (1946年7月16日) ... 23-347
- №09284** 苏联政府关于调解捷波关系及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给捷、波政府的信 (1946年7月26日) ... 23-351
- №09285** 贝奈斯关于调解捷波关系给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46年8月2日) 23-352
- №09286** 杰米亚诺夫与什米特克关于斯洛伐克共产党影响衰退的谈话纪要 (1946年8月15日) 23-355

- №09318**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加速签订捷—波互助条约
给哥特瓦尔德的信（1947年2月25日）…… 23—358
- №09319**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签订捷—波互助条约给哥
特瓦尔德的信（1947年2月27日）…… 23—359
- №09322** 杰米亚诺夫与胡萨克关于蒂索案件的谈话记录
（1947年3月28日）…… 23—360
- №09334** 杰米亚诺夫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问题与弗拉
什塔茨基的谈话纪要（1947年6月10日）… 23—362
- №09339** 古利亚耶夫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报告
（摘录）（不早于1947年6月22日）…… 23—364
- №09342** 斯兰斯基关于捷国内局势给联共（布）中央对外
政策部的报告（摘录）
（不晚于1947年6月27日）…… 23—372
- №09345** 斯大林关于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与捷政府代
表团的谈话纪要（1947年7月9日）…… 23—376
- №09346** 斯大林对贝奈斯关于捷对外政策问题的来信
的意见（1947年7月11日）…… 23—381
- №07479** 普希金与马罗山关于捷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谈
话纪要（1947年11月21日）…… 23—383
- №09492** 梅德韦杰夫关于二月事件后捷国内情况给联共（布）
中央的报告（1948年3月29日）…… 23—385
- №0949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捷共错误给苏斯
洛夫的调查报告（1948年4月5日）…… 23—392
- №09497** 西林与费林格关于捷社会民主党情况及捷苏经济
合作的谈话纪要（1948年4月9日）…… 23—424
- №09514** 诺维科夫与卡尔内关于捷两党统一和准备议会选
举问题的谈话记录（1948年4月16日）…… 23—426

- №09517** 诺维科夫与诺维关于贝奈斯总统辞职原因的谈话
纪要摘录 (1948年5月5日) 23-428
- №09500** 诺维科夫与诺维关于哥特瓦尔德当选总统一事的
谈话记录 (1948年6月3日) 23-431
- №09507** 诺维科夫与诺维关于捷共和匈共代表谈判少数民
族问题的会谈纪要 (1948年7月30日) 23-434
- №09525** 诺维科夫与契尔维切克关于清洗捷总统办公厅的
谈话纪要 (1948年11月12日) 23-437

苏联与战后罗马尼亚 (二)

(1944年8月至1948年4月)

- 专题说明**..... 23-439
- №09139** 佐林关于在开罗和斯德哥尔摩就罗马尼亚退出战
争进行谈判情况的材料
(1944年8月19日) 23-442
- №09140** 莫洛托夫关于罗马尼亚停战问题与罗马尼亚代表
团会谈记录 (1944年8月31日) 23-447
- №09141** 维辛斯基关于明确停战条件等问题与帕特拉什卡
努的谈话纪要 (1944年9月1日) 23-452
- №09147** 谢罗夫关于部队在克拉约瓦进行的活动给贝利亚
的报告 (1944年10月12日) 23-455
- №09148** 拉夫里舍夫关于罗马尼亚政府改组与帕特拉什卡
努的谈话纪要 (1944年10月15日) 23-458
- №09153** 维辛斯基与瑟讷泰斯库关于执行停战协议的谈话
记录 (1944年11月12日) 23-461

- №09161** 基尔萨诺夫与帕特拉什卡努关于罗马尼亚政府改组的谈话纪要 (1944年12月6日) 23-467
- №09167** 丹古洛夫与特特勒斯库关于其政治立场的谈话纪要 (1945年1月12日) 23-469
- №09172** 巴甫洛夫与特特勒斯库关于组建民族民主阵线政府问题的电话记录 (1945年2月16日) 23-474
- №09175** 基尔萨诺夫关于罗马尼亚政治形势的电话记录 (1945年2月25日) 23-477
- №09176** 贝里关于罗马尼亚政府危机给维辛斯基的信 (1945年2月28日) 23-480
- №09177** 维辛斯基关于同罗马尼亚国王谈判新政府组成问题给莫洛托夫的电话记录 (1945年3月2日) 23-482
- №09178** 维辛斯基关于同罗马尼亚国王再谈新政府组成问题给莫洛托夫的电话记录 (1945年3月4日) 23-484
- №09179** 奥瓦基米扬等人关于罗马尼亚政治形势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5年3月5日) 23-486
- №09181** 奥瓦基米扬等人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社会政治形势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5年3月16日) ... 23-490
- №09186** 贝利亚关于建议出动苏联部队保护罗马尼亚铁路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5年4月6日) 23-493
- №09193** 巴甫洛夫与卢普关于罗政治局势和苏罗关系的谈话纪要 (1945年4月18日) 23-494
- №09195** 维辛斯基关于罗马尼亚国王请求为其调派苏联通信参谋给斯大林的报告 (不早于1945年4月27日) 23-497

- №09210** 维诺格拉多夫和雅科夫列夫关于马尼乌将组织游行示威给维辛斯基的电话记录
(1945年8月16日) 23-498
- №09212** 苏萨伊科夫和巴甫洛夫关于与罗马尼亚国王谈话给斯大林等人的电话记录
(1945年8月20日) 23-500
- №09214** 苏萨伊科夫关于罗国王打算让格罗查政府辞职给斯大林等人的电报
(1945年8月22日) 23-502
- №09215** 拉夫里舍夫关于罗国王对待格罗查政府的不妥协立场给杰卡诺佐夫的报告
(1945年8月22日) 23-504
- №09238** 维辛斯基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归属问题与约尔丹的谈话纪要(1945年11月15日) 23-505
- №09243** 苏萨伊科夫关于罗马尼亚政治形势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5年12月4日) 23-508
- №09245** 季莫菲耶夫关于罗马尼亚对四国外长会议决议的反应给维辛斯基的报告
(1945年12月30日) 23-515
- №092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罗和约给伦敦副外长会议苏联代表团指示的决议
(1946年1月7日) 23-521
- №09248** 格罗查关于三国外长会议改组罗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给维辛斯基的信
(1946年1月7日) 23-524
- №09252** 维辛斯基与特特勒斯库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谈话记录(1946年1月9日) 23-525

- №09253** 维辛斯基与乔治乌-德治关于共产党在政府和竞选中的策略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9日) 23-527
- №09262**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乔治乌-德治、召尔杰斯库关于竞选纲领的谈话记录 (1946年4月2日) 23-531
- №09266** 克鲁格洛夫关于苏联内务部各战俘营中罗马尼亚战俘数量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4月10日) 23-535
- №09274** 卡夫塔拉泽关于对安东内斯库等战犯执行死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话记录 (1946年6月1日) 23-537
- №09289** 巴拉诺夫要求提供罗国内政治形势的信息给乔治乌-德治和波克的信 (1946年6月19日) 23-538
- №09292** 马尼乌为纪念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和恢复独立二周年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8月23日) 23-539
- №09294** 拉夫里舍夫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与帕特拉什卡努的谈话纪要 (1946年9月17日) 23-543
- №09298** 莫洛托夫关于罗马尼亚选举中的合作问题与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6年10月13日) 23-546
- №09303** 雅科夫列夫关于议会选举中的策略问题与波德纳拉希的会谈纪要 (1946年11月6日) 23-549
- №09309** 维辛斯基关于罗共党内分歧与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23日) 23-556
- №09311** 苏萨伊科夫关于就罗社会和政治局势与乔治乌-德治谈话给维辛斯基的报告 (1947年1月30日) 23-561

- №09312** 斯大林关于罗共党内和国内局势问题与乔治
乌-德治和波克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2日) 23-564
- №09313** 什科达关于乔治乌-德治谈及与斯大林会谈的
印象的报告(1947年2月4日) 23-570
- №09316** 斯大林关于罗马尼亚经济政策问题与乔治
乌-德治的谈话纪要(1947年2月10日) ... 23-572
- №09317** 马尼乌等人关于罗政府迫害反对党问题给莫洛托
夫的信(1947年3月13日) 23-577
- №09331** 苏萨伊科夫关于退役及现役军官的抵抗运动给维
辛斯基的报告(1947年5月13日) 23-579
- №09335** 苏萨伊科夫关于罗党内矛盾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7年6月10日) 23-582
- №09337** 诺罗夫科夫关于同乔治乌-德治会面情况给巴拉
诺夫的报告(1947年6月13日) 23-590
- №09340** 雅科夫列夫关于罗共经济纲领等问题与加涅夫的
谈话纪要(1947年6月25日) 23-592
- №09348** 卡夫塔拉泽关于罗国内局势及逮捕反对党领导人
问题与特特勒斯库的谈话记录
(1947年7月18日) 23-598
- №09354** 列萨科夫关于罗马尼亚党内分歧给巴拉诺夫的报
告(1947年8月26日) 23-602
- №09356** 克鲁格洛夫关于被拘留在苏内务部各营地罗公民
数量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7年9月4日) 23-608
- №09360** 乔治乌-德治关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的情况通报(不晚于1947年10月9日) 23-610

- No09365** 克鲁格洛夫关于马尼乌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供词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7年11月1日） … 23-617
- No07482** 卡夫塔拉泽与帕特拉什卡努关于罗共中央领导情况的谈话纪要（1948年1月29日） …… 23-619
- No07483** 莫洛托夫与格罗查、波克关于签订苏罗互助条约的谈话记录（1948年2月2日） …… 23-625
- No07487** 舒托夫与基辛涅夫斯基关于帕特拉什卡努问题的谈话纪要（1948年2月20日） …… 23-630
- No09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罗内务部提供自动武器的决议（1948年4月19日） …… 23-635
- No095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罗马尼亚派遣苏联专家顾问的决议（1948年4月24日） …… 23-636

战后苏联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

（1946年3月至1953年10月）

- 专题说明** …… 23-638
- No03624** 波格列布诺伊关于复员军人安置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摘录（1946年3月20日） …… 23-640
- No05564** 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员会会议纪要（节录）（1946年11月13日） …… 23-641
- No03625** 贝利亚呈报有关粮食困难的报告时给斯大林的附函（1946年12月31日） …… 23-643
- No03629** 兹韦列夫关于实行货币改革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47年4月3日） …… 23-653

- №093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政府对英法照会答复文本的决议（1947年6月21日）…… 23-654
- №03630**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食品和工业品国营零售价目表》的决议（1947年12月14日）…… 23-656
- №03631** 戈格利泽上将的关于哈巴罗夫斯克农业状况给阿巴库莫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2月14日）…… 23-659
- №05565** 克济尔灯塔集体农庄管委会关于收获情况给安德列耶夫的信（摘录）（1948年9月13日）…… 23-662
- №095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参加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苏联代表团的指示（摘录）
（1948年9月29日）…… 23-664
- №0953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关系的决议（1948年12月23日）…… 23-668
- №05566** 尼基福罗娃关于集体农庄状况给苏联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的信（摘录）（1948年12月）…… 23-671
- №03632** 贝利亚关于提高劳改营犯人粮食定额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1949年7月8日）…… 23-673
- №03635** 马林科夫关于呈送落实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决议的报告给斯大林的附函
（1950年7月8日）…… 23-674
- №03637**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工人离职和旷工情况给贝利亚的报告（摘录）（1951年6月5日）…… 23-680
- №06961** 巴甫洛夫娜关于农村生活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1月3日）…… 23-681
- №06964** 米哈伊洛维奇关于集体农庄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1月20日）…… 23-684

-
- №06962** 斯捷潘诺维奇关于农村生产生活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1月22日) 23-687
- №06963** 瓦西里耶维奇关于集体农庄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2月23日) 23-690
- №03639**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给米高扬的报告
(摘录)(1953年9月19日) 23-694
- №03640** 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
计划完成情况给赫鲁晓夫的报告(摘录)
(1953年10月22日) 23-697

【专题说明】

苏联与战后波兰（二）

（1944年4月至1948年12月）

本专题选编的61件档案，反映的是从战争结束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单独执掌政权期间，苏联对波兰的政策，以及苏波关系的发展状况。

从18世纪末以来，波兰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历史上曾三次被沙皇俄国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也是从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稍后苏联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波兰再次亡国。到战争后期（1943年底），出现了两个平行而对立的波兰政权：得到苏联支持的由波兰工人党建立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在英、美支持下的伦敦波兰流亡政府。1944年7月苏联军队攻入波兰本土，与此同时，在波兰的各爱国党派代表云集莫斯科，商议成立了以卢布林为临时首都的波兰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发表宣言不承认以米科瓦伊奇克为首的伦敦流亡政府。1944年底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随后迁都到刚刚收复的华沙。在英、美政府的要求下，雅尔塔会议决定，波兰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地吸收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的基础上进行改组。1945年6月，在苏、美、英三方斡旋下，以贝鲁特为首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同以米科瓦伊奇克为主的波兰其他政治领袖在莫斯科会晤，并达成协议，成立了民族统一临时政府。奥苏布卡—

莫拉夫斯基（社会党）继续担任总理，哥穆尔卡（工人党）和米科瓦伊奇克（农民党）任副总理。这一政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战后波兰国内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在1947年1月议会选举的较量中，左派战胜右派，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获得80.1%的选票和几乎90%的议席。随后议会选举科瓦利斯基（农民党）为议长，贝鲁特为总统，西伦凯维兹（社会党）为总理，哥穆尔卡为第一副总理。此后，米科瓦伊奇克秘密离开波兰（1947年10月），反对派纷纷退出政治舞台，波兰工人党在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然而，在冷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特别是受到马歇尔计划的冲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苏南冲突以后，莫斯科感到必须进一步加紧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因此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和民主党实行合并，建立一党制政治体制。在工人党内部，哥穆尔卡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道路，反对莫斯科派照搬苏联模式的主张，结果在1948年8~9月中央全会上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其罪名是“右倾民族主义”，反对建立共产党情报局，以及对苏共和苏联持不信任态度。社会党的多数领导人也主张保留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反对建立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1947年12月举行的代表大会上表示反对两党合并。但是，在总书记西伦凯维兹的压力下，社会党还是在1948年3月做出了与工人党合并的决定。同年12月两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并成为在波兰实际上单独掌握政权的政党。在此期间，哥穆尔卡拒绝当选合并后的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从而被免去副总理职务，并成为一年后波兰党内开始的“大清洗”的牺牲品。

这里刊出的档案，揭示了在波兰战后的政治变动中，苏联党和政府的考虑及其参与的大体情况。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张廷文、
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张木生、方琼）

No 09133

莫洛托夫关于未来波兰政府、军队及 侨民命运与朗格的谈话记录

(1944年4月24日)

1944年4月24日19时00分

秘密

摘自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互致问候之后，莫洛托夫问朗格^①以前有没有来过苏联。

朗格回答说第一次来苏联。

莫洛托夫问朗格是否会见过其他人。

朗格回答说，他见过华西列夫斯卡娅^②、德罗布涅尔和维托斯^③，简而言之，除伯林格^④之外，见过波兰爱国者联盟^⑤主席团的全体成员。朗格说，他今天还会见了美国大使哈里曼。

莫洛托夫问朗格关心哪些问题。

朗格回答：一言以蔽之，他关心的是波兰事务。他想知道波兰

① 奥·朗格，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② 万达·利沃夫娜·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苏籍波兰女作家，194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并成为在苏联成立的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

③ 德罗布涅尔和维托斯，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代表。

④ 季·伯林格将军，于1943年春在莫斯科建立的波兰军队——波兰第1军团的指挥官。

⑤ 波兰爱国者联盟是波兰爱国反法西斯组织，1943年2月成立于莫斯科，在联共（布）中央和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领导下工作。

人在苏联做的工作，想知道波兰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的社会和政治性质。朗格说，他认为，由于战争，人们变化很大。战争期间，一些社会党人成了反动派，而过去的一些保守派现在成了进步人士。因此，他想看望一些人，结识一些人。

朗格说，他主要想知道在波兰的人是怎么想的，想些什么问题。他从波兰得到的消息，主要是通过波兰政府^①渠道来的。这些消息是一面之辞，他不知道是否可信。波兰的地下工作者通过波兰的军队组织，即通过索森科夫斯基以及他的人，与波兰政府有接触。朗格说，他推测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成员得到的关于波兰地下运动的情报不准确，而波兰政府各个成员怎么想的，在波兰的地下工作者得到的消息也不准确。朗格补充说，对于能否得到有关波兰情况的可靠消息他感到很困难。

朗格还说，他对波兰关于对苏联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感兴趣。朗格认为，不重视涉及面更为广泛的问题就无法讨论波兰政策问题。波兰问题取决于如何处理德国这一问题。

莫洛托夫说，关于如何处理德国问题，盟国已经交换过意见，总之，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

朗格指出，战后德国建立什么制度的问题依然不明确。

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现在还难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不论是希特勒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德国都不应该存在。

朗格问有没有建立新德国的力量。

莫洛托夫回答说，德国的文明力量很多，在那里肯定能找到推翻希特勒的力量。

朗格说他认识一些德国侨民，但是对他们不能寄予厚望。这是

① 指在伦敦活动并得到西方国家承认的波兰流亡政府。苏联于1941年7月与该政府建立关系，于1943年4月与其断绝关系。

些旧派人物，他们想恢复魏玛共和国^①。

朗格接着说，他对东欧和中欧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此有关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问题感兴趣。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个内容广泛而且不仅涉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之间关系的问题。这是个涉及这些国家与德国的关系以及与苏联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德国战后是不是工业国家。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持什么观点。朗格还说，他对红军进入波兰后美国可能对波兰采用什么样的援助形式感兴趣。

莫洛托夫问朗格指的是什么援助。

朗格回答：他指的是经济援助。朗格说美国有许多组织准备给予波兰援助，但是这些组织与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合作。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找到红军进入波兰后波兰人组织或者美国政府能够援助波兰人民的形式。

莫洛托夫问朗格是否对波兰政府感兴趣。^②

朗格回答说，这个问题取决于人民的意愿。在卢布林或者克拉科夫成立波兰政府并不难。这是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波兰人民接受不接受这个政府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坦诚地说，切不可让这个政府被人视为“苏联傀儡”政府。

莫洛托夫说，当然，波兰人会注意到这一点：政府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于波兰。

朗格说，关于波兰，他还对以下两个问题感兴趣：一是组织国内经济问题，二是对外政策问题。第一个问题不复杂，因为在波兰的民主阵营中差不多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这一经济纲领的要点

^① 自1919年通过魏玛宪法至1933年建立法西斯独裁以前存在于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通称。

^② 1943年底波兰爱国者联盟讨论了在莫斯科成立与流亡政府对立的波兰政府问题，该主张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

如下：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自愿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大工业社会公有化。

莫洛托夫问，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是否掌握在国家手中。

朗格作了肯定的答复，并且说，这一纲领是所有各派别的纲领，不仅是波兰侨民而且是意大利和法国侨民的纲领。捷克侨民的纲领与这一纲领相近。总的来说，在这些问题上大家意见几乎是一致的，没有大的麻烦。至于说外交政策，那么波兰旅外侨民中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主张与苏联合作。持第二种观点的人指望再现1918年的局势，当时苏联和德国都被削弱了，而两国中间有一个强大的波兰。这种观点可以称作视波兰为时令性国家的观点。朗格接着说，再也不会有1918年那样的局势了，即使形成这样的局势，那么这种局势也只能存在10~15年。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怀旧观念的代表。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主张苏联与美英两国发生新的国际冲突这种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政策的前景已经被战事的发展摧毁。但是，在国外的绝大多数波兰军人仍然是这种政策的拥护者。我们不知道波兰人民希望选择哪种前途，热衷于哪种政策。如果波兰人民在战争期间有所省悟，那么波兰在外交政策上就不会有困难。但是应当考虑到，战前多数人持第二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在中小学、大学和军队中被广泛宣传。说波兰是个伟大的国家，它既能战胜德国，也能战胜苏联。多数波兰人（朗格解释说他指的是关心政治的那一部分人）热衷于这种前途，也就是说他们还在18世纪的范畴内思维。在波兰的人是不是还热衷于这种前景？如果不是那就好。如果多数有政治头脑的人热衷这种前景，那么就会造成一种悲剧局面。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奉行以第二种观点为指南的政策。其结果可能是悲剧性的，因为如果继续奉行这种政策，苏联政府就会采用非民主的手段在波兰有所动作，从而把英国和美国树为自己的敌人，

这样一来就会酿成新的国际冲突。

朗格接着说，战后，与德国结盟对波兰人民来说是不可能的。只能与苏联合作。

莫洛托夫补充说：“还要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

朗格赞同，又补充说：“还要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

莫洛托夫说，苏联领导人中有人认为：如果我们与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达不成协议，那么我们会和波兰人民找到共同语言。我们已经和捷克斯洛伐克找到了共同语言！顺便说一句，在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时，经我们倡议双方指出，波兰可以加入该条约。我们与捷克斯洛伐克找到了共同语言，而且不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这并非偶然。贝奈斯^①毫无保留地和苏联达成协议也不是偶然的。而1935年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时曾提出过这样的附加条件：苏联的援助应当在法国开始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提供。现在他没有再提带类似附加条件的问题。

莫洛托夫又说，俄罗斯人民和整个苏联政府对波兰人民没有敌意。苏联领导人认为，两国人民在互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是会找到共同语言的。倘若在波兰人士中找不到愿意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强大派别，那倒是不可思议的。

朗格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态度有本质的差别。首先，捷克斯洛伐克在传统上主张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而波兰害怕俄国人。此外，苏捷关系中没有任何边界问题的麻烦。而波兰的情况则不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那里有人会说，波兰版图本来很大，可是后来失去了一部分领土，这部分领土归了苏联。当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困难是可以弥补的。

^① 爱德华·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活动家，战时流亡政府总统，1946～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朗格接着说，他认为，被送到苏联去的波兰人问题^①是个最大、最重要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些人处境不好。朗格说，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到许多人的个人生活，每个人都在想，这段历史千万不要重演。毫无疑问，在伦敦的波兰人士会利用被疏散的波兰人的困难处境作文章。

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方面准备尽一切可能改善被疏散的波兰人的处境，前不久已经让一部分波兰人从苏联北方地区移居到俄罗斯的中部地区。

朗格说，美国和英国会制造一些麻烦。那里有些人认为，苏联想把波兰变成苏联的一部分。这种宣传来自伦敦，许多人信以为真。还有一些人认为，苏联并不力求将波兰并入苏联，而是想建立一个有名无实的独立波兰，主宰波兰的是苏联的傀儡政府。麻烦在于波兰不论建立什么样的临时政府，它都是在红军占领波兰时建立的。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是来自伦敦的贝奈斯，而回到波兰的人则是与红军一起，可能有人会议论他们说：这是“傀儡”。朗格说，美国的宣传就是按这种旨意进行的。

莫洛托夫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摆脱这种局面。

朗格回答说，办法难找。假若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的一些成员参加新的波兰政府，那样的话会好办一些。朗格说他指的首先是米科瓦伊奇克^②。

莫洛托夫指出，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

① 苏联占领东部波兰后曾于1940~1941年疏散了波兰人，当时有近39万人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②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1901~1966），1943~1944年任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总理，波兰农民党领导人，1945年为波兰临时政府成员。尽管米科瓦伊奇克在公开声明中不止一次宣称，他的政府渴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其前提条件是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西部各州并入波兰。1947年米科瓦伊奇克逃亡国外。

朗格说，贝奈斯和马萨利克^①对波兰社会党人寄予很大希望，因为认为他们主张与苏联合作。贝奈斯和马萨利克对米科瓦伊奇克评价很好，因为农民党的表现比社会党好。

莫洛托夫说，社会党有太强的反俄性质。

朗格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说，在慕尼黑协定签订时，农民党在波兰组织了2000次集会，而社会党仅限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此外应当考虑到，社会党领导人是一些出身于小贵族的人，而农民党反对慕尼黑协定大概是出于斯拉夫大家庭的感情。

莫洛托夫指出：此外，波兰农民厌恶地主。

朗格同意这一观点。

朗格说，他不知道能否和米科瓦伊奇克达成协议。朗格指出，他认为国家机构的人员组成是成立新政府最主要的问题。国家机构的人员构成可能将左右政府。譬如，西科尔斯基^②拥护与苏联友好的政策，在美国的波兰外交人士却主张美国和苏联之间发生冲突，而波兰军队则有反苏情绪。

朗格说，依他的看法，波兰政府里有些不错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影响，他们受军人控制。这些人没有个性。朗格说，米科瓦伊奇克有一次想退出政府，离开伦敦飞往美国或者莫斯科，但是拉奇凯维奇不让他这样干。朗格认为，这与其说是理智上的弱点不如说是道义上的弱点。此外，人民统一的神话也使一些人士留在了波兰政府中。

莫洛托夫指出，朗格说的话有许多是正确的。

朗格说，假若能和米科瓦伊奇克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成立波兰政府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样的话，人们就会说这不是苏联傀儡政

① 马萨利克，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

② 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1881~1943），1939~1941年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

府。

莫洛托夫说，他想苏联人也认为这样做有益。

朗格说，他问过华西列夫斯卡娅与米科瓦伊奇克有无接触。她说没有。1月，波兰政府发生过一次危机。据朗格介绍，当时，一些波兰人士想让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代表进入波兰政府。1943年11月，他（朗格）提出了关于波兰民主力量联合的建议，他曾就这一建议撰写了文章。他建议社会党和农民党退出政府，与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代表，譬如德罗布涅尔和维托斯，一起成立联合政府。新政府的任务是：1. 联合包括波兰地下活动力量的民主力量，2. 与红军合作，3. 加入苏捷联盟。当时朗格把这一政府称作联合民主力量政府。他（朗格）认为，华沙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后，可对政府进行改组，使政府的一半成员为战争期间在波兰的人员。一年后，原政府将权力移交给改组后的新政府。但是，来自伦敦的反应是反对这一建议。朗格问莫洛托夫当时有没有见过他关于在伦敦成立波兰政府的备忘录。^①

莫洛托夫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当时对备忘录作了答复。

朗格问，华西列夫斯卡娅是否知道这一备忘录。

莫洛托夫作了肯定的答复。

朗格说，他觉得现在可以做出更好的决定。

莫洛托夫说，苏联领导人对朗格的建议持肯定态度，而且他们认为，把这一建议作为基础是有益的。

朗格说，如果米科瓦伊奇克等人参加这一政府就好了。这不是

^① 朗格在1944年2月14日的备忘录中认为，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政府才会是波兰人民的真正代表者：“政府的成员至少一半应是波兰国内的人士……另一半应是波兰爱国者联盟成员、在伦敦的政府成员（如果他们接受邀请的话）以及旅美波兰人中像利奥·克尔日茨基和天主教教士奥尔列曼斯基这样的民主人士的代表”。

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这样做能解决国际问题。如果成立没有米科瓦伊奇克的政府，那就会授人以话柄，出现所谓“苏联傀儡”的宣传。

朗格说，有人试图和米科瓦伊奇克等人谈，但是朗格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谈的。朗格认为，不能过早与他们谈。

接着朗格问，参加伦敦波兰政府的地下工作者和红军的关系怎么样。最近外国报界对此有报道。

莫洛托夫说，红军和波兰地下工作者没有任何关系。报界的报道不符合事实，由于波兰部队代表所持的立场，找不到与他们合作的基础。

朗格说，还有在英国和近东的波兰军队的问题，英国政府想把他们送回波兰，但是这支军队中的军官是法西斯分子。

莫洛托夫申明，波兰主要的问题是政府问题。国家机构的人员组成关系重大，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波兰领导人的问题。因此，朗格关于在卢布林成立政府的建议是正确的。

朗格问，波兰人民会议^①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机构是在没有苏联和波兰爱国者联盟影响的情况下成立的。

朗格说，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成立新政府的基础。

莫洛托夫指出，不知道这个组织有多大声望。

朗格说，也许应当等一等，不要在红军占领波兰后马上选举政府。切不可让政府戴上傀儡政府的头衔。

莫洛托夫问，美国人士对波兰问题持什么看法。

朗格回答说，据他的印象，一些美国人士认为美国最好不与波

^① 即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农民、青年以及工会等组织于1943年底至1944年初在被占领的波兰土地上建立的。

兰政府保持关系，因为保持这种关系会给与苏联的关系带来麻烦。另外，波兰人干涉美国内政也引起了这些美国人士的不满。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美国有庞大的宣传机构。这是真正的第五纵队。波兰人搞国中之国。美国政府开始看清了这种形势，况且，在美国的波兰政府人士与反罗斯福分子合作。

美国领导人对波兰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美国人希望改组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巩固苏联和波兰的关系。如果美国人以强硬的态度同波兰人谈，他们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不过，很难直截了当地同波兰人谈，因为波兰人声称：“英国政府支持我们！”

朗格说，他认为美国政府比英国政府清楚，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不可能与苏联合作。美国大选后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危机。目前，美国国内形势使美国人不能采取断然措施。

莫洛托夫说，据他的印象，美国政府好像不想让朗格来苏联。

朗格说他不了解详情，但是他没有这种印象。据他的印象，此行的目的对美国政府来说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也许这仅仅是印象而已。

朗格问，报界对他的来访是否会有什么报道。关于这件事他问过哈里曼。哈里曼对他说，他最好去问苏联政府应该怎么做。据朗格的意见，应当发表一个简短的报道他到达的消息，就像报道奥尔列曼斯基^①到来那样。报道中最好说他来探望波兰军，并研究波兰军的性质和宗旨。还应说明他是波兰裔美国公民，芝加哥大学教授。如果不在报上作这样的报道，那么就会让人抓住把柄，围绕他（朗格）的莫斯科之行大作文章。

莫洛托夫问朗格是否和奥尔列曼斯基很熟悉。

朗格回答说对他有所了解。

^① 奥尔列曼斯基，旅美波兰侨民，天主教教士。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朗格是自己的客人，当然考虑到他是以私人身份来的，关于这一点罗斯福总统也通知了斯大林。

朗格告别时对莫洛托夫的接见表示感谢。

谈话进行了 1 小时 30 分。

记录 波采罗布

1944 年 4 月 24 日 19 时于莫斯科

№09134

斯大林关于旅美波兰侨民对苏联态度与 奥尔列曼斯基的谈话记录

(1944年4月28日)

秘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参加会见。

奥尔列曼斯基和斯大林同志问候之后说，他首先想代他的妹妹向斯大林同志转交一份小礼物。然后他打开他的手提箱，从箱中取出两个美式鹰徽状的书夹奉送给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并说鹰徽不像鹰。它们看上去不像波兰鹰徽。它们更像鸽子。

奥尔列曼斯基说，这是真正的美国鹰徽。

奥尔列曼斯基说，他想向斯大林同志讲述美国波兰侨民的情况。他会向斯大林同志道出真实的情况。情况目前相当困难。波兰人的组织和波兰神职人员有反苏情绪。他（奥尔列曼斯基）来苏联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怎么分化他们。在这一方面他（奥尔列曼斯基）在美国成功地做了自己的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向各界波兰侨民的代表做过讲演。他们支持他的行动。在美国的波兰人很多。例如，在底特律就有33万人。从莫斯科回国后他可能到那里去，向他们做讲演，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在美国的波兰人是一支很大的力量，那里有500万波兰人。仅芝加哥一地就有50万波兰人。波兰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起很大作用。因此，罗斯福在对波兰问题

公开发表意见时不得不慎之又慎。他（奥尔列曼斯基）想把旅美波兰侨民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从而为罗斯福就波兰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奠定基础。这样，罗斯福就能与俄国把一切事情办好。现在，在美国的波兰人大谈什么苏联对待在苏联的波兰儿童和波兰成年人不好。他（奥尔列曼斯基）来到这里后已经见到了波兰儿童和波兰人。他认为，波兰人民应当就俄国过去和现在给予波兰人的一切向俄国和斯大林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是吃人的野兽。

奥尔列曼斯基笑了，他说他想看的一切都看了。他和莫洛托夫谈过，对莫洛托夫向他说的一切都满意。他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旅美波兰天主教教徒反对苏联的最大理由，是俄国似乎打算消灭波兰的天主教会。他知道这不是事实，他回到美国后将向波兰人正确地介绍实际情况。如果他把旅美波兰神职人员争取到自己一边，那么，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会影响到波兰本国神职人员的思想，当红军进入波兰后他们会和红军合作。他想知道怎么做这一工作。他认为他能够胜任，尽管这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关于苏联人的流言五花八门。说他们想消灭宗教。这些流言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存在初期，俄国东正教教会人士和苏维埃政府人士之间发生过一场残酷的斗争。当时，1917年10月政变后俄国出现了以列宁为首的新政府，东正教教会和其他一些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宣布苏维埃政权大逆不道，并号召人们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命令。^①

奥尔列曼斯基指出，政教分离是件很好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我们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中有一条就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苏维埃政权刚一成立我们就立志贯彻这条规定。但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俄国最新解密档案见本档案选编第22卷。

是，东正教教会人士的叛乱使我们无法贯彻这条规定，当教会宣布要把苏维埃政权扫地出门后，政府不得不应战。宗教界和政府人士之间由此产生了隔阂。这是对德战争前的情况。对德战争开始后，人和事都发生了变化。战争消除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分歧。宗教界人士放弃了暴乱立场，苏联政府也放弃了对教会兵戎相见的立场。

奥尔列曼斯基说，这一点他完全明白。

斯大林同志说，对于波兰，苏联政府丝毫无意干涉它的内部事务，更不用说干涉它的宗教事务。波兰将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不论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还是宗教制度，这是波兰人自己的事。我们苏联人希望波兰有什么呢？我们希望波兰有这样的政府：它能理解并且珍惜与它东边邻国的良好关系，为了与共同的敌人德国作斗争能同意保持这种关系，因为德国不论被我们打得怎么惨败，它都会再度崛起。我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

值得指出的是，德国第一次进攻法国是在1870年，那次德国之所以打赢战争是因为当时有许多中立国。1914年德国再次进攻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输了，因为到战争结束之前许多国家就已不再坚持中立立场，而是反对德国了。看来德国侵略行动的间隔越来越短了。第一次间隔是40~42年，如果从1918年算起至1939年，第二次间隔是21年。他（斯大林同志）认为，15年左右德国能够东山再起。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考虑怎么结束现在的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我们有可能胜利地结束，而且应当考虑再过20年当德国恢复元气后会有什么情况。为了不让德国有可能作为侵略者东山再起，这就是俄国与波兰结盟绝对必要的原因。自拿破仑时代起，在140~150年中俄罗斯三次遭受入侵。拿破仑进犯是第一次入侵。上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入侵了俄罗斯，最后一次是他们现在的入侵。这三次都是经波兰入侵的，由此可见，波兰似乎成了外国侵略者的走廊。不论这些侵略者是遭到失败还是取得胜利，波

兰人都蒙受了苦难。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就像俄国人讨厌大批侵略者经过波兰进军一样，波兰人讨厌把波兰当作走廊。因此，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如果波兰和俄国结盟，那么由此受益的只有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而受损失的是德国侵略者。他（斯大林同志）可以向奥尔列曼斯基举格伦瓦尔德会战^①的实例加以说明，这次会战中各斯拉夫民族曾联合起来反对日耳曼条顿骑士团。那次日耳曼人被联合起来的波兰人、俄罗斯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打败了。他（斯大林同志）认为，需要使格伦瓦尔德会战政策在广泛的基础上复生。这是他的夙愿。他（斯大林同志）问奥尔列曼斯基对苏联政府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还有什么疑问，他可以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奥尔列曼斯基回答说，他个人没有任何疑问。

斯大林同志说，关于波兰与苏联、波兰与德国的边界问题引起了猜疑。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俄罗斯与波兰、波兰与乌克兰以及波兰与白俄罗斯，只有在上述任何一个国家不占有别国领土的条件下才能搞联盟。他（斯大林同志）觉得，如果这些国家不相互提出领土要求，它们以后就能搞好友谊。当年苏联政府提出关于寇松线^②的建议，就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他（斯大林同志）应当指出，当时，寇松线是在没有征得苏联政府同意，违背它的意志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条边界线是在召开巴黎和会时炮制的。1918年开始炮制，1919年完成，它是这一年对外宣布的。在凡尔赛的波

① 1410年7月，波兰、立陶宛和俄国军队在波兰国王的指挥下，于格伦瓦尔德合围并歼灭了德国条顿骑士团的军队，从而阻止了德国军队的东进。

② 寇松线是1919年12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建议的波兰东部边界线的约定名称。1920年7月苏波战争期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要求苏联红军在这条线上停止进攻，因而得名。1945年8月，寇松线在做了一些有利于波兰的变动后成为苏波边界条约的基础。

兰代表团没有同意这条边界线，苏联政府也没有同意这条边界线。没有一个不可轻视、举足轻重的独立波兰，将来就不可能遏制德国侵略者。切不可让波兰成为孤立的波兰，而应让它与俄国和西方盟国修好。至于波兰西部边界，必须首先和波兰人士达成一致意见。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都问过他（斯大林同志）。他（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都说，我们的意见是波兰西部边界应当沿奥得河走，甚至奥得河略西一些。最好把斯德丁港划入波兰，这是个很好的港口，也许应把布雷斯劳也划入波兰。罗斯福问怎么达到这一目的。他（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必须打败德国，到那时我们帮助波兰办成这件事。我们的立场就是这样。他（斯大林同志）陈述的这一番话不是我们不切实际的愿望。我们将为波兰获得这些土地而奋斗。

奥尔列曼斯基表示赞同斯大林同志说的话，并补充说：确实需要为此而奋斗。如果俄国与波兰建立友谊，那么德国人就不会东进。那样的话他们会西出。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也不能让德国人西出，因为俄国和波兰也同西方国家英国、法国结盟。

奥尔列曼斯基说，如果我们想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让逃离波兰、现在住在伦敦和纽约豪华宅院和寓所里的富翁及贵族进入波兰。如果他们跑回波兰，他们就会把那里搞得天翻地覆。他们就会煽动波兰人民对苏联采取敌视行动。问题在于波兰人民的领导人不好。他们总是念念不忘过去，总是回过头去看他们的老皇历。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民族是个好民族，波兰人是毫不畏惧的战士。至于说到奥尔列曼斯基所说的波兰贵族和富翁，他（斯大林同志）觉得，波兰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不会让他们进入自己国家的。波兰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德国占领期间经历的苦难太多

了。他们能够忍受自己悲惨的生存条件简直是奇迹。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们当然不会让那些给波兰招来现在这些苦难的人进入波兰。据他（斯大林同志）所知，波兰人民的情绪是这样的。

奥尔列曼斯基说，他下定决心分化旅外波兰侨民集团。他很高兴与斯大林会见。他一回到美国就积极着手工作，并将一切情况通报给斯大林。不过，他已向莫洛托夫说过，他不希望现在大肆宣传他在这里逗留一事。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报纸已经报道了奥尔列曼斯基在莫斯科逗留的消息。例如《纽约先驱论坛报》。

奥尔列曼斯基称，他希望在回到美国后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再公开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消息。到那时也可以公开他与斯大林的照片。他（奥尔列曼斯基）想知道，他能否与斯大林同志一起照张相。

斯大林同志说同意照相，并招呼摄影师照相。他问奥尔列曼斯基是否同意明天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今天会见的消息。

奥尔列曼斯基称，既然美国报纸报道了他在苏联逗留的消息，那么现在可以发表已经提议的报道了。

奥尔列曼斯基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他（奥尔列曼斯基）最好不要探望在苏联的波兰军，而是返回美国，参加波兰代表大会。他（奥尔列曼斯基）认为，探望波兰军要用10天时间，他会赶不上代表大会。

斯大林同志说，奥尔列曼斯基可去探望波兰军，也许该向他们祝福。为此将为他提供专列。去波兰军和返回莫斯科用不了5~6天。奥尔列曼斯基可于明天12时乘专列从莫斯科出发。

奥尔列曼斯基说，他就照斯大林的忠告去探望波兰军。

奥尔列曼斯基请求让美联社代表明天上午8时到他这里来，他打算向他通报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消息。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事会办妥的。

奥尔列曼斯基问，他可否参观斯大林格勒，因为他回到美国后人们会问，他是否到过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同志回答：当然可以，他的斯大林格勒之行可以安排。

奥尔列曼斯基表示，他回到美国后将向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或者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通报自己的活动情况。同时，他还请求允许他到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听取他所关心的消息。

斯大林同志对奥尔列曼斯基表示感谢，并且表示：他当然可以到我们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听取他所关心的消息。

奥尔列曼斯基告别时说，斯大林同志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创造了奇迹，他会健康长寿的。他（奥尔列曼斯基）很幸福，因为有机会与斯大林见了面。

斯大林同志感谢奥尔列曼斯基赠送的礼物，并且请求奥尔列曼斯基对他的妹妹赠送礼物转达谢意。

奥尔列曼斯基说，礼物很轻，但它是奥尔列曼斯基的妹妹诚心诚意赠送给斯大林的。他（奥尔列曼斯基）希望战后和他的两个妹妹一起来这里，他想请斯大林答应接见她们。

斯大林同志答应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

记录 B. 巴甫洛夫

1944年4月28日22时于莫斯科

No09135

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关于全国人民 代表会议致哥穆尔卡的电报草稿

(1944年5月19日)

波兰工人党中央维斯瓦夫^①：

谨向顽强抗击德国占领者争取祖国自由的您以及全体同志致以兄弟般的敬意。

我们拥护您提出的关于组织全国代表会议^②的倡议，全国代表会议是为驱逐德国占领者，粉碎国内反动派，争取建立独立民主波兰而斗争的民主力量联合的中心。

我们拜读了通过卢布林州委通信员收到的文件，还听取了到我们这里来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关于全国代表会议四个月工作的详细通报。因此我们坚信，为了更有成效地联合波兰所有的爱国力量，为了建立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统一民族阵线，全国代表会议应当扩大自己的社会政治基础。为了这一目的，应当通过宣布譬如保证土地私人所有，保证个体企业主办中小工商企业主动性这样的口号和规定，来缓和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宣言中提出的关于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大工业和大银行国有化的经济要求。我们认为，

① 维斯瓦夫，哥穆尔卡在党内的化名。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905～1982），早年参加波兰共产党，1939年从狱中逃脱后去苏联。1942年回国参加抵抗运动，翌年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

② 原文如此，应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下同。

还应当提出符合从工人到民主资产阶级所有民主人民阶层利益的社会经济要求。

为了扩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基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积极做人民派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吸收人民派中央委员会或者加入该派的个别组织参加全国代表会议，实为上策。^①

为了加强波兰工人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农村的影响，建议将波兰工人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领导干部从华沙和其他大城市派到农村去。

我们觉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宣传材料必须更多地面向反动组织的普通成员，把分化和分裂反动组织并使这些组织的普通成员站到自己一边，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任务。

为了避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对苏关系和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口径不一，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后的纲领性文件和宣传材料中对这些问题做出更为明确的表述。

① 1944年的年初和春季，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和联共（布）中央机关中存在一种顾虑，担心“波兰工人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奉行宗派主义的方针，突出波兰工人党的主导作用，轻视其他党和组织在代表会议中的作用，出现政治上的偏差，造成一种波兰工人党实行波兰苏维埃化方针的假象，而实际上它没有实行波兰苏维埃化的方针，而且也不应当实行”。哥穆尔卡在1944年3月7日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反驳了关于左倾宗派主义的指责，尽管他承认基层组织有歪曲党的路线的情况。

我们深信，你们会讨论我们的意见并将自己的决定通知我们。^①

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② 萨瓦茨基

1944年5月19日于莫斯科

-
- ① 回电草稿经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修改后，于1944年5月19日发给格·季米特洛夫。草稿的空白处有格·季米特洛夫于当天做的批注：“这不仅是经济要求”，“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波兰从德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必须明确地说：反对对1940年并入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的乌克兰土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任何要求！”，“不要把未来波兰的边界问题作为共同反对德国人的必须条件提出来！”，“提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派中央委员会（及其组织）共同斗争的纲领，主要任务是：为驱逐德国占领者共同进行武装斗争，诚心诚意地与红军合作，因为波兰军队也在红军中作战”。
- ② 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成立于莫斯科，其目的是领导波兰爱国者联盟、季·伯林格将军指挥的军队（1943年春始建于莫斯科）以及游击运动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帮助波兰工人党。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成员是现有波兰干部的基础上，由季米特洛夫于1944年1月24日向斯大林推荐的。1944年2月2日，联共（布）中央批准了以亚·萨瓦茨基为首的由五人组成的政治局以及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章程。

№09136

马努伊尔斯基和巴拉诺夫
关于支持向人民统一代表会议
发出呼吁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5月22日)

机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现将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提出的对维斯瓦夫 1944 年 5 月 19 日第 940 号电报的回电稿^① 呈上，请您审阅。出于以下考虑我们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的建议：

第一，向人民统一代表会议^② 发这样的呼吁会使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它是作为一支努力联合波兰各阶层反抗德国人的力量而行动的。

第二，倘若统一代表会议拒绝这一建议，那么同室操戈的全部责任将由流亡波兰政府及其在波兰国内的支持者承担。

第三，这一呼吁会给流亡政府支持者阵营带来混乱，无疑会促进人民派中央委员会和人民统一代表会议基层组织的叛离。

① 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建议波兰工人党中央与人民统一代表机构就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进行谈判，而开始谈判的前提条件是立即停止骨肉相残、与苏联和红军合作、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同占领者进行武装斗争的领导中心、有争议的问题留待战争结束后由议会解决等等。

② 人民统一代表会议是流亡政府的地下权力代表机构，成立于 1944 年 1 月 9 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也支持这一观点。

Л. 马努伊尔斯基^①

Л. 巴拉诺夫^②

1944年5月22日莫斯科

① 季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 (1883~1959)，俄国和国际革命活动家。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44年7月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

② Л. 巴拉诺夫，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

№ 11125

华西列夫斯卡娅等人关于组建 波兰政府问题给哥穆尔卡的电报

(1944年7月17日)

致维斯瓦夫转全国人民会议

关于以民族委员会的形式组建临时政府的问题，是十分迫切的问题。有鉴于此，为保护干部已经决定，立即组织以下人员前往苏联境内。第一，全国人民会议全体会议的全部委员，第二，适合担任部长和副部长职务的所有著名活动家，第三，您本人以及您认为重要的党的工作人员。总人数不能少于60人。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会议要留下临时领导人。应该保证被派出者家庭成员的安全。请立即着手执行这个任务，这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已经通过组织飞行的全部措施。明天将继续下达指示。

华西列夫斯卡娅

莫拉夫斯基^①

萨瓦茨基^②

罗拉^③

1944年7月17日于莫斯科

① 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全国人民会议全权代表。

② A. 萨瓦茨基，波兰共产党中央局书记。

③ 罗拉-日缅尔斯基将军，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波兰全国人民会议全权代表。

№09137

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关系 正常化同米科瓦伊奇克的会谈记录

(1944年7月31日)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参加会谈的有格腊勃斯基、姆尼舍克和罗默。

米科瓦伊奇克向维·米·莫洛托夫问候。

莫洛托夫说，他欢迎米科瓦伊奇克来莫斯科。

米科瓦伊奇克感谢在莫斯科为他提供的一切方便。同时，米科瓦伊奇克表达了请求约·维·斯大林同志接见的愿望。不久前，格腊勃斯基已经向列别杰夫^①谈过米科瓦伊奇克的这一愿望。现在他（米科瓦伊奇克）想谈两件事。第一，现在，波兰政府正在积蓄力量，以便在关键时刻协助苏联部队与德国人进行斗争。波兰政府已经和不久前从波兰来的塔博尔将军一起制订了波兰人的行动计划，并将行动计划交给了英国政府，请他们将该计划转交苏联政府。还在去年10月，波兰所有的武装力量已经得到命令：与苏联武装力量一起进行斗争。维·米·莫洛托夫大概已经获悉实施这一命令的消息。

^① B.3. 列别杰夫，苏联外交部官员，后任苏联驻波兰大使。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已经获悉，但完全不是这种性质的消息。

米科瓦伊奇克说，波兰政府有一个动员一切力量与德国人斗争的计划。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为了给将来波兰和苏联的友好合作奠定基础，必须找到苏联和波兰两国政府的共同语言。他（米科瓦伊奇克）深信，几乎所有的波兰人都拥戴他。他（米科瓦伊奇克）代表着波兰那些愿意与苏联合作，并且与那些不太愿意与苏联合作的党派作斗争的政党。

莫洛托夫指出，他不完全明白米科瓦伊奇克说的话。波兰政府中有不同党派的代表，其中包括那些毫无争议怀有敌意的党派。

米科瓦伊奇克称，波兰政府中没有这样的党派，参加政府的4个政党^①都愿意和苏联合作。

莫洛托夫说，那么最好暂且不谈这个问题。

米科瓦伊奇克称，他深信，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之间没有重大的分歧。他（米科瓦伊奇克）愿意就所有的问题与苏联政府谈判，并使苏联政府相信波兰政府的真诚愿望。

莫洛托夫回答说，最好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②谈判。

米科瓦伊奇克称，他认为，他最好与苏联政府谈判，因为它英勇的军队正在打击德国人。苏联政府是自己国家强大力量的代表者，而这个国家将要领导欧洲。当他（米科瓦伊奇克）谈到历史性

① 指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族党和劳动党。

② 指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经斯大林同意，由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爱国者联盟的代表于1944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建立。1944年5月中旬，由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全权代表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代表团受到斯大林多次接见，并与波兰共产党人中央局和波兰爱国者联盟进行了谈判。1944年7月15日，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华西列夫斯卡娅致函斯大林，建议成立临时波兰政府。苏联方面表示准备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及其执行机构，并建议后者的名称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时刻的时候，他想强调指出，如果苏联政府大度地欢迎波兰政府，那么波兰人民就会和苏维埃俄国结盟。如果他（米科瓦伊奇克）和民族委员会谈的话，那么他相信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觉得米科瓦伊奇克最好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它更了解波兰的情况。他（莫洛托夫）还想补充说，斯大林元帅通过丘吉尔转达的他可以会见米科瓦伊奇克的话仍然有效。因为斯大林元帅军务缠身，根据莫斯科的工作安排看，他（莫洛托夫）估计斯大林同志星期三或星期四才能会见他。他（莫洛托夫）将向约·维·斯大林转告米科瓦伊奇克关于接见的请求。^①

米科瓦伊奇克说，对莫洛托夫所说的关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了解波兰情况的话，他想回答说，到达伦敦的波兰代表对波兰的情况是很了解的。

莫洛托夫回答说，波兰本国的消息要比波兰代表的消息多。

米科瓦伊奇克同意莫洛托夫的话，并且说，塔博尔将军随时可能从伦敦乘飞机来通报波兰的局势。波兰政府已经考虑好在华沙举行总起义的计划，想请苏联政府帮助轰炸华沙附近的飞机场。^②

莫洛托夫说，到达华沙仅剩 10 公里左右的路程了。

莫洛托夫问米科瓦伊奇克还有什么问题。

米科瓦伊奇克说他没有其他问题了，并说他准备回答莫洛托夫的问题。

① 1944 年 8 月 3 日和 9 日斯大林接见了米科瓦伊奇克。

② 华沙起义是 1944 年 8 月 1 日由隶属流亡政府的国家军和地下武装力量的总司令部发动的，未与红军司令部协商。米科瓦伊奇克是在莫斯科时于 8 月 3 日获悉开始起义的。起义领导人的政治目的是阻挠建立与苏联友好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政权，从而不让莫斯科影响战后波兰的内部进程。苏联领导人对华沙起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否定的，这种态度在塔斯社的官方声明中，在斯大林与西方大国领导人的来往信函中，在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人士的谈话中都有反映。可参见本档案选编第 21 卷刊载的关于华沙起义的文献。

莫洛托夫问米科瓦伊奇克有什么（莫洛托夫）可以向斯大林元帅转告的要求。

米科瓦伊奇克回答说，他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请莫洛托夫转告斯大林元帅，他（米科瓦伊奇克）是全波兰人民情绪的表达者。

莫洛托夫说，他已经谈了自己的意见：米科瓦伊奇克最好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会晤。

米科瓦伊奇克说，他准备和委员会会谈。但是他很清楚，他和委员会只能讨论一部分问题，而他和苏联政府能谈判所有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和苏联政府应当讨论那些与苏联政府有关的问题。

罗默问，米科瓦伊奇克能否向伦敦发密码电报。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这事可以办到。

罗默请莫洛托夫同志下达有关的指示。

谈话进行了30分钟。

记录 B. 巴甫洛夫

1944年7月31日于莫斯科

№09138

苏联人民委员会给
苏联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
关于其基本任务的指示

(1944年8月2日)

秘密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已经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

给苏联人民委员会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的指示

苏联人民委员会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在自己的工作中应当遵循以下指示：

1. 履行苏联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职责，其基本任务是代表苏联和红军的利益，本着友好和紧密合作的精神处理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地方机关的关系。

2. 同时应考虑到，根据1944年7月26日苏联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在波兰领土的作战地区，所有作战事务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属苏联军事指挥部。应当注意到，在寇松线以东的全部领土上，一切权力属苏联机构和苏联军事指挥部，它们是这一领土上的全权主人。

3. 苏联代表必须监督苏联军事机关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不

折不扣地执行1944年7月26日关于苏联总指挥部与波兰行政机关相互关系的协议。

4. 根据第1条所述的任务，责成苏联代表尽一切可能协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组织政权机构，领导政权机构的活动，以及实施全国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措施。

5. 苏联代表必须全面协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尽快组织起印刷厂和报纸的出版，建立广播电台、电话电报网以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及其机构与居民联系的其他设施。

6. 苏联代表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实施组织、创建和补充波兰军的措施。波兰领土上的动员工作，只能由作为波兰主权国家政府机构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或者受其委托由红军指挥部实施。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无关系的各种波兰团体在波兰领土上进行的动员为非法动员，实施这种动员的人员应视为在波兰居民中煽动暴乱的德国间谍，立即予以逮捕。不承认在波兰领土上的其他任何权力机构，其中包括波兰流亡“政府”的权力机构；自称为这些权力机构代表的人员应视为冒名者并作为冒险分子予以逮捕。^①

7. 苏联代表必须严格监督，使最高统帅部关于在红军后方清除流亡“政府”的各种团体和部队、清除所谓国家军^②武装部队

^① 苏联权力机关的镇压行动在1944年8月引起波兰领导人的不安，以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致函苏联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尼·亚·布尔加宁，他在信中建议，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派出代表，苏联机构可预先与其协商关于逮捕某些波兰人的问题。但这一建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布尔加宁于1944年8月28日声明，除间谍案以外，与镇压波兰人有关的所有问题，一律移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国家安全局处理。

^② 国家军是波兰的群众性地下军事组织，其组建目的既是为了反抗希特勒占领者，也是为了恢复战前波兰的东部边界，战后确立波兰流亡政府的政权，以防波兰转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详见本档案选编第19卷的文件。

的指示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要监督解除上述团体和部队的武装，监督“锄奸”机构^①拘留其军官。

8. 苏联代表应向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讲明，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波兰的任务，由红军和第1波兰军团的正规部队执行。因此，在已经解放的波兰领土上，曾经起过自己作用的游击队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因而应解除武装，派往第1波兰军团的预备营。

9. 注意必须使伯林格的第1波兰军团指挥部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特别是和作为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罗拉-日缅尔斯基将军之间保持正常的工作关系。

10. 如果苏联军事机关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机关之间出现某种误会或意见分歧，应采取消除这些误会的措施，本着与波兰权力机构友好和密切合作的精神加以解决。

11. 苏联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必须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2、3方面军的指挥部以及“锄奸”机关保持经常的联系，必要时给它们下达命令、指示和指导意见。

12. 苏联代表必须定期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报告波兰的形势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及时汇报自己的工作和采取的措施。

1944年8月2日于莫斯科

^① “锄奸”机构是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总局的特别行动支队。

№09142

卡斯曼关于波兰形势
给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摘要）
（1944年9月5日）

机密

格·米·季米特洛夫同志：

……^① 以下是关于各人民阶层，主要是农民对正在组织的波兰民主国家体制的态度以及关于民主阵营和反动派力量对比的一些情况。

关于农民的情况

德国占领时期在农民中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并且有重大影响的是以下组织：1. 农民党及其组建的群众性军事组织——农民大队；2. 隶属于伦敦流亡政府的国家军；3. 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此外，在一些地区还有接近国家军的反动组织，例如法西组织民众军事力量。

农民党和农民大队的影响最大，能左右农民的思想情绪。诚然，有些地区国家军的势力比农民党强大，例如比亚瓦—波德拉斯卡、谢德尔采和沃姆扎。

^① 删节号为该文献公布时省略的部分内容。下同。

虽然农民大队在农民中占优势，但是国家军毕竟建立了它在全国星罗棋布的农村组织网。

根据农民大队中央领导的决定，农民大队组织应加入国家军，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它们仍旧是独立的往往是完全自主的组织，因为它们的基层和中层骨干分子对国家军有不信任感。

在卢布林省，各地的农民大队仍保持着自己的自主性。例如在帕尔切夫—奥斯特鲁夫区，农民大队组织公开与人民军^①一起行动，继而作为一个自主的单位加入了人民军。在卢布林省南方各区，农民大队组织在中央做出将它们并入国家军的决定之后，更名为农民卫队，和人民军一起行动，并且组建了自己的一支编入人民军的队伍。在拉多姆地区，一些农民大队组织把自己依附于国家军的关系归结为仅向国家军司令部递送自己的工作总结。在奥特沃茨克区（在华沙附近），农民大队把它的主要骨干队伍交给了国家军，但是自己仍保留了一部分队伍作为特工队。各独立的地主农民大队组织和国家军的相互关系不一样，这取决于比较坚定的民主分子或反动分子在这些农民大队组织中有没有影响。农民大队组织是最有群众性而且在农民中最有威信的组织。

波兰工人党在卢布林省的一些区有强大的农村党组织和农村军事组织。在拉多姆地区，在华沙近郊各区，在普沃茨克地区，在克拉科夫地区和琴斯托霍瓦地区的一些区以及其他地方，也同样有波兰工人党的农村组织。当然，这样的组织没有遍及全国。但是，波兰工人党对农民群众的影响和作用并非仅仅限于波兰工人党的农民组织对自己拥护者的直接影响，波兰工人党有威信，而且对一些农民大队组织有很大的影响。必须着重指出，农民的组织性很强，波兰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控制着受它们影响的那些村庄的全部生

^① 人民军是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于1944年组织的波兰武装力量。

活，农民和自己的组织牢牢地拴在一起，主要是由于受波兰工人党和农民大队的影响，任何背叛和告密的行为在村里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受某一组织影响的村庄里，村里所有的农民阶层通常都听命于该组织的领导人。

在农民大队中能够看到一种强烈向往民族阵线、向往与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协同行动的趋势，以及对反动派的不信任感。我们党小组^①在波兰逗留期间（自1944年1月底开始），我们有机会接触了不同村庄和不同地区的农民大队组织。它们对人民军队的态度非常好。农民大队组织，不论是它们当地的领导人还是普通成员和同情者，就像我们的组织积极支援农民大队一样，积极支援我们的队伍。在没有波兰工人党组织的地方，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

在一些乡，农民大队组织派出自己的代表或成员参加在德国占领下组建的民族委员会。在已经从德国人手中解放的地方，一些农民大队组织积极参加民族委员会。受自己中央领导影响并且承认米科瓦伊奇克和伦敦流亡政府的那些农民大队组织，则动摇不定，在米科瓦伊奇克莫斯科谈判期间，可以看得出，这些组织希望他与索森科夫斯基断绝关系，和一些部长一起参加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我可以以获得解放的奥特沃茨克市（在华沙附近）一个区的农民大队领导人为例，说明动摇不定的农民党人的表现。当组织地方民族委员会时，起初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民族委员会，打算等他的中央领导人做出指示，可是后来他主动加入了民族委员会，并且给隶属于他的农村农民大队组织下达指示，要求它们参与组织乡民

^① 指以卡斯曼为首的波兰共产党人小组。他们于1943年年中被送过前线，先后在苏联占领区和波兰区逗留。该小组执行的是季米特洛夫的特殊任务，即保证莫斯科和波兰工人党中央接触，保证向波兰运送武器和向欧洲各国转送共产党人。

族委员会。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 1921 年的宪法这一事实和土地改革，对动摇不定的农民党人的表现有很大的影响。

波兰解放区的土改实现得越快，动摇不定的那部分农民大队组织和追随它们的那部分农民，就会越发坚决地和国家军以及整个反动派营垒决裂，并积极参加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领导下重建民主波兰的工作。

无疑，实行土地改革还会有助于实现争取受国家军影响的农民群众和粉碎国家军在农村的组织这一任务。

通过上述考察结果可以看出，只要波兰国家机关和波兰工人党积极做工作，吸收农民党成员和农民大队组织参加民族委员会，使所有的农民大队组织都转到民主分子的领导下，并且加快实现土地改革，基本农民群众就会成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组建政权的基础。

关于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各阶层的情况

在卢布林地区波兰工人党在城市的组织很快就被盖世太保破坏了，卢布林省解放前夕，几乎没有波兰工人党的组织。只是在几个城市，其中包括卢布林市，仅和个别人有联系。总的来说，德国占领时期卢布林地区的城市中有强大的国家军组织，各民主党派在那里几乎没有做任何工作。

在诸如华沙、罗兹、栋布罗瓦矿区、西里西亚矿区、拉多姆地区、琴斯托霍瓦地区和克拉科夫这些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和部分知识分子中，有强大的波兰工人党组织。除此之外，还有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右派、其他在当地有影响的工人组织以及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和国家军在活动。

波兰工人党城市组织，尤其是在罗兹、栋布罗瓦矿区、西里西

亚矿区和克拉科夫的组织，由于盖世太保的打击和波兰反动组织的告密、残杀，损失惨重。在最近的事件之前，华沙还有强大的波兰工人党组织。

在解放区，工人阶级很快就表明自己是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例如，在卢布林很快就建立了比较强大的波兰工人党组织，工厂选举了工厂委员会，建立了工会组织网。由于工人的努力，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区，各地的波兰社会党各派（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右派等）都加入了民族委员会。同时，联合的波兰社会党组织正在重建。不论是卢布林地区，还是华沙市郊的各解放区，例如在奥特沃茨克市（德国占领期间，波兰社会党组织在华沙郊区的活动比在卢布林地区活跃），都是这种情况。波兰社会党组织的地方领导人加入民族委员会比一些农民大队组织坚决。

必须着重指出，在解放区，只是波兰社会党右派在当地有中下层骨干分子。根据波兰社会党在解放区的表现可以推测，波兰社会党右派的反动领导人在大工业中心也不可能维持自己组织的统一，波兰社会党右派的大部分成员会参加民族委员会。

还必须着重指出，一部分工人还在国家军组织和其他反动资产阶级组织的控制之下，所以还有一个把他们从这些组织的影响下争取过来的问题。

在城市居民的其他各阶层中，不论是在德国占领期间，还是现在的解放区，反动派即国家军至今还有很强大的基础。

诚然，一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了民主组织。在知识分子中，尽管有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以及一些小的知识分子民主派政治组织在活动，但是国家军组织还是强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放区，不论是卢布林还是一些小城市，各

类知识分子中主要是非党人士加入民族委员会，参加恢复波兰国家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们反映的是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和意向。

城市小资产阶级受反动派影响最大。反犹太情绪在他们中最严重，而且在波兰广泛传播。国家军和其他反动组织在小资产阶级中的势力最大。

小资产阶级因德国占领在经济上蒙受的损失并不特别大。由于德国人掠夺和杀害犹太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甚至发了财。

这种小资产阶级在大城市居民中数量很多 在小的非工业城市

在占领时期没有民族委员会的地方，赶走德国人后，已经通过民主组织（通常为波兰工人党、农民党和波兰社会党，如果有知识分子民主团体存在的话，有时也包括这种团体）、各类职业工人的代表（工会一般还没有成立）、没有参加组织的居民（小资产阶级和小知识分子）中有威望的人士协商的方式建立了民族委员会。

在没有其他组织参加民族委员会的城市，通过波兰工人党代表和居民中有威望的人士协商的办法，建立了民族委员会。

在把德国人赶过维斯瓦河后的头两周，多数被解放的地方建立了民族委员会，但是一些地方还没有建立，它们面临组织民族委员会的任务。

民族委员会是国家权力机构和自治机构。

在组织波兰政权的时刻，伦敦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代表在大城市非常活跃。这些组织在德国占领期间奉行消极反抗占领者的政策，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千方百计地准备在关键时刻出头露面，夺取政权。

而我们的组织和游击队积极与德国人作斗争，从而吸引了占领者的注意力。国家军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在最重要的地区，几乎畅通无阻地集结了自己的兵力，并且首先把自己的兵力开进被红军解放的城市，企图窃取反德战士的荣誉并夺取政权。

人民军队伍没有可能这样集结。这样一来，国家军看上去是人数非常多的组织。卢布林地区的国家军队伍被红军解除武装（当然，国家军藏匿了自己的一部分武装）之后，国家军领导人给自己驻扎在华沙附近的组织下达了指示：在解放区不要暴露自己的武装，通过佩带写有“BII”（波兰部队）字样的红白两色袖标，通过四处张贴对居民的各种指示和命令，炫耀自己的存在。

为了配合索森科夫斯基在华沙搞的起义，国家军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

国家军提出了完全抵制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的政权、抵制波兰军征兵和进入森林的口号。可以看出，一部分国家军成员不愿意进入地下状态。看来，抵制波兰军征兵的行动会失败的，这将大大减轻瓦解国家军、吸收广大国家军群众参加在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下重建波兰民主国家这一任务的困难，有助于打垮国家军组织。当然，不在适当的时机采取相当广泛的镇压措施，是不可能打垮国家军组织的。

在通过民族委员会组织政权的同时，警察担负起了保障安全的职责。警察由人民军的游击队组成。只有个别城市由于附近没有人民军游击队，警察通过其他途径组建。我可以加尔沃林市和奥特沃茨克市为例，说明我所知道的几种情况。前者的警察是由同情波兰工人党的居民组成的，后者的警察是由人民军游击小组、脱离国家军的波兰社会党右派工人警察排以及民主派知识分子军事组织（属人民军）的一批成员组成。各地警察的领导人都是波兰工人党成员。人民军队伍中的游击队转为警察，意味着军队宝贵的骨干改负其他职责。但是形势要求这样做，只能逐步改变警察的构成，将一部分游击队骨干调回军队。……

卡斯曼^①

1944年9月5日于莫斯科

^① 列·卡斯曼，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

№09149

谢罗夫关于波兰国家军的行动及 加强反侦察措施致贝利亚的报告（摘录）

（1944年10月15日）

发自卢布林

绝密

莫斯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为了组织部队的侦察活动，我们已经组织了谍报、侦查—追缉小组和在各县工作的部队侦察小组。还拨出了专业水平高的侦察人员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局在工作中保持联系向他们提供帮助。

通过就地了解波兰军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局反侦察机关对波兰“国家军”起义部队组织斗争的情况，发现了以下问题：

1. 波兰军反侦察机关的人员非常少（仅占应在编人数的50%），而且水平较低，大部分团不是按照编制配备侦察人员4名，最好的也只配备了1名，而且不懂波兰语，这就给开展谍报工作带来不便。波兰军的部队和兵团在侦察方面保障很差，因此不了解混进波兰军的敌对分子的所有企图。

这一情况也给波兰军反侦察部的工作带来消极影响。据波兰军反侦察部部长科茹什科同志说，莫斯科无人领导他们，在工作中也不给予帮助。根据科茹什科同志的肃反训练水平，他本人也无法胜

任自己担负的工作。

为了预防今后波兰军的人员大量开小差，必须加强反侦察机关。

2. 自从波兰“国家军”解除武装以后，对最后一批加入波兰军的人员没有经过认真审查。因此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通过混进波兰军的他们的士兵和士官进行敌对宣传，号召反对军队的现行制度，组织波兰军的大批人员投向“国家军”的营垒。

此间已经查明，最近两个月以来，每天都有 40—50 名官兵携带武器从波兰军开小差。

10 月的前 15 天就有 2000 人开小差，而指挥部对预防开小差并没有采取果断措施。

3.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机关的工作搞得很差，致使最近国家军分子的活动十分猖獗。

据我们掌握的非常不完全的情报，卢布林有一支近千人的“国家军”武装组织，频繁举行起义。……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局在城乡的谍报侦察活动也搞得很差。局长拉德凯维奇抱怨侦察人员少，素质低。

此外我还认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局机关仍然有“国家军”分子，他们在破坏共同的事业。……

今天夜间，有 18 名士官和 1 名上尉从波兰第 1 预备团（驻扎在卢布林以西 2 公里）开小差。目前正在搜捕开小差人员。

人民内务委员部部队昨天在搜索森林时，在 10 月 12 日夜间从波兰第 31 团开小差的 1400 人中间，拘留并缴械了 31 名士兵，其中有 22 名是波兰第 33 团的，而波兰军的司令部对此事竟一无所知。据第 33 团的士兵供认，同他们一起开小差的有 40 人，我们仍在继续组织对其余的人员的搜查。

今天白天，波兰人民解放委员会安全局逮捕了“国家军”卢布

林军区司令的督查员亚欣斯基·爱德华（绰号“旋流”）。我们现正在
在进行侦查，以发现和逮捕“国家军”卢布林军区的领导人员。

4. 为了严厉打击波兰军队和各县内的“国家军”武装起义，
我认为应报告以下问题：

1) 必须加强波兰军的反侦察机关，实行满额编制，为此需要
派遣至少 500 名苏军反间谍局的侦察人员；

2) 将潜伏在波兰军的所有“国家军”分子解除武装并关进特
别营，对在各县被拘留的“国家军”分子也关进特别营；

3) 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部派遣 15 名专业水
平高的工作人员来这里，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安全局与起义分子
作斗争的工作给予实际帮助。

请您给予指示。^①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 谢罗夫

1944 年 10 月 15 日于卢布林

① 1944 年 10 月 17 日，该文件的副本分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其附函中，贝利亚通报：“为了加强波兰军反侦察机关的工作，阿巴库莫夫将派出 100 名‘除奸部’的工作人员。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委员部方面，我们将派出 15 名同志帮助波兰的国家安全机关。在‘除奸部’方面，阿巴库莫夫和谢罗夫在当地将给予波兰军反侦察管理局及其领导人科茹什科必要的帮助”。10 月 29 日，贝利亚又向斯大林通报：阿巴库莫夫和查纳瓦同志前往比亚韦斯托克市，并调动内务部部队的两个团。这样一来，到 11 月 1 日，在比亚韦斯托克市将集结内务部部队的 3 个团队，共有人员 4500 名。

№09150

克尔关于向波兰派遣英国军官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11月2日)

分送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贝利亚、
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第二、第四欧洲处。

秘密

译自英文

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阁下

尊敬的莫洛托夫先生：

我国政府委托我通知苏联政府，我国最近需要得到关于波兰事态的直接和可靠的情报。这些事态目前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

因此，我国政府决定立即向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派遣一个由6名英国军官组成的小组。如果成行，他们将获取波兰形势的情报。当然，这些军官将与波兰政府组织的地下运动保持联系。这个小组将由古德宗中校领导，其余成员是肯普少校、索利-弗鲁特少校、摩根少校、克里大尉和戈尔布莱特中士。古德宗中校将住在波兰内卫部队总部，他的下属军官将住在其余的4个军事区。^①

^① 该小组于1944年12月底抵达仍被希特勒分子占领的波兰境内。在苏联军队解放波兰后，应英国请求，该小组被转派到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馆。

不胜感激之至。

阿尔奇巴尔德·克拉克·克尔^①

1944年11月2日于莫斯科英国大使馆^②

① 克尔，英国驻苏联大使。

② 文件上有批示：“致佐林同志。请准备复函。可询问布尔加宁同志，并立即向他转交这份照书。安·维辛斯基”和标注：“已于2点通过高频电话转达布尔加宁同志。11月3日”。

№09151

布尔加宁关于国家军的反苏武装行动 给维辛斯基的电话记录

(1944年11月3日)

绝密

维辛斯基同志：

由于您来电查询，我认为克尔11月2日致莫洛托夫同志的秘密照会^①是企图在波兰问题上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当红军向波兰维斯瓦河以外领土推进时在政治上给苏联政府制造困难。

因此我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不能让英国人的既定目标实现。从波兰领土上赶走德国人之后，必须保留红军对波兰“国家军”武装力量采取行动的自由。

必须从这一立场出发，即把由伦敦流亡政府的代表在波兰领土上建立的地下组织看成是反对红军和反对苏联的组织。因为这些组织的一部分在苏联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上活动，苏联军事当局认为它们没有任何理由对英国军队的盟军——红军采取武装行动。

所谓的“国家军”恐怖小组对红军代表进行武装袭击，杀害他们，烧毁代表住的房子，在红军后方组织爆炸军用仓库及其他破坏和恐怖行动，以此讨好盟国的共同敌人——希特勒德国。

同时还应当指出，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切的情报，表明这些小组

^① 即本卷本专题№09150文件。

与德国人占领的领土上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其行动受统一领导。

从所谓的“国家军”在波兰针对红军敌对行动的性质判断，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组织从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领取指示，阻碍波兰事态的顺利发展。正如克尔在自己照会中所说的那样，这些事态在目前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

布尔加宁^①

1944年11月3日于卢布林

^① 尼·亚·布尔加宁上校，时任苏联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

№09155

贝利亚转呈谢罗夫报告时
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附函

(1944年11月14日)

绝密

国防委员会约·维·斯大林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现将谢罗夫同志发自卢布林关于对在波兰领土上活动的“国家军”及其他地下组织骨干分子所采取的肃反措施的报告呈送给你们。

从今年10月15日以来已经逮捕2684人。被捕者有：

“国家军”官兵——2210人

非法保存武器者——72人

乌克兰民族组织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402人

拘留波兰军和“国家军”开小差的士兵和军官——1746人。

此外，波兰各县的公安局已经逮捕1732人，其中大部分系“国家军”人员。

我们的侦察小组与安全机关一起在波兰领土上共逮捕4200多名“国家军”的参加者及其他罪犯。

共收缴武器和弹药：迫击炮12门，轻重机枪110支，步枪901支，自动步枪202支，手枪295支，手榴弹2300枚，地雷1262个，炮弹1637发，子弹270000发。

在侦查卢布林市“国家军”地下组织案件过程中，还发现波兰天主教教士积极帮助“国家军”分子从事地下活动。

谢罗夫同志提出在教会建筑物进行某些搜捕和逮捕一些波兰天主教教士的问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可以批准这一措施。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44年11月14日于莫斯科

No09165

莫洛托夫关于西方对苏联承认 波兰政府的反应所做的工作笔记

(不晚于 1945 年 1 月 4 日)^①

这对波兰是一件大事！

我们不知道比利时、法国、希腊等国是怎样组织政府的，尽管我们没有说过我们是否喜欢这些政府中的哪一个，但也没有人问过我们。

我们没有干涉，因为这是英—美军队的“行动区”。

① 原文件没有标明时间。1944 年 12 月 31 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临时政府，并得到苏联方面的承认。西方国家仍保持着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1945 年 1 月 4 日美国和英国对苏联这一做法提出警告。显然，莫洛托夫的笔记反应了苏联领导人对于西方立场的反应。据此，判断莫洛托夫的笔记为 1 月 4 日以前所做。

№09173

维辛斯基关于对波兰问题苏美英
“三人小组”工作的建议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5年2月16日)

秘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关于波兰问题的建议

1. 与克尔和哈里曼举行预备会议，在会上决定小组的工作程序。^①

2. 向克尔和哈里曼提出小组以下工作程序：

1) 确定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成员的总数（倾向于20人以下）。

2) 确定应当进入政府的人员数量（倾向于3+2）：国内（3名），国外（2名）。

3) 讨论可能的人选（格拉布斯基、热利戈夫斯基——国外，库采巴、维托斯等——国内）。

① 在1945年2月4~11日的雅尔塔四国首脑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波兰临时政府的原则，并在临时政府中包括华沙现存的共产党人占有一切关键职位的政府成员。为了确定未来政府的人员组成，成立了“三人小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英国驻苏大使克尔。

4) 小组讨论所有问题，一开始就要吸收贝鲁特、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和罗拉 - 日缅尔斯基参加。

5) 政府组成的人员名单应与贝鲁特、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和罗拉 - 日缅尔斯基协商，将其召到莫斯科。与每位候选人进行单独谈话。

安·维辛斯基

1945年2月16日于莫斯科

№09184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农民党代表建议与 波兰领导人举行谈判的电话记录

(1945年3月31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杰卡诺佐夫，

第四欧洲司^①

秘密

华沙来电

特急

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克拉科夫省长奥斯特罗夫斯基向华沙政府报告称，3月29日“农民党”维托斯派的代表——马尔琴科夫斯基和维塔希克来到他处。他们提出维托斯集团的领导人，也可能是维托斯本人直接会晤贝鲁特总统或者莫拉夫斯基总理的问题。如果得到肯定答复，马尔琴科夫斯基和维塔希克请求通知维托斯的代表何时能够抵达华沙举行谈判。

贝尔曼^②告诉我，贝鲁特和莫拉夫斯基决定听听你们的意见。贝鲁特和莫拉夫斯基二人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维托斯的合法化

^① 文件上有维辛斯基的两个批示：“归档，3月31日”，“对该函给予答复。4月3日”。

^② 雅·贝尔曼，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或与他进行任何正式会谈，都将使波兰政府失去拒绝维托斯参加莫斯科协商的主要理由。但同时也可以适当地试探一下维托斯的立场。因此，贝鲁特和莫拉夫斯基倾向于由维托斯的代表或维托斯本人与某些官方色彩较少的活动家，如维斯瓦夫或者什瓦尔贝^①等党的代表，举行会晤，而谈话本身完全不具备官方性质。

估计在华沙会晤中，维托斯出于迂回的目的会迎合波兰临时政府，因为对英国人来说，现在将维托斯拉进莫斯科协商会议，然后再让他进入民族团结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波兰国内的权威人士认为，温岑特·维托斯要比米科瓦伊奇克危险得多。贝鲁特和莫拉夫斯基不想让他进入波兰政府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维托斯的代表主动提出在华沙举行正式会晤，那么贝鲁特和莫拉夫斯基提出的“非正式”会晤的计划就祸福难测了——该计划将使华沙失去维托斯非法地位的根据，而维托斯本人又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认为，贝鲁特和莫拉夫斯基应当与维托斯举行正式会晤，并建议他接受四党联盟主要纲领章程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1944 年 7 月 22 日的宣言。如果他拒绝，那么波兰政府就有可能在全国在农民面前揭露他。如果他接受，那就可以让他参加政府。此次正式谈判将迫使他履行现在做出的承诺。^②

列别杰夫

1945 年 3 月 31 日 3 时 05 分

^① 斯坦尼斯瓦夫·什瓦尔贝，波兰社会党左派代表人物，1945 年 7 月当选为波兰社会党最高委员会主席。1944 年任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

^② 波兰安全机关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于 1945 年 4 月初组织了维托斯与工人党代表奥哈布和社会党代表什瓦尔贝的会晤。

№09185

列别杰夫向莫洛托夫转发的哥穆尔卡 关于波兰地下活动形势的电报

(1945年4月3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
布尔加宁、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归档。

绝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现将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维斯瓦夫同志致您的两封电报转发如下：

“我认为必须向您通报以下情况：

为参加与流亡政府的谈判，波兰社会党的地下组织、农民党和
‘民主联合会’^① 准备的决定要点是：

① 这些政党是战时处于秘密状态并与波兰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政治党派，由于他们实际上认可1945年2月初雅尔塔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所做的决定，所以有可能进入改组后的联合政府，从而威胁共产党人在联合政府中的政治统治地位。1945年2~3月，苏联方面与波兰地下军进行了接触。3月17~21日，皮缅诺夫上校与波兰的一些著名政治家进行了预先谈话，讨论了波兰地下组织代表与苏联方面谈判的问题。为参加这些谈判而集合在一起的波兰地下军政治、军事领导人于3月28~29日被逮捕，并于3月30日被押送到卢比扬卡监狱。参见本卷本专题文件№09188。

1. 不承认贝鲁特总统，提名沃依采霍夫斯基、维托斯和热利戈夫斯基为候选人。

2. 允许‘卢布林政府’^① 仅仅以波兰工人党代表的身份参加新政府。

3. 要求西方盟国向波兰派部队，以‘保障自由选举’。

4. ‘国家军’应当是新波兰军队的骨干，它应当联合其他部队，其中包括安德斯的军队^② 和在苏联组建的部队。

5. 要求全面大赦。

6. ‘波兰民主阵营’应当成为执政集团，其宗旨是反对法西斯，反对波兰工人党的极权企图。

7. 同意东部边界，但应强调这是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产生的。

维斯瓦夫”

二

“我们接到秘密情报，声称扬诺夫斯基及其他与谢罗夫^③ 谈判的人士失踪了。此后，农民党、人民民主党以及所谓的‘民主联合会’等地下组织纷纷举行会议并做出决定：如果在最近几天扬诺夫斯基失踪的原因不调查清楚，那么他们将在国内外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活动。‘国家军’谴责代表团轻举妄动，认为应当利用这一事实，

① 即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首的亲苏的临时政府。

② 安德斯，1941~1942年任在苏联组建的波兰集团军司令，1943~1944年任在意大利的盟军波兰军军长。

③ 1945年3月5日谢罗夫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波兰国家全部顾问。

驱散‘任何和解倾向’，并以此为新的秘密活动奠定基础。^① 我们希望你们做出指示，以使做好相应的准备。

维斯瓦夫”

列别杰夫

1945年4月3日于华沙市

^① 1945年春天，在雅尔塔协定的作用下，在波兰地下政治组织中出现了想与现政权和解的倾向。最明显地准备与当局合作表现在秘密农民党的领导人中。

№09188

莫洛托夫关于苏联军事当局拘留 波兰地下组织代表给克尔的复函

(1945年4月9日)

抄送斯大林、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
杰卡诺佐夫，第二和第四欧洲司，列别杰夫（华沙），归档。

秘密

致英国特命全权大使阿尔奇巴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
尊敬的大使先生：

对您4月4日的来函现答复如下：并未委托苏联军事当局与波兰伦敦政府的代表举行任何谈判，而且众所周知，苏联政府与该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您在信中提到的在波兰被拘留的伦敦流亡政府代表处许多波兰活动家，我们正在就此事进行调查，结果我一定向您通报。^①

大使先生，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维·莫洛托夫

1945年4月9日于莫斯科

^① 1945年4月10日，在对克尔1945年3月25和30日信的复函中，莫洛托夫通报说：“超负荷工作的苏联相应机构，目前对于各种关于在波兰逮捕波兰人的报道，无法进行核查，只有进一步提供有关他们的线索才能帮助你们。”

№09197

贝利亚关于向波兰增派内务部部队 给斯大林等人的信

(1945年5月17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阿·伊·) 安东诺夫同志：

我同时呈上值得引起重视的谢利瓦诺夫斯基同志关于在波兰领土上处于地下状态的“国家军”从事破坏工作报告。^①

为了在谢利瓦诺夫斯基领导下加强同国家军匪徒的斗争，作为对现有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7个团和1个独立摩托化小兵营的补充，需再派遣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2个团。

^① 该报告在档案中未发现。当时情况据1945年6月9日驻波兰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沙季洛夫将军致函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通报说，每天都收到苏联的士兵、军士和军官被杀害的报告材料，“关于各种匪帮对红军后勤部队的多次武装进攻，绝大多数人都是穿着波兰军队的制服”，“仅在最近的一个月里，就有大约300名红军现役军人被匪徒打死、打伤以及被拖入森林”，“国家军匪徒”中断了火车的运行，抢掠遣送去苏联的财产，攻占了铁路各站点，破坏交通线，等等。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从1944年7月到1945年5月25日，在与地下军的斗争中共有588名苏联现役军人牺牲。

谢利瓦诺夫斯基同志报告说，红军总参谋部准许波兰政府召回两个师的波兰部队，以便部署在受到土匪行为破坏的省份。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45年5月17日于莫斯科^①

^① 文件上有这样的批示：“根据是：谢利瓦诺夫斯基1945年5月13日从华沙发来的密码电报”。

№09198

雅科夫列夫与马杜舍夫斯基
关于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
情况的谈话摘要

(1945年5月25日)

秘密

遵照大使列别杰夫同志的指示，我会见了马杜舍夫斯基^①，以便了解即将于5月29日召开的波兰社会党中央全会的筹备情况。

.....

我问马杜舍夫斯基，波兰社会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将突出哪些政治口号，是提出人民民主的口号还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口号。

马杜舍夫斯基回答说，波兰社会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而人民民主国家将是过渡阶段。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口号会吸引我们最革命的工人群众，尤其是青年人。马杜舍夫斯基说，如果我们愿意，那么我们就把绝大多数青年吸引到“工人大学协会”（该组织受波兰社会党影响）的队伍中，因为工人大学协会赞成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口号。

马杜舍夫斯基说，波兰工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个困难——普通工人不明白什么是工人党的最终目标：是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在我们波兰社会党中，工人正在接受这一宗旨，而这一

① 斯·马杜舍夫斯基，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宣传部长。

点对他们有吸引力。

但是，马杜舍夫斯基指出，他认为波兰存在着各种政治色彩的政党非常有好处，这些党需要作为平等的组织而发展，以便为着共同的理想将人民团结起来。

谈及各党的内部状况，马杜舍夫斯基说，据他掌握的资料表明，目前在波兰的工人党人数有 26 万人，而社会党是 14.3 万人，在这两个党中都有大量的不纯人员。目前，波兰工人党的骨干分子比社会党的好些，但是这个党却混入了许多自私自利之徒，因为他们指望凭借一张工人党的党票从国家钱袋里捞到好处。波兰社会党的骨干分子队伍则弱一些，但是在工人——党的普通成员——中只有老的革命传统，同时，在波兰社会党中从事破坏活动的“国民武装力量”和“自由、平等、独立”派作为明显敌对分子隐藏下来的人要比波兰工人党多得多。马杜舍夫斯基说，我们将逐步把这些分子清除出去。

在谈话的最后我问马杜舍夫斯基，他是否听说天主教教士——尤其是华沙天主教大主教什利亚戈夫斯基致力于在波兰建立第五天主教政党，马杜舍夫斯基回答说，他们说过这种打算。他认为，政府将不会允许建立这样的政党，对于想要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天主教教士则希望他们加入到波兰目前已有的任何一个政党。……

雅科夫列夫^①

1945 年 5 月 25 日于华沙

^① 雅科夫列夫，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09200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关于“奥库利茨基等人案件”诉讼
程序的决定

（1945年6月13日）

绝密

1. 关于奥库利茨基等15名被告的起诉书已依法获得批准。
2. 在联盟大厦十月革命厅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召开案件公开听证会。法庭的组成人员有B.B. 乌利里赫（主席）同志、Л.Л. 季米特里耶夫同志、И.В. 杰季斯托夫同志及B.B. 休利金同志。
3. 责成红军军事总检察长H.П. 阿法纳西耶夫同志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检察长罗·安·鲁坚科同志在开庭时支持国家公诉。
4. 遵照被告人的愿望或依照法庭的指定容许5~7人进行辩护。
5. 案件听证会定于6月18日举行。
6. 诉讼程序过程要在报刊发表。
7. 责成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拉·帕·贝利亚同志、安·亚·维

辛斯基同志、康·帕·戈尔舍宁同志及 И.Т. 戈利亚科夫同志对诉讼程序进行监督。

1945年6月13日于莫斯科^①

① 该文件是联共（布）中央对于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 1945 年 5 月 31 日书面报告的复函。报告阐述了关于准备和进行对波兰地下军 16 名首领的诉讼程序的建议，其中还包括建议将罪犯送交苏联高等法院军事审判厅审判。在进行诉讼过程中，罪犯被判处各种有期徒刑（从几个月到 10 年），三人无罪释放。1990 年 4 月，苏联高等法院撤消了这次判决。

№09209

雅科夫列夫与莫拉夫斯基 关于波兰政治局势的谈话纪要

(1945年8月1日)

抄送维辛斯基，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我拜访了莫拉夫斯基^①并亲自向他转交了马尔科夫斯基从罗马发出的电报。

在柏林之行后，莫拉夫斯基情绪很好，我祝贺他在柏林会谈中为波兰所取得的重大胜利。^②

莫拉夫斯基说，在柏林已找到了解决令政府头痛的最紧迫问题的方法。莫拉夫斯基说过，把拥护政府的农民党势力团结起来是目前重要的内政任务之一。他还说过，我们在对待农民党方面已犯了很多策略性错误，其中最主要的错误是没有与农民党老党员中的动摇分子合作。农民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莫拉夫斯基说，他们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政治上的动摇，因此务必考虑到这一点。

他声称，我们在波兰社会党中却避免了类似错误。先是在卢布林，而后是在华沙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不得不更多地注重让波兰社

① 爱·奥·莫拉夫斯基，时任波兰政府总理。

②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波茨坦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将位于奥德河-涅伊谢（卢日茨卡亚）一线以东的领土移交给波兰，条件是在和平代表会议上最终确定波兰西部的边界。

会党的老干部参加工作。在表示愿意合作的人中有许多并不完全支持政府的方针，但他们逐渐相信它的正确性并开始老老实实地工作。我提醒莫拉夫斯基说，社会党中混有敌对分子的现象还存在，这一点波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也已指出，而莫拉夫斯基对此却回答说，在党中央领导层中聚集着十分可靠的人，“自由、平等、民主派”分子正处于低潮，他们目前并不可怕。

莫拉夫斯基说，由于正确的战术方针，波兰社会党现在已具备了开展工作的领导能力。

农民党没有享有威望的首脑人物，因此在伦敦人来到以后，农民党现在依然不能在联合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莫拉夫斯基说，“正如我所听到的那样，斯大林同志曾建议建立两个农民党。”

莫拉夫斯基说，“我不知道这一做法是否正确。”

莫拉夫斯基问我，我如何看待司法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根据波兰社会党的提议起草的有关公民婚姻法的草案。我回答莫拉夫斯基说，这一改革的时机无疑已经成熟。

莫拉夫斯基说，他认为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错误在于，它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没有与波兰社会党取得一致，尤其是在制定公民婚姻法草案关于取消在天主教堂取得结婚和离婚合法地位的特权时，工人党认为此举为时尚早。实际上，这样的法律将会深受欢迎，其结果是波兰社会党将在波兰取得最激进的政党的地位。

莫拉夫斯基生硬地说了一句，“关于此事您就在那里跟维斯瓦夫谈吧”。

我以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与维斯瓦夫早就搭不上话了，因为他跟所有政府领导人一样，最近一直很忙。

谈话的最后，我在指出不少波兰报纸犯下了许多错误，对政府工作常常帮不了忙反而有所妨碍后，就把话题转到宣传问题上来。

我举了许多例子，并且特别指出 7 月 31 日《每日信使报》一

篇低估国家领导人作用的社论，而那时波兰就像现在一样面临相同的任务，即提高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活动家威信的任务。莫拉夫斯基对这种意见反应很迅速，并且在同意我说的内容后补充说，“就拿斯大林同志来说，他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要是没有他，许多事情就将是另一番模样。”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5年8月1日于华沙

No 09219

**苏军北方集群政治部
关于波兰境内德国居民处境
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摘录）**

（不晚于 1945 年 8 月 30 日）

秘密

近期以来，居住在已划归波兰的前德国领土的德国居民的处境急剧恶化。许多地区的德国居民正在挨饿，在其他地区也面临着在不久的将来即将来临的饥饿的直接威胁。波兰居民对德意志人的抢掠不仅没有停止，相反却愈演愈烈。波兰人随意杀害德国居民，无端逮捕、长时间囚禁并对之加以嘲弄，施以暴力、殴打和凌辱的事件更加频繁。到目前为止由波兰人进行的迁移德国居民的工作完全处于无组织状态，而且其目的首先就是抢掠德国居民。^① 在许多场合反法西斯的德国人士也受到惩罚和追诉，而且同红军的合作也被列为他们的罪状。不允许德意志人在改善自己的处境方面表现出任何合情合理的主动精神。德意志人同波兰当局建立接触的所有努力均因受到波兰当局的阻挠而告徒劳。所有这些现象的结果是德意志人与波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极端激化。这同样也导致试图挑唆德国居民去反对波兰人的隐蔽的法西斯分子的积极活动。非常具有代

① 关于从指定的领土上迁移德国居民的决定是在波茨坦会议上通过，迁移行动应该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进行。

表性的是在下西里西亚矿业区的德国居民的处境。这个地区在德国的经济中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按照采煤的数量这个地区仅次于莱茵河—威斯特线利亚煤田而位居第二。在该地区的煤炭工业中工作的工人目前达23000人，其中仅在瓦尔登堡地区就有近15000名矿工。当前，由于对农村粮食储备的征用和侵吞，对广大矿工群众和所有居民的食品供应状况已急剧恶化。从事井下作业的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不超过200~300克的面包，每周只能得到近300克肉。食用油和黄油他们完全得不到供应。膳食状况的急剧恶化的后果是矿井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和由此而来的采煤量的减少。由于工人们自作主张地前往农村为自己去搞食品，旷工者的数量与日俱增。工人家庭不断遭到抢掠，此类事件使他们对自己的处境、自己的人身安全失去信心。目前工人们得不到工资，而只能得到一点预支款，而且最近一次预支还是被用来抵偿1945年4月份的工资的。

当前居民的政治情绪的特点是对波兰人实行的对德意志人的政策强烈不满。波兰政权机关是在今年6月初出现的，在此之前居民们对红军与德国居民之间建立起来的接触感到极为满意。尽管波兰政权机关宣告说，西里西亚是波兰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德国居民直到三大国领导人柏林会议决议公布之前都曾一直认为波兰人在下西里西亚的逗留纯粹是暂时性的。作为在这方面主要理由，居民们提出的是下西里西亚煤田对于德国经济的重要性。矿工们认为，鉴于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需要煤炭，而且苏联也需要煤炭，因此苏联军事当局热衷于把这个地区保留在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看法在柏林会议决议公布之后仍然在继续传播。此次会议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议被认为是还可以改变的。波兰政权机关对德国居民的迫切需求没有给予任何的关注。他们转而采取了对抱有反法西斯情绪的矿工进行迫害、对来自企业管理委员会的一切主动性进行压制的态度。波兰政权机关对抢掠居民的行为不进行任何斗争。相反，在许

多情况下波兰人在各地的代表却在充当掠夺居民财产的组织者。经常有波兰人逮捕反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的情况发生。

当地的波兰政权机关反对向德国居民进行任何形式的组织和解释工作。例如，波兰政府派驻瓦尔登堡市的特派员舍夫契克先生宣称：“我们将把德意志人当作能干活的牲畜来使用。他们任何事情都不应当知道，对任何事情都不该感兴趣。他们应当知道的只是自己干活的地方和自己睡觉的床铺”。

波兰工业部副部长齐谢夫斯基先生的一番话非常有代表性。他说，波兰政府希望在和平会议召开之前用一切办法摆脱居住在已划归波兰的德国领土上的 200 万德意志人——即使不得不把这片领土变成荒漠也在所不惜。

结论：

1. 已划归波兰的德国领土上的情况目前已不能不引起严重的忧虑。如果波兰当局在近期内不采取坚决的措施改善德国居民的处境而是继续按老办法实施“领导”，事情可能会导致公开的武装冲突。

……

4. 当前，德国居民中的反波兰情绪明显地在快速增长。如果这种情绪继续发展下去，则可能导致出现暗中的对抗行为、破坏活动、反波兰的演讲以及法西斯分子及其代理人进一步的积极活动。

5. 波兰当局和波兰居民在对待德国居民方面的胡作非为不时地导致红军军人与波兰人之间的某些冲突事件，从而有损于他们之间正确的相互关系的巩固和加强。

……

7. 应当提请波兰当局注意：他们必须毫不迟疑地自己去坚决处理德国居民处境的正常化问题，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工作，以动员他们去完成给他们提出的各项任务。波兰当局为了进行这一工作

应当利用德国人中的反法西斯分子及反法西斯组织。

8. 波兰当局不应当阻碍红军政治机关在德国居民中进行旨在根除纳粹主义的群众性宣传 - 解释工作，他们应当指示各地方的所有政权机关在这个问题上同红军政治机关建立密切的接触。

9. 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将为已划归波兰的前德国领土上的局面的正常化创造条件，并有可能根据三大国领导人柏林会议决议精神认真和坚定地执行对德国居民的政策。^①

① 1945年8月30日，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第七管理局局长布尔采夫将这份材料提交给Г. 季米特洛夫。在布尔采夫的报告中有如下批示：“潘友新同志。如果布尔采夫的这份材料没有送交上级，应该呈给斯大林同志，以及马林科夫同志和维辛斯基同志。1945年9月11日。Г. 季米特洛夫”

No 09222

谢利瓦诺夫斯基关于波兰犹太居民状况

给贝利亚的书面报告

(1945年10月20日)

秘密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拉·帕·贝利亚同志

在波兰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对犹太人采取敌视态度一直是一个经久不变的现象。

波兰的军阀、人民民主党人和毕苏斯基^①党徒都称犹太人为“俄国代理人 and 布尔什维克分子”，曾对犹太居民加以残酷迫害。

波兰反动势力在国内到处煽起反犹太主义，唆使波兰人去迫害被他们称之为波兰人民的敌人的犹太人，组织一切可能的挑衅、劫掠和屠杀行动。

在德国占领波兰时期，在希特勒主义宣传影响下，波兰又掀起了反犹太主义的新浪潮。由波兰反动势力煽起的对犹太人的敌视时至今日仍未中止。

1939年在波兰总共有350万犹太人，其中在华沙约有40万人。

从1939年到1945年，在波兰大约有320万犹太人被德国人杀害。

^① 毕苏斯基，20年代波兰的国家领导人，持反苏立场，并于1926年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独裁者。

在波兰领土上还剩下大约 10 万犹太人，其中 1.6 万人正在波兰军队中服役，3 万人不久前刚从德国集中营中返回。

在波兰目前有如下一些犹太人政党：

“崩得”^①——目前是一个人数不多、影响不大的组织。领导“崩得”的是：舒尔登弗莱德博士（主席）和菲尔格龙特（总书记）。

“犹太复国主义者”——最近一个时期在波兰各主要省份明显地加强了活动。在华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建立了叫做“伊胡德”^②的组织。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犹太青年建立了“劳动纵队”，在这里为迁居巴勒斯坦而培训青年。

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是：佐迈尔施泰因·埃米尔博士（他同时还担任犹太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贝尔曼·阿道夫。

波兰民族团结政府已经批准成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以及举行犹太人祭祀仪式和进行宗教教育。在波兰建立的犹太人宗教联合会主席是军队犹太人牧师科哈涅中校。

波兰政府和各合法政党都主张犹太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因此，敌对的地下组织千方百计地极力利用反犹太主义情绪进行反政府和反苏宣传，同时继续在波兰群众中煽起反犹太主义。

实际上他们加紧煽动反犹太主义情绪靠的是散发传单、在敌对的非法报刊上号召人们同犹太人作斗争以及组织各种挑衅、劫掠和屠杀活动。

……

在地下组织散发的许多传单中，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竟然散

①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简称。

② 原文为缩写词 ИХУД，含义不清。

布说，在热舒夫、克拉科夫、卢布林以及其他城市似乎发生了犹太人杀害波兰儿童的事件，其目的是用波兰儿童的血治疗受伤的红军军人云云。……

在散布所谓犹太人杀害波兰儿童的谣言的基础上，充满反犹情绪的地下组织于今年8月份在克拉科夫挑动起了一场对犹太居民的大劫掠行动。被反犹太主义搞得头脑发热的人群袭击了正在举行祈祷的犹太教堂“库帕”，把教堂的珍贵遗物搬到大街上烧毁。匪徒们见到犹太人就进行毒打，无一幸免，他们洗劫了许多犹太人的住宅和商店。

在发生这些事件的当天印发的反政府传单中，挑拨性地宣称，在克拉科夫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劫掠是由苏联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组织的，目的是想败坏波兰人的名声。

在这次事件之后，在克拉科夫省的塔尔努夫市开始散发非法组织“人民统一阵线”的署名为“报复者”的传单，号召消灭犹太人，为在克拉科夫被杀害的波兰儿童报仇雪恨。

来自“国家军”和“国民武装力量”匪帮的对犹太居民的劫掠和侮辱，在波兰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对犹太人的屠杀时至今日仍未停止。

据极不完全的统计资料，从1945年1月到同年9月15日在波兰领土上共被匪徒杀害了291名犹太民族的人，其中：

在华沙省——57人

在卢布林省——68人

在克拉科夫省——14人

在比亚韦斯托克省——38人

在罗兹省——18人

在热舒夫省——34人

在凯尔采省——62人

.....

应当指出，公安部和民警机关因反犹太主义现象，同对犹太居民的劫掠与屠杀行为的斗争还很不得力。更为恶劣的是，在克拉科夫发生的劫掠犹太人事件中，民警局的工作人员竟然亲自参与其中，为此在劫掠当日已有40名民警被逮捕。

在得到进入国家机关工作的许可后，一部分积极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的犹太人在国家机关中担任了领导职务。

例如，在教育部的的工作人员中有12.3%是犹太人，其中8人担任领导工作。

在司法部有5.6%是犹太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有4人。在卫生部有4.3%，担任领导工作的有3人。

在公安部工作的犹太人占18.7%，领导岗位的50%为犹太人所占据。

在该部第1司的工作人员中有27%是犹太人，他们占据了所有的领导岗位。在干部处有23%是犹太人，担任领导职务的有7人。

在负责工作人员事务的处（特别检查处）有33.3%是犹太人，他们全都占据负责岗位。在公安部的卫生处49.1%是犹太人，在财务处有29.4%是犹太人。

在新闻检查处的本部机关中工作的有近50%是犹太人，而在拉多姆分部则占了82.3%。

这种情况引起了波兰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声称政府各部和波兰的其他一些机构都被犹太人所控制。

.....

所有这一切无疑在被反政府的地下组织所利用，他们在其非法出版物和大量的传单中尽一切可能散布关于犹太人控制波兰政府的说法，称贝鲁特和其他政府成员是犹太人，认为他们全都是共产党

人，是莫斯科“安插的傀儡”。这种宣传在国内煽起了反犹太主义并使民族团结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

.....

在其他一些非法传单中，反动的地下组织在散布关于“犹太人在波兰的专政”的流言，称今天的政府是“莫斯科的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代理人”，宣称“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在领导安全机构的工作”，“犹太人对贸易不感兴趣，因此就都安排进了国家行政机关”，“他们用波兰人的姓名掩盖自己”，“把新闻界抓到自己手中”等等。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驻波兰公安部顾问

谢利瓦诺夫斯基

1945年10月20日于华沙^①

^① 1945年10月20日，贝利亚将这份文件提交给联共（布）中央（马林科夫）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米高扬）。在报告中贝利亚做了如下标注：“于1945年10月21日以第12066号文件提交给了斯大林同志”。

№09231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在强制外迁德国居民 问题上的立场给维辛斯基的电报

(1945年11月10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巴甫洛夫，归档。

秘密

致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我已要求莫杰莱夫斯基^①明确申明波兰政府在强制外迁德意志人问题上的立场。今天，11月10日，我收到莫泽莱夫斯基的如下备忘录：

“№4103/45。

外交部荣幸地通知苏联驻华沙大使馆：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根据在波茨坦通过的决议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手段从已划归波兰管辖的西部领土外迁德意志人。

但是，困难的物质条件和对未来缺乏信心使许多德意志人倾向于自愿地向西迁移，对此波兰政府亦不加任何阻拦。”

列别杰夫

1945年11月10日18时20分于华沙

^① 3. 莫杰莱夫斯基是波兰外交部副部长。

No 09236

斯大林转述的与哥穆尔卡和明茨 关于波兰局势的谈话内容

(1945年11月14日)

抄送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

秘密

送莫洛托夫同志并四人小组阅

谈话未做记录（波兰人认为不需要做记录），因此我以问答形式转述本次谈话的内容。

波兰人问：苏联领导人对波兰，其中包括对波兰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否已经改变？

斯大林答：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我们对波兰人和对波兰共产党人像从前一样友好。

问：是否需要通过一部关于对大型工业和银行实施国有化的法案？

答：在贝奈斯通过这样一项法案之后，在波兰也必须通过这样一项法案的时刻已经到来。

问：在波兰是否需要允许以租让或其他某种形式吸收外国资本？

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需要由波兰人自己去深思熟虑。

注：波兰人只字未提他们当时曾经拒绝了苏联关于建立合股公司的建议。我得到的印象是波兰人不反对在这方向外国资本做出

让步。

问：是否应当接受波兰社会党关于取消粮食收购和宣布实行没有限价的自由市场运作的建议。

答：不论这样做是多么令人不快，波兰人迟早都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为在非苏维埃制度下，又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长久地保持粮食收购和限价体制的。

问：我是否反对波兰人向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借债，我是否认为可以在或多或少对其在波兰的使用自由加以限制的条件下接受这种借贷？

答：债可以借，但是要在没有任何限制波兰使用借款权利的条件的前提下。

问：可否同法国签订互助条约？

答：可以，但是要使该条约完全符合波兰与苏联之间签订的互助条约的精神。

问：是否应当深究关于特欣的问题，苏联能否在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特欣问题举行的谈判中给波兰以支持？

答：我不主张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在波兰得到了西里西亚的能产焦炭的煤之后，波兰已经没有理由再要求把特欣划给波兰人了，因此苏联也就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给波兰人以支持。最好还是尽快消除这个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纠纷问题，限制特欣地区的波兰人迁居波兰并恢复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良好关系。在特欣地区波兰人迁居波兰的问题上，苏联在波兰人同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谈判中可以支持波兰人。

问：是否应当邀请联共（布）的代表出席不久将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

答：最好还是不要邀请，以免反对派们说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是在联共（布）的监督下进行的。

问：可否在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说波兰工人党是早在战争之前已被取缔的波兰共产党路线和传统的继承者？

答：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尽管敌人们把波兰共产党说成是联共（布）的代理人，但实际上该党当时已经变成了毕苏茨基分子的代理人。最好在波兰党代表大会宣布说，波兰工人党是一个新的政党，它同波兰共产党的路线和传统并无联系。

问：我们关于把波兰的大选再推迟一年举行更为适宜的意见是否正确？

答：我想大选最好不迟于 1946 年的春天举行，因为不论从国内的还是国际的方面考虑，再往后推迟此次选举都将是困难的。

问：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表现很不好，如果他在近期内不能改正，我们想在选举进行之前就以朗格先生（现任波兰驻美国大使，是一位温和的波兰社会党人，据波兰人认为，他对共产党人颇具好感）取代他。您的意见如何？

答：如果你们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在目前情况下不能提贝鲁特为替补人选（波兰人认为这一作法不适宜），那么你们可以通过试试借助朗格来分化波兰社会党。请你们去同万达·利沃夫娜商量一下，她同朗格很熟。

后来的谈话涉及的是有关从罗科索夫斯基^①的储备中借给波兰人 3 吨谷物种籽问题和关于满足波兰人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请求问题。但这些事情你们均已知晓。

斯大林

1945 年 11 月 14 日于莫斯科

^① K.K.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时任苏联北方军队集群总司令，1949 年起任波兰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

№09239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国内政局与
波兰政界领导人谈话纪要（摘录）

（1945年11月22～25日）

秘密

.....

11月24日我前往拜会了贝鲁特，以便向他递交关于波兰当局以及“国家军”和“国民武装力量”的匪徒们反对驻波兰苏联军人的罪行的文件并进行相应的说明。

贝鲁特根据他同列别杰夫同志业已达成的协议，答应就此问题召开一次有军队和安全部代表参加的会议。

同时，我还把有关由于班杰洛夫盗匪集团^①的活动而在从波兰撤出乌克兰人方面遇到的困难的文件交给了他，并请他采取措施加强同匪徒们的斗争和保护被遣送回国的乌克兰人。

贝鲁特答应研究这一材料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交谈中，话题转向了波兰的国内政治局势。贝鲁特说，他确信，波兰社会党最近一个时期已经急剧右转。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在寻求同波兰农民党结盟。贝鲁特说，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但是我们波兰工人党将坚决顶住，绝不交出政权。关于此事我早已向什瓦尔贝说过，认为需要吓唬一下波兰社会党内的那些自不量

^① 即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地下武装。

力、大胆妄为的政客们。

11月24日我拜会了莫拉夫斯基并向他递交了与递交给贝鲁特的完全一样的文件。

就递交给他的关于对驻波兰红军所犯罪行的文件一事，莫拉夫斯基说，这些犯罪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波兰国家安全机关和民警部门内部不纯和工作不力所致。在国家安全部机关部门中犹太人所占比例很大，由于国内存在着反犹太主义，故这种情况正在助长反对政府的敌视宣传。莫拉夫斯基说，波兰工人党把国家安全机关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尽管波兰社会党建议派一些可靠的人去民警部门以加强其干部队伍，但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一直拒绝这样的帮助。同时，在民警部门工作的波兰工人党部分党员是那种只醉心于实施私利的人，他们在工作中并没有尽心尽职。

我向莫拉夫斯基指出，我从波兰工人党人那里也听到过在合作组织方面对波兰社会党的类似抱怨，说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在提防波兰工人党的影响。

鉴于有传言说莫拉夫斯基打算免去马杜舍夫斯基的宣传部长职务并将其派往国外（对我说过此事的，其中就有波兰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韦尔布洛夫斯基，莫拉夫斯基建议韦尔布洛夫斯基接受宣传部长一职，而把马杜舍夫斯基派往布拉格）。我试图试探一下莫拉夫斯基对马杜舍夫斯基的态度。话题转向了宣传工作。谈及此事时莫拉夫斯基评论了马杜舍夫斯基，说他是一个工作能力不太强的干部，并说马杜舍夫斯基虽然按组织系统是波兰社会党人，但就思想而言却是一个波兰工人党政策的拥护者。根据莫拉夫斯基说话的口吻可以看出，他对马杜舍夫斯基的思想信仰感到不满意。

11月24日我拜会了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西伦凯维兹，以便同他交谈一下有关正在波兰访问的苏联工会代表团打算为华沙各企业工人骨干分子举行的招待会的事。我说，这次招待会的

形式将是放映一部名为“在莫斯科的体育检阅”和为一部分应邀请来观看影片的来宾举行的小型晚宴。

西伦凯维兹对准备进行的上述活动表示赞同，并答应在招待会的具体组织和邀请工人代表方面给予协助。

接着谈话涉及到了政治话题。

对西伦凯维兹我们了解得很少。他不是一个人健谈的人，交谈进行得很谨慎，几乎是字斟句酌。给人的印象是此人是一个善于思索、严肃认真的工作者。

西伦凯维兹让我看了刚刚从印刷厂送来的波兰农民党中央机关报《农民报》，报上登载有米科瓦伊奇克在波兰农民党华沙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米科瓦伊奇克在讲话中说，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是钢铁铸就的，任何人都休想摧垮他们。西伦凯维兹评论这一段话时说，波兰农民党正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其反对党的性质。

我指出，现在看来似乎只能对米科瓦伊奇克的党采取两种政策路线：要么同它斗争，要么在竞选联盟的基础上同它达成折衷协议。我问西伦凯维兹，他认为哪条路线是正确的。

西伦凯维兹坚定地回答说，他主张对波兰农民党采取进攻的而不是退让的政策。西伦凯维兹把他的这番话具体加以解释说，对米科瓦伊奇克的支持者们的每一个反政府和反民主的讲话都必须立即在报刊上或者会议上做出反应，予以回击。

米科瓦伊奇克和凯尔尼克对部长工作是消极怠工，每天到部里来上几个小时班做做样子，其余的时间都在忙于自己党的工作。应当为此而谴责他们并追究其责任。

我指出，现在米科瓦伊奇克及他的党目前是把重点放在攻击波兰工人党上，我问，您是否认为这样的策略是旨在分裂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联盟，以便以此削弱波兰工人党，然后再对付波兰

社会党？

西伦凯维兹回答说，他认为这种对米科瓦伊奇克及其支持者的策略的看法是正确的，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这一策略取得成功，对波兰的民主制度将是一种威胁。

在谈话的最后，话题转向了有关茹拉夫斯基集团的问题。西伦凯维兹告诉我说，他掌握有充分的情报说明，在茹拉夫斯基正式申明他打算建立一个新党——波兰社会民主党之前，他已经从英国驻波兰大使那里得到了相应的指示。

茹拉夫斯基的代表们曾经拜访了英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此人向他们转达了这些指示。

西伦凯维兹说，我们绝不会把茹拉夫斯基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接纳到波兰社会民主党里来。^① 道路只能对除扎伦巴之类的人以外的单独个人开放，茹拉夫斯基集团中可以被接纳加入波兰社会党的这种单独个人并不多。

我对西伦凯维兹说，从对波兰社会党的现实情况的观察中可以看到，茹拉夫斯基集团中其余的人，很遗憾，早已加入到了波兰社会党的队伍之中并且成了其右翼的成员。

11月25日贝鲁特举行招待会，欢迎为解决人员遣返回国问题而前来波兰的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在贝鲁特的招待会上我同莫拉夫斯基进行了交谈。

莫拉夫斯基不知为什么变得沉默寡言了，似乎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他同我提起了关于吸收波兰农民党加入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如果在对待波兰农民党的态度方面采取以诚相待的政策，这一政策将会引起这个政党内部的分裂。以教育部长维采赫为首现在就一直渴望进行真诚合作的那些人将会转而同政府和

^① 原文件在这句话的边页上有一句标注：“已经接受”。

民主主义联盟合作。

我当时很清楚，莫拉夫斯基是在进行试探。我认为有必要向他指出，在下决心同米科瓦伊奇克结成联盟之前应当首先认真地想一想。这一联盟以及同波兰农民党合作的政策很可能最后对波兰的民主制度是非常危险的。

莫拉夫斯基陷入了沉思，未作任何回答。

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5年11月22~25日于华沙

№09240

波兰关于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营地 遣返波兰人的备忘录及营地清单

(1945年11月29日)

备忘录^①

鉴于苏联政府已于1945年7月6日就加速实施苏联—波兰关于人员遣返回国问题的协议一事做出决议^②，遣返目前关押在位于苏联领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各审查和劳动改造营地的波兰公民问题有望获得解决。

上述波兰公民基本上是在1944年下半年，有的是在1945年上半年由于在军事行动地区内出现的特殊形势而被从波兰领土送往苏联腹地的。^③

随备忘录附上关押有波兰公民的营地的不完全的清单，本使馆想要强调的是：波兰政府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非常重视加速遣返

① 备忘录是波兰驻苏联大使馆参赞 B. 马特文在与第四欧洲司司长 A. П. 巴甫洛夫会谈时转交的。这个问题是由波兰驻苏联大使 Г. 拉贝在1945年11月21日与莫洛托夫会晤时提出的。

② 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决议。

③ 截止到1946年1月1日为止，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里已经有19930名波兰公民和根据民族划分的波兰人，这些人都是“根据清理作战的红军部队的后方”在波兰境内被逮捕和拘留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克鲁格洛夫向莫洛托夫报告说，在这些人中有5209人已经获释并遣返回国，根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命令，有12289人将被获释。

首先是关押在卡卢加市的营地（序号 36990）和在莫斯科州科罗博夫区的谢列德尼亚基、马列伊哈、哈尔拉姆佩沃、阿纳尼诺镇的营地中的波兰籍人员和目前仍生活在莫斯科州莫尼诺镇和波多利斯克市以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斯大林斯克州捷尔任斯克市第 240 号特种营地的波兰人问题。

关押有波兰公民的营地清单

序号	州	区或铁路	营地名称和地址	附注
1.	莫斯科	顿斯科伊	博布里克山镇	
2.		科罗博夫	谢列德尼亚基镇	
3.			马列伊哈镇	
4.			哈尔拉姆佩沃镇	
5.			阿纳尼诺镇	
6.		波多利斯克	波多利斯克市	
7.		科洛姆纳	科洛姆纳市 32 信箱	
8.		——	莫尼诺镇	
9.		奥列霍沃 - 祖国耶沃	奥列霍沃 - 祖国耶沃镇	
10.		斯大林诺戈尔斯克	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市, 11 信箱	
11.			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市 1 号营地管理局 283 信箱	
12.		斯大林诺戈尔斯克	吉普斯镇 283 信箱	
13.			乌兹洛沃伊镇 杜博夫卡村 11/20 信箱波兰人镇	
14.	沃洛格达	索科尔	德文纳镇科兹洛沃村	
15.	卡卢加	卡卢加	卡卢加市 36990 号营地	
16.	基洛夫	卡伊	维亚特卡劳改营 231 信箱	
17.	古比雪夫	——	克里亚日别济缅卡劳改营	
18.	莫洛托夫	——	丘索沃伊市里亚米诺镇内务人民 委员部 №10 劳改营	
19.	罗斯托夫	卡缅斯克区	卡缅斯克市 6 信箱	
20.			阿尔乔姆国营地区发电站 8 号营地 8 信箱	
21.	萨拉托夫	塔季谢夫	338 号营地, 萨拉托夫 - 莫斯科 科天然气管道建设工地	

苏联与战后波兰(二)

续表

序号	州	区或铁路	营地名称和地址	附注
22.	车里雅宾斯克	新德沃尔斯克	叶利尚镇 27 邮政分局 402 信箱	
23.			特罗伊茨克市	
24.			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市 №1 劳改营	
25.	科米自治共和国	北伯朝拉铁路	219 信箱	
26.			哈诺沃伊镇, 秋姆村 274/6 信箱	
27.			沃尔库塔市新建筑工地建筑机构 安装处	
28.			乌萨古巴阿别兹 272 信箱	
29.	斯大林斯克	捷尔任斯克	特营地 №240	

1945 年 11 月 29 日于莫斯科

№09242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面临的国内外 问题与日莫夫斯基的谈话纪要

(1945年12月1日)

抄送维辛斯基，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我前往拜会了日莫夫斯基^①，目的是了解他于12月1日白天为波兰报纸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情况，并弄清日莫夫斯基和他的“民主党”对米科瓦伊奇克的党所持的立场。

此次拜会的借口是向日莫夫斯基转告某些信息。

我提醒日莫夫斯基说，需要尽快派出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苏联—波兰电信协定。

日莫夫斯基答应在近日内将代表团组成人员通知我方。

接着，我向日莫夫斯基通报了在运送从波兰迁出的德意志人方面存在的混乱和无组织状况。

我对日莫夫斯基说，运送德意志人列车到达波兰—德国边界的情况一直没有通知驻德国的苏联军事当局。

运送德意志人的工作是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德意志人到达时均已被劫掠一空，并且因营养不足而生病。一部分被遣送者因忍受不住恶劣的条件而死于途中。

^① B. 日莫夫斯基，时任波兰外交部长。

我说，这种情况使苏联占领当局在接收和安置德国居民方面的工作难以进行。除此以外，还应当考虑到，由于驻德国管制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今后从波兰返国的德意志人的数量还会增加。这些德意志人的一部分将会进入英—美占领区。他们到处讲述遣送他们时的恶劣条件将给波兰政府造成麻烦，并且将会被国外反动势力利用来进行反对波兰的宣传。

我附带说明，我的关于遣送德意志人问题的谈话不应看做是官方正式的交涉，而只是希望作为朋友向部长通报一下我们从在德国占领区的苏联工作人员那里得知的一些情况。

日莫夫斯基对通报这一情况表示感谢，并答应采取措施整顿运送德意志人的工作。

接着，我谈到了波兰的东正教会的地位问题。我对日莫夫斯基说，司法部长希维特科夫斯基现在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是否需要因亲德活动而逮捕并审判波兰东正教会首领季奥尼西亚。同时他也不清楚，应当保留还是取消国内东正教会的（不受康斯坦丁堡大主教管辖的）独立教会地位。

我问作为通晓宗教事务的日莫夫斯基，他对此问题持何观点。

日莫夫斯基说，他认为逮捕季奥尼西亚是不适宜的，因为对他的审判将会引起反俄情绪。至于独立教会地位问题，日莫夫斯基答应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并同希维特科夫斯基商量一下。

由于谈及的这个话题，日莫夫斯基猛烈抨击了天主教会。他说，从他的美国之行中他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即在那里梵蒂冈乃是各种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组织者。

天主教徒们为他们正在失去在欧洲的立足点，其中包括失去在波兰、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财政来源而大发脾气。

现在，梵蒂冈的主要物质和政治基地是美国。在那里聚集着德国的天主教徒、波兰人和资本主义天主教世界的代表。这些人给梵

蒂冈提供资金，而梵蒂冈则组织维护德国和中伤苏联及民主波兰的运动。

甚至连曾经一贯追随波兰毕苏茨基政权的“人民天主教会”的代表也对新波兰抱有强烈反对的情绪。

日莫夫斯基说，他在华盛顿曾经得以同“人民天主教会”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向他们介绍了许多波兰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在波兰，曾经只身一人挺身而出在法庭上为“人民天主教会”辩护的前律师希维特科夫斯基现在是司法部长。

日莫夫斯基说，在他做了这些介绍之后，他成功地使天主教会的这些代表对波兰的态度迅速好转。“人民天主教会”的领导人还向日莫夫斯基表示了自己的谢意。

日莫夫斯基说，在美国的这个天主教组织如能被吸引来参加支援民主波兰的运动，其力量不可小视。

谈到波兰本国天主教徒的表现，日莫夫斯基说，据他的大概计算，在波兰共有1.5万名天主教教士和大约5000名天主教僧侣。修道院亦有所增加。这一群人在农民中是一支很有影响的力量。天主教教士手中掌握有秘密忏悔这样的手段。他们无疑会利用这一手段唆使信奉天主教的农民反对国家的民主制度。

在谈到他美国和英国之行总的情况时日莫夫斯基说，今天他为波兰记者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向记者们谈了英国人在波兰黄金、流亡政府的债务和波兰军队从西方返国等问题上的敌对立场。

日莫夫斯基说，在我们波兰曾经有一句俗话说，波兰这个国家是由三个支柱在支撑的，这就是黄金、丘吉尔和圣母。如今黄金和丘吉尔这两根柱子都已经倒塌，只剩下圣母了，但是看英国的脸色行事的习惯也保持了下来。因此，在我对记者发表完谈话之后，记者们都惊讶地问我，难道可以把我说的针对英国的所有话语都登载

出来？

我把话题转入了米科瓦伊奇克在国内的政策并问日莫夫斯基，在回国之后他是否来得及了解一下波兰农民党报刊最近的一些言论。

日莫夫斯基说，他认为在对待米科瓦伊奇克的态度方面卢布林联盟^①犯了某些错误。这些错误早在莫斯科会议^②上就已经开始犯下了，当时在什瓦尔贝的支持下，伸着双臂欢迎了米科瓦伊奇克，并在没有要求他发表书面声明完全支持卢布林联盟的政策的情况下就让他回国了。米科瓦伊奇克是作为一名奸细回国的。众所周知，反动势力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在华沙和克拉科夫为他举行了大加渲染的欢迎大会。

他说，引人注目的是，现在，当米科瓦伊奇克开始了在报刊上的反对派运动的时候，那些曾经称他为叛徒和投敌者的声音却在美国销声匿迹了。曾经咒骂过米科瓦伊奇克的那些报纸现在都在拼命地维护和支持他。日莫夫斯基以讽刺的口吻说，现在仍在反对米科瓦伊奇克的只有那些“最落后的”反动报纸。

他说，米科瓦伊奇克没有为民主制度做任何事情，而同时又恰恰主要是由于他的过错而使英国攫取了波兰的黄金和为波兰士兵的返国制造麻烦。米科瓦伊奇克当时不应当把权力交给阿尔齐舍夫斯基。这一点应当向人民解释清楚。

我指出，目前揭露米科瓦伊奇克党的政策的还只有波兰工人党和农民党的报纸。我说，你们党的报刊在沉默不语，似乎同意这种政策。

日莫夫斯基回答说，民主报刊之所以沉默是由于这些报纸的编

① 指 1944 年年中组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力量。

② 1945 年 6 月在莫斯科关于建立民族统一阵线临时政府问题进行的谈判。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23卷

辑是由一些“腐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其中也包括主编瓦索夫斯

No09249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关于人民党和 民主党现状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6年1月7日）

抄送维辛斯基、巴甫洛夫，归档。

秘密

贝尔曼对人民党的状况表示不安。

该党同米科瓦伊奇克集团组成的议会党团在波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民族工业问题所持的反对派立场是令人不安的征兆。

尽管人民党总书记科日茨基对此解释说，人民党的代表希望显示出该党的政策是独立于波兰工人党的，而他与波兰工人党有所接触，并按照波兰工人党的指令工作，但是波兰的同志看到，科日茨基和人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该党的局面了。

根据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资料，越来越多的敌对分子正在潜入这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党，其目的是瓦解它。……

我说，在民主党内，这方面也并非事事如意。

贝尔曼不同意我的说法。

他说，民主党的情况与人民党不同，尽管这个党内有右派、左派和中派，但是民主党不存在分裂的危险。

民主党的左派以日莫夫斯基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巴尔蒂科夫斯基为首。

他们准备的党纲草案与波兰工人党的党纲差不了多少。

贝尔曼曾经直截了当地对日莫夫斯基说，这样的党纲把民主党应该接纳的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推到了党外。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托领导民主党的日莫夫斯基的副手哈因（他受波兰工人党的委派在该党工作）在民主党内掌握中派的政治方向，并纠正日莫夫斯基的“左”的倾向。

我问贝尔曼，关于1月6日开始的人民党各省代表大会的情况，他那里有什么消息。他回答说，暂时还没有得到消息，但是波兰工人党已采取了各种措施让农民参加代表大会。

贝尔曼说，应该坦率地讲，准备这些代表大会的不是人民党的领导人，而是保证农民能参加的波兰工人党的组织。

农民将参加代表大会。但是应该意识到，他们实质上并不反映农村农民政治积极性的倾向。

遗憾的是，人民党没有健康的群众积极性。

我说，米科瓦伊奇克也没有这样的积极性，但是他掌握着农村的知识分子。这是米科瓦伊奇克可以在竞选前用来对农民施加影响的巨大力量。我说，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党必须抢在米科瓦伊奇克的前头，提高农民的健康的政治积极性并领导他们。

对此，贝尔曼说，米科瓦伊奇克现在极力散布流言说，他将单独参加竞选，不会同卢布林阵营结成竞选联盟。但是，米科瓦伊奇克将一事无成，贝尔曼很有把握地说。

我说，现在波兰工人党内部经常可以听到工人党不会把权力交给米科瓦伊奇克的说法。我问，如果米科瓦伊奇克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票并依法组成政府的话，您对此如何估计。

贝尔曼说，我们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利用我们的权力确保民主阵营有良好的投票过程。

他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不会粗暴破坏自由选举的原则。贝尔曼声称掌握有实权和行政机关的波兰工人党，如果容许米

科瓦伊奇克和他的党把农民的选票抓走，那是愚蠢的。

谈话结束时贝尔曼说，最近在华沙将对 12 名恐怖活动分子进行闭庭审判。这些恐怖分子企图暗杀莫拉夫斯基、维斯瓦夫、贝尔曼和民主同盟的其他领导人。

领导暗杀准备的组织中心位于别洛斯托克，这个中心成功地吸收政府警卫队的工作人员加入了恐怖小组。恐怖分子打算闯入住宅，杀害事先拟定的对象，以此开展行动。

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6 年 1 月 7 日于华沙

№09254

列别杰夫呈送贝鲁特的关于波兰地下 武装袭击苏联官兵的情况通报摘要

(1946年1月17日)

秘密

(一)

1. 1945年12月1日，特里别利镇地段民警机关负责人克柳克·沃伊泰克及其副职绍斯塔克和民警恰斯·韦奇斯佐夫，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便在克罗利村（特里别利镇以西3公里）将两名押运牲口并在这个村过夜的红军战士捷列伊赫和多夫加尼解除武装并逮捕。红军战士捷列伊赫和多夫加尼被关押在部分被淹没的地下室中两天两夜。一部分牲口被上述匪徒据为己有，另一部分被分给当地居民。1945年12月3日，这些匪徒把捷列伊赫和多夫加尼带进森林执行枪决。但是只被打伤的捷列伊赫一个半小时后醒了过来，艰难地回到了自己部队的驻地。

1945年12月14日，克柳克、绍斯塔克和恰斯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执勤部队拘留，并于1945年12月15日移交佐劳市警备司令费尔特·罗伯特中尉进一步侦查，还移交给布雷斯劳市的波兰检察员。我们的边防军人在调查此案的审理结果中查明，1945年12月19日，佐劳市警备司令费尔特中尉向下西里西亚省民警机关负责人巴尔图什少校报告说：“正在受审查的原特里别利镇地段民警

机关负责人克柳克从在押中逃跑，绍斯塔克失踪，根据侦讯材料，民警恰斯不是谋杀事件的参与者”。

上述情况系由下西里西亚省公安部门顾问提供。

(北方军队集群司令部 1946 年 1 月 13 日消息)

(二)

1. 1945 年 12 月 22 日，一伙由 15 个身穿波兰军队制服的人组成的匪帮袭击了位于拉伊内尔斯多夫村（克拉伊茨堡西北 20 公里）的第 79 号战俘营，造成警卫俘虏营的军人瓦尔塔尼扬上士和科夫通上等兵被击毙。

(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 1946 年 1 月 13 日消息)

2. 1945 年 12 月 23 日，一伙人数不详的匪帮袭击了停在科尔库夫车站（拉多姆以南 40 公里）的第 77/7060 号军运列车。造成红军战士伊古申采夫受重伤，15 袋糖被盗。

(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 1946 年 1 月 13 日消息)

3. 1945 年 12 月 27 日，“乌克兰起义军”匪帮袭击了普热米什尔市军事代表处大楼。军事代表处受到 82 毫米迫击炮的射击，发射了 7 枚迫击炮弹。没有人员牺牲，匪徒们藏起来了。

(北方军队集群司令部 1946 年 1 月 13 日消息)

4. 1945 年 12 月 30 日 21 时，在科贝目克村（克拉科夫西南 17 公里）一些来历不明的波兰公民捣毁红军军人墓地。

(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 1946 年 1 月 13 日消息)

5. 1946 年 1 月 1 日，在卢布林市一些来历不明的人将苏联政府总特派员连的红军战士切列帕诺夫打死。

(北方军队集群司令部 1946 年 1 月 13 日消息)

6. 1946年1月2日22时，在诺维-松奇市，一些来历不明的人炸掉了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 1946年1月13日消息)

7. 1946年1月3日，在库罗夫市（卢布林西北35公里），“国家军”匪帮袭击了政府通信哨位，造成哨长克里沃舍耶夫中尉被击毙。

(北方军队集群司令部 1946年1月13日消息)

8. 1946年1月4日，在卡缅卡-普拉什科夫卡区间（诺维-松奇-亚斯洛车辆段），一伙人数不详的匪徒两次袭击第101367次军运列车，造成红军战士普鲁索夫和两名守护铁路的波兰人被打死，6头牛和12只羊被拉走。

(北方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 1946年1月13日消息)

No 09256

卡普兰 — 科布里斯卡娅
关于波兰工人党的错误
给联共（布）中央的信（摘录）
(1946年1月)

绝密

目前波兰的政治形势十分严重，如果考虑到即将举行的大选的前景，则尤为如此。

我认为，这不仅是客观严重形势（根深蒂固的对俄国人的不信任，战争期间经济遭到破坏，国际资本在波兰的活动，有产阶级反对人民民主的斗争）造成的结果，而且也是波兰工人党的主观缺点和错误造成的后果。

我只想谈几个问题，不涉及已经在代表大会上得到正确和广泛解释的问题。

是一些什么样的缺点和错误使波兰人民民主的公开或伪装的敌人的影响有增大的机会呢？

波兰工人党和整个波兰人民民主政治在农村的影响力很弱。这是因为在几乎没有触及中农利益的农业改革之后，党没有提出和没有实行改善劳动农民状况的具体纲领。在被破坏的经济条件下存在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可能性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不能向农村提供充分的工业品。……

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在一系列地区，波兰农民党（米科瓦

伊奇克)不仅领导着富农而且领导着中农,甚至拉走了贫农(克拉科夫省、波兹南省)。目前,波兰农民党(米科瓦伊奇克)在农村的影响力大概占有绝对优势(无统计数字)。

摆脱目前状况的可能的出路是:

1. 具体制定改善劳动农民日常生活的计划。在群众中宣传这一计划,动员农民群众为实现这一具体计划而奋斗。
2. 派遣数千名工人去农村向农民解释目前的政治形势。
3. 为实现与农村密切联系的国家机关民主化、为选拔成千上万出身于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人进入国家机关,为了把异己分子和敌视人民的分子清除出国家机关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 * *

第二个问题是加强波兰工人党同群众,首先是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把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提高到理解全国性的任务上。……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巩固民主分子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反动派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和相当一部分工人对政治形势认识不足,表现为频繁地举行罢工,尤其是罗兹市的纺织工人和铁路工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工人们认为,波兰工人党不仅要为一切美好的事务,而且为一切不好的事务承担责任。

许多工人不了解波兰工人党的目标是什么,是什么妨碍了实现波兰工人党目标而开展的那些活动,谁在妨碍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相当多的工人没有意识到“谁战胜谁”的斗争还在进行,劳动人民的成果还有丧失的危险。

工人们把波兰工人党视为政府党,常常不想当着波兰工人党党员的面说他们想说的话。

波兰工人党在上层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在群众中的工作开展得很不够。波兰工人党以前在推出某一新的民主法令之前还能够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中去，取得群众的支持，达到执行法令的目的，从而使自己接近群众，使工人阶级为其民主思想的新胜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然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

结果是，党为工人阶级做了事情，可以说只是从上层使工人阶级“感到幸福”，却阻碍了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和觉悟的提高。

诚然，波兰的社会变革（消灭银行、托拉斯、资本家、地主）是从上层发生的。

但是，为了巩固这一政权，应该号召千百万人，首先是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生活。

我曾经提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所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党的工作人员，都应该像列宁以其榜样行动教导我们的那样，经常到大型工厂、矿山去发表政治演讲。

但是并没有这样做。……

当我们夺取政权时，从波兰国内阶级力量的成熟程度的角度看，我们摘下的苹果是不成熟的。

只是到了现在，在米科瓦伊奇克来了以后，阶级力量才成熟起来，并开始进入分化的正常过程。

所以，每个政党应该表明它能干什么。之所以说我们在群众中开展工作、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个对胜利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

我甚至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具有两个政权在波兰并存的某些条件。

隶属米科瓦伊奇克（农业部）、凯尔尼克（办公厅）、维策赫（教育、司法）的部分国家机关正在做一些违背真正人民民主的事情。波兰农民党及其仆从们大张旗鼓地干着一些合法和不合法的事（出版、集会等等）。……

结果是，波兰工人党具有按照联共（布）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广泛的党的分支机构，所有的机构都有像模像样的、下设几个部和有几名书记的州委会和市委会，还有区委会、县委会和乡委会，而波兰工人党所有优秀的骨干分子要么在这个机构工作，要么在国家机关工作。只有一样是没有的——没有一个坚强的支部和一名称职的书记，甚至在规模最大的轻工厂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党的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国家机关民主化的速度缓慢和没有工农监督组织。

在军队、国家安全机关和部分工业部门中，工人和农民有被提拔的机会，而在其他国家机关中（供应机构、铁路、农业机构，等等，等等）几乎完全就没有这样做过。

在波兰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分立的条件下，在劳动人民苏维埃由于其消极性不能成为起作用的人民政权机关（指地方劳动人民苏维埃）的条件下，对于国家机关民主化的问题，即这一机关是否推行民主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人员的组成。

然而，除了军队、国家安全机关和部分工业部门以外，提拔工人的工作还没有迈开步子。因此出现了这种情况：在波兰工人党代表大会召开第一天，日拉尔杜夫的工人们（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这当然是反动派策划的），并宣称，他们举行罢工是因为无法搞到煤，因为“从明涅茨到工作地点的路太长”。

结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工人通过罢工实现了自己的要求。因为尽管罢工是反动派组织的，尽管罢工是反对民主政权和工人阶级的武器，但是在罢工以后常常不得不马上满足工人的要求。因为许多要求是正当的，却没有被国家机构里企图挑起工人不满情绪的异己分子及时解决。

毫无疑问，国家机构民主化的软弱使破坏活动和贪赃受贿的规模有扩大的危险，这种表现已经存在。

至于工人和农民的监督作用，实际上已不存在。人民苏维埃丧失了其大部分积极性，在它的周围没有形成一支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骨干分子队伍。

现在正在成立同滥用职权作斗争委员会。但是，从对待群众独立性问题来看，将要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可能还是一个机关，而不是群众监督的一种形式。

工会实质上并没有研究组织监督问题。国家机关的这种状况可能对选举有不良影响。

* * *

现在谈谈党内生活的几个方面。

关于党的思想教育问题

目前，党内在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危险的形势，简单地说，就是出现了思想混乱。

战后，在建立人民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胜利新道路的理论根据，对这种理论的追求是完全正确和健康的。但是许多同志已经到了否定理论的作用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的地步。……

某些同志把革命、武装起义的概念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混为一谈。所以，他们为了说明波兰沿着社会变革的道路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正确的，而否定在将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维斯瓦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给党指明了发展前景，完全正确地指出，人民民主可以不受主观因素的制约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代表大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维尔勃沃夫斯基同志（中央委员）在代表大会上反对维斯瓦夫，声称我们有可能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性。另一个反对者是斯彼哈尔斯基同志，他在军队代表会议上说，苏联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没

有工人阶级的专政。

扎瓦茨基同志（中央委员）在发言时说，许多人只是在头脑里翻一翻“圣书”（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索维斯基（中央委员）在罗兹代表团会议上说：“我们不需要理论家，我们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

简单地讲，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似乎今天党的路线不是来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基本原理关于无产阶级是人类的解放者和劳动群众的领导者的深刻理解，似乎制定这一新路线应该避免使用所有的理论知识。

在反对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许多同志已经谈到要“打倒有学识的人”，并根本否定社会改造整个历史时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的工人阶级专政。

当然，对于群众来说，社会主义民主的定义是更容易理解的。但是，要知道党的领导人应该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

这些过分行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中央委员克里什科在党校听到“社会主义”一词时吓得脸色刷白。他认为，在占领期间之所以找到了正确的路线是因为当时领导人中还没有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

1. 鉴于目前的现实——人民民主造就了新的过渡形式，必须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国家和革命问题。

2. 应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作用，深刻理解辩证法基本原理，认识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出现的新现象。

3. 应该向同志们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释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概念。

* * *

波兰工人党的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新老骨干分子和睦

共处、一起工作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以前，没有发现新老骨干分子一起工作有什么困难。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则有些不妥，准确地讲就是把事情搞糟了。结果似乎是老骨干分子成了宗派主义的主要代表者，并且妨碍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正确推行党的政策。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正是这些老骨干分子组成了党的骨干力量（占代表大会代表的61%），他们在生活中带着深深的阶级觉悟和对党的忠诚贯彻着党所实行的新路线。

总之，事情很不顺利，留下了一些不愉快的感觉。自然，在代表大会之后，党内的某些新成分已经不是那些优秀的新干部，而是那些不太重要的人。他们企图利用这一情况，声称老骨干分子们没有能力推行党的新路线。

应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载货的大车很重，需要齐心协力才能把它推动。

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是，缺乏对骨干分子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在代表大会上，几个批评性的发言和带有新思想的发言遭到了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因此人们开始害怕畅所欲言，这就为那些高喊“乌拉”的发言和平平淡淡的发言打下了基础。

正是由于没有对骨干分子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以及不喜欢批评，不喜欢别人的新思想，才使我不得不以这种形式写出上述意见。

或许，正确的东西会占上风，我将为改进党的工作做点有益的事情。……^①

^① 文件后附有如下内容的情况说明：“该文件是1946年初由波兰工人党中央党校副校长卡普兰-科布林斯卡娅同志书就并转交给联共（布）中央的。由于一系列原因，主要原因在于她是联共（布）党员，卡普兰-科布林斯卡娅同志请求联共（布）中央，不要在波兰工人党中央面前暴露她的姓名”。原文件未表明日期。

№09268

克鲁格洛夫关于波兰反政府地下活动 给斯大林等人的报告

(1946年4月23日)

接收件人地址分送四份，第五份送内务部秘书处归档。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拉·帕·贝利亚同志

格·米·马林科夫同志：

据苏联内务部驻波兰社会安全部顾问报告，今年3月“国家军”和“国民武装力量”等武装反革命集团继续在波兰境内频繁活动，而在卢布林省和热舒夫省与苏联接壤的一些边境县则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乌克兰暴动军”反革命集团积极活动。

3月份，社会安全机关在波兰境内一共记录了498次武装匪徒的袭击活动，其中袭击：

红军军人——15次

波兰军队军人——20次

社会安全机关和工作人员——34次

民警机关和民警人员——82次

波兰工人党党员——31次

国家机构、企业和公务员——105次

储蓄所——20次

火车和铁路设施——17次

汽车运输——15次

当地居民——150次

3月份一个月中，武装匪徒的活动次数呈不断增加趋势：3月上旬120次，中旬186次，下旬192次。

武装匪徒袭击结果造成：

人员类别	死	伤	被抓
红军军人	18	7	4
波兰军队军人	45	29	130
社会安全机关工作人员	18	4	7
民警	12	16	12
波兰工人党党员	15	2	1
波兰社会党党员	1	-	-
公务员	7	1	-
当地居民	64	19	1

被匪徒抢走：手提机枪10挺，冲锋枪24支，步枪95支，手枪31支，手榴弹18枚，粮食8吨，肉类制品4.5吨，各种商品价值50万兹罗提，现金455.7万兹罗提。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乌克兰暴动军”的匪徒的活动主要针对担负保证乌克兰人从波兰迁居苏联的波兰军队的分队。

一个月之中，歹徒打死波兰军队的军人27名，打伤16名，抓走12名。

此外，在热舒夫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乌克兰暴动军”的匪徒消灭了3个波兰边防站，抓走这些边防站的123名军官和士兵。波兰社会安全部的机关3月进行了255次消灭匪徒的战斗。

这些战斗取得了如下战果：

反革命集团名称	打死	打伤	抓获
“国家军”和“国民武装力量”	144名	60名	2866名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乌克兰暴动军”	250名	1名	203名

收缴匪徒的反坦克枪 2 具，轻机枪 63 挺，冲锋枪 346 支，步枪 1852 支，手枪 544 支，手榴弹 802 枚，子弹 102000 发，地雷 2802 颗，炸药 50 公斤，电台 3 部，打字机 10 台。

在战斗中，参战部队人员 12 人被打死，24 人受伤。

今年 3 月社会安全部进行的侦察性和司法性的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 2 月底开始的歼灭“国家军”反革命集团的战斗已于 3 月上旬结束。“国家军”反革命集团约 150 人，以科科利斯基·叶夫根尼为首，在罗兹省和波兹南省境内活动。

科科利斯基反革命集团于 1945 年 7 月组建。在被歼灭之前对各种机构、社会安全机关和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波兰工人党党员和当地居民实施过 93 次武装袭击。打死了 17 人，其中红军军人 2 人，社会安全机关和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 5 人。

歹徒们同期一共抢劫武器 147 件，电台一部，打字机 6 台，80 万兹罗提，5 吨糖等。

参加战斗的有苏联内务部的部队和波兰社会安全部所属军的分队。

战斗中共打死科科利斯基反革命集团的匪徒 18 名，打伤 8 名，活捉 120 名，包括一名参谋长和两名反革命集团头目。

科科利斯基被生擒后自杀身亡。

3 月下旬被完全歼灭的反革命集团有：

在华沙省采哈努夫斯基克县一带活动的“国民武装力量”反革

命集团及其头目古列茨基·斯捷凡；

在华沙省姆拉夫斯克县活动的“国家军”反革命集团及其头目切尔克舍维奇；

共计打死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15 人，其中匪徒 6 名，包括头目古列茨基和切尔克舍维奇，这两人已被执行枪决，另外 9 名反革命集团的参加者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

案件在切哈努夫市公开审理。

目前，波兰社会安全部机关正在积极行动继续肃清反革命集团。

苏联内务部部长 C.H. 克鲁格洛夫

1946 年 4 月 23 日于莫斯科

№09272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部长会议讨论 访苏事宜给莫洛托夫的电话记录

(1946年5月22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
日丹诺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

秘密

维亚

5月22日召开了波兰部长会议特别会议，会上总理宣布了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①然后日缅尔斯基、明兹、莫杰莱夫斯基、科瓦利斯基先后发言，通报了要在莫斯科谈及的问题（日缅尔斯基谈了关于获得武器贷款的必要性，因为装备快用完了。明兹指出了调整苏联和波兰之间的财政核算的必要性，以及由于农村粮食收购政策计划改变，因此必须搞清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莫杰莱夫斯基谈了鉴于和平会议即将举行和解决德国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的必要性。科瓦利斯基谈了签订文化公约和交换文物的必要性）。

米科瓦伊奇克在其讲话中肯定了莫斯科之行的必要性，同时又说代表团可能太大了。他承认武器贷款完全必要，但他想要准确地了解贷款的总额。米科瓦伊奇克谈到了波兰农业的需求，指出有必要试探一下，能否从苏联得到耕畜。米科瓦伊奇克认为，和平会议

^① 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贝鲁特为首的波兰代表团于1946年5月23~27日访问了莫斯科，期间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接见。

的政治路线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德国问题，对于波兰来讲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凯尔尼克在米科瓦伊奇克之后发言，他强调了以下两点：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权限问题不必怀疑，对于政治问题都表示同意。至于经济问题，他想搞清拟议中的协定的规模。但是代表团具有政治的性质仍然是主要的，代表团的组成证明了这一点。凯尔尼克说，代表团的组成没有反映目前波兰政府的组成，代表团中没有波兰农民党的代表使其只具有单方面的性质。所以，他（凯尔尼克）建议补充代表团的组成，把米科瓦伊奇克吸收进代表团。如果这个建议不被采纳，可能不利于代表团完成赋予它的全部任务。

莫拉夫斯基把凯尔尼克的建议提交表决，结果被否决，因为只有两人赞成。之后，总理提议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人员组成被一致通过（米科瓦伊奇克和凯尔尼克在第二次表决时表示赞成）。

列别杰夫

1946年2月22日于华沙

№09273

斯大林与贝鲁特关于波兰经济和 政治状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5月24日)

秘密

昨天，即1946年5月23日晚上22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的陪同下，会见了抵达莫斯科的以贝鲁特总统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总理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波兰方面参加会见的有：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罗拉-日缅尔斯基元帅、什瓦尔贝、哥穆尔卡（维斯瓦夫）、明兹、科瓦利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将军。

贝鲁特简要说明了波兰政府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目的。

“斯大林同志”，贝鲁特说，“我们到你们——我们伟大的朋友这里来是为了说一谈我们对波兰事态进程的想法，并检查一下我们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评价是否正确。我们还想同您讨论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问题。”

“波兰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希望，这个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以后，同以米科瓦伊奇克为首的伦敦流亡集团签订的协议能为国内形成良好的环境提供可能。我们认为，尽管米科瓦伊奇克和其他前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推行过有害于波兰利益的政策，但也应该把他们吸收进政府，以便使米科瓦伊奇克的反映部分富裕农民利益的党加入民主集团。我们之所以要把米

科瓦伊奇克吸收到政府中来，是因为我们不仅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要为其他阶层居民的利益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想把大资本家和地主从我们社会中清除出去，米科瓦伊奇克在这个方面看来能够帮助我们。

遗憾的是，实践表明，这些希望落空了。把米科瓦伊奇克吸收到政府中不仅没有促使国内形势的稳定，反而成为斗争越来越加剧的原因之一。目前我们正处在这场斗争的极其重要阶段——处在选举前夕。正确估价国内政治形势对于我们来讲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认为，我们在成立政府时同4个民主政党的团结越来越巩固，这是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同工人政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政党的思想一致（当然，在纲领和其他方面有不一致的地方），这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没有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思想一致，我们就不能实现我们面临的任務。如果没有这种一致，斗争将尖锐化并导致极其尖锐的冲突。

今天工人党的两个领袖也在这里。这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同志——波兰社会党的领袖，这是哥穆尔卡（维斯瓦夫）同志——波兰工人党的领袖。我想让您听一听他们对国内形势的评价。”

斯大林同志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哥穆尔卡谈一谈。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先说。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同意贝鲁特所说的国内斗争尖锐化是由于米科瓦伊奇克进入政府的结果。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新生的波兰还在米科瓦伊奇克之前就存在有反对派，但是那个时候反对派是隐蔽的。现在也有反对派，但现在的反对派是公开的，所有区别就在这里。“我认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们的阵营对国家居民的影响是缓慢的，但是在不断增大。”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波兰的反对派由下面三个集团组成：相当大部分的农民，大量的知识分子，大量的青年。他认为，有对立情绪的知识分子包括两种人：主要因为处境艰难而产生对立情绪的宗教界人士和小学教员；在战前就有反对情绪至今仍未改变自己观点的中等和高等院校的教师。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把青年首先分为有组织的青年和无组织的青年。”

斯大林同志让他说准确点，是指什么样的青年，是青年学生或是泛指青年。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答说，他指的是青年学生，这里面包括中产阶级的孩子，知识分子的孩子，工人和农民的孩子。

波兰现政权的反对派的组成中有在情绪上明显反动的人，此外还有动摇分子。如果谈到新波兰目前进行的改革，那么谁也不会激烈反对，包括有不满情绪的人和反动分子。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大家都赞成改革。在目前的波兰，批评改革的人不受欢迎。居民，甚至对波兰现政权有反对情绪的那一部分居民，越来越相信“伦敦政策”必定破产，相信民族团结政府推行的政策是正确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目前导致国内形势复杂化的惟一原因是对国际形势认识不清。由于情况不明，流言四起。有敌对情绪分子寄希望于发生战争，以改变波兰的现状。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当一部分波兰的反对派只是具有敌对的情绪和心理，行动上并不积极。莫拉夫斯基说，我们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水平还很低。米科瓦伊奇克对此很清楚。他知道，对于多次被其他国家奴役过的波兰人来讲，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独立。他利用波兰人担心再度丧失独立的恐惧感，企图让他们相信，只有他的党才能够建设一个真正独立的波兰政府。接着，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把话题转到了各政党的特点上。

关于波兰工人党，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维斯瓦夫同志在座，由他来介绍，我不准备讲。我只想强调一下，由于波兰工人党是一个对建设新民主波兰做出最大贡献的党，它就成了反对派的主要打击对象，因此波兰工人党所做出的牺牲最多。

至于波兰社会党，也就是我所代表的党，由于分裂和某些领袖人物的叛变，它经受了巨大危机。波兰社会党如果是个统一的党，它可能会对建设新波兰的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但是，波兰社会党的危机已经结束，这个党获得了新生，如今是完全团结的。上层头面人物中只有不多的几个人没有回到党内，他们要么自己把自己开除出党，要么被党清除出党。不久前，最后一个反对集团被波兰社会党接纳。我们认为，从团结的观点看，接纳这个（右派）集团是适宜的。我们接纳反对派集团是出于两个考虑。第一，我们希望，不给重新产生一个同波兰社会党竞争的社会主义集团创造条件。比方说，使这个与我们竞争的集团不能在选举期间对我们进行破坏活动，以波兰社会党的名义提出让茹拉夫斯基当候选人的不合理的名单。第二，我们不想让国外说波兰有两个波兰社会党。由于我们吸收茹拉夫斯基和他的集团入党，现在国外已经不讲有两个波兰社会党了。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波兰社会党对于波兰民主政府的内外政策进一步取得胜利有极其重大意义。他认为，波兰社会党是一个任何反对派分子都不可能指责其没有爱国主义的政党，因为在波兰，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老资格的政党，它的口号向来是为独立而斗争。此外，波兰社会党是一个在思想上比波兰工人党更接近自由主义者的政党，所以它能容纳自由主义分子。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谈到农民党的特点时说，目前这个党还不是很有力量，主要原因是党没有足够数量有经验的干部。而波兰农民党（米科瓦伊奇克的党）却有有经验的干部。波兰农民党吸

收了伦敦代表团的官员以及波兰农民青年组织“维茨”的领导干部。

劳动党的活动基础多少和农民党有点相似，但这个党的人数还不多。由于它具有以波比尔为代表的更温和的政治家作为自己的领导人，它对民主阵营不采取激烈反对的立场。这个党曾经同民主集团的4个政党一道反对波兰农民党（例如，在全民公决这个问题上）。较之同米科瓦伊奇克的党相比同劳动党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波兰反动派支持波兰农民党，因为反动派把它视为巨大的力量。

波兰农民党的基础各式各样。它的核心力量是富农。但是也有许多不了解国内政治形势的有激进情绪的农民加入这个党。例如青年农民组织，战前它是一个激进组织，而现在加入了波兰农民党。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强调指出，波兰的农民运动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能从政治上思考问题的领袖。这些领袖人物的思维总是落后于形象。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波兰农民党之所以具有反动性，是因为前往伦敦代表团的官员在这个党里面定调子，伦敦流亡“政府”许诺让他们当省长、村长等等，但是他们在新波兰什么也没有得到。加入波兰农民党的还有前民族民主派，他们现在没有权利重新成立自己的合法的党。

因此，波兰农民党是一个由所有带有不满情绪的人组成的党。米科瓦伊奇克认为自己是全国性的领袖，所以他向所有对所谓卢布林联盟不满的人打开了自己的党的大门。

斯大林同志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明，民族民主派是不是在形式上同波兰农民党联合起来了。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答说，民族民主派的党的干部有一部分仍处于非法状态，有一部分加入了波兰农民党。其标志是，米科

瓦伊奇克打算把自己的党变为全国性的党，正在向城市进军，那么现在的波兰农民党正在按照工人党的方式在各城市建立自己的组织（支部、区委等等）。在各城市中，米科瓦伊奇克的党主要是吸收反动干部。虽然在米科瓦伊奇克的党里面反动分子是少数，但是，由于他们有积极性和政治经验，能起到定调子的作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举出一个典型例子：米科瓦伊奇克的机关报——《农民日报》就是由民族民主派分子编辑的，波兰农民党没有自己的有经验的新闻记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份报纸发表了某篇明显反民主的文章，波兰农民党的领导人就声明说，这并不代表他的观点，说什么文章是以前不属于农民党的人写的，他不得不容忍他们，因为报社没有自己的干部。当时由民族民主派分子编辑的报纸诬蔑民主阵营，毒害群众的意识，散布幻想，说什么波兰农民党及其领袖米科瓦伊奇克是波兰的惟一救星。

反动派的地下活动越来越猖獗。所有政治上反动的集团都支持波兰农民党。米科瓦伊奇克的党里面还有一个由走出森林的人组成的还没有合法成立的集团。米科瓦伊奇克的战术（同政府进行尖锐的斗争）有助于波兰反动的地下活动。

接着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长时间地、断断续续地试图证明，在米科瓦伊奇克的党里面存在着两个集团（米科瓦伊奇克集团和凯尔尼克集团），这个党是可以分裂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米科瓦伊奇克和凯尔尼克由于都有个人野心，多少有点儿互相敌视。凯尔尼克似乎赞成在选举中同4个民主政党结盟，而米科瓦伊奇克一概反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从米科瓦伊奇克的党里面可能可以分裂出去一个独立的集团——“皮亚斯特”，这个集团由农民的右翼部分组成，但是在情绪上愿意和解，不想争吵，准备同政府协商。但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又不得不马上承认说，这个集团的弱点在于它里面有许多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过去同萨

纳齐亚（战前波兰的执政当局）^① 经常有勾结。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们对值不值得解决这个集团的活动问题感到没有把握。再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有过关于波兰的政党不能超过6个的命令，而目前已经有6个政党。但是莫拉夫斯基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应该考虑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接着指出了三个导致米科瓦伊奇克的党活动猖獗的原因：1. 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做得不好，因此一系列省份的反革命集团有恃无恐；2. 严峻的经济形势引起农村教师不满，甚至导致工厂罢工，而罢工就是波兰农民党组织的；3. 外部势力。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这里指的是间接的压力。有时英国人和美国人直接干涉波兰的内政，例如在选举、出版自由、“迫害”米科瓦伊奇克等问题上。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3月1日以后，当明显发现米科瓦伊奇克不打算同我们达成协议、拒绝参加选举联盟并企图把所有权力抓到自己手里时，我们开始同他进行了尖锐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某些良好成果。我们准备继续执行反对米科瓦伊奇克的这一方针，但是我们不知道这场斗争的界限在哪里，我们担心，我们的这一方针会不会引起国际舞台上政治复杂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指出了这种复杂化的征兆，他说，美国政府同波兰签订了向波兰提供总额为9000万美元贷款的协定，但是美国政府没有提供。其借口是，波兰政府过于迟缓宣布交换有关这个问题的照会，米科瓦伊奇克的波兰农民党副主席班奇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反政府讲话稿被没收。

关于选举问题，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选举是国内局势稳

^① 萨纳齐亚，波兰语“健全化”、“整顿”之意，特指1926～1939年波兰的毕苏茨基政权。

定的重要条件。波兰社会党的态度是，尽可能把选举的时间往后拖延，因为时间对民主阵营有用。民主阵营可以得到巩固，取得经验，而米科瓦伊奇克的机会可能丧失。米科瓦伊奇克之所以如此急于进行选举，是因为他想利用困难制造纷争。

斯大林同志问，波兰工人党对这个问题也是这种意见吗。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这个问题将由维斯瓦夫亲自介绍。他继续说，为了回答米科瓦伊奇克的一味要求，民主政党联盟已经宣布在秋天举行议会选举。尽管如此，政府有可能不考虑这一情况。如果这不会引起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复杂化，我们就准备拖延选举。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我们可以不同反对派计较。尽管我们应当承认，由于我们建立的经济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土地改革巩固了私有制，尽管是小私有制），因此国内现在和将来都存在反对派的基础。但是波兰农民党怎么办呢？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把它解散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在现存的国家经济制度下它还有基础。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如果我们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民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或者说应当是目前的这种被动的民主（说到这里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转身对着贝鲁特，露出尖刻的冷笑），或者说不得不扩大民主？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不能通过压制和打击反动派的途径建设我们的国家，因为我国人民是爱好自由的人民，有时准备以轻率的举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民。”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说，我们希望找到发展我们国家的最好的道路。波兰工人政党之间存在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在策略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的争议在于如何更好地巩固政权。

在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讲完后，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

(维斯瓦夫)发言。哥穆尔卡也承认，国内政治形势尖锐。他和贝鲁特都认为，同米科瓦伊奇克签订的莫斯科协定没有促使波兰国内形势好转，反而使其恶化。哥穆尔卡说，米科瓦伊奇克到我们这里来是有一定目的的。米科瓦伊奇克的目的不是波兰民主的团结统一，而是使波兰回到伦敦的政策上去。今天大家对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

政治形势恶化首先表现在反动派的恐怖活动加强。反革命集团特别加强了对个人的恐怖活动。国内反动分子的猖獗活动与国外的波兰反动集团的活动相互联系，例如同安德斯集团的联系。安德斯得到伦敦“政府”的实际援助和官方援助。反动派的恐怖活动主要是针对波兰工人党的，部分是针对农民党的。有许多事例表明，从事恐怖活动的不仅有非法的反动集团，还有波兰农民党的一些合法支部。为此我们已经解散了波兰农民党的两个县级基层组织。

贝鲁特：近日还将解散了几个组织。

斯大林：如何解散米科瓦伊奇克党的地方组织？

贝鲁特：没收文件，把走街串巷的同反动派集团直接联系的领导人投入监狱。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兰农民党是一个把所有的反动派都联合在它周围的党。波兰农民党进行宣传的主要提纲是，在波兰再也没有反动派了，因为波兰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这一提纲对反动派十分有利，它把反动派联合在米科瓦伊奇克的党的周围。

米科瓦伊奇克的党没有进行过任何值得肯定的国家工作。这是一股破坏势力，它阻挠恢复国家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工作。米科瓦伊奇克已经对它奉行的反政府政策再也不加掩饰。在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之前召开的部长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米科瓦伊奇克声称，鉴于已经签订向波兰提供贷款的协定，他的党的机关报有意识地不刊登反驳美国人造谣的文章。

哥穆尔卡说，在战前的波兰，农民党并不是特别强大。它在最好的时期在议会中总共也只有 25% 的席位。哥穆尔卡同意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的说法：米科瓦伊奇克的党的机关的主要骨干力量是来自伦敦代表团的人。他肯定地说，波兰农民党并不是米科瓦伊奇克创建的，而是前伦敦代表团建立的。他指出，加入波兰农民党并成立这个党的一系列支部的指示是从伦敦发给反动的地下工作者的。

波兰农民党的骨干分子就是伦敦“政府”的骨干分子。

哥穆尔卡认为，在各民主政党同米科瓦伊奇克关于选举联盟的谈判破裂以后，波兰的政治形势尤其紧张。哥穆尔卡说，我们提出，在未来的议会中，给米科瓦伊奇克的党 20% 席位，给加入选举联盟的农民党 20% 席位。而米科瓦伊奇克要求，在未来的议会中仅他的党就应该有 75% 席位。这是一个荒唐的要求，我们没有接受这个要求。现在米科瓦伊奇克说，他所说的在未来议会中有 75% 席位不是为了他的一个党，而是为了两个农民党，尽管另一个农民党并没有授权他谋求议会席位。

哥穆尔卡说，应该强调说明的是，尽管形势如此，我们的基础（波兰民主的基础）并没有缩小，反而正在扩大。他以五一节游行为例，游行的规模超出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一些领导人的意料。将近 300 万人参加了今年五一节游行，其中有许多农民。

斯大林同志问，米科瓦伊奇克 5 月 3 日组织的反游行的规模多大。

哥穆尔卡回答说，这是米科瓦伊奇克组织的第一次反游行，在一些城市有数百人参加，在克拉科夫有数千人参加，这些游行主要是由大学生组织的。

斯大林同志说，反动分子举行这样的游行在芬兰也发生过。

当哥穆尔卡谈到加强波兰政府的行政机构及其国家安全部门

时，斯大林指出，这种机构目前还很薄弱，因为反革命集团至今还有恃无恐。

哥穆尔卡承认斯大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且补充说，在这方面，事情不仅在于行政机构，例如国家安全机关，在组织上软弱，而且在于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数量不足。他说，我们现在在波兰组建志愿警察预备队，我们从工人即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党员中选拔这种警察预备队的干部，他们在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军事训练。目前波兰共有志愿警察约6万人。

斯大林同志问，这是警察还是警察支援人员。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说，可以更准确地把这些武装的工人叫做支援民警支队。但是他认为这些支队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武装的工人阶级。他说，我们想让武装的工人支队的总人数达到15万~20万人。这将使我们有能力对付反革命集团，否则我们无法消灭反革命集团。

哥穆尔卡认为，关于波兰目前的形势，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波兰农民党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波兰农民党向城市渗透，在工人中散发自己的报纸和小册子，散布种种传言……斯大林同志打断了哥穆尔卡的话后指出，如果一个国家谣言四起，那就说明党组织得不好，说明这个党没有开展反宣传。

哥穆尔卡同意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意见，尽管他认为，波兰工人党正在巩固自己的阵地，无论在组织方面或在数量方面都有长进。

在谈到经济困难时哥穆尔卡指出，工人的工资水平比战前还低，仅达到战前的40%，而工程技术工作人员的工资更低，只及战前的20%。

斯大林同志问，兹罗提贬值了吗？

贝鲁特回答说，波兰没有通货膨胀，但是兹罗提的价值只相当于战前的1/100。

明兹补充说，今年5月1日波兰的物价指数比去年5月1日的物价指数稍低一些。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很大的成就。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强调说，波兰政府很快就会有收支平衡的预算。

哥穆尔卡随之说道，波兰代表团打算专门讨论经济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要解决政治问题必须了解国内的经济形势，他同意专门讨论经济问题。“你们的纺织工业情况怎么样？”斯大林同志问。

明兹回答说，纺织工业目前只达到战前水平的20%，但是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已开始进入市场，不受需要供应军队的限制了。

哥穆尔卡又谈起了政治问题，他说，波兰农民党想方设法分裂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统一阵线。对于米科瓦伊奇克讲，现在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波兰农民党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波兰工人党。米科瓦伊奇克和他的党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得以分裂民主阵营联盟，那么波兰就注定灭亡。哥穆尔卡说，遗憾的是，不能说不存在分裂的前提条件。哥穆尔卡说，我们不完全同意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对波兰社会党所做的评述。我们担心，这个党目前的右翼部分的领导人可能同波兰农民党合作，已经有这样的迹象。例如，德罗布涅尔极力为波兰农民党涂脂抹粉。他甚至在波兰农民党组织的在克拉科夫举行的反政府示威游行之后建议将志愿警察部队司令和副司令的职位交出去，因为在德罗布涅尔看来，不这样做的话，波兰农民党就不会参加消灭反革命集团的工作。

哥穆尔卡说，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中的右派没有看到波兰农民党的真正面目，他们把波兰农民党看做是一个农民的政党。

斯大林同志：我可以这样说，米科瓦伊奇克的党不是一个政党，这是一个由几个派别组成的阵营和集团，或者说是反政府的反动派阵

线。

哥穆尔卡和贝鲁特表示完全赞同斯大林对波兰农民党的定性。

之后哥穆尔卡说，波兰社会党中的右翼分子在自己的党内散布幻想，说什么可以同米科瓦伊奇克和波兰农民党达成协议，共同对付反动派。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在对待米科瓦伊奇克党的态度上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哥穆尔卡说，我们认为，同米科瓦伊奇克的党不能合作。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各出3名代表的协商委员会上，我们经常谈到制定我们两个党对待米科瓦伊奇克党的一致立场的必要性。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两个党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我们制定统一的立场，我们会十分感谢的。

哥穆尔卡不同意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绞尽脑汁提出的关于在波兰农民党内可能存在分歧的说法。哥穆尔卡说，我们允许其出版杂志的“皮亚斯特”集团马上就对波兰工人党进行了猛烈攻击，热烈响应波兰社会党的建议，赞成在波兰建立统一农民党。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打断了哥穆尔卡的话，问：“是这样吗？”

哥穆尔卡说：“是的，是这样写的。这一期杂志就在我的公文包里。”

哥穆尔卡认为，建立“皮亚斯特”集团是米科瓦伊奇克进行的新的破坏活动，“皮亚斯特”集团不可能成为波兰民主政党的同盟军。

之后哥穆尔卡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哥穆尔卡说，波兰社会党认为，如果政府的阵营里面没有波兰农民党，这就是专政。这样说是不正确的。他说，加入我们的联盟的除了两个工人党以外，还有农民党和民主党。尽管这些政党都不很巩固，但毕竟都是政党。要知道我们是在没有波兰农

民党参加的情况下、在4个政党的基础上在卢布林建立了临时政府的，但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错误地认为，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有波兰农民党的位置，如果它是个自由党，还可以同意这种意见，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反动派阵营。

哥穆尔卡认为，波兰阶级斗争尖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民主政权执政没有经过特殊的斗争。应该看到，国内的反动势力得到了国外的支持。哥穆尔卡说，我们在制定对待波兰农民党的策略时应该考虑到国际环境。我们可以对米科瓦伊奇克做出让步，但是我们认为，过分的让步有使民主的成果丧失的危险。

哥穆尔卡认为，可能不得不广泛采取镇压的措施，但是对于波兰工人党来讲，国际环境还不完全明朗。尽管波兰工人党知道，在确定波兰民主阵营对米科瓦伊奇克的党的态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国际环境，而是国内的力量和波兰人民的需求。

哥穆尔卡请斯大林同志向他详细介绍国际形势。之后他谈到了波兰的教会。他指出，最近天主教界人士试图同政府接触。哥穆尔卡认为，教会持观望态度，想通过同政府建立联系来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哥穆尔卡说，我们正在同天主教界人士进行谈判，尽管还不是直接谈判。如果能达成协议就好了。

哥穆尔卡认为，议会选举还是应该在今年举行。他说，莫拉夫斯基说得对，时间有利于我们。但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国家经济状况改善的速度非常缓慢，一旦收成不好或者发生其他灾害，形势可能再度恶化。要是今年举行选举，国家的形势就会稳定下来，反动派将被粉碎。

之后，农民党的一位领导人，文化和艺术部部长科瓦尔斯基说，他去过20个县，会见了他熟悉的老资格的普通农民活动家，想搞清楚为什么他们反对政府联盟，为什么米科瓦伊奇克在相当一部分农民中有自己的追随者。科瓦尔斯基说，事情在于商品短缺，

农村中的宣传工作开展得很不好，农村中流言四起，看不到报纸。

斯大林同志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更好地组织无线电广播。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指出，建立无线电广播网有困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已经通电。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个问题可以找我们解决，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帮助。

科瓦尔斯基接着指出，波兰反动派散布的对集体化的恐惧心理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20名前议会农民议员进入党的领导层以后。波兰反革命集团进行的恐怖活动对农村的情绪有很大影响。他说，居住在闭塞的农村地区的农民最容易受影响。

科瓦利斯基认为，农民党现在比米科瓦伊奇克搞分裂前更加强大。干部确实不够。莫拉夫斯基说得对，米科瓦伊奇克的干部多一些。但是不应该忘记，米科瓦伊奇克的党的干部是资产阶级的干部。罗兹省、凯尔采省和其他一些省份是跟着农民党的，而不是跟着米科瓦伊奇克的。至于说青年农民组织“维茨”，那只是这个组织的核心支持米科瓦伊奇克，下面的人，其中包括某些省组织的领导工作人员是同农民党合作的。科瓦利斯基说，米科瓦伊奇克奉行两面派的政策，他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小组和支部，另一方面却保留非法的反动组织。在米科瓦伊奇克的人组织的农民大会上，首先是攻击苏联，之后攻击波兰工人党。例如，波兰农民党的发言人向农民说，目前波兰的新制度是不巩固的，苏联最终将让波兰人自行选择，西方国家也不会容忍波兰的现政权。

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说，在米科瓦伊奇克的党员大会上发言人公开发表反苏演讲？”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什瓦尔贝试图让斯大林相信这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明兹举出了刊登在米科瓦伊奇克的党的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来反驳莫拉夫斯基和什瓦尔贝的说法。这篇文章毫不掩饰

地暗示说，现在波兰已被苏联占领。

科瓦利斯基认为，如果哪怕让土地少的农民免交公粮、消灭反革命集团并扩大日用必需品的生产，米科瓦伊奇克的工作效果就会化为乌有。寄希望于米科瓦伊奇克交出自己的阵地是荒谬的，米科瓦伊奇克正在把事情引向国内战争。科瓦利斯基认为，不应该为选举而担心，推迟选举没有必要。

科瓦利斯基发言后，斯大林建议休息 10 分钟。休息以后斯大林同志致答词。

斯大林同志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并且指出在解决波兰的国内政治问题中应该怎样理解国际形势。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的敌人正在大肆散布战争的流言。

英国人和美国人通过他们的走狗散布战争的谣言，企图吓唬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人民。我认为，现在不可能发动战争，大家都厌恶战争了。再说也没有战争的目标。我们不打算进攻英国和美国，他们也不想冒险。至少在 20 年内不会有任何战争。

英国人和美国人散布战争谣言的目的是想告诉你们波兰人说，你们的制度是不巩固的，你们不应该相信苏联，因为苏联在困难的时候，在你们遭到进攻的时候不会帮助你们。

丘吉尔的讲话是讹诈，他的目的是吓唬我们。我们之所以对丘吉尔的讲话做出毫不客气的回答，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说，新的战争贩子未必能够重新挑起战争。如果英国或者某个其他国家的反对派对我们发动进攻，他们必定被粉碎。我们做出这样尖锐的回答是必要的，因为不能让丘吉尔吓唬我们的人。

波兰解放后建立起来的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里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要是没有战争，我们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具有另一种性质。因为大家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最初是由于普法战争于（19 世纪）70 年代在法

国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专政在我们俄罗斯产生了。

无产阶级专政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我们要推翻三头大鲸——沙皇、地主和极其强大并得到外国人支持的俄国资本家阶级。为了对付这些力量，需要建立依靠暴力的政权，即专政。

你们的情况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你们的资本家和地主由于同德国人勾结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因此不用费什么劲就可以把他们打倒，他们没有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欠的这笔账还没有算。毫无疑问，波兰消灭资本家和地主得到了红军的帮助。

所以说，你们那里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波兰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是新型的民主，它没有先例。无论比利时、英国、法国的民主都不能成为你们的样板。你们的民主是特别的民主，你们那里没有大资本家阶级，你们100天就进行了工业国有化，而英国人为此奋斗了100年。所以，你们不要照搬西方的民主，让他们去仿效你们吧。

你们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民主可以使你们用不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接近社会主义。

列宁根本就没有讲过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没有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允许通过利用建立诸如议会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机构的途径进入社会主义。你们那里由于进行改革，无疑会出现中产阶级和小资本家。但是，中产阶级任何时候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

你们那里没有大型私人银行，没有私人的大型工业。

所以，我不能同意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关于波兰存在他称作“被动的民主”的说法。波兰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现在苏联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的是苏维埃民主。我们没有什么人

要镇压，我们需要政权是为了保卫国家免遭外部敌人侵略。

你们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在大工业已经国有化和大资本家和地主已经从政治舞台消失的目前的条件下，只要在工业部门建立相应的制度，提高工业产量，降低价格，向居民提供更多的日用品，国内形势就能稳定下来，对新民主制度不满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你们不必通过流血斗争就可以接近社会主义。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建立的新民主对波兰是个救星。波兰目前建立的新制度保证波兰有最大的独立性，并为建立没有剥削劳动者的繁荣社会创造所有的必要条件。

这一制度是值得保留的。如果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联盟垮台了，波兰建立的新民主势必灭亡。

英国和美国的反动派不希望波兰独立，他们希望看到波兰出现他们的走狗，他们当然企图对你们施加各种压力。他们不喜欢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制度，他们想消灭这种新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寻找依靠力量。例如，在波兰他们找到了以米科瓦伊奇克和他的党为依靠力量。

对米科瓦伊奇克应该怎么办呢？

斯大林同志认为，波兰的民主阵营没有反对派也不行，这个阵营需要合法的、听话的反对派，也就是以合法的手段批评政府但不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那种反对派，这样的反对派对波兰的民主阵营是有利的。民主阵营需要反对派是为了拉走地下活动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认为，波兰的民主阵营在选举中必须结成联盟，如果对米科瓦伊奇克施加压力，他就会提出谈判，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同他达成协议。在未来的议会中，应该提出给米科瓦伊奇克的党25%的席位，给科瓦利斯基的党15%的席位。如果米科瓦伊奇克不加入选举联盟（他作为一个英国人的走狗，无疑会得到关于要他单独参加选举和在国内外点燃国内战争的指示），他就是输了，因为

社会舆论都知道你们对他做出了让步，而他不愿意接受。这样就会使米科瓦伊奇克再次暴露自己。

如果米科瓦伊奇克拒绝，当然有必要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从肉体上消灭他的党的成员，因为这个党是合法的。应该从政治上孤立米科瓦伊奇克的党。至于那些继续开枪射击的人，就没有什么值得可怜的了，应该消灭他们。如果你们尊重自己就应该这样做。不会保卫自己的制度是不好的制度。农民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尊重强大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米科瓦伊奇克不愿意合作，你们没有他也能够管理国家。能够吸收波比尔的党参加合作也不错，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参与孤立米科瓦伊奇克。

斯大林说到这里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打断了斯大林的话，他说，如果建立统一的政党联盟，把米科瓦伊奇克孤立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就不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对此回答说，在这方面他看不到会对波兰造成任何复杂的国际环境。如果波兰的民主政党结成联盟参加选举遭到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抗议，那么可以告诉他们，波兰不是第一个这样选举的国家，南斯拉夫、比利时就是采取这种途径进行选举的，罗马尼亚也是建立统一的选举联盟的。可以比较一下希腊的选举，那里有个单独的选举名单，但是选举的结果看来不值得仿效。对改变波兰现行制度感兴趣的一些国家的主要方针是按单独名单进行选举。斯大林说，所以我再次强调，你们在选举中要结成联盟，而且首先是两个政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联盟。

斯大林同志说到这里时，什瓦尔贝深深地叹了口气，有点不安地在椅子上晃动起来。

斯大林同志说，外国人能拿你们怎么办呢？绝对不会有任何办法。他们不提供贷款，企图以某种方式向你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

不可能做到长时间推行这样的政策，因为英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这种政策。不要忘记，波兰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比革命后我国的地位好得多。美国 14 年、英国两年不承认我们。斯大林同志说，哥穆尔卡同志看来急于进行选举，因为他认为，选举将最终向外国人表明，卢比肯河已经渡过^①，所以不会给任何人提供干涉波兰内政的权利。但是应该懂得，即便波兰的选举取得了保留现存制度的结果，外国资产阶级国家对波兰的态度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斯大林同志表示希望，只要波兰保留现存的制度，波兰就能保持独立，比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工厂和矿山的波兰将由于这场战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最富裕的国家。只是需要整顿工业并奉行保卫民主成果的坚定战线。

斯大林同志结束自己的谈话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向他提了个问题：如果米科瓦伊奇克不参加选举联盟，并且按照自己的党的单独名单取得了 50% 的议会席位，那时会是个什么情况？

斯大林同志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

什瓦尔贝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为目前国内不满情绪的人很多。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表示不满是一回事，对现存制度投赞成票或是反对票是另一回事。有不满的人，但是如果对他们说，你投米科瓦伊奇克的票，就是赞成消灭一切民主成果，赞成丧失独立，这样他就会为现存的制度投上自己的一票。

在随后的谈话中，斯大林建议波兰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不要疏远教会人士。他认为，应该把波兰的天主教看成一个单独的政党，它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还是可能同现存制度结成联盟的，尽管它不

^① 卢比肯河是亚平宁半岛上的一条河流。公元前 49 年，恺撒自高卢率兵渡过该河，挑起战争。后来，“越过卢比肯河”就成为采取不可更改的决定的同义语。

喜欢现存制度。

可以看出在场的某些人，比如说波兰社会党人（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可能目前对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没有信心。于是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要着急。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时间对你们有利，那么可以把选举推迟到明年秋季进行。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那国外会怎么说呢？”

斯大林同志再次重复说，他看不出国际舞台上对波兰有什么特别复杂的東西。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改变西部边境协议方面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他们就得同苏联断绝关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现在是在吓唬人，将来也会吓唬人。只要不被他们吓唬住，那么吵吵嚷嚷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如果把米科瓦伊奇克从政府组成人员中除名，他在国内的威信就会一落千丈。在这个问题上惟一使莫拉夫斯基感到窘迫的是，担心影响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首先是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为此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他认为，莫拉夫斯基错了。如果把米科瓦伊奇克从政府组成人员中除名，那么他的机会就多了。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些事情。让米科瓦伊奇克进入政府组成人员是签订过协议的。如果把他除名，反动派就有了反对波兰民主的新的理由。“我不是建议你们破坏他同你们签订的协议，”斯大林同志说：“要忍耐，否则米科瓦伊奇克就会说，由于害怕他，因此还没有等到选举就把他除名了。”

斯大林同志说，按事情发展的逻辑当然是把米科瓦伊奇克从政府组成人员中除名后就逮捕他，但这未免走得太远了。

斯大林同志说：“你们是需要米科瓦伊奇克的，我还要说得更过分一些，如果没有米科瓦伊奇克，又该想别人了。敌人也在培养

人。老一辈经验丰富的社会主义者总是说，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地方，革命力量也强大。革命力量强大的地方，反革命势力也强大。我再说一遍，你们目前还需要米科瓦伊奇克。”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米科瓦伊奇克在波兰的活动促使波兰政府和所有民主政党更加努力地为建立新波兰而工作。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在我们苏联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同德国人打仗，这看来是件好事。我们同德国人打仗能学到东西。如果比方说我们同中国打仗，我们无疑可以获胜，轻而易举地获胜，但是什么也学不到。同强大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是件好事。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可是要知道米科瓦伊奇克并不聪明，他愚蠢。

斯大林同志：可是他的主子们并不愚蠢。

在之后的交谈中贝鲁特谈了关于米科瓦伊奇克有可能自动退出政府的想法。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他这样做，那太好了。可以指责他破坏莫斯科协定。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排除了米科瓦伊奇克自愿退出政府的可能性。

斯大林同志说，米科瓦伊奇克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办事，执行英国政府的意志。

在随后的交谈中，波兰人更具体地介绍了波兰国内的经济情况。波兰对苏联在庄稼收获之前提供粮食帮助表示感谢。今年的收成预计不错，但还是稍低于去年，因为某些地方在播种的时候缺少肥料。波兰大约短缺 70 万~80 万吨粮食。波兰政府打算在明年部分地取消向国家交纳粮食。

斯大林同志建议波兰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建立起 20 万~30 万吨的粮食储备，以便必要时投放市场，以降低粮食价格。他还建议发展同瑞典的经济关系，瑞典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不同，对履行自

己的国际义务态度多少还比较认真。

由于在场的所有人都说波兰的农村有钱，因此斯大林同志建议千方百计多生产供应市场的商品，并收点税。

莫洛托夫同志问，西部地区的移民进展情况怎样，哥穆尔卡回答说，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靠近波兰的地区，德意志人总共只剩下了170万人。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贝鲁特提出了关于解决波兰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争端问题，同时他表示，希望动用斯拉夫国际仲裁机构，因为捷克人看来根本不想谈判。

斯大林同志说，捷克人是不想谈的。一方面，贝奈斯和马萨利克想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暗送秋波；另一方面，这是在玩竞选花招，指望吸引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选票。

斯大林同志认为，竞选过去以后，捷克人会比较愿意谈判的，他建议通过直接谈判解决类似问题。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表示担心说，在和平会议上，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问题，比如说在关于克拉茨科（前德国的西里西亚，根据柏林会议的决议归波兰管辖）问题的争端中支持捷克人。

斯大林同志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可能破坏关于波兰西部领土的决议，因为苏联是不会同意的。三个大国必须意见一致。

会谈持续了4个小时。

记录 B. 帕夫洛维奇
1946年5月24日于莫斯科

№09276

**达维多夫关于波兰农民党情况
给克鲁格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6月8日）

绝密

莫斯科苏联内务部

克鲁格洛夫同志：

社会安全机关进行的瓦解波兰农民党各基层组织的活动已经在米科瓦伊奇克的党的中央领导人中有所反映。

根据经过核准的谍报情报获悉，以波兰农民党总书记雷克·塔德乌什为首的波兰农民党总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们公开对这个党的中央领导人，其中包括对米科瓦伊奇克和凯尔尼克推行的政治路线表示不满。

波兰农民党中央领导机关内不团结和那里的反对派正在形成的信号已经被社会安全机关所利用。今年5月25日，在讨论今年6月9日和10日欢度“三一”节的借口下，举行了社会安全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同雷克·塔德乌什的会面。

在交谈中雷克·塔德乌什说，波兰农民党总委员会的125名成员中有大约20人对波兰农民党领导人持激烈反对态度。这个反对派集团所不满意的是，波兰农民党（特别是最近）持公开反对政府的立场，允许在自己的队伍中有大量的反动分子，并且不同“国民武装力量”、“国家军—自由独立派”等匪帮进行斗争。

在交谈过程中，他们建议雷克·塔德乌什及其反对派集团的成员在即将于今年5月26~27日举行的波兰农民党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对党的领导人米科瓦伊奇克进行批评。

如同查明的那样，在今年5月26~27日举行的波兰农民党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米科瓦伊奇克所做的关于对全民公决^①的态度和波兰政治形势的报告。反对派集团中发言的人有：雷克·塔德乌什、杰韦茨基·布罗尼斯拉夫（来自前班奇克集团）、贝尔托尔德·爱德华、亚格尔费尔德·斯塔尼斯拉夫等。

发言者尖锐批评了波兰农民党领导人执行的政治路线，要求改变这一路线，并改变对现政府的态度，同武装的地下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真心实意地倒向苏联，而不是倒向英国。

他们还建议对有关全民公决的所有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

今年5月29日举行的社会安全部工作人员同雷克·塔德乌什的又一次交谈中（政府成员、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贝尔曼在场），雷克·塔德乌什说，他的集团同意对米科瓦伊奇克及其在波兰农民党领导人中的追随者所推行的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

通过交谈达成的雷克·塔德乌什集团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同武装的反政府地下活动进行坚决斗争；真心实意地对待波苏友谊；对全民公决的所有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在选举中结成联盟。

为了进一步采取与反对派集团活动有关的措施，社会安全部同雷克·塔德乌什一道进行了准备，并于今年6月7日由上述集团出版了自己的机关报《新解放》，该报16页，发行5万份。……

雷克·塔德乌什的这份报纸准备每周发行一次。今年6月7日的第一期报纸已空运到波兰的所有省份。

^① 即1946年6月30日进行的民意测验。

有关波兰农民党内反对派集团的进一步活动情况我将在取得新材料后报告。

达维多夫^①

1946年6月8日于华沙

^① С.П. 达维多夫，苏联内务部驻波兰社会安全部顾问。

№09278

奥瓦基姆扬关于波兰社会党政治活动 情况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6年7月2~3日）

绝密

现将我们收到的关于波兰社会党政治活动问题的情报报告如下：

1. 受波兰社会党总委员会主席、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什瓦尔贝的委托，科沃泽伊斯基（以前关于成立民族团结政府问题的莫斯科谈判的参加者）最近同波兰社会党的领导成员进行了一系列会晤。会晤中讨论了关于建立由6个政党组成的统一竞选联盟问题。

今年6月，科沃泽伊斯基两次会见了米科瓦伊奇克，一次会见了凯尔尼克。在同米科瓦伊奇克交谈中，科沃泽伊斯基说：“苏联只信任波兰工人党，因此苏联只有在波兰工人党在国家中起到领导作用的情况下才会支持波兰在其西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为此科沃泽伊斯基建议米科瓦伊奇克暂时承认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地位，参加6党竞选联盟并做出有关这方面的相应声明。

据科沃泽伊斯基说，米科瓦伊奇克同意了他的建议，但是提出条件说，他（米科瓦伊奇克）只有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为一方与波兰农民党为一方签订并实现了临时和解协定之后才能做出这样的声明。科沃泽伊斯基就这个问题同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贝尔曼

进行了交谈，但是后者好像回答说，波兰工人党不同意米科瓦伊奇克的条件。

2. 波兰社会党最近的一些活动证明，波兰社会党致力于从波兰工人党中分离出去并占据国家的领导地位。……

鲁西内克^①在私下交谈时说，波兰社会党正在采取措施，把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认为是波兰工人党安插在波兰社会党中的党员从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机构中清除出去，并推举受到信任的自己能人取代他们的位置。

首先准备提出把马杜舍夫斯基清除出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问题。

目前似乎打算在只有少数人参加和没有波兰工人党的走卒（鲁西内克语）的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重要的政治问题。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不久前对斯坦奇克所做的声明是有代表性的，他说：“还在卢布林时期我同波兰工人党就难以相处。波兰工人党总是力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波兰社会党，因为波兰社会党那个时候还很弱。现在我们壮大了，我们可以指望得到国内领导权。”

奥瓦基姆扬^②

1946年7月2~3日于莫斯科

① 鲁西内克是波兰社会党右翼领导人。

② 奥瓦基姆扬，国家安全部第1总局工作人员，职务不详。

№09281

达维多夫关于波兰部长会议例行 会议给克鲁格洛夫的报告

(1946年7月9日)

绝密

专 报

今年7月4日，波兰部长会议召开了例行会议。

在审议一些现实问题之后，哥穆尔卡建议只留下部长们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他提出了谴责副总理米科瓦伊奇克的决定草案。哥穆尔卡在简短讲话中说，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米科瓦伊奇克今年7月1日会见了外国记者，在答记者问中极尽所能败坏全民公决的名声。在连初步投票的结果尚不知道的情况下，米科瓦伊奇克对记者说，全民公决是假的，并呼吁国外给予帮助。在讨论哥穆尔卡提出的草案时，米科瓦伊奇克首先发言，他说，他作为波兰农民党的首脑有权会见外国记者。米科瓦伊奇克说，他接受记者采访是正确的，因为他认为，目前国内可以看到社会安全机构的恐怖活动嚣张，对波兰农民党成员大肆镇压，试图以此来影响全民公决的结果。在谈话的这一部分他说：“安全机构的行为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感，这是政府的耻辱。”米科瓦伊奇克接着说，他掌握有全民公决的结果弄虚作假的事实，并且宣布他已经收到自己人提供的波兹南州三个县的材料。米科瓦伊奇克试图用这些材料证明，80%

的波兰人民对全民公决问题做出了否定的答复，这是波兰农民党取得胜利的证明。

在频频指责“波兰工人党专政”之后，米科瓦伊奇克说：“如果现在，在全民公决的结果已经知道的情况下，你们还不考虑人民的意志，那么人民除了采用同样不民主的方法进行斗争以外，别无选择。”

米科瓦伊奇克发言以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讲话。他的讲话中令人信服的东西不多，尽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支持哥穆尔卡的建议。但是，他没有对米科瓦伊奇克给予应有的回击，反而说一些袒护的话。在讨论中发言的还有一些部长——贝尔曼、英德里霍夫斯基、普捷克、科瓦利斯基、拉德凯维奇和凯尔尼克（波兰农民党）。

所有的部长都对米科瓦伊奇克和凯尔尼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普捷克（波兰农民党）的发言，他成功地利用米科瓦伊奇克所说的那些材料指出，那些80%的居民对三个问题都投反对票的地方正是波兰农民党有势力的地区。

因此，波兰农民党不仅领导着波兰国内的所有反动势力，而且领导着不愿意离开德国领土的波兰的敌人。

与米科瓦伊奇克不同，凯尔尼克一个小时的发言比较克制一些。凯尔尼克极力造成他担心全民公决的结果和希望找出摆脱困境的可以接受的方法的印象。他说，他担心大多数人对全民公决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投反对票。凯尔尼克说：“对于你们和我们来说都存在这种突然性。应该冷静地分析形势，冷静地得出结论。”凯尔尼克没有明确反对哥穆尔卡的建议，他请求暂时不对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以免复杂化。应该在更加狭小的圈子里讨论这个草案，有可能的话应该修改草案中的某些措词。

米科瓦伊奇克的第二次发言与第一次发言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他再度谴责大规模逮捕波兰农民党的成员，并且声称，80%的居民反对政府和波兰工人党的政策。他坚持说全民公决的结果是假的，要求公布各选区的记录。同时他威胁说，他要请求一些大国派代表来观察即将举行的选举。

哥穆尔卡在米科瓦伊奇克发言时插话说：“你能告到丘吉尔那里去”。

哥穆尔卡在米科瓦伊奇克发言后再次讲话，他详细地谈到了以米科瓦伊奇克为首的波兰农民党的一部分人极力否定全民公决的所有三个问题，充分证明了他们是波兰人民的敌人。正是波兰农民党的这一部分人依靠搞恐怖活动的反革命集团，具有法西斯党的所有特征。米科瓦伊奇克在对内政策中坚持的路线是恐怖活动，在对外政策中的路线是点燃反对苏联的战火。米科瓦伊奇克同波兰人民没有联系，他是外国在波兰的代言人。

讨论结果通过了哥穆尔卡提出的谴责米科瓦伊奇克起破坏作用的建议。米科瓦伊奇克和凯尔尼克在表决时反对这一决议。

达维多夫

1946年7月9日于华沙

№09283

雅科夫列夫与西伦凯维兹关于波兰 国内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6年7月18日)

抄送维辛斯基、巴甫洛夫，归档。

秘密

我在波兰社会党中央拜会了西伦凯维兹，同他就国内形势进行了交谈。谈话是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西伦凯维兹抱怨工人党的领袖对波兰社会党缺乏信任，这是贯穿他整个谈话的一条主线。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显然希望莫斯科的领导人了解他的这些观点。

西伦凯维兹在讲述波兰事件的发展情况时，谈到了下列情况，作为阐明其主要思想的依据。

在同德国人和德国占领者进行的战争中，波兰没有一个回击德国人的强有力的民主组织。所以居民中最积极的分子，包括工人在内，把参加国家军视为自己的爱国主义天职。当时的国家军是组织波兰人进行爱国主义斗争的主要渠道。农民近卫军还很弱小，只吸引了为数不多的爱国者参加。波兰没有像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样的人，这势必并且已经在国内形势上，而且在1944年7月掌握了波兰政权的民主阵营后来推行的全部政策上留下了痕迹。早在卢布林时期出现的一些政党的领导人的工作由于波兰人特有的心理方式而变得复杂起来。这种心理方式的特征是，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和相当

一部分波兰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天真幼稚。在波兰民主运动领袖实践活动的每一步中，都应该考虑到这一情况。在确定倒向苏联的新的外交方针时，还应该考虑到波兰几个世纪中养成的敌视俄国的心理。在这一方面，波兰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其他斯拉夫国家。例如，南斯拉夫，或者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人民自古以来就把俄国人当作自己的靠山。

上述情况使人很容易犯错误，而波兰领导人却偏偏屡屡犯这样的错误。

试以华沙起义为例。我们知道，布尔-科马罗夫斯基（他是波兰的米哈伊洛维奇）当时组织华沙起义，是为了在红军到来之前在首都建立起反动政府，把既成的事实摆在苏联盟友面前，拿数十万波兰人的生命作赌注。而被蒙骗的华沙居民在奋起还击德国人时，认为他们是在履行爱国主义的天职。所以，我们在宣传工作中，并没有贬低在抵抗德国人中牺牲的华沙人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奋不顾身和勇敢精神。

另一个事实是，不笼统地抨击国家军。本来应该孤立犯罪的领导人，应该随着新波兰的恢复吸收普通的国家军成员参加合作，但却没有这样做。

最后一个事实，前几天，我们（波兰社会党人）在华沙举行社会党人（前反对德国人的地下斗争参加者），包括国家军成员在内的代表大会，贝尔曼为此对我们大发雷霆，说我们同反动派合作。我们社会党持另外一种观点。众所周知，以前在西里西亚省和克拉科夫省并不存在民主派社会党。那里有毕苏茨基的代理人，成立了由工人组成的临时工人预备队的群众组织，教育这些组织的成员仇视俄国，同时利用社会党的口号欺骗他们。但是，这些人在德国人占领期间在国家军的队伍中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进行过斗争。我们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农民近卫军，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对这些

人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已经加入了社会党的队伍，我认为应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这些人不会去找波兰工人党，因此，波兰社会党的任务是使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下。否则的话，由于他们是骨干分子，因而易受敌对阵营的影响。全民公决表明，现在我们在波兰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群众而斗争。波兰社会党一定要完成这一任务。

我向西伦凯维兹指出，不能完全同意他所有的话。我说，据我所知，波兰的整个民主阵营对华沙起义所持的态度正是西伦凯维兹所说的那样。在宣传中，一方面揭露在明显不合适的时候鼓动华沙人起义的伦敦反动派的卑鄙行为，另一方面，对起义者的英雄主义又给予应有的评价。至于说到国家军，那么这里应该考虑到西伦凯维兹没有考虑到的一种情形，因为他没有参加过“卢布林时期”巩固波兰民主政权的初期工作。我说，众所周知，当时的阿尔齐舍夫斯基政府从伦敦给国家军的成员发出了指示，要他们退出地下活动组织，瓦解新民主波兰的机构，打入国家安全机关、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在当时，同国家军广泛合作意味着把政权交到反动派手里。力量薄弱的波兰民主派当时不能走上这条道路。同时我们知道，后来（1945年），波兰民族团结政府已经具有对自动放下武器和退出地下活动组织的国家军成员实行大赦的可能性。

西伦凯维兹在回答的时候开始纠正自己原先的一些说法。他说，关于对国家军实行的不正确的政策，他所指的并不是对待这件事的具体方法，而是指宣传活动。即便现在他也认为，有强大靠山的人民民主政权在领导国家中除了对人民的敌人实行封锁的政策以外，同时还应该教育动摇不定分子。西伦凯维兹说，在这一方面，我们对现任宣传部长马杜舍夫斯基的工作不满意。他不够内行，在政治上头脑过于简单。马杜舍夫斯基把自己视为同波兰工人党组成统一联盟的最热心的拥护者，与此同时，他却不善于在对群众发表讲话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在这里，在上层同我们争斗，但是在

地方上却毫无控制局面的能力。

我向西伦凯维兹指出，我不想评价马杜舍夫斯基作为一位部长的能力。据我所知，他是一位诚实的民主党人和一个不坏的人。至于说波兰的宣传工作，确实比较弱，但是这不能归罪于马杜舍夫斯基一个人。

接着，西伦凯维兹对波兰社会党的作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党就其政治传统而言，如今比其他政党更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波兰工人党的成员常常被视为俄国的走狗。人们更加信任波兰社会党，我们波兰社会党党员也希望苏联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把培养群众对苏联怀有友好感情视为自己的使命。西伦凯维兹说，我们波兰社会党人不是少数派，我们认为自己是能完成这一任务的。

我回答西伦凯维兹说，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不能怀疑苏联领导人对他们的信任。我说，这只要回忆一下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会见民主波兰的领导人时的著名讲话就足够了。斯大林同志在会见时说，莫拉夫斯基是人民波兰沿着民主进步道路方向前进的代表人物。

我接着说，致力于建设新人民波兰的波兰社会党人不同于西方的自己的同志，特别是不同于英国的社会党人，这对于任何人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但是西伦凯维兹回答我说，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对待我们却是另一个样子。他们不信任我们，不让我们分担管理国家的责任。

我问，这具体是指的什么。

西伦凯维兹回答说，是指不让我们的人参加管理工业部门。在外交部，什么事都由莫杰莱夫斯基和奥尔谢夫斯基说了算，不让我们的人参与领导。在波兰社会党成员担任大使的那些国家，波兰工人党成员在这些大使的身旁安插自己的观察员，不让大使们开展工

作。西伦凯维兹说，我们社会党愿意分担多数人知之甚少的波兰安全机关的工作，共同负责。但是，不让我们进入国家安全部，不让我们的副总理瓦霍维奇接触工作，不让他参与处理重大的事务。波兰社会党基层的骨干分子也感到了这一切，把委屈藏在心里头，表现出对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的不信任，把我们看成是波兰工人党中央的装饰品。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与基层脱离，并且不掌握下层的人的思想情绪的情况下同波兰工人党进行合作。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西伦凯维兹说，我们不希望国内把我们同受波兰工人党影响如此巨大的波兰农民党或者波兰民主党一样看待。我们希望把我们视为与波兰工人党共同执政的政党，共同承担组织无产阶级工作的政党。只有波兰社会党才能够并且应该组织自己队伍中那部分不跟随波兰工人党的阶级。应该考虑到我们的意见，并允许我们对某些问题有我们自己的不同于波兰工人党的观点。

西伦凯维兹说，我请您正确地理解我，我完全是坦诚地同您交谈的。您知道，我在工人面前的话同在波兰工人党党员面前讲的话是一致的，因为我认为，经过协商定下的路线应该是一致的，应该为实现这一路线而共同努力。

当我谈到对波兰社会党的信任时，西伦凯维兹说，我一方面指的是苏联及其领导人，另一方面指的是波兰工人党。

我请他具体地讲一讲，他对苏联的信任是怎么理解的。

西伦凯维兹紧盯了我一眼说：

“在同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就关于波兰的命运和我们的共同策略进行交谈以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背着我们同苏联领导人说其他的话，这使人们感到不愉快。要知道，我们波兰社会党人不是少数派，我们有权要求别人信任我们。”

我不想深谈这个话题。过了一会儿，为了反驳西伦凯维兹的攻

击，我问他，他是否认为莫拉夫斯基在准备全民公决期间的讲话是正确的。当时莫拉夫斯基利用部分波兰人敌视苏联的情绪，在群众大会上说，米科瓦伊奇克要对丢失利沃夫和维尔诺负责。当时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在进行中，米科瓦伊奇克不想同苏联政府谈判，而当时本来是在对波兰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同苏联达成协议，并保留波兰的东部地区的。波兰的省级报纸报道过莫拉夫斯基的讲话。

我接着说，西伦凯维兹同志，您是否认为波兰社会党的某些领导人在社会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是正确的，他们在讲话中泄露了他们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话的部分不宜公开的内容。

我的这些问题使西伦凯维兹感到难堪。但是他承认了错误，十分坦率地说：

“雅科夫列夫同志，您要知道，我同什瓦尔贝在知道了莫拉夫斯基的讲话后十分害怕，当然，为时已晚。我们只是想，莫拉夫斯基太不沉着了，在讲话中没有掌握好分寸，我们也只好原谅他了。”

同西伦凯维兹谈话的结束部分涉及到国内的政治形势。

西伦凯维兹估计全民公决以后的形势将会十分紧张。他认为，波兰社会党目前的任务首先是掌握群众的情绪。他说，我们应该让群众感觉到他们是形势的主人，应该改善群众的劳动条件和日常生活的经济条件，依靠工人阶级，为实现民主而斗争。同时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消除天主教的消极影响。波兰政府掌握着政权，有能力从经济上逼迫波兰的天主教教士。应该利用这一点，向天主教教士施加压力，以便使其在政治生活中保持中立。

至于米科瓦伊奇克，这方面的任务是利用目前在波兰农民党中占上风的失去信心的情绪，以及米科瓦伊奇克的影响已经大部分丧失的这种现实。

应该利用诸如维策赫和凯尔尼克这一类人，以制服米科瓦伊奇克。他可能非常坚定，不会倾向于合作，但是我们波兰民主派必须

作这样的尝试。西伦凯维兹说，我想，米科瓦伊奇克在维策赫和凯尔尼克对他施加压力时可能担心自己被孤立，不得不同意我们的条件。

分别的时候，西伦凯维兹希望今后经常会面。他希望我把波兰社会党对国内发生的政治问题的观点向苏联大使馆和莫斯科报告。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6年7月18日于华沙

№09287

列别杰夫关于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关系 出现危机给杰卡诺佐夫的电话记录

(1946年8月18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
日丹诺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

绝密

B.Г. 杰卡诺佐夫同志：

最近几个星期中，关于波兰因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关系恶化而产生的政治危机，我已经有过详细报告。但是，鉴于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我认为有责任向您简要报告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政治立场及其领导人最近的动向。

我们知道，在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在这个国家中形成了左派波兰社会党，即所谓的波兰社会工党。它不同于处于地下状态的右派波兰社会党，即完全站在伦敦流亡政府立场上的所谓的临时工人预备队。

波兰从德国人占领下解放出来以后，波兰社会工党变成为现在的以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西伦凯维兹和鲁西内克为首的合法的波兰社会党。

新的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不仅得到了国外（西方国家）的承认，而且得到了波兰国内在战前加入波兰社会党的人士和组织的承认。在1945年和1946年上半年，新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同处在地

下活动的波兰社会党的右派部分（临时工人预备队）有过各种各样的妥协。

波兰社会党的某些地下活动领袖被接纳进波兰社会党的队伍。

这一切使现在的波兰社会党得到了国外（西方国家）的承认，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国内视为旧的波兰社会党的继承者。

但是，对右派分子的让步不可能不留下后遗症。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正在不断地滑向右派波兰社会党一方，这成为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无论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对波兰社会党做出什么样的让步，随之而来的反正是提出新的要求，因为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受到同地下活动和国外波兰侨民保持接触的波兰社会党右派人士的影响，走上了一条使波兰社会党同波兰工人党决裂的道路。

波兰社会党向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是希望波兰社会党在参与执政方面同波兰工人党平起平坐。波兰工人党在部长会议中得到的席位不得超过波兰社会党的席位。社会党要求得到诸如国家安全部长、军事部长、工业部长、供应部长这些被波兰工人党掌握的部长职位。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要求平分国家安全部、总司令部、供应部和其他一些部的领导职务。波兰社会党领导人想把波兰警察收归自己管辖。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理由是，广大的波兰社会党党员指责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说，波兰社会党实际上是波兰工人党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而不是一个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波兰工人党共同管理波兰国家的政党。

波兰举行全民公决以后，波兰社会党的这些要求变得特别强硬。全民公决的结果表明，国内有许多人对全民公决的所有三个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被全民公决的结果吓倒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于是得出结论认为，波兰工人党在国内只有很不大的依靠力量，被称为“苏联的走狗”，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的前景如何很值得怀疑。

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认为，只有波兰社会党才能够表达真正大多数政治上积极的城市居民和工业居民的情绪，而波兰工人党同波兰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结成联盟只会降低波兰社会党获胜的机会。

莫拉夫斯基和西伦凯维兹不止一次对我说，同波兰工人党的结盟是牢不可破的，提出的那些要求只不过是为了使波兰社会党有参与管理国家的公正权利。我认为，实际上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特别是西伦凯维兹受到了来自地下活动组织和国外的压力（西伦凯维兹同在巴黎的齐奥尔科什一直保持接触。有情报表明，他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党会议期间同齐奥尔科什进行了会晤）。

在波兰社会党中，左派正在形成，其领导人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接触。这一派（波兰工人党力图赋予其中派的性质）的领袖是希维特科夫斯基（司法部长）、马杜舍夫斯基（宣传部长）、杜布罗夫斯基（财政部长）、热鲁克-米哈尔斯基、巴拉诺夫斯基、卡明斯基等。目前，波兰社会党中央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成员128人中有43人站在左派集团的立场上，并已经在致党的呼吁书上签名。呼吁书全文已于8月17日寄给了（通过外交信使）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莫拉夫斯基、西伦凯维兹、什瓦尔贝拼命反对这一集团，说它是波兰社会党队伍中的波兰工人党走狗，并打算立即把这些人，首先是马杜舍夫斯基驱逐出党。左派集团的领袖，特别是马杜舍夫斯基，担心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西伦凯维兹和什瓦尔贝的莫斯科之行会使波兰社会党的这一实质是右派的集团的地位得到巩固，使它有可能在定于8月25日举行的波兰社会党总委员会会议上粉碎左派集团。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西伦凯维兹认为，波兰政府成员今年5月前往莫斯科访问时，斯大林同志完全赞同波兰社会党的路线，以沉默的方式谴责了波兰工人党的路线。现在他们又散布传言，说什么斯大林同志在同英国工党党员交谈中承认采用英国工党所走的道路也可以进入社会

主义，这当然是利用这一点来为反对波兰工人党服务。

上个星期，波兰工人党和波兰农民党就关于即将举行的选举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半正式的谈判。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已表示认可和同意。目前谈判尚无什么结果，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排除波兰农民党不打算同波兰工人党达成协议而只是想试探一下有无可能同波兰社会党达成协议而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我们的波兰朋友认为，全民公决的结果破坏了在此之前大吹大擂的波兰农民党的威信，不排除在波兰活动的英国间谍企图试探一下波兰社会党脱离波兰工人党，随后把波兰社会党变成为英国的走狗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在1939年以前发生过。

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应该考虑到莫斯科会晤期间曾经发生过的波兰社会党员随意解释目前已经明确的条款的倾向。

鉴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对这三个人的莫斯科之行明显表示不安，我建议他们把自己的观点进行归纳。我可以在1946年8月18日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这份概述寄给您。

列别杰夫

1946年8月18日于华沙

№09288

列别杰夫关于哥穆尔卡
呈交工人党与社会党分歧的报告
给杰卡诺佐夫的电话记录

(1946年8月18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
日丹诺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

杰卡诺佐夫同志：

现通报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一份书面报告。他们请求在波兰社会党代表抵达莫斯科之前将此报告转呈斯大林同志。

“书面报告”

全民公决以后，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恶化。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的主要分歧表现如下：

1. 波兰社会党对待波兰农民党和米科瓦伊奇克的态度。

波兰工人党在与凯尔尼克和维策赫关于与波兰农民党结盟问题举行谈判时提出建议，让那些自以为是民主分子的党员将米科瓦伊奇克从波兰农民党主席的岗位上赶下台，同时还向凯尔尼克和维策赫宣布，在缔结选举议定书时波兰工人党将同意通过向青年组织‘维茨’（受波兰农民党控制）增补15个代表席位的方式增加波兰农民党的席位。

这样一来，波兰农民党在议会中将占24%的席位，即比波兰工人党的席位多3%。凯尔尼克提出要给波兰农民党40%的席位。

至于对待米科瓦伊奇克，凯尔尼克宣称他们党内的形势尚不允许免除米科瓦伊奇克主席的职务。

波兰社会党坚决反对将米科瓦伊奇克赶下台的建议，并建议给波兰农民党至少 25% 的席位。什瓦尔贝在与我们私下谈话中表示他倾向于给波兰农民党 33% 的席位。

由于波兰社会党的这一策略，波兰农民党采取了等待观望的立场，不大容易打交道。波兰社会党坚决反对向波兰农民党发动进攻，因为它宣布没有波兰农民党，在波兰就没有民主，有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波兰工人党的路线是通过向波兰农民党发动进攻，从整体上消灭反动分子，促使形成‘合法的’驯服的反对派集团。波兰社会党的路线则主张保留以米科瓦伊奇克为首的对现政府所必须的并不危险的反对党。

实际上，波兰社会党打算建立这样一种局面，即在没有波兰工人党和其他民主党的情况下，议会中能够出现的多数是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

2. 波兰社会党对‘国家军’的态度。

最近，波兰社会党没有同波兰工人党任何人协商，竭力将前‘国家军’的骨干分子和大量成员吸引到自己一方。

形势已经发展到在报刊上发表莫拉夫斯基在‘农民—社会党人’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讲话的地步。他说：以前对‘国家军’的态度是错误的、不正确的。这种态度体现在打倒‘国民武装力量’和‘国家军’匪徒的标语中。这种态度与‘国家军’的政治实质相矛盾，因为它在被占领时期是一个军事组织，在队伍里联合了大量的波兰人，特别是爱国青年。现在，官方人士对‘国家军’也没有提出任何指责（见《工人报》1946年8月11日）。

这一态度还表现在对华沙起义的不加批评的颂扬（为起义者纪念碑筹措资金），与童子军和反动大学生调情以及提出大赦要求和

经常庇护前‘国家军’分子等等。

3. 社会党对安全机关的态度。

波兰社会党长期反对安全机关，声称‘它们是波兰的万恶之源’。这样的声明没有刊登在报刊上，但却在波兰社会党内部十分流行。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也多次向我们谈到这一点。

波兰社会党对安全机关的典型态度体现在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瓦霍维奇辞职一事。

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自由、平等和独立’派的一名领导人温希克（阿尔齐舍夫斯基—普扎克的支持者）。已有重大证据表明温希克与著名的奥尔利克恐怖团伙相勾结，在华沙还保留有武器仓库。这个仓库已经被安全机关取缔。

瓦霍维奇受莫拉夫斯基的委托，未同部长和安全机构的任何人协商，公然将温希克释放。

自然，温希克再次立即被安全机关逮捕。随后瓦霍维奇受波兰社会党的委托提出辞呈。

莫拉夫斯基总理就此给国家安全部长拉德凯维奇批示，其中称：‘您的安全机关的无能和犯下的大量罪行，过去和现在都使我感到惧怕。如果采取某种理智的办法，我早就对您——不是作为我个人十分器重的人，而是作为一个败坏了我们整个制度声誉的部的部长——表示不信任的态度了’。最近，波兰社会党实际上已经参加了由波兰农民党和全波兰的反动派掀起的诬蔑国家安全机关的各种活动。

4. 统一战线问题。

波兰社会党已经宣布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新方针’。许多省的组织已经向基层组织发出指示，不经省委特别批准，不得与波兰工人党举行联席会议。

莫拉夫斯基、拉德凯维奇、瓦霍维奇和德罗布涅尔在一系列文

章中在对波兰工人党的态度方面提出指责。莫拉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统一战线不应当是由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俯首听命；一些人提出条件，另一些人友好地保持沉默’。

作为统一战线的条件，波兰社会党提出了新的分权要求，即按比例分配重要职务——特别是安全、国防、外交和工业部的部长。与此同时，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在各种借口下系统地罢免了波兰社会党内真心拥护统一战线的党的领导人的职务（例如，将凯采省省委书记兼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斯科夫隆斯基开除出党）。

5. 关于波兰社会党的左翼。

在这一整套‘新方针’的影响下，波兰社会党内形成了一个左翼。它由司法部长、党的副主席希维特科夫斯基和宣传部长、中央委员马杜舍夫斯基领导。

这个集团联合了党的总委员会成员的 1/3，中央委员的 1/3，在 15 个省级党组织中的 6 个党组织中占据多数。但是，党的主要省级组织仍然控制在社会党领导人手中。这个集团极力将党的骨干分子团结在它制定的纲领周围，要求彻底实行统一战线。

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千方百计对该集团实施恐怖行动，打算将其领导人，首先是马杜舍夫斯基开除出党。

结论：

1. 我们认为，已经无法与波兰农民党建立联盟，因为波兰农民党不同意 25% 的席位。无疑再也不能多给他们了。即使在 25% 席位的情况下，已经在议会形成了危险的反对波兰工人党的大多数（波兰农民党，加波兰社会党和其他动摇不定的分子）。

2. 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定于 1946 年 12 月 1 日举行的选举^①中，将不能与波兰农民党结成竞选联盟。

^① 这次选举后来是在 1947 年 1 月举行的。

3. 为此，必须使波兰社会党放弃目前的政策，主要是：

1) 停止向波兰农民党让步，同意对波兰农民党采取严厉方针（米科瓦伊奇克在政府辞职，大量解散波兰农民党的县、省级组织）。

2) 停止反对波兰工人党的言论，停止诬蔑安全机关，停止波兰社会党所谓的新方针。

3) 波兰社会党团结一致，放弃新方针，与左翼签订协议，使其代表参加波兰社会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左翼代表不参加领导机构，就不能指望修订波兰社会党的政治路线。

4. 我们认为，必须竭尽全力，迫使波兰社会党的领导放弃目前的路线。如果全部努力达不到预期的结果，那只能采取以下步骤：

1) 撤销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总理职务，由希维特科夫斯基或者罗拉—日缅尔斯基代替。

2) 让左翼占据波兰社会党领导岗位。这一举措看来不采用某些暴力手段是无法实现的。我们认为，最好是邀请波兰社会党左翼代表希维特科夫斯基、马杜舍夫斯基或者是您认为需要的波兰工人党的代表参加莫斯科会谈。

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代表 维斯瓦夫

1946年8月17日”

列别杰夫

1946年8月18日于华沙

№09290

斯大林关于波兰社会党的作用问题 同莫拉夫斯基等人的会谈纪要

(1946年8月19日)

秘密

1946年8月19日晚10时，斯大林同志在外交部副部长杰卡诺佐夫陪同下会见了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

在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开始谈话并问波兰朋友有些什么问题要向他提出。

首先发言的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访问莫斯科的目的是要客观、全面地分析一下由于不久前进行的全民公决而在波兰形成的政治形势。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波兰社会党对波兰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从根本上不同于波兰工人党的看法，因此这两个工人政党之间在今后将要采取的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即将到来的、预计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全民公决表明，现有的四党政府联盟在波兰人民中的基础过于狭小。政府联盟只得到28%的选票。而其余选票均为波兰农民党、“自由和独立”党以及“国民武装力量”所得。报刊上公布的全民公决的结果是拙劣的伪造之物，奥苏

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这是一件不能容许的事情，因为关于此事在波兰是尽人皆知，并会动摇政府联盟在居民中本来就不甚牢固的威信。

斯大林同志打断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话，表示：对全民公决中投票结果的伪造行为，他是在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之后才知道的，这种伪造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还指出：他认为，把第一个问题——保留还是取消议会的两院制——提交全民公决是一个错误。这样做把许多人搞糊涂了，因为甚至连真诚拥护波兰现存民主制度者当中的一些人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要知道，在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实行的都是两院制，这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波兰的民主政府却反对这样的制度并号召人民投票反对上院？把这个问题提交全民公决给了反动势力以可乘之机。在波兰有许多人之所以投票反对取消议会的两院制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在所有其他民主国家都普遍采用的两院制究竟有什么害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避正面回答斯大林同志的这段插话。他说，全民公决总的来说并没有决定性意义，更为重要得多的是选举，因为在选举期间反动势力将向波兰年轻的民主制度挑战。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波兰社会党建议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扩大政府各党联盟，吸收劳动党和波兰农民党加入其中。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试图证明，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政府联盟把波兰农民党的进步力量，即对全民公决的第二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从而支持了在波兰进行的改革——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力量，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对于波兰的民主事业将是极为有利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这种政策的适宜性阐明的理由是：把波兰农民党的进步力量吸引到政府联盟一边来将不会构成对波兰现行制度的威胁，同时还有可能使米科瓦伊奇克在该党的极端反动分子心

目中名誉扫地，因为他辜负了他们的希望。波兰农民党里的极端反动分子将指责米科瓦伊奇克背叛并将离开他。按照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这一构思，米科瓦伊奇克将因此而失去作为一个奢望扮演民族领袖角色的人物的声望并最终可能被清除。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没有米科瓦伊奇克也可以同波兰农民党结成联盟。

斯大林同志插话说，怎么可能在不理会米科瓦伊奇克这个该党领袖的情况下去同波兰农民党结成联盟呢？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回答说：虽然米科瓦伊奇克是党的领袖，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他也可以不再是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继续断言，在未来的选举中必须依靠波兰农民党的进步力量，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政府联盟得到多数。

接下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解释了为什么民众中的某些人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支持在波兰进行的改革。他认为，在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二个问题的人当中不仅仅有隐蔽活动的露骨的法西斯分子，而且也有许多诚实但却一时糊涂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和实际生活中的这种或那种消极现象引起的各种不满，而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示自己的抗议。

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列入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三个问题（关于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的人当中不仅有德意志人和德国代理人，而且也有被遣送回波兰的人。波兰的极端反动分子恐吓这些被遣送回国者说，如果他们支持将西部领土划归波兰，那么他们就已经不再有可能返回维尔诺和利沃夫。

接着莫拉夫斯基转而评述了波兰的匪帮。他把这些匪帮归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刑事犯罪分子，第二类是反动的恐怖主义分子，第三类则是受反动宣传蒙蔽的涉世不深的年轻人。

如果在行将举行的选举中，政府联盟能够从4个党扩大到6个

党，则不仅各种心存抱怨和不满者，而且今天仍在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其中包括匪徒当中的许多人都将转向政府方面。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认为，这将确保人民的大多数支持波兰的现行制度。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波兰工人党对扩大政府在行将举行的选举中的基础的意义估计不足。波兰工人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同米科瓦伊奇克结成联盟，即使四个政府政党的联盟在选举中遭到事实上的失败，还可以伪造投票的结果。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解释了为什么在准备全民公决时期，他在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公开讲话中说如今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实际上并不是由波兰的现政府确定的，而是在该政府组成的很早以前——由三大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确定的。他认为，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和该党报刊就边界问题发表的讲话和报道所产生的影响比波兰工人党的官方宣传要大得多，按照这种宣传，本来就无需向波兰人提起东部边界的事。

说到这里，斯大林同志向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提出一个问题：波兰社会党以及他本人是否将维护波兰现今的边界。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他和他的党完全赞成波兰目前的边界并且将竭尽全力为维护这些边界而斗争。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现今的波兰社会党乃是完全新的、与旧的波兰社会党毫无相似之处的党。这是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是坚持社会改革并同时由于在数十年过程中其主要口号就是为争取波兰独立而斗争，因而在波兰人民中享有充分信任和很高威望的党。据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称，波兰工人党在群众中，甚至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却小得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波兰工人党在波兰被认为是曾经忽略为争取波兰独立而斗争的口号的波兰、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共产党的继承者。

波兰社会党曾经向波兰工人党做了过多的让步，这是一个错

误。波兰工人党的策略是错误的，这种策略给民主波兰的复兴带来巨大的损害。波兰工人党直到最近以前一直掌握着国内 90% 以上的政权。现在它仍然保留有近 80% 的政权并力图在实际上独揽政权。这与波兰工人党在国内所起的作用并不相符，而且有损于波兰社会党领导人在追随波兰社会党的那部分工人和支持波兰社会党人的其他居民阶层中的威信。

波兰工人党不信任波兰社会党人，不让他们在相应的工作岗位任职。国家安全机关完全都在波兰工人党的手中。各地的安全机关常常为道德败坏和违法犯罪分子所充斥，这些人滥用权力和对居民使用恐怖手段（有时一些“安全机关”的不负责任分子竟然当众枪杀完全无辜的人，甚至焚烧整个村庄）。在波兰工人党里和在一些重要国家机构，其中包括国家安全机关都由犹太人把持着，这种情况会引起很大的危险，因为在波兰国内的反犹太人运动的规模，正如在凯尔采地区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是如此之大，甚至在萨纳齐亚统治的最黑暗年代^① 也未曾达到过。

尽管按照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的看法，波兰社会党在群众中拥有比波兰工人党更大的影响，但它所要求的并不多：波兰社会党希望成为一个权力平等的共同执政的政党，而不是依附于波兰工人党的附庸，不是一个仅仅听命于波兰工人党决定和指示的机构。

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强烈地表示反对解散全体波兰农民党县级和省级组织的政策。

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概括他的上述谈话时说，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即以奥苏布卡 - 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为代表的党的政治委员会）来莫斯科的目的就是向斯大林同志阐明自己对波兰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观点。

^① 指 1926 ~ 1939 年波兰毕苏茨基政权时期。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请求斯大林同志支持波兰社会党的观点并劝告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选择新的策略路线。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强调说，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应当像信任波兰工人党那样充分信任波兰社会党。他说，只有在波兰工人党同意波兰社会党人提议的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波苏友谊才能得到充分的巩固与发展。

西伦凯维兹基本上重复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想法。他认为有两条道路：目前参加政府的四个党的联盟，即如他所表达的那样，事实上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六党联盟，即扩大政府的基础。西伦凯维兹认为，扩大政府的基础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目前存在的状况不符合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在波兰存在着三个强大的政党：1. 波兰工人党，2. 波兰社会党，3. 波兰农民党。至于说到其余的政党，则它们其实称不上是政党，而只能说是充充样子。因此，漠视波兰农民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有别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是，西伦凯维兹认为，把米科瓦伊奇克本人排除在外而同米科瓦伊奇克的党去结成联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米科瓦伊奇克是波兰农民党的领袖。如果去同波兰农民党中脱离了米科瓦伊奇克的那一部分或者在将来将退出该党的那一部分结成联盟，则这就意味着米科瓦伊奇克在这件事情上不仅不会输，而且相反还会赢，因为他在党内和民众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的威信总的来说，很遗憾，是非常之高的。

什瓦尔贝也认为，没有波兰农民党的参加，在波兰就不能成功地进行他所说的诚实的选举。什瓦尔贝设想，在某些省份将可以在不同米科瓦伊奇克结成联盟的情况下进行投票。

接着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三个人分别地、时断时续地发表的意见。其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非常引以为荣地评述了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的优点。他说：什瓦尔贝

这个人整个波兰都知道在9月前的波兰就是一位为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战士，他在战争之前就曾退出过波兰社会党，因为这个党当时的领导不主张建立统一战线。至于西伦凯维兹，据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说，此人曾经蹲过奥斯威辛和其他德国集中营。西伦凯维兹在被关在集中营期间曾参加过地下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该委员会曾向盟国提供有关集中营的材料以供反希特勒宣传之用。

接着，在波兰人把所有问题都讲完之后，斯大林同志开始讲话。

1. 斯大林同志说，对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以及他的朋友们看得更清楚。但是在对波兰的政治形势的评价方面，他（斯大林）却有某些不同的意见。斯大林同志认为，由于所进行的全民公决，民主联盟和民族团结政府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恰恰相反，更加巩固了。而米科瓦伊奇克的地位却是大大地削弱了。米科瓦伊奇克在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将要求对波兰选举工作实施英-美监督。一个人如果求助于境外大国以寻求他们对自己的政策加以庇护，那么这个人就不是自己国家的爱国者，对此，波兰人民，那些迄今以来曾经一直追随米科瓦伊奇克的波兰人将会十分明白。

2. 波兰社会党领导人试图按照投票反对全民公决的第一个问题——新的波兰议会应当是单院制还是两院制——的百分比来判断此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是不对的。斯大林同志强调说：正如他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把这个提交全民公决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3. 在行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扩大联盟是否适宜？对这个问题需要由波兰人自己去认真加以考虑。但是同米科瓦伊奇克结成联盟现在恐怕是已经不可能了。他过分地胡作非为，他作为波兰利益的敌人、波兰独立的敌人已经使自己名誉扫地。米科瓦伊奇克要求由外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来对波兰的选举工作进行监督，这将给波

兰自身带来巨大的危险，因为它可能在将来招致外国的直接干涉。

4. 波兰是否应当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不，不应当。没有这样的必要。而且，这样做还将是有害的。在波兰面前，像在其他东欧国家面前一样，通过这场战争已经展现出了一条另外的，较为轻松和较少流血的发展道路——社会经济改革之路。由于这场战争，在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前在一些国家建立的民主制度，甚至是法国的民主制度，在那里仍然一如既往由 200 个家庭在主宰国家的命运，这是一种民主制度形式。斯大林把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形式称为即便在这场战争之后也依然未触动国家经济基础的政治民主制度。至于在欧洲东部国家，其中包括在波兰出现的民主制度，则乃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民主制度。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种更为综合的民主制度。它既触及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也触及了国家的经济生活。这个民主制度实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造。例如在波兰，新的民主政府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大型工业的国有化，而这就为今后在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沿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奠定了完全充分的基础。由于这场战争，各国共产党的面貌改变了，它们的纲领也改变了。以前曾经存在于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的泾渭分明的界限正在逐渐消除。例如，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德国的这个联合政党的纲领中就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

5.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沿着改革之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各国民主政府不需要坚决地与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反动势力做斗争？不是，不意味着这样。对在东欧国家，其中包括在波兰，所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改革必须要能够将其维护到底。

6. 斯大林同志认为，“犹太人把持”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安

全机关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在波兰确实存在的话，是不容忽视的。斯大林同志想象不出波兰工人党人会认识不到这一点。

7. 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的相互信任无疑是必要的。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插话问道：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是否信任波兰社会党？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毫无疑问是信任的。他解释说，这里谈到的信任乃是说，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另一个同苏联有着友好关系并且同它签订有互助条约的国家的政府或政府联盟，一般来说可以给予的信任。

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依然存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在过去波兰的统治集团曾经为了尽可能地使俄罗斯蒙受更大的损害而做尽坏事。而俄罗斯的统治集团也同样地为了削弱波兰而做了它所能够做的一切。当然沙皇俄国的统治集团的罪孽比波兰统治集团要更大一些。他们不仅参加了对波兰的瓜分，而且有时还充当过这些瓜分的发起者。但是不应当忘记，俄罗斯的先进民主人士和革命人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从来都是支持波兰独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后来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认为波兰的独立乃是波兰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至于说到列宁和我们——他的俄罗斯信徒们，则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一贯持有支持任何国家，其中也包括波兰的独立的立场。接着，斯大林同志说：众所周知，苏联政府曾经收到过参加对希腊大选工作的监督的邀请。这样一来，我们当时就曾有机会去揭露希腊保皇派和其他反动势力的舞弊行为。然而我们基于我们的基本戒律——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拒绝了参加上述监督。干涉别国内政是在对待其他国家人民态度方面的不公正行为，因而将给我们的国家招致危险。而我们，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同志强调说——是将国家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的。

8. 至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及其朋友们关于支持波兰社会

党的路线和谴责波兰工人党的路线的请求，斯大林同志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波兰工人党即在这里似乎被当作被告的党的领导班子代表现在不在场。斯大林同志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指出，甚至按照在资产阶级国家现有的法律，法庭也不能在未听取被告陈述的情况下做出判决。斯大林同志说：有一点我可以对你们说，在我看来，在波兰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应当由一个政党说了算——不论它是波兰工人党还是波兰社会党。只有这两个政党结成统一战线，才能保证波兰民主制度的成果和波兰的独立得到维护。

斯大林同志表示希望在最近的将来，在波兰大选之前能够同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领导班子的代表举行一次会晤。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都非常高兴地表示同意这样做。

关于会晤的地点，斯大林同志认为两党的代表不一定必须来莫斯科。在距波兰比较近的某个地方——比如说在基辅、明斯克或者布列斯特更为适宜。

波兰人同意关于会晤地点问题需要另行商定。

谈话共持续了4个小时，于夜里2点钟结束。随后斯大林同志邀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什瓦尔贝和西伦凯维兹共进晚餐。

晚餐后，应波兰人的要求，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们放映了影片《誓言》。

谈话记录 B. 帕夫洛维奇
1946年8月19日于莫斯科

№09300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社会党和工人党 之间的分歧与西伦凯维兹的谈话纪要

(1946年10月31日)

抄送维辛斯基，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西伦凯维兹要求同我会晤，以便向我通报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党派间调解委员会于10月30日晚上举行的会议的结果。

他介绍的情况如下：

在委员会会议上维斯瓦夫说，波兰工人党对波兰社会党不信任，因此不能同意签订波兰社会党要求的规定让波兰社会党人在政府一些关键性的部里任职的协议。到那时将可以让波兰社会党人出任农业和教育部长。

一个值得信任的党，是一个共同执政的党。^①

是谁给了维斯瓦夫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利？

西伦凯维兹说：我愿意再一次保证，我们，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希望同波兰工人党结成统一战线，波兰社会党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工党类型的社会党。我们的社会党是在波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

维斯瓦夫昨天说话的语调以及他和萨姆布罗夫斯基在会议上的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09273文件。

作为，简直粗暴得令人不能容忍。凡是希望进行合作的人都不会持这样的态度。西伦凯维兹气愤地说，如果维斯瓦夫不喜欢我这个人，我可以退出来并让位给马杜舍夫斯基，此人在波兰工人党那里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的百分之百的拥护者。

反正没有人能把我们的党推入波兰农民党的怀抱。如果波兰工人党不信任我们，波兰社会党可以退居一旁，让波兰工人党人自己去进行大选吧。

如果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有政治理智的话，他们应当明白：我们需要拥有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任，而且还有自己的党员群众的信任，而如果波兰工人党对我们党内的一切事务都要进行干预，那这种信任就不可能取得。

波兰社会党希望合作，但是它并不是受雇于波兰工人党而要对其俯首听命。

国家安全机关在到处招募波兰社会党人，目的是在社会党内部建立自己的代理机构。他们把我们的人叫去并对他们说，波兰社会党内部已经分裂，然后付给他们钱让他们为其工作。西伦凯维兹说，我这里有数十份有关此类事实的报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很难说服自己的基层骨干分子和普通党员，使他们相信波兰工人党是在以兄弟般的友好态度对待波兰社会党。

西伦凯维兹说：今天，10月31日，我们在波兰社会党政治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已经决定请求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同波兰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进行干预。我们将完全接受他的仲裁并遵照他的忠告去做。

西伦凯维兹问我：在程序方面此事应怎样才能办到？

我答应西伦凯维兹说，我将就这个问题去同大使商量。

在谈话结束时西伦凯维兹说，明天他将以书面形式送交一份关于波兰社会党对两党间业已形成的相互关系的看法的说明。

告别时，我对波兰社会党领导人未能同波兰工人党人取得一致意见和情况变得如此复杂表示遗憾。

大使馆参赞 B. 雅科夫列夫

1946年10月31日于华沙

№09301

**克鲁格洛夫关于从波兰领土撤出
内务部部队事给贝利亚的请示报告**

(1946年10月)

秘密^①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拉·帕·贝利亚同志

兹就从波兰领土撤出苏联内务部队事宜报告如下：

负责保护苏军北方集群后方的内务部部队指挥部已经解散。

保卫该苏军集群后方的内务部部队第90团和第218团已撤回苏联领土，经改编后已列入边防部队建制。

关于从波兰撤出内务部部队第64师一事，我已经根据您的委托同波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进行了会谈。

贝鲁特总统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波兰非常需要苏联内务部部队留驻，并请求让该部队在波兰驻扎到1947年3月1日。

请您指示。

苏联内务部部长 谢·克鲁格洛夫上将

1946年10月于莫斯科

^① 文件上另有标注：“未经苏联内务部秘书处许可禁止复印”。

№09304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人政治情绪与 杰韦茨基和克洛茨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6年12月11日）

抄送维辛斯基、亚历山德罗夫，归档。

秘密

杰韦茨基^①在克洛茨^②的陪同下来到使馆，按他的说法，是来向我们通报其党内情况的。这一情况通报变成了对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抱怨。杰韦茨基说，这两个党的领导人无视新建的“波兰农民党—新解放”在农民中的巨大分量。他说：我们的党是经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同意而建立的，其任务是使米科瓦伊奇的分裂，把所有比较左倾的反对派分子从波兰农民党中拉到“波兰农民党—新解放”的队伍中来。这一任务正在顺利实现，转到“波兰农民党—新解放”队伍中来的不仅仅是单个的波兰农民党党员，而且也有该党的一些整个的组织。……

谈话的最后部分谈及了波兰人民的政治情绪及对苏联的态度。克洛茨说，绝大多数的波兰人之所以对俄国人和对苏联抱有抵触情绪，是因为不论是战前的农民党，还是波兰社会党，都曾分别在农村和城市里以敌视所有俄罗斯人和苏联人的精神教育群众。

我问克洛茨，他的这一断言是否完全一样地适用于城市知识分

① Б. 杰韦茨基，“波兰农民党—新解放”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② Б. 克洛茨，“波兰农民党—新解放”活动家。

子和波兰的广大农民。克洛茨想了一想，然后回答说：如果说到农民，他们在政治上看来还是漠不关心，但“无论如何”也不亲苏。我没有去同他争论这一点，但我指出：波兰的各民主主义政党面临的还有许多教育农民的工作，我感觉不论是波兰农民党，还是农民党，还是你们的党都还没有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通过自己的宣传确实深入到了农村最边远角落的政党才能赢得农民。

杰韦茨基和克洛茨同意这一看法。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B. 雅科夫列夫

1946年12月11日于华沙

No 09306

莫杰莱夫斯基提交莫洛托夫的 有关在苏联羈押的波兰人的资料

(1947年1月13日)

1. 军事行动期间在波兰领土上被捕、现仍在拘留营中的波兰人。

2. 1944~1945年在立陶宛、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被捕、现仍被拘押的波兰人。

上述两批人共约10000人。

3. 1942~1944年在所谓的代表会议被取缔之后被逮捕和判刑的波兰人(2000~3000人)。

4. 在维连辛、西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捕并因参加秘密组织国家军而被判刑的波兰人——约10000人。

5. 来自奥波莱西里西亚的矿工——约15000万人。^①

6. 被从德国劳动营运往苏联腹地的波兰人。

7. 作为参加过德军的战俘被拘押的马祖尔人、卡舒布人、斯廉扎克人和瓦尔米亚克人。^②

1947年1月13日于莫斯科

① 指被苏联军事当局动员并被送到苏联煤矿地区的矿工们。

② 1947年1月12日波兰总统贝鲁特致信斯大林，请求苏联提前释放在苏联羈押的波兰人，以便给反动派和反苏宣传以沉重的打击，并以最佳的方式影响选举结果。在波兰驻苏联大使3.莫杰莱夫斯基递交贝鲁特的信件时，将此文件提交给莫洛托夫。

№09320

波兰工人党关于波兰政治形势 给巴拉诺夫的情况通报

(1947年3月17日)

绝密

尊敬的同志们！

在下面的通报中我们想介绍一下波兰政治形势中的一些新的因素。

各政党在议会选举及议会首次会议之后的状况如下：

我们的党还在这次选举之前就已经拥有60万党员。临近选举的几个星期及选举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是大批群众纷纷加入我党的时期。关于建立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党的口号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党内涌现出了数万名新的骨干分子。党给自己提出了保住这批骨干分子并培养教育新党员的任务。这后一个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目前有40万名党员的党龄不足一年。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我党在数量上的壮大主要是有赖于在维护民主成果、反对反动势力及其恐怖主义匪帮的斗争浪潮中入党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

我们党在选举期间为取得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是因为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政治和组织路线，同时也是由于党的成员们付出了最大限度的艰辛和努力。全党从下到上在实行动员和发挥积极性方面在选举期间经受住了考验。

在积极努力为竞选运动做出贡献方面的第二个政党是波兰社会

党，不过该党没有能像我们党那样进行如此充分的整体动员。因此波兰社会党对选举胜利的贡献要小得多。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起了作用的是在集体的、公开的和当众的表决方式问题上存在于该党许多组织中的疑虑，以及波兰社会党的某些组织中存在的对波兰农民党的幻想。

由于波兰工人党在组织和进行选举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选举之后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波兰工人党的变化。这在波兰社会党的部分人士中引起了不满和议论，认为统一战线在向有利于波兰工人党的方向发展。

但是另一方面，竞选运动也吸引波兰社会党的一些普通党员参加了斗争，同波兰工人党一起进行的联合斗争使社会党的很大一部分成员享受到了胜利的喜悦，并进而增进了同工人党的亲密关系。在选举之后，波兰社会党和波兰工人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大大巩固了，而波兰农民党在竞选中的失利则削弱了波兰社会党中提出“社会党独立自主和平等权利”口号的那一部分人的势力。

当前，在波兰社会党中存在着表现虽然尚不大明显但却无疑是存在的内部斗争，存在着新的人员重组和新的路线分化，在这一党内斗争中私人性质的问题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在人员重组和路线分歧中，推选部长会议主席问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前的情况是：所有那些曾经倾向于“独立自主”，曾经大谈“平等权利”和下不定决心去同波兰农民党作斗争的人——一句话，就是那些右翼分子，都集合在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周围。

在半年之前波兰社会党党内的关系曾经是另外一个样子。当时，衷心支持统一战线策略的一派力量还很弱小，并且没有同社会党的广大群众相结合。而现在，这一派已经有了比原来广泛得多的群众基础。

波兰社会党内部不同的两种倾向，在对待波兰农民党的态度

上，在对待波兰农民党的内部分裂产物——“新解放”和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对前景的看法上，以及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均有表现。

在对待波兰社会党的态度方面我们的任务是：

1. 警惕地注视社会党内部的新情况，新的可能的路线分化。
2. 推动社会党以前分离出来的左翼集团及其他左翼分子支持现在正在形成的左派集团。
3. 坚持不懈地力争实现关于两党联合行动的协议：议会中议员的共同行动，合办政治性训练班和学校，共同从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人等等。

前景：通过对波兰社会党内情况的分析可以认为，支持统一战线策略的左翼分子将取得胜利。

波兰农民党在选举中是大大地受到了削弱和损伤，但是并未遭到彻底崩溃。米科瓦伊奇克至今仍然在波兰农民党中拥有多数。波兰农民党受到的削弱加速了该党的瓦解，而这种瓦解正随着得到党的执行委员会五分之一成员和农民党议员团三分之一成员支持的维策赫-凯尔尼克集团的逐渐形成而日益加剧。目前还难以对这个集团做出准确的评价，因为它尚未提出有别于米科瓦伊奇克的纲领，也没有使人看到有什么独到的策略。但毫无疑问，该集团目前是把米科瓦伊奇克的活动看做是有害的，并认为在选举期间不参加竞选联盟是个错误。毫无疑问，这个集团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米科瓦伊奇克的活动。例如，众所周知，在波兰农民党中曾经存在过抵制议会的倾向，而如果说这些倾向已被消除了的话，那也是部分地借助了这个集团。

可以将凯尔尼克-维策赫集团的活动看成是波兰农民党的新防线：这就是试图保存在农村的波兰农民党，试图保住农民对这个党的支持。但是在目前，这个集团却在削弱波兰农民党，并使我们有

可能孤立该党中的最反动的分子。我们党在对待波兰农民党的态度方面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呢？我们党认为在今后仍然必须对农民党施加压力，对它采取进攻态势，不过要以其他的方式，用其他的手段。我们将继续对波兰农民党实施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但进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应当是从国家机关，首先是行政—政治机关中清除波兰农民党成员，因为这些人一直在进行有害的工作。现在，当在我们手中掌握着教育部而在农民党手中掌握着农业部的时候，这个任务有可能完成。

缩小波兰农民党在农村和城市面向城乡资产阶级的活动基础也十分重要。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去争取使广大的农民群众摆脱波兰农民党的影响。为此目的，除了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之外，同时还必须消除他们施加影响的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有条不紊地从农村行政机构中撤换掉波兰农民党成员，首先是那些工作不称职的村长和非专业人员等。

在一些策略问题上波兰农民党已经不知所措：我们发现，它一方面否定议会并把赌注押在新的选举和新的议会上，另一方面又在逐渐转向同议会合作的立场。波兰农民党没有投票反对授予政府全权，实际上是该党在政治上的投降。而这一事实正是上述表现的结果。至于说到前景，毫无疑问，波兰农民党内部的分歧将不会缩小，相反，将会不断扩大，而这将进一步削弱该党。

在“波兰农民党—新解放”中，分裂已经开始。雷克集团加入了农民党，杰韦茨基集团建立了独立的组织。毫无疑问，分裂是个不好的现象。党曾经提出过把“波兰农民党—新解放”的整个组织转归农民党。而分裂则向波兰农民党的广大动摇分子表明，从波兰农民党分离出来的最大的集团没有继续发展的条件，也没有完全按照激进的农民纲领的路线走下去。这种情况使得动摇分子们没有产生追随这个集团走下去的愿望。而这种分裂的原因则在于波兰农民

党——“新解放”没有任何群众基础。鉴于优秀分子都加入了农民党，而最保守的分子又组成了新的集团，因此这个集团“新解放”可能会成为各种政治厮杀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波兰社会党里以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首的右翼分子一直在关照这个新建立的集团，并将其作为由波兰社会党领导的未来的农民政党而把宝压在他们身上。鉴于波兰社会党的这一计划，“新解放”应当成为一个凯尔尼克——维策赫集团以后将与之联合的组织。所有这一切都有着自己的政治基础，即破坏建设一个统一政党农民党，使之成为激进的农民政党的路线。我们党打算采取如下策略：支持竭力追求统一的雷克的立场，对作为反对统一的集团——杰韦茨基集团我们是持否定态度，我们的任务就是瓦解这个组织直至波兰农民党内出现分裂。党和整个民主联盟不应把“波兰农民党——新解放”正式地看做是一个政党，它仅仅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波索尔俱乐部的一个集团。既然不是一个政党，它也就不能参加调解委员会。

农民党在选举期间表现出了比在全民公决阶段要大得多的积极性，但是组织上的薄弱和干部的缺乏，影响着它顺利地开展工作。这一点在当前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波兰农民党和“波兰农民党——新解放”内部的状况，这个农民党有着非常广泛的发展机遇，然而却因为缺乏干部和骨干分子、队伍政治水平不高而不能在农村发挥领导作用。

在农村工作方面，党给自己提出了如下任务：

1. 在农民党的激进纲领的基础上将农民运动集中起来。
2. 支持波兰农民党的分化与分裂，努力使该党内的右翼集团孤立起来。
3. 用来自城市的党员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村党员的政治水平并在各方面帮助农民党。

研究党的基层支部组织形式的改进问题。1946年9月份举行

的中央全会已经注意到了对党的基层组织工作领导不力的问题。现在已下达指示，要求基层党组织的人数不要过多，支部应当按车间和班组组建，使之能够就一些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决议。已提出了关于在每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都推选若干党组长来负责收交党费和敦促本组同志出席党的会议等任务的问题。党已经提出了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更加独立自主作用的问题。基层党组织的数量增加了。因此对它们的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必须让党的区委会对所属的基层组织分工管理，并让党的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们知道在党的工作方面他归谁领导。摆在党面前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党的思想水平问题，党的教育工作问题和具体的党内学习问题。目前，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正处于改组阶段。将组建3个部：文化-教育部、党内学习部和报刊及群众宣传部，用以取代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的单一的宣传鼓动部。与此同时，正在为理论刊物《新道路》组建一个由若干名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组成的小组，该小组将负责分析和研究某些问题并以此来提高党的思想水平。无疑正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党校必须更好地从学员中物色干部，以便今后有更高比例的党校毕业生被用于从事党的工作。最后，当前党还提出了关于提高党的领导者、党的高级领导机构的政治水平问题：省委书记及中央机关的党员干部在现阶段必须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以便有可能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

1947年3月17日于华沙

№09321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关于波兰 国内政治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7年3月23日)

秘密

贝尔曼^①邀请我去他那里，以便向我通报政治方面的新情况。

1. 在波兰社会党就马杜舍夫斯基问题举行的党内审判会结论中，马杜舍夫斯基因“不守纪律”被剥夺在波兰社会党内从事积极政治活动权利一年。会上站出来特别激烈反对马杜舍夫斯基的有什瓦尔贝、瓦霍维奇、奥布龙契卡。莫拉夫斯基当时不在华沙。什瓦尔贝在发言反对马杜舍夫斯基时说，“马杜舍夫斯基同波兰工人党进行谈判等于是朝波兰社会党的后背上捅了一刀”。

贝尔曼受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同西伦凯维兹进行了交谈。他说，在马杜舍夫斯基左翼集团的出现已经开始逐渐被人们淡忘之后，对马杜舍夫斯基的惩治又激起了波兰社会党内部反工人党的情绪。贝尔曼对西伦凯维兹说，这无论如何都有悖于两党之间业已确立的合作精神。

西伦凯维兹对于在波兰社会党内对马杜舍夫斯基进行的审判所造成的政治危害很不理解。

^① 雅·贝尔曼，时任波兰部长会议国务秘书。

2. 看来米科瓦伊奇克已经暂时放弃了建立一个自己的大党的想法，现在正在周游各省同“可信”人士进行谈话，试图同这些人一起建立一个由自己可靠的追随者组成的、将能够同波兰农民党内反对派的影响相抗衡的精悍组织。

米科瓦伊奇克为进行这样的活动而招募的人看来将采取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波兰农民党内反对派的领导人——维策赫、巴纳赫和科捷尔——已准备退出波兰农民党及其议会党团，以便组建自己的派别集团（波兰农民党在议会中有 27 名议员）。

贝尔曼认为，为了彻底击败米科瓦伊奇克，建立一个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能够循规蹈矩的反对派——农民党将是有益的。波兰农民党目前的反对派领导人不可以担负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工作。这个党将取代目前存在的组织“波兰农民党—新解放”，该组织正在接近于自消自灭。

3. 同天主教徒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最近，波兰天主教会主教理事会秘书霍罗曼斯基教士向总理西伦凯维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新的宪法草案提出了意见。该备忘录在结尾中声称，波兰天主教会将“捍卫具有波兰特点的宪法”。

新闻检查机关禁止了在报刊上刊载这样的备忘录。

在下个星期日即 3 月 23 日，将在各天主教堂宣读红衣主教格伦达为纪念先圣沃伊采霍遇害 950 周年而发出的信件。此信尖锐地指责“全世界”和波兰的无神论者。

波兰的教会厚颜无耻地干预并不属于自己分内的事情，并且最近更加积极地进行活动，其行为看来是按照梵蒂冈的旨意，同杜鲁门结成统一战线。

但是，波兰政府并不打算完全割断在选举期间同教会建立起来的联系。

波兰作家普鲁申斯基正在前往梵蒂冈，此人将在教皇那里试探可能妥协之路，在此基础之上，作为教皇临时代表的“来访者”就可以前来波兰进行旨在梵蒂冈和波兰政府之间达成协议的谈判。

4. 波兰的投机商人们利用杜鲁门的讲话和国内由于暴雪和洪水造成的交通困难开始哄抬物价。复活节前夕的市场行情更促进了黑市价格的上涨。许多货物由于被商人们囤积不售而从市场上消失。罗兹地区的面包价格已高达120兹罗提1公斤。政府已经向华沙运去了8车皮的糖和面包以供应罗兹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食品供应的紧张状况。在华沙已逮捕了一些投机商人。

5. 波兰朋友们对宣布实行大赦^①的结果十分满意。脱离地下状态的土匪数量不断在增加，在全国范围内现已达到每天1000人。前来国家安全机关登记的土匪通常都携有上交当局的武器。上交武器者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1945年大赦时的比例。大赦已经在处于地下状态的土匪中造成了深刻的分化。最顽固的分子是参加“国民武装力量”组织的土匪。

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成功地查出并部分地摧毁了国内“自由和独立”组织的领导网络。

几天前波兰的地下组织，看来大概是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将面值100兹罗提、票面上印有用英文字“美国，请救救我们”的纸币投入流通。国家全部已经从流通的纸币中没收了数百张这样纸币。此案正在侦破中。

① 1947年2月22日，波兰立法议会通过了特赦令，对于那些军事政治地下军的参加者，在其交出武器并声明停止进行非法活动的情况下，可获得赦免。波兰几万名地下组织成员获得了这样的赦免，大约17000政治犯获得释放。

在谈话结束时贝尔曼说，波兰政府和舆论界打算在4月份广泛纪念苏联—波兰条约签订两周年。贝尔曼就此事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参赞 B. 雅科夫列夫

1947年3月23日

No 09323

雅科夫列夫与沃尔斯基关于波兰 将迁移乌克兰居民的谈话纪要

(1947年4月2日)

抄送古谢夫、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沃尔斯基^①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于晚上很晚来到使馆，并请求接见他。

3月29日星期六，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由于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的遇害而从热舒夫省和卢布林省迁出所有的乌克兰人。这些乌克兰人将被迁往东普鲁士和波兰新的西部领土^②。农民将搬到农村地区，而城市居民看来将被安置在专门的营地。必须迁出还有那些哪怕其成员中仅有一个人是乌克兰人的民族混合的家庭。

沃尔斯基说，他请求把这一情况报告莫斯科。他指出：“我们的领导人看来大概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没有就像迁移乌克兰人这样的重大并且在政治上十分严肃的问题同苏联政府商量，而我由于在这种事情方面拥有经验，因而预见到此事的巨大麻烦。特别是，一部分乌克兰人将要求前往苏联的乌克兰。如何处理这些人？我们觉

① 沃尔斯基，时任波兰民政和西部土地部副部长。

② 从1947年4月24日到7月31日，从波兰热舒夫省、卢布林省和克拉科夫省迁到什切青省、奥尔什丁省和格但斯克省的乌克兰人大约有12万人。

得，不应当使有这种愿望的人丧失前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请求乌克兰政府同意接纳一部分不希望前往西方而希望前往东方——苏联的外迁公民。”

我问：“你们提议移居乌克兰多少人？”沃尔斯基没能说出具体数字。

我对他说，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他必须以波兰政府的名义提出一个正式的意见。

沃尔斯基回答说，他请求我报告莫斯科，就说“副部长沃尔斯基已正式就上述问题向苏联大使馆提出请求”。

沃尔斯基接着说：“虽然任何人都没有授权给我，但我感到我有义务告知你们：趁我们的将军们目前忙于安排斯韦尔切夫斯基的葬礼的乐队而忘记组织力量认真追捕凶手之机，匪徒们更加胆大妄为、肆无忌惮”。昨天，4月1日，还是在斯韦尔切夫斯基遇害的地方，匪徒们又打死了23名波兰边防军人，并将7人掠往森林中。边防军是在前往执勤点时途径此地的。现在政治局正在为此事举行紧急会议。关于匪徒们新的恐怖活动情况是被召去向政治局会议做汇报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拉德凯维奇告诉沃尔斯基的。

沃尔斯基说：“我担心由于一时气愤在会上会做出立即外迁乌克兰人的决议并开始不必要的镇压行动。”

沃尔斯基请求我不要对他的担任波兰工人党领导职务的同志们说他把有30名波兰边防军人被匪徒消灭的新情况告诉了我。

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7年4月2日于华沙

№09343

**维佳索夫与普特拉门特
关于波兰是否出席“马歇尔计划”
协商会议的谈话纪要**
(1947年7月4日)

分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马立克、古谢夫，归档。

秘密

7月4日，我受博戈莫洛夫^①同志的委托前往拜会了波兰驻巴黎大使普特拉门特。向他了解报刊上登载的关于他已经收到法国外交部向波兰政府发出的参加1947年7月12日欧洲国家巴黎会议的邀请的报道是否属实。

1. 普特拉门特说，7月3日11时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参赞库尔森前来拜访了他，声称是受贝文的委托来会见他（普特拉门特）的。库尔森说，贝文本想亲自会见普特拉门特，但是很遗憾，他没能抽出时间。贝文委托库尔森告知波兰大使：英国和法国政府已向波兰政府发出参加讨论马歇尔建议的欧洲会议的邀请。邀请书的文本将在华沙递交给波兰外交部。

与此同时库尔森对普特拉门特说，三国外长巴黎会议的失败，在英国政府看来，不应该影响英波两国之间的关系。

^① 博戈莫洛夫，苏联驻法国大使。

2. 今天, 7月4日, 普特拉门特拜会了阿尔方^①, 同他商谈解决某些现存的问题。在同阿尔方的交谈结束时普特拉门特说, 关于外长会议的结果, 他已经得到了俄国人和英国人的情况通报, 但是却未得到法国人的任何信息。阿尔方回答他说, 外交部已经委托他(阿尔方)向波兰大使通报必要的情况。阿尔方概述了皮杜尔在三国外长会议上所说的话。他强调, 三国外长巴黎会议的失败是战后国际生活中最可悲的事件。

普特拉门特对阿尔方说, 根据报刊报道他能够确定, 在法国有一些人认为, 如果苏联不参加英国和法国提议建立的组织, 美国将会更快地提供贷款。对此阿尔方回答说: “没有苏联参加, 当然从美国获得贷款会更容易些, 但是这将使欧洲的未来变得更加危险。”

普特拉门特问阿尔方, 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后果, 即法国最终为获得恩赐而屈从于美国。阿尔方回答说, 法国已经为获得这种恩赐而屈服美国。法国的复兴和重建有赖于美国。今年法国额外地还需要4亿美元, 而明年则需要10亿美元。阿尔方继续说, 法国曾试图与苏联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 “我本人曾与米高扬先生进行过谈判。谈判最终未能取得结果。米高扬说, 苏联暂时还不能发展其同法国的广泛贸易”。

关于行将举行的欧洲会议问题, 阿尔方说了如下的话: 法国政府预计, 大多数国家将指派各自驻巴黎的大使担任本国的代表。会期不会超过3天。这次会议将具有组织筹备工作的性质。实际上将不会对问题进行讨论。

阿尔方向普特拉门特转交了已于今天在华沙交给波兰外交部的邀请函副本。

① 阿尔方是法国外交部主管经济的部门负责人。

3. 普特拉门特说，在三国外长会议失败之后，法国仿效英国的榜样，将把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东欧国家身上。《世界报》昨天的一篇社论就是这一点的证明之一。该社论呼吁扩大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法新社广泛报道了加罗向一家波兰报纸发表的关于必须尽快在波兰和法国之间签订条约的谈话。《世界报》的这一报道是用大号字体刊出的。

普特拉门特接着说，但是迄今为止法国并没有特别急于同波兰签订条约。

4. 普特拉门特说，今天他已经给本国政府发去了关于三国外长巴黎会议结果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表明了关于波兰对行将举行的欧洲会议的立场的意见：他认为波兰不应参加这次会议。

普特拉门特说，摆在波兰政府面的有三种可能性：

- 1) 拒绝参加欧洲会议。
- 2) 参加会议以便进一步揭露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真实意图。
- 3) 同意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建议以求得到美国贷款。

普特拉门特说，第三种可能性可以排除——虽然在波兰确有一定数量的人准备这样做。出席欧洲经济委员会会议的波兰代表雷霍夫斯基就属于这样一种人。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雷霍夫斯基曾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同普特拉门特进行的交谈中他说，波兰无论如何都应该争取得到美国贷款。他问普特拉门特，如果被问及波兰是否将参加欧洲会议时他应当怎样回答。普特拉门特建议他不要做出确定的答复，但可以根据推测说波兰看来将拒绝接受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邀请。

我感谢普特拉门特提供了上述情况。^①

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参赞 Ф. 维佳索夫

1947年7月4日于巴黎^②

-
- ① 1947年6月27日至7月2日，由于讨论马歇尔计划而召开了三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外长巴黎会议。会议召开前夕，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收到了莫洛托夫的信件，信中阐述了苏联对这次会议的态度：1) 苏联决定接受邀请参加三国外交部长会议。2) 苏联坚持应吸收其他欧洲同盟国（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参加制定相关的经济措施，但反对吸收从前德国的仆从国和中立参加。3) 苏联认为，友好的同盟国家在保证参加制定上述所说的经济措施方面应该表现出自己相应的主动精神，并提出自己的要求。但后来在会议的进程中苏联方面完全改变了立场，转为坚决拒绝马歇尔计划。因此，当英国和美国邀请欧洲国家的代表参加7月12日的会议讨论那些在巴黎会议上研究过的问题时，苏联政府拒绝参加，并要求一些与苏联友好的国家也拒绝出席会议。
- ② 原文件上有如下标注：“致马尔季亚诺夫同志。利用该文件做评述。A.H. 7月6日”。

№09344

尤什凯维奇关于波兰
对“马歇尔计划”协商会议态度与
亚历山德罗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7月8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马立克，送新闻司，归档。

秘密

今天18点我应尤什凯维奇^①的要求接待了他。

尤什凯维奇说：我想向您通报一下，波兰政府对于波兰参加7月12日的巴黎会议问题持否定的观点。

今天波兰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格罗什已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波兰政府现在正在讨论波兰是否参加7月12日的巴黎会议的问题，决定目前尚未做出。可能明天波兰政府将会宣布自己的决定。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向格罗什提问说，应当怎样理解莫斯科广播电台7月8日早晨关于波兰政府已经决定不参加巴黎会议的报道。

对此格罗什回答说，这里可能是有某种误解，因为波兰政府尚未宣布自己的决定。

尤什凯维奇说：他接到波兰外交部的指示，让他提请我们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这一报道——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希望在苏联报

^① 尤什凯维奇，波兰驻苏联大使馆参赞。

刊或苏联广播电台就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报道之前能事先同波兰政府商妥为好。

我回答尤什凯维奇说，我今天早晨没能听完我们电台的广播，因此我现在难以说出究竟苏联广播电台就此问题报道了些什么。而在今天的报纸上登载的发自巴黎的通讯报道中说，在巴黎人们已经得悉，波兰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已决定不参加将于7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

我答应尤什凯维奇说，将把他的谈话报告部领导。

A. 亚历山德罗夫

1947年7月8日于莫斯科

№09353

雅科夫列夫与西伦凯维兹关于波兰 领导人访苏事宜的谈话纪要

(1947年8月23日)

抄送维辛斯基，送第一、第四欧洲司，归档。

绝密

西伦凯维兹邀请我前往共进早餐。

早餐是在位于部长会议大厦里的西伦凯维兹的一套住宅里进行的。共进早餐时只有我们两个人。

谈话一开始是围绕苏联演员小组在华沙的演出进行的，随后话题转向了国内的政治形势问题。

西伦凯维兹指出，当一年前他有机会同我会晤并提出有必要会见斯大林同志的问题时，那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是很令人担忧的，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并有导致这两个政党在大选前夕合作破裂的危险。

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一样了。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之间已经形成了合作的气氛。哥穆尔卡不久前刚刚从苏联休假归来（西伦凯维兹知道哥穆尔卡曾在苏联休息——雅科夫列夫注），现在心情和精神状态非常好，同他谈话感到很愉快。

但是国际形势却十分复杂，西伦凯维兹由此而认为，最好民主波兰的领导人能前往莫斯科去会见斯大林同志，以便同他共同讨论这一形势。西伦凯维兹说：我们波兰社会党人认为斯大林同志对于

我们来说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致他的建议和忠告都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方针和路线。

我问西伦凯维兹，打算让哪些人前往莫斯科。

西伦凯维兹说，打算由我和目前正在华沙的兰格前往。接着西伦凯维兹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说，或许也可以让什瓦尔贝一同去。

我问，前往莫斯科的这一打算仅仅是出自西伦凯维兹一个人，还是鉴于他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现在意见非常一致而已经同哥穆尔卡一起商定的。

西伦凯维兹回答说：我还没有同哥穆尔卡谈过此事，而是想事先同您谈谈，但是星期一我将同他谈这件事，如果他同意的话，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可以一同去莫斯科。

我又问，此行将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西伦凯维兹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将同哥穆尔卡商量一下。他答应在同哥穆尔卡交谈之后再吧他们的共同决定告诉我，以便转告莫斯科。

在谈话结束时西伦凯维兹补充说，与波兰社会党以前访问莫斯科的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不同，这次的人员组成将是波兰社会党焕然一新的领导人。

我指出，我不明白西伦凯维兹所说的领导班子人员更换是指哪些。

西伦凯维兹回答说：我可以对您说，不久莫拉夫斯基就将不再是党的领导班子成员了。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变动。

我问，是否可以预料，这样一些左翼反对派的代表将被安排进波兰社会党的领导班子，诸如马杜舍夫斯基、扎鲁克-米哈尔斯基或者巴拉诺夫斯基等在去年秋天波兰社会党中央全会上曾经被整过的人。

西伦凯维兹回答说：我还不能预料这一点，很难与诸如扎鲁克-米哈尔斯基及其同僚这样一些愚蠢的人交谈。他说：您称马杜舍夫斯基为“左派”，而我认为左派是我自己及我的支持者：鲁西内克、戈赫维尔德、茨维克、列切克及其他同志。

我笑着指出，现在波兰社会党内部所有的人，其中包括莫拉夫斯基，都把自己称为左派。

西伦凯维兹说：那么就请您把我看成是中派吧，如果是中派而不是“左派”能同波兰工人党和同苏联找到共同语言，那岂不是更好。西伦凯维兹补充说，我认为这样的“中派”可以给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积极的、使之走向革命道路的影响。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7年8月23日于华沙

No 09509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工人党与社会党 之间的分歧与贝尔曼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20日)

绝密

我拜会了贝尔曼，目的是向他了解经济问题辩论的结果。波兰工人党组织的辩论，旨在反对由波兰中央计划局主任、社会党人博布罗夫斯基制定的三年计划草案的资产阶级倾向。贝尔曼解释说，一年半以来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对中央计划局机关工作中反民主的实际工作一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一小撮衣袋里装着波兰社会党党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那里苦心经营。他们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将预算拨款耗费在次要的经济需要方面，滞后了重工业关键项目的发展。

明兹和波兰工人党其他领导人在此期间对经济问题并不了解，这是因为就本质而言，谁也没有研究过人民民主国家条件下的计划问题。

但是，博布罗夫斯基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的原则编制计划，在计算国民收入总额时，不仅列入了产业工人，还列入了商人和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人员的收入，从而导致波兰工人党人与博布罗夫斯基进行辩论，以便从思想上粉碎他所倡导的学说，证明这一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辩论从2月18日起一直进行到19日深夜。波兰社会党和波兰

工人党按照对等原则各派出 25 名代表。会议由西伦凯维兹主持。先后有 15 人发了言。

波兰工人党的发言小组由明兹领导。波兰社会党代表中的几名大学教授，在发言时各持己见。在波兰社会党的代表中，财政部长杜布罗夫斯基、副部长迪特里赫的发言，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反对博布罗夫斯基。波兰社会党政治局政治委员会委员、部长腊帕茨基的发言危害最大。他试图使双方的观点接近并证明没有分歧，他的这一做法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西伦凯维兹没有发言。博布罗夫斯基在闭幕词中企图指责波兰工人党的批评是“马后炮”。

他说，为什么在以前，当一切都可以修改时你们什么也不告诉我？

此时明兹反问博布罗夫斯基，你是否承认自己工作中有错误？博布罗夫斯基对此没有直接回答。

贝尔曼认为，波兰工人党在辩论过程中达到了目的，揭露了博布罗夫斯基经济纲领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

今天，即 2 月 20 日，西伦凯维兹在与贝尔曼谈话时指出，看来应当让博布罗夫斯基辞职，由迪特里赫接替他的职务。他建议派博布罗夫斯基出任瑞典大使，以替换在那里任期已满的里姆·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去部长会议大楼拜会贝尔曼时，我发现入口处的警卫检查证件很严格，我问他干嘛要这样。

他说，波兰安全机关揭露了“新解放和独立”派的一个秘密小组，要对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进行单独的恐怖行动。小组的部分成员已经被逮捕。

被捕人员供认，他们计划消灭波兰工人党的 4 名领导人：哥穆尔卡、明兹、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

贝尔曼对来自布拉格的最新报道——贝奈斯引发政府危机印象

颇深。今天哥穆尔卡应当与西伦凯维兹进行谈话。哥穆尔卡打算建议西伦凯维兹派阿尔斯基（《工人报》出版社编辑）前往布拉格，并带去西伦凯维兹给费林格的信。贝鲁特也可能向贝奈斯发出某种信函，但此事尚未最后决定。

谈话结束前我以私人身份让贝尔曼看了波兰国家经济银行的机关刊物——用英文出版的杂志《季度报道》和波兰出版的《西方通讯社电讯》，完全向西方情报机关泄漏了有直接国防意义的国家经济指标。贝尔曼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对此确实应当引起注意。最近将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检查国内所有定期出版物，堵塞向敌对情报机关合法提供信息的渠道。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B. 雅科夫列夫

1948年2月20日于华沙

№09510

苏联驻华沙使馆关于波兰社会党 代表团访捷书面报告的简报

(不早于1948年3月8日)

根据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1948年2月22日由鲁西内克、腊帕茨基、雅布翁斯基、阿尔斯基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到布拉格^①。代表团的任务是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表明波兰社会党对他们奉行的内外政策的原则性观点。波兰社会党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在其代表大会之后从左的立场上退缩，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出现政府危机的条件下有可能试图充当“第三势力”的角色。

代表团接受的指示是向捷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施加影响，不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危机演变成在波兰社会党人看来具有危险意义的那种进程。

为了具体地了解形势，代表团于2月21日在布拉格与波兰代办克拉耶夫斯基，接着又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

^① 1948年2月19日，来自布拉格的致贝鲁特的一份报告说，在政治危机日益扩大的过程中，捷克社会民主党与捷克民族社会党就如下关键性问题达成了共同行动的协议：分裂工会运动，共同行动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阻碍实行新的土地改革，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报告还强调说：“这次不知为什么劳什曼默不作声，也不强调保持社会民主党独立政策的必要性”。哥穆尔卡请求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派代表团前往布拉格，以便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施加影响。1948年2月20日，在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组成了代表团，并于2月21日动身前往布拉格。访捷归来，3月8日，西伦凯维兹向苏联大使馆提交了波兰社会党代表团出访布拉格的书面报告。

兰斯基、多兰斯基，最后又与费林格举行了座谈。

形势大体发展的过程如下：

政治危机是由三个党出任的部长辞职直接引起的。这三个党是国家社会党、教权党^①和斯洛伐克民主党。

内阁辞职的表面原因是几个国家社会党人被免职，而由共产党人接替。自然这仅仅是个借口。其实冲突早就在酝酿，随着选举期的临近而日益尖锐。冲突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右翼党派公开破坏民族阵线纲领中提出的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这里指的是将国有化扩大到所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工人占工人总数的50%以上，对批发贸易实行国有化，对外贸易实行垄断制和完成土地改革。右派担心这些改革会破坏现行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转化，破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方面，右派担心拟议中的宪法改革将为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胜利创造条件——他们已经提出口号，要在未来的议会选举中得到51%的席位。

捷克斯洛伐克无疑是美帝国主义抱有希望的最后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美国外交官企图依靠捷克斯洛伐克现有的公开表示亲美倾向的合法右派政党，利用这个国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个国家非常积极地进行活动。

政治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代表团抵达时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

某些政党和政治活动家在这样的形势下持什么立场呢？

贝奈斯总统力求不采用革命性的措施摆脱危机。现有的各种情况表明，右翼政党可以同贝奈斯的步骤协调一致。在右翼政党因其自己采取的措施而处于目前不利状态的情况下，贝奈斯预期的目标是力图通过右翼政党回到以前的地位来解决危机，即不接受右派部

^① 指捷克民族社会党和捷克人民党。

长的辞职，并千方百计使哥特瓦尔德今后继续与他们合作。贝奈斯迟迟不做出决定，并强迫共产党人做出让步。贝奈斯的策略是故意玩弄延长危机的把戏。贝奈斯无视一切，准备了一份单独的通报全国的讲话稿。军事当局为此目的已经在布拉格堡（总统府）安装了专门的无线电台。

军队动摇了。斯沃博达将军和博切克将军在对待哥特瓦尔德政府方面保持某种积极的中立态度。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共产党人可以指望军队不积极地反对哥特瓦尔德并保持中立。

由国家社会党、教权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组成的右派遭到群众的反对之后，他们同意让自己的部长返回政府并恢复原状。贝奈斯支持这一立场。

共产党一开始就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摆脱危机。共产党认为危机是右派挑起的，决定接受挑战，让右派永远无法表现出政治主动性。共产党决定建立民主势力的绝对优势。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用革命性的方法摆脱危机的要求。

由中间偏右分子（从劳什曼到维利姆）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受右派分子（维利姆、马耶尔和贝尔纳尔德）所控制，从危机一开始就站在非常危险的立场上，即观望和虚假中立的立场，实际上是在帮助反动派。他们早就希望这样，而且这一希望也没有落空。社会民主党在不了解群众情绪，其中也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情绪的情况下，打算在危机中扮演“第三势力”的角色。他们坚持让被诺塞克解职的60名警察重返岗位。当共产党人与群众一起采取行动时，社会民主党人却在搞私下交易。

社会民主党人明白，他们与共产党人一起在议会占有52%的席位，这使他们能在解决政府危机的走向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他们没有感觉到国内的革命形势正在酝酿，而且共产党人则站在

群众的前面。

波兰社会党代表团与费林格、斯兰斯基和多兰斯基接触之后进一步了解了形势，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

2月22日，代表团领导人鲁西内克正式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取得联系，举行了波兰社会党代表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联席会议。捷克人方面参加的有劳什曼、维利姆和贝尔纳尔德，后来扬科夫卓娃和社会民主党的几位中央委员——主要是右派和中派人士也参加了会谈。鲁西内克发了言。他谈到人民民主国家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共同任务，与西方左派社会党合作的必要性。他还指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对西欧工人斗争，特别是对意大利的影响。接着阿尔斯基发了言。他批评了政府中捷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腊帕茨基谈了用真正的社会主义方法摆脱危机的可能性，坚持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合作。他指出，社会党人只有站在正确立场上，才能事实上对政府扩大影响。波兰社会党的代表以自己的发言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1. 促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尽快与共产党谈判。
2. 从中立立场向左转。
3. 向贝奈斯和右派发出明确的警告：如果他们继续顽抗，社会民主党将无条件支持共产党人。
4. 停止迫害左派社会党人。
5. 破坏社会民主党右派对自己的信心，用他们反抗革命浪潮可能对自己带来的后果吓唬他们。
6. 离间右派和中派的关系，将动摇不定的分子吸收到“左派”方面来。

波兰社会党在这方面收效甚大。

1. 还在会议期间，工业部长扬科夫卓娃毅然决定转到左派方面，后来埃尔班也这样做了。

2. 劳什曼持中立立场，不支持维利姆和贝尔纳尔德。

3. 还在会议期间，大家已经清楚维利姆和贝尔纳尔德及其支持者在其他与会人员中陷于孤立。

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以至于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天召开了中央全会。

代表团与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谈话之后，向共产党的代表通报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形势。鲁西内克与国家社会党的反对派建立了个人联系，得到了他们的保证，声称将迅速与贝奈斯总统谈话，在党的大会上反对泽科尔。

晚间，波兰社会党代表团参加了由费林格主持，有扬科夫卓娃、尤纳维托娃、约翰、埃尔班、哈耶克等人参加的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会议。会上协调了在即将举行的中央全会上的联合策略，讨论了政治宣言草案。一旦右派分子在中央全会上占了上风，“左派”就立即宣读它。

在中央全会上，“左派”通过了向改组的民族阵线会议派出党的代表团的决议。会议将通过决议，用革命的措施解决危机。全会关于派遣代表团的决议成为其活动的转折点。会议于第二天继续举行。这时发生了全面罢工。布拉格工人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民族阵线各委员会在全国积极行动，对共产党的工人党员、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影响极大。

2月24日早晨，社会民主党左派集团占领了总书记处办公室。中午，社会党的布拉格组织全部转移到费林格方面。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布尔诺和国内其他许多组织中。

所有已经形成的既定事实对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随后的进程产生了影响。以劳什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人就社会民主党参加新内阁的问题开始与哥特瓦尔德谈判。以费林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左派”看到与劳什曼讨价还价不会有什么结果之

后，公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授权费林格与哥特瓦尔德举行直接对话，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政府中的领导人面对这一事实，孤立了右派（马耶尔和维利姆），委派劳什曼和贝尔纳尔德在共产党人提出的纲领的基础上与哥特瓦尔德谈判。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分裂局面。

波兰社会党代表十分清楚，为了击败贝奈斯的抵抗，在他面前公开亮相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是由劳什曼正式领导的。费林格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劳什曼是叛徒。费林格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完全可以掌握党的领导权。当代表团看到劳什曼和哥特瓦尔德的谈判正朝积极方向进展时决定离开布拉格。但是，哥特瓦尔德和斯兰斯基要求代表团的几个同志暂留数日，鲁西内克和阿尔斯基留了下来。哥特瓦尔德请求波兰社会党人与费林格和劳什曼集团联系，并倾向于让他们发表联合声明，哪怕是为了向外界表明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哥特瓦尔德对波兰社会党的代表向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施加正面影响表示感谢。

鲁西内克和阿尔斯基就哥特瓦尔德的要求与劳什曼、内梅茨和埃尔班谈了话。社会民主党在一天内改组了自己的领导。撤换了马耶尔、维利姆和贝尔纳尔德的职务，委托埃尔班履行总书记的职责。

结论：

1. 波兰社会党代表团消除了吉·莫列的中立影响。后者在一周前曾说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国内扮演“第三势力”的角色。

2. 有利于左派在党内的巩固，帮助共产党与捷克社会党建立联系，在解决危机中与社会党合作。^①

^① 对此，苏联大使列别杰夫嘲讽地说，波兰社会党的代表明显地夸大了自己出使布拉格的作用，认为在促使危机期间捷克社会民主党转向与共产党合作方面，波兰社会党起了决定性作用。

№09511

雅科夫列夫关于波兰工人党统一问题与 德罗布涅尔的谈话记录

(1948年3月9日)

抄送佐林，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德罗布涅尔是从克拉科夫来到华沙参加议会例会期间顺便拜访我的。

我与德罗布涅尔1944年秋季在卢布林相识，此后一直同他保持着联系。

他来时非常激动。没有任何开场白就谈起似乎波兰工人党准备很快消灭作为独立政党的波兰社会党。^①

他说，在知道了我反对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之后，如果我宣布，现在立即进行两党合并，要比用统一的幽灵使社会党和

^① 这个问题是西伦凯维兹在1948年3月8日与雅科夫列夫会谈时提出的，当时他还出示了来自卡托维兹省社会党委员会的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报告是由该委员会主席塞拉茨基以及其他委员编写的。报告中引用了许多事实证明，各地的波兰工人党人都不愿意同社会党人合作。波兰工人党一个县级组织的领导人说，5月1日前夕波兰社会党将被取缔，国内将只保留一个工人党。另一个地方的工人党人县长甚至示威性地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摘下了西伦凯维兹的肖像。（雅科夫列夫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说，报告中援引的有些材料仿佛是波兰社会党的一些组织强加给波兰工人党的。）西伦凯维兹还说，今天，在社会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上，将对所有这些材料进行讨论。并声称，如果波兰工人党希望打击波兰社会党中的右倾分子，这一点正如在与博布罗夫斯基辩论时出现的那样，那么社会党领导人将欢迎这个政策并帮助哥穆尔卡。但是，如果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将打击整个社会党的话，波兰社会党中央是绝不允许这样做的。

工人党党员惊慌不安好得多，您可能会感到难以理解。事实上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统一的时机尚未成熟。如同任何母亲不愿意生下7个月的胎儿一样，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也不愿意在两个工人政党之间的分歧没有消除之前将自己的党与共产党合并。不能把社会党党员硬往波兰工人党内拉，而应当是作为平等的同志，手挽手地实现两党的统一。德罗布涅尔还说，这一点任何人都应该明白。当西伦凯维兹在波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波兰人民需要波兰社会党”时，有谁耳闻目睹过那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

我支持德罗布涅尔提出的说法，即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最近实现合并，波兰工人阶级不仅不愿意，而且还可能对它们造成危害。还告诉他，我认为使他感到恐怖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将很快统一的流言很可能是挑衅者散布的，他们想离间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统一战线。

接着德罗布涅尔长时间抱怨说，不仅是在波兰工人党内，甚至连波兰社会党的同志们都认为他是右派。实际上他拥护与苏联友好，主张巩固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统一战线。

最后，他赠送给我一本他最近出版的书，书名为《在岗位上》，内容是作者公开讲话的一些速记稿和战后写的一些文章。德罗布涅尔在大多数文章里总在回忆自己多年来在波兰社会党内的活动，将自己描绘成不被承认的社会党的伟大政治活动家和领袖。

临走时德罗布涅尔提醒我，很快他将庆祝自己加入社会党五十周年纪念日。

不排除德罗布涅尔是来打听苏联大使馆是否听到令他感到恐怖的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即将合并的消息。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B. 雅科夫列夫

1948年3月9日于华沙

No09512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
关于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
统一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8年3月12日)

绝密

贝尔曼邀请我去他那里，以便向我通报关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相互关系的最新情况。

一、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认为，由于在罗马尼亚、匈牙利，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即共产党和社会党纷纷合并或者紧密联系，促使波兰社会党的工人党员认识到，必须加速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从组织上实现统一的过程。

与此同时，波兰社会党的某些“思想家”害怕两个工人政党的统一，如霍赫菲尔德在自己的讲话中宣称，党的合并大概要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实现，到那时工人才会致力于实现统一。

最近，波兰工人党向波兰社会党的右派分子（博布罗夫斯基、鲁西内克）发动进攻。此举引起波兰社会党领导层的分化，一些非中央组织的社会党党员参加了工人党。在西里西亚、波莫瑞（特别是比得哥什）以及克拉科夫，这种转党的例子很多。部分社会党党员的如此举动无疑是一时的冲动，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健康的过程。波兰社会党党员重新登记之后，党组织损失很大。部分党员自动地退了党，另一部分则加入了波兰工人党。

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波兰社会党领导人的不安。他们随后谴责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声称波兰工人党秘密地准备消灭波兰社会党。根据波兰工人党的倡议，3月9日举行了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6人协商会议。哥穆尔卡在会上发表了进攻性演说。他的讲话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与右派的斗争不真诚，被撤职的右派社会党人从一个位置上立即调到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位置上。这不是斗争，而是在玩弄换人的把戏。哥穆尔卡要求波兰社会党人与右派进行彻底的斗争。

2. 波兰社会党领导人不提拔党内的左派分子。

3. 波兰社会党的报刊，特别是外地的报刊，对右派持有未经巧妙掩饰的中立立场。

4. 波兰社会党根本不执行与波兰工人党关于在意识形态领域接近和准备两党机关合并的统一战线协议。

昨天，即3月11日，波兰社会党在西伦凯维兹的主持下举行了秘密会议。西伦凯维兹答应在3月17日举行的波兰社会党华沙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新的方针，提出实际执行统一战线协议的任务。这个讲话实际上将修正西伦凯维兹在波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即“波兰人民还需要波兰社会党”。西伦凯维兹以这种“党的爱国主义”的口号以及在波兰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全部策略为自己制造了麻烦，现在只能自食其果。

哥穆尔卡为报刊准备了一篇关于波兰社会党内右倾危险及国内的两个工人政党在组织上实现统一的必要性的文章，它将成为向波兰社会党右派发动公开和深入进攻的信号。

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之所以向自己提出这一任务，其目的是使波兰社会党在统一之前将尽可能多的右派分子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出去。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已经感到事态发展的趋势，在波兰工人党

面前各自竞相讨好什瓦尔贝和莫拉夫斯基。

但是，波兰工人党却不能容忍什瓦尔贝留在统一工人党的队伍里。至于鲁西内克，也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将他留在党内，以使他在两党统一的过程中效力。

阻碍波兰工人党实现统一的因素是：

1. 西方和美国必然的反波兰运动；
2. 意大利4月18日的选举。

然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决定不人为地制止统一成熟的进程，并打算在4月举行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和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建议，为未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建设办公大楼筹集资金。此举将动员两党的群众，并使他们在今后的统一方面相互接近（当然，这座大楼的建成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完成统一的时间无关）。

接着，波兰工人党将提出建议，定期召集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支部联席会议，而不是迄今为止所举行的积极分子联席会议。

到5月1日之前，两党将在这些口号下行动。

当务之急是统一应当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形势下，而不是在消灭波兰社会党的形势下进行，而波兰社会党的右派领导人，目前正是以后一种结局来看待统一问题的。

波兰工人党中央认为，两党在组织上的合并事实上只能在8~12个月以后实现。

波兰社会党现在面临着一个复杂问题，即如何对待国际社会党书记处，后者打算今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今年3月底，书记处需举行会议，讨论6月大会的准备问题。

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向大会派出二流的代表，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罗兹涅尔将参加会议。会上如

出现波兰社会党所不希望的形势，罗兹涅尔将授权宣布他仅仅是个观察员。根据来自伦敦的消息，工党正准备提出建议，将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党开除出国际社会党组织。

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警告西伦凯维兹，波兰社会党最好不要等到将它抛弃之时，而要选择有利时机，主动宣布退出。

西伦凯维兹正在研究这个建议……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8年3月12日于华沙

№09494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波兰工人党 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调查报告

（1948年4月5日）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关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

一、“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是波兰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很多世纪以来，在俄国专制制度情况下，波兰统治阶级传播和培植了反俄罗斯的情绪。斯大林同志在1945年4月发表的谈话中指出：“近五个世纪以来，我们两国的关系有很多相互疏远和不友好的因素，并有不少公开的战争冲突。”波兰战前执政集团在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政治交往中，不仅加强灌输反俄情绪，而且还有反苏维埃的情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成为波兰人民在德国奴役下的解放者，“苏波联盟和友好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斯大林），这种关系在1945年4月苏联和波兰共和国之间签订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协议中，得到了确认和巩固。斯大林同志说：“这个协议结束了我们国家之间旧的关系，并把它们送进了坟墓，协议以苏波之间的联盟和友好态度奠定了改变旧的不友好关系的现

实基础。”很明显，发展和尽可能地加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联盟和友好关系，对于将来的波兰人民具有何等关键和重要的意义。

根据研究的材料（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报告和发言，第一次大会及主席团的决议，波兰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可以得出结论：波兰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不友好的态度上，特别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保持沉默。

在国内和党内的这种状况下，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有责任对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但波兰工人党不但不与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其本身对这个问题就持有不忠实和有害的立场。^①

瓦·哥穆尔卡在四月全会的报告提纲中指出：“在部分波兰人民中间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波兰工人党不信任的态度，特别是在我们对所谓的波兰独立和波兰苏维埃化问题的态度方面。”

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害怕承担极力使波兰“苏维埃化”的责难，因而使波兰工人党的理论去适应波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实践。

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以党的思想路线迎合民族主义的根据是提出了波兰发展与苏联发展的根本区别问题。瓦·哥穆尔卡在1946年11月30日华沙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骨干分子大会的讲话中最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

① 苏联驻华沙大使列别杰夫在1948年3月10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指出，“在波兰共产党领导层有一些危险的倾向”，即该党已经形成了两个互相斗争的派别。一派以哥穆尔卡为首，“为波兰沙文主义所毒害”，另一个派以明兹为首，“他们战时站在苏联一边，现在仍带有明显的亲莫斯科方针的特点”。这两派的斗争目前还限制在党中央内部，即使对苏联方面也没有透露。至于贝鲁特的立场，列别杰夫认为，他与任何一派都没有内在的联系，采取的是“不同于两个极端派别的克制和理智的路线”，但“对哥穆尔卡的行为和压力表现出神经质的紧张”。

哥穆尔卡说，“第一个区别，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变革是通过流血的革命，而我们是通过和平的途径。

第二个区别应当说是苏联经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我们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

第三个区别是两国发展道路所具有的特殊性。结论是，在苏联，政权是通过苏维埃代表来实现，也就是苏维埃结合了立法和执法的职能，表现为社会主义的政权体制。我们的社会是将立法和执法分开的，国家政权依靠的是议会民主制度。”

从提纲中可以看出，瓦·哥穆尔卡强调在波兰社会政治的变革是“通过和平途径”。他解释和平过渡的条件是因为波兰地主、资本家的软弱，他们没有国家的机器和军队，在波兰的外国资本也很薄弱。只是在历数了所有这些理由后，瓦·哥穆尔卡说：“此外，所有的反动势力在法西斯失败和苏联红军胜利的影响下，处于恐惧之中，显然没有能力与民主制度进行有效的斗争。”

力图证明波兰可以走和平进化的发展道路，瓦·哥穆尔卡居然得出结论说：“波兰解放的时候，国家政权可以说是唾手可得的。”

从瓦·哥穆尔卡的全部论点中可以看出，他过低评价了苏联和苏联军队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波兰民主力量战胜反动势力和巩固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苏联和苏联军队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分析以往的事实说明，波兰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是在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下进行的，只是因为苏联红军进入波兰以后，才保证了民主力量在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使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严酷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当波兰就要解放和民主力量即将获得政权的时候，国内却活动着由波兰侨居国外的政府领导的相当数量的反动武装力量（近10万人）。

国内这些势力的领导核心是以奥古里茨基将军为首的一些人。

在与反动势力斗争的时期，波兰民主力量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

亡。瓦·哥穆尔卡在九国共产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过：“在与法西斯匪帮的斗争中，我们牺牲了 14876 人，大多数都是我们党的成员”。

众所周知，苏联武装力量在与波兰反动地下活动斗争时也承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宣布 1947 年 5 月的大赦后，公开地下活动的人数超过了 5.5 万，这就证明了反动地下武装势力活动的事实。瓦·哥穆尔卡在九国共产党代表的协商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现在虽然还没有斩草除根，但基本上平定了反动势力的武装破坏活动。”

从上述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哥穆尔卡确认波兰社会政治变革是“通过和平的途径”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来，这样来说明波兰建立民主制国家阶段的特点，是瓦·哥穆尔卡为了论证波兰可以用和平进化的途径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需要。为此他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波兰不一定需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工人阶级在民主阵营成为领导阶级以后，已经没有必要进行工人阶级的专政。因为反动势力的反抗不能形成大的反革命浪潮，他们也没有组织这种反抗的能力”。

不但如此，瓦·哥穆尔卡还热衷于议论无产阶级专政，看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担心无产阶级专政引起波兰社会党的恐惧），他说，“苏联的敌人和那些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坚持认为，至今在俄罗斯存在着专制。这一点，自然是政治上的胡言乱语……按照很简单的道理，在苏联已经再没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位置，因为解决阶级之间的问题已不需要谁对谁采用阶级压制的方法”。从上述对苏联苏维埃代表制和它的功能的议论可以看出，瓦·哥穆尔卡有意在纯理论的角度，不偏不倚地论述这个问题，却避口不谈苏维埃专政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以波兰与苏联发展的根本区别的论点为基础，产生了必须适应波兰工人党领导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波兰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是在波兰更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现代波兰的现实和波兰人民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结合。“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的政党。我们应该以波兰人民的历史为基础学习马克思主义。如果简单的话，可以说，我们的党应该研究波兰的马克思主义。”（1947年4月瓦·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在所有党的文件（波兰工人党全体会议和大会的决定和决议）中，在用于教育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思想理论刊物——党的理论机关报《新道路》上发表的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只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意识地回避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列宁、斯大林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阶段的意义和列宁—斯大林学说的作用。不谈布尔什维克党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丰富经验和贡献及其对发展现代化波兰的意义。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完整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分隔成两部分，并轻视列宁和斯大林学说对于波兰的意义和作用。这些使我们能够说，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只是形式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没有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就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有意识地不谈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意义，实际上是否定布尔什维克党在为群众的斗争中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从而在思想上解除党的武装。

列宁在1902年时说，“只有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党才能起到先锋战士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波兰工人党缺少革命理论的武装，明显地倒向民族主义，严重地危害波兰工人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实践，产生了党内某些组织蜕变的危险。“波

兰的马克思主义”用来适应波兰民族主义的观点，没有促进波苏人民之间的友好，而是相反地给波苏人民友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在实际活动中的民族主义目的，更加重了上述的情况。特别是在宣传苏联解放波兰的问题上，在各个方面阐述苏联成就的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波兰工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在波兰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竭力回避报道有关苏联的文章。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成就采取避而不谈的方针，不仅是波兰工人党的理论机关报，还有《新道路》杂志。在7期这份杂志上（除第6期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周年的专号以外）没有一篇讲述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匪帮，将波兰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的文章。杂志中只稍微提到苏联给予波兰的经济帮助。以下是发表在5期（第1~5期）《新道路》杂志上有关苏联简短文章的目录（每1期为12个印张）：《五年计划中的科学——历史和哲学部分》（第1期）；C. 鲁宾施泰因：《苏联心理学的方法和成就》（第2期）；C. 茹拉维茨基：《苏联报刊摘要》（第4期）；3. 里萨：《苏联音乐风格的形成》（第4期）；H. 希德洛夫斯基：《苏联年轻的戏剧工作干部》（第5期）等。

《新道路》杂志中有关苏联的文章登在专门的“苏联”栏目里，通常情况下，只涉及一些次要的问题，带有新闻报道的性质。其他的波兰报刊对于苏联生活的说明和报道也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波兰省一级共出版了20种日报。它们一次的发行量为250万份，占全波兰日报发行总量的72%。

1947年波兰省级日报一共只发表过486篇关于苏联的文章和简讯（文章不超过75~80篇）。平均每家省级日报每年发24篇文章和简讯。另一些报纸，如《罗兹日报》和《什捷金斯基信使报》一年只发11篇有关苏联的简讯。

波兰工人党的民族主义意图也突出地表现在波兰军队中。他们力图把苏联共产党员的指挥官排挤出波兰军队，阻止有关苏联的消息的传播，对苏联军队在过去的战争和解放波兰时的伟大使命避而不谈。

在战争结束后，波兰司令部以各种借口解除了苏联共产党员指挥官的职务，并替换为没有经过军事方面培养的干部。比如，解除了苏联将军切尔尼亚夫斯基波兰边防军指挥官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中校古塔克尔——一个没有受过军事培养的人。指挥一个军的苏联将军基涅维奇被换成了没有经过军事培养和指挥经验的将军斯韦特利克，波兰军队撤换了柳布林斯基军团的指挥员苏联将军别夫久克，解除了边防军指挥官——一个有20年边防军服役经验的苏联将军契尔文斯基。

波兰军队领导人的公开表演证明这些事实不是偶然的，反映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在建设波兰军队上的民族主义意图。

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彼哈尔斯基就曾在1946年底对苏联政治工作人员德莱丘克少将说：“部队里与其有俄罗斯政治工作人员，还不如没有政治工作人员。我们对俄罗斯政治工作人员米科莱奇克恨之入骨。”表示这种情绪的还有波兰空军政治部领导人米诺尔斯基上校（波兰工人党党员）：“我们应当尽快地摆脱俄罗斯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应当做到不怕影响空军的战斗训练。”

1947年1月，另一个波兰国防部副部长亚罗舍维奇（工人党党员）在马索维亚—明斯克的选举组（华沙省）选举前的会议上发言说：“我们将像加强西部边界一样加强东部的边界。”

为了尽可能地阻止在波兰军队中传播苏联的消息，波兰军队政治管理局局长扎日茨基将军（工人党党员）1947年4月下达指示，波兰居民订阅苏联军队出版的报纸《自由》，要限制在500份以下，

取消以前无偿提供给军队的发行量在 20000 份的各种报纸，而限制在 4000 份以下。扎日茨基这样解释自己的“措施”，他不能允许苏联报纸像波兰工人党的机关报《人民之声》一样，在波兰军队中大量发行。

在授予波兰军队现役军人苏联颁发的《战胜日耳曼》奖章的态度上，也说明波兰工人党的立场。他们轻视苏联奖章的意义，波兰国防部至今没有颁发给波兰现役军人从苏联及时寄到波兰的 10 万枚苏联奖章。

1946 年波兰边境警备部队管理署制订了一个动员计划，整个计划都写成波兰好像要受到来自东方的进攻，也就是来自苏联的进攻。因此苏联在这个计划中被看成是可能出现的敌对国家。

这些例子反映出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所创造的、适应民族主义的“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实际活动中的表现。

波兰工人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加强波苏人民联盟和友好事业危害极大，客观上助长了波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策。

二、在统一工人阶级的问题上波兰工人党从思想意识上附和波兰社会党^①

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根据这样的前提，即“工人统一战线、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合作是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波兰的主要运动力量”（瓦·哥穆尔卡 1947 年 9 月在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上的报告），1946 年 11 月对波兰社会党提出了组织上统一的问题。波兰

^① 1948 年 4 月底，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关于在当前波兰社会党的活动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的表现》，报告主要讲的是波兰社会党的思想面貌。

工人党领导人正确地理解了两党统一的问题，即首先是党内的问题，从而提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问题。瓦·哥穆尔卡在1947年4月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准备组织上的统一问题，我们应当从我们的党开始，从必须保证加强思想意识工作开始，这种思想意识工作的加强要与我们数量上的增加同时并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教育党的干部：首先起码要求有几千名党员，是在各个方面受过培养的社会活动者，能够在—个县、市、地区的范围内做政治和组织工作，从他们中再分出更少—些活动家，能够有在党的机关——不论是中央还是省里工作的能力。这些都必须以提高党的质量—为条件”。所有这些从总的和客观上提出的—问题都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实质明显地在于用什么思想理论为基础进行党的教育。从所有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发言和波兰工人党理论刊物《新道路》发表的理论文章里可以看到，党是如何在“以马克思理论与波兰实践相结合，与波兰人民的历史相结合”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教育全党的。在《新道路》杂志第1期（1947年1月）的前言里，编辑部在阐述自己建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理论观点的同时，写到：“波兰工人党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波兰工人党理论家们的任务在于“创造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处讲的都是党的思想，写的和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却有意识地不谈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及其丰富的思想，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

如果用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来检验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和《新道路》杂志的“理论家”们，可以看到波兰工人党在思想意识上明显地附和波兰社会党的倾向。

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思想意识方面正在接近，这就是“在波兰加强统一战线和为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准备的条件中最重要的事实”（瓦·哥穆尔

卡)。在与《工人报》^①辩论和反驳它关于波兰工人党力图搞“机械上的统一”的责难时，瓦·哥穆尔卡说：“工人党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它以这个理论指导自己日常的活动，波兰社会党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自己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是脱离客观生活的空谈，可以讲也可以不讲，在生活中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它应当成为两个工人党行动的指导思想”。

这样的思想基础和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所谓“独立”于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及布尔什维克党的丰富思想理论——完全适合于波兰社会党的所有团体，除了社会党里的极右分子。1946年11月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骨干分子协商会议上，瓦·哥穆尔卡说：“波兰工人党在波兰建设和发展道路问题上的这种立场将保证我们与波兰社会党的谈判成功，并签订两党间统一行动和相互合作的协议……”波兰工人党主动地接近波兰社会党，把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优先权交给了对方。比如，瓦·哥穆尔卡与《工人报》论战时写到：“我们没有反对波兰社会党的同志们在每个适合的场合强调社会主义的口号，把它作为该党的主要目标。波兰工人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党，在自己的长远纲领中把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目标，虽然上述这个阶段的发展主要强调巩固和加深人民民主制度的社会体制，就是走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样滋生的波兰民族主义的“波兰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适用于波兰工人党在思想意识上附和波兰社会党的目的。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培植起来的这种思想意识，无疑能够很快消除差异，使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思想观点接近一致。现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已经声明：“统一工人党已完成了在思想上的第一阶段的联合”。瓦·哥穆尔卡在《新阶段》一文中指出：“我们已经进

^① 波兰社会党机关报。

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组织统一的问题应当是组织和政治上的具体问题。”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联合给军队、县市一级两党委员会全体书记的指示（1948年3月）说：“为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他们，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以下原则为指导，广泛采用联合教育党员的形式：在各工厂和地方学校进行统一的党的教育，最大限度地统一教学大纲，全面地交换经验等等”。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思想上统一的过程是以“波兰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在临近波兰工人党实行统一的时候，“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就更大了，因为瓦·哥穆尔卡在四月全会上就正确地预见到会发生的事——部分波兰工人党将融合到统一工人党中。这种被称为“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给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各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和那些在工人运动中见风使舵、极力削弱波兰工人党在民主党派中地位的人进行活动提供了肥沃土壤。

三、波兰工人党在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尾巴主义”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对波兰土地改革后的波兰农业状况谈一些看法。在总的2113.4万公顷可耕地中，分配给农民的已有760万公顷（还有近200万公顷的土地也面临着分配）。在150万农民家庭中只有90万户在土地改革后获得了分配的土地，每户分到5公顷。就是这样，在这些（占有5公顷土地的）农户中，大约有60万户基本上没有从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波兰农村在实现土改以后最常见的是中小农户。现在波兰农村居住着全国69%的人口。波兰农村的这种状况给波兰资本主义提供了大量的阵地。弗·伊·列宁说：“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经常地大量地产生着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第25卷第173页)。

斯大林同志指出,“只要我们生活在小农经济的国家,我们就没有割断资本主义的根,资本主义就有着比共产主义更可靠的经济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233页)。

针对波兰的实际情况,列宁、斯大林的这些观点显得更加明确,因为在波兰农村除了富农外,天主教堂和部分地主还继续保留着自己的地位。现在国内有每户占有100公顷土地的农户10万户。这个经济集团,首先是富农,手中掌握着商品粮,并利用这些商品粮在1945年到1946年破坏了国家供给系统,而在1947年又突然提高食品的价格。Г.明兹1947年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所做的报告提纲中说:“农村中的富裕农民控制了被视为最有价值的货币——粮食的供给。国家的税收数量很小,富裕农民通过卖肉类和经济作物补偿了自己的支出,而把粮食留下用来做投机买卖”。由于政府采取专门与投机买卖斗争的措施及苏联的帮助,波兰政府才稳定住货币,并圆满地解决了工人阶级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给问题。分析1947年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指标,可以看出工业和农业经济恢复速度上的差距,在保障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方面,农业经济明显地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如果1947年总的工业产品指标为为1938年的103%的话,人均粮食产量仅为72.6%。波兰农村的这种情况首先说明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在农村推行“巩固和全面支持个体农民经济的政策”(摘自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1945年5月的决议)时,没有注意农村中的富农危险,也没有明确的农村远景规划。瓦·哥穆尔卡在1947年波兰工人党中央四月全会的报告提纲中写到:“至今我们还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农村规划”。

由于缺乏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远景规划,使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认为,只要“国家工业产品丰富到可以消灭市场上的商品奇缺现象”,只要组织和发展起国家贸易,并限制了“发展和鼓励所谓的

个人积极性”（摘自瓦·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四月全会的报告），就能解决农村和城市中与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活动有关的所有经济困难。从而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理论和实践，即随着工业的国有化，农业经济会自发地发展起来。斯大林同志在1928年指出：“不能仅在工业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根据农村自己会追随城市的说法，让农业经济任意自发地发展”。他写到：“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因素足以使社会主义的城市能永远引导农民在农村跟随其后。为此必须按列宁所说：‘转变国家经济，其中也包括农业，要转为新的经济基础，转为现代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第10版第233页）。

对波兰目前的条件来说，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讲话并不是绝对地完全适用（因为条件和起作用的力量不同）。应当指出，波兰城市的工业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化。尽管经济方面的关键阵地掌握在国家手里，但在波兰仍有18474家私营工业企业，其产品占社会工业总产品的15%以上，还有15.9万家私营商业企业，它们掌握着87%的零售贸易额和24%的批发贸易额。我们引用明兹1947年在波兰工人党四月全会的报告，对波兰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作一补充说明。他说：“我们是否确定了为占领市场而进行斗争？是否确定了为控制市场，为控制市场资本主义成分并争取消灭这些成分而斗争？当然，没有。我们没有给自己确定这样的任务。我们是否明确了要控制市场，并从行政方面对市场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进行限制？当然，也没有。如果我们能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限制可能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那么我们就可以禁止农村的土地买卖，而这些，很明显，我们没有做。我们本来可以禁止或限制在农村雇工，而显然，我们没有那么做。我们本来也可以在城市中禁止或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购买机器，扩大和新建作坊，扩大雇佣劳工，建造

房屋，开办和扩大货摊、仓库和商店。”

这样看来，如果说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城市拥有社会主义工业的条件下，引用上述斯大林同志的话，还不具备这样的足够因素——使农村自发地、彻底地跟随在城市之后，更何况在目前人民民主制度的波兰呢。斯大林同志在1929年就警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放任自流’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波兰工人党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面缺乏鲜明的和准确的纲领，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波兰农村发展的放任自流和自发性质。其最初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农村经济严重地落后于工业。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大会上谈到苏联农村经济落后于工业的危险时说：

“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的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作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无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否认列宁—斯大林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适用于波兰，拒绝搞集体农庄。斯大林同志指出：集体农庄“基本上代表了农村发展的新道路，是与富农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上面所述当然并不是说在波兰要搞集体农庄，而是说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拒绝了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却没有提出任何确切的农村发展前景规划。

瓦·哥穆尔卡在波兰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1947年9月）上说：“我们的党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在农村组织合作经济，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给农民提出其他具体的致力于农村经济改革的规划”。

这种状况导致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成为了尾巴主义，拱手把农民问题的优先权交给了波兰社会党，而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合作化计划。由于波兰工人党没有农村的远景规划，他们在与波兰社会党辩论合作化问题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除了泛泛地声明外，提不出任何可以具体对抗波兰社会党的意见。为了看看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在与波兰社会党辩论时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我们引用了瓦·哥穆尔卡（1947年5月1日）的谈话和明兹（1947年波兰工人党四月全会报告片段）的详细内容。瓦·哥穆尔卡驳斥波兰社会党报刊上指责波兰工人党反对合作化的斗争时顺便讲道：“我们只是反对合作化过程中不好的、与合作化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歪曲和糟蹋合作化的东西。可以指责我们的是，作为一个政党，我们至今很少研究合作化的问题，仅此而已。我们拥护广泛地健康地发展合作化及与此并行的国家贸易多种机构的发展。因为我们认为，在这样重要的经济生活领域——商业流通，国家应有直接从属于它的商业机构，应当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并准备在任何时候以此指导他们的行动。不可以尝试传播‘斯波联姆’^①垄断收购粮食的试验，因为任何类似的试验都可能导致破坏居民供给定额的危险，都会引起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严重后果。但完全应该好好利用‘斯波联姆’的机构来征购国家供给所需要的粮食。我们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是赞同的和实事求是的，并会永远持这种态度。但是，在世界上没有合作社社会体制，不论是什么样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或是资产阶级的，都没有建立这种体制的理论”。明兹说：“不可能建立任何合作社的制度，所以不能讲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着这种制度的要素。习惯上把我们的经济分为三种成分（国有的、资本主义的和集

^① 波兰社会党倡议的“斯波联姆”，是一种大型合作制机构，负责制作、加工和销售农业经济的产品。

体的)，只是从法律和形式上的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合作化的真正任务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者和国营成分联系到一个由国家领导的经济系统中来。合作化的形式是小生产者最能理解和最适合的进化到社会主义的形式。但是不应该忘记，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阶级力量对比下，合作化也可能利用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来反对国家的监督。这就意味着可能在合作化的招牌下，加速使人民民主化的经济以独特的形式退回到私营资本主义的经济。我们的党应当坚决地反对尝试在某种据说是‘合作体制’新阶段的伪理论下走上合作化转型的轨道。同时我们的党应当坚决地阻止把国有化的生产工具进行所谓合作化的企图，反对所有把‘社会化’和‘国有化’错误地对立起来的企图。显然，不管怎么样，这都不意味着对合作化持反对的态度。相反，我们党将以合作的态度、用更大的精力投入更广泛的合作化建设和它的正确发展之中。”

分析瓦·哥穆尔卡和希·明兹这两个摘引的讲话内容，必须指出，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在和波兰社会党辩论时，首先是站在防守的立场上。其次，在正确地发表反对波兰社会党的关于合作化体制的“理论”的同时，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却反对即使在将来在波兰建立集体农庄，未能提出适用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任何确定的发展合作化道路的纲领。这些都是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迫于反对派的作用和自己的同盟者——波兰社会党的压力，同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从而拒绝集体农庄，并声明它们对“波兰政治和经济不利”（瓦·哥穆尔卡），继续坚持这种立场的结果。因此，他们在与波兰社会党辩论时，不能实质性地讲出合作化发展的前景和它对于实现波兰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们只能声明：“合作化的形式是小生产者最能理解和最适合的进化到社会主义的形式”（明兹）。

这样，上述情况就产生了把合作化运动与集体农庄对立起来的结果。在波兰农村发展远景的问题上，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人把合作

化运动引入了死胡同。斯大林同志在1928年5月就说过：“有人把集体农庄运动与合作化运动相对立，认为好像集体农庄是一回事儿，而合作化运动是另一回事儿。这显然是错误的。有些人甚至得出结论说，集体农庄与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是对立的。不用说，这种对立的说法一点儿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合作化的一种形式，是合作化生产的最显明的形式。有销售方面的，供给方面的，还有生产方面的。集体农庄是合作化运动不能分割的组成部分，总之，它包括在列宁的合作化计划中。执行列宁的计划——意味着把农民从供销合作化提高到生产合作化，这就是所谓的集体农庄。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集体农庄的产生与发展只能是发展和加强供销合作化的结果”（《列宁主义问题》第10版第213~216页）。1929年斯大林同志在其他地方讲到：“把集体农庄和合作化对立起来是对列宁主义的嘲弄，就等于承认本身的无知”。

这样，波兰工人党领导人拒绝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和拒绝在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使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也就使波兰工人阶级的党在农民问题上丧失了战斗力。在农民问题上的这种状况不仅现在严重地困扰着党在农村中的地位，而且在将来也会给国家的民主体制带来巨大的损失。显然，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是巩固工农联盟。工人党领导人没有鲜明的和明确的关于农民问题的远景规划，可能会导致波兰工人党在农村政治上和组织上影响的削弱，导致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领导作用的削弱，使这个联盟丧失前途。

* * *

所有上述情况表明了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理论思想方针的错误，及在党内存在的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力图用

“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来替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并且一些波兰工人党活动家（在报刊上和军队中）的民族主义行为证明，在党内渗透了很深的民族主义。波兰工人党领导人轻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他们倾向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丧失了战斗力。这些都是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使波兰工人党的思想意识附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主思想意识的证明。而在农民问题上的“尾巴主义”，则反映了波兰工人党对农村缺乏远景规划。

列·巴拉诺夫

恩·布霍洛夫

鲍·奥夫恰罗夫

1948年4月5日

№09520

瓦维洛夫等人关于释放和遣返波兰战俘及 公民情况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8年5月23日)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兹报告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47 年 7 月 26 日第 2641 - 816cc 号决议而成立的复查“关于释放和遣返被拘禁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公民回国”问题委员会所做工作的情况。^①

截至今年 5 月 10 日止，从战俘营和拘禁营共释放和移交给波兰当局 6444 名波兰人，其中有：

- 1) 在前德国军队服过役的战俘 863 名；
- 2) 拘禁的“国家军”部队的人员 2662 名；
- 3) 拘禁（被动员）在苏联工作的 757 名；
- 4) 由于清理各方面军作战部队后方而被拘禁、被捕的 2162 名。

在检查内务部集中营里被捕人员的档案过程中发现，有 258 名波兰人过去曾参加过“国家军”，但他们是苏联人，长期居住在苏

^① 1948 年 1 月 18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简化从监狱和劳改营返回波兰的波兰人手续的决议草案（第 61 号会议记录第 79 号议题）。

联境内。

委员会已经将这类人员释放，送回原籍自己的家中。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审查1939年9月17日前波兰籍的波兰族人和犹太族人材料程序”的补充决议，委员会复查了12167名此类波兰人。他们因各种犯罪活动受到惩处，被关押在内务部营地，现已服刑期满。

根据对所有档案进行的复查，已决定将5200名波兰人遣返回波兰，其中2900名已经移交给波兰当局。

目前，尚有2300人正处在赶往移交地点（布列斯特市）的途中。这部分应当移交的波兰人，由于营地路途遥远以及交通工具缺乏而延误了行期。

今年5~6月期间，最后一批波兰人将移交给波兰当局。^①

委员会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

在内务部营地，现在还关押着220名波兰人。他们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因为逃避在苏军服役，自愿加入了德国国籍并向德军提供帮助，因而被军事法庭以“背叛祖国”的罪名判决的。

① 1947年驻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提交给苏联外交部一份监禁在苏联各地的波兰人的名单（50284人），这些人是由于参加在波兰和苏联境内的地下活动，以及在红军后方从事各种犯罪活动而被监禁的，其中还有一部分波兰人曾是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士兵和矿工，他们是被强行送到苏联做工的。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情报资料，到1949年为止，由各部门委员会审议了22442件波兰人和在1939年9月17日之前为波兰籍的犹太人的案件。所有这些人被关押在苏联内务部的集中营里，其中已经移交波兰的波兰公民是13437人，近期将移交的是224人。1950年8月31日，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谢罗夫在致莫洛托夫的书面报告中通报说，截止到1950年7月1日，被遣返回波兰的战俘以及扣押的人员（按民族分为波兰族、犹太族和德意志族人）共计85007人。这时内务部集中营还剩下88名战俘和375名被扣留的波兰公民。根据波兰方面的资料，1951年返回波兰的大约有300人，到1952年4月在苏联境内各地监禁的波兰公民大约有300人，这是在苏联境内被逮捕的，还有大约150人是在红军后方被逮捕的，大约10000名矿工是从西里西亚迁移来的。

事实上，这些波兰人所犯的罪行应当由波兰政府追究，委员会认为宜将他们交给波兰当局。

此外，还发现 508 名波兰人因参加反苏或民族主义组织而被判刑。复查案件过程中发现，这些人不能视为严重罪犯。苏联国家安全部因此做出结论，将这些波兰人交给波兰政府处理。

请您批准对上述问题的处理意见。

委员会主席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谢罗夫

委员会委员

苏联副总检察长 A. 瓦维洛夫

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二管理总局副局长 П. 赖赫曼

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司长 A. 亚历山德罗夫

1948 年 5 月 23 日

No 09498

雅可夫列夫与兰格关于波兰两党合并 后政治纲领等问题的谈话纪要

(1948年5月26日)

抄送佐林，第四欧洲司，归档。

机密

根据兰格^①的提议，我会见了她。

谈话涉及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的问题。

兰格很满意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准备合并的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同时，他在谈到合并存在的一些问题时说，波兰社会党领导内部对此正在辩论，目前还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合并后的党对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的态度问题。按兰格的意见，将来波兰的工人党不可能置身于联合的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之外。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成一个党以后，事实上它已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党，就该党即将实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战略意图而言，这将造成合并后的党加入共产党情报局时在形式上的障碍。

我对兰格说，我想，最正确的出路可能只有让情报局改变自己的名称，以此来为合并后的波兰工人党加入情报局创造形式上的可能性，而又不有损于波兰社会党人的威信。本来给西欧右派社会党

^① 奥·兰格，波兰社会党领导成员。

和所有的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制造口实，指责波兰社会党成了共产党的组织，就是不对的。

与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党不是融入波兰工人党（共产党）中，而是和他们在平等权利下进行合并。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把现在研究制定的思想宣言，作为将来合并后的党的政治纲领，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合并，在新的政党里从事波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共同工作。

哥穆尔卡在5月1日的发言中说，这个纲领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在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①发表的文章中，他对这一表述进行了发挥，并说，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将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思想纲领上进行合并。

兰格说，在我们社会党人的范围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很多人，包括兰格自己，倾向于出于策略的目的，把合并后党的思想纲领制定得更宽泛一些，就是说这个纲领应该是被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及西方工人运动的经验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兰格说，我们认为，如果接受被发挥了的哥穆尔卡的表述，那么，这种纲领将包含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因为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在思想上鼓舞了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并在理论上为他们制定了任务。而对于波兰社会党，甚至是共产党的广大群众来说，接受哥穆尔卡的表述将意味着波兰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尽管正如我们一直所坚信的，我们的国家是沿着波兰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

^①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是根据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决定创立的，1947年10月1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批准，确定了报的名称，其主要任务以及前三期的出版计划。11月出版了第一期报纸。

兰格补充说，接受较宽泛的表述可以排除这个因素，此外还将有助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左翼分子进行争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斗争。

兰格强调说，他以上的意见不能代表波兰社会党全体领导人的意见，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

我指出，我不讨论这两种表述的优缺点，我问兰格，他难道不认为，他坚持的更“宽泛”的表述有一些含糊不清，而这将使未来合并后的波兰党内的反对派有可能轻易地对这个党领导的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对我的意见，兰格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我认为，在同我的会面中，兰格想提出波兰社会党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这些问题随时间推移，可能会成为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分歧点。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B. 雅可夫列夫

1948年5月26日

№09503

雅科夫列夫与贝尔曼
关于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
报告的谈话纪要

(1948年6月9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绝密

昨天，6月8日，我打电话给贝尔曼请他接见我。

贝尔曼回答，很愿意见面。因为他正要告诉我某些重要的事。他又补充说，您大概已经知道要谈什么（指的是在最近这次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产生的不同意见。——雅科夫列夫）。定好今天6月9日见面。

贝尔曼说了以下一些事情：

为了即将进行的波兰工人政党合并的事宜，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党的全会，并委托哥穆尔卡做报告，题目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准备合并的组织措施。哥穆尔卡没能按时准备好报告，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几次推迟全会的召开^①。哥穆尔卡的报告在全会前一天夜里2点完成，第二天早上就做报告。

尽管哥穆尔卡推迟了报告的准备，但他完全有可能让他报告的论题经过政治局成员的同意。他有责任这样做。何况他在报告中谈

^①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48年6月3日召开。

到党的思想传统的原则问题。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使政治局的成员多少有些吃惊。但他们得出结论，看来，报告不会有新的原则性的观点，也就不再要求哥穆尔卡推迟报告，以便让他们先了解他报告的内容。

中央委员会全会是扩大会议，有骨干分子参加，共 140 人。

哥穆尔卡的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评价过去的波兰工人党的思想传统；第二部分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为一个党的组织任务。

哥穆尔卡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卢森堡派进行了批评。完全否定了罗沙·卢森堡积极的一面，并声明说，她完全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她是站在对列宁的观点进行修正的立场上说这番话的。

接着，哥穆尔卡说，波兰共产党在 1918~1920 年就提出波兰苏维埃的口号，犯下了不幸的错误，是波兰反动势力获胜的原因。同时，哥穆尔卡特别突出地夸大了这样一个论题——通常以为祖国独立而奋斗的爱国主义者面目出现的波兰社会党人是右派分子。

在这个问题上，哥穆尔卡非常混乱地解释了独立的口号和自主的原则，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使用并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与会者对哥穆尔卡报告中的论点感到震惊，并询问政治局委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勉强得到的答复是报告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在报告结束后，政治局委员们立即与哥穆尔卡进行交谈，要求他在开始辩论前告诉与会者，他的报告中有关思想传统的部分论题是供讨论的。哥穆尔卡做了这样的说明。

在讨论中 18 个人发言：4 人只谈了组织问题，14 人发言实际上谈的是报告的政治方针问题。

14 人当中有 13 人反对哥穆尔卡的修正主义论点，认为他的论点实际上明显地带有民族主义性质。只有一个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外事局局长德鲁斯基发言拥护哥穆尔卡（看来，这是个阿

谀奉承者，贝尔曼补充说)。仅以政治局委员萨姆布罗夫斯基的话为例，他在讨论时表示，他的发言只涉及报告的第二个问题，即组织问题。萨姆布罗夫斯基对此明确表示，政治局没有批准并不赞同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先驱者问题上的政治立场。

全会通过了仅涉及组织问题的决议。

全会闭幕后很快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就未经他们同意报告的论题一事批评了哥穆尔卡，认定这种行为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的原则，批评了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发了言，只有一个斯彼哈尔斯基——他本人特别紧跟哥穆尔卡，持模棱两可的立场。

哥穆尔卡辩解说，自己只是在一些提法上不够准确，但仍然维护发言中的原则错误。政治局委员请他提交报告的提纲，以便在认真研究它们之后，在下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报告中业已形成的观点。这个会议将在6月10日召开。

我直接问贝尔曼：在他看来，哥穆尔卡在报告中的立场是不是偶然的？

贝尔曼回答，这个立场不是偶然的，其中很多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成熟了。贝尔曼不得不多次修改哥穆尔卡所准备的发言中的各种论题，每次他都心平气和地同意进行修正。

贝尔曼说，我们将尽全力挽救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哥穆尔卡。如果他固执己见，我们就不得不请斯大林同志来裁决了。

我的意见是，所有发生在哥穆尔卡身上的事都是不合时宜的，正好是在波兰工人党即将统一的时候。

贝尔曼说，他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也可能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更好，如果哥穆尔卡这样的路线在统一后的党内表现出来，并在那里得到原波兰社会党成员的广泛支持，就更糟糕了。贝尔曼继续说，尽管意识到哥穆尔卡讲话的危害，但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参加

全会的政治局委员同出席会议的党的骨干分子一样，正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评价了哥穆尔卡的错误立场。

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B. 雅科夫列夫

1948年6月9日

No 09523

波兰工人党中央“关于执行共产党
情报局六月会议决定”的资料摘录

(1948年10月7日)

绝密^①

情报局做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形势”的决议正值我党领导层处于严重危机时期。这场危机是由前总书记维斯瓦夫^②同志的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所引起的。

早在情报局的决议通过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与维斯瓦夫同志之间，关于如何评价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反苏反马克思活动方面，出现了一些分歧。6月初，也就是在情报局会议前不久，维斯瓦夫同志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长篇纲领性演说，对波兰过去的工人运动做了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价，遭到了出席中央全会的大多数代表的抵制，并引发了维斯瓦夫同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一场公开的冲突。

在这样的形势下，情报局的决议大大加速了揭露和克服党的领导人右的和民族主义倾向的过程。一方面，决议有助于揭露维斯瓦夫同志在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方针，另一方面，从思想上武装了党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彻底揭露上述倾向。尽管党的大部

① 该资料是“作为对情报局秘书处咨询的答复”，由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寄给苏斯洛夫的。档案原件第二、三、五点没有标出。

② 即哥穆尔卡。

分领导人早就对其表现进行了斗争，但做得还很不够。情报局的决议帮助党理解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新阶段右的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危险实质，并对波兰做出了相应的结论。

一、情报局的决议有助于党的领导人制定人民波兰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它对党正确地提出农村政策和继续开展使小农和中农摆脱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分子剥削的斗争有着特殊的影响。它帮助党制定出对仍占波兰 2/3 人口的数百万落后的小农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社会改组的明确计划。提出这些问题，无疑调动了农村劳动群众的积极性，激化了阶级斗争，使力量的对比逐步变得有利于劳动人民。

公布情报局的决议对党的各级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广大的党的活动分子加大了对所有错误倾向的批评力度。这些错误倾向表现在评价以前的波兰工人运动，人民民主的阶级实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问题，城乡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和道路等问题上。公布决议还提高了广大积极分子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

对情报局决议的广泛宣传，巩固了波兰工人党广大党员对联共（布）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和苏联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主导作用的理解和认识。

由于对情报局决议的广泛宣传，对广大党员群众正确理解波兰工人党七月中央全会和继续做好认真的准备，对八月中央全会党的领导层克服右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将党在农村的任务具体化等方面也是一个不断的促进。

还在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前，中央就召开了大规模的党的骨干分子会议。贝尔曼同志在会上介绍了情报局会议的总结，特别强调了波兰工人党应从南斯拉夫事件中吸取的教训。随后，将情报局决议连同有关讲解在波兰工人党的所有报刊上全文发表，其中日报总发行量 120 万份，周报总发行量 60 万份。波兰社会党机关

报《工人报》也发表了决议。波兰其他所有报纸也发表了决议（发行量250万份）。电台多次播放决议的缩写本。我们的报刊系统地报道了南斯拉夫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评论。兄弟共产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或者决议的摘录及文章，也在我们所有党报上系统地进行了选登。党的报刊或者全文或者摘要地转载了在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的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材料。

署名“中央委员会”的《真理报》文章^①也在我们所有党的报刊上转载了。

7月（4~5日）中央全会将传达情报局决议列为议事日程中的第一项。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人是扎瓦茨基同志，中央全会完全拥护情报局的决议。

对于在全会上对情报局的决议持“保留”意见的贝尼科夫同志，已在全会闭幕后立即撤消了其担任的波兰工人党中央教育、文化和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在8月的全会上撤消了其中央委员的职务。^②

中央七月全会之后，举行了中央、各省、区、乡党的骨干分子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关于全会总结的报告都对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形势的决议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有60000多名党员参加了这些骨干分子会议，5000多人发了言。所有的基层党组织都讨论了关于波兰工人党七月全会的总结。在所有这些代表大会上以及党组织的会议上都通过了决议，强调了与情报局决议和波兰

① 指发表在1948年9月8日《真理报》上的文章《南斯拉夫的铁托集团将社会主义引向何方》。

② 在波兰工人党中央七月全会上，贝尼科夫认为情报局的决议“不能理解和不能令人信服”，并警告有夸大民族主义现象的危险。代表们对于这些“保留意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统一工人党全会决议完全保持一致。这些会议导致党的政治生活和思想生活大大活跃，表明党员群众对情报局决议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七月中央全会依据决议所做出的结论保持一致。然而，也出现过一些动摇，但是这种现象大部分发生在担任某种职务的党员中间。州一级党的骨干分子中间只发现了一个动摇分子，即克拉科夫州委委员、剧作家塔德乌什·霍卢依，他反对情报局和波兰工人党八月全会的决议。霍卢依已被开除出党。

中央七月全会和八月全会的决议使情报局决议更加深入人心。应当强调指出，除了关于全会的材料之外，党的报刊对情报局决议提出的许多问题，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并提出论据尚欠不足。情报局决议的普及加深了党的队伍的国际主义感情，巩固了波兰工人阶级和兄弟共产党的团结，提高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问题的兴趣，巩固了与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党——联共（布）的联系。

.....

四、八月中央全会对我党继续发展的特殊意义不仅在于全会克服了党的领导层中右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向全党揭露了这一倾向的危险，还在于以情报局的决议为依据动员全党克服党的所有机关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以公开地和波兰迄今罕见的规模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八月中央全会之后所开展的总结运动，其出发点是决心彻底改变波兰阶级力量对比的现状，使其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转化，千方百计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巩固党在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所有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特别强调了在实践中采用各种新的形式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的充分的必要性。八月中央全会之后的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在让广大党员群众掌握党的决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八月中央全会以后的总结运动使全党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其规模为议会选举以来所罕见。政治和思想积极性提高的一个主要动力是在实践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广大党员中反应强烈，现在仍是各地的主要工作方法之一。总结运动除了涉及全波兰级的党的骨干分子队伍外（1000人），还涉及所有省、县级骨干分子及乡党委书记，总数达20多万人。全会之后，中央委员在一些最大型的工厂和矿山召开了85次党的大会，有30万名党员参加了会议。现在正在举行党基层组织会议，截至9月25日止，在华沙市组织中有15000名同志参加了这些会议，200多人在讨论中发了言，足见积极性的高涨。

为了实现八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使其发挥作用，中央委员会在9月召开了全波兰国营工业、国营和合作社贸易工作者党的骨干分子（厂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与会人数达1000人，还召开了有500人参加的工人党员领导干部会议，700人参加的行政机关党的骨干分子大会，500人参加的青年骨干分子大会，600人参加的军队骨干分子大会。政治局委员在这些大会上，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对上述各部门党组织的任务做了报告。

在上述会议上，对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过程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实践中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广泛存在的与群众的疏远，经济、工会、国家机关、劳动者代表会议甚至党的机关的某些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需要漠不关心，脱离群众，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等等。同时还批评了经济机构惧怕下级的批评和监督，经济部门不善于将一长制的原则和吸引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发挥其积极性的原则相结合，不重视工会联合会和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在开展劳动竞赛方面经常忽视工会组织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和基层行政机关混进了阶级异己分子，政府机关不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国家机关在对待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经济机构

散布机会主义的“中立”原则，对阶级敌人在经济、行政机关的腐蚀活动缺乏警惕，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资本主义分子经常相互勾结。大会对所有这些问题都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做出了许多组织结论。

……

六、在执行全会决议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明确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问题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景，才清楚地发现阶级异己分子和腐化变质分子已经混进党内，而这一现象与接收党员时警惕性不高、基层党组织责任感不强、不注意经常纯洁党的组织有直接关系。波兰工人党中央已经通过了一个“关于将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清除出党”的内容详细的决议，责成基层组织在（与社会党的）统一大会召开前夕清理自己的队伍，并在此期间限制入党人数。这一时期只接收先进的工农业产业工人和积极参加反对富农斗争的贫农和中农入党。

分析八月全会后的党内形势，可以看出：由于党的领导人把全体党员动员在全会决议的周围，党的队伍出现了高涨的势头。阶级警惕性加强了。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了。

但是，还应当指出，面临阶级斗争尖锐化和阶级敌人活动频繁的形势，党的队伍的积极性和警惕性仍然显得欠缺。这种现象表现在全会之后，敌对分子开始制造恐慌和紧张气氛，导致居民开始大量囤积食品，商店囤积日用品，而党的组织没有针对这一行动迅速采取反击措施，使消灭阶级敌人制造的这种状况的过程拖得长了一些。

自情报局决议和七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公布以来，在阶级敌人制造的反对集体农庄，诬蔑和恐吓农民运动的压力下，农民中许多党的组织转入了守势，互助组、合作社和行政机关对消灭富农影响的斗争仍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仍然局限于

泛泛地开展关于生产合作社的讨论，而没有在贫农中组织有影响的对富农的具体斗争。

农村的县一级组织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开展与日益猖獗的由富农分子组成的土匪武装的复活，以及与天主教的主动出击的斗争。

七、情报局的决议和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和八月全会以来的决定，在波兰所有民主党的骨干分子和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为了实现八月中央全会的指示，我党领导人彻底废除了维斯瓦夫同志与“整个波兰社会党合并”（即将右派分子也包括在内）的方针。这一工作已在波兰社会党总委员会会议和决议中得到体现。我党对会议的准备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总委员会的会议实际上是由以希维特科夫斯基、马杜舍夫斯基、巴拉诺夫斯基和雷比茨基为首的波兰社会党的左翼力量领导的。我党还给会议以思想上、组织上的支援，对以西伦凯维兹、腊帕茨基、茨维克和阿尔斯基为首的比较健康的中派分子施加了压力，克服了他们的动摇和妥协的倾向。我党还帮助波兰社会党实现了转折，即孤立了右派及其附属的部分中派，实现了波兰社会党的左翼与西伦凯维兹集团的结盟，波兰社会党的领导层发生了重新组合。波兰社会党总委员会在克服笼罩在党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倾向和错误方面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我们首次粉碎了波兰社会党领导层用政客式掩饰分歧的方法代替思想斗争的企图。我们首次迫使波兰社会党领导层大规模地开展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波兰社会党骨干分子的队伍里引起了思想震动。波兰社会党总委员会进行的反对右派和中间派的斗争，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思想上的继续接近的决定性因素。总委员会的决定无疑提高了波兰工人党的威信，使波兰社会党的广大党员认识到波兰工人党

的领导作用。目前正在举行的波兰社会党省级骨干分子大会，所举的旗帜是从思想上克服社会民主主义，与右翼进行斗争并将他们从地方组织中清洗出去。

农民党总委员会也有了积极性的进步。总委员会已经将人民民主的明显敌人、前部长、此前一直担任农民党主席的普捷克开除出党，同时还开除了几名右派活动家。农民党第一次明确承认了工人阶级和波兰工人党的领导作用。

波兰农民党总委员会对波兰工人党八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也表现出肯定的态度。从总委员会的决议，从撤销前部长、此前一直担任总委员会主席的凯尔尼克职务这些事上都可以反映出来。

民主联盟各党派的上述变化无疑意味着它们的进一步联合。我们力争这些变化能在这些党的地方组织中彻底完成。

八、波兰工人党中央依据情报局的决议，在自己的八月中央全会上制定了继续将波兰从人民民主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路线，其途径是彻底限制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逐步增加和巩固城乡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贫农、中农与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并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斗争，为完全消灭富农阶级创造条件。

九、为了实现全会的方针，中央委员会现在正将自己和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在以下问题上：

1. 巩固党的领导作用方面

1) 纯洁党的队伍运动，提高党组织在与阶级敌人斗争中以及防止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侵蚀党的队伍的警惕性和积极性。下级组织必须在上级组织的帮助下，在统一代表大会之前将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投机钻营分子及其他分子清洗出党。中央委员会打算开除 40000~50000 名党员。

中央委员会还同时给自己提出了全面协助波兰社会党清理其队伍的任务。我们希望，在波兰社会党总委员会决定的清党运动期

间，能够开除 4000~5000 名公开的和隐蔽的右翼代表，在统一大会开幕前通过审查，将从波兰社会党 50 万党员中间查出数万名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分子。

2) 为了提高企业党组织的作用和工会联合会的作用，当前在工厂正在进行一场旨在解释经理室、党组织、工厂委员会的任务及其相互关系的运动。

3) 由于我们打算在 12 月上旬进行两党统一，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统一工人党的党纲、宣言和党章，准备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

2. 巩固农村中的国家、行政及社会经济团体机关

一场大规模的将富农分子及其走狗从基层行政机关和人民委员会清除出去的运动业已开始；为了同一目的，在互助组和合作社已经开始进行新的选举。为此目的，已经动员了我们农村组织的全部力量和农民党、波兰农民党的优秀农民。为进行这一运动，已经吸收我们的工人党组织对农村组织提供重大的帮助。只有这种运动才能从实质上提高我们的组织在与富农斗争中的战斗力，有助于克服波兰工人党的农村组织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革前景问题上的动摇性。

同时正在起草经济发展和巩固国有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0%）的两年计划，对拟于 1949 年成立的首批数百个示范性生产合作社正在做准备工作。

我们还打算成立一定数量的土地共耕社，现在正在起草章程。估计还得为此而开办此类合作社的主任和会计学校。计划组织部分农民赴苏联集体农庄参观学习。

3. 政治局还计划制定反对天主教日益活跃的措施

4. 为实现八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政治局正在加强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的建设

政治局将特别注意加强思想领导，为此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已成立了宣传部。

以上所有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措施，都是为了顺利地执行波兰工人党八月中央全会的决议。^①

^① 1948年10~11月期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也收到了来自意大利和匈牙利共产党的类似的情报资料。

No 09529

哥穆尔卡关于拒绝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 领导机构致斯大林的信

(1948年12月14日)

译自波兰文^①

约·维·斯大林同志：

由于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建议我参加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您，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9日在与我谈话时也支持这一建议，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向您报告我的初衷，并请您劝说波兰同志满足我的愿望，在统一工人党政治局选举时，不要再计划将我列入候

^① 原档案附有一个批示：“波诺马廖夫同志已将原信和译文送往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处。1948年12月24日第5372号”。波斯克列贝舍夫是斯大林的秘书。

选人名单。^①

在同您直接谈话时，我已经努力解释了我上述观点的理由。可能由于我的俄文水平不高，结果表达得杂乱无章和含糊不清。因此关于这一问题，根据今年12月10日我与莫洛托夫同志在电话交谈时所发表的意见，我想向您补充解释促使我不参加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候选人提名的主要原因。

毋庸置疑，对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特别是在在最近确实犯下的错误，应进行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

我认为，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也是我认为最正确的方法，即对于我曾经发表过的错误观点，或者在讨论某些问题时，在与同志们争论时，没有正确地表达出来的自己的思想，原则上只在党的机关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这种场合只限于党的两个机关——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这种方法使我有可能在辞去总书记职务后继续留在政治局，显然，这种方法已经被否决。

还有另一种借助其可能会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也是

① 在1948年7月6~7日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31日至9月3日举行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因其所谓的“右倾—民族主义倾向”而受到极为严厉的政治批评和指责，并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但其仍然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即将合并，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征得苏联同意，决定在确定未来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名单时，仍然保留哥穆尔卡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哥穆尔卡对此表示拒绝，并在同斯大林谈话时直接表明了这一态度。1948年12月16日，当时哥穆尔卡的这封信尚未到达莫斯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便通知贝鲁特：“根据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话得出的印象，我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即直到现在他并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因此才拒绝参加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得出结论，哥穆尔卡同志对党的态度及其是否真诚尚需继续进行考验”。接到这封信时，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合并大会正在召开（1948年12月15~21日），于是，莫洛托夫立即于12月19日向贝鲁特发出指示：“最好将哥穆尔卡留在中央委员会，但不参加政治局。党并不会因此而失败，反倒会胜利”。

政治局选择的方法，即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带有明显的扩大化的倾向），在全党面前将我当成被告人。尽管我所发表的不正确的和错误的观点仅仅是在党的最高机关里，况且我的错误原则上并没有破坏我党的总政治路线，但政治局和普通党员仍然对我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这导致了（不可能不导致）我的精神崩溃，破坏了我的威信，使我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重返党的领导岗位。

我无意批评政治局在选择第二种方法问题上的决议。也许这种方法比较容易将党引导到新的政治道路，在统一代表大会之前实现波兰社会党的决定性转折。但政治局在选择这种方法时应当认识到，此举会将我从党的领导人中间一笔勾销。

这就是使我不能同意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选举时提名我为候选人的第一个原因。

我在同您谈话时已经声明，我今后仍然不同意我党八月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的第5条。^①我在这次中央全会上第一次进行自我批评的发言中已经提出了自己反对决议第5条的理由。这次自我批评被认为是很不充分，许多同志对我就决议第5条的态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从某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发言中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打算客观地分析波兰被占领时期的形势（这对恰当地评价当时党的领导人的政治行动是必要的），他们抱有另外的目的，即全盘否定我在当时担任总书记期间所进行的活动。也许这是选举党的新任总书记，或者是选举统一工人党主席之前所需要的。

在八月全会上，事实上我面临着如下选择：或者我承认决议草案第5条对我的错误的提法，或者我不承认它，从而表明我不同意党的决议，企图破坏党的队伍的团结。明兹同志的发言特别明显地

^① 指哥穆尔卡对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统一代表会议协同行动问题上的立场。参见本卷本专题No09135、No09136文件。

表现出这一点，况且他是在大会的第一天代表政治局发言的，并给所有的讨论定下了调子。根据政治局的意图，在八月中央全会上，我已经丧失了对自己在波兰被占领期间立下的任何功劳进行辩护的权利，我不想向任何人提供我企图分裂党的任何口实，所以被迫承认了决议第5条所包含的指责是正确的。

八月中央全会过了几天，在华沙举行的全波兰党的骨干分子大会上曾指责我企图将波兰的政权拱手交给伦敦流亡政府，其结果是将把为共产党人准备的大量绞刑架运回波兰，这一指责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诬蔑性的蛊惑人心的举动没有受到参加这个会议

进入党的政治局一级机关的委员，对党的政策的完整性，对党评价其历史和过去（被占领时期）共同担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我不能不对八月全会决议的第5条表示自己的否定态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对党及其领导层的团结造成混乱，并带来有害的后果。

这就是我不允许被提名成为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候选人的第二个原因。

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了解我对党关于犹太族同志的政策的态度。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和与政治局委员个别谈话中也多次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从民族观点来看，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机关的人员构成对我们基础的扩大造成了不利的障碍，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还有农村，但首先是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有如此高比例的犹太人^①，也确实可以把它看成是我的责任，但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错误首先应当由犹太族同志承担。身为党的总书记，我关于党应该贯彻的干部政策的看法不仅没有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而且在经常性的实际工作中，他们也没有按照我的看法去做。这样一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真相，即完全是由于波兰族党的干部的严重缺乏，导致无法实行有别于现行干部政策的另一种政策。如果党不创造合适的环境，也就是不从它所掌握的环境中把最能干的同志提拔到关键岗位，那么干部将永远不会成长起来。

经过多次观察，完全可以负责地说，部分犹太族同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波兰人民以及波兰工人阶级之间有丝毫的联系，或者可以说是站在了民族虚无主义的立场上。所有这些因素，在选拔各种高级职务的人员时并未引起充分注意。

我掌握了大量的事实，表明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机关中，领导干部的如此现状引起了许多人的焦虑和不安。与此同时，在党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09222文件。

内，特别是在八月全会以后，出现了谁也不敢批评现行干部政策，只能在私下里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

我深信，我在党的民族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观点，尽管不是公开地，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解决党的领导层最近一场危机的形式和方法，我也不怀疑，如果我继续留在政治局里，事情一定会发展到这一步，即由于我关于党政领导机关中民族干部的观点，会导致我与某些政治局委员之间产生新的分歧和争议。我认为，不仅必须制止犹太人在党政机关的比例继续提高的势头，而且还要逐步缩小这个比例，特别是在高级机关。根据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积累的经验，我相信，在我目前所处的条件下，如果不迎击那些旨在“结束”我在党内工作的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活动，那么我在这方面将寸步难行。而只要我还是政治局委员，我就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这就是我不能和不应当留在统一工人党政治局的第三个原因。

政治局在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时所采用的某些做法，至今仍使我难以忘怀，我很难想像政治局还会保持经常性的步调一致和真诚合作（同时还应当记住，早在今年6月，我已经在政治局或与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主动要求解除我的职务）。回顾一下政治局所选择的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的方法和方式，我很难理解，也很难明白政治局对我采用这些方法的目的何在。例如，今年8月上旬，以贝鲁特同志为首的三名政治局委员建议我和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去找您——斯大林同志。当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带着这一目的来到当时住在波罗的海海滨的政治局委员同志们的住处时，他们又建议我批准为党的八月中央全会准备的决议草案，并同时向我宣布，已经没有必要去找您了，因为政治局委员已经就解决党的领导层的危机问题与您达成一致了。类似的事实还有很多，只要回忆一下对我指责的例子就足够了：非难波兰工人党前总书记帕威尔·芬

德尔^①；贝鲁特同志在波兰被占领期间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信；贝尔曼同志声称，还在1944年，当他抵达卢布林之后，贝鲁特就告诉他，由于我担任总书记时所执行的错误政策，党在波兰被占领时期就面临着分裂的威胁；八月全会之后，政治局告诉我，只向波兰全国代表会议传达我在波兰全国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上所做的自我批评的发言，而实际上他们在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的情况下，在报刊上还公布了我在八月全会上所有自我批评的发言，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这样的方法只能用于极力与党作斗争，并企图分裂党的队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人身上。可我不是这样的人，对此，党的政治局是一清二楚的。

这样的方法不可能不给我留下痛苦的回忆。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它们使我无法直接面对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畅所欲言。我不希望在任何时候把我的每条意见再次拿去公开讨论，这些意见在讨论各种问题时总会出现。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心地把自己认为错误的事说成是“正确”的，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说成是“错误”的，不会不分场合地永远高喊“是”。

这就是不同意提名我为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的第四个原因。

此外，过去党的工作，特别是最近的事态，损害了我的神经系统。在我目前身体的状况下，考虑到最近事态造成的自我感觉，我也无法担负起党的领导工作。

这是迫使我坚持这一观点的补充理由。

* * *

我出身于工人。我为劳动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忠诚地为自己

^① 1943年11月27日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帕·芬德尔被盖世太保逮捕，随后哥穆尔卡出任了波兰工人党新的领导人。

的阶级和自己的人民服务了一生。

我一向视苏联为波兰最好的朋友，视联共（布）和您——斯大林同志为我党的英明导师。

无论我今后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将永久忠于此前我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

衷心感谢您为我花费了对您来说宝贵的时间。请您正确地理解我在同您直接谈话和在此信中努力表达的我的观点。

瓦·哥穆尔卡

1948年12月14日于华沙

又及：由于我没有信得过的翻译，只好将这封没有翻译成俄文的信寄给您。

【专题说明】

苏联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

(1944年11月至1948年11月)

本专题选编的44件档案，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稳固地掌握政权期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以及苏捷关系的状况。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在奥匈帝国解体的基础上于1918年建立的。1939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德国侵入苏台德区，并于次年3月占领和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战争期间，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在莫斯科成立了党的国外领导核心，与留在国内的地下中央委员会共同组织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武装斗争。而以共和国总统贝奈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则在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并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也参加了民族抵抗运动和民族阵线。1943年12月贝奈斯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苏捷友好和战后合作条约》，并同捷共领导人讨论了战后安排问题，原则上同意捷共提出的关于人民民主制度的构想。1945年3月捷流亡政府与捷共领导人在莫斯科就战后政府组成和施政纲领等问题再次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4月4日在斯洛伐克东部的科希策市正式建立政府，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费林格出任总理，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以及3名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担任副总理。尽管在25名政府

成员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只占9名，但内务部、新闻文化部、国防部等要害部门均掌握在共产党或亲共产党的无党派人士（斯沃博达）手中。次日通过了政府施政纲领，即体现了捷共关于人民民主制度和民族民主革命的科希策纲领。

战后捷共组织迅速发展，其党员人数从战前的8万人发展到250万人（1948年），这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大选中的竞选力量。在1946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37.94%的选票和38%的席位，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大党，哥特瓦尔德出任政府新总理。此后，反对派的力量也有迅速增长，并因法共、意共被排挤出政府和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而受到鼓舞，反对新政府关于加强国有化经济成分、限制资本主义成分、扩大与苏联的经济联系的“建设纲领”，甚至公开抵制征收财产税和超额利润税的特别法令。尤为严重的是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右转，1947年11月的代表大会上，右翼领导人劳什曼取代费林格担任该党主席，并否定了费林格同捷共达成的联合行动的协议。与此同时，1947年夏季发生的特大旱灾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斗争的激烈局面。终于爆发了以1948年二月事件为特征的联合政府危机。2月初，捷共关于国家统制对外贸易、扩大工业国有化、加速实现大土地改革、合并全国银行等要求在议会遭到否决，而政府会议却通过了大幅度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的议案。接着，民族社会党突然指责由共产党掌握的内务部和警察部队滥用职权，政府特别会议甚至通过决议，责成内务部长取消关于布拉格警察部队8名区队长撤职的命令，暂时停止警察部队各级军官的调动。2月20日，12名部长因内务部长不执行政府通过的决议而拒绝出席哥特瓦尔德召集的政府会议，并向贝奈斯总统提出辞职——其结果可能导致因多数部长辞职而解散政府。对此，捷共一方面积极开展议会斗争，对社会民主党左派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分反对派做说服和瓦解工作，拖延辞职行动；一方面迅速采取议会外斗争手段，紧急动员各级党组织在群众中建立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加强工人纠察队，清除各政府机构和党派中的反动分子。同时

组织罢工和群众集会，向总统施加压力。22日，内务部对民族社会党官员进行了广泛的搜查和逮捕，警察部队紧急动员，封锁与西方国家的边界。次日，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宣布站在共产党一方，主张清除破坏分子。在此期间，苏联副外长佐林也飞抵布拉格，表示了莫斯科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分子活动不安和不满的立场，要求捷政府必须更加向苏联及其斯拉夫盟国靠拢。在这样的压力下，贝奈斯被迫接受了12名部长的辞职，并按照哥特瓦尔德的提议，任命了民族阵线新政府。

二月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出现了重大变化。1948年5月9日，议会根据捷共新施政纲领的精神修改了宪法，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将建成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并保证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贝奈斯于6月7日辞去总统职务，哥特瓦尔德继任总统，捷共政治局委员萨波托茨基担任总理，共产党在政府中占据了绝对优势。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实行合并，大约20%的原社会民主党党员转入共产党。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各政党和群众团体中反动分子的清洗运动，致使一年内流亡国外的人员达45万之众。至此，捷共在国内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

这里刊出的档案，揭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的政治变动中，苏联党和政府的考虑及其参与的大体情况。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张廷文、
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张木生、方琼）

№09156

哥特瓦尔德
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入苏联
给普罗霍兹卡的复电
(1944年11月21日)

普罗霍兹卡^①：

现答复您的问题，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对外喀尔巴阡乌克兰要求并入苏联的立场。^②

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

在目前条件下必须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提出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与苏联合并的问题，目前有可能削弱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力量，并给共同的事业带来危害。

2.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不反对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人要求并入苏联的愿望，但同时认为只有在战争结束之后才能提出全民公决的问题。

哥特瓦尔德^③

1944年11月21日于莫斯科^④

① Я. 普罗霍兹卡上尉，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政工人员。

② 1944年11月上旬，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并入苏联。

③ 克·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

④ 该复电曾征得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季米特洛夫同意，并提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批准。

№09164

佐林与费林格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谈话纪要

(1945年1月4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归档。

绝密

摘自佐林的日记

今天23时，我应费林格^①的要求会见了。费林格告诉我说，他收到贝奈斯^②的电报。贝奈斯在电报中介绍了他与奇恰耶夫^③同志1月1日谈话的内容^④，并说他（贝奈斯）就与波兰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事宜已发表了看法，其基本精神已经体现在他发给费林格的指示里，大使应以此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商谈。

我请费林格详细说明贝奈斯对费林格的指示究竟是什么。

-
- ① 费林格，时任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
- ② 爱德华·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活动家，战前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战时流亡国外，1946~1948年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 ③ И. 奇恰耶夫，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参赞。
- ④ 奇恰耶夫从伦敦通报，贝奈斯于1945年1月1日向他保证，当苏联承认波兰政府时，他会自动提出这个问题。既然现在宣布在卢布林建立波兰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自然会正式承认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也有自己的利益和与波兰的争端问题。因此，贝奈斯希望在承认的同时与波兰政府在某些政治问题上，例如关于波兰对于慕尼黑协定的态度等问题上达成协议。

费林格提醒我注意他在1月2日谈话中表达的立场。^①

我告诉费林格说，据我掌握的总统与奇恰耶夫谈话的内容与费林格1月2日与我谈话中坚持的立场有所不同。我向他指出，贝奈斯在承认波兰临时政府问题上没有提出任何先决条件。他认为在苏联政府承认波兰临时政府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自动予以承认；在承认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想明确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相互关系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在特欣问题上的态度。^②

费林格同意我的观点，说贝奈斯的这一立场与他1月1日之前发给费林格电报中所表达的立场有所不同。费林格由此得出结论说，看来贝奈斯受后续事态的影响，特别是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成波兰临时政府这一事实本身的影响，在承认波兰政府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费林格又补充说，贝奈斯关于同时解决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有争议问题的说法，看来波兰临时政府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间需要就捷克斯洛伐克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事先达成某种协议。

我说，我认为根据贝奈斯的讲话，并不一定是非要事先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而只是打算友好地进行讨论。但是费林格坚持

① 费林格1945年1月2日通知佐林：贝奈斯建议，在承认波兰政府之前应该首先与其代表交换意见，并弄清楚，波兰是如何看待慕尼黑协定之后的领土变更的，尤其是特欣西里西亚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离出来的问题。贝奈斯还建议他弄清楚苏联政府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这一立场的态度。

② 1938年秋天，波兰利用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机会，迫使捷政府同意将扎奥里季亚-特欣西里西亚的一部分领土划给波兰。当时特欣领土的80%以上是波兰的组成部分。1945年初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表示，希望波兰临时政府宣布不承认慕尼黑协定，以及后来的领土变更，其中包括特欣西里西亚问题。1945年1月23日在莫洛托夫处举办的招待会上，波兰总理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表示，为了公正地解决特欣西里西亚问题，应该进行公民投票，而关于在波兰人和捷克人之间分配特欣西里西亚领土的问题的解决，应取决于这个州的波兰人和捷克人居民之间的比例。

己见，并证明特欣问题对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巨大的原则意义和实际意义，因为抢占特欣州无疑是波兰进行侵略的事实，抢占了这个州就等于抢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煤炭。

对此我没有争辩。

在后来的交谈中，费林格多次强烈要求我们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与波兰人解决特欣西里西亚问题，希望波兰人发表一个关于他们否定在慕尼黑协议之后的侵略行为的声明，以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感到满意。就此费林格声称他受贝奈斯的专门委托，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他们解决与波兰临时政府的关系。

费林格问我，我就此可以提出什么建议。

我说，我认为，与波兰的相互关系，以及解决特欣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与波兰人直接谈判的事，并补充说，我们只对波兰临时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实现完全和解，建立完全友好的关系感兴趣，而且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不应该同解决它们之间有争议的任何问题联系在一起。

费林格问我，他前往卢布林与莫拉夫斯基会谈是否有意义。我回答说，这将取决于拟议中的会谈是什么性质。如果是为了直接解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认波兰政府这个问题，并为了这一目标专程前往，我个人没有看到有什么理由反对此行。

费林格补充说，问题很清楚，此行还应当谈谈捷克人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波兰人对特欣的立场。

然后费林格问我，他是否值得再次与奥尔谢夫斯基会晤，向他介绍贝奈斯在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立场上的进步。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应当由他决定。但我个人认为，朋友之间应当保持紧密联系，特别是即将做出涉及双方的重要决议之前。费林格说，他明天就去拜会奥尔舍夫斯基，向他通报在承认问题上的新消息。

最后费林格又谈到他收到贝奈斯的电报，说贝奈斯打算在最近

一两个月内回到解放区，途中将在莫斯科停留，并就一些问题举行谈判。我说，据我们得到的情报，贝奈斯已经说过就在这个月内回国，更加确切地说是1月底。费林格就此推测说，看来贝奈斯最近几天可能收到了关于事态发展的大量情报，所以决定加快回国的准备工作。

从整个交谈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贝奈斯在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上正在举棋不定。他考虑的不仅是自己政府的对外政策立场，还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流亡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看来，在贝奈斯发给费林格以及很快将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大部分成员知道的正式指示中，他还保持着比较克制的立场。贝奈斯在与奇恰耶夫谈话中竭力表明，他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愿意与我们合作，并准备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承认波兰临时政府。从另一方面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波兰临时政府，明显地对贝奈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特别是从我们方面结合承认波兰政府，看来有可能促使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朝同一个方向迈出比较坚定的步伐。

谈话结束时，我把我们收到的斯沃博达将军^①的电报内容告诉了费林格。电报说尼耶德利教授的儿子身患重病。费林格说，尼耶德利一家得到这个消息后一定会十分沉痛，他将尽力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家里。

外交人民委员会第四欧洲司司长 瓦·佐林

1945年1月4日于莫斯科

^① 斯沃博达，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地下武装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后率部投奔苏联，1944年任在苏联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第1军团司令。

№09166

佐林与费林格
关于同匈牙利进行停战谈判的
准备情况的谈话纪要
(1945年1月9日)

秘密

摘自瓦·安·佐林日记

今天22时，我会见了费林格，并遵照B.Г.杰卡诺佐夫同志的指示告诉他说，我想以非官方的方式向他通报关于同匈牙利进行停战谈判的准备情况及停战协定的草案。我把协定的文本交给了费林格并告诉他，该草案还没有经过三国政府充分协商，只是表明苏联对同匈牙利进行停战谈判的条件的态度。尽管如此，考虑到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关系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涉及匈牙利的问题的关心，我们认为有必要现在就以非官方的方式把我们起草的协定草案告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费林格对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友好态度表示感谢，并对停战协定草案中是否体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愿望表示关心。我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主要愿望在这份停战协定草案中得到了反映，并提请他注意草案的第2、4、6、12、和19条。费林格当着我的面阅读了上述几条，对这几条的内容表示满意，并且问道，草案中是否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确定匈牙利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作

战的具体日期和关于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迁移的愿望。

我回答说，与其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这些愿望写入未来的和平条约，不如列在停战协定的条件里。再说，迄今为止（同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签署的停战协定的条件中都没有反映这些问题。费林格问，今后可能以什么方式准备这一协定。我回答说，协定的文本经三国政府协商后将正式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以便同这两国政府进一步磋商，之后将最后商定的文本交给匈牙利政府。

费林格说，他准备把我对他所说的一切向本国政府报告。但是他提请我注意，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特别关注的是，明确将匈牙利人迁出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权利和匈牙利政府接受这些移民的义务，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可能会因匈牙利人自己不得不迁往匈牙利且处境艰难而变得复杂起来。

然后费林格告诉我说，他已经给贝奈斯发去一封电报，很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尽快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目前他正在等待对这封电报的答复。他还问我知道不知道莫拉夫斯基^①打算同他会晤。我回答说，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消息。

持续 25 分钟的交谈到此结束。

第四欧洲司司长 瓦·佐林

1945 年 1 月 9 日于莫斯科

^① 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全国人民会议主席，后出任波兰政府总理。

№09170

费林格关于同匈牙利签订停战协定的 条件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5年1月27日)

分送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

秘密

尊敬的人民委员先生：

荣幸收到您今年1月20日的来信，感谢您告知我关于今年1月15日在苏联、不列颠和美国代表团之间的会议上就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政府关于同匈牙利签订停战协定条件的建议问题所做的决定。^①

这次会议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同匈牙利签订停战协定和盟国管制委员会成立以后，有必要向匈牙利派遣自己的代表，在盟

① 在1945年1月9日给佐林和1月15日给莫洛托夫报告中，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认为，必须在协议中加入以下条款：“原来拥有后来又被剥夺了捷克斯洛伐克国籍的匈牙利人，匈牙利将承认他们的匈牙利国籍，并允许其入境。自他们越过国境线之时起，匈牙利将关心他们，并考虑对他们的安置工作”。还建议将废除关于涉及匈牙利吞并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的一切立法的和行政的条款列入协定，并明确，捷克斯洛伐克自何时起进入与匈牙利的战争状态。此外，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允许其代表加入同盟国管制委员会，使它能够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利益，以便在涉及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问题上，与盟国更好地合作。在签署停战协定时考虑了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最后两个建议。苏联方面建议推迟研究关于匈牙利人迁移的问题，并将它与签署对匈牙利和平条约联系起来。

国管制委员会的监督下了解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这一决定表示满意，一定会及时派出自己的代表。

同时，我受委托向您，人民委员先生，对贵国政府有效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签订同匈牙利停战协定方面的所有愿望表示感谢。

此致崇高的敬意。

兹·费林格

1945年1月27日于莫斯科

交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先生
莫斯科^①

^① 文件上有批注：“给阿布拉莫夫和拉夫罗夫同志。1. 请编制复函方案。2. 请与法律处商议——是否应该将停战协定副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大使。B. 杰卡诺佐夫。1945年1月30日”。

№09171

维辛斯基与费林格关于贝奈斯前往 捷被解放领土及特欣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5年2月16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杰卡诺佐夫，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摘自安·亚·维辛斯基日记

应费林格的请求，我在今天16时会见了。费林格通知说，贝奈斯总统决定最近离开伦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被解放领土。同时，贝奈斯决定此行途经莫斯科稍作停留，以便有可能同苏联政府讨论一系列紧迫的政治问题^①。此外，贝奈斯还打算会见在莫斯科的某些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活动家，以及会见斯洛伐克民族议会^②的议员们。贝奈斯请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在他离开斯洛伐克被解放领土作短暂停留时给予协助。贝奈斯打算同这些人讨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组成问题。费林格补充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老班

① 苏联驻英国大使古谢夫在与贝奈斯和马萨利克交谈之后，立即向莫斯科通报说，贝奈斯建议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元帅讨论苏捷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他希望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组成以及立即返回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公布新政府的成员方面听取斯大林的忠告。

② 这里指的是斯洛伐克最高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下同。该委员会是1943年9月为领导抵抗运动而成立，其组成有两个政治党派：共产党和民主党。

子不可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据费林格说，与贝奈斯同行的有总理什拉梅克、外交和国防大臣马萨利克以及大约 20 名总统的工作人员。

我回答说，苏联政府会很高兴接待贝奈斯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并给予他力所能及的协助。我补充说，最好让大使馆的某个工作人员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司取得联系，预先讨论与总统此行有关的所有细节问题。我问，贝奈斯打算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选择什么地方作为临时首都，费林格回答说，目前选择的是科希策市。据费林格说，总统定于 2 月 24~25 日离开伦敦，因此贝奈斯预计在 3 月初抵达莫斯科。

费林格答应把贝奈斯此行有关的细节问题另行通知礼宾司。

然后，费林格谈到关于红军在西里西亚地区和斯洛伐克迅速推进的问题。他预测说，红军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抵近摩拉维亚的奥斯拉瓦，并进入特欣州。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关于特欣州的归属及其行政机关和管理的问题。费林格解释说，因为在这一地区推进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司令部中没有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又因为斯沃博达将军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现在列入乌克兰第 4 方面军的编成，所以可能有必要向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部派遣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委托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在特欣州被解放的领土上组建行政机关。但是，考虑到特欣问题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波兰政府之间有争议的问题，费林格请求苏联方面予以协助，以消除该地区的争端，并希望在涉及占领该州的某一地区的命令中提到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

我说，这个问题必须考虑考虑，找出我们的双方朋友——捷克人和波兰人都满意的解决办法。

费林格补充说，卡尔维纳市作为特欣州的煤炭中心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尤为重要。同时，按居民人口来说波兰人占大多数的特林

茨市，显然将会引起波兰人的特别窥视。众所周知，正如特欣市一样，特林茨市也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各占一半。作为个人见解，费林格表达了自己的推测：如果在特欣市以外另修一条通过捷克领土的铁路，作为对通过特欣市的重要铁路的补充，那么就可以把整个特欣市交给波兰人。我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讨论，我会把他的意见报告政府。

费林格补充说，因为红军推进的速度相当快，所以他希望这些问题尽快解决。

交谈持续了25分钟。佐林同志参加了接待。

安·维辛斯基

1945年2月16日于莫斯科

No 09174

哥特瓦尔德
关于贝奈斯谈判的准备情况
给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的报告
(1945年2月23日)

今年3月初，贝奈斯总统同几位来自伦敦的其他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将抵达莫斯科。他们抵达后，我们、贝奈斯和斯洛伐克人的代表之间将就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问题进行谈判，并在贝奈斯抵达被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时宣布新政府成立。我们认为这次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在准备提出自己的建议。

根据贝奈斯和我们之间对新政府成立问题预先交换的意见，并根据我们对在组建新政府时可能被注意的人的了解，我们草拟了新政府的结构和组织的第一个方案（附上^①）。

根据这一方案，新政府应由20人组成，其中捷克人14名，斯洛伐克人6名。新政府就其组成而言，应当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阵线的政府，并联合所有主要的政治集团，它们是：

捷克方面：捷克共产党人（3名代表），捷克社会民主党人（3名代表），捷克社会党人（3名代表），捷克天主教徒（2名代表）和3名捷克无党派活动家，共计14名捷克人。

斯洛伐克方面：斯洛伐克共产党人（3名代表）和斯洛伐克公民民主党人（3名代表），共计6名斯洛伐克人。在去年的起义期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

间，斯洛伐克的各政党进行了联合。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组成了共产党。斯洛伐克的民主派分子由原来的几个政党联合成一个新的政党——斯洛伐克公民民主党。这两个政党建立了竞选联盟并领导着斯洛伐克民族议会。

我们提出的新政府的核心是所谓的“城乡劳动人民民族联盟”，在捷克方面，它由3个政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捷克社会党人（贝奈斯的党）组成，共有9名代表。斯洛伐克民族联盟（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和斯洛伐克公民民主派）可能加入这一联盟，共计6名代表。因此，“城乡劳动人民民族联盟”可能有13名代表，其中6名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人。

在组成新政府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政府中有在伦敦的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我们认为，现伦敦政府的10名成员中有5人可能参加新政府，这5个人对于贝奈斯来讲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预计的这些新政府成员中，在战争期间有8人在英国，6人在苏联，6人在斯洛伐克。

至于捷克境内的地下工作人员，无论是我们或是贝奈斯都说不出候选人的名字，所以我们认为，捷克解放以后政府可能会改组。

我们在制定我们的方案时，并不知道贝奈斯本人对政府人员组成会提出什么意见，但是我们基本上认为，我们的建议是同贝奈斯

谈判的合适原则。^①

附上关于新政府结构和组织的建议以及非共产党人候选人的简要情况介绍。^②

同时我们请求尽快为我们提供口头讲述全部事情的机会。

哥特瓦尔德

1945年2月23日于莫斯科

- ① 哥特瓦尔德的草案规定成立政府主席团，由一名总理和他的助手——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各政治党派代表组成。这个机构应该研究制定政府总体政策的法令，领导它的活动，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监督使各部门工作符合政府的方针，主持政府会议并确定会议日程。此外还规定建立三个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由财政部、工业部、贸易部、农业部、粮食部、交通部，以及国家计划和统计管理局组成；军事委员会——由国防部长、武装力量总司令、总参谋长、内务部长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主席组成；国家监察机关——政府监督国家财经和各主管部门的工具，并为国家行政机构的统一核算制定法令。在1945年3月进行谈判过程中，对哥特瓦尔德的草案进行了很大的修改：政府主席团的组成中扩大了一名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成立了对外贸易部，在国防部、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建立了部长助理（国务秘书）制。哥特瓦尔德提议的职务划分也做了改动：确定由诺赛克取代斯兰斯基（侨居伦敦的共产党人）担任外交部长，民族社会党人里普卡被任命为外贸部长，社会民主党人马伊耶尔任供应部长，以取代斯洛伐克民主党主席列特里赫，联络部转归卡拉（人民党），运输部由卡扎尔将军领导，以取代成为总理助理的希罗基。
- ② 即关于费林格、什罗巴尔、什拉梅克、达维特、斯沃博达、马萨利克、斯特兰斯基等人详细的政治简介材料。在所有这些的被列出的政治家中，评价最不好的是马萨利克，认为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西方目标的疯狂保护者。但1945年3月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了驻英国的苏联大使迈斯基对马萨利克的评语，认为马萨利克是一个对苏联充满了友好感情的人。

№09180

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共制定的政府纲领 草案给联共（布）中央的附函

（1945年3月10日）

现将捷克斯洛伐克新政府的纲领草案初稿寄给你们。该草案应成为就成立这一政府问题进行谈判的政治基础。谈判可能在下一周贝奈斯总统抵达莫斯科时开始。对于提出的草案，我们附上几点意见。

一、可以看出，纲领中对某些问题阐述得过于详细，这是我们方面有意这样做的，为的是迫使贝奈斯和我们的其他伙伴不仅对某些问题谈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使这些意见具体化，对某些事情承担责任。

根据自身的经验我们知道，他们对总的提法是会表示同意的，但是在最后确定措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更多地对某些提法提出怀疑。我们想尽可能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以尽可能具体的内容充实政府的纲领。

二、从贝奈斯的谈话判断，我们在政府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会被贝奈斯接受。

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可能是下列问题：斯洛伐克问题（第5章）；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第6章）；关于惩办叛徒和投敌分子（第8章）。

三、我们已将本草案的内容向在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大使和劳什曼议员进行过详细介绍，他们俩将参加谈判，并有可能

参加未来的政府。他们同意我们的草案。

我们认为，我们也会得到所有斯洛伐克人的同意，我们会顺利地提出这一纲领。它不仅将成为共产党的纲领，而且将成为整个联盟的纲领，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都会写进这一纲领中。

四、我们还想在纲领中专门补写一章，阐述政府关于建立新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纲领性路线。此事计划在同亲近我们的军官们协商后进行。已经同斯沃博达将军进行过协商，他支持我们的共同路线；我们已同他达成一致，为清除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反动的反苏领导人（指英格拉将军及其同党），为形成忠诚、民主、亲苏的领导而共同斗争。

五、政府纲领草案目前尚处在讨论阶段，还需要在我们的同志从斯洛伐克和伦敦抵达后进行详细审议，最后以书面形式向我们的伙伴提出。

致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敬礼

哥特瓦尔德

1945年3月10日于莫斯科^①

^① 收集的文件中没有该草案。据俄国的有关资料，对纲领草案提出意见的人有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和佐林。苏联方面认为，在最终确立中央政府之前，不应在选举和召开临时国民大会等程序上花费过多时间；在对外政策的描述上不应表露过分的感情色彩，需增加与西方盟国友好的内容；应明确提出未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形式，即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消除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等等。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正式纲领中，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

№09182

莫洛托夫与贝奈斯
关于捷战后边界、居民和
经济形势等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5年3月21日)

秘密

参加会谈的有安·亚·维辛斯基、瓦·安·佐林、扬·马萨利克和兹·费林格。

贝奈斯说，他想按照早先寄给我们的问题清单阐述自己对下列问题的观点：

一、边界问题

贝奈斯提醒说，他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全体成员总是用“维持慕尼黑条约以前的边界”这一说法来表达自己的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他曾经让英国人以书面形式表明他们对这一说法的态度，但是英国人长时间犹豫不决，尽管在1942年8月2日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不承认慕尼黑条约，并在确定边界的时候不会依据慕尼黑条约。在贝奈斯离开前的三天内，英国人以书面形式表示了他们对维持慕尼黑条约以前的边界的态度，向前迈出了一步。他们写道，在德国投降的时候，他们同意把属于慕尼黑条约以前的边界的领土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监管。贝奈斯坚持像在同匈牙利缔结停战协定中所做的那样确定划定这些边界的日期。英国人同意维持1937年12月

31日划定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他们想把自己的承认边界的说法提交在伦敦的欧洲协商委员会^①讨论。贝奈斯答应转交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声明文本。

莫洛托夫问，贝奈斯是否希望得到超出1937年划定的边界的某些领土。

贝奈斯回答说，他有点希望得到同德国接壤的那个州，但他没有展开这个话题。贝奈斯希望苏联政府在欧洲协商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二、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迁出捷克斯洛伐克

贝奈斯说，他在大约一年到一年半以前同英国人讨论过这一微妙的问题。英国人对德意志人必须迁出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意。军事内阁正式通知我们说，它同意让德意志人迁出，但这一声明是口头通知我们的，英国人对以书面形式做出这种声明犹豫不决^②。英国人的担心在于：第一，这不仅涉及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涉及波兰，而且这个问题从总的来讲涉及700万~800万德意志人的移居。第二，不知道迁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德意志人去往何方，因为已经规定了4个德国占领区，不知道哪个占领区可以安置迁出的德意志人。

贝奈斯认为，不实行移居就不能解决波兰问题和捷克斯洛伐克

① 欧洲协商委员会是反希特勒同盟主要参加者的常设机构。根据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于1943年成立。1945年9月前一直在伦敦活动。

② 贝奈斯的这一判断于1945年4月11日得到证实。英国驻美国大使克尔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说，他的政府对于贝奈斯在返回布拉格之后公开做出的关于将德国少数民族迁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打算感到非常担心。在与贝奈斯交谈时，英国方面坚持强调，苏联、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协议。克尔向莫洛托夫表示，英国政府希望贝奈斯总统不要采取过急的行动，以免使问题激化。

的国内问题，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将会爆发内战。英国人通知说，他们期待苏联政府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他们不认为这是个简单的问题。

莫洛托夫问，为什么英国人不想现在更明确地说出他们的意见。

贝奈斯说，英国人想知道苏联政府的意见，也可能他们希望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伦敦的欧洲协商委员会已经非正式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不会反对德意志人迁出。贝奈斯问莫洛托夫同志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对迁出德意志人的建议原则上持肯定的态度。但是目前应该提出实际的问题，有多少德意志人需要迁出，应该怎样迁出。贝奈斯对这个问题应当有所考虑。

贝奈斯说，他可以提出具体的移民计划。他认为，至少有200万德意志人必须迁出，看来，将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大约有80万。显然，德意志人中的所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要走，留下的是工人，他们将分散居住在捷克人中间。估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大约400万德意志人、将近60万匈牙利人，其中应该迁出的匈牙利人是40万。经验表明，一旦红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到来后，几乎所有的德意志人都会离开。贝奈斯告知说，他已经把有关这个问题的备忘录交给了英国人和古谢夫同志。

费林格强调说，在同匈牙利进行谈判时，莫洛托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极大的支持。

莫洛托夫指出，支持得还不够，因为他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议。^①

① 苏联方面对于将匈牙利少数民族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的建议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但是认为它应该属于和平条约里的条款，因此没有坚持将其列入与匈牙利的停战协定的文本中。

贝奈斯说，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同捷克斯洛伐克耍手腕。例如，在莫斯科同匈牙利谈判期间，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把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指示和建议寄给了克尔，而实际上并没有寄出。

三、外喀尔巴阡乌克兰

贝奈斯强调说，他想坦率地谈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在20年中，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彻底解决。在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提出对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要求，是美国人建议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全民投票的。1918年，苏维埃俄国的军队没有得到东加利西亚，而匈牙利得到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就可能会振奋起来。所以，捷克斯洛伐克认为自己是被迫把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再说它想保持同罗马尼亚的联系，并看到将来与苏联亲近是有前途的。捷克斯洛伐克认为自己是受委托管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并被迫接受了国际联盟的监督。这一切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红军解放这块土地以后，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①。贝奈斯和斯大林之间有过口头协定：1. 这个问题将由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友好解决；2. 选择适当的时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边界问题的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贝奈斯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贝奈斯回到布拉格时由捷克斯洛伐克议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会像贝奈斯提议的那样解决这一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经济的观点看，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讲永远只具有消极的作用。为了发展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经济，捷克斯

^① 1944年10月27日抵达外喀尔巴阡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全权代表涅姆茨与苏联军事当局发生了冲突，原因是当时苏联军事当局呼吁居民自愿加入红军。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认为苏联军事指挥部这样的行动违背了1944年5月8日的协定，而苏联方面以上述协定中未规定政府的全权代表的职能来论证自己的立场。

洛伐克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但是收效甚微。贝奈斯说，捷克人是最明智的，一旦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交给了苏联，捷克人就想签订条约，而在签订条约之前解决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边界走向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上居住有乌克兰人。贝奈斯认为，通过把居住在斯洛伐克领土上的乌克兰人移居出去并同住有部分斯洛伐克人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交换人口的途径，居住在斯洛伐克境内的乌克兰人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贝奈斯问，莫洛托夫如何看待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莫洛托夫说，这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可以就交换居民问题进行谈判。

贝奈斯补充说，在彻底解决问题时还应该解决投资问题。

莫洛托夫说，我国也有明智的人，所有问题都将得到友好解决。

四、被解放领土上的经济形势

贝奈斯首先说，有关战利品的问题尚有不明确的地方，请求明确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是盟国，自然应该和睦解决战利品的问题，首先是关于不动产的问题，它未必可以算作战利品。有这样的事实，苏联军事当局得到德国人或匈牙利人遗弃的工厂后就把这些工厂视为战利品，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则打算将这些工厂收归国有。

莫洛托夫指出，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建造了一些新工厂。^①

贝奈斯说，是这么回事，但仍然需要明确。

莫洛托夫同意具体研究这个问题并且说，在现在归属波兰的领

^① 当时德国在保护国领土上共计有 18350 家工业企业。其中有 1000 家是为躲避西方盟国的轰炸而从德国迁移出来的。

土上也有大量德国人建造的企业。苏联同波兰人达成了协议，把部分这种企业交给苏联，以便恢复供应军事需求的国民经济。如果德国人建造了新企业并运来了所需的设备，那么苏联也可以利用这些设备。莫洛托夫同志问，贝奈斯是否允许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贝奈斯说这不一定，应该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说，我们把捷克斯洛伐克视为盟国，我们不想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但是战争的法则要求，那些通过战斗、用士兵的鲜血换来的东西应当被视为战利品，把敌人赶出被占土地的人有权支配在战斗中缴获的财产。当然，盟军可以并应该分享缴获的东西，但是支配权仍然属于赶走敌人的人。接着莫洛托夫说，南斯拉夫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过摩擦，但是现在一切已经解决。

费林格感兴趣地问，是否同南斯拉夫就这个问题签订了什么协议。

莫洛托夫说，没有任何书面协议，但口头上达成了协议。

贝奈斯请求苏联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战利品有个说法，并且说，他希望同苏联政府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然后贝奈斯说，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斯洛伐克克郎和保护国的克郎，斯洛伐克人认为它们的面值各不相同，因此应该解决货币问题。有鉴于此，斯洛伐克人希望在斯洛伐克境内发行的捷克斯洛伐克货币在外表上应当同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境内发行的钱币有所区别。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不清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货币有什么建议，请以书面形式提出这些建议。

贝奈斯答应这样做。

然后莫洛托夫说，现在应该回到 1943 年 5 月 28 日关于金融问题的协议上，因为这一协议目前已经不符合由于苏军长时间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而形成的新的情况。应该重新审议这一协议，完全

取消第3点，因为在最终核算时永远不可能算清苏联战士在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斗争中做出的牺牲。

贝奈斯和费林格同意应该在考虑到新形势的情况下来起草新的协议。

五、匈牙利支付战争赔款问题

贝奈斯对苏联政府在同匈牙利的谈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且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能达成协议，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赔款的限额定为5000万美元。

莫洛托夫说，南斯拉夫人对他们从匈牙利所得到的赔款不完全满意，所以他建议同南斯拉夫政府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①

六、运输工具

贝奈斯接着说，本来应该就苏联初期对被解放领土的居民提供某些援助达成协议，他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不认为这种援助是无偿的，想就相互援助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如果波希米亚在战争结束后保持领土完整，那么捷克斯洛伐克就会迅速支付所给予它的所有帮助的费用。此外，目前斯洛伐克完全没有交通工具，多瑙河上捷克斯洛伐克的船只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

莫洛托夫说，在同罗马尼亚签订停战协定时说得很明确，盟国的船只在战争结束之前归盟国管制委员会使用。但可以达成协议，让部分船只移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使用。

维辛斯基解释说，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计划中没有提到哪些船

^① 在与莫洛托夫谈话中，铁托的代表赫布朗通报说，南斯拉夫向匈牙利提出赔款的限额为6.2亿美元。苏联方面认为，停战协定中的要求只是赔偿部分损失，而且实现这一点应该是在支付国经济不受到致命打击的条件下。

只闲置不用。

贝奈斯说，捷克斯洛伐克只能通过罗马尼亚与西方接触，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派出自己的代表前往加拉茨接收运输工具。第一艘轮船上将有某些可以运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货车。

莫洛托夫认为，这些具体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并要求提出具体的建议。

贝奈斯答应做到这一点。

七、今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组织

贝奈斯说，他在同斯大林大元帅交谈时，关于扩大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目前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此就有了同莫斯科和伦敦密切接触的问题。显而易见，应该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莫斯科和伦敦之间建立无线电联系。政府和军事机构还需要交通工具，需要有几架用于保持联系的飞机。

莫洛托夫说，需要什么应该考虑到军事环境，还应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处在红军的后方。希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对所有问题的要求，以便具体研究。

贝奈斯提交了捷克斯洛伐克请求解决的问题的清单（见附件）。^①

八、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相互关系

贝奈斯说，签订苏捷条约的时候保留了波兰加入这一条约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莫洛托夫说，如果波兰政府的改组拖延下来，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成为紧迫的问题了。

^① 收集的文件中没有该附件。

贝奈斯希望，同波兰的关系会比以前好的，他认为，如果苏联找到波兰加入条约的合适时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支持这一建议。

九、今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的政策

贝奈斯说，丘吉尔在同他交谈中赞成把德国划分为南部德国（有奥地利参加）和西部德国，并将普鲁士分离出来。

莫洛托夫说，划分德国的问题曾多次提出过，但是并没有解决。现在大家都同意这一想法，都想严厉地对待德国，但是还没有一个计划。

贝奈斯担心粉碎德国人以后又会同情德国人，对德国人产生好感。

莫洛托夫说，无条件投降的思想不是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支持这一思想并将始终遵循这一思想。波兰人应该得到直至奥得河和诺伊斯的德国领土。

贝奈斯说，他要是处在波兰人的位置上就不会要直至奥得河的德国领土，因为问题不在于可以得到多少领土，而在于能够保持多少。现在需要的是共同的斯拉夫政策。贝奈斯反对奥地利并入巴伐利亚，并对苏联将位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山脉的另一边，并成为匈牙利的邻国感到高兴。再过大约10~15年以后，西方国家也可能反对苏联，应该对此有所准备。

莫洛托夫同意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只希望世界和平。如果斯拉夫各国人民相互亲近，东方的安全就能得到加强。

贝奈斯认为，在旧金山，问题将更多地涉及大国，小国关心的是大国之间是否有分歧。因为如果大国争吵，小国所受的损害要大于大国之间取得一致时所受的损害。

莫洛托夫说，如果大国愿意诚恳达成协议，那么苏联也愿意这

样做，妥协的政策对小国也有利。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伙伴不愿意达成协议，那我们就要谨慎行事。我们比任何人都真诚地捍卫和平。如果我们的伙伴有争取稳固和平的足够意愿，那么他们会在我们这里找到忠实的同盟者。

贝奈斯认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应该依靠苏联。

莫洛托夫指出：“现在已经不再等待法国了吧？”

贝奈斯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应该统一斯拉夫各国的政策，使德国人不能再度成为威胁。

十、捷克斯洛伐克为在苏联境内的开支继续拨款的问题

贝奈斯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了支付行政和使馆开支需要一大笔钱。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向不列颠政府贷款 600 万英镑，向加拿大贷款 1500 万美元，美国也准备贷给一大笔款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如果有可能的话同苏联签订更为广泛的贷款协定，包括提供商品和现金贷款。贝奈斯强调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在互惠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因为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它能够付清欠苏联的款。

莫洛托夫认为，可以达成协议，按照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签约方式签署年度商贸协议。

莫洛托夫问，英国国内保持长期和平和同苏联合作的情绪强烈不强烈。贝奈斯回答说，丘吉尔无疑赞成这样做，但是丘吉尔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会谈持续两个半小时结束。

记录 瓦·佐林

1945 年 3 月 21 日于莫斯科

№09183

莫洛托夫与贝奈斯 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属和 经济援助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5年3月24日)

秘密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佐林，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利克，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费林格。

会谈于16时开始。

莫洛托夫同志说，他想讨论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问题。尽管贝奈斯已经不止一次就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问题发表过声明^①，但是苏联政府还想问一下，他在这个问题上要向苏联最高苏维埃说点什么。我们想从总统这里得到一些明确的东西。1939年以后，贝奈斯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某种特定的观点，在最近写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信中，他援引了1939年9月给迈斯基^②的声明。此后，他在同博戈莫洛夫^③的交谈中以及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不止一次重申了自己的声明。^④

① 贝奈斯声明的内容是，他力求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之间的边界，准备同意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划为苏联的组成部分。

② И. М. 迈斯基，时任苏联驻英国大使。

③ 博戈莫洛夫，时任苏联驻法国大使。

④ 贝奈斯曾于1943年12月12日与斯大林、12月14日和16日与莫洛托夫、12月18日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过会谈。

莫洛托夫阅读了迈斯基 1938 年^① 9 月同贝奈斯的谈话记录后问道，谈话记录同贝奈斯对迈斯基所讲的话是否相符。同时指出，谈话中涉及的有关苏维埃政权问题当然不属于现在讨论之列。

贝奈斯说，他现在无法准确说明这份谈话记录是否逐字逐句都符合他的声明，因为他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所作的谈话记录留在了伦敦。他可以准确证实的是，他历来强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苏联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就这块土地应该归属乌克兰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问题只不过在于采取什么程序把这块土地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我们知道，这件事不是今天应该解决的，但是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我们希望贝奈斯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出某种声明，这样苏联政府就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它对这一声明表示满意。莫洛托夫同志强调指出，如果贝奈斯同意，我们就提出这件事。

贝奈斯说，他在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中只是稍带说明了一下自己就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问题所做的不止一次的声明。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在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贝奈斯有两次提到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说得更明确一些。^②

贝奈斯问，在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声明中应该写进什么内容。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认为，这份声明应该像 1939 年的声明那样，指明希望同苏联有共同的边界，并且指明，愿意让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属苏联。

贝奈斯请莫洛托夫提出苏联方面认为合适的表述方法。

莫洛托夫说，贝奈斯自己完全可以表述得很好，再说对他来讲

^① 原文如此，疑为 1939 年之笔误。

^② 贝奈斯在 1945 年 1 月 29 日信中指出，对于 1939 年 9 月在与迈斯基谈话时所说的观点并没有改变，而且今后也不会改变。他还认为，关于外喀尔巴阡问题将不会成为某些争论以及大国干涉的目标。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他已经不止一次表明过自己的态度。

马萨利克问，这份声明要不要发表。

莫洛托夫说，当然不要，只需要我们之间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贝奈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同捷克斯洛伐克所有政党的观点是会完全一致的。他相信这一点，回到布拉格以后，他将提议做出这一决定并捍卫这一决定。他只不过希望苏联政府同意，目前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之间的边界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入苏联以后仍然是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

莫洛托夫同志说，边界应该仍然还是目前斯洛伐克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之间的现存边界的样子，这是毫无疑问的。

费林格解释说，贝奈斯所说的要批准这个问题决定的议会是指人民委员会，它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以后将立即召开。

贝奈斯强调说，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只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解决。

莫洛托夫同志对此表示赞同，并强调指出这样提出问题的重要性。

贝奈斯说，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并入苏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讲是重要的，这可以从两点来看，第一，苏联将成为匈牙利的邻国。第二，苏联将越过喀尔巴阡山脉。

莫洛托夫同志说，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无疑会更安静一些，更不用说匈牙利人了。接着莫洛托夫同志解释说，1944年9月霍尔蒂的代表来莫斯科时带来了霍尔蒂的一封信，信中说什么他并不知道莫洛托夫有过关于苏联不会对匈牙利人构成任何威胁的声明。为了证实这一立场，我们甚至同意停止进攻匈牙利，以便让霍尔蒂有可能把自己的军队引向布达佩斯。如果现在苏联同匈牙利交界，那么匈牙利人无疑会安静地呆在那里。

贝奈斯再次强调指出，从整个国家的安全以及从解决捷克斯洛

伐克的民族问题的观点看，确定共同的边界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莫洛托夫同志说，如果能够那样解决问题的话，就可以给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带来安宁，使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可以建立起一种信心。

贝奈斯问，应当以什么样的形式做出这种声明。

莫洛托夫同志说，可以给斯大林同志写信，斯大林同志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对信件做出回复。莫洛托夫同志问，要不要就这个问题签订某种协议。

· 贝奈斯和费林格说，最好以书信的方式。贝奈斯答应提供这封信。

然后贝奈斯说，他准备同本国的将军们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未来发展问题进行类似的讨论，并就这一个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想把形成的文件交给斯大林同志，文件中将阐述需要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并根据斯大林同志与他会谈中所说的那样改组这支军队。

莫洛托夫同志说，可以这样做。

接着贝奈斯说，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有人称之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有病的孩子）请我向苏联政府提出帮助尽快清除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人的问题，匈牙利军队占领斯洛伐克领土以后匈牙利人到了那里。

贝奈斯援引了同匈牙利签订的停战协定，其中有一点说到，匈牙利人必须立即撤除自己的行政机构，并让在慕尼黑条约以后进入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离开。

莫洛托夫同志问，这种人有多少。

贝奈斯回答说，大约有1万~1.5万人，尤其是在科希策。

莫洛托夫同志感兴趣地问，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贝奈斯回答说，是城市居民。他补充说，应该指示彼得罗夫元帅^① 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② 减少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的数量。

莫洛托夫同志答应查清这个问题。最后贝奈斯说，他想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馆建立一个可以每天研究关于向已被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提供经济援助的常设机构。

费林格指出，迄今为止，一些问题是由方面军司令部解决的，显然某些问题需要在莫斯科解决。

莫洛托夫同志说，只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援助，就可以决定由谁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贝奈斯说，他过几天就会提供已被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所需援助的详细清单，并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想无偿得到这种援助，只是希望就立即提供一些物资作为贷款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对所提供的一切支付款项。……

会谈于16时40分结束。

记录 瓦·佐林

1945年3月24日于莫斯科

① И.Е. 彼得罗夫，时任苏联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随后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

② Р.Я. 马利诺夫斯基，时任苏联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

№09189

佐林同诺塞克关于斯洛伐克境内 匈牙利人的命运的谈话记录

(1945年4月11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摘自瓦·安·佐林的日记

11时30分我拜访了诺塞克^①，他在政府所在地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

我问，内务部怎样着手工作。诺塞克回答说，中央政府内务部实际上没有活动的可能性，因为整个行政机关属于追求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全部领导权的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诺塞克有点委屈地说，斯洛伐克人建议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府目前只负责国防和对外事务问题，而将所有其他事务交给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让它有权单独解决斯洛伐克境内的内部问题。诺塞克说：“我们这里目前正在就中央政府和斯洛伐克地方政府的权限问题进行争论。”这种争论目前尚未取得完全一致。

接着诺塞克说，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打算在不远的将来采取行动，把匈牙利人迁出斯洛伐克领土，而且斯洛伐克人打算把所有的

^① B. 诺塞克，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长。

匈牙利人迁出，诺塞克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诺塞克补充说，他认为，应该首先只把匈牙利占领者，即在1938年斯洛伐克被匈牙利占领以后来到斯洛伐克的那些人迁出。

我问，在科希策这样的匈牙利人有多少。诺塞克回答说，他认为这样的匈牙利人有3000~4000人。诺塞克认为，把这些匈牙利人移居到匈牙利并不困难。但是，其他的匈牙利人不能现在就把他们移走，必须预先做一些工作。例如，应该宣布所有在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劳动义务，然后建立集中营，把那些不遵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法律的匈牙利人送进集中营，再从中挑选应该移出捷克斯洛伐克的人。诺塞克认为，不管怎么样，现在就实行全面迁出匈牙利人是不正确的。作为反对采取这种措施的论据，诺塞克同意这种说法：在匈牙利有斯洛伐克人，匈牙利政府也可能让他们迁入捷克斯洛伐克。

然后诺塞克介绍了人民警察组织和其他安全机关，并且说，打算建立全捷克斯洛伐克统一的安全系统和统一的内卫部队，其干部在征得斯沃博达将军同意后将来自捷克军中（从不能再上前线和不能执行内务警卫勤务的伤员中挑选）。诺塞克打算把宪兵队列入内务警卫的编成，将其分散编入其他的军队兵团，使其不可能再保持宪兵队的旧编制。此外，他还打算建立全国统一的、隶属内务部的侦察机关。诺塞克解释说，迄今为止几乎每一个部都有自己的侦察机关。尤其在伦敦，侦察机构很多。目前，他想把侦察机关的所有事务集中管理，使其隶属内务部，包括在国外的侦察机构。

我问，对在斯洛伐克境内同德国人合作的人追究责任了没有。诺塞克回答说，目前斯洛伐克人在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做。他答应督促这件事。

从整个交谈可以看出，诺塞克对自己信心不足，斯洛伐克人和中央政府之间还没有进行应有的接触，而且斯洛伐克人显然不允许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斯洛伐克境内进行积极活动。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瓦·佐林

1945年4月11日于科希策

№09190

佐林与劳什曼关于恢复捷工业 及其发展远景的谈话纪要

(1945年4月11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瓦·亚·佐林日志摘录

12时30分，我在政府大楼拜会了劳什曼^①。

礼节性的问候之后，劳什曼向我介绍了他的部的活动计划。他说，他打算将捷克斯洛伐克60~70%的工业划归自己的部管理。首先将属于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工业实行国有化，然后将既有捷克和斯洛伐克资本，但又是德国和匈牙利资本占大部分的工业国有化，最后将属于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中叛徒的工业国有化。劳什曼认为，由于这一措施，几乎全部大工业将转移到国家手中。劳什曼说，考虑到这一形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工业管理中应当利用苏联的经验。因此，他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得到我们的帮助。当我问及斯洛伐克的工业现在形势怎样时，劳什曼回答说，斯洛伐克的许多企业由于缺乏传送装置（德国人把皮带都运走了）现在都停工停产。劳什曼补充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货物中尚有一些皮

^① B. 劳什曼，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部长。

带，可以用来恢复斯洛伐克的工业运转。工业部正与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工业代表合作，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一系列企业，特别是为红军的需要而生产的企业。劳什曼说，前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代表扎季克工程师现已换上了共产党人波尔，他已经着手工作。

然后劳什曼问我，谁在大使馆负责经济问题。我回答说是杰米扬诺夫参赞。劳什曼请我帮助与参赞建立联系。此外，劳什曼还提出建议，声称随着大工业的国有化，可否由苏联派出顾问，协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安排对这些工业的管理。他补充说，这一问题政府还没有讨论过，也没有做出决定，他只是打算提一下。

我告诉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管理自然与苏联的工业管理有所区别，因为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

劳什曼笑着说，捷克斯洛伐克有朝一日也会有这个经济基础的。

这次谈话持续 30 分钟，到此结束。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瓦·佐林

1945 年 4 月 11 日于科希策

No 09191

佐林与哥特瓦尔德
关于捷国家建设问题的谈话纪要
(1945年4月14日)

秘密

摘自佐林的日记

12时整，我在政府所在地拜访了哥特瓦尔德。

哥特瓦尔德指出，对于列入政府成员的共产党人来说，第一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 军事问题。应当撤换军事当局和改组国防部，现在可以说这一步已达到了。斯沃博达将军被任命为总司令（取代因格尔），博切克将军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取代米罗斯拉夫），以及任命共产党人雷岑为总参谋部第二部新的部长（取代莫拉韦茨），任命共产党人普罗哈兹卡为教育部长。在第1军中也作了新的任命。哥特瓦尔德指出，所有这些更换进行得并不像贝奈斯所说的那么顺利。同时，一些部长的态度也不那么坚决，甚至在决定通过时，贝奈斯及其随后的费林格都倾向于弱化这项决定，并且就因格尔病退和莫拉韦茨退休尚未做出决定。

2. 关于惩办附敌分子问题。众所周知，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公布了有关公审并追究投敌分子责任的法律。但是在斯洛伐克境内这一法律实际上没有付诸实施，因此，任何一名罪犯都还没有受到审判和惩处。现在摆在政府面前的任务是组建审判变节分子

的法庭并惩处他们，然而在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却感觉不到落实这一措施的决心。哥特瓦尔德将不得不向斯洛伐克人施加强大的压力，以便实现上述意图。

3. 关于组建内卫部队和改组内务部问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内务部机关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均由共产党人领导。诺赛克部长目前正忙于借鉴苏联经验制定改组所有内卫部队的方案。共产党人打算组建拥有相应武装力量（警察）的国家安全机关，此外，他们还打算组建一支专门的内卫军，这支部队将用于一些重大举措，用于对付德国人、匈牙利人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将敌人的武装队伍清除出去，最后是建立隶属于内务部的面向国内和国外的情报机关。哥特瓦尔德认为，各部的彻底改组只有在捷克全境解放后才有可能，因为需要考虑到斯洛伐克已经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目前也不大情愿中央政府干预。

4. 与斯洛伐克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莫斯科会谈和有关斯洛伐克问题获得自决的政府纲领^① 通过以后，与斯洛伐克的相互关系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但是不能说与斯洛伐克的相互关系就已完全正常化了。斯洛伐克人在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第一阶段的活动中犯了一系列错误。鉴于上述原因，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对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显得准备不足。斯洛伐克领导干部过于年轻而且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现在不得不予以纠正。与此同时，这些领导人对于他们事务的任何干预都十分计较，从而影响着相互关系。哥特瓦尔德认为，随着什米特克^② 和西罗基^③ 的到职，情况就会好转，并且能够与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建立完全正常的关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

① 在政府纲领中，确定承认斯洛伐克人是作为“国家的一个独立的民族”。政府必须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关系。

② K. 什米特克，时任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

③ B. 西罗基，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

不足。

5. 财政问题。政府目前正忙于妥善处理财政问题，这是因为斯洛伐克人坚持要在捷克境内发行特种货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借口是斯洛伐克与捷克和摩拉维亚的价格水平不一样，要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行的货币按同一方式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境内使用，那么斯洛伐克的货币就可能不稳定。哥特瓦尔德对在捷克境内发行纸币的实际必要性表示怀疑，但是他说，由于斯洛伐克人坚持自己的提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予以拒绝是不合适的，并且做出了大使馆已知道的相应决定。哥特瓦尔德认为，随着捷克全境的解放，这一问题的局面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朗。

此外，哥特瓦尔德特别关注政府中民主党人的活动。他强调指出，他们要努力为政府的全部活动尽到共产党人的责任。因为共产党人占据着重要岗位，而民主党人目前对实际工作袖手旁观。同时，在组建地方政权机构时，民主党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不久前在斯洛伐克民主党内领导层的更叠导致了反动分子（乌尔西尼和戈德扎）力量的增强。但哥特瓦尔德认为，这一变化有利于共产党人，因为对广大群众来说，这个党的反动本质将暴露得越来越清楚。

在谈话结束时，哥特瓦尔德评论费林格是一个不够坚强的人，反动分子能够对他施加影响。但哥特瓦尔德希望，在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希望与共产党人合作的费林格^①将会奉行政府纲领中既定的政治路线。

谈话到此结束。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瓦·佐林

1945年4月14日于科希策

^① 在这次政府选举中，费林格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

No09192

佐林与斯兰斯基关于斯洛伐克 国内政治形势的会谈纪要

(1945年4月17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送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摘自瓦·阿·佐林的日记

斯兰斯基^①对政府中共产党人的最初行动作了介绍，并对斯洛伐克的政治形势做出评估。据斯兰斯基说，在政府中的共产党人都担负着具体的工作，同时还制定出在已解放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境内开展本部门工作的计划。此外，他们现在还不得不与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相关部门协同工作。斯兰斯基随后指出，共产党员的其他政党同事承担工作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以致于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他们想要说：“好吧，共产党员们，你们就开始干吧，我们倒要看看你们会有什么下场。”据斯兰斯基说，费林格自己的立场就动摇不定，而且还受到贝奈斯和其他部长的影响。因此，哥特瓦尔德不得不经常监督费林格的一些重要举动，并纠正他的错误。

在谈到劳什曼时，我发觉他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都对政府纲领中规定的社会措施存在着十分幼稚的观点。劳什曼提议原封

^① 鲁道夫·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不动地仿照苏联工业局来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局。据斯兰斯基说，劳什曼、费林格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现在在经济方面都站在极左立场上，并声称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措施；相反，共产党人却对此予以限制，认为推行社会主义措施为时尚早。斯兰斯基开玩笑说，共产党人在1918年就曾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而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坚决反对，并说他们拥护民族革命；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像是拥护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共产党人则赞成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民族革命。

斯兰斯基后来指出，星期天在各省城和村镇举行的群众集会表明，居民（特别是农业人口）完全支持政府纲领，并要求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反对投敌分子。斯兰斯基认为，共产党人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非常大。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东斯洛伐克计有党员3万人，现在进行的把匈牙利和德国地主的土地交还农民的行动，就能极大地巩固共产党在农村的地位。民主党人不止一次地使共产党人注意到，应把土地完全交给没有生产工具的贫苦农民。斯兰斯基指出，这样意味着把土地分给需要的人。民主党领导人已进行了改选，而新领导人比其前任（乌尔西尼、斯特克和戈德扎）右倾一些。什罗巴尔现在已多少有些离开了领导层。据斯兰斯基说，民主党人的这一右倾倾向看来对我们有利，因为民主党人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并且会在以后暴露得更加充分。斯兰斯基认为，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够坚强，同时还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随着什米特克和西罗基的到职，局势有些稳定下来。胡萨克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工作人员，但他依然是个青年党员，并且无疑需要一位指导者。诺沃麦斯基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受到外来影响，尤其是来自民主党人的影响。但是，斯兰斯基希望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捷克全境的解放，将加强共产党人在群众和政府中的影响。

按照斯兰斯基的看法，从伦敦方面获得的有关建立捷克民族议

会^①的信息是令人担忧的。他觉得该议会系由英国代理人组建，未必能代表某种广泛的运动，有关它的组成和活动情况无论如何都需要获得更为详细的资料。斯兰斯基已答应，随着一些重要材料的积累而将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向我通报。我说，我将很高兴与他会面。

谈话到此结束。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瓦·佐林

1945年4月17日于科希策

① 捷克民族议会是1945年4月作为捷克境内的全国抵抗运动机构成立的，其领导人是普拉扎克。斯兰斯基的情报加深了苏联方面对捷克民族议会的不信任感。苏联的这种立场导致捷克民族议会原领导人没有被吸收参加新共和国的领导工作。捷克民族议会被解散后，其职能转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09194

佐林关于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局势与 西罗基的谈话纪要

(1945年4月23日)

秘密

摘自瓦·阿·佐林的日记

今天11时我拜会了西罗基。不过，当我抵达时，他并没有在部里。过了10分钟西罗基出现了，而且对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推说他的表不准，外加他乘坐的汽车因为缺油而耽搁了一会儿。我向西罗基提了一些问题，内容涉及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势及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活动。西罗基高兴地讲述了如下一些内容。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后已经过去了6~7个月，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已经获得解放，但是，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治敌人与占领者合作的追随者还未受到惩处，而且还存在着宽恕他们罪行的某种倾向。斯洛伐克共产党目前已达3万人，拥有相当多的年轻党员和一个由老党务工作者组成的很小的核心，这些人只是不久前才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因为他们曾长期遭到监禁。因此，在斯洛伐克共产党内调和主义气氛很浓，而且还没有尖锐地提出有关惩处战争罪犯和投敌分子的问题。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全体会议已于4月21日举行，会议讨论公审和惩办投敌分子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就此准备好任何方案、法律或决议。不久前在许多村镇和省城举行的旨在讨论政府

纲领的群众集会表明，群众的情绪都十分坚决地反对一切与德国人合作的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人民群众都要求惩办与德国人的合作者。西罗基认为，依靠下层的呼声和凭借上层的重视，在近期内就可实现对投敌分子的公审和落实诉讼程序。西罗基补充说，司法部长斯特兰斯基多少有些在拖延斯洛伐克关于惩办叛徒法令的颁布，其借口是这一法令应是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共同的法令。但西罗基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斯洛伐克政府之间还要会就此进行协商。

接着，西罗基着重谈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间的相互关系。他说，在起义期间，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曾做出决议，规定在斯洛伐克境内只有斯洛伐克民族议会颁布的法律具有效力，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伦敦发表及在此间颁布的法律对斯洛伐克人来说没有执行的义务。现在，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对这一决议做出修改，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总统签署的法律可在斯洛伐克通用，如果这些法律的颁布征得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同意的话。西罗基解释说，这种状况不受贝奈斯欢迎，并且还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引起某种摩擦。但是他认为，此时此刻，这一状况应当维持下去。他同时感到，斯洛伐克和捷克人之间的全部问题都将得到妥善解决。

尔后，西罗基指出，民主党人正在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而且乌尔西尼在民主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声称，他们（即前大地主党）对自己的过去不感到有什么可羞愧的。总之，在民主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是人所共知的与德国人合作的前大地主党，而且他们还在民主党内竭力维护这种合作精神。对我提出的斯洛伐克民主党要到多少人才足够强大的问题时，西罗基回答说，党员人数要超过共产党，尤其是在农村，因为在那里农民中的富裕阶层已与老

的农业党^①有联系，而该党成员目前就很活跃。西罗基总结说，无论是在斯洛伐克，还是在整个捷克斯洛伐克，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政治斗争。西罗基说出了乌尔西尼不久前向他提出的一个特殊问题：“在列宁四月提纲中阐述的布尔什维克策略是否会成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策略？”由此看来，民主党人担心的是共产党人的积极性。引起民主党人的恐慌是因为内务部机关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安全机关逮捕了一些早先与德国人有联系的民主党人。

西罗基后来还说，在他看来，前往布拉迪斯拉发的胡萨克和特瓦罗热克在向军事当局请求将布拉迪斯拉发交由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管理方面表现得过于热情，但任何人都没有将这种权力授予他们。因此，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向胡萨克发出专门指示，指出从他这方面说这样的步骤为时尚早。很显然，胡萨克将留在布拉迪斯拉发，并将准备搬迁到斯洛伐克民族院那里。

在谈话行将结束时，西罗基通知我说，据悉，有20多名被斯洛伐克傀儡政府逮捕和由它交给德国人的斯洛伐克起义的参加者已被杀害。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来，斯洛伐克民族运动中本来就不多的政治成熟的工作人员数量减少了。

谈话到此结束。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瓦·佐林

1945年4月23日于科希策

^① 农业党是慕尼黑协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大党派之一。它竭力使国家的内外政策服从于德国。该党于1938年底自行解散。1945年之后禁止该党重新建立。这个党的一系列原活动家充实了在捷克境内的人民党和社会民族党的队伍，而在斯洛伐克是民主党。

№09201

布尔采夫关于斯洛伐克的反匈政策 给季米特洛夫的通报

(1945年6月19日)

秘密

致格·米·季米特洛夫同志^①：

关于斯洛伐克反匈牙利人的措施

乌克兰第2方面军政治部报告说，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各地方政权机关对匈牙利居民采取了不正确的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居住着75万~80万匈牙利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缺少土地的农民、雇农以及工人。

1938年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匈牙利人，此外在南斯洛伐克的许多地区，匈牙利人共产党员还处在领导岗位上。

1938年，匈牙利居民曾宣誓（效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保证拿起武器保卫它。

在德国人将斯洛伐克的南部并入匈牙利以后，斯洛伐克居民遭到了来自匈牙利占领军的迫害，禁止居民使用本民族语言，许多斯

^① 文件上有Г.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致巴拉诺夫同志。1.将通报重打一份给莫洛托夫同志，并编制一份附件报告。2.让拉科西同志了解其内容。1945年6月21日”，以及标注：“拉科西已经了解其内容。1945年6月23日。拉科西”。

洛伐克人被逮捕和处决，这当然激起了斯洛伐克人对匈牙利人的仇视。

由于贝奈斯在今年5月12日发表声明说，全部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都将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迁走，现在地方行政机关正采取措施切实履行这一指示。^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按这一精神采取行动，吸收匈牙利人入党被暂时中止，新党员的党证也不予颁发，对于老党员，中央委员会则以单独方式处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使得斯洛伐克南部边界地区的共产党丧失了自己的地位，而民主党的地位因此得到加强，并且还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匈牙利分部（例如在科马尔诺地区）。

沙文主义分子开始活跃起来。在勒维茨，捷克斯洛伐克警备队队长库尼查大尉还命令印刷和张贴如下标语：“谁不想讲斯洛伐克话谁就从伊佩尔滚开！”“我们在自己的家园，我们就是这里的上帝！”“斯洛伐克人，请大声说话！”库尼查大尉还是一系列旨在反对匈牙利人的挑衅性事件（诸如殴打匈牙利人等等）的凶手。

在新扎姆卡，有90%匈牙利人工作的“极佳”制鞋厂，厂部宣布禁止讲匈牙利话，下令揭掉用匈牙利文写的“斯大林大元帅万岁！”“红军万岁！”等标语，今年5月26日通过无线电广播站仅用斯洛伐克话播送了有关“苏联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报告，因而匈牙利族的工人对报告内容一无所知。

今年5月4日，西斯洛伐克州军事代表扬·切尔涅克中校发表了一份通报，其中指出：“迁移（匈牙利人）应采用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使用过的迫使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搬迁的办法，即迁移应在几

^① 1945年4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费林格向佐林通报说，斯洛伐克民族解放委员会与政府一起讨论了关于迁移匈牙利人的问题，并通过了实施这一行动的决议：“在其他同盟者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尽可能快地开始这一行动。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准备在3个月的期限里，从斯洛伐克南部地区迁出40万匈牙利人”。

昼夜内完成，只容许迁移者携带他们能随身携带的物品。”

迁移匈牙利人的方式颇为粗暴，既没有向匈牙利人提供出售或托付保管自己财产的时间，也没有提供任何交通工具。因此，儿童、老人、病人、孕妇等都不得不步行几十公里到达匈牙利边界。

匈牙利族老辈共产党工作人员在无力制止地方当局的非法行动时就去了匈牙利。

例如，这样做的就有在卢钦查的共产党组织的州委书记科列季，他目前担任匈牙利一个共产党组织的书记。科马尔诺市的一位区委书记去找拉科西同志，他对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州党代会上不让匈牙利人发言表示气愤，尽管出席会议的有 80 多名匈牙利代表。

必须指出，地方当局反对匈牙利人的一切行为都没有经得苏联军事代表的同意，而在有些时候，地方当局还违背苏联军事代表处的指示行事。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士兵有时还自发试图阻挠对匈牙利人采取粗暴的办法。

由于斯洛伐克在贯彻民族政策时采用不正确的办法，使得反动分子的活动得以加强。这些人打的是斯洛伐克爱国主义的幌子，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也未就如何对待匈牙利人发布任何命令和指示，这实际上是纵容地方当局擅自行动。

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许多组织在民族问题上持不正确的立场，因而正在匈牙利劳动者中失去影响，并把这一影响让给善于利用一些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错误的民主党。

特此报告

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第七局局长 M. 布尔采夫

1945 年 6 月 19 日

№09202

杰米亚诺夫与什米特克 关于斯洛伐克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5年6月25日)

抄送维辛斯基，第四欧洲司，归档。

绝密

摘自 Н.Я. 杰米亚诺夫的日记

什米特克就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谈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1. 民主党的党内形势

在不久前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新的领导人，即以列特里赫取代乌尔西尼为主席。什米特克认为，此人是一位比乌尔西尼更为激进的分子，什米特克把选举列特里赫的事视为民主派依靠内部反动势力的胜利。列特里赫的作风比乌尔西尼要民主一些，但也更灵活一些。显然，他的行动方针有别于乌尔西尼，在各种问题上他将会站在更加进步的立场上。在布拉格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什米特克阐述了这一看法，而一些同志却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他依然保留自己的观点。

什米特克认为，以斯蒂克工程师为首的民主党反动派在乌尔西尼的支持下没有获胜，但是却在己党内保存了下来。

2. 在斯洛伐克建立第三种政治党派

在布拉格召开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有关在斯洛

伐克组建第三政党的观点，以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争取大多数群众站在共产党人一边。

什米特克反对目前在斯洛伐克建立第三党，其理由是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不适于建立这样的党，因为一切到此暂时都还未准备就绪，因而对第三党与共产党结成统一的联盟缺乏信心。

在布拉格期间，什米特克受到了贝奈斯的接见，后者向他询问了有关在斯洛伐克建立第三党的可能性问题，什米特克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什米特克认为，斯洛伐克三党并存，在客观上可以帮助贝奈斯在斯洛伐克为自己建立由以前的农业党、土地党^①残余组成的反动势力支柱，何况贝奈斯在捷克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三党制，并企图把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融入共产党，而大部分则融入贝奈斯的国家社会党。什米特克推测说，贝奈斯指望费林格和劳什曼脱党后加入共产党，而把该党的其他成员拉到自己的队伍中。因此，在斯洛伐克建立第三党的思想完全是符合贝奈斯利益的。什米特克认为，对于这一点，一些赞成在斯洛伐克建立第三政党提议的布拉格的同志，如西罗基和科佩茨基不是十分清楚。西罗基在说明自己的建议时，是担心在即将到来的两党制选举中失败。在两党制下，共产党获得胜利的机会很小，更何况是三党制了，而西罗基认为第三党会剥夺共产党的影响。

什米特克还列举了反对在斯洛伐克组建第三党的另一种说法，这就是三党的存在必然要为其其他中小型政党的组建创造前提条件，从而将难以与之对抗。因为在捷克现有的四个政党都要求在斯洛伐

^① 土地党即斯洛伐克土地人民党。在1938年建立了置于德国庇护下的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之后，这个党成为执政党。该党的思想基础是教权主义和反捷克的分立主义。1945年之后，该党被取缔。

克境内建立这类党的平等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还赋予贝奈斯以很大的机会深入到斯洛伐克社会和政党的各个阶层。在这种情况下不应忘记，在容许建立第三党后，共产党就难以反对什拉梅克在斯洛伐克建立自己的基督教民主党的要求。……

4. 关于斯洛伐克人的情绪

一些捷克同志指责斯洛伐克同志以斯洛伐克的分立主义和不友好态度对待中央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感到惊讶，因为这种看法是毫无根据的，而且是一些人不成熟的看法。什米特克举了科佩茨基一次发言的例子。后者似乎说过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已到了该取消的时候。什米特克指出，科佩茨基及其他一些人都否定斯洛伐克的联邦提法，并且提议以自治取代联邦制，这无论如何不会使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满意，因为斯洛伐克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少数民族，仅给予自治就可以了。

为了建立起能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和安全强大支柱的可靠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斯洛伐克和捷克共产党人应当争取建立能完全符合苏联这些利益的巩固的国家，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基本方针。然而，捷克共产党人方面对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所遵循的这些共同使命并不十分理解。

斯洛伐克毗邻苏联国界，因此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清楚并能感受到与苏联负有相同使命的责任，同时还据此开展自己的工作。科佩茨基关于取消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误导，因为对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能使之从一种政体过渡到另一种政体。我们的共同使命是巩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且不许像以前那样侵犯斯洛伐克人的权利。当时，斯洛伐克的同志提出过建立两个政府（斯洛伐克政府和捷克政府），以及统一的中央政府的建议，但布拉格的同志却不同意。在他们的建议中还表现出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与他们在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以及

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一些委员会（所谓的自治选举）相提并论的倾向，这些委员会像是行政执行机关，但不是立法机关。这种建议根本不符合斯洛伐克人的利益，因为采纳这一建议就意味着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消失，何况这一倾向不久前就曾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冒了出来，因此，它们不能保证对斯洛伐克人民的繁荣昌盛带来任何好处。

什米特克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应当共同努力，巩固现有的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形式，发展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文化，并且在了解共产党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越来越彻底地转到民主政治上来。……

在谈话的最后，什米特克对苏联大使馆参赞来到布拉迪斯拉发感到满意，并且希望苏联驻布拉迪斯拉发总领事馆早日开馆，这将大大有利于对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的研究。……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参赞 杰米亚诺夫

1945年6月25日于布拉迪斯拉发

№09203

斯大林与费林格
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等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5年6月28日)

秘密

参加谈话的还有维·米·莫洛托夫和瓦·阿·佐林

约·维·斯大林问：费林格先生对哪些问题感兴趣。

费林格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有一系列的问题，并提议先讨论有关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条约问题。费林格通报说，条约的文本几乎已经协商好了，现在谈的只是条约议定书的一些条款。

约·维·斯大林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现在签署该条约是否感到合适，并且指出：“我们不会催促你们，只要你们认为合适，那就采取行动。”

费林格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拟定条约的时机合适，因此就会主动提出签署条约的建议。

接着宣读条约和议定书文本。

当谈到议定书第2条时，维·米·莫洛托夫建议规定公民选择国籍应依照每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现行法律办理，因为像在苏联，丈夫一方对公民国籍的选择并不包括妻子的国籍，而依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妻子自动拥有丈夫的国籍。

费林格同意该项建议，并建议以相应方式拟定议定书第2条。

在读完第3条后，费林格指出，与移交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有关

的财政问题看来在以后应明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目前不能说出用于补偿部分公民在迁居捷克斯洛伐克后将自己财产留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支出所需的金额。因此，费林格提议，要在议定书中制定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双方对居民迁移相关支出相互抵消，以及在条约批准后的 18 个月内有关两国政府之间日后结算的总章程。

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同意这一提议。他们吩咐最后校对一下条约和议定书的草案，如果可能的话，就在 6 月 29 日前签署该条约。

费林格继续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还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利品问题感兴趣。他指出，尽管科涅夫元帅^①坚决声称工厂和其他战利品现在不会搬离捷克斯洛伐克，并因此而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达成协议，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仍有关于从有关企业运出设备的事实及有关运出大量糖和其他粮食的报道。费林格请求考虑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利益，对该问题加以调整。

约·维·斯大林说，这一问题将做出调整，而且我们不想从捷克斯洛伐克运走工厂和设备，除了我们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即将谈妥的少量物品外。

约·维·斯大林认为，一些地方的军代表和其他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在当地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有越轨行为，但是从 7 月 5 日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要取消军代表制度，只在火车站保留军代表办事处，以保证军事供应的正常铁路运输，那些还未被军事机关占领的仓库应归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支配。关于涉及战利品和驻捷克斯洛伐克我方部队全部行动的所有问题，约·维·斯大林提议均直接与科涅夫元帅商量，并且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科涅夫的司令部中要有常务

^① И.С. 科涅夫，时任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

代表（一名或者数名）。

费林格同意这个建议并且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将高兴地派出这样的代表。然后，费林格要求解决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居民迫切需要的烟草问题和银行问题。苏联的收缴机构认为这些银行是战利品，但实际上银行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的现钞和一定数量的德国货币，当然这些德国货币现在只配被销毁。费林格要求搞清楚这些被认定是德国银行的性质，应考虑到德国人在这些银行中没有任何投入，这些银行所利用的纯粹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资本。

约·维·斯大林说，关于烟草问题可以进行协商，显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与红军共同分享这些烟草。关于银行他则提议作专门研究。维·米·莫洛托夫说，关于这一点现有一系列的建议，这些建议显然在最近就要予以研究。

约·维·斯大林补充说，关于大型企业，特别是那些被德国人占领的企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当采取果断措施，他特别建议要把维特科维采工厂掌握在自己手中。

费林格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正在考虑做到这一点。

对于约·维·斯大林提出的美国人是否想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费林格回答说，美国人放慢了撤出自己部队的速度，并且还在询问苏联部队在何时撤出。

约·维·斯大林通报说，苏联军队将减少三分之二，而且它们大部分驻扎在边界地区。他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向美国人提出撤走他们军队的问题。

克莱曼蒂斯^①通报说，已就此向美国人发出了照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可以利用苏联军队大规模撤军的机会，再次要求美国人撤走他们的军队。

① B. 克莱曼蒂斯，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

费林格然后问，如何才能使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去。

约·维·斯大林说：“我们将不妨碍你们，把他们赶走吧，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什么叫统治他人。”

费林格因此要求给苏联军人下达指示，协助将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迁移出去。

约·维·斯大林问道：“难道我们的军人妨碍这一项工作？”

费林格说，妨碍倒是没有，但是想以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约·维·斯大林然后问费林格，能否友好地与波兰人解决有争议的领土问题。

费林格回答说，这一点还没有做到，因为波兰人想分割特欣州，对此，任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不能这样做。

对于约·维·斯大林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协？”——费林格回答说，对捷克斯洛伐克而言，特欣州是领土的极为重要的部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任何让步。

约·维·斯大林指出，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人显然不会在任何其他领土问题上让步，尤其是在克拉德斯科地区，看来，波兰人将坚持己见，因为我们已许诺把这块土地给他们。

费林格回答说，波兰人得到的领土太多，未必能管理好它们。

约·维·斯大林重申了苏联政府关于友好地解决有争议问题的立场，同时指出，如果在不能这样解决的条件下，那就不得不把这一问题提交和平大会讨论。

然后，费林格问道，能否指望从苏联政府方面装备捷克斯洛伐克保留下来的6个师，上次总统访问时曾就这些部队的部署达成了协议。

约·维·斯大林说，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事我们包下了。

费林格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表示感谢。

最后，费林格代表总统赠送了礼物——扬·杰兹卡^①的全身铜像。

约·维·斯大林请求转达对总统的谢意。

记录 瓦·佐林

1945年6月28日于莫斯科

^① 杰兹卡是15世纪捷克的民族英雄。

№09251

谢米恰斯特诺夫关于同劳什曼会谈的情况给米高扬的报告

(1946年1月8日)

文件连同附后的由米高扬签字的报告一起抄送斯大林、
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

绝密

米高扬^①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把今年1月8日在弗努科沃机场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部长劳什曼送行时^②他的秘密讲话向您报告如下：

1. 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尤其取决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工业国有化。实行工业国有化使捷克斯洛伐克同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矛盾明显暴露，因为国有化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他们的利益。这些国家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人物正在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动分子，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反动分子，对抗政府采取的措施。

他有一些材料证明在反动分子里面有些人是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他没有说出名字），他同费林格和哥特瓦尔德一道进行了揭发。这

① 阿·伊·米高扬，时任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② 以B.劳什曼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专家代表团访苏的目的是为实现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国有化，学习苏联在组织生产和管理工业方面的经验。代表团与苏联国家计委，以及个别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会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接见了代表团。

些人不仅反对实行国有化，而且极力促使美国资本（比如说）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例如在石油勘探领域和对以前属于他们的企业进行管理方面。

2. 苏联目前是惟一同捷克斯洛伐克谋求自身发展没有矛盾而只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所以，他、费林格和哥特瓦尔德主张同苏联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劳什曼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是继苏联之后的第二个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

3.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该同苏联结成联盟，反对现存的西欧联盟。因为目前大肆宣布“联盟”在政治上没有好处，所以不应该公开宣布这一点，而通过密切政治、经济合作的途径建立联盟。

罗马尼亚政府也很想同苏联建立联盟，所以应该全力促进。

为此，劳什曼提起了关于向苏联提供铀矿石的问题。他、费林格和哥特瓦尔德深知此事的重要性，因此想方设法促使关于雅希莫夫企业协定的早日签署，并将在今后促成铀矿石的开采和运往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将只留下极少量生产染料用的铀矿石。

4. 这个联盟还必须包括匈牙利和奥地利。这些国家的政府尽管发誓要珍视同苏联的友谊，但是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影响很大，向他们一方倾斜。这些国家的现政府只是在苏联红军驻扎时才发出这种誓言。苏联红军一走，他们就赶紧倒向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边。他们的话没有坦诚可言。应该现在就采取措施吸收匈牙利和奥地利加入“联盟”。

5. 劳什曼确信，和在历史上扮演过叛徒角色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民主党不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现在和将来都应该走另一条道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将沿着更加密切地同共产党接近的道路前进。

6. 劳什曼认为，苏联没有帮助希腊游击队是个错误，他不理

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希腊发展游击队运动的环境很好。如果帮助游击队，那么游击队掌握政权及反动的希腊政府被推翻和消灭就不会为时太久。英国的影响也将化为乌有，希腊也有可能同苏联结盟。

希腊游击队需要武器，苏联应该帮助他们。如果苏联不便于这样做，可以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会出色完成苏联的委托。如果方便，南斯拉夫人也可以帮助。比如说，他就可以担当起这一使命，也不会对苏联产生任何怀疑。

7. 他对此次苏联之行和对他的关照感到十分满意。他将把苏联的经验推广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部门中去，并证明他们选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道路——工业国有化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他要让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写出苏联之行的回忆，而且不要写成像英国工联的代表所写的那种回忆。

谈话进行了将近 40 分钟。

И. 谢米恰斯特诺夫^①

1946 年 1 月 8 日于莫斯科

又及：格尼兹多代办通知说，捷克斯洛伐克同美国、英国和美洲签订了空中交通互惠协定。

И. 谢米恰斯特诺夫

^① И. X. 谢米恰斯特诺夫，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

№09255

克鲁格洛夫关于释放战时捷被拘留人员和 战俘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1月17日)

绝密

苏联人民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霍拉克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了关于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作战期间被我军事当局拘留的 5000 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释放并遣返回乡的问题，以及关于释放 800 名在匈牙利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斯洛伐克士兵问题。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就这两个问题报告如下：

1. 关于释放 5000 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收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1945 年 12 月第 1788/4e 号、1792/4e 号、1893/4e 号函件和 1946 年 1 月 9 日第 26/4e 号函件的同时，收到了被苏联机关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和目前在苏联拘留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名单。名单中共有 2179 人。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资料，以清理红军后方的方式被苏联军事机关拘留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中共有 1360 人被运到苏联，其中已经返回祖国的有 482 人，送往专科医院的 15 人，因各种原因减员的 110 人（其中死亡 104 人，逃跑 6 人）。

截止 1946 年 1 月 1 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俘虏营和被拘留者劳改营中共有 753 人。根据国防委员会 1945 年 8 月 13 日第 9843cc

号决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当时就把 237 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释放并送回他们的祖国。

其余的 516 人系希特勒分子的积极走狗。这部分被拘留者可移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由法庭审理。

2. 关于释放在匈牙利被红军俘虏的 800 名斯洛伐克士兵。为了执行国防委员会 1945 年 6 月 4 日第 892/C 号和 1945 年 8 月 13 日第 9843/CC 号决定，已在 1945 年 8~11 月期间将 35820 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俘虏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前线和后方俘虏营释放并送回他们的祖国。

在接收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战俘的中部军队集群驻区内的俘虏营和其他前线俘虏营中，所有被俘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已全部释放，各前线俘虏营中已没有俘虏。

截止今年 1 月 1 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后方俘虏营共有 13575 名新送去被俘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其中捷克人 9244 名，斯洛伐克人 2945 名，以及从国防人民委员部劳改营转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俘虏营的 1386 名加里西亚的乌克兰人。

正在验明这些自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身份，之后将把被俘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乌克兰人送往柳斯特多尔夫（敖德萨市附近）第 186 号遣返机构的俘虏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已采取一切措施尽快遣返战俘，遣返的期限仅取决于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车辆。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C. 克鲁格洛夫

1946 年 1 月 17 日于莫斯科

No09257

斯兰斯基和哥特瓦尔德关于捷共八大和 国民议会选举准备情况的通报

(1946年2月27日)

译自捷语

亲爱的维克托：

这封信也是写给巴拉诺夫同志的，请你翻译并转交给他。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们在最后时刻才得知负责转交这封信的同志即将离开，所以我只能简单地写几点意见。

1. 如同我们已经通知的那样，党的代表大会将于3月28~31日举行。我们请求给代表大会发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贺电。附上代表大会的日程安排。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党向全体党员发出了一封信。在所有党组织的党员大会上，对这封信进行了讨论，讨论的结果以决议和建议的形式寄给中央委员会。迄今为止已收到地方组织的决议3000份，每天都收到至少150份，这些决议中有极其宝贵的建议。这一运动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水平，使党从思想上得到进一步巩固。目前正在举行州一级的代表大会。

可以说，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也是党员积极性提高的过程。吸收新党员运动也取得了特别好的成果。1946年1月1日，有党组织13193个，其中工厂党组织2950个，地方党组织10239个，党员数量为82.6万名。党提出了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把党员数量增加到100万人的任务，迄今为止已接纳了101674名新党员。我

们相信，到3月底党员数量将接近100万人。

最近，我们将给您寄去整个党内生活的详细报告和关于在训练党员和党的骨干分子的事业中所取得成果的专门报告。在训练方面，9个月中取得了不少成绩。

2. 目前我国的国内政治生活集中表现在即将于5月26日举行的议会选举活动。新的议会应当是立宪的国民议会，会议的主要任务将是通过宪法。附信寄去关于党务工作者会议的情况通报。哥特瓦尔德同志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并提出了与选举准备工作和新宪法有关的主要政治问题。附信还寄去了哥特瓦尔德同志讲话全文的速记记录。

在捷克各州将只允许4个现有的政党参加选举。这4个政党已经商定他们将作为民族阵线党进入选举，并将捍卫现政府的纲领，即所谓“科希策纲领”^①。但是，长期以来，民族阵线内部越来越明显地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代表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另一个阵营代表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后一个阵营越来越多地在所有主要问题上表现出反动倾向。无论在政府里还是在下层，凡在这些党接纳被解散的政党的骨干分子（农业党、畜牧业党、“人民团结党”的党员）入党的地方都表现出这一情况。所有这些情况导致政府的工作遇到很大阻力，这也是迫使我们匆促做出在今年5月进行选举的决定的原因之一。

在至今只有两个政党的斯洛伐克，不久前成立了劳动党，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尽管我们一再建议社会民主党人不要成立这个党，他们还是违背了我们的意愿将其建立。我们希望，通过分裂民主党，在斯洛伐克民主党内产生反对该党反动的领导人

^① 1945年4月4日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第一届政府成立时的纲领，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制定，4月5日在科希策市宣布。

的强有力的反对派，以便成立第三党。遵循狭隘的党派利益的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自己的党，从而延缓了民主党的分裂进程。事态现在正在向另一种分裂发展，在斯洛伐克将成立一个由脱离民主党的人组成的第四党。我们在斯洛伐克的同志认为，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我们的党将会遭到到很大削弱。

3. 您请我们给您寄去关于在斯洛伐克进行土地改革的详细报告。我们向您报告，斯洛伐克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只不过是纸上谈兵。法律规定应该无补偿地没收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和叛徒的土地。至于谈到匈牙利人的土地，出于众所周知的考虑，匈牙利人农民并没有被迁移。至于叛徒的土地，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土地事务代表处实际上暗中破坏了法律。被分配的只有德意志人农民的面积不大的土地。

4. 我们同意建立希腊新闻处。我们可以帮助组建和提供物资器材。请通知希腊的同志们，让他们就这个问题同我们联系。

致以衷心的敬意

斯兰斯基

哥特瓦尔德

1946年2月27日于布拉格

又及：我们再次请求派遣由亚历山德罗夫指挥的红军歌舞团、流行歌曲演员、足球队员在选举前来我们这里，给予支持和促进。这对我们会有很大帮助。恳请您促使有关部门实现我们的愿望。

哥特瓦尔德

№09258

奇恰耶夫与什米特克等 关于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6年3月6日)

抄送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在布拉迪斯拉发逗留期间（2月21～22日）我同斯洛伐克政府主席什米特克、内阁成员胡萨克、诺沃麦斯基等人进行了会晤和座谈。

从谈话中发现：

1. 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存在两派。一派以西罗基、巴什托万斯基、朱里什为首，另一派以什米特克、胡萨克、苏普克为首。后者同党的领导人西罗基有对立情绪，他们认为以西罗基和巴什托万斯基为首的中央机关擅自决定所有问题，不让主席团（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参加。事情甚至到了部分主席团成员从出版物上得知领导人（即中央机关）的某些决定的地步。很少召集主席团开会，而中央全会就更少了。

据什米特克和胡萨克说，西罗基捍卫斯洛伐克的民族利益不够坚定。这是指下列对斯洛伐克有原则性意义的一些问题。

- (1) 明确承认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是权利平等的民族。
- (2) 实现斯洛伐克工业化。

斯洛伐克存在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贝奈斯总统和捷克的右

翼政党（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至今仍然避而不谈捷克斯洛伐克有两个民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问题，而在他们的报刊上甚至表露出只有一个捷克民族的想法。

西罗基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捍卫斯洛伐克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反对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的民族主义倾向不够有力。什米特克、胡萨克和诺沃麦斯基认为，必须争取达到不仅官方承认而且实际承认斯洛伐克人是单独的民族。这种承认应该在捷克斯洛伐克宪法中有明确的反映。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认斯洛伐克工业化的必要性，但是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得到正式的认可。同时，本来是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的，例如，把一些企业从苏台德州迁到斯洛伐克。在这个问题上慢慢吞吞的做法引起斯洛伐克人的强烈不满。斯洛伐克工业化的问题对斯洛伐克共产党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目前斯洛伐克的工人阶层仅为19%，而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工人有46%。而且应该注意到，斯洛伐克85%居民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教士对他们有很大影响。捷克人不是促使加快工业化的速度，而是建议现在就把斯洛伐克的闲置劳动力派遣到捷克的农业部门工作。捷克的农场主和地主已经开始招募斯洛伐克的农业工人并送到捷克。目前去那里的农业工人已经超过7万人。

什米特克、胡萨克和诺沃麦斯基为了说明其观点，列举了斯洛伐克政治状况的独特性、蒂索^①政权造成斯洛伐克人生活腐化以及斯洛伐克人自尊心很强等等理由。

2. 谈到斯洛伐克的政治状况时，什米特克说，最近斯洛伐克的政治形势恶化。民主党没有分裂，共产党想利用民主党的分裂为其目的服务没有成功。民主党领导人以前反对解散蒂索执政时期建

^① 约瑟夫·蒂索，1939~1945年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府首脑。

立的农民署，现在却突然同意解散。这是对曾经许诺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共产党人并以此来反对民主党的同事、防止民主党分裂的菲洛-谢夫丘克集团的让步。菲洛和谢夫丘克目前还留在民主党内。因此，共产党想依靠民主党解体来组建第四政党的希望暂时落空了。民主派随机应变，同天主教徒达成协议，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形势将如何继续发展目前尚不清楚。

目前在布拉格正在就成立第四党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的情况如何，什米特克不知道，如果在选举以前民主党内没有发生分裂并得到它的部分天主教徒的支持，那么民主党将成为共产党的重要竞争对手。

至于谈到选举，目前前景尚不明朗。哪一个政党会获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成立第四党及其由谁领导，取决于天主教徒将持什么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是支持民主主义还是成立自己的政党，取决于数量众多的天主教徒由什么样的集团领导，等等。

明确承认斯洛伐克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承认斯洛伐克工业化的问题和其他纯斯洛伐克问题对选举的结局也有很大影响。如果在选举以前这些问题会得到正面解决，那么共产党将取得巨大胜利。

什米特克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在选举中得到 30~40% 的选票。关于不久前产生的劳动党，什米特克有如下的说法：

这个政党尚处在组建之中，它目前既没有机构又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其领导人目前主要从事吸收新成员的工作，他们已经把部分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拉了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和各式各样的不坚定分子加入了他们的党。但是，这个党的势力还不小，在选举中大概只能得到较少选票。实际领导权掌握在比奇科和恰普洛维奇手里，弗里利奇卡所起的作用比人们通常传说的要小。杰列尔目前尚未积极参与党的工作。

我所见到的什米特克、胡萨克和诺沃麦斯基，以及其他斯洛伐克活动家抱怨说，我们对斯洛伐克关心太少，很少去他们那里，几乎没有给斯洛伐克邮寄任何印刷材料（图书、报纸、杂志等）。他们说：“你们关心的主要是捷克人，而把斯洛伐克人忘记了。相反，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仅在布拉格而且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大量的工作。”

他们仍然对我们的电影《解放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感到不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电影只反映了捷克人反对德国人的斗争。他们认为，捷克人只是在最后时刻反对德国人。同时这部电影几乎没有反映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起义这样的事件。

我答应把这一情况向大使通报，并邀请他们在去布拉格时顺便到大使馆一趟。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参赞、二等公使 И. 奇恰耶夫

1946年3月6日于布拉格

№09261

莫洛托夫与里普卡和霍拉克 关于民族问题及捷国内局势的会谈纪要

(1946年3月28日)

抄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日丹诺夫、
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送第四欧洲司，佐林。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里普卡^①说，两天前，他抵达莫斯科，会晤了对外贸易部部长^②米高扬。在同米高扬的谈判中拟定了关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商品交换条件的一般原则。里普卡说，关于商品交换的具体协定只能涉及这一年。要是能签订更长时间的条约，使苏联订购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品的合同期限定为5年，那就好了。

里普卡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指示他同莫洛托夫就紧迫的政治问题进行交谈。里普卡说，贝奈斯总统亲切问候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感谢。

里普卡说，他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出生在苏联沃伦州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士兵家属。贝奈斯总统就这个问题给斯大林大元帅

^① Г. 里普卡，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部长。

^②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1946年3月15日的法令，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

写了一封私人信件，里普卡请求将信转交收信人（见附件1^①）。

参加会谈的霍拉克^②说，1月9日，他向外交部转交了关于把沃伦州的捷克人遣返回国的协定草案。霍拉克说，他知道外交部研究这一草案需要一些时间，但是目前捷克人希望得到同意，以便把允许返回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通知沃伦州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的家属。这些士兵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得到了土地，所以这个问题十分紧迫。霍拉克补充说，当时有将近12000名沃伦州的捷克人被动员参加斯沃博达将军的军队，他们为捷克斯洛伐克英勇作战，其中将近5000人阵亡。

莫洛托夫说，关于士兵家属返回的问题没有什么疑问，已经表示同意。当然，也可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

里普卡说，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给贝奈斯总统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贝奈斯认为可以把这封信转交斯大林大元帅。里普卡转交了麦肯齐·金的信函原文备忘录（附件2^③）。里普卡补充说，贝奈斯总统不了解这件事的详细情况，也不知道苏联政府的观点。但是贝奈斯总统认为，他把麦肯齐·金写这封信的事通知斯大林大元帅是正确的。

莫洛托夫说，他当然会把贝奈斯的信和备忘录交给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说，他个人认为，加拿大的所作所为与在信中写的不一样。他还说，加拿大人把不大的问题搞成一场反苏运动。他补充说，这当然是加拿大人的事情。

里普卡接着说，佐林大使无疑已经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举行会谈的事报告了苏联政府。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② 霍拉克，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

③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莫洛托夫指出，谈判进行得不很成功。

里普卡证实了这一点，并且说，捷克人有这样的印象，认为谈判不成功与波兰的国内形势有关，尤其与那里即将举行大选有关。里普卡说，尽管谈判不成功，但是双方都声明谈判并没有中断。已经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就证明双方还有诚意，例如，签署了3项有关经济和运输问题的备忘录。

里普卡说，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重新审查它与德国接壤的边界，标明捷克斯洛伐克要求的地图已经交给波兰在布拉格的代表团。里普卡说，双方认为波兰人和捷克人最好在和平会议召开之前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

随后里普卡和霍拉克在地图上指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希望得到的已经脱离德国而归属波兰的那些地区，尤其详细地谈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克拉德斯科地区的要求的理由。里普卡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苏联对这件事予以同情。

霍拉克把关于克拉德斯科地区的备忘录（附件3^①）交给了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问，波兰人怎样看待捷克人的这些建议。

里普卡说，波兰人的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出来。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结为，这些领土已经不属于德国，而是波兰的领土。捷克人认为，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议，这些领土是交给波兰临时管辖。但是，这些领土的未来归属问题尚未最终解决。里普卡补充说，总统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苏联政府注意到克拉德斯科的重大意义。

霍拉克补充说，从历史的和民族的观点看，这些土地无疑是捷克的。克拉德斯科地区在1744年以前属于捷克国王管辖，曾经一度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占领。这一地区的居民至今仍保留捷克人的自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我意识。

莫洛托夫问，这个地区的居民想不想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呢？

霍拉克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莫洛托夫说，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政府支持了波兰人对这些领土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这个问题需要由捷克人和波兰人直接协商。

里普卡说，总统和政府只是请求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观点告知苏联政府。而里普卡本人只是想让苏联政府有所了解，以使苏联政府在直接同波兰人协商前预先了解一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观点。

里普卡说，克拉德斯科州受战争破坏不大，目前那里由红军占领，秩序井然。如果把这一地点交给波兰占领军，波兰政府无法在那里建立行政当局，这只会导致经济滑坡。此外，已经开始逮捕捷克人，把捷克人和德国人一道迁出这一地区。

霍拉克把关于目前克拉德斯科州的形势备忘录（附件4^①）交给了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问，这一消息有多大的可靠性。

霍拉克说，这一消息是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得到的。并补充说，一些捷克人已经开始从这一地区逃到捷克斯洛伐克。

莫洛托夫说，应该注意到，由于严酷的战争，波兰国内形势困难。

里普卡说，根据1918年签订的条约，克拉德斯科地区应该归属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捷克人没有得到这个地区。他再次重申，他只是想把目前的形势告知苏联政府。

莫洛托夫说，在发生移民的情况下，受委屈的人无疑是会有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的。但是应该批判地对待抱怨，弄清这些抱怨中有哪些是正确的东西。

霍拉克说，所谈的不仅是指边境事件，波兰人正在推行旨在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表明这一地区内没有捷克人的计划。

莫洛托夫说，应该在布拉格同波兰人谈谈这个问题。

里普卡说，谈过这个问题。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布拉格谈判以后形势会好转，但实际上形势却恶化了。他再次重申，他只不过是为了通知苏联政府。

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感谢，并说，应该具体地研究这些问题。苏联政府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些问题。莫洛托夫说，要是捷克人同波兰人直接达成协议就好了。

里普卡说，他可以声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心同波兰人达成协议。里普卡请莫洛托夫在适当的时候建议波兰人同捷克人就解决不了的问题进行协商。

里普卡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政治形势比波兰更有利，尽管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已经开始竞选运动。里普卡相信，在选举过后，民族阵线的4个政党的合作将继续下去，他认为，共产党在选举以后将是一个相对最强大的政党。里普卡说，他希望莫洛托夫因此而相信，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结盟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并非出自一个政党狭隘利益的考虑。希望保持这个联盟是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意志。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对部长的这种声明感到高兴。

里普卡接着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委托他问一下莫洛托夫，对于当前的形势，尤其是丘吉尔发表讲话^①后的形势，苏联政府的观点如何。如果可以打听的话，也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

^① 指的是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富尔顿的讲话。

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大元帅在就丘吉尔先生发表讲话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中已经阐述了苏联政府的观点。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大元帅这一次答记者问同他最近两次对美联社和合众社记者一样，充分阐述了苏联政府的观点。

里普卡问，莫洛托夫是否认为目前存在的紧张形势将继续下去。

莫洛托夫说，他并不认为形势将朝着那个方向发展。莫洛托夫说，我们不是进攻的一方，如果我们的西方朋友不对我们发动新的攻击，那么形势就会正常化。

里普卡说，捷克斯洛伐克政界人士认为，目前英国和美国所追求的是，不让苏联从胜利中得到任何东西，使苏联享受不到胜利的果实。

莫洛托夫说，如果我们的西方朋友不把我们视为平等的伙伴，那么我们将保护自己，我们的朋友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莫洛托夫说，如果试图用另一种方式看待苏联，那么苏联是不会同意的。如果他们把苏联视为平等的一方，关系就会得到改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里普卡说，铁托元帅曾在布拉格受到热情接待。他看到，捷克人民真心诚意重视同南斯拉夫的友谊。里普卡说，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已经商量好按照苏捷条约的形式签订南捷条约。但是，由于前几天刚刚签订南波条约，因此决定在5月9日（胜利日）签订捷南条约。

莫洛托夫说，这一条约只会受到欢迎。

里普卡说，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还就他们对待匈牙利的共同态度进行了详细协商。

里普卡说，总统和政府还委托他提起关于德意志人从捷克斯洛

伐克迁入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区问题。^①

霍拉克在交谈中详细谈到了这一问题，并且解释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这一请求的实质只不过是希望增加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入苏联在德国占领区的德意志人的数量。他并且指出，实际上迁入苏联在德国占领区的德意志人比苏联指挥机关所认为的 77 万人少得多。因为这一数字包括了几十万名在德国占领期间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他们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

莫洛托夫说，他们无疑不是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只是回到了原先居住的地方。

霍拉克答应将寄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报告，并补充说，政府请求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性：如果苏联停止把德意志人迁入它所占领的地区，那么美国人就可能这样做。霍拉克指出，从捷克斯洛伐克总共只迁出了 45 万德意志人。

莫洛托夫说，应该把这一数字核查清楚。

霍拉克离开的时候把请求解决关于在莫斯科为捷克斯洛伐克计划部门的工作人员举办两个月或三个月训练班问题的备忘录（附件 5^②）交给了莫洛托夫。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记录 阿法纳西耶夫

1946 年 3 月 28 日 15 时于莫斯科

① 盟国管制委员会曾规定从捷克斯洛伐克迁移到德国苏占区的德国居民定额是 75 万人。到 1945 年 12 月 21 日，苏联驻德国占领军指挥部认为迁移人数已经超过 77 万人，于是下达命令，禁止苏联占领区接收从捷克斯洛伐克迁移来的德国居民，而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希望实现迁移的人数是 250 万。经过协商这一问题后来得到了解决。

②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09269

莫洛托夫与盖达和诺塞克 关于匈牙利居民迁移问题的会谈纪要

(1946年4月30日)

抄送斯大林、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日丹诺夫、
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洛佐夫斯基、佐林（布拉格）、
博戈莫洛夫（巴黎）、古谢夫（伦敦）、
诺维科夫，送第四欧洲司。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莫洛托夫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大概对召开外长会议的情况很感兴趣吧。

诺塞克^①回答说，他们对会议的进程很感兴趣。根据报刊的报道，他们的印象是会议开得很好。诺塞克说，大概如同莫洛托夫所知道的那样，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了一些要求，并将这些要求通知了苏联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②

盖达^③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委托他对苏联政府将支持捷克

① 约·诺塞克，捷克斯洛伐克驻法国公使。

② 1946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各大国研究和解决关于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在四国副外长伦敦会议上对该要求进行了研究。在巴黎外长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③ B. 盖达，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

斯洛伐克关于把剩下的匈牙利居民从捷克斯洛伐克迁移出去的要求表示感谢和高兴。

莫洛托夫问，苏联政府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许诺过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这种要求。

盖达说，维辛斯基在同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霍拉克的谈话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莫洛托夫问，关于这次谈话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都谈了些什么。

盖达说，他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谈到南斯拉夫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对苏联政府采取共同的外交措施。南斯拉夫大使支持关于匈牙利人移居的想法。维辛斯基对霍拉克说，根据这封电报，苏联搞清楚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立场，他（维辛斯基）支持那种关于这是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好方式的意见。维辛斯基说，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应该可以相信，苏联支持友好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莫洛托夫说，他以为捷克斯洛伐克很了解苏联政府在类似情况下所采取的政策。苏联有解决类似问题的经验。当然，在战争时期可以采用一些行动方法，但是在和平时期就必须按照另一种方法完成这种任务。

莫洛托夫说，他想举出近一年中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同波兰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法作为例子。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同波兰就有关希望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移居波兰的波兰人和波兰境内的白俄罗斯人、乌克兰和立陶宛人移居苏联的权利问题达成了协议，签署了有关的协议。通过执行这些协议，在不到一年内有 100 万波兰人从苏联境内移居波兰，有将近 40 万人从波兰移居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莫洛托夫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能不能同匈牙利政府达成类似的建立在自愿移民基础上的协议呢。

盖达回答说，所有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都已经丧失殆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经向匈牙利人提出签订在数量平等的基础上交换人员（即以一名从匈牙利迁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交换一名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往匈牙利的匈牙利人）的协议的建议。但是糟糕的是，在匈牙利居住的斯洛伐克人总共有10万名，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的匈牙利人却有40多万人。交换人员的协议实行以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的数量只减少了10万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走得更远，它采取了使匈牙利少数民族丧失民族特征的措施，使在斯洛伐克出生的匈牙利人重新成为斯洛伐克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指望通过采取这种措施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人的数量再减少10万人^①。但是，还剩下的20万匈牙利人，他们仍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内外安全是个威胁。任何文化和社会性质的民主措施都不可能改变在许多世纪中一直反对建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匈牙利人，这尤其表现在德国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急时期。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人被视为像德意志人那样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敌人。盖达说，只是由于苏联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因此寄希望于苏联政府也会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讲同德意志人一样危险，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潜在威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安全问题上，苏联政府的观点同它的观点是一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是摆在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睦邻友好关系道路上的一个最后问题。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将为建立同匈牙利的友谊提供可能，这个问题的解决可

^① 实际上，这一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结果，至1948年底只有2万匈牙利人放弃了自己的民族。

以为在中欧实现稳固的和平创造前提条件。盖达重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为近 25 年中对捷克斯洛伐克有诚意的匈牙利人提供了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可能性。

莫洛托夫说，苏联和波兰没有签订捷匈协议中所规定的条款，也就是说没有按照一个波兰人交换一个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立陶宛人的原则交换人员。离开苏联的波兰人要比离开波兰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多 1.5 倍。

莫洛托夫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该同匈牙利政府依照波兰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签署类似协定所依据的原则达成有关签订人员交换协定的协议。

盖达说，苏联和波兰的例子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例子有很大差别。首先，匈牙利不想接纳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只是在苏联的促使之下才移居了部分匈牙利人。匈牙利之所以不愿意从捷克斯洛伐克接纳匈牙利少数民族，是因为想在将来有可能利用这些匈牙利人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状况提出修正版图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最担心这一点。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把匈牙利视为自己的祖国，但是又不想返回匈牙利，而希望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签订类似苏波协定那样的协定，那么这些匈牙利人中谁也不会自愿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另一方面，居住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希望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所以，要想让这些斯洛伐克居民能够移居捷克斯洛伐克，除了按照一个斯洛伐克人交换一个匈牙利人的原则，同匈牙利人签订人员交换协定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可能。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签订这一协定后向匈牙利政府声明，它把已签订的协定仅视为在解决整个问题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所有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都应该返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国务秘书克列门季斯在布达佩斯同匈牙利签署协定后想就解决问题的第二阶段准备进行谈判。但是匈牙利政府和匈牙利

党的代表声明，他们不认为已经具备研究解决问题的第二阶段的可能性。他们说，如果和平会议认为不需要让匈牙利人离开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匈牙利人将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盖达说，由于这一原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除了把这个问题提交和平会议以外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

莫洛托夫说，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得到研究。莫洛托夫说，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有区别的。里普卡先生当时在莫斯科的时候，苏联政府曾经再一次指示苏联驻德国军事当局促使德意志人尽快从捷克斯洛伐克移居。至于谈到匈牙利人问题，苏联政府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应该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按照苏联同波兰达成的移民协定的原则同匈牙利人达成协议。这当然有某些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莫洛托夫说，他很想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否就这个问题与英国人或美国人谈过，他们的答复是什么。

盖达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十分清楚德国和匈牙利之间的区别，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持同苏联政府相同的意见。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匈牙利人，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匈牙利人对捷克斯洛伐克是个内部危险。以往的经验表明，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同德意志人之间没有区别。匈牙利人同德意志人一样，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诚意，赞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看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始终是个危险，看不出有改变他们观点的可能性。至于说同匈牙利人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为了达成这样的协议已经尽力而为了。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现在对后续的谈判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如果不对匈牙利施加任何压力的话。

盖达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不止一次对英国和美国采取外

交行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答复。盖达在伦敦同杰布和汤普逊^①进行过交谈。盖达前天（4月28日）见到了杰布，杰布不断对他说，不列颠政府还没有定下来是赞成或是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盖达说，今天（4月30日）他要到汤普逊那里去。如同原先商定的那样，盖达同汤普逊的商谈结果将会通知博戈莫洛夫。

诺塞克说，他见过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备忘录副本的皮杜尔^②。皮杜尔说，法国不反对匈牙利人移居，但是皮杜尔无法说明法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诺塞克说，盖达是同匈牙利谈判的捷克斯洛伐克庞大代表团的成员。为了达成协议做过不止一次的尝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做出了让步，但是匈牙利拒绝了，因此谈判中断。

诺塞克说，几年以后的将来就可以看出，匈牙利人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将有助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睦邻友好关系。

盖达说，杰布对他说，贝文^③对要不要把这样的问题列入同匈牙利缔结的和平条约草案表示怀疑。

盖达向杰布指出，所说的不是细小的问题，而是重大的问题。杰布说，他认为，贝文不会再接受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决定。杰布建议盖达同贝文进行一次会晤。

至于说美国人的态度，美国国务院起初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给过初步的答复。美国驻布拉格大使施泰因加尔特通知说，美国国务院的答复是肯定的。但是，后来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又通知说，美国国务院改变了自己最初的观点，迄今为止没有就这个问题正式

① 杰布是英国副外交大臣，汤普逊是美国外交部东欧司司长。

② 皮杜尔，法国总理。

③ 贝文，英国外交大臣。

表明过任何态度。

莫洛托夫说，他想请求，一旦有可能就将美国政府和不列颠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立即通知他，这对苏联政府确定方针很重要。

诺塞克强调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来讲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他理解这一点，他已经表明了苏联政府对这一类问题所持的基本态度。苏联政府能办到的事一定会办的。

诺塞克说，如果这个问题被提到圆桌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准备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可能持的反对态度保持中立。

莫洛托夫说，战争一结束就应该更加坚决地行动。在和平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困难。^①

盖达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难以做到很早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去年7~8月份才达成关于德意志人迁居的协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两个问题。

谈话持续了55分钟。

苏联驻法国大使博戈莫洛夫参加谈话。

记录 B. 叶罗费耶夫

1946年4月30日12时30分于巴黎

① 1945年1月，在研究制定与匈牙利停战协定时，捷克斯洛伐克方面试图将关于从斯洛伐克迁移匈牙利人的问题列入停战协定中，但是被苏联方面制止了。参见本卷本专题No09166和No09170文件。

№09282

斯兰斯基关于捷国民议会选举后的形势 给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

（1946年7月16日）

根据苏斯洛夫7月20日指示，该报告抄送斯大林、
莫洛托夫、日丹诺夫、米高扬、马林科夫、贝利亚。

译自捷克文

尊敬的同志们：

感谢你们的来信，现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简要报告寄给你们。

1. 我们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选举结果是我们党的重大胜利。现在，我们是民族阵线的所有政党中的一个最强大的党。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现在我们不仅是工业地区和城市中，而且是农村中的一个最强大的政党。贫农和大部分的中农投了我们的票。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说明，几千个地方的人民委员会将由共产党人领导，布拉格的市长将由共产党人担任，大部分地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及捷希和摩拉维亚的地方自治人民委员会主席将由共产党担任。选举的结果表明，我们成功地打入了城市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尽管我们在这些阶层中的影响远不如在农民中强大）。我们在官员中的影响最小，但是在铁路和邮电部门的员工中我们得到了将近40%的选票，所以说，我们在这一阶层的国家公务员中影响最大。至于说军人，有45%的军人投了共产党的票。

2. 关于组建新政府的谈判遇到了很大困难。首先要解决斯洛伐克民主党参加政府的问题。哥特瓦尔德同志提出，要把接受关于扩大中央政府对斯洛伐克的影响以及限制全权代表和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权限的协议作为斯洛伐克民主党参加政府的条件。哥特瓦尔德在关于这一协议的谈判中成功地做到了使全部捷克的政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共同参加。这样一来就孤立了斯洛伐克民主党，使它不得不接受我们提出的协议。并因此挫败了某些捷克右派政治活动家同反动的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建立统一战线的企图。

另一项困难的任务是如何在某些政党之间分配部长职位问题。为了使国防部仍然掌握在斯沃博达将军手里，不得不进行斗争。民族社会党人提出，他们是否参加政府要视能否得到国防部、内务部或外交部的大权而定。我们把教育部让给了民族社会党人，满足了他们的愿望。我们还不得不把议长的职位让给了他们。这样一来，共产党人只得到了财政部和国内贸易部的部长职位。总共26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占9名，民族社会党人占4名，人民党占4名，斯洛伐克民主党占4名，社会民主党占3名。有两名部长职位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他们是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和外交部长马萨利克。

3. 我们成功地使共产党人提出的政府纲要得以通过。我们制订的方案没有作大的修改就被通过，现将这一纲要的全文寄给你们。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纲要无论在新宪法方面或者在建设计划方面都含有极其重要的条款。目前，为了让群众广泛了解和实现纲要，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我们认为，其他政党接受了这一纲要我们的重大胜利。

4. 选举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人民党和民族社会党的慌乱。在选举之前，这两个党领导人中的右派分子就开始定调子，试图让人相信选举将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胜利。在竞选宣传中，这两个

党使用了反动的口号，并且声称，通过选举可以改变目前捷克斯洛伐克政策中的人民民主方针。这两个党在选举中的失利对这两个党的党内形势产生了影响。

目前人民党已出现了某种危机。以该党主席什拉麦克为首的人民党的民主力量把该党最反动力量的代表人物——女议员科热卢戈娃开除出党。这些反动分子企图夺取人民党的领导权，以改变民族阵线的政策。他们要求召开人民党的紧急代表大会，企图在代表大会上选出反动分子担任党的领导职务（顺便说一下，他们企图解除什拉麦克的党的领导人职务），并改变党的政策，使其合乎反动分子的要求。把科热卢戈娃开除出党使人民党的民主力量得到了加强。

选举结果也对民族社会党产生了影响。这个党的领导人不得不把某些最反动的活动家（例如费埃拉本德）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民族社会党的领导人开始在该党的出版物上更多地强调民族阵线的政策和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讨论政府纲要的实践活动中。尤其在目前政府已经着手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指出，民族社会党人比过去更愿意同我们合作了。

5. 与此相对立的是，目前我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日益恶化。选举的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最弱的政党。大量的社会民主党选民投了共产党人的票，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势力分子利用了这一情形进行宣传，他们把同共产党人的密切合作说成是社会民主党力量遭到削弱的原因。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还在选举开始之前就曾经利用过这种论据，当时连一些担任社会民主党领导职务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也受到了这种宣传的影响而开始动摇。所以，社会民主党在参加选举时，执行了两面的、矛盾的路线。他们既抨击右派，也批评左派；既反对反动派分子，又反对共产党人。这是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失败的主要的真正原因。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社会民主党人靠近我们，重新加强同他们的密切合作。但是我们担心，遵循狭隘的

党的利益的左派分子会受到来自右的影响，我们在克服同他们合作的障碍中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6. 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奥洛莫乌茨和比尔森，在选举人民委员会主席时，发生了3个民族阵线的捷克政党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人的事。尽管这只不过是地方性的事件，我们还是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建立反共联盟的运动。工人们自发地通过罢工和示威游行来反对这一现象。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个别的。

7. 选举以后，党继续接纳新党员。我们在发展新党员中，主要是吸收那些我们想吸收的人入党，即工厂中的优秀工人，农村中有觉悟的农民，以及目前党内数量较少的青年和妇女。同时，我们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用正式党证更换临时党证的运动，这一运动将持续半年。我们想利用这一运动来检验所有的党员，拒绝给那些追逐名利、不忠诚老实和历史不清白的人发放党证。我们还开展了学习运动。例如，9月1日，中央委员会高级党校开课，学习时间为半年。所有的州的地方学校也同时开课，上课时间为4~6周。此外，我们将在各基层和各地区的党组织中开展普及性的学习活动。

8. 最后我们还想指出，第一次以共产党的代表为首的新政府得到了社会各界大部分人士的好评。工厂、企业、群众组织、文化团体纷纷来信，对哥特瓦尔德同志表示好感，表示同意他所提出的建设纲要。

斯兰斯基

1946年7月16日于布拉格

又及：西罗基同志已经将关于斯洛伐克形势的报告交给我，但是因为他这几天一直呆在斯洛伐克，所以我不可能把带这封信的同志要走的消息告诉他。他的报告以后再寄去。

№09284

苏联政府关于调解捷波关系及签订 友好互助条约给捷、波政府的信

(1946年7月26日)

1943年12月12日在签订苏捷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时约定，如果某一个同苏联或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接壤，并且曾经是德国的侵略目标的第三国希望加入这一条约，那么在得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让这个国家加入该条约。

波兰共和国是这样的第三国，它既同苏联结盟又同捷克斯洛伐克结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目前，苏联通过同盟条约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发生联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之间迄今为止尚未建立盟国关系。已经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有同盟关系的苏联，自然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建立类似的关系感兴趣。苏联政府认为，尽管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在领土问题上存在分歧，采取一切措施改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苏联政府认为，可以通过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的途径以达到两国关系的改善，各自对对方提出的领土要求可以在最近两年内通过相互协商取得解决。最好在不久的将来、尽可能在今年8月份签订这样的条约。这样做不仅符合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而且符合巩固斯拉夫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事业和欧洲和平的利益。

苏联政府殷切希望能尽快收到对这封信的回复。

1946年7月26日于莫斯科

№09285

贝奈斯关于调解捷波关系 给斯大林的信

(不晚于1946年8月2日)

抄送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日丹诺夫、
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佐林，第四欧洲司。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①

斯大林大元帅：

衷心感谢您1946年7月29日转告我的意见^②，同意您的意见。我们早在1943年就已经把关于同波兰签订条约的补充内容写入我们的友好互助条约，从而初步拟定我们斯拉夫未来的政治路线。我还在那个时候就致力于捍卫这一思想，从来没有放弃过，今天仍然完全遵循这一思想。不久前，波兰代表团在我国布拉格的时候，我同政府的某些成员一道说过，我们可以表示，我们愿意同波兰一致对付德国。但是，鉴于迄今为止已经同波兰进行的谈判和波兰突然提出要求，我认为，只能在我们双方最终解决涉及双方边界争议问题的时候，才能签订类似的条约。

由于不可能在特欣问题上对波兰的无理要求做出让步（如果同

① 该信是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的临时代办卡什帕列克1946年8月2日交给杰卡诺佐夫的。

② 即苏联政府1946年7月26日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信函。参见本卷本专题№09284文件。

意波兰的要求，就意味着除了其他的方面以外还证明波兰在慕尼黑期间的行动是正确的)，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相互谈判陷入了僵局。

我还认为，您在7月27日的电报^①中提出的倡议有助于促使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谈判，并使谈判向前推进一步。因为我国政府和我本人真诚地愿意同波兰达成协议，并且不排除这可能是一条达成协议之路，所以我不反对进行在你们所倡议的条件下的那种谈判。对于你们的倡议，我国政府和我本人都不想再提出什么条件。我们认为，必须解决我们同波兰之间的所有有争议的问题，直至签订那样的条约。我仍然相信，如果我不能很快到您那里去，您也不会指责我。我相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签订这一新的、对我们两个国家如此重要的条约中会深刻认识到同波兰联合共同抵御德国的重要性，如果他们知道，至今仍是捷克的一部分的前德国领土能得到波兰的起码的承认的话。然而，波兰现在都得到了那么大面积的领土^②，这连它自己也未必想到过。

我也把我的观点告诉了我们的总理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和扬·马萨利克，以便总理在参加巴黎会议（莫洛托夫先生也将参加这次会议）期间能按照我的观点行动。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加快谈判准备的速度，使谈判的准备工作在8月份（即在同德国就签订和平条约进行谈判开始之前）结束。不管怎么样，这有利于随后解决我们向德国提出要求的问题，而不必让西方国家参与这一争端。

我对大元帅您提出的倡议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完全支持这一倡议。对于苏联政府在巴黎会议期间向我国代表团所做的关于在匈牙利问题上提供帮助的许诺，我也向您表示谢意，因为实现我们

^① 原文如此。显然指的还是苏联政府1946年7月26日的信函。

^② 当时波兰西部的土地（西里西亚、波莫瑞）在1945年夏季之前一直是德国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问题上的计划无疑可以增进和加深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和盟国的政策。

忠诚于您的 爱德华·贝奈斯

№09286

杰米亚诺夫与什米特克
关于斯洛伐克共产党影响衰退的
谈话纪要

(1946年8月15日)

抄送巴甫洛夫、佐林，归档。

秘密

什米特克^①在同我交谈中批评了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他认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犯下了一系列重大的错误。

斯洛伐克共产党没有经受住民主派分子的有组织的进逼，被迫把内务部部长职位从自己手中交给无党派人士。

全党曾经坚信，党的领导人把这一重要的职位留给自己是毫不妥协的决定，所以，把内务部特派员的职位从共产党手中交出去的决定引起了普通党员和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困惑不解和气馁。

什米特克认为，这一失策使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位受到普遍削弱。这是由于党在下列一系列问题上推行不正确的政策造成的。

1. 共产党过多地把注意力用于同民主派分子在报刊上进行辩论，而很少注意开展群众工作；没有能够在民主党内部形成进步的核心。在报刊上对民主派分子进行公开的、往往是没有根据的抨

^① K. 什米特克，斯洛伐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击，客观上促使民主派分子更加团结，而不是与此相反，例如：

(1) 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科希策州委会书记瓦洛的一篇抨击民主派分子的文章使共产党遭受明显损失，因为文章的作者把所有民主党的追随者都称作法西斯分子。

(2) 共产党的报刊过多地宣扬民主派在选举中同法西斯分子勾结，预言民主党可能解散。而实际上却是，为此而成立的调查小组却没有能够查出任何能败坏民主党名声的事实，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

(3) 在斯洛伐克自由党成立的时候，共产党的报刊预言，由于天主教教徒和福音派教徒之间存在的矛盾，民主党不可避免会发生分裂。

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相应的策略，支持以费洛和茨温琴克为首的天主教徒，民主派分子是有可能发生分裂的。费洛和茨温琴克曾于1946年3月份向民族阵线提出关于脱离民主派和成立基督教共和党的建议。

共产党对费洛提出了类似共产国际第21条的使他不能接受的条件，从而丧失了时机。而费洛和茨温琴克声称，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态度，又回到了民主党，从而使民主党本身的地位得到巩固。

2. 共产党在斯洛伐克解放后在人民委员会中得到了大部分席位后，没有能够利用有利的时机来争取群众。因为人民委员会不是在民众中开展具体的工作，而是热衷于同民主派进行辩论。

3. 在任命新的内务部特派员时，民主派人士获悉共产党提议推荐费里恩奇克将军担任这一职务后，抢先把这件事告诉了费里恩奇克，以此向他表明是民主派提议让他担任这一职务的。在同列特里赫·费里恩奇克的私下交谈中，他同意接管内务部的事务。

所以说，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老练和策略性。

听完了什米特克的讲述后我问他，这些问题在中央会议上讨论过没有，他回答说，有些问题进行过讨论，而对一些问题他将申述自己的意见。

苏联驻布拉迪斯拉发总领事 杰米亚诺夫

1946年8月15日于布拉迪斯拉发

№09318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关于加速签订捷—波互助条约
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5日)

绝密

亲爱的哥特瓦尔德同志！

我们认为，继续拖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互助条约，不论在苏联还是在其他对我们持友好态度的国家都将造成令人难堪的局面和不良的印象。需要找到一种妥协办法并在近期内签署该条约。我们盼望您能克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分子的阻力并采取同民主波兰接近的步骤。

斯大林

莫洛托夫

1947年2月25日于莫斯科

№09319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关于签订捷—波互助条约
给哥特瓦尔德的信

(1947年2月27日)

绝密

致哥特瓦尔德同志

佐林大使向我们报告了同您和同克莱曼蒂斯谈话的情况，从中了解到，您对我们的信件没有给予任何答复。克莱曼蒂斯的答复我们不认为是对我们信件的答复，况且这一答复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需要的是您的答复，因为我们的信件是写给您的，而不是写给克莱曼蒂斯的。您是想还是不想做出回答呢？^①

斯大林

莫洛托夫

1947年2月27日于莫斯科

① 1947年2月28日，哥特瓦尔德复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其中通报说，在拟定于最近召开的政府会议上，将按照莫洛托夫的建议，提出与波兰签订带有议定书和补充协定的同盟条约问题。1947年3月10日，在华沙签署了捷波友好互助条约。

№09322

杰米亚诺夫与胡萨克 关于蒂索案件的谈话记录

(1947年3月28日)

送第四欧洲司，送大使馆，归档。

秘密

摘自 И.Я. 杰米亚诺夫日记

胡萨克向我介绍了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就民族阵线在蒂索案件问题上的共同立场问题所进行的会谈情况。共产党人劝说社会党人同他们一起共同反对赦免蒂索，但是莱特里、茨温切克和波拉克回避直接做出回答。^①

据胡萨克所了解的情况，波拉克有一次曾经说漏了民主党人关于支持蒂索提出的赦免请求的约定。

从胡萨克的谈话中我理解到，他认为对蒂索的审判是不得民心的，处死蒂索未必能巩固和加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地位。

① 1945年5月15日，斯洛伐克民族议会根据科苏特纲领的第九章通过了关于惩罚法西斯罪犯、占领者、叛徒以及投敌分子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对前政府高级官员蒂索提出了诉讼，追究其对国家在1939~1944年期间的内外政策方面的刑事责任。但斯洛伐克社会对于蒂索的诉讼程序反应不一。一部分人认为他协助分裂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斯洛伐克民族的保卫者。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力争对他处以最高刑法。教会人士和民主党队伍中的一些政治家极力阻止这样做。各政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蒂索的诉讼案（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以宣布被告死刑而告终。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胡萨克的意见，强调了这场审判对期待法庭能给予蒂索应得惩罚的人民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至于说各政党在处决蒂索之后在群众中的地位，在我看来，形势将对共产党最为有利而不是相反。

在谈话结束时胡萨克向我通报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和行政委员会关于将他们占用的房屋无偿提供给总领事馆使用的决定。据他说，本拟将这些房产的产权移交苏联，但未获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批准。

我对胡萨克表示了感谢，感谢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和行政委员会如此盛情地向总领事馆提供房屋。我同时请他将关于此事的决定书面通知我们。

苏联驻布拉迪斯拉发总领事 杰米亚诺夫

1947年3月28日于布拉迪斯拉发

№09334

杰米亚诺夫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问题与
弗拉什塔茨基的谈话纪要

(1947年6月10日)

送第四欧洲司，送大使馆，归档。

秘密

摘自 H.Я. 杰米亚诺夫日记

弗拉什塔茨基^①首先表示了对斯洛伐克总的内部政治局势的不满，认为这种局势对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均将在产生负面影响。他把造成这种局势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在国家活动的所有问题上都对斯洛伐克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沙文主义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现在刚刚获得了平等参加建设统一的共和国的权利，并正在积极地为维护业已争得的地位而斗争，但是捷克沙文主义者们却千方百计地力图缩减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权利，从而造成国内的紧张局面，并引起斯洛伐克人心中对捷克人的仇恨。

弗拉什塔茨基认为，捷克人限制斯洛伐克人民族权利的企图正在毒化国家的整个局势并为未来开创人们所不希望的恶劣先例。

在谈到由于民主党的立场而即将在布拉格举行的民族阵线会议

^① P. 弗拉什塔茨基，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的时候，弗拉什塔茨基认为，对民主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并不会使局势得到改善——民主党人将要求给予斯洛伐克人以一定的民族权利并最终将争得这些权利。至于民主党内混进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问题，弗拉什塔茨基说，这种人在其他政党中——其中既有捷克的，也有斯洛伐克的——也有很多。问题并不在这里，整个问题在于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权利。

我问他，为什么民主党的领导人一方面承认自己的党里混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事实，并签署了关于净化社会生活的声明，而另一方面却至今不采取果断措施把混进党内的分子清除出党。弗拉什塔茨基回答说，该党的领导人已经让布加尔、肯普尼、斯塔什科和其他一些人离开了党的主席团，但是在对待共产党提出指控的许多人，民主党人是不能同意这些指控的，并且将在民族阵线的会议上为他们申辩。

在谈话结束时弗拉什塔茨基表示，历史归根到底将证明我们在捷克人面前提出的要求是正当合理的。

我们在争论不休，而事情依然如故。任何一个问题也未解决，人民对我们感到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

杰米亚诺夫

1947年6月10日于布拉迪斯拉发

№09339

古利亚耶夫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局势的分析报告（摘录）

（不早于1947年6月22日）

绝密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报告

从6月12日至6月21日我因公出差去捷克斯洛伐克。^①在那里我有机会会见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许多州、县级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我认为在本报告中概述一下这些交谈的结果和我个人观察到的情况是适宜的。……

政治形势

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党派间斗争的尖锐化和受盎格鲁撒克逊人支持的反动分子的日益活跃。这些人的言论带有明显的反共和反苏性质，过分宣扬并不存在的美国人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功劳，极力吹捧美、英民主制度的无限美妙。

^① 古利亚耶夫前往捷克斯洛伐克，是为了向哥特瓦尔德介绍日丹诺夫给法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的内容。参见本档案选编第24卷“苏南冲突及其结果”专题№09333文件。

如果说在过去各反动政党主要是在议会选举前夕才在群众中开展积极活动的话，那么现在，则可以断言，它们已不再等待竞选运动的到来而在动员自己的骨干分子和动用各种手段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大规模的工作。他们组织的群众示威和在报刊上的宣传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人民民主制度的凶恶敌人——农民党的领导人钻进国家社会党以及他们的积极活动，该党过去的领导人津克利等一些入坠入反动阵营使这个党成为反苏、反共运动的先锋。

与英国工党联系密切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的左翼势力已大大加强。据哥特瓦尔德同志称，费林格作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并没有掌握该党，在党内并不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费林格和劳什曼在支持共产党人的立场，特别是支持在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立场方面越来越经常地表现出动摇不定。

国外的，主要是美国的反动势力的影响借助于对外贸易的渠道正在明显地扩大：建立了各种经销处、事务所、代办处。据粗略统计，目前在国内有近3万名外国人，其中主要是美国人，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是军人。他们走遍全国，在布拉格简直是随处都可以碰见他们。应当指出，政府和某些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人士，其中包括某些共产党人，都把这种情况看做是给他们带来美元收入的有利因素。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中产阶级中，在美国人面前逢迎讨好更为普遍。

在互派教授和留学生方面也下了很大力气。以互派方式在捷克斯洛伐克就读的外国留学生有5000多人，不少于在国外的捷克留学生总数。有数十名捷克教授被邀请赴英国、美国、法国及其他国家。

反动政党在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当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反动势力主要就是在这些人中网罗其开展群众工作的骨干分子的。应当指出

的是，一些高年级的大学生是在德国人统治时期，即在效忠于法西斯德国的情况下进入高等学校的。

外国文学作品充斥图书市场，国外反动报刊广为传散——所有这一切同样在促进反苏和反共宣传的扩展。还有人在花大力气试图在工人阶级中间扩展这种宣传，把美国人当做这个国家的解放者而开展为其募集资金修建纪念碑的广泛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国家社会党甚至敢于在拥有“斯科达”等国内最大的工厂的大工业中心比尔森市开展这一运动。

反动势力的这种积极活动也波及到政府和议会中。他们明目张胆地加强了阻挠和破坏民族阵线国内政策纲领以及企图使对外政策转向西方的活动。

共产党人揭露反动势力及其境外人员的宣传活动目前还具有局限性。共产党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反动政党的敌对宣传和在公众场合的一次次演讲所带来的危害。例如，尽管苏联大使馆参赞博德罗夫同志曾当着我的面向哥特瓦尔德指出，国家社会党人为庆祝该党成立50周年而于6月8日组织的示威游行人数很多——总共不少于20万人，但共产党布拉格州委员会的书记们却竭力要证明这次示威游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其参加者最多不超过10万人。应当指出的是，各工会在共产党支持下为祝贺国际工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召开而于6月13日组织的示威游行总共才有不足10万人参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活动

在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之后，共产党现在共有113.3万名党员，已成为一个大党。该党下设组织严密的中央、州、县各级党的机构并均拥有素质良好的领导干部，其中一部分经过了合法的和秘

密的党校的培训。

党的基层组织是按两种类型建立的——按工厂和按地域，而且属于某工厂党组织的党员同时也必须参加所处地域党的组织生活。基层组织的工作并不很活跃，只是在由党的领导层进行的大的政治运动之前，例如议会选举、组织游行示威或其他政治行动，才开展积极的活动。

关于建立党的骨干队伍问题尚未被党的领导层作为首要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据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巴雷什称，对共产党员的认真的培养教育工作预定在年底之前开始。目前有为州、县级工作人员开设的政治学校和训练班网在运作。这些学校一年培训了 2437 人，学习期限从 1 周到 6 周不等。中央党校的培训期为 6 个月，正在培训第 2 届 50 名学员。

由共产党组织的一系列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均把党描述成一支能被成功地动员起来进行主动进攻性斗争的强大和积极的力量。党内活动，特别是在共产党员的教育方面的活动的逐步扩展将大大提高其战斗力。

据哥特瓦尔德称，党把其基本的政治任务确定为在下届普选中取得议会中的多数。为此目的党采取了各种强有力的措施，以便把大批选民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在农村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为实施各项最重要的农业法案进行积极的斗争；根据共产党人的倡议在农作物收获季节由城市居民组成突击队前往农村帮助收割。这种在群众中争夺影响的斗争遭到反动势力日益激烈的抵抗，他们在大选中败北之后依然在国家机关、军队、中产阶级、农村以及大学生中保存了群众基础和强大的阵地。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渗入很不够。在国家机关的共产党人数量很少，甚至在由他们领导的一些部里也是如此。例如，在由诺塞克领导的内务部里，在部属 48 个司、局长中

仅有 14 名共产党人；财政部共有这一级别的干部 75 名，其中只有 5 名共产党人；在由其他政党的成员担任部长的部，情况比这还要糟。例如，在由社会民主党人劳什曼担任部长的工业部，在 131 名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员中只有 13 名共产党人；在外交部的 51 名干部中仅有 7 名共产党人；在司法部仅有 2 名共产党人，而且这些人均身居次要职位。

据一些捷克领导同志说，在国家机关的基层和中间环节中，情况同样很糟，在那些地方是反动的国家社会党的影响占据优势。这种情况被利用来破坏政府的一些进步的决议的实施，并且可能还会给共产党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加强和巩固，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甚至还出现了新的困难。由于有大量从英国返回的军官的参加，反苏的军官集团大大地得到充实，这些人加强了在军队高层和中间指挥人员中的反动势力的地位。

共产党人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在士兵中开展教育工作。由共产党人担任的指挥员的数量很少，而且其地位也很不巩固。他们的职务提升受到阻挠，他们被从最重要的岗位排除出去。表面上不问政治和冒充苏联的朋友的斯沃博达将军所占据的地位实际上加重了共产党人这种处境的形成。

军官们很低的物质待遇（一个中尉仅收入 2000 克朗，而工人的平均工资却为 3000～5000 克朗）妨碍着把出身于民主阶层人民的军官吸引到军队中来。

但是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不能令人满意的最主要原因乃是缺乏为加强和巩固军队的战斗力和争取由共产党人占据军队中重要地位而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斗争。在青年人中和平主义情绪很强烈。甚至连身为共产党人的青年人也不愿意进军事学校以及飞行员和坦克手等学校。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向共产党员和人民阐明建立和巩固

一支忠于人民的民主军队的必要性。

所有这一切使反动势力手中有了在形势激化的情况下可能对民主力量造成严重威胁的最危险的工具。

这样，得到的印象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将其主要的活动集中于争取议会多数，而与此同时却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反动势力在国家机关、军队、农村，在各中产阶级以及其他方面重要阵地。由此而导致一个拥有上百万党员和组织良好的机构的党却没有被充分地动员起来去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该党尚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而且还应当指出的是，该党的领导人目前还没有为党提出这样的任务。例如，哥特瓦尔德在今年6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党的状况和在党的建设方面党的诸多任务。

斯洛伐克的局势

斯洛伐克业已形成的局势需要予以特别细心的研究。

这是一个在经济方面实力很弱并且在战争期间大受摧残的地区，其经济恢复得极其缓慢，实施工业化计划的成果尚不明显。

斯洛伐克和捷克两个地区的经济形势的反差太大，特别是在劳动者的境况方面：斯洛伐克工人的工资比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工人要低，农业同样也大大地落后。农业方面的改革尚未完成并且在受到反动势力的破坏。

蒂索法西斯主义政府的统治在其覆灭之后留下了大批敌视现行制度、受过希特勒分子训练的人。现在他们已经渗入了民主党，并且在该党的反民主、反苏立场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民主党同在居民中拥有很大影响的天主教反动势力结成联盟，

从而加强了国内反动势力的力量并同国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这样一来，斯洛伐克民主力量就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对手，这个对手拥有富有经验的干部并且在群众中颇有影响。他们在国家和社会机构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利用中产阶级的分离主义情绪，组织了对民主力量的进攻和对民主改革的破坏。

据共产党的领导人自己说，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大选之后不得不把一系列重要阵地让给反动势力，因而该党的地位是不巩固的。

在组织方面共产党还不够强大，其党员数量尚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做过有组织的统计工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数字是15万~16万。据他们称，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不高。关于党员缴纳党费的材料很有代表性：4月份16万党员中有近40%缴纳了党费，而5月份（以6月17日为准）同样数量的党员中只有约20%缴纳了党费。

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具有党的领导工作的足够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

内部的不协调妨碍了党的集体领导和党的团结。在这方面应当补充提到的是：西罗基同志作为党的领导人，同时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副总理就很少到斯洛伐克来，也很少过问党的工作。在布拉格政府担任农业部长的朱里什情况也是如此。

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尚得不到来自捷克共产党的足够的帮助，目前事情还仅限于口头上的许诺。

两个中央委员会之间在工作上互无联系，协调不够，这给斯洛伐克共产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存在着互相指责，甚至在领导人中间互相指责的情况：斯洛伐克人被指责有分离主义，而捷克人则被指责有大国沙文主义。

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反动势力面对的就是一个在组织上比较弱的并且其领导班子也很弱的党。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当前需要做许多事情以便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党。领导干部问题是一个需要在捷克同志的帮助下尽快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书记们一再抱怨苏联学者、演员、作家对斯洛伐克的冷落，因为他们总是回避访问斯洛伐克。书记们请求我们在宣传和介绍苏联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

II. 古利亚耶夫^①

^① 古利亚耶夫，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该报告由苏斯洛夫发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苏斯洛夫在递送报告的附言中写到：“古利亚耶夫的报告无疑会引起兴趣”。

№09342

斯兰斯基关于捷国内局势给联共（布） 中央对外政策部的报告（摘录）

（不晚于1947年6月27日）

译自捷克文^①

绝密

2. 关于政治形势

民族阵线内的形势正日益紧张和困难。

反动分子正越来越多地渗入参加民族阵线的国家社会党和人民党两个党。已渗入国家社会党的都是前农业党中最积极的反动分子，这些人正在国家社会党建立自己的影响。该党主席彼得·津克利正在成为最含有敌意的反共政治活动家。

社会民主党动摇不定的立场使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该党主席费林格没有把党控制在自己手中。现在该党内右翼分子正在巩固扩大。工党的一些反动领导人则在通过各种渠道对他们施加影响。担任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某些问题上支持我们，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又同民族阵线中的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反动势力特别注重利用议会来达到阻碍和破坏政府工作的目的。在议会权力至上的掩饰下，所有那三个党的议员们都联合起来，以便在议会中讨论政府提请审议的任何一项法案时进行捣乱。

^① 苏斯洛夫将该报告转呈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并通报说，该报告经哥特瓦尔德同意。

参加民族阵线的所有这三个党里的反动分子一直在力图结成联盟来对付我们和孤立共产党。我们不得不随机应变，利用某些党之间的分歧，时而同这一个对手联合，时而又同另一个对手联合，以便能采取一些必要的重要措施。

当前我们认为最紧要的是采取对付斯洛伐克的反动势力的措施。斯洛伐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薄弱的和最危险的地方。斯洛伐克民主党早在大选之前就已经同天主教徒订立了所谓的协议^①，这个协议实质上就是同格林科夫的人民党从前的代表人物的协议。借助这个协议，分离主义的反捷克和反苏分子在民主党内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渗透到斯洛伐克的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

我们通过处决蒂索给了他们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争取到处决蒂索并非易事。直到最后一刻我们的捷克伙伴和总统还在犹豫不决。只是到了我们非常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到总统面前并威胁说我们将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的时候，我们才在政府中就此问题上争取到了多数。民主党的代表们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确信蒂索不会被处决，政府不敢将死刑判决付诸实施。在处决了蒂索之后，民主党的代表们在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中通过了一项关于罢黜审判蒂索的法官——共产党人达克斯涅尔博士的决议。政府下令撤销这一关于罢黜达克斯涅尔的决议，但是民主党的代表们不愿意服从这一命令。

我们建议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来对付民主党内的反动分子。我们要求：将民主党的某些已声名狼藉的代表清除出该党；政府在斯洛伐克也行使全权；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特派员要服从政府的部长；对拒绝执行布拉格政府部长命令的民主党代表应予以免除职务。

^① 指的是在1946年的议会选举前夕，民主党领导人与天主教徒订立的“四月协定”。在斯洛伐克在民族阵线范围内，有两个党——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主党在起作用，而民主党试图将一些福音教派的信徒联合到自己的队伍里，以此来保证该党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些措施能否得以实施将取决于其他的捷克政党和总统是否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实行它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同意我们的上述建议，而其他政党则暂且只承认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尚未表示同意实施我们所建议的严厉措施。我们认为我们将能够做到迫使他们同意实施其中的某些措施。

民主党人威胁说，他们将挑起政府危机，他们半退出政府并且将不服从政府的决定。我们并不怕他们的这种威胁，并且能够掌握住斯洛伐克的局势，但是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其他捷克政党和总统将同我们团结一致。在解决处决蒂索问题的时候，民主党人同样也曾以危机相威胁，但是他们最后孤立无援，因而未敢公开站出来反对政府。

为了采取对付斯洛伐克反动势力的措施，我们需要得到参加民族阵线的其他政党的同意，恰恰是这一情况经常迫使我们做出让步和通过在其他问题上的妥协来争取他们的同意。

至于有关新宪法的问题，目前尚未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其他政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一些有争论的主要问题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这些问题将只能在秋季加以讨论。反动势力将试图在说明革命的成果（国有化、民族委员会的全权等等）的时候，为他们今后消灭这些成果的企图留下可钻的空子。我们决定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不做任何妥协。在必要时宁可在没有宪法的情况下举行本应在一年之后进行的选举，并率领群众为制定新宪法而斗争。

我们之所以对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通过新宪法没有把握，也是因为按照宪法解决斯洛伐克问题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3. 关于党内形势

在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曾经提出了关于必须加强反对反动势力和争取人民的多数支持我们的政策的斗争问题，在这次全会之后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在明显加强，在组织上也在不断壮大。

工厂委员会的选举已经表明，党在工作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多数。在各级工会代表大会上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不仅仅在基本工业部门的各级工会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多数，而且在铁路员工中，在教师和教授联合会中也同样争取到了多数。

我们同反动势力之间的主要斗争在于争夺农村。在最近的大选中，我们不仅仅在工业区，而且在农村都曾经是力量最强大的党。在农村，绝大多数的小农是拥护我们的。尽管反动势力不断地攻击我们，但我们在农村的阵地依然是牢固的。现在我们又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争取中农的任务，并正在动员全党去完成这一任务。反动势力试图借助于农民统一联盟和农业合作社等该党至今仍然拥有强有力阵地的组织来巩固自己在农村的阵地。我们认为，我们的农业政策将给我们带来成功，我们将能够加强自己在农村的影响。

对于我们来说最困难的形势是在城市的中间阶层，在官吏和商人当中，这些人中大多数迄今一直在追随反动势力。

党进行了党员的重新登记。截至1947年1月1日，党在捷克各州共有已登记的党员120万名。其中有数万名是经过两次登记的。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在解放之后最初几个月里迁往边境地区的，他们在原籍和边境地区均进行了登记。这些人中的另一部分是一开始在当地的组织中，后来又所在的工厂组织中进行登记的，结果是两次登记为党员。

在更换党证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共有登记的党员1035000人，我们把党员重新登记与审查党员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并清除了数万名表现消极、不忠诚和名利熏心的党员。自1月1日起我们已接收了98000名新党员（其中46%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目前在捷克各州的党组织共有党员1133000名。最近几个月入党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今年的5月1日重新显示了党的力量，此后我们仅仅在5月份就发展了26000人入党。

№09345

斯大林关于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与 捷政府代表团的谈话纪要

(1947年7月9日)

秘密

参加谈话的有：约·维·斯大林同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哥特瓦尔德，外交部长马萨利克，司法部长德尔蒂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秘书长亨德里赫和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霍拉克。

斯大林同志同哥特瓦尔德：“你们有些什么问题要向我们提出来？”

哥特瓦尔德回答说，他们希望讨论3个主要问题：

1. 关于参加1947年7月12日的巴黎会议问题。
2.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法国的条约问题。
3.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同苏联对外贸易部长的贸易谈判问题。

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地问哥特瓦尔德，他们希望从哪一个问题开始讨论。

哥特瓦尔德回答说，最好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斯大林同志说：在维·米·莫洛托夫同志从巴黎返回莫斯科的2~3天之后，南斯拉夫人就向我们询问，他们该怎么办，是参加将于7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还是不去参加，并且表明了自己的

意见，说他们考虑拒绝参加这次会议。随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起初我们曾经想建议他们前往赴会，并在那里就地使其无法进行，而后来根据从我们的大使们那里收到的材料我们确信，在向欧洲提供贷款援助的幌子下正在组织某种类似反苏的西方集团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果断地决定并将我们的意见告知了他们所有的人说，我们反对参加这次将于1947年7月12日举行的会议。

我们对你们决定参加这次会议感到吃惊。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乃是一个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间的友谊的问题。你们在客观上是在帮别人孤立苏联，不管你们主观上是否愿意，但的确是在这样做。请看看结果是个什么样子：所有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都不参加这次会议，而同样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却去参加。那么，他们就会判定，既然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拉到孤立苏联、反对苏联的一边，那就是说，它同苏联的友谊已经不是那么牢固了。这将被看做是反对苏联的胜利。我们和我们的人民不能理解这一点。你们必须取消这一决定，应当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并且这件事你们做得越快越好。

马萨利克请求斯大林同志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很清楚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对西方的依赖性。工业界的代表们认为，为了不错过获得贷款的机会，参加此次会议是适宜的。就在此时，波兰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并告知我们说，他们已决定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最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关于参加1947年7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会议的决定由所有政党一致做出的。

马萨利克继续说，他曾经赞成参加这次会议，他不打算推卸为此而应承担的责任，但是他请求斯大林同志注意到，不论是他还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从未打算通过这一决定来做任何反对苏联的坏事情。马萨利克最后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帮助他们改善

处境。

莫洛托夫同志向马萨利克指出：你们去参加会议本身就是反对苏联。

马萨利克回答说，他本人、政府、所有政党以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都不愿意也绝不会做任何反对苏联的事情。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没有怀疑过并且现在也不怀疑你们对我们的友谊，但是实际上客观出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德尔蒂纳说：他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他所属的全党申明，如果说我们的决定是反对苏联的，那么我的党是不希望这样做的，并且也不会这样去做，我的党甚至连有可能使人得到把我们的做法解释成是反对苏联的借口的事情都不会去做。与此同时，德尔蒂纳还请求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有别于除苏联之外的所有斯拉夫国家，它的出口和进口有60%有赖于西方国家。

斯大林同志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的贸易存在的是逆差，捷克斯洛伐克不得不向西方支付外汇。

德尔蒂纳说：他指的是出口和进口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人民认为，如果我们不去参加这次会议，那就意味着我们将得不到贷款，从而我们就将降低我们居民的生活水平，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苏联的贸易在1947年已急剧下滑了。在结束其发言的时候德尔蒂纳请求帮助他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增加同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需要的某些产品是可以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例如石油工业管道、窄轨铁路用的铁轨、车箱以及其他等等，并且我们可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签订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定。

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向西方大量出口轻工业和纺织工业产品，而苏联则暂时还不购买这些产品。

斯大林同志说：为什么不买？我们要买的。

哥特瓦尔德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合公报中写明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来访苏联将给我们些什么。

马萨利克和德尔蒂纳请求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帮助他们研究出拒绝参加巴黎会议的理由。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看一看保加利亚人是以什么样的措辞拒绝参加会议的，你们同他们商量一下，然后提出关于拒绝赴会的理由的措辞。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关于同法国的条约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按照贝奈斯的说法，似乎是我们苏联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这是不确实的。我们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同法国的友好互助条约，但我们同样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条约不要次于同苏联、同南斯拉夫、同波兰的条约。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关于一旦遭到侵略立即给予援助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捷克斯洛伐克需要这样的援助，因为它是一个小国。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他搞不明白，为什么德国的一些仆从国，例如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在进行侵略的时候能够干得比德国本身更猖狂。历史告诫我们，并非一定要由德国自己去进行侵略，它也可以借助于自己的仆从们去干这样的事。所以，苏联希望的仅仅是一点，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不要次于它已同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签订的那些条约。

马萨利克说，当他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法国之间的友好互助条约问题接见法国大使德让的时候。德让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对法国提出的要求比苏联同法国签订条约时写入的还要多。

斯大林同志确认：在苏联同法国的条约中，确实没有写入关于一旦发生侵略缔约双方应立即予以互相援助的问题——这是由于我

方的疏忽，但是我们打算对条约的这一部分进行修正。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在同英国的条约中写入了关于一旦发生侵略缔约双方应立即予以互相援助的问题。

哥特瓦尔德说，他还有几个比较小的问题，他将就此写信给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表示同意。

在谈话结束时斯大林同志提醒哥特瓦尔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所有成员，必须在今天就拒绝参加巴黎会议，即在1947年7月10日。

马萨利克说，他们将于明天讨论这个问题，只有在傍晚时分才能把自己的意见呈报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这件事应该马上办。

代表团对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接见和所给予的必要的忠告表示感谢，并答应将像已经商定的那样做好一切工作。

记录者 博德罗夫

1947年7月9日于莫斯科

№09346

斯大林对贝奈斯 关于捷对外政策问题的来信的意见

(1947年7月11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日丹诺夫、
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

秘密

从总统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总统认为苏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之间的互助条约持否定的立场。我不同意对苏联立场做这样的解释，并认为有必要申明，苏联是赞成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之间签订互助条约的，因为这样一项条约将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而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应当认为也是有利于苏联。

同时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之间的条约不应次于或弱于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业已签订的那些条约。这些条约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互相支援以反对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侵略；第二，对正在准备中的和已经开始的侵略立即予以援助。法国人把这两个方面排除在条约之外，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在同一系列国家签订的条约中业已争得的有利地位受到削弱。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应当同意对捷克斯洛伐克有利地位的这种削弱，而应当争取使法国同意签订一项不次于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已经签订的那些条约的条约。我们不明白法国人为什么要把关于德国在侵略行动中的同盟者的提法去掉。难道

德国的同盟者不会像德国一样对捷克斯洛伐克构成威胁？我们同样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法国人要去掉关于一旦发生来自德国及其同盟者的侵略而自动予以支援的内容？俄国倒是可以不在乎关于自动予以支援的内容，因为它拥有辽阔的土地，所以它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暂时后撤 100~200 公里以等待来自自己盟国的援助，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小国，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关于立即自动予以援助的内容，因为只要敌人从边境山区突进约 40 公里，捷克斯洛伐克就可能要陷入灭顶之灾。法国人在立即予以支援问题上已经使捷克斯洛伐克上过一次当了。不能让捷克斯洛伐克忘记这一教训。

除此以外，还应当考虑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同法国的条约中同意削弱自己的地位，则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苏联、南斯拉夫和波兰同法国相比就有可能陷入不利的境地。从而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他们将开始比照法国的先例。^①

1947 年 7 月 11 日于莫斯科

① 原文件上有如下标注：“责成驻布拉格的苏联代办博德罗夫同志将该文件交给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贝奈斯的来信，是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哥特瓦尔德先生收到的。

№07479

普希金与马罗山关于捷社会 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谈话纪要

(1947年11月21日)

抄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送巴尔干司。

绝密

摘自普希金的日记

马罗山^①刚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他作为客人参加了在布尔诺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马罗山不满意大会的结果，因为在大会上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取得了胜利。他的结论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党派。马罗山说：“我没有看到一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唱国际歌，只唱国歌。”

马罗山认为大会中费林格派和右派大致是一回事儿，他们之间的斗争由中间派决定，他们的极大多数又支持右派。劳什曼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马罗山评价他为中间偏右派。

马罗山告诉了我大会期间的一些幕后谈话。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建议匈牙利人组织发行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接纳全欧洲国家的左派参加。萨卡伊奇^②许诺原则上同意并表示：将由黎斯·伊什

① 马罗山，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

② 萨卡伊奇，匈牙利副总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特万代表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参加这个报纸的编委会。

马罗山和英国工党党员丹尼斯·希利有一段有意思的谈话。后者曾是共产党员，他鼓动马罗山积极参与反对匈牙利共产党，因为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挽救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不被消灭。希利告诉马罗山，莫斯科决定在一年或最多两年内取缔东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他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他指责马罗山在与共产党人合作时越来越接近他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共产党人。马罗山回答他说，自己还不是共产党人，但并不怕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这样发展比希利的发展要成功——后者从共产党人“发展”成了工党右派党员。希利恼羞成怒，中断了与马罗山的谈话。

马罗山最后对我说，布尔诺代表大会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左派决定向右派发起进攻，以防止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右派取得捷克式的胜利。

1947年11月21日于布达佩斯

№09492

梅德韦杰夫
关于二月事件后捷国内情况
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
(1948年3月29日)

绝密

自1948年2月20日至3月1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逗留期间（由于第三次全斯拉夫民族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在布拉格进行），我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局势的一些情况，并产生了一些印象，感到有必要进行汇报。

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间的
政治事件和这些事件的后果

观察最近国内政治事件的过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足够了解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力量和正确评价这个力量，因此在1948年二月事件的过程中，过分相信有最广泛劳动群众支持的政治行为的特殊作用。

最近的政治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力量对国内反动派斗争的胜利，明显地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只有坚持与国内反动派进行不妥协的政治斗争（包括民族阵线内的），只有坚定和坚决地实现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进一步的民主化改革，才能保证真正地巩

固人民民主阵地，在新的道路上发展民主。

共产党对于在改变国内政府的成分及其政策，使人民群众的民主组织（特别是工会组织）加入到民族阵线内，以加强民族阵线内部的一致性等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对于民族阵线其他党右派分子的严重失败，以及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天主教）和斯洛伐克民主党领导人的威信扫地，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出宽容和自信，不加批评地评价所发生的政治进展和反对派在国内的失败。

国内反对派的失败和不断加剧的政治派别的尖锐分化过程，使全国形成了一种许多可疑的政治派别加入到捷克和斯洛伐克共产党队伍中来的倾向^①。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共产党领导人实行大量接收党员的方针），引起党员在思想和组织质量上的严重危险。

因此必须指出下列问题：

1. 今年3月8日，在莫拉夫斯卡亚—奥斯特拉瓦市一些高等学校和企业内发现了秘密的由民族社会党反对派集团散发的传单，目的在于号召反对派“保存力量，不要和现今的政治体制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相信马萨利克和贝奈斯的思想一定胜利，因为我们的时代很快就到来”。这些号召与那些其他党派（非共产党）中右派所信奉的战术，即“保存在现有条件下可以保存的一切力量”，以及右翼党派的政策——企图在组织上全力保存这些党的地方组织以此来保存他们在基层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2. 从捷克和摩拉维亚的一些城市（赫拉德茨、克拉洛维、利托美什里、布尔诺）和斯洛伐克的一些城市（布拉迪斯拉发、科希

^① 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巴什托万斯基确认：1948年2月前加入共产党的人数为每月5000~10000人。而“在2月以后的一个月中，斯洛伐克共产党就增加了30000人。可以期望，最近还会有30万人加入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队伍”。西罗基毫不隐讳地说，在一些共产党中有不少“暗藏的和明显的无赖，他们用各种借口把自己装扮起来，钻进共产党内，这就叫做投机分子”。

策、图尔羌斯基—上马尔基)市领导人(共产党员)的谈话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过高地评价了对反对派所取得的胜利,倾向于确认在右翼政党内部发生的“深刻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解体”(在斯洛伐克:佛里施同志、诺沃麦斯基同志、马乌列尔同志、卡博什同志等)。

3. 同一些共产党员和民族阵线组织的活跃分子的谈话表明:他们大多数人不能准确地说出现在国内及政治生活和各地成立的行动委员会(有一些是自发成立的)^①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对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对待一些人的态度方面,已经给许多党员和这个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带来不公正的惩罚(按照清洗的方式)。比如,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某些工程师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要求严厉而被辞退,而这一点却被认为是他们对现存制度不满。同时,参加“行动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时常地用直接的行政手段和方式不合理地干预国家管理的事务,撤换地方政权的合法机构——民族委员会。在一系列场合下,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人民政权这些机构的威信没有得到提高,特别是在逐出了他们中间的反动分子之后,这些共产党员允许“行动委员会”不合理地干涉民族委员会的职能,有时还直接撤换它们。

4. 如果说在今年2月底到3月初捷克斯洛伐克政治斗争尖锐化的激烈阶段,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政治成熟性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对国内的重大转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那么知识分子各阶层(特

① “行动委员会”是在所有工厂、机关和政治党派的地方组织中成立的由共产党员组成政治清洗的工具。例如,在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成立的行动委员会于1948年2月25日向政府领导人提出了要辞退的机关职员名单。尽管贝奈斯没有同意进行政治清洗,但还是进行了人员的辞退。行动委员会以充实民族阵线组织为借口,解散了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民主党的地方组织,使这些过去在民族阵线里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伙伴变成了没有群众基础的党派。

别是在地方机关)的思想状况则导致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消极现象,因为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国内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在估计右派及其首领的破坏活动方面,他们的思想处于令人吃惊的混乱状态。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 一些国内政策和党的建设问题上的立场

二月事件期间在布拉格召开了农民大会,在市中心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有15万人参加)。在大会和游行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朱里什)答应,党将通过农业方面的全部法规,其中包括土改方面的法令,该法令所依据的原则是超过50公顷以上的地主土地收归国有。当时农民代表团喊叫着坚决要求把土地使用标准限制在20公顷以下。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与斯兰斯基同志、施维尔莫娃同志、科佩茨基同志、戈明杰尔同志谈话时,对于所提出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按农业改革新规定来确定土地使用限度的观点的问题,斯兰斯基同志回答说,党将在国会中确定的数额为50公顷。对于农民中存在的限定20公顷对农民有利的情绪,斯兰斯基同志回答说,这个数额不可能被采纳,因为在早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就要求在国会中通过50公顷的限额标准,并告示农民,法规正是按照这个精神制定的。当时很清楚,50公顷这个标准是国会委员会所提建议中得出的折衷数字(在二月事件很早以前),当时共产党不可能在其他党的面前再降低这个标准了。现在国会确认了这个土地使用的标准——50公顷,并以此作为土地改革的法规。

尽管斯拉夫国家代表团在布拉格全斯拉夫民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一系列有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状况的事实,一些集

团对待匈牙利人的沙文主义事实和歧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居民的事实（这些都是些斯拉夫国家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谈话的内容），斯兰斯基、施维尔莫娃、尼耶德利、诺沃麦斯基、科佩茨基在申述斯洛伐克人民群众情绪的同时，都试图证明他们有权对匈牙利人使用这种政策，并特别强调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来说“匈牙利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据说这首先是指，从捷克斯洛伐克迁走的是匈牙利富农。实际上并不是那样，因为匈牙利人迁回匈牙利的问题，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对待匈牙利居民的不适当政策，以明显的形式涉及到这部分居民中的无产阶级部分（特别是东部斯拉夫人）。

在大量接收共产党员进入共产党的问题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虽然承认有敌对分子钻入党内的明显危险，特别是那些从其他党派投奔来的人，但他们仍然坚决地坚持必须无条件地大量吸收人们入党的观点，目的是在大选中利用他们的选票，以后再计划进行清洗党的队伍。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斯兰斯基、施维尔莫娃）同意，在这种形势下应该坚决地提高和开展党内的思想工作，尽管应当指明，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还没有做。

关于根据改组民族阵线和加强民族阵线范围内群众的政治统一而斗争的精神和计划，在最广泛的各界人民群众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承认，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认真组织。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方面交换意见（3月1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谈话）表明，根据民族阵线计划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任务，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改组后民族阵线中央及地方的“行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

今年2月26日，政府为全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代表团举办了欢迎招待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克·哥

特瓦尔德在致欢迎词时指出（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发生的二月政治事件），最近几个月从所有斯拉夫国家寄来了“斯拉夫朋友们”的不少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明显地也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批评意见。克·哥特瓦尔德承认，这些批评本质上是正确的，今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2月20~25日的事件的结果表明，现在人民民主思想牢固地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家庭。克·哥特瓦尔德特别着重指出了在萨格勒布市召开的斯拉夫国家新闻记者会议所起的作用，以及在那里因捷克斯洛伐克报界诽谤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国——各斯拉夫国家而对其提出的批评的意义。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一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领导工作的人（施维尔莫娃、戈明杰尔、巴雷什同志）至今仍坚持这样的意见，认为邀请人民民主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客人——新闻记者到萨格勒布市参加斯拉夫国家新闻记者会议的决定是“错误”的。理由似乎是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的重演，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所处的地位复杂化（很明显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关系的现状）。

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个别领导人的发言和声明中，从与他们的谈话中（特别是科佩茨基、戈明杰尔同志）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显然是过高地评价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变动的后果，并且因而得出结论说，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似乎不仅是“赶上”了，而且还“超过”了某些国家（！）。

总之，涉及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组织活动和斯拉夫人的工作状况，应当说明以下意见：

1. 捷克共产党中央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承认，直到现在他们实际上没有研究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他们才依据事实确信，在政治工作上这种因素具有重大的和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在斯洛伐克（反对天主教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天主教的反动分子）。

2. 捷克共产党中央和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确认，应该努力迅速改善斯拉夫组织的工作，并保证斯拉夫运动的群众性，在这种形式下进行社会政治工作时，实现共产党方面的经常性监督。

全斯拉夫民族委员会秘书长 伊·梅德韦杰夫

1948年3月29日于莫斯科

№0949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
关于捷共错误给苏斯洛夫的调查报告
(1948年4月5日)

机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所犯的错误

研究了一系列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策和策略的原始资料，基本的结论是：这个党及其领导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产生了危险的后果。这些错误中主要的问题如下所述：

在理论和实践中不用牺牲和阶级斗争的方式，而依靠特别的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滑到了资本主义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立场；

在党内对议会的幻想流传甚广，对议会的斗争形式估计过高，对群众工作评价过低；

用社会民主的方式来建设党，拒绝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违背了斯大林同志的教导：共产党不能也不应该是选举机关，不能也不应该只适合搞议会选举和进行议会斗争；

在民族问题上忽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在民族问题的政策上附和落后的捷克人中的民族主义分子；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不研究农民问题，也没有科学的纲领，只局限于实行一些不触动农村中资本主义基础的措施。共产党对富农的危险估计不足，并站在“放任自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待国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 * *

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途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捷克斯洛伐克新人民民主制度的确立以及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的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的建立（1945年与资产阶级政党一起进入民族阵线政府的还有共产党）使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劳动群众相当的左倾，其直接成果是使共产党在1946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全部选票的40%以上。这一切使共产党的队伍及其领导人产生了错觉，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胜利可以通过和平的途径很“轻易地”取得，而不必经过牺牲和搞阶级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的讲话里不止一次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这样的情绪，并试图给他们以相应的“理论的”根据。这些讲话的主要意思都是要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按照和平的人民民主的途径发展社会主义。

在1947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哥特瓦尔德同志在总结时说：

“我们走上了和平的人民民主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更为复杂，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更为困难，但却是一条正确的道

路。”

这个论点与以这样一种理论为根据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而这种理论是哥特瓦尔德同志1946年十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报告时声明的：

“正如经验所表明以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对我们所教导的那样，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止是一条——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的道路。在国际和国内力量处于一定差别的情况下，还可以有新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

我们已经按我们特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走过了一段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显然，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发展的历史和内部政治的条件，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其按自己的方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不能同意哥特瓦尔德同志和其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关于以“和平”为特征的“人民民主”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说法和那些他们附加在这个概念上的东西。

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可以归结为他们幼稚地相信“可能”与资产阶级政党在民族阵线及其政府的范围内“密切合作”。直到最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仍错误地认为，在民族阵线纲领下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协作”可以避免阶级斗争。

站在拒绝坚持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立场上，否定阶级斗争是国家顺利地沿人民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须条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最近仍企图在自己的国家事务中实行与自己民族阵线中的伙伴们“和平”协作，而在实践中却滑向了对资产阶级无休止的退让和腐朽的妥协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采取的妥协，明显地违背列宁主义的原则，即善于对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做出让步以有利于无产

阶级的原则。

弗·伊·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专著中研究了妥协和让步的问题，他教导说，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当立足于利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分子。弗·伊·列宁同时解释到：

“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時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555页1943年版）。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破坏了列宁关于让步的原则，他们经常对那些不应该退让的人让步。共产党同意了民族社会党关于停止进一步工业国有化的意见，似乎认为会影响两年计划的完成，这本身就给了反对派重新组织和加强自己在工业和商业中力量的机会。共产党员居然在1947年建立新的斯洛伐克全权代表团时对反动党派让步，使斯洛伐克的反动派有可能在政府机关中保存和加强自己的位置。1947年初，共产党掌握了必要的材料，却不主张追究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反动活动，为的是保持民族阵线队伍中的虚假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给了反动派保存自己力量的机会。如此，共产党做了一个接着一个这样的让步，而这些让步不是对无产阶级有利而是对反动派有利。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员萨波托茨基1947年12月在制宪民族议会上的发言是最明显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策的例子。萨波托茨基在自己的发言中回忆了民族阵线全体党派通过的科希策纲领的原则，他说：

“共产党有责任与其余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进步的党派一起紧密合作，准备以和平发展的方式达到社会主义，这样将阻止相互的斗争，而这种争斗只会给人民带来新的牺牲。”

接着，萨波托茨基同志转向所有签署了科希策纲领的各党派代

表，声明：

“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但我们有责任并且可以期望，通过努力将达到这个目标。通过友好合作、避免斗争和重大牺牲达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实现他们在革命时期所期望的一切。”

萨波托茨基同志代表共产党在议会上所做的专门声明，主要想证实通过和平途径，没有阶级斗争，没有牺牲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萨波托茨基同志在同一次讲话中还做了以下声明，正是从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出发，必然得出的结论：

“……我们现今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应当通过持续地发展变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事实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和平”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这个方针在党的宣传中得到相当广泛地传播。我们举一些例子：

1946年12月，奥斯特拉夫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地方委员会机关报《新自由报》编辑部在发表的文章“沿着自己的道路”一文中确认：

“我们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没有选择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而选择了与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先进的党派合作的方式。……我们将沿着自己独特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道路与他们精诚合作。”

这种题目的文章还登载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委员会的政治文化杂志《创造》周刊上（1946年12月），在《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标题下，文章确认：

“比较苏联革命的途径，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还可能其他的途径（通往社会主义）——这正是和平的途径，议会的途径。我们共产党和所有承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投入一切力量，正是要使

捷克斯洛伐克能真正沿着这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党的新闻机关发表文章不是偶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既定方针的体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巴雷什在1948年1月思想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做的报告可证明这点，报告的题目为《人民民主制和我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报告说：

“我们的人民发现有这种和平的、无害的通往社会主义途径的可能性。”

巴雷什同志为证明这个结论，赶紧摘引了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有名的论断：

“在遥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替代，那么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出重大的让步。……”（第11版第32页）

对斯大林同志这一观点的这种随意注释，有意地明显地歪曲了上面摘引的斯大林原话的真正意思，报告者肯定地说，虽然

“……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包围没有被社会主义的包围所替代，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却形成了具体的像斯大林所说的那种形势。”

就是这样，强拉硬扯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可能有“和平的”发展途径的原话用于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而实际上完全不是斯大林同志的原意。由于他们认为存在着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资本家自愿向无产阶级让步的条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走上了放弃阶级斗争原则的道路，无条件地相信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会“自愿地”向新人民民主制度让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错误地把捷克斯洛伐克所进行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改变，说成是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肯于让步”

的结果，是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平协作”的结果，他们实际上在宣扬“和平进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会《论联共（布）中的右倾》的讲话中指出：

“或者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资本家融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或者是阶级利益间不妥协的对抗，或者是阶级利益调和的理论；两者必居其一”（第11版第227页）。

显然，引证哥特瓦尔德1946年3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八次会议上的声明就足以说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忘记了斯大林同志这个重要的指示。哥特瓦尔德当时肯定地说，在捷克斯洛伐克

“……民族阵线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他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因而，哥特瓦尔德同志承认，在民族阵线范围内，作为其成员的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及与他们有关的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没有利害冲突。

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对民族阵线及其政府内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存在幻想，以及折衷和妥协主义的有害实践，结果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直到最近，还不能充分估计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必要性和利用工人、农民反对反动势力的坚定行动。

最有代表性的是194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科佩茨基同志在政治思想工作代表大会上的简明报告，其中甚至有以“反动派正在挑起阶级斗争”为标题的专门章节。

在这个报告中，科佩茨基同志只停止在承认这个事实，即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着不同力量的斗争，这些力量推动我们沿社会主义方向向前发展，但资产阶级也加紧自己的反动企图”。科佩茨基

没有分析存在的阶级矛盾，没有强调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更没有把下面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点运用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环境中。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第541页）中指出：“不应当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而应当揭露和研究这些矛盾，不应当熄灭阶级斗争，而应当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由于醉心于在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对于反动派的力量及它们的破坏作用估计不足，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中产生了对捷克斯洛伐克阶级力量实际对比的错误认识。

举例说，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巴雷什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小册子里，对国内民主力量和反动势力的力量对比作了如下评价：

“通往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道路……意味着在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获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足以使他们有可能顺利地进行反对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反动残余势力的斗争，而不需要经过任何震荡、转折和革命。通往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道路意味着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已经具备了优势力量，足以使他们能对社会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

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具备“优势力量”的类似声明，明显与国内至今存在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只要看看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和地主所占据的重要经济地位就足够了。例如，根据弗莱科1948年1月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所说明的官方材料，可以看出，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占国家所有工业企业总数的52%，其中工人占全捷克斯洛伐克工人总数的20%以上。在建筑行业，私营成分约占全行业整个生产规模的90%，国内贸易的75%是私营商业。到1948年初，在国内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中，一般有500名工人，有的甚至达到1000人。在农业经营中（除了

苏台德地区)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地主(除少数外)在自己手里还有相当大片的土地。从这些材料中知道,大地主(拥有50公顷以上的土地)手中集中了全国近20%的精耕土地,在富农手里占有全国15%的可耕地。

过分地评价捷克斯洛伐克在推翻个体资本主义经济基础问题上的实际情况,并尽可能地否定在政治及经济方面残酷的阶级斗争环境,使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活动家和许多党的宣传工作人员在评价国家沿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远景问题上还犯了其他严重的错误。比如,在上边已经提过的,发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杂志《创造》周刊上的文章《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中,一字不差地写着:

“另一种道路,我们沿着它前进,并沿着它走过了像英格兰一样的最初的发展阶段,我们认为,通过和平的、不流血的道路……也是可能的。同时在这个事业中,我们的情况比英格兰更好,在我们这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已经被赶出了所有重要的阵地,垄断资本也被消灭了。而在英格兰垄断资本还掌握着经济和政治的关键阵地。”

可见,如果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杂志,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在英格兰似乎可以没有流血就通过全部和平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 (!!)。

党把注意力放在可能“和平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同时对阶级斗争作为国家顺利地始终不渝地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只字不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是站在斯洛伐克资产阶级及其党派——斯洛伐克社会党(以前的民族社会党)的立场上,代表了他们的观点,其中包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

众所周知,贝奈斯以及过去捷克社会党、天主教党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声明实现独立的“捷克的社会主义”,似乎是否认暴力的,

与“承认暴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相对立。在这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 1945 年 9 月国家社会党机关报《自由言论报》号召“研究捷克社会主义的特殊理论，这种社会主义应当考虑到所有阶级的利益”。紧随国家社会党之后说出自己观点的还有天主教徒。天主教党的报纸《人民民主报》写到：“我们需要自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将符合我们的特点和我们的要求。”

难道所有这些与贝奈斯的提法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贝奈斯说：“现在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发展到人民民主制度，……用和平的途径，依照民主的方式，不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不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既定理论。”贝奈斯特别强调的思想难道是偶然的吗？他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逐步地采取措施，引导到社会主义，避免强迫性地从一个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制度”。

显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没有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彻底揭露反科学的、适用于“所有阶级”的“捷克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本身就宣传“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途径”的思想，他们自己实际上是支持这种“理论”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不能实际地评价捷克斯洛伐克沿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问题，站在这种虚幻的立场上，他们原本没有能力击败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提出的“捷克的社会主义”的“论点”。资产阶级打算用这些论点来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针，在人民中间散布对苏联的不信任。为了掩饰自己的这种政策，又蛊惑人心地表示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自己的、不受其他国家约束的社会主义”。

通过这些可以清楚地看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坚持以和平的途径通往社会主义，不必牺牲，不要阶级斗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过高地评价国内民主改革的成果，

过低估计反动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势力及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经济基础；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企图证明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似乎在民族阵线内没有不同阶级的利益对立，实际上是掩盖了阶级矛盾，因此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到国内最近（2月）的事件发生，都低估了劳动群众和党自身的力量，及被各界广大人民支持的群众政治行动的重要作用。由此在国家事务中不可避免地滑到向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妥协和各种退让的错误道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了议会幻想的俘虏

还在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而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和在伦敦组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资产阶级各党派的代表人物就讨论了与未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有关的，以及与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组建政府有关的问题。由于当时的情况，未来国家政权的性质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受到本国民族解放斗争革命过程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受到贝奈斯阵营的政治方针的影响，贝奈斯与当时侨居在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谋求的是自己所期望和所能采纳的协议。

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与贝奈斯和其他右派组织的领导人谈判时，成功地对谈判进程施加了积极影响，和他们签订了（1945年3月）关于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建立民族阵线的协议，通过了由共产党人研究制定的、以民族阵线纲领为基础的后来十分著名的科希策纲领。在国家解放后实施国内民主改革的这一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相互妥协的结果，其实质上反映了这样一种追求，即消灭对

立阶级在利益上的差异，建立起可以被民族阵线中各党派接受的和平协作的基础。

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共和国民主建设中议会的作用和意义抱有陈旧的幻想所产生的。

事实表明，直到最近，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都毫无根据地夸大了议会斗争的形式，认为这些形式是加强和发展国内人民民主的政治活动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事实还十分明显地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在议会中仅拥有 38% 席位（300 个席位中的 114 个）的共产党都是预先采取了步骤，由民族阵线和议会来制定加强国家民主进程、巩固人民民主阵地的新法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最近（至 1948 年 2 月）遇到与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其他党派发生组织上的冲突时，都不得不重新回到妥协和退让的老路上。

在制定国家两年发展计划以及在议会和总统审批这一计划时，共产党迫于右翼党派的压力不得不同意他们停止对工业进一步实行国有化的要求，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样，在 1946 年 7 月 8 日议会开会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总理克·哥特瓦尔德以 1946 年议会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名义发表了政府宣言，他声明：

“……政府声明，它认为在生产部门的国有化工作已经结束”。

尽管最近以来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明显认识到资产阶级政党对今后国内民主化事业的顽强抵抗，他们还是继续地相信议会活动的决定性意义，低估其他非议会形式的斗争。在这方面的表现是，他们力求把国内政治斗争局限在民族阵线和议会的范围内，以此保持与左派和右派能够进行“合作”的条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这种立场一直保持到 1948 年二月事件，这些可以看做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错误和危险的社会—民主政策弊端的全部基础。

而且，作为资产阶级议会幻想的俘虏，由于过高估计国家民主

化斗争的成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打算把战胜资产阶级政党的反抗和改变民族阵线的政策寄托在争取例行的议会选举的大多数选票上。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把党的方针放在必须争取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上，把它作为顺利地推动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实践中推行这个政治任务，首先为党能争取到议会的大多数而斗争。

在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六月中央全会上，哥特瓦尔德同志说：

“我们再次强调，我们想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不是为了得到51%的多数票从而可以压倒49%的票数，而是为了使我们的威信和更大的实力。”

同时，哥特瓦尔德同志强调，争取共产党方面的多数票（也就是指议会的多数票）并不破坏“与其他党派的合作”，但不可避免地要改变民族阵线的政策。

在1948年2月20~25日政治事件的前几天，在莫克雷市郊党的骨干分子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同志在其《论捷克斯洛伐克迫切的政治问题》的讲话中说：

“在选举中决定性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谁将获胜：是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力量，还是寄生的、剥削阶级的残余。”

正如实际所表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动势力除了支持从外部给共产党以打击外，不等到选举就以强制的方式（包括组织有国外武装帮助的叛乱）来改变国内政治体制。总结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的二月事件，明显地证实了要改变民族阵线的性质及其政策，使其更符合劳动群众的要求，共产党必须具备必要的力量和条件，而不能等待党在选举中得到51%的席位，即议会的大多数。

上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准备面临的议会选举（1948年5月）

的事实，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特别是在选举前加紧接收新党员的做法，都说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还没有摆脱对议会的幻想，并像以前一样企图利用党作为竞选斗争的某种武器和机构，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新的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这本身就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学说，以及在具体的情况下，在人民民主的议会制共和国里党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在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问题上 轻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则及其后果

提出争取大多数人民倒向共产党一方的任务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采取了加紧扩大共产党队伍的方针。由于准备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党中央委员会对地方党组织提出党员要达到 150 万人，然后再达到 200 万人。

在 1947 年 11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斯兰斯基同志总结说，在党的地方组织，首先是地区一级组织中，党的队伍扩大了；按选举人数的比例吸收党员的工作顺利完成了。他指出，作为先进的地区，克拉德诺区在这段时间里吸收了 32% 的选举人入党，在卡罗维发利是 27%，在乌斯季是 27% 等等。

斯兰斯基在这个报告中确认了大规模接受新党员入党的目的，他说：

“谈到在党内被组织起来的参加选举的人数，我们希望到（1948 年）5 月 1 日以前把这一人数扩大到参加选举人数的 25%，以取代上次选举时被组织起来的 20% 的参选人数……”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吸收新党员的运动，为了达到（1948 年）5 月 1 日前的 150 万党员，必须在 5 个月内吸收 21.8 万人入党，也就是每月吸收 4.5 万人”。接着他说：

“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我们将能够保证在选举时得到最多的选票”。

斯兰斯基同志声明：“我们的同志应以这样的口号指导自己：每一个党员都要说服和吸收自己的熟人和亲戚入党”。

至于为什么要实现以“接收熟人和亲戚”的原则吸收党员这样的政策，可以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书记施维尔莫娃同志在1948年3月7日《红色权利报》上的文章做出判断，文章中清清楚楚地写到：

“我们为有10万人成为党员而打开了大门。我们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热爱共和国吗？你是好人吗？如果诚实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则可以在我们的队伍里找到位置并得到帮助，使他成为我们党的好党员。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加入我们党的人。他们入党的条件——只要是一个好的捷克人，一个诚实的人”。

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在党中央的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专门用来解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今年3月7日到14日被称为“哥特瓦尔德周”的日子里，吸收“新的10万人入党”的这件事，是有代表性的。我们注意到，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正如《红色权利报》报道的那样，接收了19万多(!)新党员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最近的事实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反动势力1948年2月的失败及国内政治力量急剧的分化过程决定了大批可疑分子（有时明显是投机分子）加入共产党队伍的倾向，在目前的形势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存在的大量接收新党员的想法，自然会引起对共产党队伍의思想和组织状况的担忧。

但是，至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表示关心党的队伍的纯洁性问题，仍旧把发展党的队伍的问题服从于吸收大多数选民入党的任务。用机械地招收几十万新党员的做法，代替了在广大人

民群众中进行经常不断的思想工作，因此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走上了公开违背和忽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党及党的建设的学说的歧路。

列宁在谈到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时指出：

“欺骗自己，忽视我们任务的重大意义，并缩小这些任务的范围，就意味着忘记了先进队伍与向往先进队伍的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了先进队伍经常的责任，把更多、更广泛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准”。（第6卷第205～206页，第3版）

事实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忘记了列宁同志的教导，忘记了共产党人与那些向往共产党的人之间的区别，忘记了我们的任务根本不在于利用党来进行招募和“捞”选票，而是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并经常不断地用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把他们提高到能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之奋斗的政治任务的水平。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对机械招收新党员做法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还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今年3月发表的另一个文件中，这个文件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同志签署。文件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地方组织“要为忠诚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动知识分子打开党的大门”。

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原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把共产党变成为群众性的党，变成为思想上松散的党的倾向，致使他们在确定党的阶级本质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使他们差不多要把党变成了“全民”的组织。

举例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八次委员会上，斯兰斯基同志是这样来说明共产党的性质的：

“我们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体人民的党”(!)。

关于这种“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体人民的党”的社会成分，斯兰斯基同志在1947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有下面的表述，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队伍中有工业和农业工人47%，农民7.4%，家庭妇女19.1%，职员16%，商业和手工业者4.1%等。

对自己队伍中这样的社会成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只有在1945年5月以前入党的3%的党员，实际上是党的基本队伍。

很明显，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采取了无限制地扩大党的队伍的方针，以获得即将进行的议会选举的胜利。他们聊以自慰的希望是在选举后进行清党，可以轻易地开除不适合的分子和临时的同路人。但将来这一步所酝酿的危险，难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不清楚吗？当然，毫无异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走到这个地步，那么它为自己造成的形势将是，大量的开除出党不可避免地造成数量巨大的党的敌对分子，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附和反动阵营和加强反动势力。

由于党的干部队伍在思想和组织上准备不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倾向和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有组织的队伍、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共产党，埋在思想上没有培养好的新党员之中的倾向，更加严重了。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直到现在都没有考虑到斯洛伐克共产党是否应继续存在的问题，而此前斯洛伐克共产党在组织和实践工作中都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如果说在捷克的范围内共产党是最强有力、最有影响的政党，那么斯洛伐克共产党至今在组织上还是软弱的，在各阶层人民群众中也没有树立起必要的威信（1946年的选举中斯洛伐克共产党才获得30.4%的选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没有采用联共（布）的建党经验，即把各民族的共产党在

政治和组织上合为一体。

保留斯洛伐克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无疑在按共产党员的愿望获得议会、政府和民族阵线中更多的席位时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把党的建设问题服从于在议会取得成绩的局部利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忽视了列宁—斯大林的教导：“只有把各民族的工人汇合成统一的组织，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进行必胜的斗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88页）。

斯大林同志指出，共产党不是工人阶级惟一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组织，没有它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斗争。这些就是工会的、合作社的、妇女的、青年的组织等等。

如果说在工会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有巩固的地位，那么在合作社、妇女和青年的组织中，共产党的地位还很薄弱，这是在巩固共产党的地位，支持共产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业中，对这些群众组织的意义和作用估计明显不足的结果。

通过这些清楚地说明：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把党的建设问题服从于议会活动的局部利益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不会是（像第二国际的党）只适合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人的机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已否定了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队伍的作用，毫无道理地为了选举斗争的局部利益而采用了大量招募各种不同的人入党的方式，走上了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变为某种“全民”性质的组织的歧途。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用共同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改革

的纲领把自己和资产阶级党派联系起来，自祖国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天起，就与贝奈斯和所有资产阶级党派的领导人共同合作，在解决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党派都一致认为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这是国家政策的实质。

很多事实证明，直到最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非斯拉夫少数民族问题上实际上完全保持着和资产阶级党派领导人一致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的意愿有关系，这就是使广大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确信共产党是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的“共和国根本利益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很多事实又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牺牲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所有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的党都有责任捍卫它），与资产阶级一道，服从国家政策中“民族统一”的利益，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待匈牙利人的问题上。因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也包括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民族问题上犯有严重的错误，准确地说，造成共产党不得不执行民族主义的异常行为和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极端的沙文主义政策。

让我们来看看在捷克斯洛伐克非斯拉夫民族问题上国家政策的某些方面和这种政策的后果。

在所有党派通过的民族阵线政府的科希策纲领（1945年4月）中，公正地指出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与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关系中汲取的“痛苦的经验”，众所周知，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曾充当过奴役斯拉夫人民的希特勒政策的工具。但同时又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不想也不会惩罚自己奉公守法的德意志和匈牙利民族的公民，特别是那些在最艰难的时期都忠于祖国的人”。

接着科希策纲领写到：在慕尼黑协议前归附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和匈牙利民族的公民，“如果他们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的分子”，并且他们在慕尼黑协议之前就“积极与汉伦^①进行斗争，与匈牙利的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党斗争，才会承认其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籍……”。

纲领还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中，在慕尼黑协议后迁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工作过的”人将被留下（不被赶走）。

必须指出，在科希策纲领公布和纲领制定者回国后，贝奈斯和所有党派、组织的领导人以及报刊，在谈到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时，通常讲的都是全体德意志人和全体匈牙利族人。

这种倾向是由于当时国家的一定的政策决定的，足以明确地表现这一点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报纸《我们的部队》记者在科希策市与内务部部长共产党员诺塞克的访谈，这篇访谈于1945年4月15日发表，其中写到：

“在我们的共和国内应当只留下这样的匈牙利族和德意志族的公民，他们在1938年慕尼黑协议前以及在整个抵抗运动时期，已经在为共和国与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共同进行反对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斗争。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保留了承认这些人国籍的权利，对每一个人都要单独地进行甄别，而不是普遍地予以承认。所以，几乎所有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都不会成为共和国的公民”。

各党派和政府关于非斯拉夫少数民族的政策是通过各党派的中央机关报体现出来的。在这些报纸中，自然表现最积极的是右派和

^① 汉伦是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德意志党创始人，1939年以后成为法西斯德国在苏台德区的全权代表。

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945年5月18日的人民党（天主教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民主报》，其中写到：

“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集体地对我们的国家犯有过错，他们应集体地为自己的过错负责。我们尊重保护他们的国际准则，认为他们永远是弱者，现在他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力量……”

该报纸还肯定地说：

“……大概，没有一个问题像消灭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的问题那样，在解决它时，政府可以更多地依靠人民的统一意志去实现……”。

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劳什曼在1945年5月23日讲话时说，捷克斯洛伐克将会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人的国家，并特别强调了以下的意思：

“在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我们永远不会再绞尽脑汁……”。

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包括贝奈斯总统，都从这一精神出发，不止一次地发表过声明。

众多事实表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有组织地、公开地进行了反对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的运动，同时所有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都是以这一运动的精神公开表示意见的，这不可避免地在相当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群众中激化和加剧了民族主义和极端沙文主义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看来也陷入了这个明显散发着沙文主义气味的运动，并且他们没有看透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国内的反动派故意扩大这一运动，其目的是利用迫害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的政策，在国家必须进行连续不断的清理反革命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叛徒的问题上，转移劳动群众的注意力，而这些反革命和叛徒是右派的依靠力量，并很快补充了他们的队伍。

还在1945年7月，哥特瓦尔德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治州

和地区骨干分子大会上指出，工人阶级是民族阵线的主导力量，而且“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工人阶级确定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民族阵线的政策。

“反对德意志人和匈牙利族人，大体上可以认为是反对过去的、现在已被推翻的、异国土地上的民族统治者的代表”。

在1946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哥特瓦尔德指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的一个任务是：

“完全可以利用德国法西斯和它的喽罗们的战败，有意识地使共和国摆脱以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面目出现的第五纵队。”

援引了慕尼黑协议和被占领时期的痛苦经验，哥特瓦尔德同志确认：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可能和这样的少数民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涉及到进行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交换居民的事（按照1946年2月27日协议），哥特瓦尔德说明：

“交换结束后，我们将继续争取达到把剩下的部分匈牙利居民迁移回匈牙利，使斯洛伐克的南方边界重新成为斯洛伐克人的”。

尽管从那时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匈牙利事情的状况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但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包括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共和国内匈牙利人状况的问题上，立场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直到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政策中仍保留着剥夺那些仍留在以民主自由为基础的国家中的匈牙利人的精神，也就是实质上推行官方的歧视匈牙利人的计划，还在1946年2月底在布达佩斯新闻代表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克莱曼蒂斯当时描述的那样：

“……对于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今后将不给予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

注意到今年1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对匈牙利人的态度》，文中写到：

“……共产党在匈牙利人的问题上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补充”，并且“共产党坚持匈牙利应根据和平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

文中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认为“现在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是不同于霍尔蒂时期匈牙利的另一个国家”，并欢迎“匈牙利向社会主义发展走出的每一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没有找到比援引这样的话更好的说明了，即共产党人“……在自己这个立场上并不是孤立的”。……在此，利用贝奈斯在读者中的威望而援引了总统在布拉格第一次接见匈牙利公使时的讲话。报纸援引贝奈斯辞藻华丽的讲话，以如下最后的声明结束了这篇文章：

“我们不知道对此还能够补充什么”（?!）。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非斯拉夫少数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包括对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的态度方面的政策），首先因为这些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使民族政策在原则基础上迎合一些落后的居民阶层的民族情绪的错误道路，并以“论传统”、“论过去的经验”等等的声明来论证这种迎合的正确性。

1948年2月底在布拉格全斯拉夫民族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尼耶德利同志，就主席团提及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关系问题的发言，相当详细的表达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中存在的一种观点：

“当谈到在斯洛伐克迫害匈牙利人的时候，实际上谈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阶级问题——是反对匈牙利富农和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

所以提出类似的“理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是想以此证明在国内反对匈牙利人的政策是合法的，虽然实际上从捷克斯洛伐克遣返的不仅是匈牙利人中的富农，因为目前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对待匈牙利人的政策已经触及了斯洛伐克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其他阶层（其中包括无产阶级）。

匈牙利问题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的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是与其基本的民族政策问题相联系的，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现代条件下的相互关系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热衷于倡议和平地解决与斯洛伐克人在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地位有关的一切问题，几年来获得了明显的成绩。无疑，这些成绩为保证将来在统一的共和国内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平等权利，铲除捷克反动资产阶级力图保留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陋习，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在捷克特别是斯洛伐克人民中一些阶层对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表现出极端的沙文主义，而这些表现却从党的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那里得到了支持。沙文主义的表现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关系，以及实际解决这个主要的民族问题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尽管科希策纲领承认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平等权利，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努力在解决斯洛伐克问题上迈出了实际的步伐，但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相互关系上到现在仍然存在着相当尖锐的政治问题。

许多事实表明，目前在国家机关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可以看到错误和有害的现象（特别是建设军队的问题，把一些企业的基地从捷克转移到斯洛伐克等方面），这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激化了斯洛伐克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所有严重性和斯

洛伐克政治上的困难，还是没有足够的估计，事实证明，在当时（以至现在），在斯洛伐克共产党为持久巩固其在斯洛伐克各界人民中的地位和影响的事业中，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没有给予必要的帮助。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使斯洛伐克反动势力至今还在人民中保留着自己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挑起和加剧分立和反捷克的情绪，就更不用说1946年这种状况给斯洛伐克的议会选举所带来的影响了。因此必须指出，解决斯洛伐克问题的重要条件是使目前的国家议会通过能够正确反映在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中斯洛伐克人的作用和地位的宪法。但是，众所周知，制定新宪法的事情交给了特别的议会委员会，因此这个最重要的国家措施，实质上没有为广大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所掌握，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按自己追求的“合作”和对议会原则的遵守）将不能在斯洛伐克人民面前发表自己关于宪法，特别是有关将来斯洛伐克自治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看法。

由此看来，应当承认：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轻视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本国民族问题的方针和行动上犯有严重的错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直到最近在客观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俘虏，没有坚决反对国家政策中对匈牙利居民的沙文主义和歧视政策的种种表现，反而使自己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迎合了存在于人民的某些阶层中的陈旧的民族主义情绪。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容忍在国家机关的活动中扭曲的和偏激的民族主义行为，同时企图以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证实反匈牙利人政策的合理性。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至今对斯洛伐克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没有采取所有组织上的和其他可能的办法巩固共产党在斯洛伐克人民中的影响，以及首先根据将来国家的宪法来确认

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相互关系问题上明确的立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上，首先根据农村当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来确定自己的土地政策原则。

如果说在 1945 年科希策的政府纲领和哥特瓦尔德的政府纲领（1946 年 7 月）中，都确定了在实现了农村一些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农业改革、国家给农民提供帮助、规范农村的税收政策等），把农村经济提高到战前水平的迫切任务作为国家的土地和农业政策方面的主要任务，那么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到 1947 年春以前）中，其指导方针还是仅仅局限于解决农业经济建设中现实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只是在 1947 年 6 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哥特瓦尔德同志才通报了党的农业纲领的一些基本原则。在全会的报告中哥特瓦尔德说：

“我们在农村方面的纲领现在是赫拉德茨纲领……”

这个所谓的“赫拉德茨”纲领，实际上是当前国家的种种措施的总和，而这些措施是共产党在共产党员农业部长朱里什的法案中拟订的，并包括了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名义向议会提出的种种建议。这些法案是朱里什 1947 年 4 月 4 日在赫拉德茨—克拉洛维市颁布的，其实质不过是建议对（1919 年）第一次土地改革的结果进行核查；缩减土地占有量，限制在 50 公顷以下；制定农业方面的统一税收；妥善解决农业贷款的问题；在农民中推行社会保险制度等等。

谈到党对农村的这个纲领时，哥特瓦尔德指出：

“这个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核查原来的土地改革，然后进行新的土地改革。依据这个行动纲领，我们应当在近半年中，顺利地展开争取大多数农民的斗争”。

显然，捷克斯洛伐克反动势力在农业问题上对于共产党提出的法案极端仇视，在很长时间内千方百计地阻止议会对这些法案进行审批。只是在1948年的二月事件之后，在民族阵线内和政府中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之后，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近一年以前就已经拟定的全部法案才有可能被议会通过。

这样一来，在1945年的农业民主改革部分措施（包括没收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的土地及少量的变节分子的土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业改革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向捷克和斯洛伐克地主赎买超过50公顷以上的土地。无疑，所有现在这些人民民主政权的措施都是为了限制捷克斯洛伐克大土地占有者的数量，而根本没有铲除捷克斯洛伐克农村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在个人手中土地限额在50公顷以下的规定，在国家农业生产高度集约化（高商品率）的情况下，将成为发展和加强富农阶级的广泛基础。

显然，根据国内农村的这种状况，无法得出农村人民民主改革已经取得胜利的结论，也无法证明农民坚定地、毫无保留地站在支持政府和共产党政策的立场上。但此时哥特瓦尔德却在1947年6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自信地声明：

“我们已经给了农民很多东西，没有任何理由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担心”。

在评价农村实际的阶级力量对比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的这种宽容政策明显地反映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杂志《创造》（1947年5月号）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情报通报（1947年第5号）发表的文章中，文章的标题是《赫

拉德茨纲领——农业的社会主义革命》(!)。文章指出：“赫拉德茨纲领”恰恰是“……至今在世界上首创的农业社会主义革命”(?!)。

这篇文章承认，赫拉德茨纲领的主要内容是把解决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巩固经济联合”的重要手段，从而彻底揭示了“党对农村的这个纲领”的真正含义，文章写到：

“……农民获得了信心、安定以及宪法给予的拥有土地权的保障。没有根据的、引起农村恐慌的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言论消失了”。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力图在捷克斯洛伐克农村走“和平”地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避开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又如在私人资本基础上发展农村生产的条件下农业的资本主义问题等等。这就决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农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进行的实际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农村以“和平”道路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是，尽管在今年2月底布拉格召开的农民大会上，许多农民代表团要求把土地分配限制在20公顷以下，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批准并决定执行的还是限制拥有土地在50公顷以下的提案，这个提案是今年3月在议会提出并通过的。

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就想在民族阵线内保持与自己伙伴的一致，而不顾有可能加强农业生产中资本主义成分（特别是富农）的危险，没有给自己提出铲除农村反动势力的基础的任务，以此作为保证始终不渝地巩固人民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础。

于是，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农业政策问题上没有一个明确

的、科学的纲领，而局限于采取部分措施，这些措施实质上并没有触动农村资本主义的基础；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对农村中实际的阶级力量对比估计不足，容忍党的骨干分子陶醉于在农业政策中取得的局部结果和妥协成果的危险现象，从而在争取大多数农民站到党的一边的工作中犯了错误。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没有让党的干部了解富农阶级增长的危险性，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革中实际上滑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放任自流”的立场上。

* * *

1948年2月在反动党派引起的政府危机期间（即将发生反政府的武装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从经验中认识到，对议会的幻想和希望不开展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紧密合作”取得成果，是多么的危险。应当指出，共产党很好地利用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农民和所有劳动群众，反击反动势力。在群众的积极参与下，利用了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行动委员会，共产党使反动势力和他们在右派中的代理人惨遭失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个阶段显然已经坚信，只有始终不渝和毫不妥协地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的斗争的政策，只有党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做出坚定和顽强的努力，才能保证进一步加强民族阵线，巩固国内的民主力量。

伴随着二月事件在共产党队伍中出现了高枕无忧和宽容的现象。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号召民族阵线内所有伙伴走“和平协作”的道路，“不需要牺牲”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领导人却为了夺取政府机关、广播电台和国家政权，准备和武装了专门的军事组织和行动小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曾不得不坚决利用自己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有利地位，解除阴谋参与者的武装和清除他们的危害。全副武装的工人警察队伍在二月进行的盛大游行，是对人民民主共和国敌人的严重警告。

在解决了政府危机之后，改组后的民族阵线和哥特瓦尔德政府工作卓有成效，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法令，这些都说明了过去共产党希望所有的问题都通过妥协来解决是错误的。

但是，由于共产党在改变政府组成和它的政策中获得的显著成绩，以及在所有党派中右派的惨重失败，社会民主党、人民党（天主教的）、斯洛伐克民主党的领导人威信的降低，导致中央和地方在一系列场合下产生出宽容心理和自满情绪，并在评价已过去的政治转变时，不加任何反省。这些更是不正确的，因为众所周知，反动势力在二月事件后采用号召所有反动分子“保存实力”，不要与现政权“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并“相信马萨利克和贝奈斯的思想一定胜利”。显然，这些号召决定了他们的策略，现在其他政党的右派分子也采用了这种策略——“保存一切现在条件下还能够保存的东西”。

在2月成立的一些地方上所谓行动委员会的组织的领导人，不能准确地把握他们在政府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对这个问题不明确，致使许多共产党员——这些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对进步的、没有过错的人进行毫无理由地惩罚（以清洗的方式）。同时这些本身在行动委员会的共产党员有时使用直接行政管理的方式，干预国家管理的事务，替代了地方政权的司法组织——民族委员会。

从以上所述内容可以看出，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政治事件纠正了共产党的理论方针和实践活动。

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更有必要面对一系列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

问题，特别是党的建设问题，认真地重新考虑修正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

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不能不看到，国内这次事件的结果，无疑是巩固了现在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地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要善于利用过去的这次政治事件的转变，使它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制度的全面胜利。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面临的这个重要任务所必需的条件如下：

——不断地阐明党作为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作为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作用，努力做到清除党建工作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倾向，结束利用党作为选举的机构，使其迎合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坚定不移地为巩固共产党在民族阵线中的地位而斗争，使其作为阵线的重要和主导力量，避免与民族阵线内其他政治倾向的党派在指导纲领和党的政策上搞“平等”。因此，坚决消除一切妥协和折衷的痼疾，牢记只有在所有战线上与反动势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取得人民民主事业的成功，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使党的干部彻底摒弃与资产阶级“和平协作”的幻想；

——正确地制定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坚决地反对民族主义和极端沙文主义倾向，这些倾向会危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地位，并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腐蚀党的干部；

——明确地制订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指导纲领，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农业政策上根除党内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和平”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农村的“理论”；

——为最终铲除农村的资本主义基础，准备与富农阶级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这是国家转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条件；

应当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和斗争经验，证

明自己的党在国内所起的领导作用，并将率领工人阶级和所有真正拥护党的人，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完成历史使命——使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人民转向最高级的社会发展形态的斗争中获得伟大胜利。

Л. 巴拉诺夫

В. 莫舍托夫

А. 安基波夫

1948年4月5日于莫斯科

№09497

西林与费林格关于捷社会民主党 情况及捷苏经济合作的谈话纪要

(1948年4月9日)

抄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佐林，归档。

机密

摘自 M.A. 西林^① 的日记

4月9日我拜访了工业部长费林格。

费林格在谈话中涉及了三个问题：关于党内的状况和即将面临的选举，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合并，第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在工业上的技术合作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费林格说，党面临的一系列的困难现在消失了，因为在选举时所有的党都用统一的名单。再不需要进行单独的共产党选举，党派间的争吵和打闹也会少一些。

但是，在领导他们的社会民主党面前有了新的困难，在党的成员中出现了神经紧张。在地方上，共产党员向社会民主党人施加压力，强迫他们加入共产党。许多社会民主党员担心失去他们占据的职位，因此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所以在基层出现了必须与共产党在选举前就合并的意见。

^① 西林，时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费林格自己认为，与共产党合并最好是逐渐地，并且在选举之后。不要给资产阶级进行宣传 and 指责的依据，说共产党为了权力，这么快就吞并了社会民主党。

但是，考虑到地方上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瓦解和地方共产党毫不放松的压力，费林格得出必须现在就与共产党合并的结论。费林格就这个问题和哥特瓦尔德谈过，但还没有得到回答。

从费林格的话中流露出，他是拥护尽快使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合并的人，但其原因仅仅是害怕自己的党有被消灭的危险，并希望社会民主党还在比较强的时候和共产党合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党平起平坐。

谈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的可能，费林格不失时机地表明，他认为，必须的条件是，合并应当没有共产党方面的压力，按照“正当的形式”进行。按照费林格的意见，这将对西欧国家的左派社会党人有很大影响。

费林格在抱怨共产党方面的压力的同时指出，必须并适时地共同进行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在选举中发表统一的名单，以及最后和共产党合并。

这样看来，他主要不是对问题的实质有所动摇，而是采取这些措施的方法和实施的期限问题。

在谈话过程中，费林格不止一次地表明，解决各种问题取决于哥特瓦尔德，显然，费林格对他怀有很大的尊敬……

1948年4月9日于布拉格

№09514

诺维科夫与卡尔内关于捷两党统一和 准备议会选举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8年4月16日)

抄送佐林、亚历山德罗夫，归档。

绝密

今天，即4月16日，我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副主编M.卡尔内。

谈话时M.卡尔内告诉我，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将在议会选举后实现统一。共产党认为此事并不是两个党的统一，而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人将在不接受社会民主党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实行统一。

M.卡尔内说，统一之后党将与从前一样，仍然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可能增选几名优秀的社会民主党人进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如供给部长卢·扬科夫卓娃、社会保障部长埃·埃尔斑和兹·费林格。

两党的统一并不是全部采用全党增选的方法，而是通过单独接收。为了吸收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共产党，将成立由6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其中3名委员是共产党人，另外3名是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吸收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委员须经共产党批准。

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将不许加入共产党。

M.卡尔内声称，在外地，早在“二月事件”之后社会民主党

已经土崩瓦解。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宣布即将与共产党统一之后，这一过程更加剧烈。有几个州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被消灭（乌斯蒂纳德—拉贝姆州）。

今年4月14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州委书记会议上，许多州委书记反映当地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解散，其党员加入了共产党。

M. 卡尔内在谈到即将开始的议会选举时说，在捷克和莫拉维亚的共同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将有70%的候选人。其他三个党（社会民主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和人民党）各有10%的候选人。在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候选人名单中有75%的候选人。

社会民主党人起初反对只分配给他们10%的候选人，他们要求多分配一些。但共产党人告诉他们说，目前他们是最小的政党，只有30万名党员。

被提名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其中有一半实际上是共产党人。他们早就提出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是故意将他们留在社会民主党内的。

谈话结束时M. 卡尔内说，B. 劳什曼在社会民主党被消灭之后不会被吸收加入共产党，甚至也不会被社会民主党提名为议会选举候选人。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二等秘书 H. 诺维科夫

1948年4月16日于布拉格

No09517

诺维科夫与诺维关于贝奈斯总统

辞职原因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8年5月5日)

抄送费多托夫、佐林、亚历山德罗夫，归档。

绝密

今年5月5日，我拜会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总编威·诺维，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谈话时威·诺维告诉我，昨天晚上举行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克·哥特瓦尔德在会上通报了他今年5月4日与爱·贝奈斯总统就总统提出辞职一事所进行的谈话^①。威·诺维同志也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

接下来威·诺维告诉我，爱·贝奈斯总统派最高文官斯姆特内去克·哥特瓦尔德处，向总理报告了总统辞职的愿望，并解释了总统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的原因。

因此，今年5月4日在塞齐莫夫河畔的乌斯蒂，克·哥特瓦尔德拜会了总统。

爱·贝奈斯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的原因如下：

^① 贝奈斯在二月危机出现时就产生了辞职的想法，但1948年2月29日他放弃了这种想法。关于辞职的决定最终是在1948年4月底得知新宪法草案的文本后做出的。5月1日他提出准备向议会提交辞呈，并邀请哥特瓦尔德总理前往他的官邸进行会谈。

1. 宪法不民主。对此爱·贝奈斯指出，他不同意新宪法草案的第 75 条。在总统的就职宣誓词中有这样一句：“我应当按照人民政府的精神，根据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忠实而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爱·贝奈斯说，在他看来，“人民的意志”就是某些政治活动家所组织的街头压力。他还是赞成旧宪法的措词：总统依照现行法律履行其职责。

2. 新宪法扩大了内务部长的权力，侵犯了公民权。

3. 选举法不民主。因为在选举中由所有政党提出统一的名单。

爱·贝奈斯在与克·哥特瓦尔德谈话时强调，他不想以自己的威望掩盖宪法的不民主和选举法的不民主。

他还说，他不允许出现第二次“二月事件”。爱·贝奈斯对自己今年 2 月没有提出辞职而表示遗憾。

克·哥特瓦尔德对此回答说，因为这些原因而提出辞职，是对“二月事件”以后成立的人民政权的公开示威。克·哥特瓦尔德向爱·贝奈斯暗示，以这种形式辞职可能出现对爱·贝奈斯不利的后果。

此后爱·贝奈斯说，他不想在自己和政府之间制造任何冲突，他也不想与批准宪法和举行议会选举有任何关系。克·哥特瓦尔德暗示，关于辞职的建议可能是某些西方人士影响的结果。

对此爱·贝奈斯断然否认。

于是，克·哥特瓦尔德建议爱·贝奈斯利用新宪法第 72 条第 2 点，总统因健康原因在选举和批准宪法时可以休假，届时由政府代行总统职能。

此时爱·贝奈斯指出，他现在身体确实不好，需要治疗。爱·贝奈斯表示自己打算去瑞士治病，并向克·哥特瓦尔德保证无条件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爱·贝奈斯并没有拒绝克·哥特瓦尔德提出的要他休假的建议，请求给他一段时间考虑这一建议。^①

克·哥特瓦尔德对此表示同意，并请尽快给予答复。

交谈时在座的总统夫人和最高文官斯姆特内热情地支持克·哥特瓦尔德关于总统离职休假的建议。

威·诺维告诉我，克·哥特瓦尔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相信，总统会接受他的上述建议，因此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新总统的人选问题。

威·诺维还告诉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发去了电报，因为这些事件而要求推迟签署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友好合作条约。他们向罗马尼亚驻布拉格大使解释签署条约改期的原因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员生病。

交谈结束时威·诺维告诉我，克·哥特瓦尔德委托 B. 克莱曼蒂斯就这一问题向 M. A. 西林详细通报。

谈话持续 1 小时 30 分钟。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二等秘书 H. 诺维科夫

1948 年 5 月 5 日于布拉格

① 哥特瓦尔德认为贝奈斯的立场及其提出辞职的愿望是向新制度的“宣战”。在会谈时贝奈斯清楚地表明，他将不签署宪法也不支持选举法。问题的讨论最后以折衷的方式告终：贝奈斯在哥特瓦尔德的压力下同意，他的辞职信将不提交给议会，而是提交给总理本人，并在 5 月议会选举结束之后提交辞职书，辞职的理由将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09500

诺维科夫与诺维关于哥特瓦尔德 当选总统一事的谈话记录

(1948年6月3日)

送 A. 亚力山德罗夫。归档。

机密

今年6月3日威·诺维和我谈话时告诉了我爱·贝奈斯即将辞职的事。据威·诺维说，贝奈斯将在第二轮选举结果公布后，今年6月7~8日递交辞呈。贝奈斯将以身体状况不好的理由辞职。^① 贝奈斯辞职声明的呈文，要由政府同意。在声明中将指明给贝奈斯安排了国家退休金，并提供给他一座在拉尼的城堡供其使用（夏季的总统府）。

在贝奈斯辞职被批准后，由总理克·哥特瓦尔德担负起总统的职责，他将签署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宪法。遵照宪法，在总统辞职后14天内应当选举出新的总统。

威·诺维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今年5月31日召开的会议，会议通过了由克·哥特瓦尔德竞选共和国总统的决定（哥特瓦尔德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由此在政府组成上要发生一些不大的改变。国务总理由萨波托茨基担任，副总理将由西罗基和费林格担任，代替费林格担任工业部长的将是克利门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09517文件。

特，他是共产党员，老的工会活动家。其余的部长们将在新政府中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

威·诺维说，新议会第一次会议，看来要在下星期末6月11~12日举行。共产党希望总统选举在贝奈斯辞职后尽快进行，并要在隆重的场合下进行，以显示出选举的重大意义。威·诺维说，新总统的选举在今年6月13~20日举行，共产党人希望在选新总统前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新的法案，每个总统候选人必须有100名以上的议员签名推荐，总统选举时的投票表决应是公开进行的。在克·哥特瓦尔德竞选总统时，这个选举法案可以防止个别议员的挑衅行为。

威·诺维指出，共产党人认为在贝奈斯辞去总统之后，可能发生内、外反动势力的挑衅行为。

在与威·诺维谈话时，他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希望现在照“苏联的方式”，提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作用，使国家所有的重大问题不再由政府解决，而是在政治局内决定。在克·哥特瓦尔德当选总统后，政治局会议将在总统府召开，由克·哥特瓦尔德主持。

谈话结束时，威·诺维向我讲述了在南斯拉夫发生的托洛茨基式的剧变，以及即将对忠诚的老共产党员（赫布朗和茹约维奇）进行诉讼的情况。据威·诺维说，吉拉斯在一次讲话中说，南斯拉夫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苏联已经衰落了，未来是属于南斯拉夫的，列宁的旗帜和当前世界革命的旗帜将由南斯拉夫人高举。

威·诺维称韦莱比特就是英国的代理人，他们想往捷克斯洛伐克秘密地派遣自己的人，于是韦莱比特往南斯拉夫驻布拉格大使馆派来哥特瓦尔德女儿过去的丈夫，久尔格耶夫，他们已经分手了。久尔格耶夫是南斯拉夫人，韦莱比特的亲信。他极力想和哥特瓦尔德的女儿恢复关系，希望像自己家人一样进出哥特瓦尔德的家。

威·诺维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实践工作是托洛茨基式的，错误深重，与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谈话进行了 40 分钟。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二等秘书 H. 诺维科夫

1948 年 6 月 3 日于布拉格

№09507

诺维科夫与诺维
关于捷共和匈共代表谈判
少数民族问题的会谈纪要

(1948年7月30日)

抄送佐林、亚力山德罗夫，归档。

机密

根据威·诺维的通报，昨天，今年的7月29日，举行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上讨论了一系列问题。

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给主席团通报了今年7月24~25日在布拉迪斯拉发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就少数民族问题进行的谈判结果。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参加人有斯兰斯基、西罗基、科佩茨基、克莱曼蒂斯，匈牙利方面的参加人为法尔卡什、雷瓦伊等。

双方谈判结果如下：

1. 给予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以国籍，给予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以国籍，国籍法将在今年9月公布。国籍不提供给附敌分子和反动天主教神甫，以及明曾蒂主教的拥护者。

2. 开办学习斯洛伐克语和匈牙利语的学校。

3. 退还匈牙利人按照1945年宪法的土地法令而充公的土地(50公顷以下)，不向附敌分子和反动分子退回土地。

4. 被迫迁到捷克土地上的匈牙利人可以返回原斯洛伐克的居

住地。

5. 决定在斯洛伐克出版匈牙利文的报纸。

6. 匈牙利人应有加入共产党和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会组织的权利。

二、关于体育组织“索科尔”的问题，巴雷什通报说，清洗“索科尔”组织的工作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

主席团决定在大的企业开办“索科尔”的组织（巴加、斯大林工厂、兹布罗耶夫卡等），在这些地方本来有“索科尔”的基层组织。通过了国家成立体育与竞赛委员会的决定，将由新的人来领导，这个委员会至今为止将不再从属教育部，而属科佩茨基的情报部。这个问题将在今天，7月30日，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会议上确定。

三、捷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合并。

两党将在今年9~10月间进行合并。合并的倡议由斯洛伐克共产党提出，首先准备好将在近期通过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合并的决定。斯洛伐克共产党名称还与以前一样，但在一切问题上都将服从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斯洛伐克的各州委会书记，都将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任命。

斯洛伐克共产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有5人：西罗基、朱里什、克莱曼蒂斯、胡萨克、巴什托万斯基。斯洛伐克共产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有18人。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的斯洛伐克人有2名——西罗基和朱里什。估计，在斯洛伐克共产党成员中有反对党的、不满意合并的人。

四、组织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推行巩固捷克斯洛伐克共

产党队伍的措施。对党员进行检查，以便开除那些党的异己分子。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计有 220 万人，不算斯洛伐克共产党，不考虑现在接收入党的过去社会民主党党员，仅 1948 年 2 月事件以后就接收 70 到 80 万新党员。主席团同时指出，必须加强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二等秘书 H. 诺维科夫

1948 年 7 月 30 日于布拉格

No 09525

诺维科夫与契尔维切克 关于清洗捷总统办公厅的谈话纪要

(1948年11月12日)

抄送佐林、亚历山德罗夫，归档。

绝密

在旅居布拉格的苏联公民委员会举行的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1周年晚会上，我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契尔维切克谈过一次话。

谈话时契尔维切克告诉我，自克·哥特瓦尔德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之后，总统办公厅进行了一场大清洗。目前办公厅的所有重要岗位都由共产党人担任。最高文官斯姆特内形式上在休假，但他再也不能担任此职了，因为这一职务将被取消。从前需要最高文官，那是为了就需要由总统做出决定的重要国家大事，事先协调各政党之间的矛盾。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克·哥特瓦尔德总统对斯姆特内很好，委托契尔维切克为他找一个合适的职位。

据契尔维切克说，最近他本人将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

契尔维切克在回答我的问题——总统办公厅前政治部主任伊纳现在何处时说，他现在在工业部图书馆工作。伊纳要求给他分配工作，并保证他不会逃到国外。

契尔维切克对总统办公厅经济部部长弗莱科、政治部主任拉依斯、新闻部部长涅恰谢克评价良好。契尔维切克说，他们都能出色

地胜任自己的工作。他特别指出，弗莱科作为一个著名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工作搞得很好，克·哥特瓦尔德对他评价很高。他顺便指出，曾在政府主席团工作过的拉依曼是旧式经济学家，现在正在接受改造。

关于克·哥特瓦尔德的克里木之行^①，契尔维切克说，克·哥特瓦尔德对此行非常满意。克·哥特瓦尔德对与约·维·斯大林的会晤感到非常荣幸。他同时指出，克·哥特瓦尔德不仅深切敬仰约·维·斯大林同志，视他为自己的导师，而且全心全意地爱戴他。克·哥特瓦尔德总是滔滔不绝地谈到与约·维·斯大林同志的会晤。

契尔维切克还告诉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于11月17~18日在布拉格堡（总统府）金碧辉煌的西班牙大厅举行。从前，这里仅举行红十字会的盛大会议。这也是捷克斯洛伐克有史以来，党的会议首次在总统府举行。

契尔维切克同时还告诉我，前总统的夫人哈娜·贝奈斯现在并不住在塞齐莫夫河畔的乌斯蒂，而住在布拉格，距切尔宁斯基宫不远。她生活简朴，服从政府。

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一等秘书 H. 诺维科夫

1948年11月12日布拉格

^① 哥特瓦尔德1948年9~10月访苏，斯大林在克里木与哥特瓦尔德进行过几次会谈，并就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问题进行了协商。

【专题说明】

苏联与战后罗马尼亚（二）

（1944年8月至1948年4月）

本专题选编了57件档案，反映的是从战争结束到罗马尼亚工人党全面掌握政权期间，苏联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以及苏罗关系的状况。

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依附于土耳其的罗马尼亚获得独立，并于1918年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1939年和1940年，罗马尼亚卡洛尔二世两度与希特勒德国签订条约，失去了特兰西瓦尼亚。1940年6月苏联则以最后通牒方式强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9月，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在德国的压力下推翻王室，建立了安东内斯库军事独裁政权，并加入了德、意法西斯阵营。战争期间，罗马尼亚共产党联合国内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并建立了武装游击队。1944年6月罗共与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建立民族民主同盟。8月23日，在苏联军队进抵罗马尼亚的有利形势下，王室和爱国军人联合民族民主同盟，发动武装起义，逮捕了安东内斯库政府所有成员，并宣布成立王国联合政府，倒向同盟国一边。9月12日，罗共领导人帕特拉什卡努代表王国政府在莫斯科与苏、美、英签订了军事停战协定。罗马尼亚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出现了尖锐的政治分歧。罗马尼亚共

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要求彻底清除安东内斯库集团的残余，成立人民群众代表广泛参加的政府，并于9月1日成立了以统一工会为标志的工人统一阵线。以此为基础，10月12日罗马尼亚民族民主阵线宣告成立，除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外，参加民族民主阵线的还有农民阵线、工会联合会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劳动者联盟等。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拒绝参加。民族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下台，成立民主政府，并于11月4日以采取“直接行动解决政府危机”相要挟，提出最后通牒。当天，新政府成立，但总理仍然是瑟讷泰斯库。民族民主阵线因土地改革纲领在新政府受阻，便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建立乡村民主组织和民主政权的运动，并且扩大到夺取县政权的斗争。到11月底，民族民主阵线已经控制了除苏军当局管制的特兰西瓦尼亚以外40个县的政权。12月2日，民族民主阵线以外政党的政府成员集体辞职，瑟讷泰斯库被迫提出辞呈。12月6日国王米哈伊任命其副官勒代斯库组阁，仍然维持上届政府的班底。1945年1月29日，民族民主阵线发表了由共产党起草的政纲，要求成立真正民主的政府和实现土地改革，同时组织了更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并在农村实际开始了土地分配运动。勒代斯库政府采取镇压手段破坏地方民主政权和群众集会，罗马尼亚局势进入紧张状态。恰在此时，雅尔塔会议召开，苏、美、英三国首脑商定罗马尼亚应进行自由选举，建立一个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会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赶到布加勒斯特，要求国王改组政府，苏联红军也开到罗马尼亚首都周围。2月28日勒代斯库在国王的命令下辞职。3月，以农民阵线领袖彼得·格罗查为首的新政府成立，民族民主阵线控制了政府。

新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法令和措施：颁布土地改革法；成立国家最高经济委员会，以统一信贷、原料分配；工人委员会对生产、供应、销售、工资实行监督；改组警察和军队等等。这些措施受到政治反对派的攻击，并引起英、美驻罗马尼亚使团的干涉。于是，国王于8月21日要求政府辞职，并在遭到拒绝后与政府断绝

了关系，开始“国王罢工”。此时，苏联为了支持新政府，立即与罗马尼亚重建外交关系，并于9月4日邀请格罗查访苏。在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美、英达成妥协，要求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各有一名代表参加政府，并宣布尽快进行全民秘密投票选举。1946年1月6日，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国王恢复与政府的关系，2月5日美国宣布承认格罗查政府。5月17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与参加政府的各党派结成民主政党联盟，并于11月19日举行的全国议会大选中取得绝对优势。1946~1947年，罗马尼亚加快了实行工业国有化的步伐，并在农村实行了限制富农和组建消费合作社的措施。随着冷战局面形成和国际关系的紧张化，政府取缔了国家农民党，并迫使国家自由党自行解散，并于1947年12月30日逼迫国王退位，从而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同其他东欧各国一样，罗马尼亚也实行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并在此基础上于1948年2月召开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样，合并后的工人党也进行了党内清洗，开除了20余万名党员，司法部长帕特拉什卡努被撤销职务，并被逮捕，罪名是“放弃对剥削者进行阶级斗争并主张同剥削阶级进行合作”，在经济上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政策。帕特拉什卡努成为“大清洗”的首批受害者之一。

这里刊出的档案，揭示了在罗马尼亚战后的政治变动中，苏联党和政府的考虑及其参与的大体情况。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张廷文、
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张木生、方琼）

№09139

佐林关于在开罗和
斯德哥尔摩就罗马尼亚退出战争
进行谈判情况的材料

(1944年8月19日)

秘密

在开罗谈判的情况^①

向斯蒂尔贝^②提出了经英国人和美国人赞同的苏方1944年4月12日的停战条件^③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和马尼乌^④通信，通信表明，马尼乌提出了他的一些反建议，并且同意只在苏联提出的条件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4月27日，以三个同盟国的名义给马尼乌和安东内斯库^⑤发了最后通牒电，要求在72小时内答复：接受或者拒绝苏联的条件。

① 从1943年12月、1944年1月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苏罗外交人员在开罗和斯德哥尔摩进行了关于罗马尼亚退出战争的条件谈判。

② 巴尔布·斯蒂尔贝，罗马尼亚亲王。

③ 苏方的意图是：使罗马尼亚脱离德国，使罗马尼亚军队站在盟国一边参战；根据1940年的条约恢复苏罗边界；赔偿损失，遣返战俘和扣押的人员。苏联一方则承担取消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维也纳仲裁决定。

④ 尤·马尼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最大的政党——国家农民党的领导人。

⑤ 扬·安东内斯库，1940~1944年的罗马尼亚政府总理，法西斯独裁者。

4月29日，马尼乌发来答复，说决定改变罗马尼亚目前的立场，并称反对派有困难，还说，决心在盟国的帮助下克服这些困难。马尼乌同时通知，他将派遣新的特使，该特使携有最新指示。

5月25日，在开罗与斯蒂尔贝和新特使维绍亚努^①会晤时，我方听取了在盟军军事行动协助下在罗马尼亚前线举行兵变的计划。建议马尼乌派遣一名罗马尼亚高级军官与苏军指挥部接触。同时，斯蒂尔贝和维绍亚努企图向诺维科夫同志^②提出在比萨拉比亚举行全民表决、同罗马尼亚签署类似于苏捷关于被解放领土行政管理协定的协定等问题。

5月30日，指示提醒斯蒂尔贝和维绍亚努：苏联4月12日的条件是最低条件，苏政府在未收到同意4月12日建议的正面答复之前，不打算讨论任何建议。还指示提醒他们：马尼乌没有直接回答盟国4月27日的最后通牒电。

马尼乌5月29日的电报称，反对派同意将盟国的条件作为讨论的基础，似乎盟国的要求仅此而已。此外，马尼乌提出，反对派将根据盟国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起事。

6月1日，在开罗的三国代表拟定向斯蒂尔贝声明：继续谈判已经无益，他们认为谈判已经结束。不过，倘若马尼乌愿意利用停战条件，他应派军官与红军直接接触。

6月4日，我们指示诺维科夫同志，关于6月1日拟定的建议，以未收到莫斯科的答复为由暂缓答复盟国。

6月12日收到马尼乌的电报，马尼乌在电报中同意以盟国提出的条件签订停战协定，并通知说，实施停战的办法正在研究中，近日将予以通知。

① 维绍亚努，时任罗马尼亚政府外交部长。

② Н.Г. 诺维科夫，苏军官员，后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二等秘书。

6月27日，转来马尼乌与国王协商好的19点政变计划，计划预定让苏联部队通过前线，盟军给予支援（苏军在政府变更后24小时内集中进攻，空运和空投全副武装的3个旅，计2500人和2000伞兵）。该计划还提出一个问题：盟国准备立即采取哪些措施改善停战条件。

7月4日发出指示：鉴于马尼乌一伙人耍滑头，应冷淡谈判，只听通报，不作回答。

7月19日，克尔^①致函莫洛托夫同志，陈述6月27日在开罗转交的罗马尼亚政府政变计划，并询问，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持什么观点，如何答复马尼乌。我们未对克尔的信作答复。

8月7日，马尼乌致电斯蒂尔贝，电报称，盟国的沉默将罗马尼亚置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在反对派中引起了慌乱。

8月7日，维绍亚努建议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直接接触，因为罗马尼亚的未来仅取决于苏联。不论对马尼乌还是维绍亚努，我们暂时都未给予回答。

在斯德哥尔摩谈判的情况

与杜卡和纳努初步交谈后，纳努于5月29日以米哈伊·安东内斯库的名义转交了罗马尼亚政府对苏联停战条件的答复，电报中提出以下建议：只有当德国人在15天内不撤离罗马尼亚的情况下，罗马尼亚军队才与苏联军队合作赶走德国人；保留某一个区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的所在地，不予占领；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未来只能在战争结束后决定；以及减少罗马尼亚在占领的苏联几个州所造成的损失的赔款。

^① 阿·克拉克·克尔，时任英国驻苏联大使。

5月31日，向纳努转交了我们对于米·安东内斯库建议的答复，我们在答复中申明：苏联的第1、2、4项条件不能有任何改动，关于第3项，即赔款一事，我们同意将应向苏联支付的赔款额减少一些。此外，我们还申明，如果是在苏军占领的罗马尼亚领土上划出一个区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的驻地，那么苏政府不反对。最后，关于保留罗马尼亚行政机构一事，我们表示，同意采取有利于罗马尼亚的某种折衷方式。

纳努在听取这些条件后问，如果德国人自愿撤离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否有权保持中立，可否派代表团赴苏进行细节问题的谈判。6月2日，我们对这两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复。

7月1日，杜卡以反对派的名义转交了罗马尼亚退出战争的计划，该计划与斯蒂尔贝和维绍亚努6月27日在罗马尼亚转交的计划相似。

同时，反对派希望苏联对自己的条件作三点让步，即安东内斯库5月31日通知我们的三点。

7月4日，我们指示柯伦泰同志^①暂时不作任何表态，如果杜卡询问答复一事，就说将在开罗给予答复。

7月15日，杜卡请求苏政府尽快答复驻开罗代表，并告，如果向反对派做出对安东内斯库说的那些让步，那么反对派会立即将计划付诸实施。杜卡请求向我们解释：反对派的意图是严肃的，它没有别的出路。因此，反对派企盼答复，希望48个小时后得到答复。

8月9日，杜卡要求告诉他任何一种答复，不论答复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好让大家心中有数。另外，杜卡还以“罗马尼亚民族民主阵线”（反对派如此称呼）的名义转交了一个建议：经前线派

^① A.M. 柯伦泰，时任苏联驻瑞典公使。

遣一名将军赴苏，他负有就与苏军指挥部协调军事行动一事进行谈判的使命。挑选的这名将军叫阿尔迪亚。将授予他全权。我们对这一建议暂时未作答复。

瓦·佐林^①

1944年8月19日于莫斯科

^① 瓦·亚·佐林，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四欧洲司司长。

No 09140

莫洛托夫关于罗马尼亚停战问题与 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记录

（1944年8月31日）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苏联方面参加接见的有：维·米·莫洛托夫、安·亚·维辛斯基和翻译波采罗布。

罗马尼亚方面参加接见的有：帕特拉什卡努^①、维绍亚努和达马恰努将军。

相互问候和介绍后，莫洛托夫问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的住处是否安排妥了。

帕特拉什卡努说，代表团一路顺利，在莫斯科的住处安排得很好，他们为此感谢苏联政府。

莫洛托夫问：代表团已经全部到齐还是部分代表团成员还在途中。

帕特拉什卡努回答，代表团现在已经全部到齐。

莫洛托夫说：今天获悉一批罗马尼亚代表已经到达敖德萨，这些代表是否也是代表团成员？

① 卢·帕特拉什卡努是罗马尼亚司法部长，罗马尼亚联合政府中的共产党代表。

帕特拉什卡努说，这不是政治代表，而是代表团的技术人员。

莫洛托夫问，代表团成员是否知道这次举行谈判有美国和英国代表参加。

帕特拉什卡努作了肯定的回答。

莫洛托夫问代表团中谁是签署停战协定的罗马尼亚政府全权代表。莫洛托夫还提醒说，维诺格拉多夫大使在安卡拉从克列齐阿努^①那里收到的罗马尼亚照会^②，今天已经交给了代表团。

莫洛托夫问，这个照会是否把问题都说清楚了。

帕特拉什卡努回答，代表团有全权讨论停战问题、停战实施协定以及与罗马尼亚和盟国停战有关的所有问题。代表团中有政府成员，还有从开罗来的代表，他们也是谈判和签订停战协定的全权代表。

莫洛托夫说，他打算大约两天后把停战协定方案交给罗马尼亚人。这些停战条件以罗马尼亚已经知道的4月13日^③的苏联建议为基础。

帕特拉什卡努证实说，罗马尼亚人知道这一基础。

莫洛托夫问，从开罗来的代表团成员是否知道苏联政府最近的一封电报，他们应该从诺维科夫大使那里了解到这封电报。

维绍亚努回答说，他和斯蒂尔贝从诺维科夫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说，苏联政府同意以4月提出的条件为基础停战，并接受罗马尼亚外交部提出的三点补充建议。

莫洛托夫说，这是前一封电报，最后一封电报到达时维绍亚努和斯蒂尔贝已经不在开罗了，这封电报说，苏联的和平条件已经得

① 克列齐阿努，罗马尼亚驻土耳其大使。

② 指罗马尼亚方面打算立即签署停战协定并参加对希特勒军队作战的照会。

③ 原文如此，应为4月12日。

到英美两国政府的赞同，但是还剩下一些不清楚的问题，需要在莫斯科谈判时搞清楚。

维绍亚努证实说，他和斯蒂尔贝离开开罗前没有收到这封电报。

莫洛托夫说，他想说明究竟哪几点他认为在谈判时应当弄清楚。譬如，四月条件的第1条说：罗马尼亚和德国人断绝关系，罗马尼亚参加对德的共同斗争。现在不能用这种笼统的话草草了事，必须对罗马尼亚方面参加军事行动的罗军数量做出准确表述。

帕特拉什卡努说，代表团成员中有达马恰努将军，他受权参加军事问题的讨论。

接着，帕特拉什卡努申明，罗马尼亚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对德斗争。帕特拉什卡努又说，他想强调指出这一情况。国王作完报告后6小时，即8月24日凌晨4时，罗马尼亚军队收到并且开始执行不反对俄国人而是反对德国人的命令。8月25日，罗马尼亚正式对德宣战。

莫洛托夫说，罗马尼亚政府提出的补充停战条件中说，划出一个区或者区域作为罗马尼亚政府的驻地。目前，这个问题并不迫切。比较迫切的是苏联军队和罗马尼亚当局之间的关系问题。莫洛托夫接着说，四月条件中说罗马尼亚必须向苏联赔偿损失。我们必须确定向苏联赔偿损失的数额。

帕特拉什卡努回答说，他想对莫洛托夫的话作些说明。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将在莫斯科签署停战文件和停战实施协定。罗马尼亚人认为，莫洛托夫刚才讲的问题，与其说是停战文件中的问题，不如说是停战实施协定中的问题。把这几列入停战文件的问题，对罗马尼亚代表团说来是个新的问题。代表团到这里来是为了讨论一切可能产生的问题，但是，他（帕特拉什卡努）还是认为有责任指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应列到落实停战文件的协定中去。

莫洛托夫回答说，停战协定包括最为重要的问题。细节问题可以通过签署单独的协议书或者协定来解决，但是，其他所有的问题应当列入停战协定。

接着，帕特拉什卡努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而且急需解决的问题。自8月24日起，不论从法律上讲还是从实际情况讲，罗马尼亚都处于对苏停战状态。但是在此日期之后，即28日，当代表团飞离布加勒斯特时，罗马尼亚的一些师被红军部队解除了武装。罗马尼亚军队受命与德国人作斗争，但是却解除它的武装，从而削弱它。罗马尼亚的一些团被调往异地，如果说这些战士不是战俘，那么也是处在像战俘一样的处境中。帕特拉什卡努认为，必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帕特拉什卡努还说，罗马尼亚代表团成员中有一名将军和一名上校，他们能够搞清所有的军事问题，并说明罗马尼亚为对德斗争准备派兵的数量。

莫洛托夫回答说，停战协定从它签署之时起生效。当然，希望停战协定能尽快签署，但是，这事暂时停下来了。需要确定停战条件，参加谈判的各方需要协商好这些条件。至于说苏联方面的立场，苏联方面将遵守它以前所做的声明。

帕特拉什卡努说，罗马尼亚政府希望立即将自己的部队派往特兰西瓦尼亚与德国人作战。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解除罗马尼亚师的武装，而是把武器归还那些被解除武装的师。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已经制订出在特兰西瓦尼亚对德作战的详细计划。但是，这一计划现在无法实施，因为政府制订计划时打算使用的一部分军队，现在被解除了武装，不能参战。

莫洛托夫说，他想指出的是，战争打了3年，现在需要花几周的时间转入另一种环境。苏联政府将以军事意图为指南，随着罗马尼亚政府参加对德斗争，类似帕特拉什卡努提到的那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帕特拉什卡努申明，如有必要，达马恰努将军准备提供所有有关军事问题的材料，军事问题将委托给他。至于说地区问题和领土问题，代表团认为最好在看过书面方案以后再说。但是他（帕特拉什卡努）认为，军事专家明天就开始工作是有益的，他还建议，为了尽快为军事问题做准备，安排达马恰努将军和红军专家接触。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认为最好先从停战条件开始谈，其他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军事问题，都会由此得出结论。

帕特拉什卡努说，代表团没有其他向苏方提的问题了，他们等待苏联的方案。

莫洛托夫说，方案的基本原则三个盟国政府已经协商好，但是，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互相致电最后敲定条文，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

会谈进行了 1 小时。

记录 波采罗布

1944 年 8 月 31 日 22 时 05 分于莫斯科

№09141

维辛斯基关于明确停战条件等问题与
帕特拉什卡努的谈话纪要

(1944年9月1日)

分别抄送约·斯大林、维·莫洛托夫。

秘密

摘自安·亚·维辛斯基的日记

今天应帕特拉什卡努请求会见了。帕特拉什卡努一开口就申明，他打算作为同志和同志，而不是部长和部长，同我进行一次非常秘密的谈话。他认为首先必须说明为什么罗马尼亚共产党进入联合政府，而他作为共产党的代表进入停战代表团。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想力争消除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①的影响，他们对苏联的态度不友好，千方百计地阻挠和苏联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不论马尼乌还是布莱蒂亚努至今都不同意比萨拉比亚应当划归苏联。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有英美的影响。罗马尼亚共产党把发动人民力量反对德国人，保证与苏联和平合作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②（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之所以同意与共产党人合作，是

① 迪努·布莱蒂亚努，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主席。

② 国家自由党是罗马尼亚自由资产阶级的传统政党，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靠拢英法垄断集团。该党自战前起就已明显地分为两派。其中一派（主流派）与布莱蒂亚努家族有联系，另一派与格·特特勒斯库有联系。

因为他们希望为自己的利益利用共产党，用帕特拉什卡努的话说，就是驱使共产党人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但是，这一企图是不能得逞的，因为共产党有自己的任务，走自己的路。帕特拉什卡努说：“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目标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目标截然不同。我们明白，罗马尼亚对战争负有责任，它的原领导人是战争罪犯，罗马尼亚应当对站在德国一边参加战争付出足够的代价”。

帕特拉什卡努申明，他不是搞外交的，他的处境相当困难，因为他不太明白他该怎么办，他在这件事上该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帕特拉什卡努说：“在这件事上我请您帮我出主意”。帕特拉什卡努接着又说：“我应当提醒您，来的罗马尼亚代表团中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苏联政府打算在莫斯科提出比对安东内斯库元帅申明的条件更为苛刻的条件^①。例如代表团中有一个波普，是马尼乌安插的亲信，他不折不扣地反映了马尼乌的观点和态度。这个波普从昨天就叫嚷：不应签订停战协定，代表团必须打道回府”。

我问，这个波普从哪里看出停战条件比四月条件更苛刻，帕特拉什卡努解释说，代表团没估计到要谈赔款的具体数额。通过昨天与维·米·莫洛托夫的谈话他们明白了，估计要确定赔款的具体数额。

我对帕特拉什卡努说，今天或明天代表团大概会收到我们的停战条件，到那时他就会深信，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内容从作为这一方案基础的四月停战条件上退步。在方案中不可避免地应当对某些问题做出明确说明。帕特拉什卡努同意这一意见。

关于帕特拉什卡努提出的帮他出主意的问题，我说，我对这个问题很难出什么具体的主意。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No09139文件。

于是帕特拉什卡努提出一个问题：能否与安娜·波克^①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其他成员联系。若可以联系，帕特拉什卡努请求协助他联系，因为这种联系能缓解他的困境。

我允诺商议这个问题，然后再给帕特拉什卡努答复。应当指出的是，帕特拉什卡努在会谈中强调了两三次，得到授权以罗马尼亚政府名义签订停战协定的是他，而不是斯蒂尔贝或者维绍亚努。^②

谈话持续了约25分钟。是用法语单独谈的。

安·维辛斯基^③

1944年9月1日于莫斯科

① 安娜·波克，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4年11月从苏联回国，负责国外局工作，1947~1952年担任罗马尼亚政府外交部长。

② 停战协定于9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其主要条款有：罗马尼亚至少派出12个师的兵力参加反法西斯作战；苏联等盟国军队自由通过罗领土，罗马尼亚要确保军需供应；恢复1940年6月28日苏罗协定规定的苏罗边界；废除维也纳仲裁，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归还罗马尼亚；将德国及其仆从国在罗的一切财产交给苏联；罗马尼亚赔偿苏联3亿美元，分6年还清；惩办战犯，解散一切法西斯组织；一切宣传机构的活动要得到苏联的同意；在布加勒斯特设立盟国监督委员会，监督该协定的执行。

③ 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09147

谢罗夫关于部队在克拉约瓦 进行的活动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4年10月12日）

绝密

莫斯科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

兹报告部队今年10月11日之前在克拉约瓦市进行的活动。^①

1. 共逮捕55名反苏人员，其中42名系铁卫团^②分子。罗马尼亚政治侦查机关根据我们的指示对被捕人员进行了侦查，并将结果向我们报告。

被捕人员承认参加过特别军团组织，在安东内斯库当政期间有过活动。

我们已经查明，居民对进行这些活动持十分戒备的态度，关于政治侦查机关逮捕铁卫团分子和向苏联军官开枪的反苏分子的消息不胫而走。

许多对我们怀有友好情绪的人员对逮捕铁卫团分子一事表示满

① 克拉约瓦是靠近南斯拉夫的罗马尼亚城市。为了组织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物资，1944年9月5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措施》的第6510/cc号决议，责成苏联空军和后勤部队在克拉约瓦组建援助南斯拉夫的供应基地。该基地隶属于由红军侦察总局局长管辖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特别处。

② 铁卫团是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秘密警察组织。

意。他们感到惊讶的是为什么没有把他们一网打尽。亲法西斯人员持等待观望态度，许多人准备转入非法状态。

在昨夜应当逮捕的人员中，其中有三个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火车站提着皮箱被逮捕的。

今天罗马尼亚外交部副部长舍洛季在与拉夫里舍夫同志^①谈话时就我们在克拉约瓦市采取的行动向后者提出了问题。拉夫里舍夫同志回答说他对此一无所知，并提醒说可能已经预先通知了总理。为了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指挥部将进行侦查。可能这一行动与指挥部进行的侦查有关。

今天罗马尼亚第1军参谋长尼古列斯库上校参加了警备司令部的招待会，并请求向他说明，由于颁布了克拉约瓦市警备司令严厉的命令，在苏联军队宣布戒严后罗马尼亚军队的官兵将如何行动。他还要求保留军官的收音机。后来又提出被我们逮捕的前市警备司令布津阿今后的命运问题。我们对所有问题都进行了解释，包括对他说，军事侦查官对布津阿表现出的不尽职将进行侦查，结果将向方面军指挥部报告。尼古列斯库同意，布津阿应对未采取措施保障苏联军官的安全负责。

2. 截至10月11日24时止，在克拉约瓦共没收和缴获：90件有来复线的射击武器，800多部无线电收音机，夺回非法盗窃的汽车12辆，没收罗马尼亚军队的苏联牌号的汽车（吉斯、嘎斯）17辆。此外，从克拉约瓦市拆除正在使用的公共电车7辆并送回敖德萨市，以及铁桩和电线，5辆有轨电车和被罗马尼亚人运去的铜纪念碑等。

3. 我认为，部队在克拉约瓦市进行的活动今后将有助于整顿秩序，对地方当局的领导人和“铁卫团”采取的镇压措施也会对反

^① A.A. 拉夫里舍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派驻罗马尼亚的代表。

苏分子产生相应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必须：

1. 在两三天内逐步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队从克拉约瓦市撤回自己的地段继续值勤。为了维持城市的秩序，暂时留下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营的部队。此外，在一些次要方向，将使用罗马尼亚分队，总兵力不超过一个营。

2. 将莫尔德维金同志继续留任市警备司令两三周。

3. 将被捕人员市警备司令布津阿上校、警察局长弗拉西、政治侦查局长佩尔乌列斯库等送往布加勒斯特监管，由方面军军事指挥部关押一个月。期满后除佩尔乌列斯库以外，将上述所有人员释放，免去所担任的职务。将佩尔乌列斯库和其余 50 名“铁卫团”分子依照罗马尼亚法律进行审判。

4. 苏联管制委员会应依据我们对这些问题的侦查，写出详细的侦查资料。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 谢罗夫

1944 年 10 月 12 日于克拉约瓦市^①

^① 附在报告之后有一封致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的短笺，请求批准由谢罗夫提议的措施。信中还有批示：“致莫洛托夫。我认为正确的。10月18日，A.A. 库兹涅佐夫”，“同意。10月20日，莫洛托夫”，“与维辛斯基同志协商。莫洛托夫”。

№09148

拉夫里舍夫
关于罗马尼亚政府改组与
帕特拉什卡努的谈话纪要
(1944年10月15日)

分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归档。

绝密

摘自 A.A. 拉夫里舍夫日记

10月15日深夜帕特拉什卡努拜会了我，他说他就政府改组问题有急事找我。帕特拉什卡努说，与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举行的谈判尚未取得积极的成果。两党都表示拒绝参加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爱国联盟、农民阵线和工会联合会的代表一起组成的政府。

10月13日，民族民主阵线^①代表团（帕特拉什卡努也是成员之一）晋见了国王，建议他吸收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与民族民主阵线的代表一起参加政府，或者在国家农民党、国家自由党最后拒绝的情况下，同意按民族民主阵线委员会提出的名单组成政府。国王同意在以农民党、自由党为一方，以民族民主阵线委员会为一方的

① 罗马尼亚民族民主阵线成立于1944年10月。参加民族民主阵线的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工会联合会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劳动者联盟。民族民主阵线是由农民阵线领袖彼得·格罗查领导的。

谈判中充当调解者的角色。为此，国王于10月14日邀请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来自己处，但两人都没有到他那里去。国王身边的人士请帕特拉什卡努就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没有去国王那里的事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报刊上都不要说什么，以免破坏国王的威信。帕特拉什卡努认为，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不晋见国王，完全是因为他们事先希望国王和社会各界对他们定于10月1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众所周知，此次游行示威已被禁止）留下印象，而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将于10月16日去晋见国王。

民族民主阵线委员会在与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将准备一份没有他们参加的政府成员名单。届时委员会将遇到很大的困难。委员会已经与经验丰富的财经专家、自由党党员杜尔马达成协议，如果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不参加政府，他将同意出任财政部长。

最大的困难是寻找经济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合适人选。帕特拉什卡努说，他和他的一些同志认为，共产党的代表不宜担任经济部长职务，因为如果国内出现经济困难，那么资产阶级将故意暗中进行破坏经济活动，破坏共产党代表担任的经济部长的声誉。有一种方案提出由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担任总理，并同时兼任经济部长。目前尚未就此事与格罗查举行谈判。

关于外交部长的人选问题，帕特拉什卡努提出了三名候选人：维绍亚努、勒杜列斯库和琼图。维绍亚努对民族民主阵线委员会非正式建议的回答是：如果委员会与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就组建新政府问题达成协议，他可以出任外交部长。

委员会尚未与勒杜列斯库谈话。

至于琼图，迄今为止他一直呆在东京。帕特拉什卡努说，当琼图回到莫斯科，请维辛斯基同志帮助他联系。帕特拉什卡努还重复了这一请求。

帕特拉什卡努征求我对外交部长一职人选的意见，我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说帕特拉什卡努和他的同志们最了解罗马尼亚的活动家和政治家。

谈话结束时帕特拉什卡努告诉我，关闭《宇宙报》受到所有民主阶层居民的热烈欢迎。他表示希望这份报纸不再出版，因为它是罗马尼亚反动派的工具。

A. 拉夫里舍夫

1944年10月15日于布加勒斯特

№09153

维辛斯基与瑟讷泰斯库 关于执行停战协议的谈话记录

（1944年11月12日）

秘密

出席人员：维辛斯基、维诺格拉多夫、博格坚科、巴甫洛夫、华西列夫等同志

瑟讷泰斯库、格罗查、维绍亚努先生

维辛斯基：我想谈谈与罗马尼亚政府执行1944年9月12日停战协议有关的几个问题。现在我们有瑟讷泰斯库^①将军领导下的新政府。我们希望新政府能与盟国管制委员会合作，保障迅速执行协议。

苏联社会对不执行协议感到不安。

我此行的任务是调查与执行协议有关的情况，制定并通过有关措施，更好更快地履行协议，它将对苏联与罗马尼亚建立正常的关系奠定牢固的基础。

瑟讷泰斯库先生：决议的确没有得到全部执行。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罗马尼亚执行协议委员会不是按照规定的方式成立的。

① 瑟讷泰斯库，时任罗马尼亚政府总理。

因此，新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撤换该委员会的领导人，并建立一个新的更全面的委员会，以便迅速解决委员会所面临的一切有争议的问题。

新的委员会将设有技术、执行和监督机关。显而易见，委派一名军人担任委员会的领导人，可以雷厉风行地开展工作。

我们有许多问题久拖未决。我想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将促进协议的更好执行。例如，我们感到运输困难，但铁路改轨的地段尚未批准。8月24日被苏联部队俘虏的战俘尚未遣返，而他们返回罗马尼亚可以成为劳动力的补充来源。特兰西瓦尼亚的政府问题也没有解决。^①

罗马尼亚政府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已经深入到4个县：丘克、奥多尔黑、特雷斯考涅和特尔古穆列什。

我们政府的这次进入是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逐步完成的。但是，我们接到我们警察局长的报告，说军事指挥部命令我们的行政和其他机关在24~28小时内全部撤出特兰西瓦尼亚全境。依据停战协议第17条、第19条，我想了解您对罗马尼亚政府派出自己的行政机关是否正确的原则性意见。

既然今天夜间是撤出我们行政机关的最后期限，我希望能将这一期限延长二三天。因为后撤有许多困难：不仅要召回行政机关，还有许多机构（银行等）。

维辛斯基：关于军事指挥部的这个命令，无论是我还是维诺格拉多夫将军^②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另外一件事，即在特兰西瓦尼亚出现了一支武装队伍，他们独往独来，从事犯罪活动。

① 最初，根据与苏联的协定，在被红军解放的北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建立了罗马尼亚民政管理局。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以及罗马尼亚民族武装部队的行动，苏联指挥部决定将该机构转归苏联军事当局管辖。

② 维诺格拉多夫，盟国管制委员会驻罗马尼亚的苏联代表。

这支队伍的首领宣称，他将不服从苏联指挥部。顺便提一句，这支部队的名称就叫“马尼乌支队”。因此我们指挥部要求这位军人停止其活动并离开特兰西瓦尼亚。如果不执行这一要求，将对他采取必要的措施。

格罗查先生：我将采取一切措施查清这个问题。我还要告诉马尼乌，要他宣布，任何人都无权批准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支队。总理先生已经调查过这个事件，并且以为应当将这个支队的指挥官，这个坏蛋土匪予以逮捕。他早在1943年12月就侮辱过匈牙利外交使团的成员。但当时是法西斯制度掩护了这一切。当然，我们将解散这支法西斯部队。

瑟讷泰斯库先生：我要再次提到我们的行政机关撤出特兰西瓦尼亚的问题。今晚7时撤退期限到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无法得到撤退用的火车。因此我请求延长撤退期限。

维辛斯基同志：我们现在就跟前线联系并查明情况，但我不能改变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

瑟讷泰斯库先生：我要尽一切努力，尽快满足这些要求。

维辛斯基同志：协议的第19条不应当有任何疑义。其中首先说到，维也纳仲裁的决定并不重要。盟国政府认为特兰西瓦尼亚全部或者大部分领土应当归还罗马尼亚，而这在停战协议中已经确定了^①。而归还特兰西瓦尼亚的程序、时间和期限应另行规定，至于将权力移交罗马尼亚政府，应当通过有组织的程序，而不是单方面地擅自作主。

昨天，在外交部长维绍亚努先生在场的情况下，我有可能向国王解释，在执行协议第19条的同时，还有其他许多条款也必须无

^① 协议中有这样的措词：特兰西瓦尼亚全部或者大部分领土归还罗马尼亚，允许苏联外交官使用“特兰西瓦尼亚这张牌”向罗马尼亚政府和各党派施加压力。

条件地执行，因为这些条款紧密地互相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协议尽管由许多条款组成，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大多是涉及罗马尼亚国内生活的条款，例如消灭法西斯制度；第二部分几乎全部涉及到罗马尼亚的利益，例如，协议的第19条。我们当然也关心恢复特兰西瓦尼亚的公正，但是第19条与第17条一样，是特别谈及罗马尼亚的。

最后第三部分，即协议的第10、11、12条，尽管对恢复公正感兴趣的罗马尼亚人也对它们感兴趣，但首先是苏联对这几个条款感兴趣。^①

这三部分的内容相互紧密联系，这些条款不可能不互为条件。执行条约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否则将使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执行一些条款，而不执行另外的条款。我认为，执行第19条的问题症结就在这里。

格罗查先生：罗马尼亚政府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非常明白并深切感谢您对协议第19条的理解。

顺利解决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将鼓舞罗马尼亚人民，使人民以新的热情继续消灭法西斯分子的全部残余。因为他们给罗马尼亚人民带来贫困和不幸。

今后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在最短期限内执行停战协议。

维辛斯基同志：我们为此已经焦急地等待了两个月。

瑟讷泰斯库先生：我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财政问题。我们在兑换苏联临时货币方面感到困难很大。兑换的期限很长。有的公民，甚至是一些组织搞投机倒把，他们买来苏联货币，又以高价将其倒卖，必须采取措施，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

维辛斯基同志：我请您，总理先生，关于这一问题先制定一些

^① 这几个条款涉及到罗马尼亚方面应补偿苏联方面的物质损失。

具体措施，然后我们再讨论。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我也把这一点告诉了罗马尼亚政府，但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建议。

瑟讷泰斯库先生：明天将把这些建议送给你们。

维绍亚努先生：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好更快地执行停战协议的条款。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政府已经制定了利用我们的一切手段执行协议的总计划。为此我们希望你们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申请单。我们目前在这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西多罗夫上校在不同的时间提交了有时是理由不够充分的申请单，例如，要求我们拨出 8.5 亿列依，购买巧克力、咖啡、丝绸内衣等等。我认为在这些申请单上签字的未必都是权威人士。例如，在上述申请单上签名的是列昂诺夫少校。对苏联军代表的供应问题也没有协调好，他们在当地随便拿东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维辛斯基同志：我要说一句，维诺格拉多夫将军将对这一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向罗马尼亚政府递交的申请单，只能由维诺格拉多夫将军和博格坚科海军少将签字。

瑟讷泰斯库先生：我还想提出关于摩尔达维亚政府的问题。苏联指挥部的代表与我们政府的代表经常发生误会。

维辛斯基同志：我希望能说得具体一些。

瑟讷泰斯库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开始对战俘调查。我们有许多被捕人员，但尚未开始对他们进行调查。

维辛斯基同志：我认为近期我会告诉您我的意见，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维绍亚努先生：我请求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波托皮扬努将军被捕。他被捕的原因是他在苏联前线指挥过一个师。

维辛斯基同志：这个我们会查清的。我还想讨论另一个与完成协定第 11 条有关的问题。罗马尼亚方面在某些问题上的建议，例

如关于提供石油产品、牲畜等非常合适。但对工业设备就不能这么说了。例如，建议向我们提供制帽厂的设备，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在战争期间建成了第聂伯河水电站。当然，罗马尼亚政府不能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但它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罗马尼亚对提供工业设备应当比较严肃，使我们能够接受。我认为，现在就应当制定特别备忘录，就已经达成协议的商品发货。罗马尼亚政府对此有何看法？

格罗查先生：对制定备忘录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将竭尽全力，执行停战协议。

谈话持续2小时。

1944年11月12日于布加勒斯特

№09161

基尔萨诺夫与帕特拉什卡努关于 罗马尼亚政府改组的谈话纪要

（1944年12月6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
维诺格拉多夫、外交人民委员部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12月6日，在布加勒斯特市长杜布罗夫斯基处用过午餐之后，帕特拉什卡努来找我，并主动谈起了今天改组的勒代斯库政府。

帕特拉什卡努认为，勒代斯库政府与上届瑟讷泰斯库政府相比，是某种倒退。

他说，勒代斯库政府与上届政府之间所有不同的地方，并不利于我们。前总理瑟讷泰斯库心肠软，不太聪明。新总理勒代斯库意志坚强，对军队影响很大。但这种意志和影响可能是针对我们的。勒代斯库与英国人关系密切。佩内斯库辞去内务部长并由勒代斯库兼任此职不能认为是一个胜利。勒代斯库与佩内斯库区别不大。至于说勒代斯库将忙于总理事务，因此内务部会掌握在一位由共产党员任部长的同志手中，这种说法的论据不足。我们了解勒代斯库的性格，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在瑟讷泰斯库的旧政府里，如果军事部长的职务空缺，那么有可能由一个接近共产党的人士代替他。现在在新政府里，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军事部长一职已经由宫廷人士内古列斯占据了。帕特拉什卡努批评了共产党在现政府出

现危机和解决危机过程中的策略。“我们没有政策”，他说，“我们的行动有偶然性，不连贯性和几分歇斯底里。我们对政府发起攻击太早，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危机现在解决得似乎明天还应该再次向政府发起攻击。我们应当利用我们在政府的胜利，在孤立马尼乌，使他与国家自由党脱离关系，并占领自由民主党的地方组织方面开展工作。当最初听到委托勒代斯库组阁的消息时，我们发表了反对他的强烈声明。现在我们很难向群众解释，为什么我们终究还得同他合作。”

帕特拉什卡努随后继续发挥自己的思路说，共产党的举动，特别是波克和卢加^①这些代表同志，是以某种人所共知的方式讨好苏联。他们过去曾长期在苏联呆过。他说，“因此，我们应当加倍警惕，加倍谨慎。我们应当成为政治家。”

我对帕特拉什卡努的谈话没有发表个人意见，因为同他详细谈话的条件尚不具备，只是帕特拉什卡努急于向我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商定明天再会见一次。我有这样的印象：共产党的领导层内，以波克为一方，以帕特拉什卡努为另一方，相互之间在策略问题上有些分歧。

盟国管制委员会驻罗马尼亚政治部副主任 C. 基尔萨诺夫

1944年12月6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瓦西里·卢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4年11月从苏联回国，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后任罗马尼亚政府财政部长。

No09167

丹古洛夫与特特勒斯库 关于其政治立场的谈话纪要

（1945年1月12日）

抄送维辛斯基、维诺格拉多夫，
送外交人民委员部新闻处及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1月12日，前大臣会议主席特特勒斯库在他的助手的陪同下到我这里来，他说，他打算对我们同意出版他的报纸表示感谢。

特特勒斯库还想利用这一次会晤再次阐述他未来的政治活动计划。同时，他介绍了他的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某些活动。

特特勒斯库一开始承认，在其政治生涯20年中他始终倒向西方。特特勒斯库说：“我认为，随着苏维埃俄国的胜利，在东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倒向西方就意味着把国家引向明显不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才大声宣告自己倒向苏联。这是我的政策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我的政策有别于支持农民党人倒向西方国家的国家自由党的现任正式领导人。”

特特勒斯库同时说，他在国家自由党内进行了旨在反对该党现任领导人的积极活动。他说，他给自己提出了掌握党的领导权的任务。他认为，使党的大多数人站到自己这一方面以后，这一任务是可以实现的。特特勒斯库指出：“自由党是以健康的民主培育出来的党，我相信这个党的绝大多数成员会同我联合。”

正如特特勒斯库所指出的那样，他谴责国家自由党的现任领导人，首先是谴责迪努·布莱蒂亚努，他们放弃了党的独立性，因此背叛了党的传统。特特勒斯库指出，他的呼吁在党内引起了广泛反响。特特勒斯库说：“如同报刊所报道的那样，国家自由党人的许多外地组织和某些与党有联系的青年组织支持我。现在我可以这样说，这一进程已经波及迄今为止似乎还信任迪努·布莱蒂亚努的老的自由民主党人。例如，自由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去年曾任总理的安格列斯库就支持我，他是党内老自由党人中的反对派领导人。”特特勒斯库说，他的拥护者的数量增加得相当迅速，他“并没有放弃使布莱蒂亚努处于如此境地的希望，即他的支持者只剩下他的家族和历来就是他那个家族靠山的国家银行的主宰者。”

在谈到自己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时，特特勒斯库强调指出，他正在竭尽全力同这两个党进行全面合作。特特勒斯库指出，他将努力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吸收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参加。特特勒斯库说：“我将使党的成分更加民主化，以此来消除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同自由党之间在社会面貌方面历来存在的鸿沟。”

随后我们谈到了特特勒斯库同农民党的关系。我问，特特勒斯库在这个党的基层组织中有没有追随者。特特勒斯库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接着我问，农民党中特特勒斯库的追随者由谁领导。特特勒斯库回答说，这个党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人，但是米哈拉凯博士^①比这个党的其余领导人更亲近特特勒斯库。同时特特勒斯库指出，他认为米哈拉凯是一位能干的政治活动家，并且相信，在目前同马尼乌的斗争中，米哈拉凯可望取得胜利。我问，如果米哈拉凯取得胜利，特特勒斯库认为卢普博士会^②持什么样的立场。特特勒斯

^① 约恩·米哈拉凯，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领导人之一。

^② H. 卢普，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副主席。

库回答说，卢普是米哈拉凯的好朋友，他永远会站在米哈拉凯的一边。特特勒斯库指出：“是的，卢普曾经试图单独行动，但是我认为，他将来不敢这样做，因为米哈拉凯在党内的影响是占压倒优势的。”特特勒斯库指出，如果在农民党内发生领导人更换和米哈拉凯取代马尼乌，自由党普通党员对迪努·布莱蒂亚努的政策的不满情绪增大，那么特特勒斯库上台的速度就会明显加快。

接着特特勒斯库谈到了自己同马尼乌的关系。他声称，马尼乌是罗马尼亚所有政治活动中惟一同他进行了将近20年尖锐政治斗争的人。马尼乌从来没有紧紧地站在执政党一边，不善于进行创造性活动。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他总是领导反对派，并依靠这一点建立自己的政治威望。特特勒斯库指出：“我曾经对马尼乌说，他只不过是一把毁坏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的丁字镐。”特特勒斯库认为，马尼乌的这一特点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如果这只涉及与党内生活有关的某些问题，那还可以容忍。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大的方面。罗马尼亚面临对倒向哪一边做出选择。在这种形势下，马尼乌极力否定一切有创造性的东西，企图把国家引向危险的道路。特特勒斯库指出，但是必须做到让你们的国家不是根据马尼乌在罗马尼亚所占的地位来谴责罗马尼亚。只要马尼乌被迫离开这个国家，取得相互理解的问题就会明显地变得轻松一些。

为此特特勒斯库指出，马尼乌和米哈拉凯之间的矛盾还在加剧，党内领导人的更换可能比旁观者所认为的还要快。我问，如果其中某一个政党更换了领导人，特特勒斯库是否允许一方以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为首，而另一方以米哈拉凯和特特勒斯库为首这样的派别并存。特特勒斯库作了肯定的回答。对于他能否同米哈拉凯达成相互理解这一问题特特勒斯库也予以肯定的回答。

随后谈到了右派政党对待民族民主阵线各政党的态度问题。对此我问特特勒斯库，他认为米哈拉凯如果成为国家农民党的领袖

后，会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政党持什么样的态度。特特勒斯库回答说，他对此不抱幻想。特特勒斯库指出，正如所知，米哈拉凯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他本质上是个富农，在他身上有着浓重遗传因素。他对共产党人在农村的影响日益扩大十分嫉妒。米哈拉凯和准备打死挪动地界上石头的人的他的祖先一样，准备动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对付敢于进入他的“领地”——罗马尼亚农村的共产党人。

我问，如果他和米哈拉凯能够成为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的领导人，他准备如何对待米哈拉凯和民族民主阵线的政党。特特勒斯库回答说，他要尽一切努力争取团结。此时特特勒斯库极力想摆脱涉及米哈拉凯的谈话，他说：“我不把同米哈拉凯的关系作为重点。对于我来讲，主要的是同民族民主阵线的政党的关系。我希望在将来也能同他们达成如同现在那样的相互谅解。至于米哈拉凯，我只能在从各方面都能够预见到国家未来的政治局势需要的时候，才会考虑与他的关系问题。”作了这一说明以后，特特勒斯库开始详细讲述自己同民族民主阵线的关系。他介绍了同帕特拉什卡努交谈的情况，说帕特拉什卡努是自己的好朋友。特特勒斯库说，他们在交谈中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我的印象是，特特勒斯库之所以在谈话中把话题突然从米哈拉凯身上转向帕特拉什卡努，是因为他担心他为米哈拉凯说了这么多好话，可能会使苏联方面对他产生反感。

显而易见，特特勒斯库为了淡化这种印象，继续提起他同帕特拉什卡努的谈话。他指出，他曾经试图让帕特拉什卡努参加签署苏罗军事同盟条约。同时特特勒斯库指出，他向帕特拉什卡努强调指出，不能低估同苏联进行经济联系的意义，因为经济利益和物质基础历来是每一个军事联盟的基础。特特勒斯库指出：“何况我们必须现在就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可以使我们把大量对贸易联系感兴趣的实业界人士吸引到我们这一边来，并且是那些企图

在目前倒向西方国家的实业界人士。如果苏联报刊或者苏联的广播在这一方面做出比较详细的评论，描绘一下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前景，那就是对我们共同事业的不可估量的促进，有利于我们取得实业界人士的信任，因为实业界人士的作用不能低估。”

特特勒斯库最后指出，他希望这次交谈能继续进行下去，以便他有机会对为了奠定苏罗友谊的基础应该依靠罗马尼亚哪些社会人士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坚决拒绝了特特勒斯库的建议，但表示以后可以举行这样的会晤。

盟国管制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第一助理 C. 丹古洛夫

1945年1月12日于布加勒斯特^①

① 文件上有如下批示：“致巴甫洛夫同志。请通知丹古洛夫同志，应该与特特勒斯库保持关系和联络。安·维辛斯基。1月19日”，“将亲自执行。巴甫洛夫。1月20日”。

№09172

巴甫洛夫与特特勒斯库
关于组建民族民主阵线政府
问题的电话记录

(1945年2月16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佐林，归档。

2月14日晚，我应罗马尼亚前大臣会议主席和国家自由党的反对派集团领袖特特勒斯库先生的请求接待了他。特特勒斯库说，他正在同民族民主阵线阵营中自己的朋友讨论有无可能组建“激进派分子集中的单一制政府”（进入这一政府的应该是民族民主阵线的代表和国家自由党、国家农民党的激进分子）。这个政府的外交计划将致力于发展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和同苏联全面的政治经济合作。

我问，人民对成立这样的政府怎么看。特特勒斯库回答说，所有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以及大部分农民都把特特勒斯库和左派农民党人参加政府视为不必通过不受欢迎的过火行为实现国家民主化的保证。至于说到工人，他们之所以支持这样的政府，是因为民族民主阵线将进入这个政府。特特勒斯库接着说，他基本上同意民族民主阵线的纲要，但是不能同意纲要中的一些表述方式。例如，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如“没收”这样吓人的术语。可以这样做，但是纲要中不要这样讲。此外，擅自把土地分给农民，擅自更换不合适的地方行政机关中的民族民主阵线的代表，这些做法都是不正确

的。他强调指出，在罗马尼亚，国王的支持是任何政府组成和活动的最重要条件。

我问特特勒斯库，国王对政府的态度会怎样。

特特勒斯库回答说，他认为国王会支持组成这种政府的想法。特特勒斯库补充说，马尼乌害怕。在回答如何对待马尼乌这一问题时特特勒斯库说，卢普把一部分农民党人分裂了出去，但是留下来的农民党人支持马尼乌。马尼乌是特特勒斯库需要认真对付的敌人。但是特特勒斯库希望把马尼乌作为苏联的敌人予以揭露，以彻底削弱他的政治影响。农民党的另一个领袖米哈拉凯未必会同民族民主阵线合作。但是这样甚至会更好一些，因为他会同马尼乌为争夺对农民党留下来的那一部分人而进行争斗。

我问特特勒斯库，他如何对待国家民主化和清洗国家机关中的法西斯分子。

特特勒斯库回答说，这个问题可以在两个小时内解决。我们可以把其中的部分人投入监狱，把有的人消灭，有的人驱逐出境。

我问，特特勒斯库是否觉得自己够得上是一位可以同民族民主阵线真诚合作和引导国家走上民主道路的民主派分子。特特勒斯库说，过去在罗马尼亚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不足，现在则不能没有民主派分子。想在罗马尼亚不实行民主就能对付过去的政治家将会变成一根被强大猛烈的民主潮流卷到任何地方的稻草。特特勒斯库声称，他所设计的政府将执政大约四年，其条件是苏联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特特勒斯库最后说，他打算近几天内拜访勒代斯库将军，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制定新政府计划，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同民族民主阵线协商，然后把这一计划给我们看，并同国王磋商。他对成功比较有信心，只是请我说一说他能否指望我们的支持。

我说，我们目前还要暂时同现政府合作，尽管现政府的工作中

有不少缺点。我们准备同任何积极履行停战协定条件、实行同苏联保持睦邻关系政策的政府合作，把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进行到取得最后胜利，在罗马尼亚进行反对法西斯分子及其走狗的斗争，促使国家民主化。如果这一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取得国王的批准，之后在实际行动中执行这一计划，那么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同它合作的。

巴甫洛夫^①

1945年2月16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A.П. 巴甫洛夫，苏联派往驻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会政治顾问。

№09175

基尔萨诺夫关于罗马尼亚 政治形势的电话记录

（1945年2月25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
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对于昨天通过高频电话发出的勒代斯库总理的广播讲话记录稿，基尔萨诺夫报告说，今天的罗马尼亚各报没有发表这一讲话。已经给各县发出了指示，说地方报纸不发表勒代斯库的讲话，还指示停止播送勒代斯库的讲话。

基尔萨诺夫同志说，自由党人和农民党人的领袖已着手武装本党的党员。

勒代斯库总理向所有地方长官下发了通告，通告中说，“红军也参加了镇压昨天发生在布加勒斯特的起义。”布加勒斯特大街小巷到处可以见到罗马尼亚军队。

罗马尼亚警备司令正式通知盟国管制委员会总部说，在昨天的双方对射中打死了3人，打伤4人。死伤者名单中没有士兵，受害者只是老百姓。

我们的新闻检查机关收到了外国记者写的几则报道，其内容主要是：民族民主阵线的示威游行人数多，规模大，示威者有组织，守纪律，没有动武，但受到了军队的毫无理由的开枪射击。勒代斯

库昨天通过无线电播送的声明不符合实际情况。基尔萨诺夫本人经过斟酌后决定不告诉罗马尼亚的新闻检查机关，允许把这些报道发往国外，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使这些新闻稿可以发到国外。

傍晚，特种军团的无赖兵士烧毁了大街上的纪念红军建军27周年的“罗苏友好协会”宣传画和民族民主阵线的标语牌。今天，基尔萨诺夫同志同从2月24日晚上起呆在我使馆大楼内的安娜·波克和卢加进行了交谈，他们认为最好回去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要是他们不回去工作就会被察觉并留下不好的印象。基尔萨诺夫同志回答说，他会将这一情况向莫斯科报告，建议他们暂时还是呆在大使馆里。

2月23日（示威游行前夕），帕特拉什卡努在国王那里。据帕特拉什卡努讲，国王对他说：“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只是别发生国内战争。关于政府的组成问题，您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法。”帕特拉什卡努回答说：“已经对您说过，这就是民族民主阵线。”对此国王回答说：“希望大家在一起，我不想看到国内战争，不希望爆发战争。”帕特拉什卡努告诉国王，战争已经爆发。在谈到内阁的情况时国王说：“勒代斯库那里事情有点不顺利，您下一周到我这里来，咱们再谈谈。”

今天（2月25日），帕特拉什卡努向宫廷大总管涅杰利提出尽快同国王见面的要求。涅杰利回答说，国王在西奈。于是帕特拉什卡努请涅杰利转告国王，他请国王回到首都。

据我们推测，国王大概没有回首都。

对昨天互相射击的事件进行调查后已经确切查明，是宫廷御林军从老皇宫开枪射击。

今天的罗马尼亚各家报纸发表了民族民主阵线部长们就昨天的

事件致国王的电报。^①

1945年2月25日18时30分于布加勒斯特

① 2月24日在布加勒斯特及其他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冲突，其结果是勒代斯库政府的垮台和格罗查政府的上台。莫斯科的政治和军事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格罗查政府的保证。

№09176

贝里关于罗马尼亚政府危机 给维辛斯基的信

(1945年2月28日)

尊敬的维辛斯基先生：

得悉您昨日抵达布加勒斯特，我希望今天能见到您，以便欢迎您并将我得到的关于美国政府对罗马尼亚某些政治问题的态度告诉您。

当我得知您很忙，不能在今天见我时，我决定把我以前掌握的情况告诉您，并祝贺您平安抵布加勒斯特。

根据我从美国政府得到的指示，我的政府认为：

第一，目前代表所有政党和社会阶级的联合政府是罗马尼亚最合适的国家管理机构，在人民不可能表达自由选举的愿望之前，美国政府不希望看到一个只由民族农民阵线或民族民主阵线组成的政府。如果为了让某一集团掌权而使用某种政治势力或者让某种政治力量进行干预，那我们将感到十分遗憾。

第二，采用非组织的手段及使用武力或恐吓来改变行政管理机构的企图是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应该鼓励在自由投票、无记名投票或其他民主方法基础上进行地方选举和全国性选举的任何尝试。

第三，不应该允许任何政治团体或组织拥有武器，暴力工具应该由国家机关掌握，而这些机构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力和装备只是为了维持内部秩序。

恕我直言。

美国驻罗马尼亚代表^① 巴尔顿·贝里
1945年2月28日于布加勒斯特^②

① 即美国驻盟国管制委员会在罗马尼亚的代表。

② 维辛斯基还从驻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英国代表那里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信。

№09177

维辛斯基关于同罗马尼亚国王
谈判新政府组成问题
给莫洛托夫的电话记录
(1945年3月2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
马林科夫、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高频电话记录)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皇宫里的谈判还在继续^①。早晨卢普和特特勒斯库在皇宫里。国王坚持让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的党的代表参加政府。特特勒斯库声称，民族民主阵线和他不会参加这样的联合。

现在彼·格罗查被召进皇宫。在斯蒂尔贝失利以后暂时不会委托任何人组成政府。

刚才皇宫总管告诉我，协商的结果在午饭后才能知道，到时他

① 1945年3月1日维辛斯基拜会国王。在会谈时，国王表示他希望“将能够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做出决定”。

会马上把国王的决定告诉我。

继续谈判的情况另行报告。

安·维辛斯基

1945年3月2日14时45分于布加勒斯特

№09178

维辛斯基关于同罗马尼亚国王
再谈新政府组成问题给莫洛托夫的
电话记录

(1945年3月4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
马林科夫、杰卡诺佐夫，第四欧洲司。

秘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12时45分，格罗查在国王那里提出了不许拖延组成新政府的时间问题。国王请格罗查同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谈判，并尽量做到使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这时，马尼乌、布莱蒂亚努、萨维尔·勒代列斯库和罗马尼亚各政党的其他代表出现在皇宫。

国王请格罗查即便不同马尼乌也要同米哈拉凯谈判，并且说他认为格罗查的政府是惟一可能的，但是不能不考虑到历史党^①。

随后的会晤定于今晚5时。在晚5时前，格罗查打算同米哈拉凯和布莱蒂亚努就他们参加政府（条件是绝大部分席位留给民族民主阵线的代表）问题进行会晤。如果皇宫想不出拖延时间的新理由，预计到晚6时问题就可以解决。根据马尼乌给皇宫出的主意，拖延时间是为了赢得时间。格罗查则坚持原定的立场。

^① 指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的政党。

我们将报告后续情况。

安·维辛斯基

1945年3月4日17时于布加勒斯特

№09179

奥瓦基米扬等人
关于罗马尼亚政治形势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5年3月5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绝密

莫斯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贝利亚同志：

兹报告截至1945年3月4日罗马尼亚的政治形势和事件。

联合民主政府的组成问题继续成为公开的问题。

由斯蒂尔贝亲王、斯特尔泽亚和乌列亚上校组成的国王的奸党对国王施加强大的影响，反对批准组成彼得·格罗查的内阁。

3月2日夜晩，宫廷里召开了由国王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涅杰利、斯蒂尔贝、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会上决定继续拖延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时间。为此，3月3日作为这一集团的工具的特特勒斯库同彼得·格罗查进行了会晤。尽管3月2日已经就部长职位的分配和特特勒斯库的集团参加政府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他还是提出了新的要求。

3月3日，彼得·格罗查三次受到了国王的接见。国王对彼得·格罗查说，根据宪法他希望所有的政党，包括农民党和自由党都参加政府，而在彼得·格罗查呈送的政府名单中并没有反映出这一点。

彼得·格罗查回答说，如果注意到政治形势就可以看出，除了

成立联合民主政府以外别无他途，民族民主阵线和历史党没有共同合作的可能。

历史党的领导人认为，彼得·格罗查提出的政府组成人员他们不能赞同，因为其中没有农民党人和自由党人。

尽管彼得·格罗查尖锐地提出必须立即组成内阁，国王还是对他说，他尚未召见内阁成员。

这样一来，国王得以把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时间拖延到3月5日。

民族民主阵线原定在今天举行的要求组成以彼得·格罗查为首的内阁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改到了星期一。

一旦国王不同意准备组成彼得·格罗查提出的内阁，“老乡”^①的领导人就准备发出告人民书，采用未经官方许可的方式实现这一点。

我们正在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盟国管制委员会领导人进一步减少了布加勒斯特的卫戍部队和没收武器。

我们的3个师预计在3月4~5日抵达布加勒斯特郊区。

首都的形势和各地区中心城市一样，依然十分紧张。

农民党的领导人认为，对于罗马尼亚的未来而言，如果苏军占领了罗马尼亚，这要比国王自愿同意批准彼得·格罗查提出的政府组成名单更好。

3月2日，迪努·布莱蒂亚努说，他之所以不能参加与敌人合作的政府不是出于对本党的自豪感，而是因为“老乡”会争取到多数人并将做出一系列决定。

国王、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感到不满意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① 苏联内务部以此作为共产党人的代号。

对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事件没有干预。

3月3日晚上，皇宫里似乎向伦敦发去了一封电报，内容不知道。同时还给贝奈斯发去了几封电报，请求干预罗马尼亚的事情并将情况向斯大林同志报告。

国王、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决定在收到伦敦的答复之前拖延组成新政府的时间。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在国内形成紧张的局势，迫使俄国人采取某些果断的措施。这样一来，就可以指责俄国人积极干预罗马尼亚的内政。

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如果维辛斯基坚决要求马上组成政府，国王就打算继续组成H.卢普的内阁。

H.卢普应该会接受民族民主阵线的所有建议，但是他不会实行这些建议。

已经指示“秘密情报局”副局长金泰斯库立即从过去和现在不过问政治的知识分子中挑选200人，并编造名册。

可以准备以这种方式选择组成“专家政府”的人。

罗马尼亚军队的军官们正在士兵中间进行宣传鼓动，说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危险，因为面临解决罗马尼亚的独立问题，号召士兵们准备拿起武器。

在罗马尼亚的各个部队中，同情民族民主阵线的士兵经常被杀害。

3月1日库斯坦察市，一辆开往苏联装载工业设备的列车上发现一枚航空炸弹。列车是22点11分在“马拉克萨”工厂装货的。

3月1日到2日夜間，普洛耶什蒂市炼油厂的工人委员会继续解除宪兵队警卫人员的武装。到3月2日早晨所有工厂的警卫都被解除武装。

在“罗曼娜—亚美利卡娜”、“拉切亚—罗曼娜”、“克谢尼亚”、“织女星”、“猎户星座”和“哥伦比亚”等工厂没收了下列武器：

轻机枪 6 挺，冲锋枪 25 支，手榴弹 171 枚，步枪 26 支，手枪 14 支，子弹箱 23 个。

在“阿斯特拉—罗曼娜”工厂，工人们没收了宪兵队的 3 辆载有武器和弹药的汽车。

尽管这个工厂的宪兵队警卫人员开枪抵抗，但还是被解除了武器。

普洛耶什蒂市炼油厂的工人斗志高昂。

官员和工程师中有反动言论。

在列瓦市，国家农民党人通过宪兵散发传单；在卡拉卡尔市，居民们占领了警察局大楼，赶走了警察局长，推举当地人奥尔泰亚努任警察局长。

宪兵队没有进行抵抗。

在图尔努塞韦林市，居民们推选勒代斯库的走卒（民族民主阵线的追随者、律师巴泽莱）取代原警察局长扬涅斯库任新局长。

奥瓦基米扬^①

季莫费耶夫^②

库兹涅佐夫^③

1945 年 3 月 5 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Г.Б. 奥瓦基米扬，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管理局第三处处长。

② П.П. 季莫费耶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管理局第一处处长。

③ А.С. 库兹涅佐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保密局局长。

№09181

奥瓦基米扬等人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北部
社会政治形势给贝利亚的报告
(1945年3月16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

绝密

兹简要报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情报。

根据特工提供的情报。

一、3月13日，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克卢日市举行的庆祝罗马尼亚行政机关成立的活动进行得非常顺利^①。克卢日市从未有过如此盛况的民间庆祝活动。军队阅兵式过后，城乡各阶层居民积极参加了在中心广场举行的游行（参加者超过10000人）。

从政治的角度看，民族民主阵线和彼得·格罗查的拥护者在这一天取得了重大胜利。参加游行的人情绪高涨，表明了大部分居民的进步情绪。以维辛斯基同志和苏萨伊科夫上将^②为首的苏联代表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欢迎。

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归并罗马尼亚，给工人、工厂和大学的青年、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留下了深刻印象。只

① 在以格罗查为首政府成立之后，苏联立即同意在北特兰西瓦尼亚设立罗马尼亚行政当局。

② 苏萨伊科夫，驻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副主席。

有一些企业主、金融家和大商人忐忑不安。

乘坐专列去参加庆祝活动的国王在下榻处受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当局代表的隆重欢迎。欢迎彼得·格罗查和维辛斯基同志的游行队伍围绕国王的住处走一圈以示欢迎。

没有任何欢迎国王的标语和宣传画，只有一些农民党人欢迎国王。

因此可以看到国王的情绪低落。

二、尽管英美的使团接受了彼得·格罗查政府提出的关于在克卢日市参加庆典活动的建议，他们打算各派4名代表前往，甚至还派出了小轿车，但在政府的专列前往克卢日市时，英国人却通知彼得·格罗查说，由于他们没有得到伦敦的准许，不能前往克卢日。

美国人也送交了类似的声明。

这一事实被“历史党”视为英美使团对彼得·格罗查政府和苏联政府在罗马尼亚的活动持否定的态度。

三、在彼得·格罗查政府、苏联代表以及其他政党和社会组织的代表——民族民主阵线的拥护者前往克卢日市参加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罗马尼亚行政机关成立仪式的前夕，“历史党”的领导人向彼得·格罗查提出允许他们的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的请求。

国家农民党派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团长是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党人的领导人米哈伊·波波维奇，参加代表团的还有科波苏和霍吉阿，他们是马尼乌的亲信。

国家自由党派出了拉佩达图和季米特鲁·纳库。

在克卢日市举行的国家农民党人和自由党人布加勒斯特代表团同地方组织代表的协商会议指出，必须尽最大努力继续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抵抗民族民主阵线，反对匈牙利的统治，寄希望于特兰西瓦尼亚北部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农村居民会在反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斗争中对“历史党”提供支持。

附上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社会政治组织的参考资料。^①

奥瓦基米扬

季莫费耶夫

库兹涅佐夫

1945年3月16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参考材料。

№09186

贝利亚关于建议出动苏联部队保护
罗马尼亚铁路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5年4月6日）

绝密^①

国防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

在布加勒斯特市形势紧张期间，我们遵照您的指示动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个师。

最近发现，德国人多次空投伞兵，旨在破坏为前线运输物资的罗马尼亚铁路干线。

有鉴于此，并考虑到正在发生变化的形势，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有必要从布加勒斯特市调一个师返回常驻地（蒂米什瓦拉市、锡比乌市、布拉索夫市），以便对铁路交通线执行警卫勤务。

苏萨伊科夫同志向我们报告说，在布加勒斯特地区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几个师以外，还驻有红军的两个师。因此，他不反对并认为有必要动用内务人民委员部军队的一个师去守卫铁路交通线。

请您决定。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拉·贝利亚

1945年4月6日于莫斯科

^① 文件上另有批示：“未经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许可不准复印”。

№09193

巴甫洛夫与卢普关于罗政治局势和 苏罗关系的谈话纪要

(1945年4月18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今年4月18日，国家农民党副主席H.卢普博士看望了我。

卢普声称，其实他早就想与我会见。此外，由于自己以往的民主活动，他认为自己有直接责任要求这样一次会见。

在顺便提到自己与苏联驻罗马尼亚前任公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密切联系，以及他（卢普）被公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和“效忠莫斯科的人”达25年后，卢普声称，由于马尼乌面临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他认为我们的会见对于我获得有关卢普“真实政治面目”的印象是必要的。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介绍了自己与社会党，尔后与国家农民党相互关系的历史，并且强调他正领导着国家农民党的左翼。随后，卢普讲述了自己有关罗马尼亚人起源的理论，按照他的说法，罗马尼亚人是与斯拉夫人同源的民族，而按照他的看法，这是在历史进程中与俄罗斯民族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前提之一。至于谈到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那么他（卢普博士）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自身的发展道路正在接近于苏联模式”，他不是“资本家”，也不准备反对苏联模式。

鉴于上述情况，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保持最紧密的合作的必要

性对他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采用另一种迄今为止已经用过的方法，即友好协作和相互信任，而不是采用强制的方式。目前的情况使罗马尼亚人感到十分伤心，他们不会喜欢特特勒斯库的一切，此人在过去曾支持过戈加和科德雷阿努等反民主派，如今却担任了外交部长，并且是一位与苏联接近的倡导者。

尽管现任内阁总理格罗查是卢普博士的朋友，他却没有利用其权威指出罗马尼亚当前新的前进方向。卢普说，“谁和俄罗斯搞在一起，谁就将和苏维埃搞在一起，我就是这样，而格罗查不会同意这么做。”

卢普继续说，在国家农民党中目前有一股支持选举他（卢普）担任党主席以取代马尼乌的强大力量，而马尼乌则是该党最反动的部分。卢普在共产党中的“朋友”都坚持要他制造党的分裂，但他认为比较合适和有利的做法是选举到党主席的位置，并在当前历史时期带领全党沿着该走的道路前进。

现在正值他（卢普）可能被选为党主席的前夕，他想知道他能否指望苏联政府方面和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机构，以及共产党方面对国家农民党的态度有所变化。党员总是在问他，他是否得到保证，即有关方面对他的赏识超过了马尼乌，而苏联政府（更不要说罗马尼亚共产党）对后者采取了敌视的立场。

我对卢普博士的答复有以下几点：（1）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空话和宣言（哪怕是有很多许诺），而是事实。宣言我们听得多了，而事实目前还没有见到。我问卢普，“您和贵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支持罗马尼亚新政府奉行的与苏联合作的政策吗？”我又补充了一句说，“对这个问题您无言对答。”

（2）至于选举卢普先生取代马尼乌先生担任国家农民党主席职务，那么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干涉这一（或其他任何一个）罗马尼

亚政党的内部事务，以及就领导人的变动问题发表任何见解都是不适意的。总的说来，事情本来不取决于当选者本身，而是取决于与这些人物相联系的和他们实际上奉行的政治路线。

(3) 不言而喻，对于把促进罗马尼亚人民和苏联人民互相接近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将忠实执行这一纲领的社会运动或社会团体，我方要给予必要的理解和应有的评价。

最后，卢普博士提出了他采取具体实际行动能力上的局限性，因为他不担任任何国家职务，并且还和报界失去了联系（由于国家农民党党报《正义》被禁止出版），他还是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实际上证明自己意图的严肃性。

谈话到此结束。

我得出的印象是，卢普离开时有些垂头丧气的样子，他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所指望的东西。

盟国管制委员会驻罗马尼亚政治顾问 A. 巴甫洛夫

1945年4月18日于布加勒斯特

№09195

维辛斯基关于罗马尼亚国王请求为其调派 苏联通信参谋给斯大林的报告

（不早于1945年4月27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不久前，罗马尼亚国王向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我方代表请求暂派两名苏联通信参谋到他身边工作。国王阐述了自己请求的理由，希望与盟国管制委员会保持直接的和经常的联系。今年4月27日，国王又当着苏萨伊科夫和巴甫洛夫两同志的面重申了自己的这一请求。

我知道，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对暂调我们的通信参谋到罗马尼亚国王身边工作持肯定态度。但是，由于他的外出，这一问题没来得及解决。

考虑到准许我方训练有素的人到国王及其幕僚身边工作对我们有着毋庸置疑的好处，现特请您批准有关暂时调一些苏联通信参谋到罗马尼亚国王身边工作的决定，决定草案附后^①。

期待您的批示。

安·维辛斯基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决定草案，但根据俄国有关资料，维辛斯基的建议是：责成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麦尔库洛夫和伊利切夫为驻罗马尼亚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派出两名训练有素、通晓法文、军衔不低于少校的军官。

№09210

**维诺格拉多夫和雅科夫列夫
关于马尼乌将组织游行示威
给维辛斯基的电话记录**

(1945年8月16日)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据得到的情报表明，马尼乌要在今年8月16日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一次旨在反对格罗查政府的游行示威，同时在自由党人中央俱乐部召开会议，其与会者还将参加马尼乌组织的游行示威，组织者想使上街的人数达到5万左右。示威的开始时间尚未确定，马尼乌对此正等待着美国人的指示，大体上确定在8月20日前要举行一系列示威活动。

我们认为，这与美国国会议员的到来有关，他们将于18日抵达。为此曾召开了会议，与会人员有内务部副部长、保密局局长及民警局的代表和波德纳拉希。他们做出的决定如下：

- (1) 逮捕游行示威的组织者，但马尼乌除外。
- (2) 在示威当天，要加强对证件的检查，加强其他一系列旨在破坏游行示威行动的措施，阻止游行街上街。

我们建议采取各种手段，以便使任何游行示威都不要发生，但

是也不要采取任何极端的公开手段，而是在它刚露头时努力予以平息。

维诺格拉多夫

雅科夫列夫^①

1945年8月16日2时整于布加勒斯特^②

① Д. 雅科夫列夫，盟国管制委员会驻罗马尼亚的苏联代表。

② 原文件上有一则签名无法辨认的批示：“维辛斯基同志亲自给雅科夫列夫同志下达了指示。1945年8月16日。”另有维辛斯基的指示：“不要急躁，逮捕是不合适的，……示威游行没什么可怕的。安·维辛斯基”（省略号是被删去的文字，无法辨认）。

No09212

苏萨伊科夫和巴甫洛夫关于与罗马尼亚 国王谈话给斯大林等人的电话记录

(1945年8月20日)

秘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今天，8月20日15时30分，我与巴甫洛夫同志一起应邀拜会了国王。在会见中，国王向我们表示，由于目前形成的局面，他处境困难，并请求出主意——他这么做是由于美国人和英国人已向他口头表示，他们不承认彼得·格罗查政府，不与它会谈，不与它签署和平条约。然后国王向我们宣读了他本人给驻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美、英代表的一封信，现将信件全文引述如下：

“注意到柏林会议的工作报告，依据该报告‘公认的民主政府’是使罗马尼亚能与主要的盟国缔结必要的和平条约，使之能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加入联合国组织的条件，同时考虑到美国和大不列颠政府对目前组成的罗马尼亚政府所持的立场，我认为自己作为立宪君主有权就局势征询各派政治力量的看法，这符合国家的立宪传统。

由于这些因素，大多数人都主张建立经三个主要盟国承认的政府，这样一来就可以缔结必要的和平条约，并准许罗马尼亚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因此，我不得不请求总理同意现政府辞职，以有利于实施上述

决议。

但总理没有按这一建议行事，所以目前没有可能组建这样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请求苏联政府、美国政府和大不列颠政府，要他们竭力依据克里米亚会议共同通过的决议和负起他们宣称的共同责任，以便帮助建立符合柏林会议决议并为三大盟国所承认的政府，这样一来，就为罗马尼亚提供了缔结和平条约和加入联合国组织的可能性。”

对我们提出的要不要将这封信交给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问题，国王回答说，他已根据我们的要求同时交给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国王本人是否满意格罗查政府的问题，国王回答说，他对格罗查政府没有任何要求，并对其感到满意，而要求它辞职的惟一的原因，就是希望新的政府能为三大盟国所承认。

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即陛下认为依靠什么人可以扩大政府和哪些社会阶层代表不能出现在政府里，国王将两手一摊回答说：“我自己不知道依靠哪些人来扩大，但是需要一个能得到三大盟国承认的政府。”

尔后，国王说：“请帮我出个主意，对于目前出现的局面该怎么办。”

我们首先表示，他请我们出主意已为时太晚。然后，我们指出，苏联政府已不止一次地对格罗查政府做出过积极的评价，其中最近一次这样的评价是由于与罗马尼亚恢复外交关系而做出的。国王还不满足，并再次要求帮忙出主意，我们当时回答说：“本来不应把信件交给美国人和英国人，如果已经交出去了，那就把它要回来。至于谈及格罗查政府，那么国王应当有必要发表声明，以便使格罗查政府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能。”

苏萨伊科夫

巴甫洛夫

1945年8月20日16时30分于布加勒斯特

№09214

苏萨伊科夫关于罗国王
打算让格罗查政府辞职
给斯大林等人的电报

(1945年8月22日)

抄送杰卡诺佐夫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巴尔干国家司。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兹报告：

今天，8月22日4时30分，宫廷总管涅杰利来到我这里并递交了国王对我根据你们的指示提出的几个问题的书面答复。

现将其答复全文转呈如下：

1. 三个同盟国在波茨坦通过的共同决议以及立宪咨询会议的结果都责成我开始组建一个能够满足被三个同盟国承认这一条件并能开始和平谈判的新政府。

因此，我要求格罗查政府辞职。由于内阁拒绝了我的这一要求，于是我依照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诉诸了由三个大国所决定的程序。

2. 作为立宪君主，我希望在罗马尼亚举行自由选举，并希望准备好一切条件以确保这次选举的充分自由。但是我必须强调，这个问题现在是在三个大国的管辖之下。

3. 对格罗查政府提出异议就在于三个大国中有两个不承认它。此外，政府已经拒绝辞职。

苏萨伊科夫

1945年8月22日布加勒斯特

№09215

拉夫里舍夫关于罗国王对待格罗查政府的 不妥协立场给杰卡诺佐夫的报告

(1945年8月22日)

秘密

B.Г. 杰卡诺佐夫同志：

鉴于苏萨伊科夫同志发来的报告，我认为指示托尔布欣同志把我们的某些机动部队调往布加勒斯特附近是适宜的。^①

我觉得，只要国王仍然采取不妥协立场，格罗查政府就不应当辞职。

我认为，应当批准苏萨伊科夫会见卢普并听取他的意见，但是不要同他讨论罗马尼亚的国内政治问题。

请您指示。

A. 拉夫里舍夫^②

1945年8月22日于莫斯科

① 1945年8月22日，苏萨伊科夫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说，由于国王和将军团不愿意参加为解除安东内斯库的领导职务和罗马尼亚脱离战争（即所谓的王国罢工运动）举办的周年庆祝会。苏萨伊科夫请求苏联政府同意调动30辆坦克和集结摩托化步兵师前往布加勒斯特。

② A. A. 拉夫里舍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巴尔干国家司司长。

№09238

维辛斯基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归属问题与

约尔丹的谈话纪要

（1945年11月15日）

抄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杰卡诺佐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摘自安·亚·维辛斯基日志

今天应罗马尼亚大使约尔丹的要求会见了她。

约尔丹说：最近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巴贝什从布加勒斯特返回莫斯科，给大使带来格罗查和特特勒斯库的专门信件，该信责成她向苏联政府做如下声明：

根据罗马尼亚政府掌握的材料，某些匈牙利政界人士正在为使特兰西瓦尼亚完全归属匈牙利而展开积极的活动。这些人得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匈牙利人希望在未来的和平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仰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支持使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自己。有鉴于此，罗马尼亚政府特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苏联政府能否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府提出倡议，建议它们相互间开始有关特兰西瓦尼亚未来命运的谈判，以便两国政府在和会开始之前能就这一问题取得一致的解决办法。

我问他，打算在何种基础上进行这一谈判？

约尔丹回答说，罗马尼亚政府关于此事未通知她任何东西。约尔丹马上请求我允许她要求本国政府给她以进一步的说明，其中包

括回答应当在何种基础上进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府之间的谈判。

我对大使说，对他代表政府所做的声明需要加以研究。同时作为个人的意见，我向约尔丹解释说，实现罗马尼亚政府的建议隐藏着今后使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变得复杂的危险，因为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在同罗马尼亚签署的停战协定条款中已经明确说明，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或者大部应当归罗马尼亚。

约尔丹说，某些罗马尼亚领导人之所以表现出不安是因为罗马尼亚政府的地位在国际社会中尚不稳固：它至今还没得到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承认。

我问是谁表现出这种不安。约尔丹不十分有把握的回答说，特特勒斯库也表现出此种不安。约尔丹说，匈牙利政府在利用所有同盟国都承认它这一点。英国人和美国人均对匈牙利举行的大选^①感到欣喜若狂。匈牙利人在追求使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面在仰仗英国人和美国人。考虑到匈牙利人的这样一种立场，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匈牙利外交部长吉恩杰希有礼貌地拒绝了同格罗查进行会晤。

我问约尔丹，布莱蒂亚努和马尼乌在国内的影响是否增大了。约尔丹回答说，虽然他并不拥有确切的材料，但是他可以说，他们二人的影响的确有所增加。罗马尼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助于此。

在谈话的最后，约尔丹介绍了最近发生在布加勒斯特的事情。他的介绍与新闻界的报道相比没有任何新东西。约尔丹认为，罗马尼亚政府对破坏秩序的人采取严厉措施，做得很对。目前正在进行侦讯中。

我从同约尔丹所做的交谈中形成的总的印象是：约尔丹对罗马尼亚政府的地位表现出张皇失措和缺乏信心，似乎羡慕他认为存在

^① 匈牙利于1945年11月4日进行了议会选举。

于匈牙利的那种政治上的“平安无事”。约尔丹就此问题所做谈话的整个语气使人感到，约尔丹似乎对罗马尼亚有这样一个被如此之多的麻烦和不安所困扰但又固执己见的政府而感到遗憾。

谈话进行了1个小时。在场的有斯塔里科夫同志。

安·维辛斯基

1945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

№09243

苏萨伊科夫关于罗马尼亚政治形势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5年12月4日)

抄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
米高扬、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

秘密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最近一个时期，在罗马尼亚国内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情况和现象不仅要求我们对之加以最密切的注视和警惕，而且要求我们主要是对造成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做出正确的反应。

我们现在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努力对这些原因给予影响并力争取得某些结果。

这场久拖不决的政治危机到目前为止是由某些开始表现出这种或那种动摇不定的部长们引起的，现在我们已经比较快地得以恢复了政府中的稳定状态。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开始发现在政府总理格罗查的行为中有某些令我们不能不担心的不正常现象，因为在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中我们看出了一些危险的征兆。

我很想向您谈一谈我对格罗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行为的印象，并听取您的意见，如果可能的话，更想得到您的帮助。

罗马尼亚久拖不决的政治危机对在政府内建立起一定的一致和

团结有所促进。

政府内部以前曾经一时存在的磨擦和分歧已开始有所缓和。

这种一致在政府同艾特里奇^①的一系列会晤中曾经得以显示，当时尽管艾特里奇在会晤中曾极力在内阁中寻找裂痕，但以格罗查为首的所有部长在评价罗马尼亚国内局势方面表现是团结一致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它曾经并且仍在缓和国内业已形成的局势，但是它的作用将能持续多久尚很难说。

同时，长时间久拖不决的危机不可能不给政府造成困难，而以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为首的反动势力也绝不会不利用这些困难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马尼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开始改变在对待格罗查的态度方面的策略，试图对他施加影响。看来，马尼乌的策略是旨在动摇格罗查并利用这种动摇为自己服务。

我们认为，应当这样看待马尼乌采取这一新的策略手法的原因，即马尼乌及其支持者们开始明白，由于目前的局势格罗查正在成为国内能够在政府中使国内现有政治潮流相互和解的一个合适人物。在这方面他们恐怕基本上没有弄错。

马尼乌开始同格罗查“调情”，暗中派自己的人去格罗查那里提出建议说，他（马尼乌）同意让格罗查留任总理一职，让现政府保留原班人马，但是只有特特勒斯库及其代表除外，这些职位应当由不包括自由党人迪·布莱蒂亚努在内的国家农民党人出任。

虽然格罗查坚决地拒绝了马尼乌的这一建议，但是在他最近一个时期的行为及一些未经充分考虑的讲话中，人们开始发现了某种变化，使人有理由议论初露端倪的某些动摇。

^① 为了了解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府改组问题，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派出新闻记者艾特里奇作为私人代表，到苏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

例如，对坚持主张格罗查同马尼乌和解的特兰西瓦尼亚居民，特别是妇女，格罗查曾说：“让马尼乌去争取让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认北特兰西瓦尼亚，让他放弃自己将导致罗马尼亚分裂的政策吧，到那时我们将看到可以在哪些条件下来谈和解问题。”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格罗查的这番讲话被马尼乌信以为真了，那就是米哈伊·波波维奇曾找到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请求向他确切说明他们在北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立场。

格罗查的支持者们已开始向他施加影响。

这一点从“农民阵线”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农业部长查罗尼坚决要求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对他的这一要求表示支持的还有格尔梅加努。诚然，格罗查给了他们以应有回击，他说：“农民阵线不同工人党结盟连一天也无法存在”，但是这样的和类似的“要求”既来自他的志同道合者，但同时又特别是来自与他观点不同的人们，终究还是开始对他产生影响。他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行为和讲话都使我们不得不警觉起来。

在格罗查视察德瓦市同当地共产党组织领导人彼得拉什库谈话时，格罗查曾掏出手枪威胁说要枪毙他，因为共产党在该县取缔了“农民阵线”的组织。

再如，在同安娜·波克的会晤中，波克向他概述了一系列政治问题，指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表现出坚定性，而格罗查在整整一个半小时的过程中只是听她讲话，自己则甚至未回答她一句话。

格罗查不仅在自己周围的人中，甚至在同我们的谈话中都开始表现出以前人们未曾见过的情绪。

格罗查公开表现出不满的事情有：

1. 至今未允许罗马尼亚政府沿罗 - 苏边界布设边防和在罗 - 匈边界派设混合哨位，他威胁说要把边界问题通过其驻苏联大使直接向斯大林同志提出；

2. 罗马尼亚铁路仅有 20~30% 用于罗马尼亚的需要，而 70~80% 的运力被用来运送苏联货物，这有损于国家的恢复工作。但是实际上这些材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整个铁路运输的 60% 都是罗马尼亚人在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3. 盟国管制委员会要求按以前的额度供货，而不顾这样做会造成石油开采量的暂时减少，并导致数十家企业被迫停工，其后果将是经济的崩溃。

格罗查已开始以过分敏感的心态对向他报告的每一起有关苏联军人下流行为的事件做出反应，不经任何调查就将这些事件加以归纳，怒气冲冲地向我提出说，对这种现象他绝不能容忍。对于从德国调回苏联的苏联军人在雅西的行为他表示特别不满。对于此事他当时竟然说：

——摩尔多瓦的首府现在处于流氓们的恐怖活动之中，对于这些流氓我们在这里必须把他们当作苏联公民来加以关照，而当他们一旦抵达苏联，就被作为叛徒送往集中营或者被送去服苦役。

格罗查在自己的亲信中说，他同苏萨伊科夫和卡夫塔拉泽进行了会晤并向他们宣布，他准备为迄今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同他们一起分担责任，但是他又补充说：

“如果这一次我得不到我们的苏联朋友的协助和毫不迟疑的支持，则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准备将来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我将难以应付那些在我们的朋友表现出善良愿望的情况下本来可以解决的新任务和新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格罗查行为中的变化并没有逃过马尼乌及其支持者的眼睛，他们开始散布关于政府中存在动摇不定和意见分歧的流言蜚语，并作为“试探气球”暗中派自己的人前往格罗查那里提出各式各样关于同他们建立接触的建议。

对格罗查的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也不能避而不提，因为它可以在

许多方面揭示出最近一个时期在他的行为中发生变化的原因。

格罗查独身住在布加勒斯特，他身边既没有女管家，也没有其他能够给他以照顾的服务人员。

对于帮助他安排家庭生活的建议，他总是坚决地予以回绝。有人认为他不愿意身边有了解他的艳遇的目击者，这种看法似乎不无道理。此外，格罗查极为吝啬，因此他通常不在家吃饭，而是在自己大量的熟人中间的某个人那里用餐。

在他的松松散散的个人生活中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来自对立阵营的人势必要来围着他转，对他施加影响。但尽管如此，我并不倾向于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这里，而认为这些人只是加剧了他的原已形成的情绪而已，因为这些情绪是在此之前，在政府面临的由于久拖不决的政治危机中形成的，当时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已开始明显恶化。

罗马尼亚经济状况的恶化是政府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没有管理国家的足够经验而无力同那些蓄意暗中破坏政府新采取的经济措施的人进行有效斗争的结果。

必须考虑到，银行和工业的主要部门现在仍继续掌握在国家自由党人和国家农民党人或者紧紧依附于他们的人手中。

盟国管制委员会下属没有这样一些专家，他们在解决一系列经济和财政问题方面不仅能给政府出主意，而且能实际给它以帮助，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加强与巩固。因此，我们无力在这方面具体帮助罗马尼亚政府。

格罗查不去集中一切精力克服国内的各种困难，而是在其周围人士的某种影响下，不仅对上述涉及苏联军人行为的事件，对不允许沿罗-苏边界布设边防，而且对从罗马尼亚每运出一批物资都是做出特别敏感的反应，错误地把这些看成是导致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

例如，最近根据布尔加宁同志的指示，从罗马尼亚往南斯拉夫运出了 50000 双鞋。

于是他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关于驻在罗马尼亚的苏联军队供应的申请明显地被夸大了，目的是要供应驻扎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苏联部队，这样一来，盟国管制委员会不是在帮助国家经济状况好转，而是在促使其恶化。同时他还对我讲，政府之所以无力消除通货膨胀的后果，是因为发行的货币与供应军队及其他与之相关的需求的开支相等，这样，政府就不可能停止发行货币，因而也就无力稳定等等。

虽然如我上边已经指出的那样，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原因并不在于此。

引起格罗查特别大动肝火的是共产党在“农民阵线”问题上的方针。这一方针基本上导致共产党的地方组织试图在组织上把“农民阵线”吞并入自己的组织之中。

很显然，这个方针是不正确的，对此我们已经向朋友们指出了。现在正在采取措施来彻底纠正这一方针。

我想，主要的任务在于使格罗查脱离开那个他现在正处于其中的不良圈子，而为此就必须改变他的日常生活。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还必须帮助他和他的政府制定并实施一些能够巩固和加强国家经济的经济和财政措施。

因此我请求您给我以协助，派一个由具有高级专业水平的经济学家、计划专家和财政专家组成的小组来罗马尼亚暂时归我调遣。

最后，我想向您报告的是，当人们同格罗查谈到他行为中的变化时，他没有否认这种变化并解释说，这种变化是他由于面临的困难而心情恼怒的结果，他承认，在外表上他可能给人造成他是一个动摇不定的人的印象。承认了这一点，他答应要消除在他的一些真诚朋友心目中形成的这种印象。

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同朋友们会见，近日来其行为也开始表现得比较平稳和心平气和了。

我认为，他亲口承认在自己的行为中有变化并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它使我们相信，在我们对他予以关注的情况下将能够防止今后再出现这种变化。

苏萨伊科夫

1945年12月4日于布加勒斯特

№09245

季莫菲耶夫关于罗马尼亚对四国外长会议 决议的反应给维辛斯基的报告

（1945年12月30日）

绝密

致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同志

新发布的关于莫斯科会议就罗马尼亚问题^①取得的结果的官方消息在主要的社会各界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大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归结为：不论业已确定的程序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罗马尼亚已经摆脱了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紧张局势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死胡同。

大多数人的意见还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对罗马尼亚的政策方面遭到了失败，而在实际上获得胜利的是苏联。

12月22日马尼乌在同自己的一位亲信（秘密政治警察局的谍报员）的谈话中说出了一系列令人感兴趣的心里话，现归纳如下：

根据所有的材料，莫斯科会议不会使国家农民党的处境有任何改善。

根据马尼乌从宫廷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国王当时就表示愿意以任何方式摆脱其在8月23日之后所陷入的境地。

国王在同自己的亲信们的谈话中说，他任何时候都没拒绝过同

^① 在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上达成协议，通过让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代表进入政府的办法改组罗马尼亚政府。

现政府合作，没采取过反对任何参加政府班子的政治集团的对立立场。

他曾经被迫考虑了驻布加勒斯特的英、美两国代表向他所做的声明，他只是因为这一点而同政府闹翻了。^①

当时国王就对自己的亲信表示，他完全服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因为他抱有的惟一目的是让所有三大国承认民主政府。

据马尼乌得到的材料，国王在12月22日之前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进程没有任何直接的信息，因此马尼乌把国王的上述情绪看成是准备完全改变他在8月23日所采取的立场，甚至如果必要的话，“抛弃马尼乌的支持者及布莱蒂亚努老人”。

马尼乌同佩内斯库和维尔吉尔·所罗门谈了他对国王所作所为的愤慨心情。他说，“国王是想重干他在3月6日已经干了的事”。

国王侍卫长尼古列斯库将军在同样于12月22日进行的同自己的一位熟人的交谈中说，国王在不久之前曾倾向于放弃自己特权的想法，但是由于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他决定等一等看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到那时再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

关于四国外长会议各项决议的官方报道全文是12月27日晚上很晚的时候才传到宫廷的。

国王的亲信们的普遍意见可以归结为，国王毫无疑问会遵照盟国代表小组将提出的建议去做——虽然一些“历史”党代表已经开始在搞阴谋诡计，以便使国王保持住自己的尊严并保护作为他惟一支柱的“历史”党。

这些阴谋诡计来自巴尔布·斯蒂尔贝。但是，据国王的亲信们认为，这一次斯蒂尔贝的主意将不会对国王产生影响。

12月29日从国王的亲信们那里得悉，他打算在同前来罗马尼

^① 见本卷本专题No09212文件。

亚的盟国代表小组进行的谈话中要求任命一位中立人士担任内务部长，并准备让国王副官Г.米哈伊将军出任此职。

国王已于12月29日16时从西奈来到布加勒斯特市。

在“历史”党的领导人当中，关于莫斯科会议结果的报道被看做是苏联政府的明显胜利。鉴于马尼乌当时不在布加勒斯特，12月28日在米哈伊·波波维奇的家里召开了有佩内斯库、所罗门、理查·波普、米哈耶斯库和胡迪查参加的会议。

通过交换意见，大家得出结论认为莫斯科会议决议中积极的内容是：

1. 罗马尼亚将可以签署和约，以便有可能通过一项将改变其目前的战败国地位的国际章程；

2. 国王的愿望将得到满足，并且将不提出君主制是否存在的问题；

3. 国家农民党的代表参加政府将可以更加顺利地举行大选奠定基础，进而使其参与执政。

在此次会议上预先就做出决定，必须向三国代表小组提出关于内务部和司法部严格中立化的问题。

被提到的参加政府的可能人选有米哈拉凯、米哈伊·波波维奇和卢普。

12月28日白天，胡迪查、弗拉迪斯库、格拉西姆、阿达姆、布迪什季亚努和赫格佩将军拜访了卢普博士，了解他对莫斯科决议的看法。

卢普说，虽然决议的措词并不理想，但还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对国王来说是这样。

卢普认为，在确定以国家农民党的代表身分参加政府的人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他本人大概将不得不承担起这一使命。

国家农民党骨干分子中的广大人士都表示，该党最有可能推荐

参加政府班子的人选是约恩·米哈拉凯。

此外，这些人士还确信，内务部长特奥哈里·召尔杰斯库和国防部长雷什卡努二人将互换职位。

马尼乌一回到布加勒斯特立即表示，在同自己的同事进行讨论之前他不能就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一事发表任何看法，马尼乌同时还立即表示，只要是一个手中握有整个宪兵和警察机构的共产党担任内务部的头头，在罗马尼亚就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选举；即便是“历史”党代表参加了格罗查的政府，这个政府也不可能做到一个“专家”政府所能做到的事情。

12月28日在迪努·布莱蒂亚努主持下举行了旧自由党常设代表团会议，会上讨论了莫斯科会议关于罗马尼亚问题所做出的决议。

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代表团通过的一项初步决议称，“历史”党不应当同意与由现有成员组成的格罗查政府合作，格罗查政府应当辞职，只有在此之后才能仍然在格罗查主持下，按另外的方式组成新的政府。

在旧自由党成员的广大人士中占上风的想法是：旧自由党的总书记、“布莱蒂亚努王朝”的著名成员之一贝贝·布莱蒂亚努将被推荐进入格罗查政府班子。

旧自由党成员中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成功地使俄国人承认‘历史’党”表示满意。

12月29日，在“历史”党的各书记处和俱乐部里笼罩着空前的活跃气氛，讨论了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这些“历史”党的成员们激烈地辱骂英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他们认为，正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经常不断地挑唆他们去进行反对俄国人的斗争，而现在，在关键时刻却背叛了“历史”党的利益。

12月29日晚上很晚的时候，从政治警察总局传来情报说，在上午举行的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之间的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一致同意拒绝提议让其担任政府班子中的二个职位。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向从莫斯科来到此地的盟国代表小组提出使内政、军事和外交三个部中立化和由国王任命这些部的部长的问題。

“历史”党两位领袖的这项决定将提交各自的政治局审议批准。

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成员把莫斯科会议关于罗马尼亚的决议看做是彻底巩固了格罗查政府，同时也是“历史”党掀起的反对这个政府的所有运动的失败。

在以奉公守法的态度对待目前的民主制度的十字军团军人当中，人们表示担心“历史”党中将参加格罗查政府的两名代表可能会扮演特洛伊木马的角色。这些十字军团的人士认为，“历史”党代表在政府中将妨碍其工作并且只会利用他们的地位去损害民主制度。

由于莫斯科会议做出的关于罗马尼亚的决议，布加勒斯特市的工人群众的情绪已明显高涨。

工人们普遍确信，在罗马尼亚，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将会大大改善，因为通过进行贸易，国内商品的数量将会增加，而这将促使资本家们不再把资本用来收买黄金，而是将其投入工业。

他们同时还表示相信，政府将会采取坚决措施同投机倒把行为做斗争，而这件事是政府因感觉到自己地位不稳而迄今未曾做过的。

由于莫斯科会议做出的决议，拥有英国、美国资本的企业将工业产品的价格提高了几乎一倍。但同时，市场上的物价却立即开始下降。

例如，在圣诞节之前猪肉价格是每公斤1.5万列伊，而现在是0.7万列伊；原价为每米2.5万列伊的布料已降到每米2万列伊；棉线原价每公斤是12万列伊，现已降至9万列伊；金币原价为每枚65万~70万列伊，12月的售价是每枚40万列伊。

12月29日在布加勒斯特市的某些围墙上出现了标语：“彼·格罗查政府活着，而人民在挨饿”。

季莫菲耶夫中将^①

1945年12月30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П.П. 季莫菲耶夫，驻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会机构的苏方人员。

№092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对罗和约给伦敦副外长
会议苏联代表团指示的决议**
(1946年1月7日)

秘密

批准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并经修改的对意和约和对罗和约问题给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苏、英、美、法四国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见附件）。

1946年1月7日

附 件

**给出席伦敦副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关于对罗和约**

一、苏联代表团在副外长会议上应当依照苏联代表团就对罗和约问题于1945年9月12日提交四国外长伦敦会议审议的建议以及在该次会议上达成的相应决议行事。

二、在讨论美国和英国在上次四国外长伦敦会议上提交审议但尚未审议或者在对之进行讨论中出现分歧的建议时，苏联代表团应

当遵循下列各项原则：

1. 对武装力量的限制（美国备忘录第4章和英国备忘录第3点）。

支持被四国外长会议作为讨论基础的美国建议。如果在讨论这个建议时提出裁军的具体数字，则可主张罗马尼亚军队应当缩减到大约10万人左右。

不同意建立监督裁军的检查制度，理由是在签署和约之后罗马尼亚将加入联合国而成为其一员。

反对限制军工生产，理由是在罗马尼亚军事工业微不足道，但如英国人和美国一再坚持，则可同意对军事工业加以限制。

2. 从罗马尼亚撤军（英国备忘录第5点）。

将从罗马尼亚撤出军队问题同从意大利撤出军队问题一并提出。为了保护红军同在奥地利的苏占区之间的交通线，需要在罗马尼亚留驻必要数量的苏军。在这一建议被接受的情况下可同意让英国人在意大利留驻部分部队以保护其同奥地利之间的交通线。

3. 特兰西瓦尼亚（英国备忘录第9点和美国备忘录第1章第2点）。

坚持苏联代表团关于将全部特兰西瓦尼亚移交罗马尼亚的建议（第3点）。

4. 关于变更罗马尼亚边界问题。

暂不讨论这个问题，理由是苏联代表团尚未得到必要的材料。

5. 关于赔偿盟国的财产和赔偿罗马尼亚在战争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美国备忘录第6章和英国备忘录第11点）。

1) 同意以罗马尼亚在相关盟国的资产进行抵偿，但是反对以其在中立国家的资产抵债。

2) 反对以罗马尼亚公民在国外被收归国有的财产进行赔偿，因这是罗马尼亚的内部事务。

3) 反对建立负责监督罗马尼亚履行和约规定的经济义务情况的同盟国委员会。

6. 关于让罗马尼亚承认多瑙河公约（美国备忘录第 2 章，英国备忘录第 10/4/点）。

像在四国外长会议上已经做过的那样，拒绝英国和美国的建议。

7. 平等开放原料、贸易和工业，平等使用港口、河流和航空设施（美国备忘录第 7 章）。

拒绝美国的建议，理由是这个问题应当是对所有国家适用的普遍性协定的议题。

8. 关于主权。

反对在和约中写入关于恢复主权的条款，理由是签订和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恢复罗马尼亚的主权。

9. 保留还是废止双边和多边条约（英国备忘录第 10/5/点）。

在他们具体指明所指系哪些条约之前，我们对此持保留态度。

10. 经济和财政问题（英国备忘录第 11 点）。

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约中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章节。

11. 军人墓地（英国备忘录第 10/8/点）。

苏联代表团应当拒绝这一建议。

12. 承认取消国联和国际法院常设法庭（英国备忘录第 10/2/点）。

不反对英国的建议。

13. 承认联合国组织权力机构（英国备忘录第 10/3/点）。

不接受英国的建议，因为已经确定支持罗马尼亚加入联合国成为其一员。万不得已时可不予反对。

№09248

格罗查关于三国外长会议
改组罗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
给维辛斯基的信
(1946年1月7日)

苏联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安德烈·亚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阁下：

为了执行三大盟国外长会议的决议^①，罗马尼亚政府同以尤利乌·马尼乌先生为首的国家农民党的全权代表和以迪努·布莱蒂亚努为首的国家自由党的全权代表进行了会谈，之后于今日（1946年1月7日）收到了这两个党的来信。信中说：

国家农民党提名埃米勒·哈齐埃甘作为该党在政府中的代表，而国家自由党提名米哈伊·罗姆尼采亚努为代表。

罗马尼亚政府认为，上述两党提名的代表符合莫斯科决议中规定的条件，准备接纳他们进入政府。只要您表示同意，我们就准备颁发关于任命他们的国王令。

内阁总理 彼得·格罗查
1946年1月7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09245文件。

№09252

维辛斯基与特特勒斯库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9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
米高扬、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归档。

秘密

摘自安·亚·维辛斯基日记

在离开罗马尼亚的那一天早晨，特特勒斯库^①在我那里谈及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特特勒斯库感兴趣的是当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以及起草和平条约并讨论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时会不会邀请罗马尼亚去协商。特特勒斯库还说，他担心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会全力支持匈牙利反对罗马尼亚。

我回答特特勒斯库说，他应该很清楚我们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变化^②。我说，可以预计，正如特特勒斯库所想的那样，美国和大不列颠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将持更有利于匈牙利而不利于罗马尼亚的立场。至于说在起草和平条约时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讨论程序，目前我难以在这方面给他以确定的回答。

① 特特勒斯库，时任罗马尼亚外交部长。

② 苏联政府赞成将北特兰西瓦尼亚转交给罗马尼亚。

特特勒斯库一再感谢我在把贝贝·布莱蒂亚努和福蒂诺从部长候选人名单中除名一事上对他的支持。特特勒斯库许诺说，他本人一定同共产党人一致行动。并表示相信，他和罗马尼共产党之间永远会找到共同的语言以及进行合作的共同纲领。

我在回答特特勒斯库时指出了特特勒斯库集团同共产党合作对在罗马尼亚进行民主变革事业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这在目前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在交谈过程中我说，在罗马尼亚有一种传言，说什么我们要把苏维埃制度强加于罗马尼亚，这是毫无根据的。他听了以后十分高兴，并且似乎有点害怕这种前景。

安·维辛斯基

1946年1月9日于布加勒斯特

№09253

维辛斯基与乔治乌－德治
关于共产党在政府和竞选中的
策略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9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
米高扬、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归档。

秘密

摘自安·亚·维辛斯基日记

在前往保加利亚的当天早晨，我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①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们交谈的主要问题如下：

1. 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政府内部和对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策略。

2. 关于即将举行的竞选运动。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请我就这些问题给他必要的指示。

我提醒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说，我只能谈点个人的意见，并请他千万不要把我说的话作为指示。我还提请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注意，在我抵达布加勒斯特的短短几天内，对情况的熟悉程度还难以保证我就这些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没有错误。对于格奥尔

^①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基·乔治乌-德治提出的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策略问题，我谈了这样的意思：这一策略应该旨在确保政府内部的最大限度团结。因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提出了最好实行诸如罗马尼亚银行国有化一类的措施的问题，我表示反对采取这种措施。我认为罗马尼亚目前还没有作好这种准备。同时我指出了尽最大努力发展和巩固苏联和罗马尼亚的工业、贸易和银行机构的活动的必要性。

同时我还指出，共产党必须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色，因此不要害怕对政府机构的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进行批评，也不要害怕自我批评。比如说，我指出，共产党对地方政府机关和党的代表的反常行为不应该表现出任何姑息宽容，要坚决和公开地同反常行为进行斗争。我说，这有助于提高共产党的威信和扩大它对人民的影响。我举例说，如对农民阵线在各地的反常行为，过去进行的斗争不够坚决，在某种意义上是悄悄地进行的，这曾造成了不良后果。我还指出，司法部长对亲法西斯分子无所作为，表现在由于形式方面的原因停止了人民法庭的工作，以及国家机构严重不纯，混进了法西斯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尤其像警察机关、司法机关、外交部等机关）。这是不能容忍的，不利于巩固共产党的威信，不利于巩固共产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的威信。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承认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关于共产党对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的态度问题，我建议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尽力扩大这两个政党内部的瓦解和各种集团的分裂倾向。对国家自由党要采取措施孤立迪努·布莱蒂亚努和贝贝·布莱蒂亚努集团，让罗姆尼采亚努、达尼埃波利等人从他们中分裂出去。我说，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共产党应该不要妨碍特特勒斯库的意图，而应该在瓦解国家自由党方面给他提供帮助。

我说，按照我的意见，对国家农民党应该实行让马卡雷斯库、哈切加努这些农民党人同政府中的民族农民集团（亚历山德雷斯库集团）亲近的方针。还要特别注意表现出脱离马尼乌倾向的米哈拉凯的行为。这件事是我动身前往保加利亚之前的头天夜里维绍亚努直截了当告诉我的。

我还提请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注意，三国外长莫斯科决议对罗马尼亚的“历史”党给予了重大打击。共产党现在的任务是利用这一点，使这些政党的分歧和瓦解的倾向加大加深。

关于竞选运动，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请求我们同意把罗马尼亚人制定的选举法草案寄到莫斯科预先咨询一下。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问，今后在为“历史”党提供出版、言论自由方面应该怎么做。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必须依据三国外长的莫斯科决议。我特别指出，在政府没有禁止出版农民党的报纸的情况下，不能不允许印刷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会出版自己的报纸。

我向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建议说，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他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要慎重考虑，仔细地权衡所有情况，之后拟订出自己的建议。

从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进行的交谈中得知，罗马尼亚人从我们这里得到了20部流动电影放映机，但完好无损的只有4部。我答应回莫斯科后过问这件事。

从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的进一步交谈中还发现，朋友们需要竞选经费。他们的财政状况十分可怜，而社会民主党和特特勒斯库的党却拥有足够的资金。我问，朋友们需要多少竞选经费。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说需要10亿列依。从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朋友们指望我们提供帮助。

我个人认为，有必要把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泰奥哈里或

者朋友中负责竞选的某个人请到莫斯科，就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同我交谈中提到的问题和其他与当前有关的问题同他们进行讨论。朋友们无疑需要权威性的指示。便于他们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开展工作。

安·维辛斯基

1946年1月9日16时于布加勒斯特

No 09262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乔治乌—德治、 召尔杰斯库关于竞选纲领的谈话记录

（1946年4月2日）

（翻译：泽格·谢苗——乔治乌—德治的助手）

维·米·莫洛托夫和格·米·马林科夫同志问乔治乌—德治和特·召尔杰斯库^①同志，他们希望在这里弄清楚哪些问题？

乔治乌—德治说，他们此行是想就罗马尼亚即将举行的大选问题同苏联方面进行商量。他说，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制定了竞选纲领草案，在提交给已经参加了政府联盟的各政党之前，他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该纲领中阐述的某些问题的建议。

问：你们计划在什么时候选举？

答：在1946年夏末，大概在8月份，准确的日期尚未确定。

问：为什么你们要把选举定在这一期间内进行，你们出于什么考虑？

答：我们之所以要在这一时间进行选举，是因为第一，这是收获的季节。第二，我们认为，准备选举需要一些时间。我们考虑，在此期间我们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以便在选举中取得更有利的结果。

之后乔治乌—德治简要介绍了国内的情况，比较详细介绍了工业部门的状况。他指出，由于原材料短缺，冶金、食品和其他一些

^① 特·召尔杰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工业部门的形势严重。

问：你们将如何进行选举，是提出参加政府联盟的政党的共同名单，还是提出单独的名单？

答：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有两种方案：

1. 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人民民族党、农民阵线党、安东·亚历山德雷斯库的自由农民党以及尚未加入民族民主阵线的特特勒斯库的国家自由党共同提出加入民族民主阵线的政党和组织的名单。

2. 民族民主阵线的各政党提出单独的名单。特特勒斯库的国家自由党也提出单独的名单。但是，在选举期间同特特勒斯库签订关于合作和放弃相互攻击的协议。

随后乔治乌—德治同志介绍了选举纲领草案的主要内容，并就其中的某些条款向苏联方面征求意见，其中包括：

1. 要不要把下列内容写进选举纲领：

(1) 国家银行国有化；

(2) 保险公司国有化；

(3) 对各主要银行实行国家监督；

(4) 对具有垄断性质的卡特尔和公司的活动实行监督。

乔治乌—德治同志和特·召尔杰斯库同志认为，这些要求可能在人民中间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如果付诸实施就可能破坏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的历史党的物质基础。这两个政党同罗马尼亚的国家银行和上面提到的各种机构有密切的联系。

2. 对君主政体和国王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乔治乌—德治说，他们获悉，特特勒斯库对君主政体的观点如下：

“巩固立宪君主政体——君主政体是罗马尼亚国家的主要制度并保障罗马尼亚国家的历史发展。”

特特勒斯库建议把这段话写进选举纲领。

乔治乌-德治同志说，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没有讨论过君主政体问题，但是他和特·召尔杰斯库认为，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某些阶层中，尤其是在农村中，国王和君主政体的声望很高。因此，他和特·召尔杰斯库认为，可以把关于君主政体这一点写进选举纲领，其表达方式如下：

(1) “在立宪君主政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或者

(2) “在作为罗马尼亚民主国家的主要制度的立宪君主政体的范围内保证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问：你们期望选举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答：如果我们能动员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那么我们能够得到70~75%的席位。乔治乌-德治说，同时应该注意到，根据1927年通过的、被民族自由农民党人和自由党人在选举中不止一次利用的旧的罗马尼亚法律规定，在选举中取得40%以上选票的政党自动得到20%的席位作为奖励。

我们也准备利用这一法律。

问：列入民族民主阵线的政党对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

问：彼得·格罗查说，他同意把北特兰西瓦尼亚部分交给匈牙利，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答：我们不知道这一情况。我们只知道，匈牙利文化代表团在访问罗马尼亚期间，曾经向彼得·格罗查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彼得·格罗查在同我（指乔治乌-德治——JI. 巴拉诺夫注）交谈中谈了他的意见。他说，或许应该向北特兰西瓦尼亚提供在罗马尼亚国家框架内的行政自治权。

问：你们在有关农民问题的计划中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我们在计划中谈到了关于完善土地改革。实际上这意味着以文件的形式确认土地改革后得到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我们着重强调了保留私有制的原则，以便打消对集体农庄的疑团。反动势力为了恐吓农民，极力散布这种怀疑。

问：土地改革进行得顺利吗？

答：还好，有过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分配土地是在缺乏国家必要监督和没有严格遵守规定标准的情况下开始的。所以，一些不应该得到土地的人分得了土地。有些地方分配土地出于血统关系的考虑和其他考虑，因此出现了一些误会。

现在我们正在纠正这些错误。成立了国家委员会，前往各地发放土地证，依法确认某些农户的土地归属。发放土地证的工作尚未开始，我们准备在选举之前进行这项工作。

问：有多少农户得到了土地？

答：将近70万个农户。

问：会不会存在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的选举联盟？

答：他们有共同的路线，但是尚未就统一的名单问题达成协议。

问：除了选举的事情以外，你们还有什么想在这里解决的问题？

答：在选举的经费问题上我们还有点请求。

答：请你们准备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次会晤时再研究。下一次会晤时我们要了解一下选举纲领草案。

(注：乔治乌-德治几乎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会谈记录 Ⅱ. 巴拉诺夫
1946年4月2日于莫斯科

№09266

克鲁格洛夫关于苏联内务部
各战俘营中罗马尼亚战俘数量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4月10日）

绝密

苏联外交部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遵照您的指示，现将截至1946年4月10日关押在内务部各战俘营中的罗马尼亚人战俘数量补充呈报如下。

根据1945年8月13日国防委员会第9865cc号决定，共有61662名罗马尼亚人战俘被释放并遣送回国。此外，有20411名罗马尼亚人战俘被移交去组建罗马尼亚志愿师。

关押在内务部各战俘营的罗马尼亚人战俘除了将军、军官和病人以外，均在各经济部下属的企业劳动。其中大部分罗马尼亚人战俘劳动在：各建设部6000人，煤炭工业部5000人，交通部2600人，电站部2200人，有色冶金工业部1000人。

其余的少数罗马尼亚人战俘在各州和各共和国的各部下属的建设工地和企业劳动（见附件）。

苏联内务部部长 C.H. 克鲁格洛夫

1946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附件（绝密）：

截至1946年4月10日关押在
内务部战俘营的罗马尼亚人战俘的数量

共关押罗马尼亚人战俘50928名，其中：

1. 关押在内务部各战俘营49138名，其中：

将军——4名

上校——40名

中校和少校——161名

中级军官——2994名

士官和士兵——45939名

2. 住在专门医院的战俘共1513名，其中：

中校——3名

中级军官——52名

士官和士兵——1458名

3. 在前线网点共计37名。

4. 在武装力量部的一些劳改营共计240名，其中：

中级军官——1名

士官和士兵——239名。

№09274

**卡夫塔拉泽关于对安东内斯库等
战犯执行死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话记录**

（1946年6月1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
洛佐夫斯基和拉夫里舍夫。

秘密

国王已经批准对扬·安东内斯库^①、米哈伊·安东内斯库、康斯坦丁·瓦西利乌（前内务部副部长）和格奥尔基·阿列克西亚努（前后德涅斯特省省长）执行死刑。可能今天在监狱中执行死刑，但不公布。

国王赦免了3个人：康斯坦丁·潘塔泽（前军事部长）、克里斯杰斯库（前秘密警察局长）和洛克（前犹太问题专员）。这些人的死刑改判为终生服苦役。所有其他判决仍然有效。

C. 卡夫塔拉泽^②

1946年6月1日15时15分于布加勒斯特

① 扬·安东内斯库于1944年8月23日被捕之后，即由国王米哈伊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人送交给苏联指挥部，并被押送到苏联境内。1946年2月22日，罗马尼亚请求将安东内斯库移交给罗马尼亚政府。4月3日，苏联方面满足了这个请求。

② C.И. 卡夫塔拉泽，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

№09289

巴拉诺夫要求提供罗国内政治形势的 信息给乔治乌—德治和波克的信

(1946年6月19日)

乔治乌—德治和安娜·波克同志：

利用我们的信使乌里扬诺夫同志去你们那里的机会，我们想得到你们关于罗马尼亚议会选举前夕国内政治形势的简明信息。如果关于这一问题有党通过的决议或者由政府批准的选举法，也请给我们寄来。

考虑到国内因准备选举和国内外反动派的猖獗而导致的复杂形势，我们还想得到关于反动派破坏活动的某些新信息。

我们感兴趣的材料还有，国王及其近臣的立场和表现；“历史党”内部的形势；与社会民主党（彼特雷斯库集团被开除出党以后）合作的前景；各民主党联盟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实际活动及新政党对人民民主阵线和新选举法的态度等。

请你们对我们提出的如何使用已经从反法西斯学校毕业的罗马尼亚战俘的询问尽快答复。如果你们来不及将上述所有问题的信息由乌里扬诺夫同志带回，那就请通知我们何时再向你们派出我们的信使。

祝你们工作顺利！

此致敬礼！

Л. 巴拉诺夫

1946年6月19日于莫斯科

No09292

马尼乌为纪念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和 恢复独立二周年致斯大林的信

（1946年8月23日）

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元帅阁下

值此1944年8月23日这个纪念日的二周年之际，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谨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国家农民党借此机会向友好的盟友——苏联各族人民和阁下本人——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导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在消灭希特勒主义、解放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领土并将其归入国家版图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的保证。

1944年8月23日这一天，对于罗马尼亚来说象征着退出它所不希望的战争和同它的始终不渝的盟友一起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同时也象征着罗马尼亚摆脱独裁统治。

罗马尼亚民族之所以感激苏联和各盟国，是因为它们确保了它的独立及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恢复。各盟国政府的全权代表所发表的声明以及莫斯科条约的各项决定保证了所有这一切。

伟大的苏联和各盟国的正义感，以及它们对使国际决定得以执行的关注，使我们有勇气像我们对其他盟国政府已经做了的那样，值此1944年8月23日起义二周年之际，向阁下介绍由于在格罗查主持下的政府不执行莫斯科会议决定而导致的、我们的国家目前所

处的令人忧心的局面。

国家农民党是农民和工人的政党。它自建立以来一直在不断地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进行斗争。

国家农民党的对外政策在过去曾经一直是以同苏联和各盟国的友谊为基础。

我们的党曾经坚决地反抗德国帝国主义。它为反对国内的独裁统治和反对安东内斯库政权在未经罗马尼亚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战争而进行过斗争。

国家农民党在德国占领期间也曾提出过这一政策。本党的主席开始了在开罗举行的为8月23日起义奠定了基础的谈判，并以罗马尼亚民族的名义接受了停战协定的先决条件，从而使谈判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国家农民党及其主席履行了他们承担的义务——使罗马尼亚从反对苏联的军事冒险中挣脱出来，并以国家的全部力量反对希特勒德国。

8月23日起义是由国家农民党准备和实施的，而“民族民主联盟”中的民主政党，即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只是在后来才加入了由国家农民党开始并完成的事业。

国家农民党代表着罗马尼亚民族的大多数。今天，罗马尼亚民族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政权拒绝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公民权利，因为这些权利的行使将与这个政权所依靠的政治结构相抵触，既然如此，那么当初又何必还要为自由而斗争呢？

而现在，国家农民党成了报刊攻击的目标，而这些攻击又是极不公正的，它的领导人不时地遭到杀害或身受重伤，它的所有政治活动均被设置了一切可能设置的障碍。

在1940年，党的总书记维尔吉尔·马加鲁被特种军团的兵士杀害。在1946年，曾经有人策划了通过挑衅行动杀害总书记尼古拉·佩内斯库，致使他身受重伤，而其秘书则当场身亡。

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是被武装的政治集团杀害的。

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中没有一条为政府所执行：我们的报刊几乎被取消；权利和自由被废除；监狱因关押我党的支持者们而爆满；我们被禁止举行会议，如若举行则遭到手持武器的半军事组织的袭击；信仰自由根本不存在；选举法被有意地制定得给人以伪造民意的可能性；杀人凶手、煽动杀人者和暴徒们不仅受不到惩治，相反却因为他们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而受到奖赏；行凶杀人和残酷刑讯都是在政府和当局的庇护下进行的。政府人士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说所有这一切暴力行为和滥用职权都是根据莫斯科的授意干的。

为迫使罗马尼亚政府履行停战协定的条件和执行莫斯科决议，我们曾无数次向盟国管制委员会以及各盟国政府发出抗议，但均未见任何效果。

国家农民党为实现 8 月 23 日起义曾做出过最大的贡献，而就在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罗马尼亚却正在忍受着现政府的恐怖和野蛮行为，它采取法西斯镇压手段来对付其一切政治反对派。

国家农民党对罗马尼亚政府一手造成的这种无政府状态表示抗议，并请求阁下予以敦促，以确保停战协定条件和莫斯科决议得到认真执行，同时也敬请阁下采取措施，让以苏联红军的代表为主席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尽到其负担的责任，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履行它承担的义务。

国家农民党希望随着莫斯科决议得到执行，在罗马尼亚将实行并保持一系列确保 1944 年 8 月 23 日起义时曾经打算要争取的民主生活的自由和依法治国的措施。

国家农民党感到极其遗憾的是，它由于迫不得已而用国家令人难以容忍的局面使罗马尼亚这一喜庆之日的欢乐与安详黯然失色，但这个喜庆之日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向您表达自己诚挚谢意、同时

又向您描绘罗马尼亚现实生活中令人忧心的情景的幸福机会。

我们仍将希望，指出这一局面将不会影响罗马尼亚人民同光荣的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永恒友谊。

请阁下接受我们对您深深的敬意。

国家农民党主席 尤·马尼乌

1946年8月23日于布加勒斯特

No 09294

拉夫里舍夫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与 帕特拉什卡努的谈话纪要

（1946年9月17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古谢夫。

巴黎市^①

秘密

9月17日我邀请了罗马尼亚司法部长帕特拉什卡努。在交谈过程中我问帕特拉什卡努，是什么原因招致匈牙利代表抱怨说罗马尼亚政府不给予30万~40万居民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族人以罗马尼亚国籍，并且说罗马尼亚政府似乎打算将他们迁移出罗马尼亚。在回答时帕特拉什卡努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1945年4月4日罗马尼亚曾经颁布了一项有关居住在北特兰西瓦尼亚的居民的国籍问题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所有在1940年8月30日（维也纳仲裁的日期）之前曾经拥有罗马尼亚国籍的人均可自动恢复其国籍，在1940年8月30日至1945年4月4日之间没有选择匈牙利国籍而自愿选择了其他国籍的特兰西瓦尼亚居民，以及自愿在1944年8月23日之后罗马尼亚曾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服军役者，不能授予罗马尼亚国籍。在北特兰西瓦尼亚共有30万人是1945年4月4日法案规定不能授予罗马尼亚

^① 会谈是在巴黎和平会议召开期间进行的。卢·帕特拉什卡努是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成员。

国籍的，这些人目前是持匈牙利身分证生活在那里并被认为是外国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维也纳仲裁之后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人（官吏等）。罗马尼亚政府不打算授予这些人罗马尼亚国籍，也不打算让这些入继续留住罗马尼亚，因为这将会导致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成分对比关系朝有利于匈牙利的方面转变，并且会有助于匈牙利修正主义的宣传。罗马尼亚政府觉得，许多在1940年8月30日以后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似乎是根据匈牙利政府的指示继续留在那里的。罗马尼亚内务部已经下令从北特兰西瓦尼亚外迁外国人。这项命令实际上尚未付诸实施，并且在和约签订之前也不会付诸实施。罗马尼亚政府认为，许多外来的匈牙利族人之所以留在特兰西瓦尼亚，是因为抱有这样的希望，即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将会移交给匈牙利。而一俟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那些无权获得罗马尼亚国籍的匈牙利人就将会自行争取前往匈牙利。

罗马尼亚政府现在不与匈牙利政府就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地位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在签订和约之前也不打算与它进行这种谈判，目的在于不削弱自己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地位。而在和约签署之后，罗马尼亚政府将不反对同匈牙利政府讨论涉及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地位的各种问题。

我提醒说，罗马尼亚政府曾经请求盟军管制委员会允许撤销按照停战协定第8条之规定被冻结的罗马尼亚公民的财产的管制，并罗马尼亚政府已经被允许撤销对罗马尼亚公民私有财产的管制，我问帕特拉什卡努此事目前进行得如何。帕特拉什卡努回答说，罗马

尼亚政府已经解除了对罗马尼亚公民私有财产的禁令，但属于叛徒的财产以及属于曾经同敌人狼狈为奸者的财产除外。对罗马尼亚公民的巨额财产以及匈牙利和匈牙利公民的任何财产停战协定第8条继续有效。

拉夫里舍夫

1946年9月17日于巴黎

№09298

莫洛托夫关于罗马尼亚选举中的 合作问题与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6年10月13日)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乔治乌—德治通报说，罗马尼亚代表将于今天，10月13日返回罗马尼亚，因为最近在罗马尼亚将颁布一项关于选举的法令，而按照宪法的规定，选举应在这部法令公布1个月之后举行。这样一来，选举就应当在今年的11月中旬举行。特特勒斯库一开始曾经坚持主张把选举推迟到和约签署之后，其理由是：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处理和约问题，同时也担心大概将进行得风波迭起、十分激烈的这次选举将可能会对外长委员会工作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只是在政府中的共产党人成员向特特勒斯库指出有必要利用巴黎会议上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方面取得成功所带来的良好印象，并指出罗马尼亚的经济局势在12月或明年1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以及继续推迟举行选举可能导致在竞选运动中被动用的干部散归平时岗位之后，特特勒斯库才最终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

莫洛托夫在这里指出，不能把特特勒斯库看成是现政府百分之百的拥护者，因此不排除他怀有通过推迟选举日期来达到其自己的某些目的的可能。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在特特勒斯库的立场中确实可以看出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反动资产阶级对他的态度又使他不得不同共产党人合作，而且他也没有其他出路。他知道马尼乌、布莱蒂亚努及其支持者们是何等地仇恨他，那些人视他为自己阶级的叛徒。关于这一点，乔治乌-德治讲述说，在共产党同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的党合作时期，马尼乌曾把特特勒斯库归入了他所拟定的战争罪犯名单的为首者之列，指控他曾经是第一个在罗马尼亚实行独裁专制的人。而实际上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之所以攻击特特勒斯库是因为他在1940年皇家议会讨论苏联政府关于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归还苏联的最后通牒式照会时所持的立场，当时特特勒斯库十分积极地反对马尼乌、布莱蒂亚努、约尔加及其他要求政府抵制苏联政府的要求直至使用武力的人。现在特特勒斯库正试图把整个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并将其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他声称，只有他才有能力有效地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至于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立场，则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反复重申说，罗马尼亚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同苏联的亲密友谊和联盟为基本内容的新的历史时期。

乔治乌-德治补充说：当然，同特特勒斯库的合作本身是有困难的，因为他往往为了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而偏离政府的总的政策。他有时还试图利用参加民主联盟的个别政党之间的某些意见分歧，而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试图在共产党的领导班子中挑起这种分歧，他时而单独地同安娜·波克商量，时而向他（乔治乌-德治）征询意见，时而又向瓦·卢加或其他人去咨询。但毕竟还是可以说，在所有主要问题上，例如在农业改革、政府的对外政策等问题上，同特特勒斯库的合作进行得还是顺利的。通常，他一开始总是持坚决的立场，在受到某些压力之后再做出让步。

莫洛托夫问，政府在行将进行的竞选运动中获胜的机会如何。

对此，乔治乌－德治回答说，罗马尼亚政府对未来是持乐观态度的，因为它已经为了确保取得胜利而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莫洛托夫同志提醒乔治乌－德治说，政府无论如何不应让事情放任自流。

随后，莫洛托夫告诉乔治乌－德治说，今天晚上19点他将招待特特勒斯库，为罗马尼亚代表团送行。他表示希望乔治乌－德治也能同特特勒斯库一道前来。

会见持续了2小时20分钟。

1946年10月13日13时于巴黎

№09303

雅科夫列夫关于议会选举中的策略问题与 波德纳拉希的会谈纪要

（1946年11月6日）

送杰卡诺佐夫，归档。

秘密

此次谈话只涉及议会选举，共向波德纳拉希^①提出了如下一些问题：

1. 此次选举的前景如何，民主主义政党联盟^②打算实际获得多少选票？

回答：今年11月5日，我们党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安娜·波克、波德纳拉希和米龙·康斯坦丁内斯库在从外地结束（为了解和指导帮助选举准备工作而做的巡视）并返回之后，举行了一次旨在剖析错误和做出有关选举前景的结论的会议。

乔治乌—德治、安娜·波克和我的意见是民主主义政党联盟实际将得票55%，最多60%。米龙·康斯坦丁内斯库预计可得票65～70%。我们认为，康斯坦丁内斯库过高估计了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力量并且对情况的评估也不完全现实。

① 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政府中担任副国务秘书。

② 民主主义政党联盟是由共产党人于1946年春天建立的，它联合了共产党、农民阵线、社会民主党、民主自由党（亚历山德雷斯库）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在选举时提出统一的名单，按各党的“重要性”分配当选证书。

秘密情报局根据现有的情报提出的看法同样也预料民主主义政党联盟最多将得票 55%，而不是 60%。

在两个月之前曾经还可以指望民主主义政党联盟取得更大一些的成果，但是由于旱灾和因旱灾而引起的经济运作方面的诸多困难，参加政府的各政党的声望均受到了一些影响。在外地，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既有受到旱灾之苦的人，也有没受到旱灾之苦的人。前者对政府不满是因为政府没采取充分的措施来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后者对政府不满是因为政府不得不从他们手中征集粮食以供干旱地区之需要。

现在看来我们所采取的经济运作方面的措施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对于旱地区的供应工作做得很不及时，以致给某些地区造成了十分困难的局面。只是到了最近，即 10 月 31 日，我们才决定通过建立政府特别委员会来采取坚决的措施，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形式上的领导——格罗查及实际工作的成员：乔治乌-德治、T. 约内斯库和贝让。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对于旱地区的粮食供应的可能性问题，这种供应首先是靠国家的内部储备，其次是靠从国外进口。在 11 月 5 日的该委员会会议上，研究了现在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向缺粮地区供应粮食。现在得知，在萨武列斯库领导下的所谓“统一指挥部”周围虽然聚集了一批专家，但制定出来的计划原来却不是用于最近的将来，而是用于 1947 年 1~3 月，即选举之后的。这个“统一指挥部”开始征集粮食仅仅是在纸上，而实际上可以用来在选举期间进行调配的任何粮食储备却根本没有。

为了向干旱地区供应粮食，前一段时间我们已允许农民个人主动地自由采购并向遭受旱灾的地区运去粮食。实践表明，得益于这一许可的仅仅是投机商人和农民中的富裕户，因为贫农和缺粮户由于缺乏资金而不能利用这一许可。富农们开始雇用贫农并派他们出去采购粮食，而且他们给这些被雇用的贫农的报酬不是粮食而是

钱，这样一来，粮食就全部落入了富农和投机商人手中。现在，富农和投机商人囤积着这些粮食待价而沽，而缺粮户依旧没有饭吃。

“统一指挥部”和乔治乌—德治都曾认为这一措施将可以调动私人的积极性把足够数量的粮食引入受灾地区，因而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只需要从明年1月开始即可。实际上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已经断定，正是现在，确切地说是在若干天之内，我们必须向遭受旱灾的地区投放粮食，否则发生大规模饥荒就不可避免。

农村中的富裕户和富农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钱财因而不需钱花；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敌人又在他们当中进行大量的工作，以便人为地阻拦农民手中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其目的是在于恶化受灾地区的局势，同时又指责政府在向灾区供应粮食方面的无能。

在所有16个遭受旱灾的地区总共有2000到5000个农民家庭，家家都急需救济粮。如果粮食问题能够在4~5天内，即不迟于今年的11月10日得到解决，我们就能在选举中获得这部分农民的赞成票，约占全部选票的5~10%。

所以，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遥远将来的计划，而是在于立即找到供应缺粮地区的粮食储备，而且就要在现在，即选举之前，目的是获得这些投给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选票。

在粮食问题上我们眼下的基本政治任务是：我们需要采取一切措施争取使11月19日的选举成为民主主义政党联盟政府的胜利而不是失败。如果11月19日不是胜利之日，则一切长远的计划都将自动落空。我们现在需要350~500车皮的玉米来供各地方和政府机构将其投放到受灾地区。

众所周知，总共有16个县：整个摩尔达维亚、南布科维纳和布泽乌县，如果近日内不能把粮食投放到这些地区，则毫无疑问，这些县的饥饿农民将被反动派所利用，而这些反动派现在就已经在力图造成惊慌和混乱：他们叫嚷饥饿并就此指责政府，乘机在政治

上利用国家的经济困难。这16个县的居民占全国人口的20%以上，及时向他们供应粮食将对选举的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我还想指出的是：农村中的富农和反动分子据我们所知是按照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指示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力争做到在11月19日之前不以任何方式出售粮食。有事实证明，他们劝说农民不要出售粮食并向其许诺：如果11月19日以后的粮价低于现在，将向他们支付差价。

还发现有破坏铁路的事件，运输体系遭到破坏，运粮列车很少能到达指定地点，车箱沿途即被摘钩并被发往遥远的车站，发往国内完全是另外的一些地区，从而使粮食运不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同样的情况在石油产品的运送方面也有发生。

总之，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现在正在一切战线发起广泛的攻势：在金融战线、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

在所有这一切方面给他们以积极帮助的是特特勒斯库集团的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而在石油产品方面则主要是约内斯库。特特勒斯库的人主要是在外地向各反对派政党的代表提供金钱供其进行反政府活动之用。总而言之，资产阶级的所有集团与反动势力之间针对遥远未来实际上的勾结已经开始。对于特特勒斯库集团的人来说这一点尤为突出，该集团认为，“同路人关系”的时期已经结束，越往后，组成现在政府的资产阶级和左派政党的利益就会越不一致。除此之外，他们也不完全排除反对派各政党取得某种程度上胜利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现在就已经在为今后可能的合作铺路搭桥了。

还应当指出的是一系列目前在国内外广泛散布并且是反动势力的某种竞选口号的传言。其中有：

1) 安娜·波克和菲尔德尔曼曾经为了准备推翻国王和取消君主政体以及取消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的独立自主权而前往莫斯科拜见

了斯大林同志。安·波克刚刚从莫斯科返回国内，大主教尼科季姆即被提议前往莫斯科，以便在那里实现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向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臣服。可以预料，在最近的将来，特别是在选举之后，将对国王做某种处理。所有这一切都是安·波克及其他犹太人活动的结果。

2) 将建立军事化类型的集体农庄，也就是说，农民将被弄进兵营式农庄，农耕工作将按命令进行，实行 12 小时工作日，每月有一天休息日，农民将无权处理自己劳动的产品。

3) 在议会选举之后将立即对罗马尼亚，首先是对摩尔达维亚、布科维纳的铁路改铺宽轨。

4) 选举之后彼·格罗查将被立即撤职，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是布加勒斯特而是在克卢日被提名为候选人的原因，因为他在克卢日肯定将得到较少的选票，而这种情况将可以给人以借口说格罗查已经丧失了威望，因此他应当被解职。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传言在全国范围内口径都是一致的，因此很显然这些传言是同一个中心散布出来的。

2. 力量对比情况如何，民主主义政党联盟依靠的是谁？

回答：

1) 民主主义政党联盟在农民中的基本依靠是最贫困的农民，部分地还有同样缺少粮食的中农，这就是为什么向遭受旱灾的地区投放粮食问题特别尖锐的原因。这些阶级占农民总数的 60~65%。

2) 产业工人大约占国家总人口的 5~6%，他们将投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票。

3) 国家机关和军队。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他们将会投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票，因为其内部的组织本身以及他们进行选举的环境都可以确保他们投票支持民主主义政党联盟。他们说共将投下近 100 万张选票。

4) 部分小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总的来说他们的人数所占比例不大，对选举结果将不会有特别的影响。

3. 在民主主义政党联盟和反对派的得票方面可以做什么样的预测？

回答：

正如上边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希望通过在投票时得到的实际选票来获得选票的 55~65%，但是我们需要得到的是 90%，而做到这一点将要借助于选举法所提供的一些可能性和某种“技术手法”。

我们预料，投票之后议席的分配可能是这样的：

反对派，20~25 席

卢普的党，5~8 席

其他党派，5 席

匈牙利人联盟（即支持政府者），40 席

民主主义政党联盟，344 席

这样，在 414 个议席中民主主义政党联盟将拥有：

我们自己的席位，344 席

匈牙利人联盟，40 席

卢普的党，5~8 席

总计，389~392 席

4. 预料反对派将在何处能获得最大的成功？

回答：

反对派最大的成功预料可能在特兰西瓦尼亚取得，在那里民主主义政党联盟和反对派将各获得多少选票的问题无法预测，但是不能排除反对派，特别是马尼乌分子将在那里占上风的可能性。

围绕选举所进行的斗争毫无疑问将是非常激烈的，反对派正在为此进行认真的准备。他们组建了专门的队伍，其任务将是占据投

票站以便使选举在他们的控制下进行。这些队伍的任务还将有：不让将投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票的那些人进入投票站。众所周知，他们已经建立了“特别警察”并以适当方式把他们武装起来，直至用装有混合燃料的燃烧瓶。

从自己方面来说，政府除了动用警察、宪兵和军队之外，还准备了5万人用来保护投票站和维持选举期间的秩序，如果需要，即当反对派试图占据投票站的时候，打算把他们作为一支防暴力量加以使用。预料将会发生群众性的不愉快事件，直至发生流血冲突。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 雅科夫列夫

1946年11月6日于布加勒斯特

№09309

维辛斯基关于罗共党内分歧与 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23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
日丹诺夫、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归档。

秘密

摘自安·亚·维辛斯基日记

一开始，乔治乌－德治阐述了一些涉及到不久前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选举的问题。

他说，民族民主阵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事先经过准备并及时加以实施的措施。在竞选运动的第一阶段，参加民族民主阵线的所有政党都分别召集选民并向他们阐述自己的纲领。在第二阶段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所有参加民族民主阵线的政党代表都在这些集会上发言。群众大会上人们情绪旺盛、热情很高，参加的居民也很多。这种情况也导致一些在地方上工作的共产党人和骨干分子对出现的情况做出了表面上的评价，并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对手的力量估计不足而放弃了分别对每个选民进行个别的劝说工作。乔治乌－德治强调，这种没有任何根据的乐观主义支配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宣传鼓动员。

而与此同时，马尼乌的国家农民党却进行了更加紧张的工作，

特别是在农民群众中拥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恰恰是把自己的全部努力都用在了说服农民群众的工作上，因为工人们都公开地、全部地支持民族民主阵线，致使马尼乌分子失去了争取他们站到自己一边的任何希望。

乔治乌－德治继续说，斯大林同志曾经让我们注意农民并建议我们派最优秀的人去在“农民阵线”中开展工作，但我们没有足够深刻地理解他的话。在选举之前几天里，农民们开始纷纷向共产党宣传员提出有关集体农庄的各种问题，开始反对他们，从而证明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些农民认真地做过工作。

同时还有人在进行反犹太人的宣传，特别是在北摩尔达维亚和北特兰西瓦尼亚。还有人用“俄国的奴隶制度”等来恐吓民众。除了所有这一切之外，还有社会民主党，特特勒斯库的自由党中大量机会主义干部的背叛，以及国家过去经受并且现在仍在经受的经济困难。

乔治乌－德治说，尽管有所有这一切情况，但是政府采取了确保民主制度在罗马尼亚取得胜利的一系列措施。

我提了几个涉及选举的问题，并询问军队投票的情况如何，军官和士兵的情绪如何。乔治乌－德治详细地回答说，军队不仅认真地投了票，而且在进行选举工作中给了政府以很大的帮助。

乔治乌－德治接着谈到了作为本次选举的必然结果而将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采取的措施，因为在选举中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已经经受住了自己的第一次考验。

他说，将进行清党工作，所有在这次选举中暴露出来是胆小鬼、机会主义分子和反间分子的党员将被开除出党。相反，那些在选举中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才能的人将被委以重任。与此同时，还将要采取一些组织方面的措施。例如，将撤销州委会，因为处于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县级组织之间的州委员会已经变成了迟钝的和官

僚主义的机构。一部分州委会的工作人员将被派去加强党的县委员会，而另一部分人员将组建一个中央委员会的指导部门。

乔治乌-德治还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将组建一些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在农民、妇女、工会会员等人中间的工作。将特别重视农民，将在每一个村庄建立党的支部。还将成立“罗马尼亚青年联合会”。

接着，乔治乌-德治详细地谈了对改组国内的合作社组织问题的看法，并谈到了同社会民主党人及特特勒斯库的自由党人的相互关系。乔治乌-德治强调说，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在以拉达恰努为首的右翼与得到共产党人支持的比较强大的左翼之间正在进行斗争。

我问乔治乌-德治，关于组成统一的工人党有何想法，事情现在进行得怎样。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正在为办成这件事而进行工作，但速度并不快。

乔治乌-德治随后谈到了国内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并请求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提供大约价值8000万美元的商品信贷。

这一部分的谈话是通过译员什科达同志进行的。随后，根据乔治乌-德治的要求，我们俩进行了单独交谈，乔治乌-德治向我介绍了如下情况。

他认为，在卡夫塔拉泽同志和苏萨伊科夫同志之间形成了不正常的关系。这对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状况产生不良影响。有时从卡夫塔拉泽和苏萨伊科夫那里接受的指示互相抵触。就此问题他强调说，他认为卡夫塔拉泽的主意要比苏萨伊科夫的主意更正确和更有益。他举例指出，苏萨伊科夫曾建议在选举中不要同特特勒斯库的党建立统一战线，卡夫塔拉泽对此表示反对，事后看来他是比较正确的。

乔治乌－德治接着详细谈到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内部关系。从乔治乌－德治的话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在自己的工作中经常碰到来自安娜·波克和卢加，以及部分地也来自特奥哈里^①的障碍。乔治乌－德治没有抱怨他们对他态度不好，也没有抱怨这些同志在搞什么阴谋，但是他认定现在这种情况在客观上给工作造成损害，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波克和卢加不太顾及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乔治乌－德治的威信。乔治乌－德治还强调，波克和卢加在党的领导班子中所占据的地位引起别人的不满，并且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在损害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威信。据说有人责难罗马尼亚现在是犹太女人波克和匈牙利人卢加在统治，此外，人们还强调说，波克是莫斯科的代理人。乔治乌－德治认为似乎需要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是对波克，按照他的意见，应当派她去国外任职，例如去巴黎当罗马尼亚派驻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这样做将可以使情况有所改善并消除那些令人讨厌的议论和闲言碎语。

乔治乌－德治说，波克、卢加、特奥哈里以及其他某些支持他们的中央委员都曾反对由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乔治乌－德治在内——去负责国家经济部的领导工作。他们争辩说，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是如此之糟，以至任何人如果接手此事，等待他们的都将是失败，因此最好还是让别的政党而不是共产党人承受这种失败吧。乔治乌－德治没有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于罗马尼亚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共产党不能推卸自己在解决经济难题方面应负起的责任。现在乔治乌－德治还在担心他得不到曾经反对过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那些人的必要支持。与此同时，当前罗马尼亚的局势就是这样：不成功地解决经济难题，共产党就不能指望巩固自己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影响。讲空话和提出泛泛口号的时代已经

^① 即召尔杰斯库。

过去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人面临着具体的，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任务，在这一领域里倘若遭到马尼乌派和其他反动分子所期待的失败，那定将会使这些人的处境得到改善，并被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说到这里，乔治乌-德治着重强调了以他为首的罗马尼亚贸易代表团此次访问莫斯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他相信他来莫斯科的使命将获得成功，并请求苏联政府这一次仍然能一如既往，帮助罗马尼亚共产党承担起其困难的职责。

在同乔治乌-德治所做的两小时交谈的整个过程中，我主要是仅限于听取他的说明。就波克问题我提醒说，早在去年我们就曾建议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以消除乔治乌-德治上边提到的那些障碍。关于苏萨伊科夫和卡夫塔拉泽的问题，我答应对乔治乌-德治通报的情况予以注意。关于整个这次谈话，我答应向我国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做出汇报。我许诺说，如果有必要，我将再次同他会面。

安·维辛斯基

1947年1月23日于莫斯科

№09311

苏萨伊科夫关于就罗社会和
政治局势与乔治乌－德治谈话
给维辛斯基的报告

（1947年1月30日）

抄送杰卡诺佐夫、沃兹涅先斯基，
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

秘密

兹报告：

应乔治乌－德治的要求（经您同意后）我于1947年1月28日同他进行了会晤，谈话时在场的有毛雷尔^①。

一开始，乔治乌－德治简要介绍了他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及您所做谈话的内容。

在归结这些谈话时他表示确信，他将会得到使他有可能克服现阶段存在于罗马尼亚的经济困难的相应帮助。

乔治乌－德治强调说，他对这些交谈，尤其是同莫洛托夫和同您的交谈感到很满意。他说这些交谈是非常真诚的和非常坦率的。

乔治乌－德治强调说：“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了解罗马尼亚的处境并着眼于未来，无疑将会给我以相应的支持”。

接着，乔治乌－德治转入探讨涉及罗马尼亚目前国内形势的一

^① 扬·格·毛雷尔，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国民经济部部长。

些问题。

他说，据安娜告诉他，格罗查已开始在对待马尼乌的国家农民党人的态度方面再次表现“软弱无力”。最近，在业已存在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格罗查又开始弄出一些别的困难。乔治乌-德治接着说，看得出，造成这样一种结果的也有那项关于大赦的法令，根据该法令所有在竞选运动期间和在选举那天犯下各种罪行的人都被赦免了。据毛雷尔说，甚至连犯下诸如袭击投票站等明显的严重罪行的人也被赦免了。

乔治乌-德治说，早在他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特特勒斯库就曾表示过这样的想法，即需要在国内实现“政治休战”，争取改善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看来，他对格罗查产生了影响，并争取到了这项毫无任何理由的法令的实施。据乔治乌-德治说，这项法令标志着政府的软弱和意味着试图讨好国家农民党人。

同时乔治乌-德治还告知说，特特勒斯库曾试图把参加访问莫斯科的代表团的惟一一位自由党人、财政部长亚历山德里尼召回罗马尼亚。

只是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特特勒斯库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接着，乔治乌-德治告诉我，2月3日特特勒斯库将前往巴黎签署和平条约。罗马尼亚共产党已决定派帕特拉什卡努作为自己的代表同他一道前往，也就是说，按乔治乌-德治的说法，是“向巴黎派出一位二号人物”。

乔治乌-德治把这些措施说成是“铁腕”措施，其中包括：关于没收国家某些地区多余粮食的强化运动（据他说，他们现在每天能筹集110~140车皮，但是仅仅饥荒地区每天就需要300车皮粮食）；禁止随意乘坐火车出行；禁止从一个县前往另一个县；对试图制造混乱的农民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例如，在费拉什卡县的一个乡村农民试图暴动，政府对这个村的居民就采取了“行政方面的严

厉措施”。

乔治乌－德治说，他急切地期待着同斯大林的会见。在其他问题中，他将把重新审定涉及停战协定第 12 条的价格问题提出来讨论。他试图向我证明，无论从法律的观点还是从政治的观点上看，罗马尼亚人都是有理的。在经过我的实际质询之后，乔治乌－德治和毛雷尔承认了他们的立场从法律观点上看是站不住脚的，并表示他们将请求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们以帮助——尽管他们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理由提出这种要求。他们说：“我们处境很困难，因此我们将请求帮助”。

乔治乌－德治同时还批评了苏罗股份公司某些领导人的所作所为。

他说：“这些同志希望的只是一件事，即宣布他们的计划已经完成并超额完成。但是他们并不考虑他们的做法是否正确，他们力求采用苏联的工作方法而不考虑罗马尼亚的现实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接受这些方法。”

我没有确切弄清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乔治乌－德治是希望以此来强调，他们指的只是问题的商业方面。

苏萨伊科夫

1947 年 1 月 30 日

№09312

斯大林关于罗共党内和国内局势问题与 乔治乌－德治和波克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2日)

秘密

谈话时在座的有：莫洛托夫同志，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卡夫塔拉泽同志，苏萨伊科夫上将，什科达（译员）少校。

斯大林同志首先祝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大选中取得的胜利，然后问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共产党正在按照党的路线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提拔在这次选举中表现突出的人，并准备取消州委员会，只留下直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县级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问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治局中是否有意见分歧，如果有的话，都是些什么分歧，其原因是什么。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其实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并没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曾经发生过一件涉及帕特拉什卡努的事情：他由于对自己未被选进中央书记处和受到尖锐的批评不满而想提出辞职并退出政府。后来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帕特拉什卡努在克卢日发表了针对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的讲话，也就是说，那次讲话充满了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气息。后来帕特拉什卡努解释说，他当时是打算以此

来把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吸引到格罗查政府方面来，认为这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罗马尼亚人在特兰西瓦尼亚是占多数的。乔治乌－德治说，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并迫使帕特拉什卡努放弃了这些不健康的思想。帕特拉什卡努表示服从，但是终究还是感到不满。

斯大林同志问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是否还有过其他的分歧，有一些传言甚至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内有一种潮流，希望党内只有罗马尼亚人，具体地说，也就是希望按民族说并非罗马尼亚族人的安娜·波克和卢加不能在党内占据领导岗位，这种传言是否符合事实。斯大林同志强调，如果有这种情况，党将从社会的、阶级的党变成种族的党。如果党能够保持其社会和阶级性质，则它将得到发展和巩固；而如果它具有了种族性质，则它将注定要灭亡。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党内不存在这样的潮流，的确有过某些带有这种情绪的讲话（维丹－克卢日），但这并不是党内的普遍现象。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很好。

斯大林同志问，联盟中的合作情况如何。

乔治乌－德治回答说，民主主义政党联盟中的合作仍在继续，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有一个试图在这个联盟中制造困难的右翼。自由党人也有这样的企图。

斯大林同志强调，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将面临一个为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和削弱参加联盟的其余政党地位而工作的任务。在共产党人的概念中同盟者就意味着是兄弟，而在资产阶级政党的概念中每一个今天的盟友都被看做是明天可能的敌人。因此，为了不输给对方和不因天真幼稚而受害，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必须开始这项工作。

乔治乌-德治说，这次选举已经显示了反动派的力量，他们特别是在农村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农民中间拥有很大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指出，需要特别注意去争取农民，需要考虑一下建立一个劳动农民的政党的问题，并以这个党与富农阶级相对抗。斯大林同志强调，马尼乌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们没有充分注意同富农的斗争，因为没有充分阐明这一斗争的意义，没有砸开农村这块铁板。因此，农民们看不到存在于罗马尼亚的各农民政党之间的区别。只有当每个村庄的贫苦农民和中农起来反对富农的时候，农民们才会明白谁是他们的敌人和为什么需要这场反对富农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举波兰为例做了比较，在那里米科瓦伊奇克的党正在成为富农的党，因为劳动分子正在从该党退出。

波克说，成立劳动农民的政党将会导致同格罗查的冲突。

乔治乌-德治强调，曾经有过这样的计划，即一开始集中全力打击马尼乌以粉碎该党，然后再致力于同特特勒斯库及其他参加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的政党的斗争。乔治乌-德治说，需要把富农分子从“农民阵线”党中清除出去并把贫农吸收进去。

斯大林同志指出，为此需要预先取得“农民阵线”领导人，首先是格罗查的同意。

波克断言，格罗查、查罗尼、米科洛·贝拉和“农民阵线”的其他领导人肯定不会这样做。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更勇敢地转向同富农阶级的斗争，这只会巩固和加强共产党人在农村中的地位。

波克指出，罗马尼亚共产党现在拥有农民出身的党员20万人。

斯大林同志问，他们缴纳党费，但他们是否明白加入共产党成为其一员意味着什么。

波克回答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缴纳党费，在他们当中的解释工作一直进行得很不得力。

在转入经济性问题时乔治乌－德治说，罗马尼亚共产党为国家的经济状况承担了责任，从而向前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非常勇敢的一步，就是他个人也不会下决心去干这件事。

乔治乌－德治说，反正共产党人也要对国家的经济负责，因为他们在议会和政府中占有多数。

斯大林同志问，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是否认为格罗查也是共产主义者。

波克做了否定的回答。

苏萨伊科夫说，格罗查随时准备入党。

斯大林同志说，那时他将会希望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袖。

波克强调说：格罗查是有这样的想法，格罗查甚至还幻想成为所有巴尔干国家的领袖，并把自己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

斯大林同志问，有关经济援助方面的要求都有哪些。对此乔治乌－德治列举出如下一些问题：

- 1) 以贷款形式向罗马尼亚提供 8200 万美元的货物和机械；
- 2) 重新审定按第 12 条所定的价格问题（4 月 1 日以前的或者 4 月 1 日以后的）；
- 3) 从停战协议第 11 条规定的数额中扣除按第 10 条已用掉的数额；
- 4) 向罗马尼亚共产党提供资金援助。

乔治乌－德治说，他提出关于第 12 条的问题不是基于法律方面的理由，而是作为请求。

莫洛托夫驳斥了乔治乌－德治的这一说法。他援引了乔治乌－德治交给维辛斯基的两份文件，从该文件中很明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罗马尼亚政府认为自己有理由对苏联政府依照第 12 条所做出的决定提出异议，并且指责苏联政府不正当地向罗马尼亚政府

收取战争赔款方面和返还战时被掠财物方面的钱款。^①

莫洛托夫批评了罗马尼亚政府在占领军开支，即用于供养驻罗马尼亚苏军的开支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从法律的观点来说，苏联与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状态只有在和平条约由三个大国批准的那个时候才算结束。在此之后，苏联将自己负责为保护通往奥地利的交通线而仍将驻留罗马尼亚的苏军的费用。而罗马尼亚人则试图证明他们仅仅在军事行动停止之前有义务供养苏联军队。因此他们要求将按第10条规定的开支全都列入第11条，并说出了1.6亿这个数目。

乔治乌-德治说，他认为这份文件是非正式的，他只是“随便”把它送交给维辛斯基看看，他将收回这个文件。

莫洛托夫向乔治乌-德治指出，既然文件已经提交，因此也就不能排除外部世界均已知晓的可能性，对这个文件必须做出回答。

斯大林同志同意首先需要做出回答，然后再提出关于削减第12条规定的3亿列伊的问题。

波克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说，美国人已经同意向罗马尼亚转让4.5万车皮的小麦和玉米，条件是罗马尼亚政府必须公开宣布它购买这批粮食仅仅供罗马尼亚居民食用，并保证用黄金支付粮款，同时还必须发表一项关于德国黄金问题的声明。

乔治乌-德治和波克请求斯大林同志给出个主意。

斯大林同志说，应当接受美国人的要求，因为人民需要粮食。他强调，当有可能的时候，苏联把粮食供给了罗马尼亚人，但拒绝收取特特勒斯库向苏联提议支付的黄金。而如今苏联则由于今年的

^① 乔治乌-德治交给维辛斯基的报告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重新研究减轻罗马尼亚的赔偿义务，即罗马尼亚以货物偿还在战争时期给苏联造成的损失。二是重新计算罗马尼亚政府在1945年7月到1947年1月为驻罗苏军支付的开销数额。

收成不好而不能向罗马尼亚提供粮食。

斯大林同志同意派专家、金融学家和经济学家去帮助乔治乌—德治，并建议准备通过发行新币替换旧币的办法进行金融改革。他建议在秋收之后再采取这一措施。

斯大林同志强调，这项措施具有重大意义，它将给资本家和财团以打击，但却将巩固列伊的地位和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得到稳固的工资。不断贬值的货币导致工人阶级越来越穷，以及国家的经济崩溃，这将有损于民主主义政党联盟，特别是共产党，但却有利于罗马尼亚的资本家们。

记录 什科达少校

1947年2月2日21时于莫斯科

本记录业经 C. 卡夫塔拉泽审阅和修正。

№09313

什科达关于乔治乌－德治谈及与 斯大林会谈的印象的报告

(1947年2月4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卡夫塔拉泽。

秘密

1947年2月4日我陪同乔治乌－德治前往苏联外交部，他需要在那里同布加勒斯特通高频电话。

途中，乔治乌－德治开始向我讲述了他对同斯大林谈话的印象。

乔治乌－德治认为，整个谈话没有连贯性。他把过错归咎于自己，他说他每当面对斯大林的时候，总是感到自己不知所措，像“失魂落魄似的”。

乔治乌－德治说，把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民族主义潮流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使他感到很不安。乔治乌－德治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把这方面的事告诉斯大林同志的。他甚至问我是否知道是谁干了此事。我做了否定的回答。

乔治乌－德治表明自己的想法说，在国内是存在着反犹太人的潮流，不可以对之掉以轻心。他接着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在国内实行民族主义政策。

莫洛托夫对乔治乌－德治的信件所做的阐释，以及斯大林同志说的“匈牙利人和奥地利人可不会给我们写来这玩意儿”一番话，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个问题乔治乌-德治对我说，他不仅仅是犯了一个错误，而且是干了一件蠢事，因为他把自己置于了尴尬的境地并且“激怒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的人”。接着，乔治乌-德治强调说，他没有想到这些信件会被如此重视，他只是“随便地作为情况通报”送出这些文件的，没有料到这些报告性质的信件能够变成半官方文件。

乔治乌-德治最后说，他非常担心在和约签署并得到批准之后在国内将出现的局势。据他说，已经有材料说，马尼乌分子在国内正在抬头，不排除在和约被批准之后国王同马尼乌分子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甚至可能会要求政府辞职。

乔治乌-德治说，他将争取在离开此地返回罗马尼亚之前向苏联领导人当中的一位说出这些想法。

少校 什科达^①

1947年2月4日于莫斯科

^① 什科达是斯大林与乔治乌-德治会谈时的苏方译员。

№09316

斯大林关于罗马尼亚经济政策问题与 乔治乌－德治的谈话纪要

(1947年2月10日)

秘密

谈话时在座的有：莫洛托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苏萨伊科夫同志，什科达同志（译员）。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已交换了在上一次谈话中谈到的信件。^①

格·乔治乌－德治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向乔治乌－德治询问罗马尼亚国家经济部的组织结构和职权。

格·乔治乌－德治说，在罗马尼亚，国家经济部统管所有的工业、国内贸易以及对外贸易。国家经济部所采取的一切重大措施均由罗马尼亚最高经济委员会批准，隶属该委员会的是所有负责经济方面事务的各部，也就是国家经济部、财政部、采矿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等。得到最高经济委员会认可的各种方案和计划再提交部长会议讨论。最高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是乔治乌－德治。

斯大林同志指出，乔治乌－德治一方面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同时又是国家经济部的部长，是“自己领导自己”。

格·乔治乌－德治说，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提请政府审议批准关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9312、№9313文件。

于改组国家经济部的法案和关于按部门组建工业管理局的法案。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管理局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它们是否将拥有定价的权力。

格·乔治乌－德治回答说，每一个管理局都将负责处理所有涉及相应工业部门的问题。各管理局提出的建议将提交给部长。格·乔治乌－德治说，在罗马尼亚的纺织工业系统中就有这样的管理局，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样的管理机构有助于政府对私营企业实行监督。

斯大林同志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人承担了罗马尼亚经济中责任最重而且又是最困难的岗位。在他们看来，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得了这些岗位，而实际上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是有意识地把这些部推给了他们，因为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知道存在的困难，并希望以此来败坏共产党人的名声。罗马尼亚共产党人觉得他们是在领导着这些部，而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因为当你根本没有生产原料、设备和零配件，当你不能自己确定市场价格的时候，你就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领导。当前，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快地和尽可能有准备地实行金融改革，以便使国家拥有坚挺的、稳定的通货。做不到这一点，一切都将是徒劳无益的。

格·乔治乌－德治回答说，采取这项最为重要的措施的准备正在进行中。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德治应当开诚布公、老老实实地讲话。在罗马尼亚实际上还没有开始此事的准备工作，而德治却在说与实情相反的话。

格·乔治乌－德治请求苏联派出经济专家给予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应派这样的专家去给予协助，但他强调说，这些人一开始需要很好地深入了解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熟悉所有的实际资料。

格·乔治乌-德治对此表示感谢。接着又说，金融改革计划在今年的农作物收获季节之前实施，匈牙利人已经同意（帮助）印制相应数量的新纸币用以替换旧币。

米高扬同志说，货币改革的实施应当尽快而不是过5~6个月之后。

在谈到罗马尼亚经济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直接贸易谈判，以及罗马尼亚政府关于帮助改善国内困难的经济形势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再次帮助罗马尼亚并实行如下减免：

1) 苏联政府把罗马尼亚政府按照停战协定第12条应当偿付的3000亿列伊减少到1000亿列伊。

2) 尽管已有与罗马尼亚人签署的协议，但苏联政府还是承担在苏联领土上转运归还给苏联的苏联财产所需的费用。

罗马尼亚人只需将归还的苏联财产运到苏联边境和港口即可。在罗马尼亚领土上和罗马尼亚港口转运这些财产的一切费用将由罗马尼亚人支付。在苏联领土和苏联港口转运这些财产所需的一切费用将由苏联支付。

3) 苏联政府将依照贸易协定向罗马尼亚提供数额为1000万美元的贷款（用货物）。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将再向罗马尼亚提供其所要求的总值为1500万美元的货物，作为交换，苏联政府将从罗马尼亚得到总值同样为1500万美元的货物。

格·乔治乌-德治对此表示感谢并强调说，如果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得到苏联的相信和援助，则他们定能完成摆在自己国家面前的经济任务。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整顿秩序和走上正轨，则任何来自外部的援助都帮不了他们的

忙。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阶级被放任自流，使其养成了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习惯。因为不能养活他们，使其得以维持生计，所以也无法强令其干活，而从农民那里又不征税。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管理好国家而只能使国家崩溃。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减少工厂中的工人数量，立即向农民征税，减少职员的数量。在实行金融改革之后应当减少工资，采取果断措施对付投机商人。应当把所有这些措施呈报政府，而如果政府在实施这些措施的时候加以阻挠，则德治就应当准备辞职并将这一点告知政府。

在话题转入有关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状况的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德治没有全部地、诚心实意地向他介绍罗马尼亚共产党内部民族主义倾向的情况。要知道，德治自己就曾经向维辛斯基提出过需要把波克派往巴黎的问题。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态度。需要珍惜并举荐好的干部，而不去看他们是罗马尼亚族人还是犹太族人或者是匈牙利族人。在俄罗斯同样曾经有过势力强大的反犹太人运动，比在罗马尼亚国内的还要强大。屠杀、劫掠和蹂躏犹太人的浪潮曾遍及整个俄罗斯。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被解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犹太血统，而是因为他们破坏苏维埃政权并为反对这个政府而进行斗争。布尔什维克也解除了一些俄罗斯人的职务：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是个好人，那么即使是在某个时期存在着反对某一民族的潮流，也要给他出路。曾经有人在犹太人问题上大肆攻击布尔什维克。他们说，甚至连伊里奇也是犹太人。但是他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顶住了这些攻击并批驳了它们。罗马尼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罗马尼亚有许多犹太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人怎么能够试图仅仅由罗

马尼亚族人来组建自己的党呢？他们应当记住：如果他们的党将成为一个阶级性的、社会性的党，那么它就将会发展壮大；而如果这个党将是一个种族性政党，则它定将灭亡，因为种族主义将导致法西斯主义。

乔治乌-德治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他说，早在1946年维辛斯基就曾建议他把安娜·波克派出国，而现在他则向维辛斯基提出了这一想法。

格·乔治乌-德治指出，就提出让波克当议员和任命她为议会党团领袖的问题，他曾同苏萨伊科夫进行过交谈，苏萨伊科夫当时就已经向他指出了其观点的错误。但是他（德治）没有理会这些忠告，以为这样从策略的观点来看也是比较恰当的。

斯大林同志说，从策略的观点来看，这样做也是不正确的。

格·乔治乌-德治答应要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斯大林同志问，波克和卢加工作得如何。

苏萨伊科夫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应力求掌握政权，并提醒注意中央委员波德纳拉希的放荡不羁的性格。指出，对此人必须盯紧，不能任凭他为所欲为。

格·乔治乌-德治请求就农业合作社问题给予指教。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个事情需要暂缓到金融改革实施之后再去做。

在谈话中还提到了向美国订购粮食的问题。就此问题双方决定：由德治起草一份答复，然后交给莫洛托夫同志审阅一下，他将帮助确定这一答复的最后措辞。

谈话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译员 什科达

1947年2月10日19时20分于莫斯科

№09317

马尼乌等人关于罗政府迫害 反对党问题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7年3月13日）

秘密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先生阁下^①

尽管人们一再请求罗马尼亚政府遵守波茨坦和雅尔塔决议及莫斯科协定，恢复公民的自由、人权并保障财产和人身安全，但新的恐怖和迫害行动的恶浪仍一直在罗马尼亚肆虐。国家农民党、国家自由党和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等民主主义政党充分认识到由于目前执政政府的无所作为而导致的饥荒和经济崩溃后果所造成的严重局面，采取了十分忍耐克制的立场，就在前几天，内务部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了这一点。他们自觉自愿地避免去激怒对1946年11月19日的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和无耻的弄虚作假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社会舆论。他们之所以严守忍耐克制的立场，是因为饥荒地区的悲惨情势和不忍心通过新的行动再进一步增加已有的困难，爱国之心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

在没有任何实际理由，甚至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况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逮捕上述三个民主主义反对党重要成员的行动已经

^① 该信最初是交给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卡夫塔拉泽的。1947年3月14日23时，该信的译文高频电话由使馆参赞雅科夫列夫转达给莫斯科的维辛斯基，并说明是转寄给参加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莫洛托夫的。

持续了整整一周。被捕者的人数每天、每小时都在不断增加。三个党在所有各县的党组织负责人，各党的副主席和总书记，其中包括国家农民党的副书记兼该党工人分部主席，以及工人、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纷纷在自己的家里被捕，他们被塞进汽车拉走并关进监狱或者不久前为此目的而专门设立的集中营。

不言而喻，不会给他们任何在法庭面前露面并驳斥对他们自己都并不知晓的指控，以及进行自我辩护的可能性。

政府为对付这些民主主义的反对党而采取这些非法的和专断的措施，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当局现有的、但却是非代表制的和专制的社会制度，而且也是为了我们目前尚无法断定的某些目的。

国家农民党、国家自由党及独立民主党请求阁下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措施来结束目前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状况，这种状况在罗马尼亚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制度下都没有出现过，而且公然违背了波茨坦、雅尔塔和莫斯科协定以及不久前签署的和平条约的精神。

国家农民党主席 马尼乌

国家自由党主席 布莱蒂亚努

独立的社会民主党主席 K. 蒂特尔-彼得列斯库

1947年3月13日于布加勒斯特^①

^① 1947年3月17日，苏联外交部研究和审议了这封信。巴尔干国家司副司长弗拉索夫建议“对这封信不做答复”。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支持这个建议。

No 09331

苏萨伊科夫关于退役及现役军官的 抵抗运动给维辛斯基的报告

（1947年5月13日）

绝密

根据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情报材料可以看出，在1946年年中开始的从军队中清洗反动分子及强令一些军官和士官退出现役的工作确实从一开始就使人看到了大多数军官对政府的这一措施的否定态度并测定出了这些人在对待现行制度的态度方面的观点。

大部分军官和士官在被命令退出现役之后马上就试图结成团伙并要求执行关于退役军官安置的法案。

这样一来，在此前已被列入预备并以其反动性称著的军官的队伍中又增加了一大批对自己从军队中退出现役感到不满的校官和尉官。

退出现役的军官们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互相联合起来，组成各种名称的组织和集团。到处鼓吹必须推翻似乎是完全处于俄国人影响之下的现有民主政权的思想。

反动的“历史”党决定利用军官中间的这一潮流为自己服务，并为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以使用这些人建立自己的后备力量，为此而在这些人中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在进行这种工作时国家农民党人提出建立新政府和新的纯民族的军队，并许诺让被“无理”赶出军队的军官们担任领导职务。

这些“历史”政党的宣传已见成效，许多军官加入了马尼乌的国家农民党，该党专门为军官们建立了附属的“军事专业小组”、“军事青年组织”，而在外地，则在每一个该党的组织中设立了军事分部。

国家农民党的领导人专门为被命令退出现役的军事人员建立这些组织的目的是：

- 1) 在党内建立一支能够在适当时候负责领导发起反对现政权暴动的民众力量。
- 2) 为在推翻现政府之后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准备干部。
- 3) 历史党夺取政权之后将实施新的军事法案和条令、条例。
- 4) 主要是利用当前出现的各种困难在基干军官中及在军队士兵中进行反政府的破坏性宣传活动。

在1946年11月的竞选运动和选举期间看得尤为明显，几乎所有被令退出现役的军官都转向了反对派政党的阵营，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国家农民党在各选区选举委员会中的助手。目前已知存在的有4个较大的退役军官组织：

1. “退伍军人协会”——这个协会自组建之日起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维护被令退出军队的军官们的利益。

领导该协会的机构是由所有各军兵种的军官中推选出来的以恰乌舒·杜米特鲁将军为首的一个军官委员会。

该协会的真正目的是推翻现行制度。

该协会的分支机构遍布于所有大城市。恰乌舒本人坐镇克卢日。

2. “退役军人党”——该党同军队中的基干军官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成员的数量最多。

3. 海军少将罗曼的集团，该集团全部由被令退役的海军军官所组成。

在罗马尼亚现有的帆艇俱乐部的帮助下，该集团的成员同一些思想反动或形迹可疑的人保持着联系。此外，所有该集团的军官都同英国和美国使团的军官有联系。

4. “阿尔佳将军的集团”（阿尔佳现已被判刑）——这个集团带有特殊的性质，曾经同民族抵抗运动有直接联系，有着极广泛的秘密活动，该集团进行着强有力的反苏和反政府宣传，这种宣传也深入到了军队。

除了这些大的集团以外，还曾存在过而且现在仍然继续存在着一些地方上的小集团。在阿拉德曾存在过一个现已被捕的索列斯库上校的集团。该集团的领导者曾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支完整的部队发起反政府的行动，并曾为此目的而生产武器和弹药储备。

在卡拉法特市也曾建立一个名为“弗拉德·采佩什”的组织，其招募工作是由从前曾在第31步兵团及其他一些组织中效力的波涅斯库·格里戈雷少校负责进行的。

被令退役的军官利用“历史”党的合法组织来掩盖自己的反政府及为外国情报机关效力的活动。

国家安全机关清楚地知道，这些心怀不满的军官们的这些组织的存在对于国家和现行制度具有何等危险性，因而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以查清这些组织及其活动，但目前尚未取得足够的成果。

苏萨伊科夫

1947年5月13日于布加勒斯特

No 09335

苏萨伊科夫关于罗党内矛盾 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7年6月10日)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米·安·苏斯洛夫同志^①

随本书面报告附上的文件我们是非正式获得的。文件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埃·波德纳拉希所写就。

其中有关乔治乌—德治的情绪和行为的一系列内容皆有所渲染，因此作者的结论并不完全反映实际情况。

这涉及的主要是作者的如下一些断言：乔治乌—德治疏远苏联代表；乔治乌—德治认为造成困难的经济形势的主要原因是苏军在罗马尼亚的留驻及停战协议条件的履行；在乔治乌—德治看来，苏联没有能力满足罗马尼亚的经济需求，因此他开始转向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其他等等。

在该文件中对乔治乌—德治和毛雷尔不做特别的区分。许多涉及毛雷尔的事都归咎于乔治乌—德治。这并不完全正确。

但是，尽管有许多不够确切之处，这份文件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出自一位中央委员之手，并且看来其中所述的内容也

^① 1947年6月14日，苏萨伊科夫的报告及附件由苏斯洛夫转呈“七人小组”——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

并非作者个人的意见。这表明：在罗共中央委员会内部存在着对乔治乌－德治奉行的路线及其所作所为的某种不同意见，如果这种分歧继续加深，将有可能导致反对派的形成，因为现在就已经存在着乔治乌－德治的支持者和反对他的路线的人。

那么该文件完全正确地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乔治乌－德治有些脱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乔治乌－德治有时甚至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都认为不需要同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书记们商量。

在我同乔治乌－德治见面的时候，我曾谨慎地向他暗示了他在对待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书记们的态度方面做法的错误，但他似乎有些生气地回答说：“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为什么我必须就每一个问题都同他们商量并请求他们的批准”。

以下的事实也使我确信，乔治乌－德治对许多事情还缺乏理解：

当在政治局会议上出现意见分歧从而使乔治乌－德治的建议得不到通过时，他就为此而生气，并在一段时间内不同中央政治局成员及中央书记们见面。

不久前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意见，认为应该让乔治乌－德治在部长会议中担任副主席而不再担任贸易和工业部长，以便他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党的工作上。乔治乌－德治听了之后表现得极其缺乏自制力，事后在会晤波德纳拉希时竟然说，“如果他离开贸易和工业部，他就只去工厂，去开车床”。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放松对此事的关注，乔治乌－德治有可能会引起其余政治局委员们对他的反感，因为他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经济问题方面，重视的只是自己周围的人和自己部里的人。

有一切理由认为，给予乔治乌－德治以不好影响的是毛雷尔，因此安娜、特奥哈里·召尔杰斯库和卢加关于任命毛雷尔担任外交工作，以便把他同乔治乌－德治分开的意见也许是有根据的。

附件：共5页。

И. 苏萨伊科夫

1947年6月10日于布加勒斯特

附 件

绝密

对最近一个时期得到的材料所做分析表明：乔治乌－德治的不健康情绪是如此之重，以致如果不采取相应措施，这种情绪将可能会转变成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系列的事实表明，随着罗马尼亚同英、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日益巩固和加强，乔治乌－德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在罗马尼亚的苏联代表，很少与他们会面，而对某些苏联代表则干脆不予理睬。

作为经济部长的乔治乌－德治亚本人以及他的人（毛雷尔、加斯顿和采格尔）在为得到罗马尼亚所必需的谷物而访问莫斯科返国之后，已于今年1月开始与驻各地的英、美代表进行谈判，随后这些谈判即变成了带有私人性质的会晤、接待、宴请等等。

乔治乌－德治把这些谈判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不同共产党的其余领导人就这些问题进行商量，而这样一来，他就在同以特殊的关注和殷勤对待他本人包括他的心腹的英、美代表的关系方面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而且，乔治乌－德治的人还同英国和美国的代表们建立了带有亲昵色彩的私人关系。

还曾发生过一些此类宴会以喝得酩酊大醉而告终的情况，例如，以在这方面不能自制称著的毛雷尔就曾数次醉得不成体统，然后就与人接吻和粗野地破口大骂。

所有这一切在整体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乔治乌-德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一个由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关照和殷勤，特别是由于在获取人家的经济援助问题上对人家的依赖而欠了他们某种人情债的人，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力图以此来给罗马尼亚的代表们造成他们准备在各方面帮助罗马尼亚的印象。

另一方面，经济部和外交部的各类“经济专家”也对乔治乌-德治一班人有很大影响，他们竭力想把自己在罗马尼亚同苏联及其他盟友的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强加给乔治乌-德治。

这种敌视苏联的观点的为首者是毛雷尔，此人政治上动摇不定，出身于资产阶级阶层（律师），对苏联的态度也不够忠诚——虽然他同时也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负责代表之一。

乔治乌-德治及其一班人在罗马尼亚同苏联及其他盟友的经济关系问题上经常听信这些专家的主意，在这方面特别危险的人物是毛雷尔，因为他最受乔治乌-德治的信任并且对乔治乌-德治的影响很大。

可以证实上述情况的有以下众所周知的具体事实：

1. 乔治乌-德治，特别是毛雷尔认为，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驻扎和罗马尼亚必须按照军事停战协定及和平条约规定的条款履行对苏联的义务，是造成罗马尼亚经济困难局势的主要原因，他们由此而力图减少这些义务或者加速苏军的撤离。

在这方面，特别是毛雷尔，与力图把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及在国家经济恢复工作中的破坏活动的责任都推到苏联身上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乔治乌-德治今年年初在罗马尼亚同苏联的经济谈判中，在莫

斯科向苏联政府提出的那些交涉，也应当用这一点来解释，当时乔治乌-德治在一些与这种立场有利害关系的人（特特勒斯库、克里斯图等）的提示下完全采取了与苏联利益相抵触的立场。

2. 乔治乌-德治和毛雷尔对待苏罗委员会的组建与活动问题一直持否定的态度。在其他中央委员和苏联代表做出相应的指示之后，乔治乌-德治表面上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毛雷尔仍然坚持其原来的立场。他们认为苏罗委员会是纯资本主义的机构，走了一批主人（德国人）又来了一批主人（苏联）取而代之。他们甚至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抵制苏罗委员会的建立，后来他们又曾试图把苏罗委员会置于由工业和贸易部控制和领导的新组建的“专门委员会”的监督之下。

3. 乔治乌-德治认为，在各地的某些苏联代表有一种意图：“显示自己的成绩——完成并‘超额完成’任务，因此这些苏联代表们在中央下达的指令及所提出的要求之外，力求从罗马尼亚弄走尽可能多的东西而不考虑其实际可能性”。乔治乌-德治已开始把这种指令从人们那里转变成具体事务性问题，从而在客观上有损苏联的利益。

4. 乔治乌-德治和毛雷尔认为，由于战争的后果，苏联不仅无力完全满足罗马尼亚在经济方面的需求，而且甚至连它对罗马尼亚已承担的义务（原料和工业品）也将难以履行。在这方面他们经常重复外交部经济司司长、著名的反动分子克里斯图的诬蔑性论点，此人参加了同苏联谈判的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之后即开始散布此类言论。

鉴于这种情况，乔治乌-德治，特别是毛雷尔认为，必须寻求发展同英、美两国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关系中并没有明确划定界限，而且还随波逐流，这一点则可能导致这样的想法，即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在英、美两国的帮

助下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毫无疑问，是局势在推动着乔治乌-德治，因为共产党人已经把国家的经济接手管起来，这个问题现在是个关系到乔治乌-德治个人及整个党的威望和政治成败的问题。

5. 在报刊上公布了斯大林同志的谈话内容之后，乔治乌-德治开始向中央委员们（波克，波德纳拉希）证明说，“连斯大林同志都赞成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合作”，试图以此说明自己在对待英、美两国方面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尽管某些中央委员曾经对之持有异议。这些委员们既向乔治乌-德治指出了过于加深这种关系所具有的政治危险性，也向他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乔治乌-德治本人在其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方面走得过远了。例如，中央委员会曾经建议乔治乌-德治不要出席加斯顿（经乔治乌-德治同意）为参加经济谈判后返回美国的美国驻罗马尼亚代表机构秘书举行的宴会。虽然中央委员会指出，一个经济部长兼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不应当对一个像赫利克这样低级的美国代表给予这样的重视，但是乔治乌-德治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不正确的。同样使中央委员会困惑不解的是：在群众大会开始前二小时的时候，乔治乌-德治拒绝前往出席，而去参加贝里的午宴了。这次群众集会的举行是事先早就同乔治乌-德治商量好了的，他本应在“格里维察”铁路枢纽站 8000 名工人的集会上发表讲话，但是他最终还是沒有到会。

6. 格罗查在 5 月 9 日胜利日的讲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斗争以反对用帝国主义的统治来取代法西斯主义的企图”，而乔治乌-德治对此表示反对。在编辑清样上改成了：“用其他统治来取代”。乔治乌-德治还指示说，不应当“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我们现在需要他们，不应当惹怒他们，对人家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是不好的”。

7. 在 5 月 7 日霍尔曼举行的宴会上，霍尔曼在同乔治乌-德

治交谈时称赞他是“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国际主义的”。在这里霍尔曼放肆无礼地试图把乔治乌-德治推上使罗马尼亚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相对立的道路。

乔治乌-德治对霍尔曼的类似行动未做任何反驳，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乔治乌-德治默认了霍尔曼的看法。

霍尔曼关于乔治乌-德治的“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一番话给乔治乌-德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番话同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接见他时谈到共产党应当是“阶级性的而不是种族性的”时所发表的意见做了对比。

乔治乌-德治认为，驻各地的苏联代表中的某个人为了挑拨离间和败坏他的名声而把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告诉了英国人。

可以认为，英国人确实是得知了这个情况并且霍尔曼说的那番话也并非偶然，但是这事是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层的一班人传出去的，因为不论是乔治乌-德治，还是其他领导人都曾把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讲述给许多人听，知道此事的也有在酒醉状态下最善于多嘴多舌的毛雷尔。

乔治乌-德治已把他同霍尔曼的谈话写成纪要，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本人不愿意去见卡夫塔拉泽和苏萨伊科夫，而只是将其转送给他们并要求听取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其中包括对霍尔曼的消息来源的看法。

8. 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断定，乔治乌-德治由于把经济工作抓在了自己手中而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因而正在急急忙忙地寻找出路，以免于垮台和使党及自己丧失威信。他由于盲目地追求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方向，在对待英、美两国的态度方面也丧失了警惕性。而英国和美国也明白乔治乌-德治的处境和整个罗马尼亚经济状况，并得以通过给予的关注和提供广泛经济援助的许诺，给乔治乌-德治造成一种在他们的帮助下他将能

够摆脱困境的幻觉。

应当把上边提到的诸多事实看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因为当前存在着的一方面是乔治乌 - 德治在一定程度上偏离正确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是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向英、美两国的危险的倾斜，这种情况要求毫不迟疑地采取根本性的措施。

№09337

诺罗夫科夫关于同乔治乌－德治 会面情况给巴拉诺夫的报告

(1947年6月13日)

绝密

呈巴拉诺夫同志

今年6月10日，在抵达布加勒斯特30分钟之后，我把公文袋交给了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卡夫塔拉泽同志。乔治乌－德治当时正在贝尔格莱德。

6月11日上午乔治乌－德治来到大使馆，并看了我带来的文件^①。此时我不在场。

当天，在乔治乌－德治读完该文件1个小时之后，我同他交谈了1小时45分钟。据我的观察，他当时好像因某个事情感到不安，并两次重看已经当着卡夫塔拉泽的面读完了的那份文件。

第一次，他脱离了我们正在交谈的话题说：“我们不应当让自己做出在法国人那里发生的事情”。随后，当我们谈到党内的情况时，他再一次重看了一眼那份文件，似乎想起了什么说：“党正在巩固和加强，在我们这里将不会发生已发生在别人那里的事情。”

由于我曾接到指示不要同他谈这个问题，故我一概未参加讨论。

^① 指联共（布）中央给法共中央的信，参见本档案选编第24卷“苏南冲突及其结果”专题№09333文件。

乔治乌-德治对看过的那份文件的书面意见我将于今年6月13日呈送给您。

诺罗夫科夫^①

1947年6月13日于莫斯科

^① 诺罗夫科夫，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官员。

No09340

雅科夫列夫关于罗共经济纲领等问题与 加涅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6月25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送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绝密

今年6月25日我拜访了加涅夫^①，目的是就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情况问题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材料，因为他同他们（乔治乌—德治、波克等人）保持着早在一起蹲罗马尼亚监狱时就已经建立起来的经常不断的个人关系。

关于这次会晤，我同加涅夫是在以前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商定的。

在同加涅夫的交谈过程中我向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所做的回答可归结如下：

1. 关于特特勒斯库的备忘录^②

加涅夫指出，这个备忘录完全是针对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更确切地说，是针对共产党开始在经济领域采取措施的尝试的。经济领域目前完全掌握在自由党人手中。据加涅夫认为，迄今为止，他们

① 加涅夫，保加利亚驻罗马尼亚公使。

② 1947年5月特特勒斯库作了书面报告，批评了格罗查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要求重新研究这些政策。备忘录还被寄送给加入了保加利亚民主党的各党派的领导人，以及美国、英国和法国驻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官方代表。

通过做出某些无关紧要的让步，或者在实际上破坏某些根本性变革的实施，得以维护了自己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

加涅夫指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执政的过去两年里，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的基本地位几乎未受到触动，特特勒斯库的自由党人通过参加政府的工作而成功地阻止了在经济领域采取任何措施。鉴于这一点，只要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撑点不被动摇，就谈不上经济形势的改善。

加涅夫还指出，特特勒斯库的备忘录是一个蛊惑人心的文件，因为在这份文件里他提出了某些比乔治乌—德治在部长会议上提出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建议还要激进的建议。特特勒斯库这样做是蓄意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民主作风”，因为他事先就知道他的备忘录将不会被付诸实施，因而他并不冒任何风险。

加涅夫认为，特特勒斯库的备忘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按照同国王商定的协议起草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国王势力的干预准备相应的客观环境。加涅夫认为，国王迟早将会利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要求政府辞职，而在这种情况下，特特勒斯库的备忘录将起到一份证明在政府内部有人并不同意政府政策的文件的作用。

现在这份备忘录正在国内和国外广为传播，而且看来是特特勒斯库本人在做这件事。

在谈到特特勒斯库集团内部的情况，更确切地说是谈到贝让的活动时，加涅夫推测说，贝让是在特特勒斯库知情并同他商定的情况下行事的。不能把贝让的活动看成是对特特勒斯库持反对态度的活动——很可能贝让是个后备人物，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将在他的帮助下继续参加执政。特特勒斯库通过自己的这份备忘录做出了一个相应的姿态：他可能会带领一小部分自由党人退出政府，但贝让及其集团将取代他的位置。

2.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经济纲领

加涅夫在评价乔治乌-德治今年6月末向部长会议提出并被部长会议通过的经济纲领时指出了如下各点：

1) 纲领没有触动资产阶级的基本地位，没有超出罗马尼亚共产党从前的策略的框框——不触动同资产阶级关系方面的根本问题；

2) 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轻易地就同意了接受这一纲领，特别是自由党人（亚历山德里尼和温图）故意引人注目地在部长会议上当众宣布了这一点，这一事实说明这个纲领是令资产阶级满意的。因此，这一纲领被通过并不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成功或胜利，而很可能是恰恰相反的结果。看来，资产阶级是打算通过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做些让步来阻止和破坏在经济领域中的原则性措施的实行；

3) 乔治乌-德治提出的纲领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对着手解决主要问题没有信心、畏缩和胆怯的表现，它反映出犹豫不决和缺乏明确的前景和对未来的计划；

4) 纲领中提出的某些措施不仅不会使事情有所改善，而且相反，还会使之更加糟糕。例如关于精简国家机关问题就是一例。对此事只是机械地规定：精简30%。这也就是说，大多数工作人员将会想到，他们有可能遭到裁减。其实，本来可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利用这次精简来把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和思想上不坚定的人（反动分子、法西斯分子、投机分子等）清洗出国家机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绝大多数本来是会对自己的前途抱有信心并且也不会把机关的精简看成是政府对付其工作人员的一场运动了。

3. 对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活动及该党领导班子内部状况的看法

谈到这个问题时加涅夫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罗马尼亚共产党

在占领国内经济阵地方面做事甚少，并且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可能性。

加涅夫指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善于实际解决问题，不善于吸引群众来实现所打算要实现的措施，并由此而产生了言行脱节的现象。例如，5月1日人民曾经应召举行示威游行，口号是同投机倒把进行斗争，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任何反对投机倒把分子的实际措施也没有采取，相反，投机倒把活动在自由党分子的庇护下有增无减，而广大群众的经济状况却在每况愈下。

乔治乌-德治自己的错误在于他指望借助于来自外部的，首先是来自英、美两国的援助以改善经济局面，而不是在国内去寻找这种可能性。在这方面，乔治乌-德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毛雷尔的影响，此人身边也有一帮贸易和工业部里的反动专家，有时还成为这些人思想上的领路人。

乔治乌-德治对加涅夫本人说过，他看不出罗马尼亚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得到经济援助会有什么特别的危险。按照乔治乌-德治的意见，罗马尼亚只要善于利用英、美两国资产阶级的资本，它将由此得到好处。

加涅夫说，就为改善罗马尼亚经济形势而必须采取的经济措施问题，他曾经同乔治乌-德治谈过话，但是正如从乔治乌-德治以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名义向部长会议提出的建议中看到的那样，加涅夫的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并没有得到反映。

在分析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的状况时加涅夫指出了如下几点：

1)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班子中缺乏工作的协调一致，个别领导人有事不同别人商量，擅自做出决定并加以实行，由此而存在着某些领导人各自为政的危险；

2) 一般来说对需要提交讨论，其中也包括需要提交政治局讨

论的问题，都缺乏认真的准备，因此决议总是过分匆忙地做出并且有时是不正确的；

3) 由于这一点，在领导班子中，特别是在乔治乌-德治和安娜·波克之间，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常常存在不同的观点。毫无疑问，安娜·波克的观点在政治上要更正确一些，因为乔治乌-德治，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一直在受毛雷尔的不良影响。

总的来说，加涅夫在分析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状况时并没有对我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是：上面指出的那些不正常现象仅仅是由于个人之间的缺乏协调一致而造成的，还是有其深层次的其他原因。得到的印象是，加涅夫不愿意谈论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问题，因此我也就没有坚持追问下去。

4. 建议采取的措施

在谈到改善国内经济形势的措施时加涅夫说，他曾建议乔治乌-德治采取如下措施：

1) 实行金融改革；

2) 在某种体面的借口下对资产阶级的部分资本实行国有化（例如在战争期间因军事订货而得到的非法收入、投机倒把等等）；

3) 对资产阶级的主要经济阵地发起攻势并将其摧毁，以便将经济的命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谈到上述的最后一个问题时加涅夫举出了保加利亚的例子，在那里曾经在这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国家得以将经济的领导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他建议乔治乌-德治也这样做。

加涅夫不止一次地强调，目前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只要经济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在政府里的代表手中，罗马尼亚共产党能够改善国内的经济形势就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将仅仅在表面上做出一些让步，而同时却将破坏和阻碍任何重大措施的付诸实施。

关于向乔治乌—德治建议的政治方面的措施，加涅夫指出了如下几点：

1) 防止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与加强（马尼乌、布莱蒂亚努、军队中的反动势力和特特勒斯库）；

2) 给反对派以打击，目的是消除其首领们。为此加涅夫建议利用无疑是存在于已被揭露的恐怖主义组织和阴谋组织与反对派领导人之间的联系；

3) 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再解决特特勒斯库的问题，因为如果特特勒斯库现在退出政府，无疑他将转向反动势力，那样将意味着反动势力的加强；

4) 还需要在政治上打垮充当资产阶级在政府中的代表并阻挠任何重大经济措施的实施的特特勒斯库的自由党人，而不要去走自由党人试图指点的道路，使处于后备位置的贝让取代特特勒斯库。

在后一种情况下自由党人将仍然留在政府中，他们将会继续采取自己抵制政府一切政治和经济措施的策略。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 Д. 雅科夫列夫

1947年6月25日于布加勒斯特

№09348

卡夫塔拉泽关于罗国内局势及
逮捕反对党领导人问题与特特勒斯库的
谈话记录

(1947年7月18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送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秘密

摘自 С.И. 卡夫塔拉泽的日记

今天特特勒斯库前来拜访了我，向我谈了其索非亚之行的印象。他高兴地提及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在保加利亚所到之处受到了真挚热情的接待并强调指出，在经过了将近40年之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终于建立起了真正友好和同盟的关系。格·特特勒斯库简要概述了在索非亚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容和所取得的结果之后，向我转交了罗马尼亚代表团在索非亚签署的议定书及其附件的副本。他对保加利亚的国务活动家们十分赞赏，特别是对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同时他还指出，从政治观点看，他感觉南斯拉夫政府的地位毕竟要比保加利亚政府的地位要更牢固些，因为铁托政府不需要同像在保加利亚国内，甚至在其议会内部那样强大的反对派做斗争。根据他在保加利亚逗留期间所能够收集到的片断和表面上的信息材料，他得出的印象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和解的希望很小，因为政府要求反对派：第一，要承认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第

二，要放弃其倒向西方国家的方针。而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则像罗马尼亚的反对派一样坚持不退让。

从与某些保加利亚的部长们进行的个别谈话中特特勒斯库得出的结论是：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还存在一些有关领土方面的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但是他表示相信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解决的，也不会成为签订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障碍。特特勒斯库说，保加利亚方面也向罗马尼亚代表团提出建议想签订类似的条约，但是他（特特勒斯库）建议将此事推迟到和平条约批准之后再议。但是两国政府已经确定现在就互相视为盟友，进行合作和互换情报信息等以便协调两国的对外政策。

在谈到巴黎会议问题时特特勒斯库表示：从国外报刊的所有报道中他脑海里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现在就已经可以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成功的会议。他相信，这一点对于参加会议的所有国家的政府来说都是一清二楚的。此次会议的气氛很不自然，好像是一种“例行公事”，在所进行的一些时断时续的争论中，与会各方都表现出很不感兴趣和希望尽快结束这次会议，其原因概源于此。会议参加者们对会议几乎没有丝毫的热情，这使得特特勒斯库有理由认为这次会议不可能取得任何重要的结果。虽然此次会议的组织者们在最后一刻采取了相当巧妙的一着，不是像最初预定的那样只让5~6个国家参加“合作委员会”，而是让有代表出席会议的所有16个国家都参加该委员会，以便造成欧洲国家一律平等的印象，但是仍然不能指望在当前条件下会通过这次会议的工作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特特勒斯库说，在休假8天返回之后他打算再次来拜访我，同我谈一谈他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一些想法。他指出，他认为今后应该由苏联来主动采取步骤了。

接着特特勒斯库谈到了逮捕以米哈拉凯为首的国家农民党（马

尼乌)一批领导人的问题^①。关于此事,他说他认为必须给这个党以无情的打击。若是在几个月之前,他本来会反对逮捕米哈拉凯或者马尼乌的,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全体人民”反对政府。然而现在,由于掌握了他们叛国行为的确凿证据,人民将会明白,这不是报复,而是正义的惩罚。他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将不反对也逮捕马尼乌本人。必须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消灭“毒菌的发源地”。至于促使米哈拉凯及其追随者下决心出逃国外的原因,则他并不相信米哈拉凯的支持者们所散布的所谓此人是试图避免依据由政府准备的关于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律遭到难以逃脱的逮捕。他坚信,这一出逃的企图乃是精心安排的在国外,特别是在华盛顿建立一个以米哈拉凯为首的罗马尼亚流亡政府的计划的结果。按照这一计划,马尼乌则应当留在国内继续领导反动势力反对政府的斗争。

显然是为了同一目的,在华盛顿聚集了许多国家的反对派代表。例如,目前呆在华盛顿的有前罗马尼亚驻土耳其大使克列齐阿努、克罗地亚农民党首领马切克、保加利亚农民党首领季米特洛夫(格梅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罗马尼亚,这一计划已被内务部机关及时予以揭露和粉碎,为此应当祝贺特奥哈里·召尔杰斯库。关于“无情惩罚”的话特特勒斯库在谈话中重复了好几次。特特勒斯库还指出:尽管罗马尼亚政府对英、美两国最近就逮捕反对党成员一事发来的照会做出了措辞强硬的回答,但是根据国外报刊的报道,预料英、美两国政府还会就最近的逮捕一事发出新的照会。特特勒斯库认为,它们不得不不时地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类似的照会,因为它们没有其他办法去支持那些反对党的“士气”,它们如

^① 1947年7月14日,以米哈拉凯为首的国家农民党的一批领导人在试图逃到国外时被逮捕,7月29日罗马尼亚议会决定解散国家农民党。马尼乌、米哈拉凯以及国家农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被逮捕。

果不这样做，这些反对党就会认为自己已被抛弃。

科特利亚尔同志参加了此次谈话。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 C. 卡夫塔拉泽

1947年7月18日于布加勒斯特

№09354

列萨科夫关于罗马尼亚党内分歧 给巴拉诺夫的报告

(1947年8月26日)

绝密

致巴拉诺夫同志

在今年8月7~20日逗留布加勒斯特期间，我同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中央书记乔治乌-德治、安娜·波克和瓦西里·卢加以及盟国管制委员副主席苏萨伊科夫进行了会晤。

除了了解与完成我此行任务（为撰写关于党的文章和资料收集素材）有关的问题之外，在同苏萨伊科夫、安娜·波克和卢加的交谈中，他们都谈到了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书记之间——以乔治乌-德治为一方和以波克、卢加为另一方，存在严重意见分歧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就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内容向您做一汇报。

在8月8日同我所做的谈话中，苏萨伊科夫同志告诉我说，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中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方是乔治乌-德治及其“伙伴们”——工业部副部长毛雷尔、乔治乌-德治的私人秘书采格尔和加斯顿，另一方是瓦西里·卢加和安娜·波克（虽然波克同乔治乌-德治的争吵一般比卢加要少一些）。据苏萨伊

科夫同志认为，这些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乔治乌-德治不愿意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重大原则性问题，而竭力想独自决定这些问题。乔治乌-德治平时实际上几乎并不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他对波克和卢加提出的建议总是反应过分敏感，害怕他们在党内的威望得到加强。

苏萨伊科夫同志认为，乔治乌-德治竭力想把波克和卢加挤出党的领导班子。作为例子，他举出了这样一件事：在议会竞选运动期间，乔治乌-德治建议不要把波克和卢加列入候选人名单，理由是他们不是罗马尼亚族人，并且来自苏联。在成立国际妇女联合会的时候，乔治乌-德治曾提议把波克选进该联合会的领导班子并派她去巴黎常驻。

苏萨伊科夫同志指出，乔治乌-德治不经政治局讨论而自行其是，从而导致了不可容忍的政治性错误。例如，乔治乌-德治起草了两项基本上正确的有关节约财源的法案，在未告知任何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就将其交给了财政部长、自由党人亚历山德里尼，后者又将这两项法案提交给预算委员会审议。在这次委员会会议上，卢加和其他支持共产党人的委员会成员都反对这两项法案，原因首先就是这些法案是由亚历山德里尼提出来的。而亚历山德里尼则说，他本人是反对这些法案的，但是提出这两项法案的是共产党人。只是由于安娜·波克的巧妙应付才把这件丑闻压下来而未张扬出去。

在7~8月间曾进行了工会组织的选举。波克打电话给乔治乌-德治，建议召开会议讨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措施。对此乔治乌-德治回答说，他没有时间，同时还告诉波克说，他将就选举进程问题同社会民主党人沃伊捷克和拉达恰努举行会晤。波克建议他邀请通晓选举进程的卢加参加这一会晤（卢加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工会工作），对此建议乔治乌-德治回答说，他将一个人同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会晤。

苏萨伊科夫同志认为，乔治乌-德治的所有这些做法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受到毛雷尔和采格尔对他的影响，这两个人是党内的可疑分子。波克和卢加竭力想削弱毛雷尔对乔治乌-德治的影响。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建议任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取代毛雷尔出任最高经济委员会秘书长，但乔治乌-德治很长时间没同意这样做。在乔治乌-德治访问莫斯科期间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康斯坦丁内斯库担任此职的决议。毛雷尔出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但未敢在表决时反对这项决议。当卢加给在莫斯科的乔治乌-德治打电话，告知他这一决议时，乔治乌-德治回答说：“如果毛雷尔同意，那么我也同意”。

8月15日我会晤了瓦西里·卢加。

关于党的领导班子中的状况问题，卢加表示：我们（指他自己和安娜·波克）希望由党来领导国家和（由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政府各部，而不是像目前这样由政府各部来领导党。卢加重述了苏萨伊科夫同志对我说过的一切。他（卢加）认为，波克和特奥哈里·召尔杰斯库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意他的意见的——虽然特奥哈里·召尔杰斯库总是竭力置身于所有这些争论之外。

卢加说，在进行中央委员会各书记之间的职责分工时，乔治乌-德治曾试图把他和波克排斥在党的领导班子之外。乔治乌-德治提议让波克去领导行政-经济和妇女部门，让卢加去领导工会，而干部工作、组织指导和宣传鼓动等部门则由他自己负责，也就是如卢加所说，由他“自己的伙伴们”负责。

卢加告诉我说，在工业部里有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工作，这些人在毛雷尔的协助下影响着该部的工作。在司法部（部长是共产党人帕特拉什卡努）同样也有许多旧官吏，他们一直在破坏这个部的工作。卢加说：“从这个部里把诚实的人赶出去比把法西斯主义分子赶出去要更容易”。司法部经常拖延对各种犯罪分子案件的审理，甚至为他们洗刷罪行。乔治乌-德治明知司法部里的这种情

况，却没有对帕特拉什卡努采取过任何措施。

据卢加断言，毛雷尔乃是一个迄今为止一直力图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人。由于他的坚决主张，为了同美国建立经济联系，在去年未经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情况下，向那里派去了罗马尼亚最大的资本家奥什宁格和马拉科斯，此二人现在仍在美国，并在进行反动的宣传。毛雷尔在自己的工作中有事不依靠工会，不同工会商量，而去向罗马尼亚工业家总联合会请教。

卢加认为，毛雷尔是在千方百计地故意败坏罗马尼亚同苏联之间贸易的声誉。他的做法是把从苏联购买来的机器以低于购进时的价格在罗马尼亚出售。卢加认为，乔治乌-德治受毛雷尔这样一些人的影响，并犯下一些政治性错误，因为他（乔治乌-德治）没有足够的政治素养，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和处理的能力也很弱。

卢加认为，没有联共（布）中央的干预，他们不可能取得积极的结果，因为他和波克对于乔治乌-德治来说并不是有权威的人，乔治乌-德治仍会继续独自决定一切问题。卢加同时还指出，除了政治局成员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分歧，这些分歧并未反映到党的工作中。

卢加说，所有的政治局成员在自己的所有讲话中，都努力支持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乔治乌-德治，维护他的威信。卢加强调，任何人都没有想要得到这一职位，而且在党内也没有别的什么人能够替代他，但是我们希望由党而不是由政府各部来决定一切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在谈话结束时，卢加请求将这些分歧的情况报告联共（布）中央，并请帮助消除这些分歧。

8月19日我同安娜·波克进行了第二次交谈。

在于8月8日进行的第一次交谈中，波克没有谈及党的领导班子里的分歧问题。

在第二次交谈中，她谈了自己对党的领导班子中的状况的看法。她的看法基本上与苏萨伊科夫和卢加的看法相吻合。

关于派奥什宁格和马拉科斯去美国的问题，她说：毛雷尔提出并得到乔治乌－德治赞许的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他们作为“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应当为国家经济操心，而“莫斯科派”更多的是为苏联考虑。

波克告诉我说，鉴于在进行金融改革之后确定了固定的价格，乔治乌－德治于8月16日指示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会领导人阿波斯托尔和布加勒斯特党组织领导人，组织工人小分队并“私刑拷打”一切敢于提高商品价格的人。在8月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乔治乌－德治的这项指示已被取消。

根据特特勒斯库的建议，乔治乌－德治已经同意每周举行一次有格罗查、乔治乌－德治、特特勒斯库和拉达恰努参加的会议来讨论一些日常重大原则性问题。

波克认为：共产党人在政府中拥有多数，更不用说在议会中了，在那里共产党人拥有绝对的多数，因此，共产党人不应当去参加这类会议。但是乔治乌－德治同意了特特勒斯库的建议，并屡屡到会。

波克认为，乔治乌－德治所有错误的产生都是由于他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结果在他的知识水平和他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之间出现了很大的脱节。他忙于部里的工作，几乎无暇过问党的事情，同样也顾不上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

8月19日晚上我同乔治乌－德治进行了交谈。

根据我的要求，乔治乌－德治介绍了有关国家生活中当前的一些政治事件的情况。

在谈到党的作用时他强调，工作中的主要困难是党员，其中包括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不强。乔治乌－德治认为，正是由于这

一点而在实际工作的进行中犯有许多错误，但是党的基本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他没有谈及党的领导班子中的意见分歧问题，但是在谈到同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他们的分歧时，乔治乌—德治说：“我们也有分歧，并且有时相互间也争吵”。

B. 列萨科夫^①

1947年8月26日于莫斯科

^① 列萨科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部顾问。

№09356

克鲁格洛夫关于被拘留
在苏内务部各营地罗公民数量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7年9月4日)

绝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苏联内务部现向您报告有关截至1947年9月1日罗马尼亚籍战俘和被拘禁人员数量的材料，以及我们对遣返他们的期限问题的想法。^①

拥有罗马尼亚籍的战俘共拘押46725人，其中：

罗马尼亚族人——34504人

匈牙利族人——8067人

德意志族人——2993人

犹太人——704人

摩尔达维亚族人——137人

奥地利族人——31人

其他民族——289人

在罗马尼亚籍的战俘中有将军3人，校级军官152人，尉级军

① 维辛斯基1945年9月11日给特特勒斯库的信通知说，苏联政府作为对罗马尼亚请求的答复，通过了一个决议：“继此前释放48000人的基础上，再释放并遣返40000名罗马尼亚战俘返回祖国”。

官 1519 人，士兵和军士 45501 人。^①

被拘禁的罗马尼亚籍人员主要是德意志族人，他们被关押在苏联内务部的营地卫生部的医疗机构及某些拘禁人员工作营里，总共 32814 人。

罗马尼亚籍的战俘和被拘禁者的总数为 79539 人。

苏联内务部认为遣返工作可以在 1947 年 9 月份开始，在 1948 年 3 月份全部结束，具体安排是：为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运行，让这些人员的绝大多数于 1947～1948 年的冬季遣返完毕，其中在 1947 年的 9 月遣返 6000 人，10 月遣返 8000 人，11 月和 12 月以及 1948 年的 1 月和 2 月各遣返 12000 人，在 1948 年 3 月份遣返其余人员。

苏联内务部长上将 谢·克鲁格洛夫
1947 年 9 月 4 日 22 时 45 分于莫斯科

^① 原文如此。这里总计是 47175 人。

№09360

乔治乌—德治关于罗马尼亚社会 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情况通报

(不晚于1947年10月9日)

绝密^①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曾经提出了建立统一工人党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是由于当时需要加强和巩固工人统一阵线，并阐明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对这一口号保持缄默。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设置了重重障碍，尽管我们尚有某些缺点，但工人统一阵线在基层组织中还是加强和巩固了。

(一)

我们党同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组织一起为反对被自由党人掌握的财政部，争取加强通货稳定所进行的活动，围绕马尼乌案件所开展的群众运动，在对待马歇尔计划的态度方面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以及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无所事事和无所作为，都加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队伍中的威望。由于所有这一切，在企业及其他部门工会机构选举期间，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就都

^① 1947年10月9日，苏斯洛夫将这份报告分送给“七人委员会”：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米高扬、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

直接着手把右翼分子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一些基层组织在各自召开的会议纷纷通过决议，要求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也采取同样的做法。许多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表示，他们今后再也不信任他们党的中央领导了，并纷纷要求接纳他们加入共产党。于是在我们面前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对我们有利的现象可能也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后果，那就是：工人党员大批退出社会民主党将削弱反对右翼的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也可能会变成西方社会党类型的右翼政党。因此，我们党的领导人决定暂时停止大批忠诚可靠的社会民主党成员转入我党，而让他们留在社会民主党内进行工作，以便在反对同英、美帝国主义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右翼分子的斗争中加强和巩固左翼。

在反对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中右翼分子的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在从下面发起的纯洁社会民主党队伍的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现了主张建立统一工人党的潮流。

（二）

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正在进入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机关，直至中央委员会。左翼已经组成并且由我们领导，它基本上是由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分子组成，这些人在各种会议上和在报刊上发言或发表文章反对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在党内的帮凶。这导致社会民主党右翼陷入瓦解状态之中（谢尔邦、沃伊尼亚），而中派（沃伊捷克、拉达恰努）则出于各自维护自己影响的考虑，急忙表态不仅赞成统一行动，而且赞成建立统一工人党。沃伊尼亚也表示赞成建立统一工人党的主张，但同时又同沃伊捷克和拉达恰努一起及每个人分别地大耍手段反对统一行动。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正是在这样一种内部条件下举行的。

(三)

我们党在领导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左翼进行斗争，以反对英、美和法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利用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作为自己的工具的企图。我们党在领导着他们为工人阶级的统一、为支持建立统一工人党的正确主张而进行斗争，而统一工人党只有在工人统一阵线不断巩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我们党正在为确保左派在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而工作。

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西方的各社会民主党将动员起来，力求赋予这次代表大会以反共倾向，这一点早就是很清楚的。

众所周知，沃伊尼亚和沃伊捷克，有时还有拉达恰努，曾经请求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支持，于是他们就向本次代表大会派来了大量的代表团。这些代表团从事活动的中心人物是来自布吕姆的党的格鲁姆巴赫和来自工党的克劳福德，这两个人都试图赋予代表大会以反共和亲西方的倾向。

他们仅仅得以巩固了沃伊尼亚的地位，但是却未能改变代表大会的进程。在开会的第一天，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就曾威胁说，如果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关于统一的党的问题和攻击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就将离开这个国家。但他们最终还是留了下来，以便“给真正的社会党人以帮助”。

格鲁姆巴赫在致词中一方面承认“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苏联的巨大成就及其历史性功勋”，同时又宣称，“我们法国人终究不能忘记，由于地理条件的关系，解放我们的是英、美两国的军队”。这一致词在代表大会的大厅里引起了某种困惑不解，尤其是因为格鲁姆巴赫坚持说，美国的援助对于法国是必不可少的。

格鲁姆巴赫曾试图利用报刊上发表的在波兰举行的会议的文

件，把代表大会左翼，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上数量相当可观的动摇不定分子引入迷途。格鲁姆巴赫说：“我遗憾地发现，就在社会党代表大会开幕的这一天，出现了一份由众多共产党发表的宣言，按照该宣言中的论点，我似乎应当认为自己不配在这个讲台上致词，我甚至似乎应当说我是在玷污这个讲台。……这个宣言充满了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指责。但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些党的领导人才是一些头脑简单的背叛者。”格鲁姆巴赫的这一段话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我们早已及时地不仅向社会民主党忠诚的左翼分子而且也向该党的中派领导人通报了情况，致使他们已经看出了所公布的文件在评价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人活动时所做的区分。正因为如此，格鲁姆巴赫才蛊惑式地宣称，一旦发生战争（冲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将全都站在一个方面：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没有忘记甩出这样一句话：“我们将反对西方或者东方结成集团”。

总的来说，除了一位工党党员之外，几乎所有外国代表团成员在看到大多数会议代表都热情欢迎对苏联的赞扬话语时，也都从积极方面去谈论苏联。

工党代表团的代表在致词中充当“英国社会主义”的辩护士，要求加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同“英国社会主义”的合作，加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除了保加利亚的代表以外，所有其余的外国代表都强调了加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地位的特殊必要性。

（四）

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代表的构成

代表总数 378 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当然代表）。

政治构成

持左派立场者——119人

受左派影响者——142人

总计 261人

敌对分子——77人

动摇不定者，受右派影响较多者——40人

总计 117

这些看法及划分是根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我们党的各县级组织收到的材料做出的。

(五)

我们的中央委员被邀请出席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因而派了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瓦西里卡同志根据波兰会议的文件精神所做的讲话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从代表大会开会的第一天就有一些派别在大会上活动。布加勒斯特一些企业和外地的代表批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接纳了一些特种军团和资本主义分子入党。许多代表批评党的领导人工作消极、暗中破坏统一阵线，揭露了曾经支持过国王专制统治，而现在身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却在暗中破坏统一阵线建立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沃伊捷克虽然在代表大会上得到很多人支持，但也同样受到了批评，原因是他曾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以表示对削减员额的抗议，以及他削减人员太少并把许多反动分子留在了人民教育部机关里。沃伊捷克在代表大会期间曾组织了一次同担任教师的大会代表们的会议，让他们起哄以妨碍左翼分子发言反对拉达恰努，并要求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给教师10个名额。左翼分子揭露了这一把戏，说这是分裂行为，是企图在小圈子的基础上组建社会民主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尔卡由于其同伙米洛内斯库—梅拉所进行的反共

和反苏活动而受到激烈的批评。布尔卡在为自己辩护时攻击拉达恰努，指出他正在从事反共的工作。

在各种思潮之间冲突的条件下，左派是惟一拥有明确路线的一个派别，他们的发言很受欢迎。在代表大会上通报了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社会成分情况，但是这一情况至今仍然不十分清楚。例如，所罗门提供了如下数字：工人 155303 人，官吏 49000 人，商业和工业部门职员 17093 人，商人 8600 人，自由职业者 3903 人，农民 253803 人。当然，这些数字被大大地夸大了。

在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动摇不定分子中间开展了紧张的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结果，沃伊捷克的影响开始下降，致使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与会的多数代表都支持了尖锐批评沃伊捷克的政策及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的政府工作——他们对待经济问题、国内反动势力及在对外政策等方面的立场的人。

（六）

如果说在 10 月 6 日之前，作为反对统一阵线策略总导演的沃伊尼亚曾经试图转入进攻态势，试图联合起所有的右翼集团以便改变代表大会路线，而沃伊捷克还曾对左翼分子发出过威胁，那么今天，左翼分子已经掌握了主动，对右翼发起了广泛的攻击。普拉霍瓦县的代表博多里亚努在会上要求清楚地阐明党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的立场，对沃伊尼亚及其他声称社会民主党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的立场是由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的那些人进行了抨击。这位代表在整个大厅的热烈掌声中说，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的立场，是由这样一个事实来决定的，那就是苏联是惟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采矿及石油工业部长图多尔·约内斯库也受到尖锐的批评，此人在代表选举中落选。大会代表菲洛里亚努在大会上说：“我们有一位社会党人的石油部长，但是石油的产量却在下降。图多尔·约内斯库的经济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也没有提出任何摆脱困难的办法”。菲洛里亚努在发言中反对关于依靠“外国贷款”的思想，他说：“我们有英国的例子可资借鉴，英国在外国贷款的帮助下实行了‘国有化’，而我们却看到英国已经陷入了多么贫穷的境地。……为什么图多尔·约内斯库在对待国际托拉斯的态度方面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为什么在经过了两年的工作之后，采矿及石油工业部仍保留着一批在石油开采工作中占据负责岗位并现在已隐藏到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反动人员——投敌分子？”尽管会议主席杜纳里亚努曾试图打断菲洛里亚努的发言，但是与会者却多次为发言者鼓掌。这证明了左翼分子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

总的来说，在代表大会的第三天，左翼分子都做了很好的发言，而右翼分子则几乎没能登台发言。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为社会民主党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确定了旨在加强两个工人政党行动统一的方针。在将于各基层组织中进行讨论的纲领的基础上，将为统一工人党的建立准备好条件。这一方针已经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所正确理解。今天，许多代表已经要求更多地把工人和其他忠诚分子选入社会民主党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便使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得到保证。

虽然社会民主党的此次代表大会尚未结束，但还是可以断言，敌视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势力已经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在这方面，各共产党波兰会议的决议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此次代表大会后面的工作问题，我们已经为使其继续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而采取了措施。

№09365

克鲁格洛夫关于马尼乌
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供词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7年11月1日）

绝密^①

特急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由于报刊公布了关于即将开庭审理前国家农民党领导人马尼乌及其同谋者的案件，苏联内务部于1947年10月14日将“阿布维拉”^②在罗马尼亚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战俘彼得曼·阿尔弗雷德关于马尼乌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的间谍活动的供词发送给了费多托夫同志。

彼得曼的供词可简要概括如下：

在1942年初德国情报机关把自己的间谍——罗马尼亚工业家康斯坦丁·布尔桑派往伊斯坦布尔，其任务是同英国情报机关的中校德恰斯泰连建立联系，后者系英国情报机关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领导人之一，已经在罗马尼亚以一家石油公司经理的身分工作了13年之久。

德恰斯泰连吸收布尔桑参加了效力于英国的情报工作，这是列

① 原文件上有批注：“未经苏联内务部秘书处批准禁止复印”。

② 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关。

入了德国反间谍机关“阿布维拉”的计划之中的。

德国情报机关通过布尔桑查明，马尼乌把一封米哈伊·安东内斯库写给马尼乌的信转给了英国情报机关，该信中包含有一系列国家机密，例如，关于新的铁路线，新公路的修建，飞机制造厂的扩建，以及在加拉茨和布勤伊拉满口仓库储存的大量储备粮的情报。

1943年8月布尔桑收到了马尼乌交给他的有关在普洛耶什蒂的油田状况的情报，让他转给德恰斯泰连。

彼得曼还供称：在1943年12月德恰斯泰连与另外两名英国侦察人员一起，乘降落伞降落在罗舍奥里-杰-维杰地区并被罗马尼亚当局逮捕。

作为“阿布维拉”的代表参加了侦讯小组的彼得曼亲自审问了德恰斯泰连，后者在受审中证实了马尼乌同英国情报机关的联系。

“阿布维拉”总部提出的关于逮捕马尼乌问题被安东内斯库所拒绝，其理由是马尼乌在罗马尼亚颇有声望。

10月30日马立克同志告称，彼得曼的供词已由罗马尼亚内务部长特奥哈里·召尔杰斯库阅过，后者请求把彼得曼的德文亲笔供词的影印件寄给他，以便他们在审理马尼乌案件时使用。

这些供词影印底片已于今年10月30日发往布加勒斯特。

召尔杰斯库还请求弄清楚并告知他，他们能否指望在必要的情况下让彼得曼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

鉴于这一情况，我们问了彼得曼，他是否同意以控方证人身份就马尼乌案件出庭作证，他对此表示同意。

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把彼得曼送往布加勒斯特。

请您给予指示。

苏联内务部长 C. 克鲁格洛夫

1947年11月1日于莫斯科

№07482

卡夫塔拉泽与帕特拉什卡努 关于罗共中央领导情况的谈话纪要

（1948年1月29日）

抄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机密

摘自谢·伊·卡夫塔拉泽的日记

卢·帕特拉什卡努来我处拜访，他说是想与我像老同志一样谈谈所有让他不能平静的问题，这些是关系到他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开始谈话时，帕特拉什卡努简单地介绍说，他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已经29年了，是与安娜·波克一个时期的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作为罗马尼亚共产主义青年中央委员会成员，他参加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过莫斯科，在那儿认识了列宁、斯大林和其他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的领导人。在29年中，尽管有时由于犯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因而离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去工作，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离开岗位，永远是一名遵守党纪的共产党员。就这样，他被后来成为人民敌人的共产党总书记弗里什整了4年，先到基层工作，接着又根据安东内斯库的命令被软禁了两年半。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弗里什没有试图与他建立联系，没有向他提供党的文件或信息。这些年里，帕特拉什卡努一直以一个合法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开展自己的活动。作为共产党员他被选为议会议

员，作为共产党员他在所有大型活动中为共产党人辩护。这种情况使他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声誉，特别是在1944年8月23日事件之后。一些领导同志觉得这种声誉是不正常的现象，由此产生了对他个人的种种闲话及摩擦等。这使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仕途无望了。在1944年8月23日以后不同时期对他的指控，造成了对他不信任的氛围。例如，指控他似乎是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分子，这种指责根据的是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他1946年在克卢日关于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的发言；二是1944年8月23日后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立场。他认为这些指责是没有根据的：他在克卢日的发言不是反对匈牙利人民，而是反对当时掌权的纳吉·费伦茨和吉恩杰希，他们根据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命令，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执行沙文主义政策。无疑，发言内容有较夸张的地方，但主要内容是政治方面的，并且不带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性质。后来中央委员会讨论过他的发言，并且很久之后，直到1948年1月还没有被人忘记，当讨论赴布达佩斯缔结友好互助条约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成员名单时，帕特拉什卡努又因为这个反匈牙利的发言被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最后他还是进入了代表团，因为人们注意到，当时发表反罗马尼亚言论的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格罗，是去年访问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代表团的成员。

1944年8月23日以后，开始涉及到返还犹太人住宅的问题——这些住宅是犹太人按安东内斯库政府命令被迫迁出的，但只是过了几个月后才通过这一决定，而且也没能完全满足犹太人的要求。因为那时格罗查政府刚刚执政，而在执政初期应当依靠现有的国家机关，于是时任司法部长的帕特拉什卡努考虑到住在犹太人住宅的新居民大多数都是国家公务人员，就在他颁布的返还犹太人住宅的法令中增加了一个补充说明，允许国家公务人员留住他们占用的犹太人住宅。这个法令在犹太人中引起不满，包括犹太人的知识

分子，帕特拉什卡努一直被他们指责为排犹主义。

帕特拉什卡努还举出第三个事例，证明在他周围存在着人为制造的不信任环境和力图在政治上孤立他的情况。

还在1944年8月23日之前，他与国王合作准备8月23日的起义时，以及在8月23日前后，他都认为君主制是一种政治因素，共产党员应该利用国王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让他成为国内和国外反动派手中的武器。但不应把这个从特殊政治方面考虑而提出的观点作为依据，认为他（帕特拉什卡努）是君主制保皇派。然而，在国王举行退位时，他没有被召回布加勒斯特，当时他经党的书记同意在省里工作，他甚至是在国王退位后才从广播中听到此事的。对于没有出席政府向共和国临时主席团宣誓的议会的隆重大会，社会舆论对此解释是他过去和国王合作的结果。那个时候召他回布加勒斯特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当时所在的地方大家都清楚，离布加勒斯特只需3个小时的路程。

帕特拉什卡努接着说，含有敌视的态度是从1944年安娜·波克和瓦·卢加从莫斯科回到布加勒斯特后不久开始的。当时开始散布一种说法，帕特拉什卡努在党内没有起任何作用。在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党中央机关报《火花报》得到指示，不刊登任何有关帕特拉什卡努作为党内领导人活动的消息，以及他作为当时在政府中惟一的共产党员部长活动的消息。

自然，有敌对情绪的人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并分裂党的队伍。反对势力直接对帕特拉什卡努及其周围的人施加影响的企图都被他顶住了。还在1944年末和1945年初，他就把这些事报告了党中央。但是这些企图并没有停止，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反对派的报刊上，一再出现一种说法，好像帕特拉什卡努和党中央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实际上任何不同意见都没有。

最使帕特拉什卡努苦恼的是，尽管一再要求，但已经有一年半

没有委托给他任何党的工作了。他是惟一一个没有党的工作的政治局成员，甚至当他提议去完成党的某项任务时，也被用各种借口拒绝了。

帕特拉什卡努承认，他可能曾经在改组他所领导的司法部时不够坚决。但他认为，必须看到他所领导的司法部比起匈牙利司法部的情况要好得多。现在在部机关中有近1000名党员和靠近他们的职员，他们基本保证了所有重要措施的实施。改组法庭的法令从3月1日生效，同时部里已经掌握了40000名选出来的人民陪审员。

帕特拉什卡努接着声明，在党内29年的政治活动中他不止一次地被更换职务，或在领导岗位或到基层工作，但任何时候他也没有拒绝过。他没有要求保留自己在领导机构的地位，也没有抱住部长的职务不放，但如果以后一直对他进行政治上的孤立路线，如果今后将不再让他做党的工作，这将是感到最沉重的。

他已经和安娜·波克和乔治乌-德治单独反映了上述问题。与安娜·波克的谈话未能使他满意，他知道在政治局里，他（帕特拉什卡努）的主要反对者是安娜·波克，但不知道导致这种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对他没有任何具体的指责。

对他的这种态度反映在各个方面，最近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作为法律学家、司法部长和政治局成员，却没有进入研究制定新宪法草案的委员会。

帕特拉什卡努表示，他不想再列举大量事实，来证明力图在他周围营造的政治上不信任的空气了。但作为一个例子，他说，1944年11月，当他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从莫斯科回来后，波德纳拉希立即让他的谍报机关对他进行了监视，一直进行了几个月。

谈话中帕特拉什卡努一再表示，他说这些给我听，不是想让我给政治局的成员和党的书记施加什么影响，而只想得到作为老同志

的我的意见。而且他坚持这次是推心置腹的私人谈话，内容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我回答他的只有一点建议：让政治局讨论他的情况，做出决定。我认为他关于“自己在政治上仕途无望”的说法，是有损于共产党员称号的。

帕特拉什卡努同意我的意见。请我原谅他由于心情不好而倾吐衷肠。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 谢·卡夫塔拉泽

1948年1月29日于布加勒斯特

说明：对帕特拉什卡努的不信任和有所防备的情况已有几年了。事由是怀疑他与英、美间谍活动有关，但没有具体的、有说服力的材料。不知为什么朋友们好像对此事不以为然。上述的谈话有一种别有用心的虚伪和自负，给我的印象帕特拉什卡努不是那种问心无愧的人。这几天内务部乔哈利·德诺尔热斯库交给我一份来源可靠的秘密情报。这对帕特拉什卡努是致命的材料：材料中的事实可以确实证明帕特拉什卡努反党和反苏的立场，以及他与居住国外的罗马尼亚侨民中的反动集团的联系——他们劝其加入他们的组织。鉴于帕特拉什卡努准备进入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而大会将在2月21日召开，我赶紧向党中央书记处提出帕特拉什卡努的问题，并建议他们（德治、波克、德诺尔热斯库）对这个“不光彩的事情”进行最后的调查，做出确定结论。书记处一致同意我的建议，

决定在开大会之前解决帕特拉什卡努的问题。以后的情况我再汇报。^①

谢·卡夫塔拉泽

1948年1月29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1948年帕特拉什卡努渐渐疏离了政治活动，1949年末被软禁。1949年末巴拉诺夫与乔治乌·德治谈话中说要“防止帕特拉什卡努对党的危害”，1949年10月巴拉诺夫从布加勒斯特报告说：帕特拉什卡努的情况没有变化，他仍被软禁。“……在现在的形势下，将帕特拉什卡努在别墅中软禁是危险的，必须将他逮捕，进行更积极的侦讯”。

№07483

莫洛托夫与格罗查、波克 关于签订苏罗互助条约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2日）

机密

摘自莫洛托夫的日记

参加人：瓦·佐林、谢·卡夫塔拉泽和翻译 Л. 科特利亚尔

互相问候之后，莫洛托夫问格罗查，罗马尼亚政府接到苏联政府的邀请，为签订苏罗互助条约到莫斯科举行谈判，是否觉得意外。

格罗查回答说，这个邀请的确出乎意料，但却令人兴奋。

莫洛托夫说，现在苏联政府正和保加利亚、匈牙利预备谈判签订类似的条约，而这样的条约关系应该首先与罗马尼亚确定才是合理的。因为苏联政府考虑到苏联与波兰和罗马尼亚有漫长的边界线。与匈牙利只有不长的一段共同边界，和保加利亚完全没有接壤。鉴于与波兰已签订互助条约，苏联政府认为现在与罗马尼亚签订这样的条约是合乎时宜的。

在开始谈条约前，希望了解一下罗马尼亚共和国现在的情况。

格罗查回答，最近在罗马尼亚发生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它足以使这次的政府代表团代表一个新的共和国。罗马尼亚共和国是年轻的，但却是有生命力的。它具备继续发展的所有先决条件。无

疑，它面临着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莫洛托夫说，根据轻易地实现了变革这一点来推断，取消君主制的问题已经完全成熟了。

格罗查接着指出，在这个历史性事件之前，共产党员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们知道摘果实要到它完全成熟的时候。无论何时，取消君主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同。以后的事实证明，罗马尼亚政府这样做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在国王离位之后，罗马尼亚没有一点骚动，相反，它唤起了全体人民的赞同和热情，在政府代表团于今年1月初访问布达佩斯返回的路上，就能够证明这一点：激动的人群在从边境到布加勒斯特沿线的两边欢迎政府代表团所乘的列车，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致意。怜惜国王和君主制的只是某些有反动情绪的少数集团。因清理军队而退役的军官表现出一些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比对马尼乌审判时表现的更为突出。但这种不满在群众中没有响应。此外应当指出，国王没有让反动集团的阴谋得逞，他们希望国王到国外，在西欧国家某些集团的帮助下开展反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斗争。国王让国内外的反动派失望了，政府也不会满足于所取得的成绩，而要继续提高警惕。

莫洛托夫指出，罗马尼亚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事实，在建立共和国的过程中，格罗查总理在说服国王同意签署退位诏书的事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格罗查说，所采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心理方面的特点：国王，特别是王后，坚持要“体面地离位”。采取了适宜办法，比如说给予一定数目的硬通货，政府指派工作组迅速和准确地清点属于皇室的全部财产，公正地估价这些财产。国王和皇宫管家甚至对政府的做法表示感谢。“换句话说，我们用了最现代化的方法，服用青霉素代替了外科手术”。同时，政府也考虑到，苏联政府合

乎时宜地给国王颁发了“胜利”奖章。^①

莫洛托夫问，授予国王“胜利”奖章这件事，在与他谈判时是否起到了帮助政府的作用。

格罗查回答说，在与国王谈判退位问题时，提了一下这个问题，意外地起到了效果。但无论是国王，还是王后，都不会声张谈判的内容，因为如果此事被境外的集团提前知道了，恐怕会被他们所利用。国王是很安心的，因为给他授了“胜利”奖章，并一再邀请他到苏联大使馆及其他迹象表示出苏联政府对他的重视，都使他增加了信心，知道自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现在罗马尼亚面临的是政府提出的任务：尽全力巩固罗马尼亚新的国家制度。

莫洛托夫指出，罗马尼亚共和国的建立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可以因此祝贺罗马尼亚民主制度的建立。

格罗查以政府的名义对苏联如此评价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多少有些意外的邀请本身，也说明在罗马尼亚消灭君主制度是很顺利的。

莫洛托夫确认苏联政府在发出邀请时，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接着莫洛托夫指出，今天的会见是为了预先让罗马尼亚代表团了解苏方关于互助条约草案内容的意见。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接见将安排在明天。苏联政府打算以苏波条约为例与罗马尼亚签约，这个条约与罗马尼亚最近同其他邻国所签的条约有所不同。到现在为止，与苏联所签的条约有：1942年的英苏条约、1943年12月的苏捷条约、1944年的苏法协定、1945年4月的苏南条约和苏波条约，这些条约都是用于反对可能来自德国及其可能的盟国方面的侵略。这些条约都是在战争时期签订的，自然它们都是用于反对德国及其盟国

^① 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世在1945年7月6日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名授予“胜利”勋章。

的。

不久前苏联政府认为，签订互助条约不仅应反对有可能来自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还应反对来自无论哪个国家的可能的侵略。这个精神得到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响应。而分析了目前的国际形势后，苏联政府得出结论：现在签订的互助条约仍然指向反对可能来自德国及其盟国方面的侵略还是合适的。苏联政府认为，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是将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考虑用间接的形式，在条约的其他条文，即在协商的条款中，表示出来。苏联政府觉得，在上述场合的互助条约中没有必要写明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所以苏联政府提议按苏波条约的基本形式签订互助条约。

波克提出，在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期间，贝奈斯和马萨利克反对将签约一方遭受侵略时，条约双方可动用一切手段互相帮助的条款列入互助条约，并建议将事先协商这一条列入条约。是否可以认为，在上述的协议草案中将包括这样的补充条款？

莫洛托夫回答，苏罗条约草案中的协商条文含有另外的意思。所提条约草案中，在与德国及其可能的结盟国家的关系方面，如遭受他们的侵略，有义务不用协商和尽快采取行动的内容。在与德国没有关系的其他问题和事件上，草案中建议有责任相互协商，经过协商可以再采取行动，到时还需要新的协定。在这个协议草案中，应该表明主要的可能的侵略者是德国。这样条约将显得更加令人放心，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容易使人接受。现在那些西方强国，像英国、法国，都改变了过去发言中反对德国的调子。贝文公开在下议院声称建立西方国家联盟，他打算把德国也包括进去，我们不改变反对德国侵略重演的政策，无疑会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他们的调子变得令人神经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自信而坚决的基调，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心及平和的态度，我们觉得更好让人接受。

莫洛托夫将条约草案（参见附件^①）转交给格罗查，请他熟悉一下内容。然后他问大家，是否听清楚他所讲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格罗查感谢莫洛托夫清楚地讲解了条约草案的原则，答应和代表团的成员一起认真研究条文的内容。

波克问，是否明天就签署条约。

莫洛托夫回答，首先应当认真讨论条约，并通知说，明天，即2月3日，晚上8点安排约·维·斯大林接见代表团。2月4日为欢迎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举行外交招待会。

谈话进行了1小时10分钟。

记录 Ⅱ. 科特利亚尔

1948年2月2日21时于莫斯科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07487

舒托夫与基辛涅夫斯基关于 帕特拉什卡努问题的谈话纪要

(1948年2月20日)

抄送维·米·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机密

1948年2月20日我拜访了约·基辛涅夫斯基^①，他和我谈了今年2月19日他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会议把帕特拉什卡努·卢克连楚的问题调查清楚了。他还告诉了我，他自己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中提出的意见。

在会议上，党中央总书记乔治乌-德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帕特拉什卡努今年1月28日与卡夫塔拉泽谈话^②的内容是什么。帕特拉什卡努回答，他和卡夫塔拉泽讨论了司法部的工作问题。于是，乔治乌-德治说，他已经知道了帕特拉什卡努和卡夫塔拉泽的谈话内容，并问他为什么不来书记处提出他同卡夫塔拉泽所谈的问题。同时乔治乌-德治要求帕特拉什卡努在政治局会议上讲清楚，在党的领导人对他的态度方面，他所不满意的地方。

帕特拉什卡努回答这些问题时表示：

1. 在讨论米哈伊退位问题时，党的领导人没有请他参加。由此，他把这个事实看做是党的领导人对他的不信任；

^① 约·基辛涅夫斯基，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② 参见本卷本专题№07482文件。

2. 他没有进入审定新宪法的委员会；

3. 他是惟一一个没有任何党内工作的政治局委员；

4. 在讨论 1948 年去布达佩斯的政府代表团成员时，波克说，因为帕特拉什卡努 1946 年在克卢日就民族问题所作的发言，她认为帕特拉什卡努去布达佩斯不合适；

5. 党的领导人他不看他（帕特拉什卡努）写的书；

帕特拉什卡努说，他从上述问题中看出了党的领导人对他采取的谨慎态度，故意不理睬他。

然后，帕特拉什卡努申明，自从 1947 年他与乔治乌 - 德治在巴黎谈话^①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参加党的生活。就是现在他与党的领导人也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接着他说，他不满意波德纳拉希对他的态度，根据他所得知的情况，波德纳拉希的人散布各种谣言，例如说他（帕特拉什卡努）要逃出国。所以帕特拉什卡努断绝了和波德纳拉希的一切联系。

帕特拉什卡努解释完这些以后，大家给他提了一些问题：

1. 乔治乌 - 德治提问：帕特拉什卡努是怎么考虑下列问题的，即为什么对他存在着不信任？

回答：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以，大概是我的个人主义，我生活在个人主义中。

2. 乔治乌 - 德治提问：帕特拉什卡努怎么评价迪努·布莱蒂亚努的话，即“如果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像帕特拉什卡努一样，那么和他们就可以合作”。

回答：我和他们合作还是在 1944 年 8 月 23 日以前，在马尼乌和布莱蒂亚努的印象中，我大概是一个调和分子。

3. 波克提问：波德纳拉希采取反对你的政策，起诉你企图逃

^① 指帕特拉什卡努和乔治乌 - 德治为签署对罗和约同赴巴黎之行。

往国外。波德纳拉希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为什么会那样做？为什么他认为你是叛徒？党中央代表着什么？如果事实不是那样，波德纳拉希就不可能再呆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可能再是党员了。为什么你表现得很平静？应当看一看波德纳拉希提出这些指控的目的。也许他想提醒敌人的注意，看一看你（帕特拉什卡努）心里怎么想的，以此向敌人说：“试一试，去找帕特拉什卡努那样的人，他可能被你们招募”。如果波德纳拉希持有这样的立场，你怎么解释。

回答：波德纳拉希的根据是他所获得的有偏见的情报。这些情报是臆造的结果。但我不认为是波德纳拉希本人捏造的这些事。

4. 乔哈利·德诺尔热斯库问：你是否还和别人说过与卡夫塔拉泽所谈的问题？

回答：不记得了。

还提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但没有什么重要内容。

在辩论时，有很多政治局成员发言批评帕特拉什卡努。波克在自己的发言中尖锐批评帕特拉什卡努的行为，说帕特拉什卡努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力量评价不够。瓦西里·卢加在发言中称帕特拉什卡努为罗马尼亚的布哈林分子，并把布哈林在联共（布）所进行的反党活动和帕特拉什卡努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的行为做了比较。

基辛涅夫斯基对我说，所有这些指责，帕特拉什卡努听起来很平静，而在早先（1946～1947年）个别的政治局成员给帕特拉什卡努提出些小意见时，帕特拉什卡努却大吵大闹。

要求发言的人还没有说完，帕特拉什卡努按会议顺序要求发言，并表示若允许他发言后，他将没有必要再解释其他的话了。

他的请求得到了允许。在第二次发言时，帕特拉什卡努讲了如下内容：

1. 他不是追求个人名利的人，但是虚荣心重。在波克和卢加

回到罗马尼亚后（1944年）^①，他看到他们的第一个企图是把他推出党的领导层。帕特拉什卡努说，这种企图在党的领导机构形成时期就有了，在党的代表大会（1946年）的准备阶段，他更加深了这种想法——波克和卢加的目的是要孤立他。从那时起他就有一种心理变态。他处在众多的评论影响之下，代表大会之后，这些评论对于他既没有被选入政治局也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进行了大肆渲染。

2. 和乔治乌-德治巴黎谈话后，他对自己说，要尽一切努力改正自己的行为。但他去找卡夫塔拉泽谈话的那个事实，说明自己没有摆脱以前就有的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他承认，这是他的老毛病，但他表示，他去卡夫塔拉泽那寻求支持，因为那种支持是他在党中央那里没有感到的。他说，如果他的问题早一些得到讨论，也许就不会发生以后的许多事情了。

3. 接着他说，在一些问题上他与党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一些问题上他没有与自己党的敌人作斗争，波克批评他这点是正确的。但说他在所有问题上都过高地估计敌人是不对的，正确地说应该是在许多问题上过高地估计了敌人。在对待“历史党”问题上，他认为他们其中能有被共产党利益而吸引的人，所以他不主张公开反对这些党派。他认为自己在民族问题的立场上更灵活。在克卢日发言的真正原因，是当时这个问题是很流行的，他想用自己的发言来获得声誉。

4. 然后他说，有些人来找他，目的是利用他的不满和聚集在他周围。国家农民党巴斯库来他这里，当他（帕特拉什卡努）知道了怎么回事后，把他赶走了。来他这里的还有珀格涅阿努；尼古列斯库-布热斯基派自己的人来找他，但他没有和他们谈话。谈到和

^① 指卢加和波克1944年11月从莫斯科回来。

贝吉阿的关系时，他说“在和贝吉阿的问题上，我落入了圈套”。

最后，帕特拉什卡努说，在党内给他制造了疏远他的气氛，跟他认识了27年的波克，没有帮助过他。有充分理由的认真严肃的谈话是能给予他的实质性帮助，但三年来党的领导没有这样做。帕特拉什卡努用下列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作为一个党员，不被选入新的党中央成员对我来说是有利的，但希望能交给我一份党的工作。”^①

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 舒托夫

1948年2月20日于布加勒斯特

^① 罗共中央书记处于1948年2月20日召开会议，继续审理帕特拉什卡努案件，并通过了关于帕特拉什卡努不再适合作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及将此案转交党的专门委员会研究的决定。

№09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向罗内务部提供自动武器的决议
(1948年4月19日)

绝密

1. 批准苏联武装力量部（布尔加宁同志）向罗马尼亚内务部提供1万件苏制自动武器和缴获的1万件9毫米直径自动手枪。
2. 委托对外贸易部（米高扬同志）依据本决议第1条提供给罗马尼亚的武器与罗马尼亚政府进行结算。

1948年4月19日

№095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罗马尼亚 派遣苏联专家顾问的决议

（1948年4月24日）

分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米高扬、苏斯洛夫、
恰达耶夫、Ф.费多托夫（全部）、布尔加宁、
沃兹涅先斯基、捷沃相、贝内迪克托夫、
柯西金（第1、3条）、阿巴库莫夫（第2、4条）。

绝密

1. 根据所附名单向罗马尼亚派遣9名专家，期限1年。^①
2. 向罗马尼亚按非正式程序派遣1名国家安全问题顾问，期限1年。
3. 委托对外贸易部（米高扬同志）与罗马尼亚政府签订关于苏联专家在罗马尼亚工作条件的议定书，其中应规定由罗马尼亚政府承担这些专家的全部工资开支，并依据苏联方面的决定规定他们

① 在1947年12月30日与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拉夫连季耶夫会谈时，罗共领导人波德纳拉希说：“罗马尼亚共产党目前极需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受过专业知识训练的人员，因此不得不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派苏联专家前往罗马尼亚的有关部门工作”。1948年1月17日，在维辛斯基处举行的招待会上，罗马尼亚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卢加在讨论的一系列问题中最先提出的就是关于苏联专家的问题，并请求尽快向罗马尼亚派出“工业各部门的苏联专家作为顾问进行工作，罗马尼亚非常需要他们”。1948年12月22日，驻莫斯科的罗马尼亚大使向佐林请求延长即将期满的苏联专家逗留的期限至1949年4月1日。

的工资数额。

4. 批准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接收 20 名经过政治审查的罗马尼亚学员，到安全部门接受 6 个月的培训，与培训有关的全部开支由罗马尼亚政府承担。

拟派往罗马尼亚的专家

派出专家的部门	专家的类别	派遣的数量(共 9 名)
苏联武装力量部	军队组织和训练顾问	1
苏联国家计委	国民经济总体计划专家	1
苏联国家计委	工业生产标准化专家	1
苏联国家计委	组织生产工艺流程专家	1
苏联国家计委	价格和费率问题专家	1
黑色金属工业部	黑色金属工业专家	1
苏联农业部	农业专家	1
苏联财政部	工业企业财政管理专家	1
苏联财政部	组织税收系统专家	1

【专题说明】

战后苏联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

(1946年3月至1953年10月)

本专题选编的20件档案，反映的是苏联战后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部分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农业的政策。

总体说来，战后一段时期，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是矛盾的：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苏联无疑是足以同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流强国，但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苏联却处在十分软弱和危险的境地。而形成这种局面，并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破坏和苏联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物质代价。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法西斯国家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使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这一胜利充分证明了苏联战前坚持的超工业化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的优越性和正确性。而苏联这种过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实际上相当于战时经济体制和准战时经济体制，其特点和优势在于资源的动员和调配，而不在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再生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苏联的经济体制为赢得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战争似乎也为战前的苏联经济体制注射了一支强心针，使斯大林等人认为进入和平时期以后，仍然可以继续沿着过去的经济道路发展。1946年2月斯大林的著名演说充分反映了苏联领导人当时的这种认识水平，特别是在冷战的格局形成以后，更加重了这

种看法。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苏联则以对抗马歇尔计划为由，坚持对东欧各国的经济实行统一指挥和领导，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推行这种经济模式。于是，苏联在战后的许多年中，计划经济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集中，通过进一步扩大和完善集体农庄体制提高对农业的税收，仍是靠剥夺农民来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其结果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张和落后。

本专题收集的档案比较详细地、具体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
张廷文、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张木生、
方琼、安新奎、沈友泰、吴玉英）

№03624

波格列布诺伊
关于复员军人安置情况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3月20日)

秘密

自1945年6月23日颁布作战部队全体年老人员复员法和1945年9月25日发布红军第二梯队全体人员复员令以来，有5314700人复员到城市和农村。其中1771500人回城，其余的3543200人回到农村。

……1946年2月15日前，在城市安置就业的有1286500人，上学的41900人，占复员回城人数的75%。其中531700人是由我城市劳动力核算和分配局安置的，自行解决的有754800人。

未安置的443000人中的147000人在最近的一个月内返回居住地，享受他们应该得到的休假。

从军队复员回家的大多数人在3~4个月长的时间内不去上班，理由是要收拾住宅和料理家务。部分复转人员不愿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专业生产工作上去，要求给他们提供行政管理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力核算与分配委员会副主席

И. 波格列布诺伊

№05564

联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州委员会 会议纪要（节录）

（1946年11月13日）

……今年10月12日，出身于原富农家庭的匪徒对到“前进”集体农庄参加收割庄稼和收购粮食的第三技工学校的领导和学生进行了完全是反革命的恐怖主义袭击。……对这一罪行的就地侦查确认，利莫诺夫、卡尔波夫和其他积极参与的匪徒共有15~20人，他们用铁锹、尖木棍和刀子作武器，进行了这次袭击被派去收购粮食的工人代表的、早已有所准备的恐怖主义行动，结果使第三技工学校的两位专家被打死：勋章获得者、党员伊利尤赫同志、联共（布）预备党员克留奇科夫同志，另有沙尔科夫同志和扎沃龙科夫同志受了重伤……

“前进”劳动组合主席拉波夫最明确地表达了集体农庄上层富农分子政治立场的实质。1945年8月，拉波夫在自己的亲朋好友圈子中就说过：“现在在苏维埃政权下，人民和农民感到自己受压迫，他们起早贪黑地干活。农民什么也没有，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集体的土地上杂草丛生，土地耕作的质量很差，比旧时代还差。农具和农业机械无人爱护，经常被损坏，因为集体农庄庄员们认为这些工具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是集体农庄的财产。集体农庄的许多土地都空闲着，以前这些土地在私人手里时每块地都有人耕种。农民不能当家作主，他们被强迫干活，愿不愿意都得干。如果我国的整个农业能像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一直发展下去的话，

那么现在，即1945年这个时候，每一个个体农民就会在自己的个体经济中使用拖拉机、汽车和其他农具。农民就会有丰富的产品，什么也不缺。”……联共（布）区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国家全部和内务部的区分局领导人政治警惕性迟钝的原因是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低，多数区领导人在物质上都直接依赖管理委员会主席拉波夫，在集体农庄拿面包、蛋、鸡、肉、奶品及其他农产品。

1946年11月13日

№03625

贝利亚呈报有关粮食困难的报告时 给斯大林的附函

(1946年12月31日)

兹将从阿巴库莫夫^①同志处得到的有关在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些地区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伊兹梅尔州粮食供应困难的报告，及沃罗涅日州和斯大林格勒州居民埋怨粮食供应紧张，并报告因饥饿而出现了浮肿现象的来信摘录，一并呈报给您。由于对通信进行了秘密监督，在今年11月和12月，苏联国家安全部登记了沃罗涅日州的4616封来信和斯大林格勒州的3275封来信。

贝利亚

1946年12月31日

附 件

莫尔多维兹有关摩尔达维亚一些地区饥荒情况 呈交阿巴库莫夫的报告

由于1946年欠收，在农村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在摩尔达维亚

^① B. C. 阿巴库莫夫，时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南部，居民严重缺粮。

卡吉尔·宾杰里、基什尼奥夫县的一些村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由于饥饿引起的营养不良、消瘦、缺蛋白性浮肿病已发现 10834 例。这些县的个别区患病人数情况如下：科姆拉特区 3445 人，奇米什利区 2401 人，考纳斯区 1360 人，凯纳尔区 748 人，雷布尼察区 310 人，苏斯林区 250 人，列奥沃区 220 人，在共和国其他一些边疆区还有 2100 人。

病人中，学前儿童及学生占很大的比重，如科姆拉特区的 3445 个病人中儿童计有 2018 人，凯纳尔区的 748 个病人中儿童就有 423 人。

应该指出，营养不良病症的病人正在逐月增加。

此类病症使这些区居民的死亡率大大提高。如在科姆拉特区今年 10 月份就有 260 人死亡，其中 115 个小孩子；在奇米什利区一个月内就死亡 70 人；在沃龙奇洛夫区 10 月份死亡 16 人，在其他边疆居民因身体虚弱而死亡的人计有 65 人。

发生了一些横尸街道、公路、田野的现象。如从今年的 10 月 25 日到 11 月 5 日科姆拉特区的街道、公路上就发现并收殓尸体 6 具。今年 11 月 2 日在科姆拉特市的街道上发现并收殓了马夫里·伊万的尸体，他 52 岁，死于饥饿和虚弱。今年 11 月 30 日在沃龙奇洛夫克村通往斯捷潘诺夫克村的公路上收殓了 32 岁的帕兰·普拉斯科维亚的尸体，尸体解剖后发现，她死于饥饿和虚弱。今年 11 月 9 日在斯洛博兹市的郊区收殓了曼库什·捷连季的尸体，他生于 1910 年，是斯捷潘诺夫克村的居民。

今年 12 月，有一个两岁的婴儿被人捡到后送到了莱昂斯卡娅医院，婴儿身上附有便条，上面写到：

“……我丈夫死在前线，而又不给我发口粮。恳求你们妥善照料一下婴儿，我走了，为的是求得一口饭吃。我也不知道，我的命

运将如何，可能会死掉，但是不想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

由于目前的粮食困难，居民中已发现有反苏的失败主义和移民叛逃情绪。例如，里普康区的谢莱乌达村的村民 E. H. 秋秋尼克和 B. H. 秋秋尼克声称：“……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去罗马尼亚，那里的生活条件要比苏联好……”。

博洛金区的库赫涅什达村村民 П. M. 鲁苏说：“这里生活太差，什么吃的都没有，而在罗马尼亚过得要好些，我想去罗马尼亚，但是普鲁特河岸有许多边防军。等天一黑，我是要越过边境的。”

温格内区的瓦列-玛列村女村民 M. H. 托尔诺拉鲁在村民中说：“……我种的半公顷玉米还未成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活到收获时节，我可能要饿死了。如果有人能把我送到罗马尼亚，我可以把什么都给他。”别里齐县老波特拉日村女村民维尔博娃·玛丽娅声称：“……苏维埃拿走了所有的粮食，但不久这儿将不会再有苏维埃了。”

斯库良区拉斯波涅娜村村民 Л. H. 布拉什万鲁说：“比萨拉比亚应划归美国所有。苏维埃政权长不了。”

反苏因素很明显使敌对活动猖獗起来，并朝着暴动、恐怖行为方向发展。

我已给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所有机关下达了相应的指示，以及预防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制止越境事件的发生和查清反苏活动的组织者。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少将

莫尔多维兹

1946年12月2日

萨夫琴科关于伊兹马尔州塔鲁金和波罗金地区 饥荒状况给阿巴库莫夫的报告

根据伊兹马尔州国家全部管理局的材料，最近在塔鲁金和波罗金两地区的许多乡村和国营农场，由于庄稼欠收和粮食供应减少，出现了许多因食不果腹而浮肿、死亡的现象。

在塔鲁金区因吃不饱而饿死的事件记录在案的有四例。死者有：克里夫佐夫·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1939年生于塔鲁金区韦金村，非党人士，油脂厂看门人；叶夫罗夫·尼古拉·伊里奇，1923年生于摩尔达维亚切得尔鲁克区盖达尔村，加告兹族人，非党派人士，自1946年春开始在“比萨拉比亚”国营农庄工作；恰班·伊万·多罗费耶维奇，1897年生于伊兹马尔州新伊万诺夫区达维特利亚加村，保加利亚族人，住在帕里什村他的在铁路局工作的弟弟那儿。恰班死后两天，人们才在他捡麦穗的田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医生诊断证明，他因饥饿而死。

今年10月，在区卫生院登记看病的共有16位饥饿浮肿病人，其中9人来自彼得果尔诺叶村，4人来自塞尔宾涅沃村，3人来自塔鲁金诺和别列津诺村。

求医的人有：洛佐夫·安德烈·费多罗维奇，1899年生于摩尔达维亚切得尔鲁克区卡拉特鲁格村，加告兹族人，在国营农庄养蜂，家中有妻子和三个小孩。他们一天的口粮只有500克；洛佐夫·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65岁，卡拉特鲁格村人，加告兹族人，非党人士，靠在国营农庄工作的儿子赡养。其他人也都是由于吃不饱而患浮肿。

食品供应困难、天气寒冷使儿童缺课率上升。比如，国营“比萨拉比亚”农庄所在地——波得果尔诺叶林的村小学有学生100

名，而每天有 30~35 人缺课。

在波罗金诺区今年 10 月份由于食不果腹，登记死亡事件有 8 例。

在波罗金诺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村登记在案的因饥饿而患浮肿病有 20 例。集体农庄庄员尼热尔斯基·叶费姆·列昂季耶维奇及其妻子和三个两岁到十岁的孩子也患浮肿。国家作为贷款发放给尼热尔斯基一家的六普特谷物已经吃完，目前家里没有一粒粮食。

52 岁的沃洛基什克·尼基福尔·雅科夫列维奇的家里有 5 口人，同样也没有粮食。

由于食品短缺，居民中，特别是反苏分子中反苏言论时有所闻。所陈述的事实业已通报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部长、中将

萨夫琴克

1946 年 11 月 29 日

沃罗涅日州和斯大林格勒州居民 反映粮食供应紧张的信件的摘录

沃罗涅日州：

1946 年 11 月 15 日。“……即将到来的饥荒使人恐惧，人们情绪低落。我们的孩子过着野兽般的生活——整天到处找吃的，饥肠辘辘。热尼亚因营养不良已开始浮肿，脸部肿得特别厉害，非常虚弱。虽然常常没东西吃，但小家伙们默默地忍耐着饥饿，从不用那些无用的哀求来刺痛我的心。”（沃罗涅日州布图尔林诺夫卡·格拉夫姆卡镇 M. C. 叶夫列莫娃写给 H. A. 叶夫列莫娃的信。III39273）

1946年11月20日。“……现在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时至今日未见改变，而且未必能够有所改观。今年内我们家中可能有人会死去，因为饥饿，我们现在已开始浮肿。”（家住沃罗涅日市尼基京斯卡娅街的М. И. 普斯托瓦洛夫写给Т. А. 普斯托瓦洛夫的信。ПП33846）

1946年11月24日。“……家里糟透了，所有的人都因饥饿而浮肿；一点粮食都没有，只是吃一些橡实。”（沃罗涅日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市集市街57楼的В. В. 叶尔绍夫写给其弟П. В. 叶尔绍夫的信。ПП61500）

1946年11月24日。“……我们无以充饥：既没粮食，也没土豆，我们挨饿，我们开始浮肿、我们快要死啦。”（沃罗涅日州波德戈林斯基区维亚佐夫村的А. И. 尹多维茨卡娅写给С. П. 尹多维茨基的信。ПП90244）

1946年11月24日。“……我们要饿死了。没有粮食，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可吃。活下去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的，喝水为食，人只能活一周。”（沃罗涅日州别格里帮诺夫卡镇劳动街40楼的А. С. 博布罗夫斯基写给И. В. 博布罗夫斯基的信。ПП89485 - В）

1946年11月16日。“……我们活着毫无用处，我们没有食品，也没钱可买。我们简直快要死了：没东西吃。还能再活下去吗？不愿那般活着，宁愿活着进坟墓。一到早晨，加洛奇卡就要东西吃。而我能给她吃什么呢？”（沃罗涅日州坎捷米尔区坎捷米洛夫卡村工人街32楼的Н. И. 科列斯尼科娃写给Д. И. 科列斯尼科夫的信。ПП29386 - И）

1946年11月1日。“……我们的生活条件非常差。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吃，只能以橡实为食，吃了橡实我们才能勉强走几步。今年我们一定会饿死的。”（沃罗涅日州卡拉奇市波德戈林斯基镇红军集体农庄的А. И. 普卢日尼科夫写给И. И. 普卢日尼科夫的

信。ПП09866)

1946年11月12日。“……生活非常艰难，不给发粮食，就是领到的粮食也不足250克。人们没有生病却在死去。死亡率非常高。春天让人恐慌：食品价格现在已经急剧攀升，到了春天就更甬提了。”（沃罗涅日州巴甫洛夫斯克市革命大街13楼的韦罗尔热娃写给A. Ф. 皮斯卡列夫的信。ПП30163）

1946年11月21日。“……简单谈谈自己的生活：没有上班，没有力气，非常虚弱，因吃不饱开始浮肿。得到一丁点帮助的人还能喘口气，而那些未得到者则已浮肿。米糝、豆子、包谷、土豆，无论有什么，请送来，要不就完全没命了。再带点大蒜和葱，因为只给汤，汤里没盐。牙齿已开始晃动。这段时光可真难熬。”（沃罗涅日市26楼30号信箱2分箱的H. C. 朱可夫写给沃罗涅日州里斯基镇苏维埃街6号的Д. А. 季塔列娃的信。）

1946年11月29日。“……我过得很不好，整日里完全饿着肚子坐着，我已没气力活下去了。有时想自杀，但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变成孤儿。向你求助真不好意思，但饥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你也是做母亲的，你也了解，眼看着孩子挨饿是多么的难受。”（沃罗涅日市十月革命二十年街141楼的H. A. 梅尼亚科娃写给沃罗涅日州新乌斯曼区罗加乔夫卡村的A. П. 帕尔申娜的信。）

1946年11月26日。“……我们生活得很不好，食品越来越贵。一到集市，你就觉得可怕。用我们的那点钱买食品可真是可望而不可及。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过。人们从晚上就排队买粮食，我们没去排队，那没用！整天在想着这事，在为食品发愁，头都晕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卖，我不知，我会不会神经失常或会死去。如果人世冷酷，那还不如死去，但又死不了。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沃罗涅日市革命英雄街25号的H. 波波娃写给库尔斯克市雷日科沃镇三号楼的A. H. 波波夫的信。）

1946年12月2日。“……我只剩下一只小山羊了，而我也不得不卖掉它。我快要死了，土豆都吃光了，又不给发粮食，完全没东西可吃。想方设法帮个忙，寄封邀请信吧，我到你那去。饿死在这儿或死在途中我都无所谓。我给你写信，眼泪一个劲地往外流，我已经整整一星期什么都没有吃了。我饿着肚子出门，人们给什么，我就吃什么吧！”（沃罗涅日州新乌斯曼区自由街14楼的H. Г. 亚普雷采娃写给爱沙尼亚共和国科赫特拉西尔韦市油页岩天然气建筑工地宿舍30号信箱的M. C. 亚普雷采夫的信。）

1946年11月20日。“……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艰难，同时还得饿肚子。沃罗涅日州歉收严重。根本就不可能买到面粉、粮食，排队的人成千上万。人们在吃渣饼。要想活总得想法子呀！虽然离死不远，但可怕的是被饿死。唉，这也无所谓，最好是死得快点。我已累了，活得真艰难！”（沃罗涅日市拉索街13号5单元的K. И. 伊万诺娃写给格罗兹宁斯卡亚州果尔斯基区中心街8号4单元的H. B. 伊万诺夫的信。）

斯大林格勒州：

1946年11月4日。“……我们的祖母病得很厉害。她和我们大家都在浮肿，我们饿着肚子已坐了三天了。这种折磨何日是个头？那怕吃些热菜，死了也行，我不想当个饿死鬼。凭卡供应的粮食越来越少：儿童每人150克，母亲和祖母每人100克。一发工资我们就熬点什么吃，然后又等下次发薪。”（斯大林格勒市达尔-果拉镇茨冈街42楼的Г. B. 布罗娃写给И. B. 留林的信。ППИ49240）

1946年11月1日。“……我无法生活。集体农庄什么也不给，因此我们已开始浮肿。我们靠尼娜自己领来的700克粮食生活。冬天要来了，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不知我将怎么生活。”（斯大林格

勒市拉兹古利亚耶夫卡镇无产者街 19 楼的 М. Ф. 普罗科波娃写给 В. К. 普罗科波夫的信。ПП13967 - В)

1946 年 11 月 6 日。“……没有粮食，我们不知道怎样熬过饥荒。不给任何人发粮食，人们开始浮肿。在我们的和邻近的集体农庄都不给发粮食——情况很糟。”（斯大林格勒州伊洛夫林斯基区加卡林诺镇潘申诺林村 Ф/М2 号的 П. П. 伊利亚索夫写给 И. П. 伊利亚索夫的信。ПП37271В)

1946 年 11 月 6 日。“……我活不了多久了：我饿得一点劲也没有了。脚和脸已开始浮肿，头晕。”（斯大林格勒市拉兹古利亚耶夫卡镇第四硅酸盐厂第三宿舍 11 单元的 В. Ф. 诺维科夫写给 И. Ф. 波格丹诺夫的信。ПП36399 - Л)

1946 年 11 月 20 日。“……我们现在不是活着，而是存在着。这种折磨何日是尽头？我们已经开始浮肿，我们在忍饥挨饿，死亡在等待着我们。”（斯大林格勒州 Н - 奇尔斯基区杰姆金村的 П. К. 瓦雷金写给 И. К. 巴雷金的信。ПП71843 - В)

1946 年 11 月 13 日。“……我现在吃的是橡实，那怕禁止吃橡实也要吃，因为许多人吃橡实给吃死了，但是又再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不能再那样活下去。”（斯大林格勒州涅哈耶夫斯区乌波尔尼基村的 Л. Н. 连科夫写给 А. Е. 连科夫的信。ПП24525 - Ф)

1946 年 11 月 14 日。“……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这几天吃这东西差点要了命——胃痛得厉害，然而，除此以外再没东西可吃了。现在能有一点粮食渣也好啊。即便吃这些橡实会死人也没办法。”（斯大林格勒州果尔诺 - 巴雷克列伊斯基区果尔娜娅普罗列伊加村的 А. В. 奇斯洛娃写给 М. Д. 奇斯洛夫的信。ПП33552)

1946 年 11 月 29 日。“……为了活命，我卖掉了一切。再也没东西可卖了，只剩下一件事：要么去死，要么想点别的办法，否则死路一条。我已开始浮肿。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

(斯大林格勒市电车总站的穆尔尼洛写给普斯科夫州奥斯特洛夫斯基区梅尔兹利亚基村的Л. 亚历山德罗娃的信。)

1946年11月14日。“……我们饿着坐在那儿已三天了。我们已经浮肿。凭卡供应的粮食很少：孩子们每人可领到150克。这种折磨何日是尽头。哪怕可以吃上一顿热菜和足够的面包也好啊。”(斯大林格勒市茨冈街42号的Г. В. 布罗娃写给П. В. 留林的信。ПП49240)

1946年11月23日。“……简直难以如此活下去了。计划供应的粮食已拖延了三天。根本就不出售商品粮。我们的腿几乎都迈不动了。人们饿着肚子，有些人浮肿了。”(斯大林格勒市拖拉机厂606楼的伊里科夫斯卡娅写给沃罗涅兹州巴图尔林诺夫加镇的А. 巴兰尼科娃的信。)

1946年11月23日。“……我们过得不好。已经三天了，还不发放凭卡供应的粮食，又没有商品粮可卖。工人们饿着肚子，许多人饿得已浮肿。这哪是生活，简直是受折磨。”(斯大林格勒市拖拉机厂10车间的В. Я. 伊里科斯基写给列宁格勒州加钦娜的卢基班诺娃的信。)

1946年11月24日。“……母亲饿得完全浮肿了，没有什么东西可接济她。两个月没吃过粮食了，我们只有甜菜吃，但是甜菜也快没了。没有粮食吃，孩子们也不去上学。我想自杀，免得目睹这些痛苦。”(共青团区先诺伊村的沙梅金娜写给沙梅金的信。ПП82116)

已将斯大林格勒州发出信件的内容通报给联共(布)斯大林格勒州委员会。

苏联国家安全部“B”处处长 М. 格里博夫

1946年12月

№03629

兹韦列夫关于实行货币改革情况

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7年4月3日)

……用于兑换将要提供近 600 亿卢布的银行券和国库券。若按 5:1 比值来兑换货币，货币总量将减少 480 亿卢布，发到居民手中的新币为 120 亿新卢布。……兑换货币时，需合理地重新估价居民的货币积累，它们主要是居民在战争年代存入储蓄所、国家银行的积蓄，战争期间未曾度假而发给的补偿证明以及 1938 年的债券。

由于币制改革，国家债务将减少大约 700 亿卢布，其中因发行新币减少 520 亿卢布（包括遗失和下落不明的卢布近 40 亿），因居民存款和储蓄而减少 160 亿卢布。

……新币发行应该在废除凭证供应制的时候及时进行，以便公开交易能按统一价格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广大劳动阶层在兑换新旧货币时的损失得以补偿，同时减少商品流通时可能出现的一些暂时困难，防止形成收益投机和维护新币的信誉。

苏联财政部长 A. Γ. 兹韦列夫

1947年4月3日

№093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政府
对英法照会答复文本的决议

（1947年6月21日）

绝密

兹批准苏联政府对英国和法国政府照会^①的答复文本（见附件）。

附 件

法国政府6月19日有关鉴于马歇尔将军6月5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说，并且业经英、法两国外交部长在巴黎的双边谈判中讨论过的制定欧洲经济计划问题的照会，苏联政府已收悉。

苏联政府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当前欧洲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其被战争破坏了的民族经济。不言而喻，如果其生产能力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增大了的美利坚合众国能够提供符合上述目标的援助的话，那么完成这个任务就可能会容易些。

虽然苏联政府目前尚不拥有关于美国可能向欧洲国家提供的经

① 指英、法政府邀请苏联派代表到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讨论马歇尔计划的照会。

济援助的性质和条件的材料，也不掌握有关法国和英国政府不久前在巴黎讨论过的那些措施的情况，但苏联政府还是接受法、英两国政府的建议，同意参加三国外长会议。

按照苏联政府的意见，这样的会议可以于6月27日在巴黎举行。

1947年6月21日于莫斯科

№03630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批准食品和工业品 国营零售价目表》的决议

(1947年12月14日)

第3866号

……从1947年12月16日起生效(卢布和戈币/公斤)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黑麦面包	2.80	3.00	3.20
二级麦面面包	4.00	4.40	4.80
一级麦面面包	6.20	7.00	7.80
黑麦麸粉	4.40	4.80	5.20
二级麦面粉	5.70	6.20	7.00
一级麦面粉	7.00	8.00	9.00
一级碎黄米	5.50	6.00	6.50
荞麦米	11.00	12.00	13.00
一级麦面通心粉	9.00	10.00	11.00
碎精制方糖	13.50	15.00	16.50
一级营养牛肉	28.00	30.00	32.00
高级咸奶油	62.00	64.00	66.00
精炼向日葵油	28.00	30.00	32.00
(非分装)			
一级鲜冻梭鲈鱼	10.50	12.00	10.50
桶腌大黑海鲱鱼	17.00	20.00	17.00

战后苏联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

2号细盐	1.60	1.60	1.80
3号细盐	1.40	1.40	1.60
燕麦	2.20	2.50	2.80

……以卢布、戈比计算：

	一类地区		二类地区		三类地区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高	最高
一类“堪地勒” 苹果（公斤）	8.00	12.00	12.00	18.00	16.00	25.00
一级纯牛奶 （公升）	2.50	3.50	3.00	4.00	1400	5.00
鸡蛋（一类，十个）	10.00	14.00	12.00	16.00	14.00	18.00

……下列商品的统一零售价格（对各类地区）以卢布、戈比计算：

一级格鲁吉亚白毫茶	10克	16.00
一级炒天然咖啡豆	1公斤	75.00
瓶装日古利啤酒	0.5公斤	7.00
100克装奶制冰淇淋	1公斤	20.00
一级欧鳊鱼子、鳊鱼子		
鲟鱼子、上等罐装鲟鱼子	1公斤	400.00
特制莫斯科伏特加	0.5公斤	60.00

……工业商品的统一零售价（以卢布、戈比计算）：

	度量单位	城市	农村
印花布（幅宽60~62厘米）	米	10~10	11~20
特级缎纺织物 （幅度60~63厘米）	米	25.20	28.00

混色衬绒毛料			
(幅宽 142 厘米)	米	108.00	120.00
纯毛波士顿呢			
(幅宽 136 厘米)	米	450.00	510.00
中国绉绸			
(幅宽 92~94 厘米)	米	137.00	151.75
开司米、线呢、编织物			
混纺连衣裙	件	77.00	86.00
女式绉绸毛料连衣裙	件	510.00	560.00
针织半毛混纺男式西服	件	430.00	450.00
波士顿呢里西服	件	1400.00	1500.00
短腰男式黑羊皮鞋	双	260.00	288.00
女式便鞋	双	260.00	288.00
普通男式橡胶套鞋	双	45.00	45.00
.....			
火柴	合	0.20	0.20
(家用) 香皂	块 (100 克)	4.00	4.00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恰达耶夫

№03631

戈格利泽上将的
关于哈巴罗夫斯克农业状况
给阿巴库莫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2月14日）

……每个集体农庄平均应得 500 公顷土地，每个家庭成员平均 130 公顷^①，每个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平均 256 公顷^②，其中耕地 16.4 公顷。725 个农业劳动组合中有 666 个享受拖拉机服务，这里几乎所有的作业均由拖拉机来完成（每年由拖拉机完成全部作业的 82~85%）。

在耕地面积有保障、机械化程度高、土地又较肥沃、气候条件良好的条件下，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集体农庄的农业应该得到顺利地发展。

然而，特别在近几年里，情况并非如此。1947 年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尚未达到战前水平，而那时，即在 1940 年，就远远未能满足城市居民、工业企业和驻扎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苏联军队和海军舰队对农产品的需求。

……在边疆区集体农庄里各种农作物的收成依旧十分低下。例如，1940 年谷物平均收成为每公顷 11.6 公担，而在 1945 年降至每公顷 7.7 公担，1946 年降至每公顷 4.1 公担。……1947 年集体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农庄少交国家 24500 吨或近 150 万普特粮食，这要占原粮食收购计划的 28%。

因此，关于边疆区集体农庄超额完成交国家公粮计划 5 万普特谷物的上报材料根本不能表明边疆区集体农庄经济普遍提高，或社会财富和集体农庄庄员福利有所增长。

……农作物、蔬菜收成低，总产量下降，畜牧业产出率低，这些都导致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产品分配量急剧减少，致使每个劳动日的价值也急剧降低。……大多数集体农庄庄员每个劳动日所得不足 500 克的谷物。近一半的集体农庄给集体农庄庄员发 300 克粮食，而在 1940 年有超过一半的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发 1~5 公斤粮食。

……由于上述因素，相当一部分能劳动的年青集体农庄庄员离开农庄去工业部门工作。1940~1946 和 1947 年集体农庄农户数目相应减少，情况如下：1940 年 34403 户，1946 年 30558 户，1947 年 26908 户。在 1941~1947 这段时间里，集体农庄内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从 79995 人剧减为 57829 人，减少了 22165 人^①，占有劳动能力庄员人数的 40%。播种面积在这一阶段也减少了 21%。

……1947 年在收交公粮期间，一些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竞相虚报完成和超额交公粮的计划，竟对集体农庄庄员采取了不可容忍的措施：强迫他们按交公粮计划向粮食收购站运送或交出种子田里所产的种子。许多已顺利完成粮食交购计划的集体农庄根据党和苏维埃的指示，按劳动日计算的预付款中 15% 尚未发给集体农庄庄员。而所有的粮食却运往大粮仓。1947 年在交公粮计划执行过程中，一些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交粮计划被提高了许多倍。

……党政机关派往集体农庄的全权代表队伍过分庞大，这在组

^① 原文如此，应为 22166 人。

织粮食收购工作中起了消极作用。例如，仅向阿穆尔州的伊万诺夫一个区的31个集体农庄就派了80位全权代表，其中来自区委会23人，来自州委会18人，来自联共（布）边疆区委会39人。

……集体农庄中所出现的这些情况不但使农庄庄员，也使农庄领导人十分反感。例如，维亚泽姆斯基区“红色乌苏里人”集体农庄主席穆拉夫瑟柯1948年2月14日在区执委会会议上谈及集体农庄的状况时声称：“我看不出我们集体农庄的生活条件同监狱里犯人的生活条件有什么区别。”坦波夫区“古比雪夫”集体农庄庄员B.C. 萨亚平说：“没有粮食，那还干活做什么？集体农庄欠我20公担粮食，但一点儿也不给我，全部上交国家。因此人们不愿在集体农庄里干活。”

布里亚区“忠诚道路”集体农庄主席、联共（布）党员希梅拉就长时间拖延收割燕麦，并告诉集体农庄庄员：“没必要急着收割燕麦。即使收割了，还得让你交给国家。”记录在案的还有许多集体农庄庄员因此而递交的退出集体农庄的正式声明。……边疆区集体农庄中出现的这种严重局势正在被一些别有用心心的反苏分子所利用。

例如，阿穆尔州马尔斯基区阿诺索沃村在1948年1月19、20、21日三天里就有不明身份的人在信箱上张贴反苏传单，旨在破坏集体农庄及其领导人的声誉。

……就上述内容我已通报联共（布）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区委书记。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安全局局长、上将 C. 戈格利泽

1948年2月14日

№05565

克济尔灯塔集体农庄管委会 关于收获情况给安德列耶夫^①的信（摘录）

（1948年9月13日）

我们请您解释清楚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要年复一年地把所有的收获都上缴，而且每个劳动日连一克粮食也分不到，是什么导致集体农庄的经济遭到破坏，导致集体农庄庄员不愿意干活。在战争时期，需要供给军队更多的粮食，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高兴地把所收获的一切毫不吝惜地都上缴了，这一切我们是理解的。1945年、1946年、1947年都歉收，但仍然把一切都上缴了，以便能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1948年，我们希望在今年，在完成国家的粮食上缴计划后能按每个劳动日大约1公斤粮食的标准分配粮食。现在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200%，超额上缴计划粮一倍。但是尽管如此，联共（布）州委员会和区委员会给我们的硬性任务是超计划上缴，超出国家计划几倍的任务，这样，每个劳动日什么也分不到，甚至于1949年播种的种子都不够。

我们区的集体农庄庄员们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谁都不关心，我们一年到头不分昼夜地干活，但是到头来一个劳动日却一无

^① 安·安·安德列耶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所获，见不到面包，只靠土豆生活，土豆在春天吃光了，只好从靠土豆转为靠青草……

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图拉恰克区
“克济尔灯塔”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

1948年9月13日

№0952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
参加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苏联代表团的指示（摘录）

（1948年9月29日）

会议记录分送给莫洛托夫和米高扬。

绝密

苏联代表团在今年9月27日开幕的欧洲经济委员会专门委员会^①会议上，应当遵循以下方针……

六、审议执行书记处关于加强贸易和加快欧洲工业发展的可行性报告

1. 在讨论执行书记处的报告时，苏联代表应当指出，该报告是书记处依据苏联代表团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建议做出的，是阐述欧洲经济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的首次尝试。

该报告虽然不乏正确的内容，但也有一些不能接受的内容。苏联代表团应当特别指出，报告将欧洲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即西欧和东欧，做了不正确的对比，并是从此前提出发的。报告的起草者在这方面是沿着马歇尔计划的道路——执行分裂欧洲、使西欧和东欧对抗的路线前进的，企图达到与振兴欧洲各国经济无关的政治目

^①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47年3月27日。其主要活动是发展贸易，并拟定长期经济计划和进行预测等。大会闭幕期间，实际工作由多种专门委员会（煤炭、天然气、农业等）主持。欧洲经济委员会所在地为瑞士的日内瓦。

的。苏联代表团应当指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各国经济合作事业的消极作用，因为这一计划不是为了促进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振兴，而仅仅是援助那些表示准备使自己的经济服从于这个计划反动的政治目的的国家，包括恢复西德的军事—经济潜力。

苏联代表团还应指出，与西欧国家出口有关的问题相比，该报告更多的是关注与东欧国家出口有关的问题，其结果并没有表现出西欧国家实际上应当如何在全欧贸易中履行其义务。由于西欧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这一点显得特别需要。

由于欧洲现在许多重要商品（食品、金属、煤炭、木材等）明显缺乏，扩大其生产有赖于向生产国提供有关设备，建议委员会在发展经济联系方面首先应当研究由生产这些设备的欧洲国家出口所需设备的可能性。

尚需指出，报告中对扩大贸易额的问题设想得太遥远，轻视在现阶段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因此，建议委员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现行欧洲国家之间主要贸易议定书的范围内探讨扩大贸易的可能性。

随后还要指出，报告对发展工业问题应做专门的阐述。

2. 提请专门委员会注意，它的建议应当促使所有欧洲国家之间（不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发展经济联系，而不是让欧洲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对立，在贸易和信贷方面不能歧视欧洲的某些国家。苏联代表团应当把苏联的经济和贸易议定书的实践与美国的限制贸易政策加以对比。苏联代表团应当建议大会反对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国家贸易强加的禁锢和限制。

3. 苏联代表团应当指出，当感兴趣的国家要求欧洲经济委员会提供所需的援助时，欧洲经济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不应当暗中取消发展欧洲国家贸易的正常渠道，而应当通过协商，在寻求发展贸易补充措施的问题上向欧洲国家提供援助。

欧洲经济委员会只能向有关国家政府质询与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对外贸易问题的有关资料。

4. 应当从双边议定书仍然是现今欧洲国家之间贸易议定书主要形式这一现实出发。但同时应当注意，双边议定书并不排斥采用多边贸易的各种形式。代表团应当向欧洲经济委员会下设的发展欧洲各国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建议：任何贸易和结算形式应当保障参加国互利，应当是这些国家谈判的结果，而不应当给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在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建议，以促进扩大双边贸易议定书，并帮助其实施，研究欧洲国家之间三边贸易和多边贸易及外贸结算的途径和形式。

在对待召开欧洲国家贸易大会问题上，苏联代表团应当声明，这个问题应当依据由苏联代表团建议成立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机关，特别是发展欧洲国家之间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另行专门研究。

5. 苏联代表团可以在专门委员会大会上宣布：苏联将继续与所有愿意与苏联在互利基础上进行贸易的国家继续发展贸易。苏联代表团还可以特别宣布：目前苏联在与欧洲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准备以援助的形式，扩大欧洲复兴和发展经济方面急需的商品，例如粮食、化肥、矿产、木材、石油产品、棉纱设备的出口。

6. 苏联代表团应当指出，报告中出现了向欧洲经济委员会提出制定全欧计划或者欧洲国家某些集团计划的任务的倾向；它尤其表现在发展多瑙河流域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建议中。然而，制定这些计划的基础完全没有成熟，目前制定这些计划只能转移对更现实的问题的注意力和精力。

代表团应指出，专门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在促进欧洲国家的工业发展时，应当在其工作中避免制定全欧的工业发展计划或者任何国家、国家集团的计划。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应当依据有关

国家自己提出的申请，协助发展在战后条件下，对欧洲国家的经济意义重大的一些工业部门。因此，代表团还应当指出，执行书记处提出的发展多瑙河流域国家经济的计划是人为的、不能接受的计划，因为它没有建立在多瑙河流域国家自愿及其所提出的计划的基础上。

7. 不反对欧洲经济委员会促进在各方同意的基础上在各国之间交换技术情报。不反对在欧洲经济委员会工作机构认为必要时探讨成立有关这方面机构的合理性。

8. 苏联代表团可以支持关于通过传达执行书记处报告的建议，但反对关于赞同这一报告的建议……

№0953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关系的决议

（1948年12月23日）

秘密

1. 定于1949年1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的秘密会议，建立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

希望每个国家各派出2名代表，尽可能是共产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这次会议。

2. 委托外交部向有关政府通报本决议的第1条，并指出会议是由苏联和罗马尼亚政府倡议召开的。

3. 将苏联和罗马尼亚提出的苏联与新的民主国家密切经济合作纲要的决议草案提交本会议讨论（草案附后）。

4. 指定莫洛托夫同志、米高扬同志为出席会议的苏联代表。

附 录

关于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密切经济合作的决议（草案）

一、由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在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就协商经济政策缺乏经常的联系，不仅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造成损

害，而且从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和英国利用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这一不协调行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一点在当前尤为明显。美国正在利用“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国家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并将这一政策用于反对苏联和新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

新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缺乏协调经济活动也影响到这些国家极其重要的经济部门的发展，对某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

二、新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它们协调一致地出现在外贸市场上，相互在协调经济活动方面保持经常的联系，将促进人民民主国家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促进整个民主阵营事业的巩固。

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拟在享有平等的代表权的基础上，由所有相关的国家，即委员会参加国的代表，组成常设协调委员会。

四、协调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

1. 制定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经济联系计划，对参加国的经济计划进行必要的协商；
2. 协商进出口计划；
3. 监督已经制定的经济合作计划的执行情况。

五、协调委员会只有在相关各方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做出决议。

委员会下设以委员会主席为首的精干的技术机构，主席由委员会所有成员国协商任命。

六、委员会的发起国为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①

① 早在1947年9月3日，科斯托夫在与基尔萨诺夫会谈时就提出了东欧各国需要与苏联加强经济联系的问题。科斯托夫通报说，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进行会谈时，曾谈到这样的问题，即在苏联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可以召开专门的代表会议，以便研究他们之间经济联系的长久计划，以及协商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入更高一级的经济合作。基尔萨诺夫向莫斯科汇报说：“科斯托夫以极大的热情发挥了这一想法”。

No 05566

尼基福罗娃关于集体农庄状况给苏联 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的信（摘录）

（1948年12月）

1948年12月

莫洛托夫州切尔努申斯克区的许多集体农庄处境艰难。许多村庄在完成上缴任务和付清物资技术供应站的费用后几乎就没有粮食可剩了。吃的是土豆，有时有牛奶。在科佩托瓦亚村人们是这样烤面包的：把一桶土豆磨成粉，再加上一把面粉，以便能粘在一起。这种面包几乎没有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至于牛奶，许多奶牛都作为肉类按计划上缴了，交到了屠宰场，最近连怀孕的母奶牛都上缴了。有这样的情况，小牛犊从宰杀的母牛肚子里拽出来后就站了起来，有很多小牛犊甚至还能走动。

牲畜都上缴送去屠宰，但是残杀母牛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因为牛奶可以代替面包，牛奶里有蛋白质。

牛奶是儿童正常发育所必须的食品。如果粮食很少（一桶土豆只放一把面粉），而且又没有牛奶，那么人体就会极其虚弱，全身乏力。

完全有必要规定最低数量的留用粮，这是必须保证的，哪怕是每人（每昼夜）300克面粉也好。土豆是一种骗人的食品，味道很好但不能填饱肚子。粮食状况最差的有以下一些地方：科佩托沃、大叶绍尔、小叶绍尔、克列先斯科耶、格伦、比济亚尔等地。国家

对农民缺粮少衣漠不关心。如果城里不收购这么多的粮食和肉，种庄稼的农民就能吃饱肚子，也不会抱怨了。

由于在切尔努申斯克区有许多没有粮食的村庄，所以必须禁止投机分子榨取粮食的行为。每当逢集（即在每星期三、六、日）时都有许多来自列夫达、德鲁日尼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谢尔吉的投机商采购面粉并运回家去，他们回家后以两倍半的高价出售。比如，他们在我们这里按1普特^①90卢布的价收购白面粉，而回去后按1公斤13~15卢布的价出售。尔后再带着钱赶到这里，买了再回去，往返不停地大量采购粮食。平均每次每个投机商运走506普特粮食，而且人很多，靠近车站的房屋挤满了投机商。总之，一个集市上要来20~25个投机商人。警察局检查过少先队大街（他们离这里很近），但是他们只关心商人们是否运来了布匹。投机商的运输工具是挂在货车车厢后的取暖货车。投机商付给取暖货车车主每人20~25卢布，有时还给护车员塞钱。

莫洛托夫州切尔努申斯克区切尔努什卡村集体农庄女庄员
尼基福罗娃

^① 苏联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03632

贝利亚关于提高劳改营犯人粮食定额 给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

(1949年7月8日)

苏联内务部（克鲁格洛夫同志）报告，目前给囚犯供应粮食的标准仍按战时已降低的定额（平均每天含2660卡路里）。而战前平均每天热量为3378卡路里。

政府已决定提高边远地区和专门的劳动工地上劳改营犯人的营养定额。但大多数犯人每天口粮标准仍不到2300卡路里。

由于降低了营养定额，所以就出现了大量在押犯人体质减弱，以致有的根本不能工作或不能完成加工定额。

为了提高犯人的劳动生产率，苏联内务部建议把粮食定额从每天800克提高到每天900克（而战前是1100克），而其他食品则恢复到战前的定额。这样的口粮标准将含2998卡路里。

请苏联部长会议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

附上克鲁格洛夫同志的方案及该方案的备查资料。^①

贝利亚

1949年7月8日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03635

马林科夫关于呈送
落实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决议的
报告给斯大林的附函

(1950年7月8日)

兹寄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农业局有关落实执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问题及党组织在其中的任务》的情况报告。

格·马·马林科夫

1950年7月8日

附 件

关于落实执行联共（布）中央“关于
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问题及党组织在其中的任务”的
情况报告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50年5月30日《关于扩大小型集体农庄问题及党组织在其中的任务》的决议，目前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都在大力开展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工作。集体农庄庄员们积极参加会议，讨论有关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问题，政治热情十分高涨。集体农庄庄员和领导人在各自的发言中都十分拥护党和政

府关于合并小型集体农庄的措施，认为这是正确的，它将使集体农庄在经济、组织方面继续得以巩固，并使其社会经济能够全面发展。

截至今年7月1日，由于小型集体农庄的扩大，全苏集体农庄数量减少了46000个，是1950年1月全国集体农庄总数的18%。在莫斯科州、列宁格勒州、基洛夫州、斯摩棱斯克州、雅罗斯拉夫尔州、卡卢加州、加里宁州、伊万诺沃州、图拉州、梁赞州、普斯科夫州、沃洛格达州、弗拉基米尔州、大卢加州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广泛开展了小型集体农庄的扩大工作，在这些地方有的小型集体农庄这次确认了归其使用的土地。部分州和加盟共和国因此而减少的集体农庄数量，可由下表中看出：

州、加盟共和国	集体农庄总数		
	1950.1.1	因扩大而减少的集体农庄数	
	1950.1.1	1950.7.1	
莫斯科州	6069	1668	4401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33063	30313	2750
白俄罗斯苏维埃政社会主义共和国	14594	9707	4887
列宁格勒州	2039	580	1459
卡卢加州	3458	1296	2162
加里宁州	7507	6110	1397
图拉州	3396	1153	2243
普斯科夫州	3188	2143	1045
雅罗斯拉夫尔州	3893	2147	1746
弗拉基米尔州	2773	1509	1264
梁赞州	3925	1893	2032
科斯特罗马州	3128	2207	921
大卢加州	3522	1964	1558
伊万诺沃州	2888	1464	1424
沃洛格达州	5281	3495	1786
诺夫哥罗德州	3737	1726	2011
高尔基州	4932	4613	319
奥廖尔州	4171	3445	726
布良斯克州	3061	2291	770

州、加盟共和国	集体农庄总数		
	1950.1.1	1950.7.1	
坦波夫州	3135	2642	493
克麦罗沃州	1595	1320	275
鄂木斯克州	2397	1179	618
斯摩棱斯克州	5486	4051	1435
楚瓦什自治共和国	1923	1691	232
基洛夫州	9150	4639	4511
托木斯克州	1311	1153	158
新西伯利亚州	2672	2357	315
库尔斯克州	4971	4648	323

各地方党组织、苏维埃和农业部门所开展的执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工作，仅仅是小型集体农庄扩大工作的开始。如何评价当前集体农庄的扩大工作，则需要根据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的小型农业组合在按其规模确定使用的土地后能否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而定。1949年1月1日，全苏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除乌克兰加盟共和国西部各州、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和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外，共计有226300个集体农庄，内含1800万农户和2760万有劳动能力的农庄庄员。每个集体农庄平均有80个集体农户、707公顷可耕地和122个有劳动能力的庄员。46000多个集体农庄（占总数的20.4%）拥有的农户不到30户，其中8670个集体农庄拥有的农户在15户以下。

根据1948年的播种面积的规模集体农庄划分如下：

类别（按集体农庄播种面积）	集体农庄数量	比例	播种面积（公顷）	比例
100公顷以下	35400	15.5	2558	2.5
101~200公顷	52000	22.8	7807	7.7
201~300公顷	34700	15.2	8662	8.6

续表

类别(按集体农庄播种面积)	集体农庄数量	比 例	播种面积(公顷)	比 例
301~500 公顷	39100	17.1	15385	15.2
501~700 公顷	23900	10.5	14256	14.1
701~1000 公顷	20500	9.0	17308	17.1
1001~1500 公顷	14300	6.2	17388	17.2
1500 公顷以上	8400	3.7	17741	17.6

由以上资料可知，半数以上（54%）的集体农庄播种面积不到300公顷，这些集体农庄的播种总面积仅占全苏集体农庄播种面积的19%。

播种面积不到200公顷的小型集体农庄大多分布在中部和西北部地区。这类小型集体农庄在诺夫哥罗德州有3300个，占该州集体农庄总数的89%；在列宁格勒州有1818个，占88%；在莫斯科州有4780个，占79%；在沃洛格达州有4128个，占78%；在普斯科夫州有1980个，占68%；在弗拉基米尔州有1817个，占65%。

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开展的小型集体农庄合并工作使扩大后的集体农庄可耕地面积和集体农户数量有很大增长，大大缩减了行政管理人员的编制及开支；把一批有威望、训练有素、政治可靠、业务合格的干部选拔到主席岗位；改善对集体农庄农机站的服务质量，在各集体农庄建立起坚强的党、团组织。在许多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小型集体农庄的扩大工作使农村苏维埃数量得以减少。

现列举一些事实材料说明集体农庄合并后所引起的变化，扩大小型集体农庄工作的进行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集体农庄合并前后的规模。随着小型集体农庄扩大工作的开展，其经营规模在耕地面积和农户数量上都有显著增长，见下表：

州和加盟共和国	加强前集体农庄平均规模		加强后集体农庄平均规模	
	农户数量	耕地面积 (公顷)	农户数量	耕地面积 (公顷)
1	2	3	4	5
莫斯科州	42	198	152	713
列宁格勒州	29	146	98	506
弗拉基米尔州	46	260	190	1070
图拉州	45	412	133	1215
斯摩棱斯克州	39	287	104	750
科斯特罗马州	46	272	162	955
大卢加州	37	214	124	723
加里宁州	35	213	120	725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59	610	132	1344
伊万诺沃州	33	220	121	766
托斯木克州	48	386	119	947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	54	592	108	1183
诺夫哥罗德州	27	198	116	746

由上表可以看出：所有各州和加盟共和国的小型集体农庄在合并过程中其耕地规模和农户数量增加了1~2倍。

在扩大小型集体农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许多州和加盟共和国在执行联共（布）中央关于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决议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缺点。

某些地区许多集体农庄在合并后按划归土地的规模仍然很小。例如，伊万诺沃州某些地区扩大后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还不到300公顷。诺夫哥罗德州和大卢加州个别合并后的集体农庄在扩大后集体农户仍不到20~25户。

许多州党的边区委员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在召开小型集体农庄合并会议之后，并未给予调整后的集体农庄必要的帮助以协调工作，在这些集体农庄中组织筹备时间拉得过长，致使合并后的集体农庄在经济上遭受损失。

列宁格勒州奥列杰日区和奥西米区的党政机关在领导小型集体农庄合并工作中暴露出严重失误。这些地区的区委员会和区执行委员会在合并小型集体农庄的会议之后，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帮助新选

举的农庄管理机构。区委员会和区执行委员会没有有效地监督财产移交工作，致使某些集体农庄财产统计工作进行得很糟，现在财产与账面记录不符，未对财产统计依据凭证进行核对，从而为盗窃集体农庄的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突击手”集体农庄原主席不向新选出的奥斯明区基洛夫集体农庄管理机构移交职权，并在资产登记时隐匿了一辆卡车、一个车座和几个汽车外胎，价值约 20000 卢布。“红色斯拉夫人”集体农庄原主席没有将 1769 公斤种粮移交给扩大后的奥斯明区“红旗”集体农庄管理机构，隐瞒不报，然后私自卖掉。奥斯明区“苦难”集体农庄主席将留做种子的 2000 公斤燕麦私藏不报。许多地方不向新组建的农庄移交农具和资产，隐匿不报并陆续偷光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农庄没有及时制定生产计划和向各生产队布置任务，合并后的集体农庄仍沿用各农庄及生产队原有的生产计划，而没有重新修订生产定额和劳动日。

据卡卢加州党委报告，随着集体农庄的合并，有些地方出现了盗窃、挥霍农庄财产钱物的情况，而小型农具尤为严重。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两个农庄主席得悉农业劳动组合将合并后，杀了八只羊，将羊肉分给农庄庄员。梅绍夫斯克区在区党委召开的有关扩大小型农庄问题的积极分子会议后，有 40 多位农庄代表涌进国家银行，提取现金，以便在农庄合并前花掉。该州的乌戈茨克—扎沃德区在农庄合并中出现了售卖土豆的情况。

某些州（加里宁、明斯克州）的区党委和苏维埃机关领导在贯彻小型集体农庄合并工作的过程中有命令主义的倾向。

现在苏联农业部正采取措施帮助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搞好农庄调整后的生产工作。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农业局将继续监督检查联共（布）中央《关于扩大小型集体农庄的问题及党组织在其中的任务》决议的执行情况。

阿·科兹洛夫

1950 年 7 月 7 日

№03637

斯塔罗夫斯基^① 关于工人离职和旷工情况
给贝利亚的报告（摘录）

（1951年6月5日）

	1950年自动离职工人数			1950年旷工工人数		
	工业企业	建筑企业	总计	工业企业	建筑企业	总计
各共和国各部署总计	167500	154200	321700	552300	317500	869800
原冶金部属	15800	5200	21000	38400	7100	45500
煤炭部属	44300	44500	88800	81500	97900	179400
石油部属	2300	9100	11400	9900	20400	30300
电力部属	2600	11500	14100	12500	19000	31500

① B. 斯塔罗夫斯基，时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局长。

№06961

巴甫洛夫娜关于农村生活状况

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1月3日)

斯大林同志，我给您写信是因为迫不得已。请原谅我给您添麻烦，但我还是决定这么做。我对于自己的艰难的物质生活状况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最终得出结论，那就是您能够帮助解决我在信中所谈的问题。

我是库尔干州乌克相斯克区柳比莫夫卡农业委员会集体农庄庄员。我在集体农庄的牲口棚工作。我一年到头劳动且没有休息日。我的女儿去年也干了一年，而我们仍然无法养家糊口。我还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如何能供他们上学读书？用什么养活他们？我不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供养他们。在一年间，我工作了约500个劳动日，却只挣得140公斤粮食，因为另外的200公斤被扣除用于偿还去年的债务。我的女儿读完3年级便停学了，由于缺少食品我不得不把她送到城里当保姆，她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劳动日不支付现金。我们只好把卖牛奶的钱用来交税和购买面粉，以便养活自己。我的另外两个孩子——一个9岁，另一个14岁，都不得不辍学（一个孩子上3年级，另一个上5年级），是因为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鞋子。

我们集体农庄的境况非常糟糕，去年我们农庄死亡牲口1000多头。一天死了13头。去年牧场长满青草，而牲口却死了。现在又开始死牲口，已经有5头小牛犊死了。我真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去年也没有追究哪一个人的责任，到今年仍然如此。

集体农庄主席瓦西尔科夫领到1200卢布，整天酗酒。去年，当牲口开始死亡的时候，他来到了我们的村子，他命令把牲口（冬天）赶到没有收割的燕麦田里。他们赶走了牲口，而第二天，几乎所有的牲口都死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们将部分幸存的母牛和已宰杀的牲口都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去出售生肉，主席用卖肉的钱随便买了些牲口。这就是他们干的事。买回来的牲口都是干瘦的，也很快死去了。农庄主席瓦西尔科夫将自己家那头干瘦的母牛连同运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牲口一起卖掉，然后给自己挑了一头非常好的母牛犊。

斯大林同志，这到底该怎么办？干了一整年的活却挣不到一块面包。

这些天来我忍不住了，我去了一家商店买烤面包，但售货员说什么也不卖给我面包，他说，面包只供应教师。这太让我伤心了：我们生产面包却吃不到面包。连孩子的面包也没有。我们只能吃土豆。而对于吃肉的事，连提都不用提。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肉。

斯大林同志，您是否能派一个可靠的人来调查这些事实并惩治那些有罪的人。库尔干全州的人都在传说，去年冬天死了非常多的牲口，因此，大概连州里的工作人员也不太想过问这件事。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他们的责任。据说，报纸上有消息说好像州党委书记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了，要知道，这个书记所领导的州，在一个冬天里就死了27万头牲口。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这样的工作不像样子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呢？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可能在什么地方问得不对。我的丈夫和我的一个儿子 1941 年在前线都阵亡了。

库尔干州乌克相斯克地区柳比莫夫卡农业委员会

赫鲁晓夫集体农庄农村劳动者

日杰列娃·奥莉加·巴甫洛夫娜敬上^①

1952 年 11 月 3 日

^① 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 1952 年 12 月 18 日的决议（第 3 号会议记录第 130 条），为了核查该信中所阐述的事实，派出了中央农业部指导员 П. 乌拉耶夫。

№06964

米哈伊洛维奇
关于集体农庄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1月20日)

报 告

在研究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可以说，共产党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这一点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的，一些党员，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党员，虽然也研究了我们的政策，但是对党的政策了解得不够深入，以至于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尤其对农民和工人具有很大的影响。

按照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我们国家在今年，即1952年粮食总产量已达到80亿普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的产量比1940年增长了48%。

拿1940年之前的战前时期情况来说，即使在涅任地区，商店里各种各样的面包也应有尽有。而现在生产的尽是黑面包，质量很差，特别是病人无法吃这种面包。此外，商店里的面包供不应求，而白面包根本就见不到。难道地方领导人就不纠正这件事？他们不愿意理睬这件事是因为他们自己一切齐备，他们看不见这些困难。而如果有人向您申诉，那么，他们就会向您报告说，这里一切都很好。

再来看看市场的情况，难道检疫站是专门为了搜刮钱财而设立

的吗？想出一种口蹄疫病来，于是就说牲口得了此病。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种病。刚刚结束了结核病，现在又来了口蹄疫病。农民不能出售生肉和交税。

大规模消灭牲口的事情开始了。宰杀牲口是因为对劳动日不支付饲料报酬，而如果拿村子里的情况来说，那么在每个村子里平均还有 200~300 公顷的草场没有收割。又没有地方出售生肉，因为在市场上设立了检疫站。老百姓对此反应很强烈。

集体农庄到底还有多少丑事，是无法说清的。请看看格里戈罗夫克村的克鲁普斯卡娅集体农庄的情况吧：任人怎么挖苦嘲弄，既没有人去打谷脱粒，也没有人去收土豆。区领导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件事。我想，如果把这种情况汇报到莫斯科您那里，那么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会高兴。而现在，您要是同农民一起讨论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么农民根本就不想听，因为无论如何它和大家都协调不起来。

党的州委书记罗吉涅茨来到涅任，作关于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报告，但他一个村子也没有去过，也不去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他在代表大会上讲过，州里一切都很好。斯大林同志，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不过仅仅是切尔尼戈夫州的情况。

斯大林同志，您还是应该派您身边的人去秘密地检查集体农庄的事情，然后再向您报告。

没有面包。两个月不让去市场。税款应该如期交付。还要照样去上工。事情简直糟糕透了。应该设法纠正这些毛病。

集体农庄都在打针，为了使母牛不用与公牛交配就可以受胎，而如果发现母牛怀了胎，那么同样用打针的方法使之流产。对此什么也不能说。如果您刚一开口，立即就会有人说，“闭嘴，难道你不相信苏联的医学吗？”这样就使你不说话，因为弄不好会叫你

去坐牢。您的意见应该对这种情况有所帮助。^①

切尔尼戈夫州涅任区科列斯尼科夫村公民
达维坚科·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
1952年11月20日

① 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对该声明进行了核查。在苏共中央财政贸易计划部副部长 C. 基斯林和中央指导员 A. 特罗费莫夫致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的 1952 年 12 月 31 日的报告中，以及 1953 年 1 月 5 日致斯大林的类似报告中，都对该次核查的结果进行了汇报。对于这次核查的结果，还有另一份报告，即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 Л. 马利尼科夫致斯大林的 1953 年 1 月 5 日的报告。

№06962

斯捷潘诺维奇 关于农村生产生活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1月22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从今年11月15日州农业局的报告中得知，在本年内我们州的大部分集体农庄为畜牧业储备的粗饲料还不到50%。因此，只能饲养集体农庄计划中单栏期上半年的牲口，而不得不使单栏期下半年的牲口处于饥饿状态。由此可见，大概会像去年一样发生大批牲口病死的现象。例如在我们集体农庄里就曾约有300头牛死亡了。

我们这个地方的情况就是这样。无论有没有饲料，牲口存栏总数的计划都要保持。因此结果就是这样：牲口只能处于半饥饿状态，于是牲口渐渐消瘦，而接近春天的时候便死亡了。那些比较能经受不良条件而幸存下来的牲口，在经过了饥饿的单栏期后，到夏天也只能勉强恢复它们在冬季失去的健康。而奶牛很少产奶。所以庄员们说得很正确，我们没有奶牛，只有牛尾巴。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员或无党人士，也许我们不是出色的唯物主义者，但我们总还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像耶稣·基督用5个面包和5条鱼养活5000人那样创造奇迹。我们不能凭空瞎想。我用这些事例想说明，国家计

划传达到集体农庄的目的，不是为了搞垮集体农庄的经济，相反，是为了改善集体农庄和庄员们的经济状况。计划总归是计划，但是，当事情发展到了牲口因饥饿而死亡和无法挽救时，就应该采取认真的措施，而不能置之不理和用计划来推诿。最好是预先考虑到饲料平衡的所有可能性，正像李森科同志所教授的那样，按照现有饲料喂养和保持牲口。由于缺少饲料，对那些尚未病倒的牲口，比较适合于宰杀食用。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让牲口病死然后将其埋入坑内。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苏联农业部长 1952 年 2 月 28 日在“关于区农业局标准编制”第 233 号命令中说道：“在有 1000 箱蜜蜂的区，可以保留一个养蜂业的农艺师，少于 1000 箱蜜蜂的区，缩减一个养蜂农艺师（编制）”。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您相信，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一生从事养蜂业。养蜂业是一种使用劳动力少但收益很高的经济部门。就在去年，即 1951 年，我从每个越冬蜂箱中提取了商品蜂蜜 75 公斤，今年提取的是 50 公斤。我一共养了 8 箱蜜蜂。今年春天，附近的高尔基州莫尔多夫希科夫斯基地区的“失去列宁六年”集体农庄楚德村，从蜂房越冬室中出室了 50 箱蜜蜂。可获得商品蜂蜜 1000 公斤，并确保给每箱蜜蜂过冬储备食用蜂蜜 20 公斤，这样可以使养蜂场出室的蜜蜂提高到 65 箱。而在养蜂场工作的只有一个女养蜂人，名叫叶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哈普科娃，她是集体农庄庄员，文化程度不高，只是第二年养蜂，实践经验不足，无疑需要养蜂农艺师的帮助指导。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至于说我自己这方面，我不仅建议在有蜜蜂的地区要有农艺师，而且还建议在没有蜜蜂的地区，也必须有养蜂农艺师，以便繁殖蜜蜂。养蜂业在我们的国民经济中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请原谅我打搅您，真是拿俄罗斯人的天性没办法。非常盼望同您本人见面。紧握您的手。^①

高尔基州瓦恰区佩尔托沃村村民 弗·格鲁宁

1952年11月22日

① 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1952年12月26日的决议（第4号会议记录第318条），责成中央农业部（科兹洛夫）和苏联农业部（贝内迪克托夫）对信中所提的问题进行研究。

№06963

瓦西里耶维奇
关于集体农庄状况给斯大林的信

(1952年12月23日)

关于集体农庄状况的汇报信

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指出，对党隐瞒实情是最严重的罪恶，是与党的性质不相容的。

我认为我向您真实地报告州和区的各集体农庄的状况是我作为一名党员的义务，农庄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和不能容忍的地步，今后再不能让集体农庄处于这种状态，非对农业劳动组合章程进行修改不可。

具体问题是：

1. 所有男女青年都离开农村去企业工作和学习，并不再回到集体农庄。从苏联军队复员回来的战士不去父母居住的地方，而是在城市上户口并定居下来。这样，集体农庄就没有年轻干部了。

2. 男人们不停地终年在外劳动却不给农业生产提供任何帮助，而他们的妻子使用丈夫挣回来的钱。即便在集体农庄劳动，生产效率也是非常低，而且总是在集体农庄生产队长或领导人的强制下，或者在没收宅院旁自留地的威胁下干活。

因此，集体农庄的生产队长和领导人无法去抓主要问题，而是把精力放在琐事上，走村串户劝说和说服庄员们上工。

3. 年满 60 岁的男人和 55 岁的妇女，尽管体力好，身体健康，但是几乎都不在集体农庄劳动，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享受国家补助金，还有从自留地得到的现金收入，再加上儿子或女儿挣的工资。

4. 举家从农村迁往城市还在继续，一户户从农村迁往新的居住地。这样一来，农村的衰败非常严重地影响到集体农庄的整个工作进程并涣散了劳动纪律。

5. 集体农庄中的马匹足够使用，但谁也不用它来耕作。马匹没有固定专人经常管理，无人愿意干这份差使。因此，集体农庄在秋冬季用于喂养马匹耗费了大量的粮草。

6. 牲口棚和办公设施均遭到破坏，而日常维修或建设新的标准建筑根本就没有人干，虽然集体农庄完全拥有足够的专业劳动力。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例如，夏伯阳农庄的许多木工、泥瓦匠、家具工和其他人都到“巴黎公社社员”集体农庄去干活挣钱了，而“巴黎公社社员”集体农庄的人又到夏伯阳农庄来挣钱。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到处都有，并严重影响到诚实的集体农庄庄员们的劳动纪律。

7. 由于最好的劳动力离开集体农庄去从事副业和工业，集体农庄无力担负田间劳动，所以在最近几年，工业企业和机关不得不在有损于自己的生产任务的情况下派遣工人和职员去收割和做其他事情，这就不是偶然的了。

但是，因为工人和职员毕竟不是农民，所以，他们的田间劳动没有数量和质量，因此也损失了不少收成。

必须放弃这种劳动方式，使集体农庄在没有工人和职员的帮助的条件下有组织地和齐心协力地完成所有的农活。

8. 1951~1952 年间，大部分集体农庄的劳动日价值不超过如下标准：

谷物——200~300 克/一个劳动日

土豆——2~3公斤/一个劳动日

现金——

干草——

这样的劳动日价值严重影响了成年累月在集体农庄干活的农庄庄员（寡妇、家庭人口较多的人及其他人）的积极性，而这些农庄庄员却是集体农庄的主要支柱和最值得信赖的力量。

9. 由于集体农庄的困难非常严重，有时集体农庄的领导人简直无法工作，每天都得考虑：今天派谁去养畜场搞饲料，安排谁去打扫马厩，谁将去拉粪肥和做其他事情等等。因此，农庄主席不得不挨家串户劝说，说服，向庄员们解释，而这件事每天都得做，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更糟糕的是这样做会损坏自己的威信。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请您不要把我的信当成一个害怕困难和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机会主义者、胆小鬼或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写的。

我诚心诚意地说，我正满怀热情和无尽的愿望在这个困难重重的岗位上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在我所负责的集体农庄执行党的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农庄的政策。

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所以我决定给您写一封简短的信汇报集体农庄的形势，最近两年以来，我感受到和看到有些不对头的东西，有些东西正在妨碍着集体农庄的正常发展和巩固，或许，人们没有向您报告这些情况，我想，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做错。

我向您提出一个请求。

党把我从城市派到了集体农庄去工作。我的祖辈和父母以及我本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来都没有搞过农业工作，所以我现在面临的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仍将坚定地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我所领导的夏伯阳集体农庄位于一个不大的城市附近，坐落在山上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个农庄堪称是一个标准的模范农庄。

我作为从城市派来的使者，没有一分钟不在考虑要把这个城郊的农庄变成一个全区实力雄厚、美丽的模范农庄，要使它以自己的美丽和富饶，像一盏灯塔给其余的农庄照亮道路，要使矗立在那山上的那伸展双手并注视着人民前进的伟大斯大林的塑像更加光彩夺目。

因此，我鼓足勇气请求您，您是否有可能在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农庄的工作方面向夏伯阳集体农庄提供政府帮助，因为夏伯阳集体农庄很需要政府的帮助。^①

集体农庄主席、苏共党员 费·奥布拉兹奇科夫

地址：弗拉基米尔州苏多戈达区

夏伯阳集体农庄管委会

1952年12月23日

^① 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1952年12月31日的决议（第4号会议记录第541条），责成中央农业部（科兹洛夫）和苏联农业部（贝内迪克托夫）对该信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

№03639

斯塔罗夫斯基关于苏联消费水平 给米高扬的报告（摘录）

（1953年9月19日）

绝密

1. 苏联人均一年消费食品数量（公斤）

	1913年	1923/ 1924年	1928年	1930年	1940年	1952年
面粉、大米、通心粉制品	200	223	214	208	195	190
土豆	75	149	130	147	112	190
蔬菜及瓜类作物	40	-	72	93	64	61
牛奶及乳制品	154	160	182	157	130	159
肉及油脂	27	19	32	28	21	24
鸡蛋（个）	48	33	60	49	59	69
鱼及水产品	6	3.2	3.5	5.4	4.9	7.3
植物油	-	2.1	2.6	2.4	2.6	3.7
糖	8.1	3	7.5	7.8	8.7	16.2

2. 莫斯科市工人家庭消费食品量

食 品	人均年消费量（公斤）			1952年与该年的百分比	
	1925年	1940年	1952年	1925年	1940年
粮食及粮食制品	190	242	217	114%	90%
土豆	101	85	114	113%	134%

续 表

食 品	人均年消费量(公斤)			1952年与该年的百分比	
	1925年	1940年	1952年	1925年	1940年
蔬菜及瓜类作物	43	52	57	133%	110%
水果	16	5	14	88%	280%
牛奶(升)	46	38	63	137%	166%
乳制品	-	4	7	-	175%
动物油和植物油	8.6	9.2	12.0	140%	130%
蛋(个)	96	86	99	103%	115%
肉及肉制品(代用品)	48	41	51	106%	124%
鱼和鱼类制品	11.5	9.6	11.3	98%	118%
糖及糖果制品	13.7	27.7	31.1	230%	112%

3. 农民家庭基本食品消费量

基本食品	人均年消费量(公斤)			
	1923/ 1924年	1940年	1952/ 1953年	1952/1953年与 1923/1924年的%
粮食及粮食制品	298	257	250	84%
其中白面包	72	120	124	172%
大米及豆类	24	14	9	39%
土豆	159	165	278	175%
蔬菜及瓜类作物	49	63	68	138%
水果	-	3.6	5	-
牛奶及乳制品(代用品)	142	166	181	128%
动、植物油及人造黄油	1.9	2.9	3.6	190%
蛋(个)	32	52	75	230%
肉及肉制品	12	17	17	140%
糖及糖果制品	0.9	3.2	6.8	760%

以上数据是通过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19 个边疆区、州及自治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47 个州比较得出的。被列入此项调查的农户家庭 1923~1924 年为 5364 户，1940 年——10116 户，1952~1953 年——11883 户集体农庄家庭。

№03640

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 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 给赫鲁晓夫的报告（摘录）

（1953年10月22日）

绝密

……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亿8490万普特。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产品数量约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2.8%。去年同期收购粮食19亿409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9.5%。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2亿5600万普特。

1953年粮食收购计划的完成情况按其进项类别，其数据如下表：（单位万普特）

	计 划	收 入	完成计划%
公 粮	53070	45560	94.5%
给农拖站实物支付	104130	92790	90.3%
集体农庄返还贷款	5920	5440	93.2%
国营农场上交粮食	18880	21970	116.4%
国营农场返还贷款	-	110	-
除谷物外加工费用	182000	165880	94.4%
谷物加工费用	6000	2610	43.6%
总 计	188000	168490	92.8%

……截至今年10月20日在81个州、边疆区和共和国中，有17个州和共和国完成了粮食收购计划，且超额完成计划2470万普特的谷物。